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抗日战争史(中)



后 记

在本卷编写过程中，得到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的指导。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出版社及本院有关部门，给予了支持帮助。彭明、王淇、张注洪、王桢林、丁守和、王振德、吕永和、马仲廉、何理、莫阳、沈宗洪、傅吉庆、吴春秋、谢钢等同志，参加了中卷史稿评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还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3年3月

附 录

大 事 记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在卢沟桥回龙庙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随后，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7 月 8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7 月 9 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战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

7 月 11 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立即向华北增兵。

7 月 12 日蒋介石电示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以下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抵抗日军。

伪宁安县三道河子森林警察大队 150 人，在大队长李文彬率领下反正，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 5 军，编为警卫旅。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 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准备应战”。

7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同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

7 月 25 日东北抗联第 1 路军总司令部发布《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

7 月 28 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将领第 29 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次日北平失陷。

7 月 30 日天津沦陷。日军侵占大沽。

7 月 31 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

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获释出狱。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成立。

宋美龄等发起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成立。

东北抗日联军第 3 军党委作出《关于军队中党的工作问题》的决定。

8 月 2 日日军第二次动员的第 5、第 6、第 10 师陆续到达天津。

8 月 6 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地区，整装待命。

8 月 7 日中国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及国防联席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于 9 日赴南京出席会议。

8 月 9 日日军在上海制造“虹桥机场事件”。

日军参谋部命令中国驻屯军及关东军对察哈尔省作战。

8 月 13 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

8 月 14 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发表《帝国政府声明》。

日军下令编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上将）。

8 月 16 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划全国为 4 个战区，建立战时体

制。

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5日结束。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

8月23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在吴淞登陆。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发布《关于抗日救国宣传运动的紧急通知》。

8月31日日军编成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上将)。

9月4日国民政府修正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9月6日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进一步阐明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对日本侵华提出申诉书。

9月13日日军侵占大同。

中国军队同日军展开太原会战,至11月8日结束。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力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于平型关前线伏击日军,首战告捷。

9月29日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周保中在四道河子联军密营主持召开吉东省委常委会议。

10月1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四相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

10月5日日军攻占德县。

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宣言,斥责日本在华侵略行为实际破坏《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

10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筹备委员会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

日军占领石家庄。

10月1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10月13日忻口战役开始。同时,中国军队进行正大路防御战。

10月14日日军编组第10集团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参加上海方面作战。

10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成立,任弼时为主任。

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袭击代县阳明堡机场。

10月26日日军上海派遣军占领大场镇。

10月27日在日本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作《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的报告。

本月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军长祁致中。

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

11月3日《九国公约》参加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日本和德国拒绝参加。

11月5日日军第10集团军从杭州湾的金山卫和全公亭登陆，包抄上海。

11月6日意大利参加日、德防共协定。

11月7日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日军组成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上将），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集团军。

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

1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八路军发出分兵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准备反围攻的指示。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

毛泽东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11月18日日本发布大本营令。

20日，设置日军大本营。

11月20日日军逼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11月22日在关东军策划下，伪“察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于张家口联合成立“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

11月24日日军首次围攻晋察冀边区。

本月山西新军进至晋东南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日伪军开始对活动在伪三江省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动大规模“讨伐”。

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

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和平”。

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路线及组织问题，14日结束。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并开始进行大屠杀。

12月14日日本指使汉奸王克敏等，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2月17日蒋介石在武汉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

全国抗日大同盟成立，总部设在汉口。

12月18日日军命令华北方面军进攻山东。

12月24日中共山东胶东特委书记李滇领导胶东人民在文登县天福山举行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3军第1大队。自11月至翌年3月，山东各地人民举行了10次较大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

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

秋、冬东北抗日联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钳制与打击日伪军，配合全国抗战。

1月5日苏联志愿航空队百余人抵武汉，加入中国空军作战。

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驻南昌。

1月8日日军编成驻蒙兵团。

1月15日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

1月16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建立能与日本合作的新政权。

本月东北抗联第2路军成立，所属第4、第5军主力西征。

2月3日徐州会战开始。

2月4日和5日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出破袭同蒲、平汉、正太等铁路和邯（郸）长（治）公路的作战命令。各部广泛展开破袭战，有效地钳制和打击敌人，支持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

2月18日日军飞机空袭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中国空军第4大队与日军激战。

本月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开创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晋西北军民粉碎日军首次围攻。

3月2日中苏签订《关于使用5000万美元贷款之协定》。

3月6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第120师，集中主力攻击日军一路，打破其对晋西北根据地的围攻。

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并通过《宣言》、《告世界文艺作家书》及《告日本文艺作家书》。

3月28日日本扶植汉奸梁鸿志等，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4月1日日本公布国家总动员法。

4月7日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

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

4月27日晋东南军民反日军“九路围攻”作战胜利结束，历时23天。

本月八路军第129师和115师各一部向豫北、冀西和晋南发展。

白求恩率领医疗队来华援助八路军抗战。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

5月5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洽商军火货物交换方法。

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

5月20日中国空军飞抵日本长崎、佐世保市上空散发传单。

本月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和雁北支队东进恒山和北平以西地区。

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转移，同时决定决黄河堤坝放水。9日，花园口决堤。

6月12日武汉会战开始。

本月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冀东人民随即举行武装起义。

7月1日新四军军部北移至皖南泾县云岭。

7月2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7月4日国民政府规定每年7月7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

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开幕。

7月上旬滇缅公路建成通车，畹町至昆明全长959公里。

7月29日日苏两国军队在中国吉林珲春县境的张鼓峰发生冲突。

本月八路军第 115 师、第 129 师各一部挺进冀鲁边地区。
8 月 5 日第 9 战区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
8 月 6 日毛泽东、张闻天等发出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
8 月 21 日宋庆龄在广州发表广播演说，斥责美国向日本提供军火。
本月八路军冀南地区部队发起漳南战役。
 新四军苏南部队粉碎日军首次围攻。
 八路军第 120 师一部创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9 月 1 日武汉保卫战之瑞昌前线获胜。
9 月 7 日中国政府向国联揭露侵华日军多次使用毒气。
本月八路军第 115 师主力在汾（阳）离（石）公路三战三捷。
 日军在进攻武汉、广州期间，对晋察冀边区五台和冀西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围攻，晋察冀边区军民和第 120 师主力展开反围攻作战。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10 月 5 日据日方公布：7～9 三个月东北抗日联军 1.6 万余人，在三江地区与日伪军作战 321 次。
 10 月 8 日台湾爆发反日暴动，遭到镇压，200 人被杀，四五百人被捕。

 10 月 12 日日军 3 万人在广东大亚湾登陆。
 10 月 21 日日军占领广州。
 10 月 27 日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本月广东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1 月 3 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日、“满”、华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
 11 月 12 日蒋介石密令焚毁长沙全城，实行“焦土抗战”。
 本月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东江下游、珠江三角洲、雷州半岛等地区，积极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12 月 5 日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开展海南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2 月 18 日汪精卫自重庆叛逃，19 日抵河内。
 12 月 31 日美国照会日本重申不承认所谓“东亚新秩序”。
本月八路军第 129 师师部率第 386 旅主力进入冀南。
 八路军第 120 师主力东进冀中。
 八路军第 115 师主力挺进山东。

1939 年

1 月 1 日国民政府重申严惩民族叛逆令。
1 月 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
1 月 7 日冀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春季反“扫荡”。
1 月 21 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开幕。
本月新四军创建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2 月 7 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

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

2月23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方针。

本月八路军第115师一部东进，发展和巩固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

3月1日日军开始进攻八路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3月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部署南昌会战。

27日南昌失陷。

3月3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治安整顿纲要》。

4月5日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秘密签订亡华协定阴谋暴露。

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

5月1日随（县）枣（阳）会战开始。

5月3日日机对重庆进行大规模空袭。

5月5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东汤池成立，张云逸兼指挥。

5月11日日苏军队在中国东北诺门坎地区发生冲突。9月15日达成停战协定。

5月26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区域。

5月3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成立，张寿钱（李兆麟）任总指挥。

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等由上海去日本，洽商成立伪政权事。

6月1日鲁中沂蒙山区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方针》。

6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

6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

6月16日《中苏通商条约》在莫斯科签订。

6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7月初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7月中旬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开赴华北敌后。

7月24日日英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这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

8月1日八路军第1纵队在山东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

8月28日日本平沼内阁辞职。30日阿部内阁成立，宣称：处理中国事变，建设“东亚新秩序”乃日本基本国策。

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欧战爆发。

在日本策划下，伪“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改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9月4日日本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上将），统一对华北、华中、华南侵华日军的指挥。

9月5日日本政府声称，正全力解决“中国事变”，对欧洲战事采取不干涉态度。

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

9月25日八路军第120师开始进行陈庄战斗。

本月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第3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

10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第9战区划分为第9、第6两个战区。

10月5日东北抗联第1路军决定分散在长白山地区坚持艰苦斗争。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10月25日晋察冀边区军民展开冬季反“扫荡”作战。

10月30日重庆至仰光的空中运输线开通。

11月7日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在涞源黄土岭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歼灭其所部第2混成旅主力。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陈毅任总指挥。

11月8日新四军第3支队在皖南繁昌展开反“扫荡”作战。

11月12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在重庆开幕。

白求恩医生因医治伤员中毒，在河北唐县逝世。

11月15日桂南会战开始。

本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由延安抵达津浦路西淮南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12月8日晋冀豫边区军民发动邯长公路破击战。

12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晋西南事件及我们的方针的指示》。

12月20日蒋介石秘密颁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

12月23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成立，作家鹿地亘任主席。

12月30日汪精卫卖国密约《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在上海签字。

本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确定华中新四军的战略任务为：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

1940年

1月5日日机轰炸滇越铁路。

1月8日日本内阁批准制造汪伪政权的计划。

1月22日日军在浙江萧山登陆。

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在伯力举行会议，确定将东北抗联第1、第2、第3路军缩编为10个支队。

1月25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发出《关于在阎锡山继续反共情况下对山西工作的指示》。

2月6日八路军第2纵队成立，左权兼司令员。

2月10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

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决定把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命名为“桐工作”。

2月23日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在濛江地区与日军激战中英勇牺牲。

本月琼崖地区独立总队开进澄迈县美合山区建立根据地。

3月9日平西、冀中军民开展反“扫荡”作战。

3月12~22日八路军第115师一部三战白彦镇，巩固鲁南抗日根据地。

3月12日汪精卫发表所谓《和平宣言》，要求重庆方面抛弃成见，立即停战。

3月15日八路军、新四军将领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表《讨汪救国通电》。

3月30日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

林森发表广播演说，斥责汪精卫卖国罪行。

4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

4月7日冀南军民发动平汉铁路破击战。

4月14日鲁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4月26日新四军皖南部队展开反“扫荡”作战。

4月30日八路军、新四军发出讨汪救国通电。

5月1日日军进攻枣阳，枣宜会战开始。

5月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

5月5日八路军第129师进行白（圭）晋（城）铁路和武（安）沙（河）公路破击战。

5月10日皖南新四军克复繁昌。

5月18日日机对重庆等地实施大规模战略轰炸。

6月1日冀中八路军展开保卫麦收战役。

6月5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夏季反“扫荡”。

6月12日日军攻陷宜昌城。至24日枣宜会战结束。

6月23日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大行支部”成立。

本月中共中央对八路军、新四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

7月12日日海军宣布封锁闽浙沿海交通。

7月1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并通过《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

7月17日英政府正式宣布封闭滇缅路3个月。

7月23日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43号》，要求迅速处理“中国事变”。

本月毛泽东发表《团结到底》一文，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

八路军第4纵队成立，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

8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基本国策纲要》。外相松冈鼓吹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

8月25日周恩来自延安飞抵重庆，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办法方案。

本月八路军第5纵队成立，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下辖第3、第5大队，大队长分别为曾生、王作尧。

9月3日中国广西部队收复龙州北关。

9月5日皖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新加坡、爪哇、英、法、美等地归国华侨，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

9月18日日军“扫荡”沂蒙山区。鲁中八路军展开总破袭战。

9月23日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

10月4日黄桥战役开始。历时5天，打败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打开了华中抗日新局面。

10月6日日军对华北敌抗日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扫荡”。太行地区八路军展开反“扫荡”作战。

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八路军第5纵队于东台以北白驹镇会师，胜利完成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

10月13日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展开反“扫荡”作战。

10月14日英国重开滇缅公路。

10月30日国民党军队收复南宁。

本月第3战区部队粉碎日军“七月攻势”。

广州市区游击第2支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晋西北军区（第120师兼）成立，贺龙兼司令员。

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

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拟定《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

11月15日冀中八路军展开攻势，配台北岳区反“扫荡”作战。

11月17日太岳地区八路军展开反“扫荡”作战。

11月中旬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11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11月30日日本与汪伪正式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

国民政府外交部声明：日汪所订非法条约完全无效。

12月9日蒋介石发出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的手令。

12月14日日军调集重兵对晋西北地区进行冬季全面“扫荡”，实行“三光”政策。

12月23日日本海军宣布加强封锁中国南部海岸。

12月28日新四军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案。

12月29日国民党第32集团军颁布“进剿”新四军计划。

本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和第2路军一部，移向中苏边境地带并陆续越境入苏。

主 编	王道平							
副 主 编	罗焕章	支绍曾						
编写人员	高 培	王明亮	柳茂坤	王天成	韦显文	支绍曾	罗焕章	
	耿成宽	贺新城	徐勇	彭玉龙	周小宁			
大事记 编制	高培							

出版说明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长达 14 年的抗日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编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 14 年斗争的抗日战争史，总结和借鉴抗日战争的经验，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富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编写任务，是根据国务院的批示精神，由有关单位于 1982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关于落实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号提案”的会议上确定的，具体由军事科学院负责。该项目是“七五”社科研究规划的组成部分，并先后列入《全军一九九〇年前军事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和《全军军事科研“八五”计划的重点课题》。还被列入《1991 年—1995 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在编写中，我们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角度，探讨中国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进程和规律，全面反映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军事行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全书共分三卷六编。上卷（1931.9.18～1937.7.6）分为第一编东北沦陷，第二编救亡高潮；中卷（1937.7.7～1940.12）分为第三编举国奋战，第四编转入相持；下卷（1941.1～1945.9）分为第五编渡过难关，第六编走向胜利。各卷均附有照片、地图及大事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3 年 3 月

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

第三编 举国奋战 (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一节 日本全面侵华时的形势与日中实力对比

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的形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新的经济危机、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日本内外矛盾加剧和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发生的。

1937年下半年，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蔓延到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次危机比上次更为严重。在危机的第一年，美、英、法三国的工业生产分别减少了21.9%、9.5%、15.5%，失业人数高达1800万人。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由于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不断进行侵略，暂时还未陷入危机，但是这种片面地发展军事工业，以及战争的巨大消耗，必然带来新的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险恶形势，更加激化了各国之间的矛盾。

德、日、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为了逃避危机和实现重新瓜分世界的目标，加紧相互勾结和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经过签订和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意初步形成了以柏林——罗马——东京为轴心的法西斯集团。在欧洲，德意一方面与英法美进行经济争夺，强化干涉西班牙的局部战争，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德国主要军政首脑秘密会议上，决定了首先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消除侧翼威胁的战略方针。在亚洲，日本军事经济急剧膨胀，1937年日本的陆海军武器生产总额，比1931年增长了8倍。垄断资本的暴富和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加深，使1936年日本参加工农斗争的人数超过42万人，达到战前最高水平。在日本国内，不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亲德意派与亲英美派之间，政党、军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很突出。在远东，日本与英美等国的矛盾亦不断加剧。随着“二·二六”事件后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日本对战略原料、市场的需求和扩张的欲望也越来越高。在变中国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计划碰壁后，日本正加紧策划全面侵华战争。

英、法、美等国家，虽然同后起的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经过几次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已力不从心，为了保住现有市场和殖民地，它们在法西斯侵略面前，采取了一种姑息迁就的绥靖政策。在英国，张伯伦于1937年5月出任首相后，全面推行绥靖主义政策。他的总计划是：“在最近一年之内争取同德国和意大利议和，并缔结四国条约。”为此，张伯伦指派亲信哈里法克斯勋爵前往德国，向希特勒表示英国同意满足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的要求。英国还试图拿中国东北与日本做交易，以保住其在远东的权益。这时的法国，也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同英国的联盟上。此时的美国，则实行一种名力“中立”，实为“绥靖”的政策。美国国务卿

赫尔于 1937 年初设想了一个包括军备限制、政治保证和殖民地重新调整的欧洲问题总解决方案，企图以此换取“德国放弃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和扩充军备。”在远东，美国“担心以任何形式出现的英美统一阵线，都会在日本激起支持军队‘极端分子’的舆论，从而危及和平”。并坚持从经济上绥靖日本，源源不断供给日本战略物资，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当 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处在经济危机状态的时候，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一直顺利发展，1937 年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已由 1913 年欧洲第 4 位世界第 5 位，跃居欧洲第 1 位世界第 2 位。面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威胁，苏联致力于建立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但遭到英法美等西方大国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时间建设和巩固内部，并打破西方大国祸水东引的企图，苏联也极力避免与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直接发生对抗。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后，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欧洲西班牙人民反对德意武装干涉和亚洲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遥相呼应，并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促成了中国政治形势的重大转变，国共两党开始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

1937 年，国共两党为动员和准备全国抗战，在军事、政治、经济 and 思想诸方面做了相当的工作。国民党还于 1937 年 6 月中旬决定在庐山召集全国高级将领、各界人士座谈会，共商军政大计，研讨对日方策。共产党亦于 5 月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争取民主，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号召力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日本的侵略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与坚持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此时，中国社会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国民政府还不愿实行民主政治，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抗战准备还不充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法西斯集团决定利用对其有利的国际形势，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达成之机，迅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摆脱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实现征服中国的既定目标，并加强它争霸世界的地位。事实表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已越出一国的范围而成为国际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战也不是孤立的，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给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战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将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使其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二、日、中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比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中双方总的实力对比是日强中弱。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

〔英〕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年版，第 14 页。

〔英〕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第 42 页。

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无论“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一）经济实力

在经济力量上，日本占有很大优势。至 1937 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到 80%，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中国现代工业（包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在内）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仅占 10%。除沿海部分城市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少数轻工业外，大部为手工业。在农业方面，日本已使用机械生产，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以 1937 年日中两国的工业总产值和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为例：工业总产值，日本为 60 亿美元，中国仅 13.6 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 4.4 倍；生铁产量，日本为 239.7 万吨，中国只 95.9 万吨（含东北）；钢产量，日本为 635 万吨，中国仅 55.6 万吨（含东北）；石油，日本为 39.3 万吨，中国仅 0.02 万吨。

日中在经济方面的另一个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 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 22.3 亿日元，比 1936 年增加了 2.2 倍，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 61.7%。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到 1937 年除能生产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外，其他大型武器装备如重炮、坦克、舰艇、飞机等，或者不能制造，或者只能少量制造。

（二）军事实力

1937 年上半年，日本有陆军常设师 17 个，独混旅、骑兵旅和守备队 10 余个，共 60 余万人；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 192 个，独立旅 65 个，独立团 79 个，总兵力 202.9 万人。但是，日本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比中国雄厚，有预备役 73.8 万人，后备役 87.9 万人，第 1、第 2 补充兵 248 万人；而中国仅有预备役 50 万人。日本陆军的武器装备较强。日本一个常设师与中国一个整编师相比，步骑枪比中国多 1.5 倍，轻重机枪多 1.1 倍，野榴山炮多 3.1 倍。另外，日本一个常设师还多有炮兵车和辎重车 1000 余辆，坦克 24 辆。日本有海军舰队 4 个，大型舰艇 200 艘，共 77.1 万吨，中国仅有舰艇 66 艘，共 5.9 万吨。日本陆海军有航空兵中队 91 个，飞机 2625 架，中国只有空军中队 31 个，飞机 600 架（其中作战飞机 305 架）。

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日强中弱，这是中日全面战争初起之时最基本的形势。但是，日本是一个小国，本土只及中国 1/28，人口只有中国的 1/6，本国资源缺乏；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些因素也必将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开始

一、事变前平津地区的军事态势

“七·七”事变前夕，平津地区的军事态势是：北面，有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日本关东军一部，其前锋已伸入长城沿线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口等关隘的两侧地区。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分布于张北、尚义、宝昌等地。平津之间，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万人的伪保安队5个总队，部署于通县、顺义、怀柔一带。在东起山海关西至丰台的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本中国驻屯军，辖一个步兵旅和一个炮兵团及直属分队，共5700多人。其部署是：军司令部率步兵第2团及第1团第2营、炮兵团及直属分队驻天津及其附近，其中第2团第3营分驻唐山、滦县、山海关等地；步兵旅旅部率第1团（欠第2营）驻北平，其中第1团第3营驻丰台镇。

当时驻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该军共辖4个步兵师（每师4个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1个特务旅和1个保安队，总兵力约10万人。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全军的部署是：第143师刘汝明部辖保安第1、第2旅，独立第29、第40旅，以及独立骑兵第13旅，驻张家口和宣化等地区；第37师冯治安部辖第109、第110、第111旅和独立第25旅驻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9师郑大章部和军部特务旅、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队，分驻于南苑、北苑和黄寺；第38师张自忠部辖第112、第113、第114旅和独立第26旅，驻天津及北宁铁路平津沿线；第132师赵登禹部辖第1、第2旅和独立第27、第28旅，作为二线部队分驻于河北任丘、河间一带。

日军在威胁利诱中国第29军失败以后，即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技。为此，日军从1937年5月起，频繁地在宛平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中国驻屯军旅长、团长均先后到卢沟桥附近，对丰台日军演习进行指导。7月6日，驻丰台日军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去演习，中国驻军不许，双方坚持10余小时，至晚日军始返回丰台。

面对日军的挑衅，中国第29军加强了抗战的准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到第29军宣传抗日，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宋哲元军长曾于5月召集部下商讨抗日对策，采纳了副参谋长张克侠提出的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和情报工作等项建议，以及“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该军还于五六月间组织了多次防御演习。与此同时，加强了卢沟桥地区的防御部署：抽调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第219团（团长吉星文）接防宛平与长辛店地区。该团接防后，即以加强的第3营（步兵连4，轻迫击炮、重迫击炮、重机枪连各1，共1400人，营长金振中）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1、第2营和团部集结于长辛店地区。该团官兵“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抗战意志高昂。

二、日本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

人们预料中的卢沟桥事变终于发生了。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事先未通知中国当局，即荷枪

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久郎电话通知中国冀察当局，诡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落士兵一名，要求进宛平城搜查。中国冀察当局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但日方仍坚持要派兵入城，否则“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先派人员进城调查，再寻处理办法。正当双方交涉的时候，中国驻屯旅已令丰台日军第3营营长一木清直立即率该营奔赴卢沟桥。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日兵现已归队”，却又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行谈判的无理要求，复遭到中方拒绝。7月8日晨5时，日军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顷刻间“东门外枪声大作，继之西门外炮声及机枪声继起，我方均未还击，少顷炮火更烈，我方为正当防卫计，始行抵抗。”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并提出“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7月8日，日军三次进攻宛平驻军，并攻占了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地区和铁路桥以南部分地区，随后，又调整部署，将第3营集结于大瓦窑地区，并调第1营于大枣山附近待机，同时令第2营向卢沟桥开进，准备9日攻击宛平城。当晚，日方松井与中方秦德纯进行交涉，9日晨2时达成三项口头协议：（1）双方停止射击；（2）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到永宁河西岸；（3）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但是，日方意在缓兵，并不打算执行停火撤军协议。在9、10两日内，日军4次背约弃信，两次进攻宛平守军，并复占铁路桥和回龙庙地区。10日夜，第29军展开反击，经过十余次争夺，终将失地夺回。日军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地域，等待国内援军的到来。

日军挑起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11日上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杉山陆相提出的派兵案，并把卢沟桥事变改称“华北事变。”随后，首相和陆海军首脑分别上奏天皇，均得到批准。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29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随后，近卫首相连夜召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国内舆论。是日，参谋部向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陆海军还就在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接替重病中的田代皖一郎。7月12日，香月抵天津后，立即下令“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29军”，要求在7月20日以前完成战役部署。7月15日，日军参谋部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将其所辖18个飞行中队派往中国东北。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部又相继作了《形势判断》，制订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073。

《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246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166页。

纲》。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第29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三、中国方面对事变的态度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当日，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等，支持第29军抗战，“愿为后盾”。7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勉励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抗日御侮，支援前线，鼓舞了第29军广大官兵守土抗战，奋勇杀敌的信心。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指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指示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2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让步与妥协了！”并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这个宣言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蒋介石曾多次致电宋哲元，指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密令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及高桂滋等部4个师，沿平汉路北进，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督导冀察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94页。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17～18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中央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8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9页。

《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5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版，第297页。

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同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认为“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谋求和平的行动，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中国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驻华使节，希望居中调停。然而得到的却是象美国通告各国的“不行使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那样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谈话阐述了“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抗战方针，并且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原则：“（1）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对蒋介石的上述谈话，毛泽东曾给予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蒋介石的第二次庐山谈话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但是蒋介石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泯灭。

四、日军发动总攻，北平、天津失守

（一）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面压迫宋哲元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一面加紧调整部署，陆续将新到达的部队部署于指定位置：独立混成第1旅集结于怀柔地区；独立混成第11旅进抵高丽营；第20师分布于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

7月25日，从朝鲜调来华北的日军第20师一个连以维修电话线路为名，由天津乘火车于16时30分抵达廊坊，并占领了火车站。中国驻军反复提出交涉，日军坚持不退，遂发生武装冲突。日军立即以第20师第77团和驻屯军步兵旅一部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于26日晨向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损失严重，被迫向东转移，廊坊即被日军占领，平津间铁路交通中断。

26日下午，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该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紧接着，由天津乘火车抵达丰台的驻屯军步兵旅第2团第2营，分乘26辆卡车于19时到达广安门，企图强行入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遂关闭城门阻止。于是双方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大部被阻于城外。至22时左右，已入城的日军进到使馆区兵营，未入城的日军退回丰台。

日军挑起廊坊和广安门事件后，日军参谋部于27日命令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并下令国内进行第二次动员，增调第5、第6、第10师和第

《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声明》，1937年7月12日。

《蒋介石致宋哲元的手令》，1937年7月9日。

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20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4页。

11、第3师共5个师约20余万人到中国。这时，宋哲元进一步感到，日军大举进攻迫在眉睫。

26日，他连续两次致电何应钦转呈蒋介石，报告平津形势，并请求援助。蒋介石复电说：“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孙连仲）随时加入。”

（二）南苑战斗与北平陷落

日本中国驻屯军于26日晚，下达了进攻中国第29军的命令。攻击时间为27日正午。其部署是：以廊坊及天津的第20师主力集中于团河和马驹桥附近，准备从东南和西南两面主攻南苑；以驻屯步兵旅主力及其另一部，分别由丰台和通县出发，向南苑西北和东北方向进攻；以独立混成第11旅从瓦窑附近攻占西苑，然后进入永定河一线；以独立混成第1旅从沙河镇方面向永定河一线攻击；以第20师3个营为预备队，位于天津；以集大成飞行团于拂晓轰炸西苑兵营，临时航空兵团支援各兵团地面作战。

中国第29军在廊坊和广安门战斗之前，讨论了作战计划。决定以第132师一部守北平城，其余部队协同第37师攻击丰台和通县之敌；以第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等，切断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以第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日军司令部。26日，蒋介石曾电令宋哲元：北平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宛平应死守勿失，决心大战，从速部署。27日，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以张维藩为城防司令；任命正在接防的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面司令官，同时将军部由南苑移到北平城内怀仁堂；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孙连仲、万福麟等部迅速北上协同第29军作战。同日，宋哲元还向全国发出了“自卫守土”通电。

日军对北平发动总攻前一天，在航空兵支援下，首先对第29军驻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等地的部队发动袭击，并占领了这些要点。

27日下午，宋哲元电请蒋介石速派大军兼程北进，以解北平之围。蒋立即复电宋：“请兄镇静谨守，稳打三日”，“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28日凌晨2时，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通知宋哲元：日军“将单独采取行动”，并要求第29军“立即全部撤出”北平城。

7月2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香月清司指挥下，对北平附近的中国第29军发起总攻，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苑。当时，第29军驻南苑部队有第38师、骑9师和军特务旅共5个团（含骑兵团1），约7000余人。前敌总指挥为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赵于27日傍晚赶到南苑部署应敌，并急调其所辖之第1、第2旅到南苑参战。不料，28日拂晓日军第20师和驻屯步兵旅主力突然从东、南、北三面向南苑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被迫仓促应战。由于冀察当局7月11日以后的妥协，平津前线放松了战备，事先没有构筑防御工事。所以，当日军展开进攻时，中国守军被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仅凭围墙作掩护，进行抵抗。日军在飞机、大炮火力支援下，向守军猛烈攻击。在5个多小时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70页。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25页。

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 2000 人以上，副军长佟麟阁不幸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亦壮烈殉国，南苑遂陷敌手。

在此期间，日军独立混成第 1 旅和第 11 旅主力，分别向北苑等地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第 29 军所部节节抵抗。第 37 师和第 38 师一部曾在丰台、廊坊和卢沟桥一带与日军激战；独立第 39 旅曾迫使进攻北苑的日军转攻黄寺；伪冀东保安队亦举义反正，一度占领通县城。但是，在日军增援反攻下，这些部队都被迫撤退。宋哲元见大势已去，遂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自己于 28 日 23 时偕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等离平去保定。第 37 师等部亦奉命于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何基沣旅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该旅于 30 日退往涿县。至此，北平乃告沦陷。

（三）天津战斗与守军撤退

当日本中国驻屯军主力集中在北平地区作战时，天津仅有日军 5000 余人，分散配置在海光寺军司令部、天津各火车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第 29 军在天津的部队有第 112 旅和第 26 旅等部。第 38 师副师长兼公安局长李文田接到宋哲元“自卫守土”通电和北平守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第 38 师驻津部队和天津保安队，乘势向天津日军出击。29 日凌晨 1 时，第 38 师第 26 旅、师部手枪团和天津保安队等部，在李文田指挥下，分别向海光寺、天津各车站和东局子机场等处日军，发起进攻。各攻击部队很快袭入飞机场，烧毁日机十余架，并攻占了天津总火车站和东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闻讯后，立即抽调北平第 20 师的 4 个营及关东军堤支队增援天津，并以临时航空兵团对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在日军轰炸和猛烈炮火反击下，第 29 军转攻为守。经过 15 小时战斗，部队伤亡严重，遂于 30 日放弃天津，向马厂方向撤退。

从卢沟桥事变到平津之战的过程表明：卢沟桥事变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和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卢沟桥事件不是什么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政府、财阀、政党的共同意志；而且全面侵华的“有关出兵、作战的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

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固然有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但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 29 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 29 军仓促应战，后援不继，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事后，蒋介石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任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

〔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1988 版，第 129～130 页。

《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1937 年版，第 13～14 页。

第三节 “八·一三”事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一、日本制造“八·一三”事变

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准备进行会战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早在7月11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就认为战争将波及到全中国，“对于海军来说要作全面战争准备。”7月12日，日海军军令部秘密制订了对华作战方案，确定第一阶段配合陆军进行华北会战，第二阶段在陆军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然后把战争扩展到华中和华南。7月16日，日本驻上海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得知军令部的上述意图后，向东京提出了《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他认为：“要想用武力打开中日关系现状，只有惩罚中国，使中国中央势力屈服。”他还认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因此，他主张派5个师的兵力，进行京沪会战，攻占南京、上海。7月27日，日本海军省和军令部还达成了《关于处理时局及准备的协议要点》，正式提出：“鉴于今后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作战，因此，海军应做好对华全面作战准备。”7月28日，日本政府训令将长江沿岸的2.9万多名日侨于8月9日前撤到上海。8月8日，长谷川清遵照东京的指令，要求驻上海第3舰队做好应付事态扩大的一切准备，并重新部署了兵力。

8月9日18时30分前后，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与藏，肆意驱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与中国保安队卫兵发生冲突，当场被击毙，是为虹桥事件。日本立即以此事件为借口，提出撤退上海保安队、拆除所有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准备进攻上海。8月10日，日本陆海军中央紧急磋商向上海派兵，并得到内阁会议的确认。8月12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提出了向上海派兵的方案，计划动员30万兵力和8.7万马匹，并向上海和青岛各派两个师。同日，日参谋部和军令部还达成了陆海军协同作战协定和陆海军关于在华中作战的航空协定。

13日9时30分，日军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间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午后4时，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少将下令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守军当即予以猛烈反击。于是，“八·一三”事变从此爆发，淞沪会战由此开始。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并调集陆军和空军投入自卫战斗。同日，日本海军航空兵轰炸了中国华中地区的杭州、南京和南昌等城市。当天，日本海军军令部给第3舰队司令官发布命令，要求消灭当面的中国陆军及华中的航空兵力。是晚，在日本临时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要求全面进行对华战争，迅速建立战时体制，正式对华宣战。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如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还称：此举是为了“消灭类如此次事变所由发生之根源，并达到日、满、华三国融台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第165页。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187页。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第224页。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页。

和提携”之目的。同一天，日本国内开始第三次动员。日军参谋部下达了组建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两个师，迅速开赴上海作战。8月下旬以后，日本国内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中国，投入华北和上海的作战。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讨论施政方针时，决定将“华北事变”正式改为“中国事变”。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帝国议会，根据不久前四相会议的决定，以开幕式的天皇敕语代替宣战诏书，内称：“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发扬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醒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别无他意。朕期望帝国臣民鉴于今日之局势，忠诚奉公，同心协力，以襄助达到所期之目的。”日本近卫首相也在会上发表了施政演说，要求各界支持对华战争，建立举国一致的战时内阁和与紧急事态相适应的财政经济体制，据此，第72届临时议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加快了日本转入战时体制的步伐。

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提出了迅速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如前所述，到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止，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为谋求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2月中旬、3月下旬和6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顾祝同、宋子文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和庐山举行了三次高级会谈。在这几次会谈中，由于国民党企图以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向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派遣主要官员等办法，取消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控制红军和陕甘宁边区，致使谈判无进展。6月25日，中共重新提出合作方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再次作了让步，谈判尚未达成协议，卢沟桥事变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又一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电，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二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宣言》中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同时向全国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个宣言，再次显示出了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诚意。7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举行第4次国共谈判。在谈判中，蒋介石把《宣言》搁在一边，另提一套方案。他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部队。由于他不愿承认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文书》，第370页。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第305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5页。

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坚持按他的一套改编红军，并企图通过改编逼朱、毛“出洋”，致使谈判未获结果。7月底平津失守，8月中上海又起事端，中国军队被迫在华北和华中两面作战。这时，蒋介石才不得不重视国共合作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8月9日，中共中央应邀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举行第5次谈判，由于蒋介石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放弃了一些不合理要求，双方于18日就陕甘宁边区人事、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以及在若干城市设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达成协议。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总指挥。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秦邦宪和康泽等，在南京举行最后一轮会谈。双方就发表《合作宣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了字。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成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采取正确政策的结果，也是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表示：“中共宣言与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国共合作的实现，也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党派，都先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7人从国民党政府监狱获释后，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大团结，更加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普遍动员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政治主张，并积极投入抗日工作。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以大局为重，从原来抗日反蒋的立场转到拥蒋抗日的方面。在面临日本灭亡中国战争的大是大非面前，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了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去猛烈冲击日本侵略者。对此，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第119页。

《抵抗》三日刊第12号，1937年9月26日。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64页。

第四节 日军大举进攻华北，中国军队沿铁路线防御

一、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前的战场形势

（一）日军的战略企图与部署

日军占领平津后，即以主力巩固平津地区，以一部兵力展开于平津以南的长辛店至独流镇一线，待国内援军抵达后，再向华北内地进攻。8月5日，日军参谋部决定进行华北会战。其主要战略企图是：“迅速对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空军主力给予打击，随后占据华北要地，以期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并图谋调整日华关系。”按照日军参谋部的指示，日本中国驻屯军于8月7日调整了部署，确定：（1）待国内援军到齐后，即与中国军队在河北保定——沧县之线决战。主决战方向为平汉铁路沿线。决战时间预定在9月下旬或10月上旬。（2）第5师和独立混成第11旅沿平绥铁路作战，进攻察哈尔、山西北部及绥远地区。（3）保定、沧县会战后，再向石家庄、德县之线追击。

为进行华北决战，日军参谋部于8月21日提出：除原向华北派出第20、第5、第6、第10师外，拟再向华北派出第16、第101、第108、第109师和一批特种兵部队。2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4个师的动员。8月3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正式编成，其战斗序列如下：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寺内寿一上将 参谋长 冈部直三郎少将

第1集团军司令官 香月清司中将
第6师师长 谷寿夫中将
第14师师长 土肥原贤二中将
第20师师长 川岸文三郎中将
集团军直属部队

第2集团军司令官 西尾寿造中将
第10师师长 矶谷廉介中将
第16师师长 中岛今朝吾中将
第108师师长 下元熊弥中将
集团军直属队

方面军直属部队
第5师师长 板垣征四郎中将
第109师师长 山冈厚重中将
临时航空兵团兵团长 德川好敏中将

重炮兵营、防空部队、通信队、铁道队、兵站部队、中国驻屯混成旅、宪兵队

以上共辖2个集团军、8个师、17个旅和1个临时航空兵团及其它特种部队，外加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4个独立混成旅和2个支队，共约37万人。

（二）中国军队的防御方针和部署

平津失守以后，中国军事当局判断日军必然很快要向中国内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所以迅速制订计划，组建统帅机构，调整军事部署。8月12日，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决以武力解决”企图“灭我民族生存”之日军，“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本此主旨，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其中华北平汉、津浦路方面为第1战区；华北晋、绥、察方面为第2战区。并且指出：“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的侧背在第二战区”。同时还规定了第1战区和第2战区的作战任务。为加强主战场的防御，国民政府决定在平汉、津浦铁路沿线设立三道防线：以保定——沧州之线为主要防线；以彰德（安阳）——济南之线为第二防线；以洛阳——郑州——开封——徐州——淮阴之线为第三防线。为达成防御目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调整了兵力部署：以傅作义之第7集团军一部向平绥铁路东段的张家口和南口地区集中，准备迎击日关东军和驻屯军向西进攻；以刘峙之第2集团军向保定、石家庄之线集结，其中第26路军（第1军团）孙连仲部进到琉璃河、马头镇地区展开防御，准备迎击北平方向日军的南攻；以宋哲元之第1集团军展开于津浦路北段地区，准备迎击天津方向南下的日军。

根据对日防御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军委会于8月20日颁布了全军战斗序列：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中正	参谋总长	程潜
第1战区司令长官	蒋中正（兼）辖区：平汉、津浦两铁路线		
第2战区司令长官	阎锡山辖区：晋、察、绥		
第3战区司令长官	冯玉祥辖区：苏、浙		
第4战区司令长官	何应钦辖区：闽、粤		
第5战区司令长官	蒋中正（兼）辖区：山东		
第1预备军司令长官	李宗仁		
第2预备军司令长官	刘湘		
第3预备军司令长官	龙云		
第4预备军司令长官	何成濬		
第17集团军总司令	马鸿逵		
第18集团军总司令	朱德		
海军总司令	陈绍宽		
空军总司令	蒋中正（兼）		

担任华北防御作战任务的第1、第2战区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1战区

第1集团军总司令	宋哲元	副总司令	万福麟、冯治安
第59军军长	宋哲元（兼）（第38、第180、第181师）		
第77军军长	冯治安（兼）（第37、第132、第179师）		
第53军军长	万福麟（兼）（第116、第130、第91师）		
第67军军长	吴克仁（第107、第108师）		
第3军团军团长	庞炳勋		

第 40 军军长 庞炳勋（兼）（第 39 师）
 第 49 军军长 刘多荃（第 105、第 109 师）
 骑兵第 3 军军长 郑大章（骑兵第 4、第 9 师）
 第 2 集团军总司令刘峙 副总司令孙连仲
 第 1 军团军团长 孙连仲（兼）（第 27、第 30、第 31 师）
 第 52 军军长 关麟征（第 25、第 51 师）
 第 32 军军长 商震（第 139、第 141、第 142 师）
 第 3 军军长 曾万钟（第 7、第 12 师）
 第 13 军团军团长 刘茂恩（第 64、第 65 师）
 集团军直属部队（第 177、第 17、第 23、第 47、第 106 师，新编第 35 师，独立第 46 旅，骑兵第 14 旅）
 骑兵第 4 军军长 檀自新（骑兵第 10 师）
 第 14 集团军总司令 卫立煌
 第 14 军军长 李默庵（第 10、第 83、第 85 师）
 挺进军司令 马占山（骑兵第 6 师）
 特种兵部队（炮兵第 6、第 8 旅）
 第 2 战区
 第 6 集团军总司令 杨爱源 副总司令 孙楚
 第 33 军军长 孙楚（兼）（独立第 3、第 8 旅，第 73 师）
 第 34 军军长 杨澄源（第 196、第 203 旅，第 71 师，新编第 2 师）
 第 7 集团军总司令 傅作义 副总司令 刘汝明
 前敌总指挥 汤恩伯
 第 35 军军长 傅作义（兼）（第 218、第 211、第 20 旅）
 第 61 军军长 李服膺（第 200 旅、独立第 7 旅，第 101 师）
 第 68 军军长 刘汝明（兼）（第 143 师，独立第 40 旅）
 第 17 军军长 高桂滋（第 84、第 21 师）
 第 13 军军长 汤恩伯（兼）（第 4、第 89 师）
 集团军直属部队（第 94 师，新编第 5 旅、第 6 旅、骑 2 旅）
 预备军总司令 阎锡山（兼）
 第八路军总指挥 朱德（第 115、第 120、第 129 师）
 第 19 军军长 王靖国（第 205 旅、独立第 2 旅、第 209 旅）
 骑兵第 1 军军长 赵承绶（骑兵第 1、第 2 师）
 以上两个战区共 6 个集团军、24 个军（军团、路军）、53 个师另 21 个旅和其它部队，约 60 万人。

二、平绥铁路沿线的作战

平绥路作战是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 年 8 月 9 日，日军参谋部决定进行察哈尔作战，其目的在于“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消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

为进行平绥路作战，日军以独立混成第 1 旅、混成第 2、第 15 旅和大泉

支队、堤支队，航空第2飞行集团（共14个飞行中队），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中国驻屯军以第5师和独立混成第11旅参加平绥线东段作战。

为了加强华北的防御，蒋介石于8月初先后任命傅作义为第7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为副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平绥路东段之防御，在南口地区，以汤恩伯第13军之第89师和第94师沿长城线右自南口左至宁强堡组织阵地防御；以高桂滋第17军之第21、第84师部署在宁强堡—赤城—龙关一线，对热察边实施防御。在张家口地区，以刘汝明第68军之第143师担任正面防御。另以傅作义之第35军，赵承绶之骑兵第1军集结于绥东之集宁、兴和地区，作为机动兵力。

（一）南口——张家口战役

中国第13军于8月7日晨全部到达南口地区并进入阵地。8月8日，日中两军即展开前哨战。8月11日，日本驻屯军命令独立混成第11旅主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火力支援下，向南口展开攻击；以一部向南口西侧长城线助攻；以另一部佯攻得胜口。中国守军第89师在南口车站和龙虎台高地顽强抵抗后，于12日退守长城要隘居庸关、八达岭一线主阵地。13日，蒋介石电令石家庄卫立煌之第14军及第85师编成第14集团军，车运易县，经平西山地增援南口，并以第1军团出房山掩护该部前进。12日后，日军曾多次向中国守军发动猛攻，均被击退。战至17日，日军第5师一部占领了长城防线上的最高峰——1390高地，并以其主力向守军右翼镇边城迂回，使守军的防御处于危急状态。18日傅作义奉命率一师三旅车运怀来增援。19日，双方争夺空前激烈。在镇边城方向，两军在黄老院、禾子洞、沙锅铺等地反复冲杀，一日之内守军伤亡1200余人。在居庸关方面，日军也倾全力攻击，并突入该关南门，又被守军击退。为挽救危局，汤恩伯于19日下令调整部署，将得胜口、居庸关、镇边城一线划分为三个固守区，由第89、第21、第4师和第72师一部分别固守。傅作义亦准备指挥守军向进攻的日军展开反击。正当此时，察北日军开始向中国守军攻击，张家口告急。于是，傅作义又率第200、第211两个旅由下花园车运回援张家口，留下第72师和独立第7旅归汤指挥。奉命北上增援的卫立煌部于21日进至门头沟西北30公里的傅家台、千军台一线时，日军第6师牛岛支队已占领阻击阵地。卫军前进受阻，侧后又受到良乡西部日军第20师的威胁。于是，卫军转取守势。由于中国守军与援军被隔断，第72师各部在长城峪、灰岭子和镇边城等地与日军反复争夺，终因孤立无援，镇边城乃于23日被日军攻占。日军随即兵分两路：一路西进怀来；一路向东北方向包抄长城正面守军前沿阵地。25日，日军在横岭和居庸关两地与守军激战。在危急情况下，汤恩伯于26日午后下令中国守军向桑干河右（南）岸突围。日军左翼第5师和右翼独立混成第11旅，于8月26日和27日分别占领怀来和延庆。至此，南口战斗结束。

此役历时半月，中国军队伤亡26736人，日军伤亡据日方公布为2600余人。南口作战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守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其影响也是大的。9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短评说：“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

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在南口前线中日两军激烈战斗之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趁势向张家口方向发动攻击。8月20日夜，日军混成第2旅从张北的二台出发，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御，占领了神威台。22日，日军乘胜进攻旧万全，中国守军第143师进行抵抗后，于23日退守张家口西南、平绥线上的孔家庄一线高地。日军占领旧万全后，继续向孔家庄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曾以有力的反击，迫使日军转取守势。经三昼夜激战，日军始占领该地并切断了平绥路。此时，东援南口的傅作义立即率两个旅赶回张家口，组织固守城垣并反击日军，但未能抑制住日军的攻势。26日以后，整个战局严重恶化，南口、怀来失守。

27日，刘汝明下令所部向洋河南岸撤退，张家口遂告沦陷。日军左翼之大泉支队于20日从沽源开始南进，26日，占领独石口以西之三间房。

27日，再占宣化，与由张家口东进的混成第2旅会合。

29日，日军第5师亦进至宣化。至此，进攻平绥路东段的两支日军会合。与此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占领了张家口以西的柴沟堡。中国第2战区防守平西的部队受到日军南北夹击的威胁，遂分头向天镇、蔚县方向撤退。

（二）大同、归绥沦陷

日军占领南口和张家口以后，中国驻屯军第5师集结于怀来、下花园之间；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集结于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宣化、柴沟堡地区。9月6日，日军第5师根据方面军关于“迅速进入蔚县附近，准备对保定平原作战”的指令，分三路向南推进。担任蔚县守备任务的中国第68军刘汝明部未与日军接触即行后撤。汤恩伯急令第17军高桂滋由广灵速派一个团去蔚县填防。高部所派之团尚未到达蔚县，日军第5师就已先行入城。随后，日军于14日陷广灵，16日取涞源，20日占灵丘，准备突破内长城线后，参加保定会战。

在日军第5师南下的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亦以混成第2、第15旅等部在伪蒙骑兵9个师协同下，沿平绥路向西进攻。9月6日，日军强攻天镇。驻守天镇的第61军之第299团孤军奋战，坚守天镇达一周之久。9月11日，日军占领天镇，接着向大同进逼。13日，大同守军弃城而退，日军不战而占大同。尔后，日军继续向前推进。17日，攻占大同北面的丰镇，24日攻陷绥东重镇平地泉（今集宁）。随后，又向西发展进攻。10月13日，日军占领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16日又占绥远重镇包头。至此，平绥线作战遂告结束。

平绥路沿线作战自8月11日至10月16日，历时两月有余。平绥路作战中国军队失利，使日军完全控制了内蒙地区，解除了其主攻方向的侧背威胁，消除了日军南下冀、晋的后顾之忧，为中国华北防御作战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三、平汉、津浦铁路北段的作战

8月下旬，日军在平绥线取得进展后，即以第20、第6、第14师在北平，

以第10师在天津，分别向南进占良乡、固安、静海附近地区。8月31日，华北方面军成立后，即根据日军参谋部关于进行华北会战的命令，于9月4日制定了《华北会战指导方略》。《方略》规定将会战的重点放在河北省中部的平汉沿线，由第1集团军担任该线作战，第2集团军负责津浦线作战，第5师从蔚县南下参加河北省中部会战。为保证第1集团军在重点方向平汉线的作战，方面军除令第5师南下蔚县，以确保平汉线右侧安全外，还令第2集团军先向津浦线进攻，以保障平汉线左侧的安全。

日军第1集团军于9月11日下达命令，规定9月14日开始攻击。具体部署：以第20师攻击涿县北面之中国军，尔后，迅速进入易县以南地区；以第14师迂回涿县以南地区，切断第20师正面中国守军的退路；以第6师攻击其当面固安以南地区，然后进入定兴附近；以第50团为军预备队，位于良乡。9月11日，日军第2集团军占领了津浦线上的马厂和青县，并以一部兵力进至青县以南的兴济镇。为防御日军由平津沿铁路线向南进攻，国民政府军委会于8月20日颁布了第1战区作战指导计划。确定北正面的主要任务是：阻止日军沿津浦、平汉铁路南下，同时侧击日军对南口方面的攻击。并区分第1集团军力右地区队，第2集团军为左地区队，第14集团军为总机动部队。据此，石家庄行营于8月下旬决定，在房山至保定之间构筑三道防御阵地：第一道设于房山、琉璃河、固安之线，由孙连仲的第1军团（第26路军）配属骑兵第10师构筑与防守；第二道设在易县、涞水、高碑店一线，由曾万钟的第3军构筑与防守；第三道设于满城、保定、新安镇一线，由关麟征的第52军构筑与防守。

（一）保定、沧县地区的战斗

9月14日，日军第1集团军从北平附近出发，分三路向涿县、保定地区大举进犯，其第20师由正面向琉璃河、涿县方向进攻；第14师于永清、第6师于固安方面渡过永定河，分别向涿县南面和定兴方向迂回。中国守军第1军团（第26路军）、第47师、骑兵第10师等部，依托防御阵地，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伤亡严重。至18日，日军第20师攻占房山南部阵地后，已进至汀县以西地区；第6师越过沼泽地区后，已进到拒马河左岸的辛桥地区；第14师已迂回到涿县以南的松林店地区，堵住了守军的退路。在此情况下，中国守军开始后退。中国第2集团军立即命令第1军团在高碑店以北、第3军在大清河右岸阻敌前进。但是此时双方已陷入混战状态，卫立煌之第14集团军也由张坊南撤。日华北方面军见战局对其有利，遂于18日21时令第1集团军突破保定附近阵地后，向正定追击；令第2集团军第10师向德县进攻，其余部队向正定方向追击，以切断平汉线上中国军队的退路；令第5师主力迅速经涞源进入保定方面，据此，日第1集团军于21日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向南推进。22日，日军开始向僧河阵地攻击，并于当日占领满城。同日，蒋介石曾电令刘峙固守保定、满城，但已无济于事。23日，日军开始向保定及其两侧地区发起攻击，未能得逞。

24日11时，日军第6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对保定城垣再次发起攻击。这时，刘峙曾向第52军转达蒋介石“务须固守保定，无令不准撤退”的指令

。但该军在强敌进击下，纷纷南撤。同日，保定一带守军已全部退至滹沱河南岸，至此，保定及其以北全陷敌手。于是，日华北方面军决定乘胜前进，将战线推进到石家庄——德县一线。

在日第1集团军南犯的同时，日第2集团军按照方面军关于“迅速进入沧县以南，之后以主力准备向保定南侧前进”的命令，以第10师沿津浦路南下，迅速占领沧县；以第16、第109师继续沿子牙河向南攻击。中国第1集团军根据军委会“在沧县附近抵抗”的命令，加强了沧县地区的防御：令第59军之第38师、第40军之第39师、第49军（欠第109师）、第77军之第132师等部，防守刘各庄、姚官屯、李天木一线；令第49军之第109师为预备队，位于沧县以南地区。同时，以第67军在文安、大城一带侧击敌人，策应正面作战。9月21日，日军第10师开始攻击姚官屯，经四昼夜激战，突破了姚官屯防线。

24日，日军未遇到大的抵抗，便进入沧县城。23日，日军第16师亦攻陷大城，继续沿子牙河南进。日军第10师占领沧县后继续向南进攻。中国第1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在冯家口、泊头、东光等地逐次抵抗。25日，日军进占捷地镇东西之线。

27日，日军分三路从运河东西两侧及津浦路以东向德县方向进犯。

29日，中国守军第59、第49、第40军及第43师等部，向冯家口日军侧翼实施反击，未收大效。10月1日，各部即沿铁路东侧向南撤退。其左翼之第67军在刘各庄、沙河桥逐次抵抗后，即向献县转移，改归第1战区指挥。日军乃进逼献县、德县。

（二）石家庄、德县及其以南的战斗

保定、沧县失陷后，平汉和津浦路沿线的中国守军分别退至石家庄和德县地区。为便于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月下旬决定划平汉路北段为第1战区，以程潜代理第1战区司令长官，撤销石家庄行营，并调整兵力部署：以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指挥第32军（欠第139师）及第17师、第47师和骑兵第10师，担负平路线以东、滹沱河南岸的防御；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第14军团（第27路军），第3、第14军，及第27、第85、第89、第177师等部，守卫平汉线上的正定、石家庄及其以西、滹沱河南岸之线；以第1军团（欠第27师）和第139师、第54师为预备队，集结于平汉路西之平山以南地区。同时决定，在津浦线北段设第6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统辖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继续抗敌。冯受命后，立即赶到德县以北之桑树园指挥作战。

9月28日，日第1集团军令各部向石家庄追击。此时适逢晋北告急，蒋介石令第14集团军车运忻口增援，余部留置平汉线逐次抵抗。

10月1日，日军第20、第6、第14师和新加入战斗的第108师，开始向石家庄方向进攻。未经大的战斗，先后占领了望都、定县、曲阳、新乐等县城。10月8日攻占正定、灵寿。10日，第14师强渡滹沱河，占领了石家庄。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9册。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332页。

11日，第20师占领井陘。在此期间，日军第2集团军以第10师沿津浦铁路向德县攻击前进，第16师和第109师沿子牙河西南方向推进，配合日第1集团军进攻石家庄。10月初，日军第16、第109师连占武强、深县、衡水、束鹿等地，逼近石家庄。

10月3日，日军第10师开始进攻德县。军委会速令第3集团军以两个师增援。但按时赶到德县的仅有第12军第81师之第495团。该团在日军猛烈攻击下，牺牲巨大，余部退至徒骇河右（南）岸，德县遂于10月5日陷入敌手。

日军占领石家庄和德县后，将第6、第16、第20、第109师等部、先后分别调往上海和娘子关方面作战。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向南追击的日军第14师等部，于10月中旬相继占领了元氏、赵县、赞皇、高邑、临城、柏乡、内丘、邢台（顺德）、任县、肥乡、邯郸与南和等县市，中国守军逐次撤退至漳河南岸。

19日，日军第14师又从武安以南强渡漳河，与守军关麟征之第52军激战两昼夜，双方伤亡重大，于丰乐、安阳间形成对峙。10月下旬，军委会决定第1集团军改归第1战区指挥，津浦路之作战由第3集团军负责，改属第5战区，第6战区撤销。同时令第1集团军以一部于平汉、津浦之间钳制日军，以主力协同友军阻击南下之敌；令第3集团军与前出石家庄方面的第1集团军相呼应，攻击敌之侧背，以解娘子关之危。据此，第1战区作了相应的部署。正当各部准备行动之际，第20军团奉命经林县增援太原。而日军则乘势于11月4日抢先向驻守安阳的第20集团军进攻，5日占领安阳，第32军退守宝莲寺东西之线。中国第1集团军仍按预定计划，于6日开始攻击，连克沙河、任丘，逼近邢台，切断了平汉路。日军立即集中第14、第108师等部夹攻向邢台逼近的中国军队，并由邯郸、磁县向大名反击。

11日，日军占领大名，第1集团军退至卫河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在津浦路的第3集团军，由于韩复榘意存观望，前进迟缓，日军先于11月5日开始分路向第3集团军进攻：一路日军沿铁路及其两侧南进，连陷高塘、禹城、临邑，向徒骇河进迫；一路由盐山南进，相继占领乐陵、阳信、惠民、济阳。第3集团军退守黄河右（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

12月23日，日军一部由青城附近渡过黄河，攻陷周村，切断了胶济路。24日、26日，日军第10师由济阳和齐河相继南渡，27日占领济南，尔后继续前进。

平汉、津浦路北段作战自9月中旬至12月下旬，历时三十多月。日军虽然击退了平汉、津浦路北段的中国军队，占领了平汉、津浦路沿线广大地区，但未能达到其“消灭河北省中部的敌人”，“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的会战目的。

在日军沿平绥、平汉和津浦铁路大举进攻的三十多月中，中国广大官兵发扬守土抗战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进行了抗击或反击，给日军以相当的打击，但是中国军队在这段防御作战中，未能阻止日军的长驱直入并给敌以更大的消耗。这里除了技术装备等客观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方针。上层军官指挥不力，消极防守，互不支援，致使部队常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有的将领一战即退，中央军第2集

团军总司令刘峙的大撤退，即遭到全国各界的谴责。国民政府监察院张华润等人于 10 月 26 日对其提出弹劾，指出：“豫皖绥靖主任刘峙，恒怯畏死，未经激战，遂下令总退却，一溃至石家庄，致使全冀皆失，而豫晋两省交受其祸。今又退至彰德矣。夫由琉璃河至石家庄计里四百余，石家庄至彰德计里亦四百余，是旬日之间，败退几达千里，自古及今，丧师失地未有如是之速者矣。”

第五节 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平型关大捷

一、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8月22日关于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出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为第18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陆军第115、第120、第129师和总部直属队。第115师由红一方面军之第1、第15军团及陕南第74师编成,共1.55万人;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之第2、第6军团和陕北红军第27、第28军及独立第1、第2师,赤水警卫营、总部特务团各一部编成,共1.4万人;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之第4、第31军及陕北红军第29、第30军、陕甘宁独立第1~4团和第15军团骑兵团编成,共1.3万人;总部直属队3000余人。全军共计4.6万人。其编制序列如下。

第八路军总指挥部

总 指 挥	朱德副	总指挥	彭德怀
参 谋 长	叶剑英	副参谋长	左 权
政治部主任	任弼时	副 主 任	邓小平
第115师师长	林 彪	副师长	聂荣臻
参 谋 长	周 昆	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
第343旅旅长	陈 光	(第685、第686团)	
第344旅旅长	徐海东	(第687、第688团)	
第120师师长	贺 龙	副师长	萧克
参 谋 长	周士第	政治部主任	关向应
第358旅旅长	张宗逊	(第715、第716团)	
第359旅旅长	陈伯钧	(第717、第718团)	
第129师师长	刘伯承	副师长	徐向前
参 谋 长	倪志亮	政治部主任	张 浩
第385旅旅长	王宏坤	(第769、第770团)	
第386旅旅长	陈 赓	(第771、第772团)	
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	萧劲光		

为了加强党对新形势下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9人组成。朱德、彭德怀分别力正副书记。同时,中央还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分任三个师的书记。

10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任命任弼时为主任。

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师、旅级政治委员。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为第115、第120、第129师政治委员；萧华、黄克诚、李井泉、王震、王维舟、王新亭，分别任第343、第344、第358、第359、第385、第386旅政治委员。同时，还撤销了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级政治部。中国共产党还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公开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等地设立了八路军通讯处。

二、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抗日

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确定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自己。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八路军的作战地区为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

8月22日，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国民党军节节后退之时，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主力从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该师经韩城东渡黄河，至侯马乘火车沿同蒲路北进，挺进晋察冀交界地区。9月3日，八路军总部与第120师主力分别由陕西泾阳云阳镇和富平县庄里镇出发，跟随第115师之后，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9月30日，第129师主力也由富平庄里镇出动，东进北上。八路军开赴前线，纪律严明，勇敢迎敌，受到战区人民的称赞。

正当八路军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之际，沿平绥路西进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后，以一部继续向绥远进攻，主力则沿同蒲路南进。与此同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之第5师，亦由平绥路东段之宣化南下晋察冀交界地区。中国第2战区部队退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内长城一线。9月中旬，日华北方面军7个师沿平汉、津浦两路南犯，突破中国第1战区保定——沧县防线后，继续向石家庄——德县一线进攻。在此形势下，毛泽东于9月16、17日，向八路军发出变更战略部署的指示。指出：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路友军侧背，进而实现夺取华北五省的计划。同时判断恒山山脉一带必力日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枢纽。根据这一敌情变化，毛泽东决定将原来三个师集中配置在恒山山脉一区的计划，改为分散配置于山西省的四角，即：第120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115师立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和太岳两山脉中；第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变更后的部署对敌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它对于八路军保持战略上的主动，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粉碎日军的进攻，对于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根据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统一八路军指战员对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认识，加速全军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并使友军也了解与同意这一方针，毛泽东于9月1日致电彭德怀，要求向全军和友党友军解释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包括：八路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只作战略规定”，八路军有依据情况灵活机

动“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并“坚持依托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21日，毛泽东再电彭德怀，强调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25日，毛泽东给中央北方局的电报中又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于9月21日和25日先后对各师发出指示和训令，要求各部队“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同时立即在八路军所到之处“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指示还划分了各师开展游击战争和做群众工作的地区。根据总部指示和地区划分，第115师于9月中旬向五台、繁峙、灵丘等晋东北地区及冀西阜平地区推进；第120师主力于9月下旬前进到宁武、神池等晋西北地区，其第359旅开至五台、平山地区活动；第129师准备向正太铁路以南之晋东南地区发展。

三、平型关战役

9月中旬，由平绥路东段向西南进攻的日华北方面军第5师，在由大同向南进攻的察哈尔派遣兵团的配合下，迅速向内长城线逼近，企图突破平型关要隘，歼灭第2战区部队，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主力在平汉路的作战。至9月20日，日军第5师已占领晋东北的广灵、浑源和灵丘等地；察哈尔派遣兵团亦进逼晋北雁门关，在日军进攻下，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决定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内长城线组织防御，凭借长城天险阻止日军进入山西腹地。部署杨爱源所部第6集团军（辖第15、第17、第33军）担任右翼北楼口以东至平型关的防御；傅作义所部第7集团军（辖第34、第35、第19、第61军），担任左翼北楼口以西至神池沿线防御。9月21日，日军第5师第21旅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其后续部队，亦有向平型关开进的模様。第2战区司令长官决心集中4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歼灭平型关之敌，并致电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称：“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个团的兵力拂晓可到，希电林师夹击敌之侧背。”

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按照中共中央调整战略部署的指示，令第120师进至雁门关以西的神池地区，侧击由大同南犯之日军；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之大营镇待机，准备侧击进犯平型关之日军。第115师赶到大营镇后，立即侦察平型关方向的敌情、地形。得知日军第5师正由浑源、灵丘、涞源分三路向西进攻，各路相距较远，兵力分散，进攻平型关方向的日军约一个旅。平型关以东是群山连绵的谷道，而两侧高地又便于隐蔽机动和伏击。据此，第115师决心以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并报请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批准。23日，第115师在上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当夜，师部率主力进至平型关东南15公里

《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册。

的冉庄地区。24日，林彪师长和聂荣臻副师长组织干部现地勘察后，确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村长约13公里的公路两侧高地设伏，将由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歼灭于狭谷之中，具体部署是：以师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地区活动，钳制和打击增援平型关之日军。以第343旅两个团担任主攻：其第685团占领关沟至老爷庙以东高地，截敌先头部队，协同友邻围歼公路之敌，并阻击由东跑池向老爷庙回援之敌；其第686团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尔后协助第685团向东跑池发展进攻，以第344旅第687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村以南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以第688团为师预备队，置于东长城、黑山村地域，同日，第2战区第6集团军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要求第115师依据原计划由东南出击。为了隐蔽行动企图，第115师于24日午夜利用夜暗和暴雨，由冉庄向平型关东北之白崖台开进，于拂晓前进入预伏地域，并做好了战斗准备。（见附图1）

25日拂晓，日军第5师第21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该部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第115师抓住战机，立即命令全线突然开火，并趁敌陷于混乱之机，适时发起冲击。第685团迎头截击，歼其先头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第686团于小寨至老爷庙之间，实施突击，并令第2营冲过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狭谷之中。已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向老爷庙反扑，企图向北突围。控制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的第686团第2营在第1、第3营协同下，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在此期间，先期（22日）进占东跑池的日军一部，试图回援老爷庙，亦被第685团所阻。

日军第5师师长板垣征四郎得知其部下将被围歼后，急令在蔚县的第21旅和进至涞源以西的第9旅各一部，火速增援平型关。当该两部行至灵丘以东的驿马岭和以北的王山村时，遭到第115师独立团的迎头痛击，涞源的日军也因受第115师骑兵营的钳制，而不敢倾巢出援。13时许，蔡家峪以东之日军一部与小寨以南被围日军会合后，在6架飞机火力掩护下，以密集队形，再次向老爷庙高地猛扑，由于敌我短兵相接，日军的飞机也无能为力，其反扑被第686团又一次击退。随后，第686团冲下公路，在第685团的协同下，将该日军全歼。至此，战斗胜利结束。第115师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向平型关正面东跑池日军逼进，按照与友军达成的协同作战计划，共同消灭该地区之敌。当日黄昏，第343旅两个团迅速抢占了东跑池周围的高地，并将日军包围在东跑池一带盆地。但是由于友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该日军未能被歼。

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战役中，共击毙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其政治意

义是很大的。平型关大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忻口作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同时，有效地钳制了日军第5师的行动，支援了平汉路友军的作战。

平型关大捷的消息，立时传遍全国。举国上下，莫不欢欣鼓舞。全国各界给共产党和八路军发出的贺信、贺电，达百余件之多。蒋介石26日在给朱德、彭德怀的贺电中说：“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28日致电八路军称：“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谨电驰贺。”国民党同盟会会员、第2战区战地动员会主任续范亭著文称赞道：“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下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也使第2战区司令长官受到鼓舞。26日，阎锡山命令傅作义指挥第6集团军等部迅速击破平型关之敌，并令新组建的第61军速援平型关。第61军于27日到达平型关、团城口附近，解了第34军第71师之围。正当第35军准备东援平型关之时，西线日军已突破茹越口，直趋铁角岭南下，于29日夜占领繁峙城，切断了平型关正面第2战区部队的退路。于是，阎锡山下令内长城线上各军向五台山、三中山、芦茅山之线转移，集中主力于忻口地区组织防御。

第六节 国际社会对中国初期抗战的不同态度

一、苏联和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既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世界法西斯国家所发动的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既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又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次大战在亚洲全面爆发的起点。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因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援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对华政策的重心是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让中国拖住日本侵略军，以备德意法西斯一旦发动侵苏战争时，能避免两线作战。7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时表示：“苏联愿援助中国，”为声援中国抗日，苏联党政领导人给予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积极的评价；苏联外交代表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呼吁各国援助中国，制裁日本；苏联各族人民纷纷写信慰问中国抗日军民，表示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有关宣传机构及时传播中国抗日斗争的消息，举办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事迹的展览。苏联政府不仅在道义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而且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给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在中国抗战迫切需要外援，而西方大国对中国抗战持观望态度的时候，苏联是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但是，苏联在援助中国的同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仍与日本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及各国人民给予中国抗战以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七·七”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号召各国共产党“发动工人运动和广大民众之一切力量去赶快地把法西斯强盗驱逐出中国。”英国共产党号召援助中国。在英共组织下，伦敦万人集会，声援中国。英国全国劳动工会也作出决议，要求政府禁止向日本出售商品和提供贷款。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代表几万集会工人致书中国，向中国抗日军民致敬。美国共产党号召美国人民给中国尽可能的帮助。在美共的号召和推动下，美国“反对国际侵略委员会”等援华组织相继成立。美国产业和劳工两大工会组织所属800万工人，表示声援中国。法国共产党利用一切机会号召人民阵线进行援华工作，全法有30万工人决心支持中国抗战。处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共产党也发表声明，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战，“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除上述国家外，西班牙、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丹麦和瑞典等国的共产党和工会，亦积极号召和推动本国的反日援华活动，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还得到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关注和支持。越南、朝鲜、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等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推动下，不仅在道义上谴责日本，声援中国，而且通过捐款、捐物和拒购、拒运日货等手段，支援中

《中日外交史料丛书（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印行，第485页。

延安《解放》周刊，第29期，1938年1月28日，第13页。

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

二、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的两面政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直接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特别是日军进攻上海更加深了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八·一三”日军进犯上海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出口的物资，美国减少了86%，英国减少了60%。英、美等国为了维护它们在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对日本妄图独占中国的行径进行了一些谴责和限制；对中国抗战表示了某种同情和支持，并企图利用中国抗战削弱日本。这是英美两面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英、美自身有许多矛盾无法解决，而与日本在反苏反共和反民族解放上又是一致的。因此希望借助日本之手，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使日本成为反苏反共的先锋。于是，它们对日本侵略中国主要采取了绥靖政策。

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利益不受日本侵犯，宁愿在中国问题上对日妥协。在“七·七”事变之前，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和外交大臣艾登就对中国代表团说过：“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七·七”事变后的10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又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如果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意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的殖民地进行某种报复性的打击。由于英国惧怕日本报复，所以主张同中日双方维持友好关系，力图将美国推向与日本对抗的第一线。1938年5月3日，英国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将中国沦陷区海关移交给日本的《中国海关协定》，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日本全面侵华，损害了美国的在华权益，但是美国为了保持对日贸易，避免日美矛盾激化，对日仍然实行绥靖政策。当中日双方于7月12日分别向美国国务院通告卢沟桥事件后，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友好的、公正无私的态度。”7月16日，赫尔发表声明，提出“和平原则十六条”，无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区别，却要求中日双方为“世界和平”而“自我克制”。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关于“中立法”的声明，禁止美国政府的商船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用物资。这项声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很公平的，但在中国缺少船只和海岸线已被日本封锁的情况下，占便宜的是日本。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美国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罗斯福于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了“隔离演说”，不指明地抨击了日本的侵略政策。他指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中，在生理上的流行症开始蔓延时，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以保障社会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染”。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支持罗斯福的演说，指责“日本在中国的行为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罗斯福的演说和国务院的声明，立即遭到国内孤立主义者的攻击。于是罗斯福又出来解释说：这个演说“不意味着放弃中立法”。随后，他又进一步宣布这

《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页。

《1937年国际事务概览》第1卷，牛津1938年版，第259页。

《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个演说“没有考虑对日制裁”。无怪乎有人对此评论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试探性汽球”，吓唬一下日本而已。

美国不仅在政治上绥靖日本，而且在经济上给日本“输血”。从“七·六”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前，美国一直是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者，据日本工商省的统计，日本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是：1937年为33.6%，1938年为34.4%，仅1937年下半年，美国向日本输出石油就达3500万桶。对此，美国31名议员联名指出：“我们说日本有德意两个盟国，事实上，我们才是日本最好的同盟国，任何人心里都会毫无疑问地相信，我们正在积极参加日本在华进行的战争。”“日本派出士兵，而我们的性命在战争中却无危险，我们只把商品和原料运到日本，让他们用以作战，而我们则从中获得利润。”

“七·七”事变后，西方大国对日本的绥靖在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上表演得最为充分。

1937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国及英法政府递交备忘录。8月30日，中国驻瑞士公使胡世泽向国联控诉日本扩大侵华战争。9月12日，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正式向国联大会提出申诉书，要求各国制裁日本。9月16日，国联决定将中国的申诉书提交给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咨询委员会的两项报告：第一项报告，指出日本军队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但未明确宣布日本是侵略者；第二项报告建议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并提议国联明确表示从道义上支持中国，要求各国扩大对中国的援助。但无实际措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是英国代表提出的。作为华盛顿会议的发起国，美国不能拒会。罗斯福指示美国代表戴维斯，既不希望“被推到前台充当领袖”，也不愿落在后面变成“英国风筝上的尾巴”。英美两国，在会前既不愿意带头主持正义，更不愿在会上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措施，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说，到这个会议上去谈论经济制裁“是完全错误的”。这就给会议的成功投下了阴影。

11月3日，“九国公约”国中美英法和特约国苏联等19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正式开会。英美等国在会上互相推诿，谁也不愿充当会议的主角，好不容易才说服比利时充当东道主，并由其外交大臣斯巴克主持会议。会议中间，中国代表顾维钧恳请各国从道义上、物质上、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对中国实行援助。苏联代表要求对侵略者采取集体措施，实行制裁。但英、美、法等国都怕得罪日本，拒绝对日本采取行动。英国代表艾登重申，英国决不带头行动；法国代表德尔博斯担心制裁日本，会引起日本入侵印度支那；美国代表戴维斯则认为，即使日本统治中国，美国也不值得与日本开战。

11月24日，历时3周的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只是重申“九国公约”原则，并要求停止战争行动，但对谁是侵略者，谁是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8日。

〔美〕多萝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哈佛大学出版1964年版，第406~407页。

〔英〕尼维尔·张伯伦：《为和平而斗争》，伦敦1937年版，第42页。

被侵略者未敢指出，中国没有得到任何援助，日本也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会议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大失所望。中国代表顾维钧事后写道：中国“是非常失望的，主要不是因为会议本身不能有任何作为，而是由于在远东有巨大利益的大国不愿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日本，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世界和平事业和利益本应采取的。”

布鲁塞尔会议是一次开比不开更坏的会议，使日本摸到了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底牌，因而放胆扩大侵略。就在会议前后，日军攻占上海，逼近南京，在长江炸沉、炸伤美英军舰和炮艇各 1 艘，这是对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莫大讽刺。

三、德、意法西斯支持日本灭亡中国

日本侵略中国得到德、意法西斯国家的支持。由于德意与中日两国的利害关系不同，其对中国初期抗战的态度也有所区别。

“七·七”事变前，德国虽然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政治联盟，但是它同中国政府的关系仍较密切。“七·七”事变爆发后，德国一方面担心日本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从而失去它作为德国盟友的意义；另一方面担心日本独占中国会使德国失掉在华经济利益，所以，在战争初期希特勒不赞成日本的行动。7 月 20 日，德国外交部宣布，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

28 日，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指出：“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德国继续执行中德贸易协定，供给中国作战物资，德国军事顾问团继续留在中国服务，日本对德国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给中国输送军人，甚至扬言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因此，希特勒决定一面继续履行中德贸易协定，攫取中国战略资源；一面命令驻华军事顾问下准参加前线作战，为尽量消弭中日战争而努力，其目的在于既不使中国赤化，又不失去日本。但是随着 10 月德英秘密谈判的中断和英德矛盾的加剧，希特勒为了对抗英美而作出了改善德日关系、加强两国联盟的决定。他宣布“在远东问题上，原则上赞成与日本合作的主张。”11 月 18 日，德国政府根据希特勒的指令，推迟所有德中军人贸易及工业贸易谈判，并部分停止德中原订军火贸易合同的履行，停止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同月，德国拒绝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

1938 年 2 月 20 日，希特勒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同时在演说中称：“德国为抵抗共产主义，始终认为要尊重日本为一种保障的力量”，“德意两国再和日本联合，便成了阻止苏联布尔什维克势力继续扩展最坚强的力量”。1938 年 4 月，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 月要求撤回驻华军事顾问，以实际行动支持和纵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

意大利法西斯从“七·六”事变开始，就与日本法西斯沆瀣一气。在舆论上，意大利公然袒护日本，蔑视中国。意大利法西斯党机关报曾公开发表言论，污蔑“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吹捧“日本是代表世界文

《顾维钧回忆录》第 2 分册，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696 页。

威廉·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第 243 页。

国民党执委会宣传部：《中日战争与舆论》，第 31～33 页。

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 1937 年 11 月，在 19 国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意大利在德日拒绝与会的情况下，充当了日本法西斯的忠实代言人。它极力宣传日本的荒谬主张，反对制裁日本，在大会最后通过宣言时，意大利投了唯一的反对票，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演说时，称赞意大利政府“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始终有力地支持日本。”意大利还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1 月 29 日，又承认了伪满洲国。接着，意大利政府又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航空教练官。

1938 年 2 月，意大利政府通过了给予日本“在远东以积极援助”的决议，为日本提供军火，用来屠杀中国人民。

德意法西斯在西方遥相呼应，袒护和支持日本扩大侵略，使其与日本一样，成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公敌。

第十二章 中国抗战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的，由于国民党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由各党派参加的民族联盟的建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形式，两党只是遇事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因此，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也是依据各自制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实施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反对共同的民族敌人，并在抗日战争的战略范围，保持着一定的协商关系，在反对侵略求得民族解放等目标上，有着共同点。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不同，因而在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主张

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动员和武装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明了对日本侵略不妥协的抵抗方针，以及通过民族革命战争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决心。

1934 年 4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系统地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正义的战争，这是进步的战争，这是保障中国民族生存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换言之，这是使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为使组织和实行这个正义的民族战争，有一个共同的具体纲领，为使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成为强有力的行动，《纲领》提出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最根本的六项共同行动纲领：（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立刻成立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并组织广大的人民的参战组织。（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将各种武器发给人民反日义勇军，以便实行训练和对日作战。（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和卖国贼的财产，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并将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视为我们的朋友。上述纲领不仅明确提出全体军队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和总武装的方针，以及成立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和解决抗日经费的具体办法，而且还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著名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来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 1779 名国内著名人士签名公布，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82 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83～685 页。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力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和武力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并实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等10项方针，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作为抗日的先锋。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全国同胞总动员，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群众，抗击侵略者。“八一宣言”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中央对实行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救国神圣事业提出的最具体的纲领性意见。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又重申了上述方针。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的问题中，就有关抗日战争胜利的条件和方针指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十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十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这个战争会延长多久，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关于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下，它的士气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大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毛泽东回答斯诺的中心点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如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发展和国际援助等各种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军队应该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对中日战争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52～15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446页。

的趋向和结局，作了精辟的论断，对国际反日联合阵线的建立，提出了纲领性的主张。毛泽东首先就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的问题指出，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撤退华北驻屯军，停止一切侵略行动，只有在这些原则之下，才进行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但是，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谈判的可能并不存在。因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毛泽东说：“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即使“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治的崩溃。”毛泽东提出：“日本已有他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全国抗战爆发前的相当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对中日战争的形势，指导中国抗战的路线和方针，以及战争的前途和结局等问题，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反复向全国人民提出自己对抗战的一系列主张。这对推动局部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抵抗，对促进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全国抗战爆发后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对全国抗战和国防问题的方案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全国抗战的战略基本方针以及重大国防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和细致的方案。7月8日发表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提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7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反对妥协的总任务及5项主张：1、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2、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3、全面的抵抗，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4、统一的积极的抵抗，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5、建立抗日的民族

《新华日报》1937年3月23日。

《新华日报》1937年3月26日。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275页。

《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6日出版。

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7月23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妥协退让的危险倾向，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以及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改良人民的生活，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等八大纲领，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7月底至8月初，在日军占领平津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对抗日的国防有关重大问题，提出了全面的意见：

“国防问题我们意见如下：

（1）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2）第二防线保定、大同、马厂、潍县等处，应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3）至于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仅能作为第三防线，决不能只顾此线而下集中兵力于第一、二线；（4）目前关键是第一防线；（5）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6）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7）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8）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9）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犹豫是必败之道。”

中共中央还拟定了《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在估计了敌我双方的全面情况后指出：

“根据敌我一般情况之分析及敌我战略之基本方针，应确立对日作战原则如下：（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箝制敌人；（5）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任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地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地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6）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7）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293页。

洛甫、毛泽东关于国防问题给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指示，1937年8月4日。

《中央文件汇集》1937年下册，第317页。

为了推动和促进对全国抗战路线及战略方针的制定，8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3人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提出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贯主张。

11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强调：部署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外交拖延办法只可便利军事准备及民众动员，但不可动摇抗战的决心；主战场在华北方面，不因其局部扰乱过分分散我兵力；黄河北岸之抗战，因交通运输有被切断之可能，故第1、第2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之能力；正面防御不可依赖一线及数线之阵地，宜采用集团工事，并在平原和山地开展广大的运动战、游击战。朱德在发言中侧重指出，在战略上需要持久防御，但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行动；在整个抗战中，政治工作甚为重要，能发挥动员民众和瓦解敌人的重大作用；游击战在抗战中有重要地位，破坏敌人后方、钳制敌人兵力效果甚大。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防问题意见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案，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在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抗日战争指导案，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洛川会议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的制定

全国抗战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日本侵略军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但是，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在此紧迫的形势下，为推动全国抗战的顺利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2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报告。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会议通过并于8月25日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是日寇大举进攻华北的开始，“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

过去了。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决定》最后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开始的历史关头，提出的上述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成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持久抗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屈不挠地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指针。

（三）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军事战略转变

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从预定的战略任务着眼，确定了在总的持久战方针下，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在给周、博、林的电报中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8月下旬，毛泽东在洛川会议的军事报告中提出，红军的基本战略任务是：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保存与扩大自己。红军当前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红军胜利完成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方针。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与集中打仗的关系，集中兵力大兵团作战与分散兵力进行游击战的关系，保存和发展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山地是红军开展游击战得心应手的用武之地，也是日军坦克等重装备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合。进行山地游击战，是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下，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保存和发展自己，击败和消灭敌人的最好战略。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也是红军贯彻执行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的唯一正确方针。只有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才有利于发动、组织群众，造成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进行全民族的抗战，置日本侵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有通过动员、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才能迅速发展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122页。

同上，第84～85页。

人民武装力量。扩大我占区，缩小敌占区，不断消耗敌人，实现战略的持久，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根据红军担负的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以及红军必须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洛川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同敌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务相符合。这一转变在现象上虽然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但是，在本质上却是洞察中日战争全局而作出的英明战略决策。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命运。

三、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全国抗战开始以前，国内的亲日妥协派即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以后，他们又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当南京失陷后，亡国论更是鼓噪一时。与此相反，抗战初期国内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低估日本的力量，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淞沪抗战时，有些人认为只要打3个月，形势一定发生变化，国际干预，苏联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

这些速胜论者不赞成实行动员人民力量的持久战的方针。另外，不少的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只把胜利希望寄托于正规战，甚至反对八路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方针。

中国全民族几千万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这场亚洲的大战，它的胜败和结局，不仅关系着中国的存亡，而且极大地关系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世界各国无论就其本国利益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抗战的发展，担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待兰，曾向毛泽东提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呢？”“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如何克服投降主义？”这些问题的本身，就反映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抗战存在的疑虑。

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具体指出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如何争取最后胜利，驳斥“亡国论”、“速胜论”的滥调，拨开人们思想上存在的迷雾，坚定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同时也回答国际朋友们存在的疑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先后发表文章。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连续发

《大公报》评论，1938年4月25、26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页。

同上，第382页。

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军事论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着重论述了下列问题：

毛泽东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中日战争发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进行的一次决死的战争。他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其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这些基本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批驳了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方面，而看不到有利方面的“亡国论”，也批驳了只看到有利方面，而不承认敌强我弱方面的“速胜论”。他指出中国决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并勾画出了持久战必经的过程，解决了进行持久战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原则。

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就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军民的动员。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毛泽东从中日双方实力的基本情况，指出了各阶段敌我力量变化的趋势。在第一阶段的战略防御中，敌虽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其兵力、财力、物力的消耗都将开始表现竭蹶状态。中国方面虽受颇大的损失，但同时有很大的进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全国空前的团结，对敌人的坚强抵抗，最终将使敌停止战略进攻。但由于中日强弱的悬殊，在敌停止战略进攻后，中国距离反攻的程度还相差很远，尚难举行战略反攻，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继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造成反攻的必要条件。这个重要的第二阶段，即为相持阶段。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它是持久战理论的精髓。毛泽东指出，在相持阶段中，敌企图保守占领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到顽强的游击战争。此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的 1/3 左右的区域，2/3 左右仍然是中国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这个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努力的程度。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演出最精彩的反攻的结幕。第三个阶

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运动战仍是主要作战形式。此时，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和本阶段继续生长着的力量，同时，还须依靠国际援助的增长和日本困难的增长。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战略反攻在前期将不是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战略反攻将逐渐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过程。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战略反攻力量依靠的基点，反攻作战的特色，以及反攻应有的彻底性。

毛泽东提出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这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运用于军事学，创造出的军事辩证法的范例。他说，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对于内线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他认为战略上的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决不能靠战役战斗上的内线持久防御战来实现，相反地必须发挥地广和兵多的长处，采用主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路对敌一路，从战场的外线进行突然包围攻击，歼灭其大部或一部，迅速解决战斗，一战胜之，再及其余。使敌之战略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战斗的作战上，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敌之战略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战斗的败仗和消耗，不得不改为持久战。毛泽东还辩证地论述了歼灭战与消耗战的关系。要改变敌我力量总对比，就要在战略上消耗敌人。要减杀敌军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就要靠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所造成的歼灭战。战役战斗的内线防御战对敌人的消耗，只能起辅助作用。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战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毛泽东所设计的中国全面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最光辉和特殊的方面，是表现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整个抗日战争处于战略内线的地位，但主力军在内线，游击战争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敌后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夹击敌人的战线。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战略外线作战的军队，则广泛向敌后方大步前进。这样就形成了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的复杂形态。“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毛泽东对持久战总的趋势和结局的论断是，中国进行的这种持久战，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民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战争中去，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那末，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它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在这样的

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就要求把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游击战争，但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辅助正规战的一种作战形式，认为它只起战役战术的配合作用。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地位来考察，这是对军事理论的重大发展。他要求广大的游击战争，逐步向运动战发展，以担负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他强调建立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一了依托。根据地是关系游击战争生存和发展的生死攸关问题，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群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就失去了进退的依托，在敌人反复残酷的进攻下，就不能长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指出，首先应在山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堡垒，然后向平原和河湖港汉地带发展，建立临时根据地，并逐渐发展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及其成功的实践，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打破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计划，发展壮大人民武装，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都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它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具有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

毛泽东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使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得不佩服。程思远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依据，详细地制定了怎样对一个起初较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蒋介石在他早期的抗战演说中借用了毛泽东的很多提法。”傅作义将军读了《论持久战》后，感到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他让军官们阅读并指示在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7年版，第101页。

该部军政干部学校研究学习。卫立煌将军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即让秘书陪他阅读，该书不但使他对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意义有所了解，而且认识到抗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这对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论”观点也有所触及。《论持久战》由杨刚译成英文于1939年出版后，它的影响迅速在国内外扩大。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伊藤宪一，把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归纳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旧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崎重三郎，在日本军事杂志著文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国民党由于在西安事变前，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对抗日仍存在着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因此，难以对抗战实行正确的指导，而且实际上已使抗战受到不少失败和损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中日民族的主要矛盾，精辟分析了中日两国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点，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指导了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胜利进行，实际担负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历史重任。

蒋曙晨：《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日〕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94页。

〔日〕《丸》1965年12月号。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拟定的抗战指导方案

“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影响下第19路军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际上是标榜抵抗，重心在谋求对日妥协。这一对日方针继续到西安事变后，才有了转变。

1937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的较为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计划按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于日苏战争的前后，分为甲乙两案。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

在敌情判断中指出：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则敌将以陆空军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在中日战争而演成世界大战之初期，或由俄日或美日战开其端绪，则敌军为略取资源，筑固作战之基础，或将以主力先对我国军取攻势，使在短期内消灭我抵抗之能力与意志。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并收复失地之目的，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至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迄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抵抗，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规定：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开战之初，如情况所许，则国军以主力于沧州——河间——保定之线，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集中期间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作战。会战期间以主力协同北正面陆军作战，以一部协同海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以获得我空中行动之自由。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

民国二十六年作战计划（乙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发生于日苏战争之后，其中敌情判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与甲案有若干不同：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为应付世界战，先必略取资源，巩固作战之基础，将主力对我国军取攻势，在最短期间内欲消灭国军作战之意志。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巨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迄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进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之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一）开战初期，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敌在我国以非法占领之各根据地之实力，在规定同一时间内，将其奇袭而扑灭之，俾尔后国军作战进展容易。（二）国军应以大无畏攻击之精神，统一之意志，对骄敌实行攻击，挫折其企图，以达成国军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

在上述甲乙两案的敌情判断中，都正确地指出日本在军备及物质方面占有优势，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欲在短时期摧毁中国的作战意志。但是，在敌情判断的结论中，则认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这就忽略了日本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的严重威胁。日本在 1937 年度的侵华作战计划中，明确具体地规定要使用 4 个集团军共 14 个师，对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实施全面战略进攻。

对日本全面侵华的时机和兵力使用的判断方面，甲案是设想日本首先向中国发动进攻，并将以主力先对我国采取攻势。但是，将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日本将以陆空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乙案虽指出将以主力对中国采取攻势，但因此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在日俄战争之后爆发，日军必然不能全力对华作战。实际上，日本总的世界战略是采取中间突破，即先侵占“满蒙”，进而侵占全中国，获得足够的战略资源和有利的战略基地，尔后北攻苏联或南攻英美。不首先侵吞中国就先向苏、英、美进攻，不先从弱处开刀辟头就与强敌决战，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侵略政策。同时，也没有估计到，苏联和英美等国都将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尽量避免陷入或过早陷入战争。因此，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不会很快惹起日俄或日英美的战争，我国必须作抗击日军主力甚至是全力进攻的准备，作长期独立支持抗日战争的准备。

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由于判断日本的大举进攻会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后，即使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前，不久后将惹起日本与苏、英、美之战，日军的主力可能不放在中国方面，从这一判断结论出发，国民党提出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就忽视了敌强我弱的根本特点，及其规定的中日战争长期艰苦的规律，使作战方针和指导带有轻敌和速胜的思想。如作战计划甲案在作战方针中提出：“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取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会战期间，……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作战计划乙案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中更提出：“于开战初期，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 “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迤北之线，并乘好机……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从中日双方军事、经济强弱不同的基本特点出发，上述作战方针、任务和指导，有些是难以实现的，有些是脱离实际的，勉强去作，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作战计划甲案中提出：“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抗战，”“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这就不难看出，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带有浓厚的战略速决和速胜的色彩。尽管如此，参谋本部在1937年上半年拟定的这两个国防作战计划，对国民党以后研讨和制定对日作战方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的抗战指导路线和方针

（一）卢沟桥事变汇报会议讨论抗战大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幕僚，从7月11日起至8月12日，逐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邸举行汇报会，分析研究日本进攻的形势，商讨确定对付侵略的大政方针。

关于对日军进攻企图判断，与会者认为根据连日情报综合，有两种判断，一种是敌不愿事态扩大，另一种是敌将大举进攻。但根据“关内第一线不过二师，第二线不过三师。辽北有重兵，不能移动，国内输送来华部队，大连、釜山未见有大部队登陆，仅塘沽有军用品上陆。山东方面无敌情。国内似尚未大规模出动，第一线之挑战，恐系少壮派之自由行动，尚非整个计划”。

对于卢沟桥事变处置的方针，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另一种意见主张决意作战，认为“现在宋明轩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关于抗日战争采取局部化还是全部化，是否绝交或宣战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依现在实际状况，仅能局部化，第一步似不能谈绝交，但如青岛、海州发生战争，则我在上海方面，似应先有所动作。”“如局部化，日军对二十九军攻击时，中央当然参加，此时其他地方均不动”。另一种看法是，“仅局部化，则敌仍可处处自由行动，敌亦有利”，如北平、青岛等地发生战争时，可考虑此时全部化，实行绝交宣战。“但究竟局部化与全部化，何

《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4页。

同上第2期，第7页。

同上第2期，第6页。

同上第2期，第7页。

同上第2期，第8页。

者于我有利，在国际公法上手续如何，均须详为研究。”经与外交部商讨得出的结论是：“如绝交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现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两相比较，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九一八时之状况为宜”。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方面，有人主张“实行持久战，放弃土地，无关重要。在持久战中，应研究减少敌人三种力量，即（1）飞机（2）战车（3）大炮。……我非支持一年，不能得苏俄之援助。”有人认为：“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久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有人提出，采取持久战，还是采取歼灭战，应先决定。

卢沟桥事变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有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以及军政部次长、参谋本部次长、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要员参加的应急商讨会议 33 次，但对日本进攻的企图的掌握仍是若明若暗，对是和战仍举措不定，对应采取持久战略还是速决战略，尚难作出决断。

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讲演中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准备迫不得已的应战，仍不放弃争取和平解决。

（二）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表明抗战决心

在平津失陷及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的敦促下，国民政府为了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于 1937 年 8 月上旬邀集各地区将领和负责人赴南京开会。

8 月 7 日上午，国防会议正式召开。在会上由蒋介石致开会词后，参谋总长程潜说明国防会议原定在 9 月中举行，因敌人向我挑衅，发生战事，特提前召开，以便讨论制敌救亡大计。同时，因形势紧急，会议必须缩短。随后，由军政部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及处置情况，由各有关方面报告了空军建议、防空、国防工事以及重工业建设等情况。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简短讨论。

8 月 7 日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孙科、陈立夫、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唐生智、陈调元等 41 人出席。会上，蒋介石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致开幕词说：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的关头，今天集合了全国各地高级将领长官，共同商讨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接着，由秘书长程潜，报告当日上午召开国防会议

《民国档案》1987 年第 2 期，第 9 页。

同上第 2 期，第 10 页。

同上第 3 期，第 13 页。

同上第 2 期，第 7 页。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1 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064 页。

的经过，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情况，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报告了敌我态势及四个战区和预备军的划分情况。最后，蒋介石阐述了战争的意义和决心，他说：“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防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仗不可。”会议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以起立表示抗战的决心。会议还决定，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本进行交涉，仍不轻易放弃和平。国防联席会议决议表明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不放弃以妥协办法解决的前途。

（三）国民政府大本营战争指导方案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

战争指导方案

“一、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付托，统帅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

“二、大本营之组织如系统表

“三、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连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最高之原则。

“四、为统帅指挥之便利，将全军区分为四战区（战区区分及战斗序列，另令规定颁发之），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

各战区作战地域如左：

第一战区：冀省及鲁北。第二战区：晋察绥。第三战区：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第四战区：闽粤。第五战区：苏北（长江以北）及鲁省。”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

“一、方略

1、……

2、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

“二、敌情判断

综合所得诸情报，及依据历次战役之经验，判定：

1、敌国为使现在平津一带敌军之作战便利起见，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线各要点（张家口、南口等处），尔后或深入山西，以威胁我第一战区之侧背，或转进于正定、保定方面，以直接协力于其在平津部队之攻击。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4页。

2、敌国为牵制我国军兵力之转用，及从政略上威胁我国军根据地起见，将以一部攻我淞沪，窥伺我首都。

3、敌国为使其平津方面之部队进展容易起见，将以一部攻我胶东，进出历城。

“三、指导要领

甲、第一期（自八月十三日至月日）

第一战区

对北正面（平津）为限制敌军之自由转移兵力于平绥线路，及使我第二战区在平绥路方面作战之便利起见，应即派有力之一部（约两军），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同时抽调在平汉路北端部队（机动性大而富于游击战之经验者）约三师（能多更好），归第二战区长官指挥，向怀来、万全之线以北转进。

第二战区

本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

平绥路为第二战区之生命线，亦中苏连络之生命线，更为我国军旋回作战之能实施与否之中枢线，应以南口附近力旋回之轴，以万全、张北、康保等地方为外翼，要固守南口、万全，国军作战方有生机；要攻略张北、赤城、沽源，国军方能展布，如南口、赤城、沽源之线，始终为国军保有，则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冒险南下，故本战区之作战为：第一步：以该战区现有之兵力，最低限度，必须固守南口、万全之线，以俟第一战区转移兵力之到达。第二步：第一战区转移兵力到达后，向赤城、沽源之线转移攻势。第三步：依战况之推移，对于山西东北方面，厚积兵力，以期永久固守。

第三战区

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

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发的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较之过去的方案计划大大前进了一步。它明确提出要以武力对抗侵犯我国的敌寇，以求中华民族之生存和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确定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主旨；正确判定敌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铁路线各要点，尔后深入山西以威胁第一战区之侧背，并将以一部进攻淞沪，窥伺首都，牵制我国兵力之转用；正确决定主战场之正面为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为第二战区，决定第二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但是，对贯彻持久战主旨的部署和指导，缺乏周密考虑和计划，相反，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即准备于主战场正面以主力实行柔性攻击，在主战场侧面以攻势略取张北、赤城、沽源等地，并集中空军主力协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这些部署和任务，都或多或少背离持久战略，而带着轻敌和速决战略的成分。

国民党提出“持久战”战略、“持久消耗战略，”主要是根据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蒋介石认为，敌如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敌之武力，终有穷时。国民党争取持久战的目的，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国防部史政局：《中日战争史略》上册，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169页。

蒋介石：《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1937年12月17日。

量总的对比，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而是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最后取得胜利。蒋介石说得很透彻：“所谓‘抗战到底’，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我们只有一心一德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国民党设想的抗日战争只分为两个时期，蒋介石于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训词中说，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就是前十七个月的抗战，以后是第二期抗战，就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国民党实现持久战略的途径，主要是靠内线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蒋介石规定的抗战获胜要道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实际上，这种受制于敌和被动挨打的内线防御战，不能有效地歼灭敌人，很难实现战略持久。而且以这种单纯阵地防御的消耗战，虽能给敌人造成一定的消耗，但要通过它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实现敌消我长、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是很困难的。

三、抗战建国纲领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检查全国抗战以来的工作，确定以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为帮助国民党继续进步，3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电文中，提出八项建议：（1）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誓与日寇抗战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2）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3）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即须发布以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鹄的。再在这一纲领下，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4）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切实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严紧军队纪律，认真改善征兵制度。

（5）继续改善政治机构。首先应该召集真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全权的国民大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制定各种实施纲领的具体法令。大量吸收全国人民中各党派中的爱国志士参加政府。切实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6）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普遍组织民众的自卫队、游击队。大量扶植与发展一切抗日救国与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各界的、职业的民众团体。颁布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法令。（7）实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豁免战区地赋等改善民生的法令。（8）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军需工业，改进农业。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对抗日有关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方面，扼要作出纲领性决议：

甲、总则

蒋纬国：《抗日御梅》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序言第6页。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3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484页。

- (一) 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
(二) 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力迈进。

乙、外交

(三) 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四) 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五) 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六) 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七) 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动。

丙、军事

(八) 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九) 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对于华侨回国效力疆场者，则按照其技能，施行特殊训练，使之保卫祖国。(十) 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十一) 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并优待抗战人员之家属，以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之鼓励。

丁、政治

(十二) 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十三) 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十四) 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十五) 整饬纲纪，责成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为国牺牲；并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为民众指导。其有不忠职守，贻误抗战者，以军法处治。(十六) 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财产。

戊、经济

(十七) 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己、民众运动

(二十五) 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二十六) 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庚、教育

(二十九) 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三十) 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十一) 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三十二) 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自西安事变被迫转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走向全国抗日以来所制定的比较好的一个纲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首都南京后，又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华北华中的战略联系，并发表“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全国军民团结奋战，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国民政府真正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允许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共同抗日，以便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只能选择继续抗战的道路。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日的胜利，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建议，采纳了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在政治改革开放民主的方面，多少作出了一些让步。这些都在纲领中得到了某些反映。

《抗战建国纲领》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要抗战的。《纲领》在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方向上，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有基本一致的方面。

《纲领》吸取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某些精神，在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和教育等项中，采取了近似和类似的提法。如“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充实民众武力”，“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严惩贪官污吏”；“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对于汉奸严行惩办”；“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等等。因此，它对指导和推动全国抗战有积极的作用。

国民党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的决定和转变的有限，在大敌当前、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下，既想利用人民抗战，又害怕人民的力量在抗战中壮大起来；既不能不对人民的合理要求作出某些让步，又想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制订《抗战建国纲领》，既能利用人民的力量来抗日，又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总体方面进行统制；既能用《纲领》搪塞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健全民意机关的意见，又能拒绝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建立国防政府等民主改革的要求，从而使抗战的胜利成为政府和军队的胜利，达到维护旧国家制度的目的。因此，《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纲领，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着本质的区别。

《抗战建国纲领》的严重缺陷和消极因素在于：抗战纲领未对抗战的最目的作出规定，未提出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坚决反对妥协和动摇，这就给抗战的妥协动摇派夭折抗战留下了后路。《纲领》虽提出实行总动员，但未对实施办法作出具体规定，这就变成了空洞的诺言，无从实现。在军事纲领中，只提到训练官兵、壮丁，抚恤伤亡官兵等，未规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未提出采取积极的作战方针，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也未提出改善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却只能“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名为援助，实为限制。在政治纲领中，虽提出了“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但国民参政会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是具有决定国策和实际权力的民意机关，只是一十建议、咨询性质的机构，而对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包括各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国防政府，开放党禁等最关键性的问题，却避而不谈。在经济纲领中，虽提出了“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但对促进发展农村经济最重要的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政策，都未作出规定。在民众运动方面，虽不得不提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但只限定于一定的范围，而且没有规定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抗

日的旧法令，和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政治犯，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通过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以非实质性的改进和让步，掩盖限制各党派团体和人民群众，参加国家民主管理和参加抗战活动的片面抗战路线的集中表现。虽然如此，《抗战建国纲领》总的倾向是要抗战的，这是首先值得肯定的。即使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它虽与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相差甚远，但与一味妥协的不抵抗路线，仍然有着巨大的进步。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左派爱国人士及人民群众赞助这个纲领，希望在实施中逐步去完善、发展与提高它。对其中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希望在实施中给以逐步的批评，以推动国民党的进步。人们还担心《纲领》提到的一些进步的东西能否兑现，担心国民党过去“决而不行”、“行而不力”的习惯，以及南辕北辙、反其道而行之的作法能否改变。事实上，就在《纲领》通过的前后，在上海、西安、武汉等地，就出现了解散已组织起来的——群众抗日团体，压制群众抗日活动的情况，说明人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第十三章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及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一节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

一、日军进攻山西的方针和计划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雁门关以南娘子关以西系多山地带，居高临下，直接威胁日军平津地区的军事重地，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

1937年10月1日，日军突破茹越口、平型关一带之内长城防线，侵占大营镇、繁峙等地之后，日军中央部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以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并应“为以上作战提供方便。”华北方面军于当日夜半即命令关东军位于内长城线以南的各部队，归第5师师长指挥；同时命令第5师以主力在代县集结，准备攻占太原。

10月3日，第5师由大营镇向代县附近集结。4日，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主力列入该师指挥。

10月7日，萱岛支队（以中国驻屯军步兵第2团为基干编成）到达大同，也配属于第5师。至此，忻口作战日军的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下辖第5师、独立混成第1旅、混成第2、第15旅、堤支队、大泉支队、萱岛支队等部。

6日，华北方面军命令沿平汉线南侵的第1集团军在适当时机攻占石家庄，并以一部兵力进入井陉以西的要地，切断中国军队在山西方面的交通，以策应第5师的作战。同时，命令第5师向太原前进，攻占太原。

二、第2战区的防御企图和部署

内长城防线被日军突破，太原形势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挽回危局，遂决定转用平汉线兵力，巩固山西防御。10月1日，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共四个半师的兵力，由石家庄经正大路，转赴晋北增援。并令第2战区以有力一部固守淳县、原平，掩护集中。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了扭转晋北作战的败局，决定缩短战线，将兵力集中于宁武、代县、原平一带，利用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推卸晋北作战失败的责任，他又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处决了雁北作战夫利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同时，阎锡山召集有关人员当面敌情进行分析，判断日军将以主力由大营、繁峙，以一部由大同、雁门关沿汽车路进攻，另以一部由阳方口附近实行钳制攻击。据此，第2战区确定忻口作战的方针是：以攻势防御之目的，以主力占领原平、阳方口地区既设阵地线，两翼依托五台及宁武各山脉。将部队编为右、中、左及预备等4个集团军：以第18集团军及第73、第101、新编第2师为右集团军，归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在五台山至峨口之线占领阵地；以第14集团军、第9、第15、第17、第19军等部为中央集团军，归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在蔡家岗、

南怀化、大白水一线占领阵地；以第 68、第 71、第 120 师及独立第 7 旅等部为左集团军，归第 6 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在黑峪至阳方口之线占领阵地；以第 34、第 35、第 61 军及第 66 师等部为总预备军，归第 7 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配置于定襄、忻县地区。决心以主阵地之部队竭力阻止日军前进，以第 18 集团军第 115、第 120 师分由平型关及雁门关施行包抄，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包围敌人于原平以北山地而歼灭之。

与此同时，阎锡山命令第 19 军固守崞县，第 34 军之第 196 旅固守原平，独立第 7 旅固守轩岗，阻敌南下，以掩护主力在忻县附近之集中。俟各路部队集中完毕后即开始向当面之敌攻击。

三、中共中央军委对山西作战的指导和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的部署

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极为关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直同阎锡山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多次参与一些重要作战计划的研究，以协调共同作战。针对阎锡山把作战地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以主力用在正面防御的作战计划，周恩来指出：“在中地区，应以小部队箝制当面之敌，而以主力把敌诱到代县、忻口一线，求得侧面出击，加以消灭；右地区的部队要进行广泛的游击，以牵制敌军；左地区兵力较弱，可向宁武南北游击，破坏和阻止敌军的前进计划。”他还提议，立即组织、武装正太、同蒲铁路员工和井陉、阳泉矿工，配合保卫山西。

为了争取忻口和太原作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 10 月 6 日致电参加太原军事会议的周恩来，让他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尤泉关（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毛泽东判断：进入山西之敌，总数不过两个半师，为确保晋北占领区，又须分兵守备。因此，到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不过一个师左右。如果我方部署适当，是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的。并指出此战役关键在于下列三点：（一）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二）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三）敌后方之破坏。

为达上述目的，毛泽东提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应速派主力军三四个师至娘子关；第 14 集团军的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其余担任守备；八路军第 115、第 120 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袭击忻口至大同，大同至张家口之铁路及代县、广灵至张家口之公路交通线。八路军第 129 师主力或全部则使用于正大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路。

朱德、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 10 月 6 日、7 日，令第 115 师协同友军向平型关、大营镇之敌进攻，相机袭取浑源、应县，断绝茹越口、繁峙之间交通；令第 120 师以主力向岱岳镇（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出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 358 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第 129 师主力进到正大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

四、忻口作战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忻县、崞县、定襄三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战略要地。从1935年起，就已在修筑工事。

为了占领太原，日军第5师于10月3日由大营镇出发，6日在代县集结。混成第2、第15旅于10月1日由代县沿公路分别向崞县、原平进攻。此时，第2战区第19军王靖国部凭借有利地形，对日军的进攻奋力抗击，迟滞了敌军的行动，并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

10月5日，第14集团军先头第9军（欠第47师）到达忻口，占领忻口附近之南怀化一带阵地。

10日，第14集团军主力到达忻口，占领忻口东西一线阵地。

12日，第2战区又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率第35军及第61军之独立第2、第3旅等部开赴忻口一带，协助中央集团军作战。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将先后到达忻口地区的部队区分三十兵团：以第15军军长刘茂恩指挥第15、第17军为右翼兵团；以第9军军长郝梦龄指挥第19、第35、第61、第9军为中央兵团；以第14军军长李默庵指挥第14军及第85、第66、第71师为左翼兵团。各部队由卫立煌统一指挥，在12日前展开于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准备与敌决战。（见附图2）

日军在10月8~11日占领崞县、原平后，企图一举攻占忻口，直趋太原。10日，其第5师从代县向忻口前进。12日，日军各部队集结于原平附近。板垣征四郎将混成第15旅及堤支队等部编为右翼队，第5师为左翼队，于13日开始向忻口阵地攻击。因两翼有五台山和云中山相阻，日军集中5000余人兵力，在飞机30余架、坦克50余辆、炮50余门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央兵团第9军第54师之南怀化阵地及左翼兵团之阎庄阵地发起猛攻。战至10时许，南怀化沿河工事被毁，守军伤亡殆尽，日军乘机渡河，突破南怀化阵地。郝梦龄即以第17军第21师两个团增援堵击，卫立煌派第14军之第10师及第61军新编第4旅协力夹击突入之敌。激战终日，毙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恢复南怀化东南高地。向阎庄进攻之敌，至黄昏时，增加到3000余人，突破守军前沿阵地。

13日夜，卫立煌组织部队向日军实施反击，企图围歼突入之敌。14日2时，反击开始后，中央兵团之第35军第218旅向南怀化以北之弓家庄日军反击。日军1000余人则向第9军第54师之第161旅下王庄阵地攻击。第218旅以一部增援第161旅，旅长董其武率另一部继续向弓家庄日军反击，7时攻克弓家庄。8时，日军1000余人，坦克10辆在飞机15架、炮20余门的掩护下，向下王庄至弓家庄一线反扑。守军连续打退敌人四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在中央兵团对南怀化附近日军开始攻击之际，日军亦增兵向南怀化反扑，战斗甚为激烈。经一日激战，南怀化阵地又为日军占领。右翼兵团经一日激战，于20日将当面日军压迫于滹沱河东岸至灵山脚下一带；左翼兵团于拂晓攻占旧练庄，遇日军增援部队反扑，激战终日，成对峙状态。

14日20时许，卫立煌亲率独立第5旅至忻口督战，将指挥关系作了调整：由第61军军长陈长捷指挥第21师、独立第2、第3旅（欠第4团）及新编第4旅，负责肃清南怀化之敌；由郝梦龄指挥第54师附第217、第218旅及独立第3旅之第4团等部，担任忻口——正面守备及向当面之敌反击。

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泥河、东泥河之敌反击，曾一度攻占中泥河，

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之日军，自拂晓起，继续向 1300 高地攻击，情势极为严重。左、右翼兵团经一日激战，仍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

卫立煌鉴于南怀化为全线锁钥，关系忻口战役的全局，遂决定集中第 21 师、独立第 2、第 5 旅及新编第 4 旅等部共 5 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 68 师由秦家庄、旧练庄向前后城头行动，夹击该敌。限于 16 日零时前后开始攻击。

阎锡山得知当面之敌增加，恐中央集团军兵力不足，遂电令朱德总司令：指挥所属截断敌后交通，以阻敌续增；并即派第 73 师及第 101 师之第 201 旅等部，迅速轻装赴忻县，归傅作义指挥。

16 日 2 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 218 旅由弓家庄向南怀化敌侧背攻击，7 时攻占旧河北，9 时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是时，日军飞机 10 余架，协助其地面部队一再反扑，终被击退。

郝梦龄率部向占领南怀化之敌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昼夜激战，占据南怀化以南之日军，大部被歼。此战，日中双方军队均伤亡数千人，第 9 军军长郝梦龄中将（牺牲后被迫晋为上将）、第 54 师师长刘家琪少将（牺牲后被迫晋为中将）、独立第 5 旅旅长郑廷珍少将等，均壮烈殉国。

连日鏖战，部队伤亡惨重，卫立煌除派陈长捷统一指挥中央兵团各部队继续作战外，并电呈蒋介石，请求迅筹援军。蒋介石即派第 22 集团军之第 41 军由潼关一带兼程驰援。阎锡山也急令第 94 师及第 177 师之第 529 旅由五台山之耿镇、龙泉关一带星夜赶赴兰台镇、二十里铺间，归卫立煌指挥。与此同时，日军汽车 400 余辆，满载步兵，由团城口西进。卫立煌遂决心固守阵地，以等援军到达，再行反击。乃令第 217、第 218 旅分别撤至忻口附近集结；第 54 师界河铺北岸之一部亦撤至界河铺以南占领预备阵地。并以第 19 军军长王靖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第 61 军军长陈长捷为副总指挥。是日 24 时，卫立煌又对部队部署作了调整，将部队区分为左地区队、右地区队、中央地区队（即原左、中、右翼兵团），分别配置于张家庄、灵山、界河铺、大白水、南峪之线阵地，待后续部队到达，再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之敌。

17 日至 19 日，日军陆空协同不断向中央集团军之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官村、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守军击毁其坦克、装甲车各 20 余辆，使日军攻击未能得逞。自 20 日起，日军先后对中央集团军各阵地施放大量催泪性毒气，并向守军阵地实施爆破。

22 日，日军增援部队萱岛支队也投入了战斗。守军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突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 11 月 1 日，守军虽“战斗员伤亡三分之二以上”，“日耗两团上下”，但阵地仍巍然屹立。

还在日军准备向忻口进犯时，八路军各部队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 115 师独立团于 10 月 10 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 120 师之第 358 旅主力于 10 月 8 日，夜袭宁武县城。该师雁北支队于 10 月 1 日袭占朔县以北之井坪镇（今平鲁县城），4 日又收复平鲁县城（今平鲁镇）。接着该支队对同蒲铁路朔县至大同段展开

破袭战，10日在辛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

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了游击战。

第115师之第344旅主力于10月13日至14日在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断绝日军交通。

15日，截击由灵丘方向驶来的日军汽车130余辆，并打退该敌一个营的数次反扑，迫其退回灵丘。接着第344旅主力于当日夜袭团城口，随后收复平型关及浑源县城。第344旅之第688团于15日夜袭沙河镇日军，缴获大批粮秣和军用物资。

18日，该团又一举攻克繁峙。

第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等部，则向察南、冀西之敌展开进攻。15日，独立团于广灵以南之冯家沟设伏，歼灭日军步骑兵100余人，缴获满载军用物资的大车120余辆、骡马300余匹。16日乘胜收复广灵县城。随后收复灵丘、蔚县、易县、浑源、阳原等县城。向冀西挺进之骑兵营等部，于18日克复曲阳县城。至29日，骑兵营等部又连克平山、唐县、完县等城，严重威胁了日军平汉铁路北段的交通。

经20余天的作战，第115师先后收复县城10座，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

第120师向进攻忻口之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其第358旅旅部率第715团于10月13日夜向崞县西南之日军进击，一举攻占大牛店。随即于14日乘胜向南北大常、永兴村之敌进袭，毙伤日军120余人。第358旅之第716团深入日军侧后，打击敌人的运输队。

18日，该团在黑石头沟公路两侧进行伏击，毙伤日军3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

20日夜，又以一部袭占雁门关；另一部破坏了广武至大和岭间的公路及桥梁，一度切断了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

第359旅（欠第718团）在日军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之时，星夜由平山地区进至忻口西北侧击敌人。10月23日，该旅在阳明堡西南之王董堡伏击日军运输队，毁敌汽车7辆。此后，不断袭扰过往日军，使敌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

由于第115师和第120师的积极作战，使进攻忻口之日军与大同、张家口的交通中断，粮、弹、油料等供应断绝，迫使敌人不得不借飞机来输送给养。卫立煌10月24日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称：“敌自雁门被截断，粮秣极感困难，现向地方征发杂粮中。”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连电嘉奖，蒋介石于10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

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遂由代县西南之阳明堡机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了对忻口阵地的轰炸。此时，八路军第129师先头部队第769团，进抵滹沱河南岸苏龙口一带，发现日军飞机不断由北岸的阳明堡机场起飞，遂决定出其不意，夜袭机场。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05页。

《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34页。电中所说“林师”指林彪任师长的第115师，“张旅”指张宗逊任旅长的第120师第358旅。

10月19日凌晨，第769团各部队分别进至预定地区。担任主攻的第3营顺利偷渡滹沱河，潜入机场，发起攻击，经过1小时激战，共毁伤日军飞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八路军伤亡30余人，营长赵崇德光荣殉国。这一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暂时失去了空中力量。

八路军各部队的积极作战，切断了敌后方运输线，削弱了日军的进攻力量，大大减轻了国民党军正面防御的压力，起到了暂时稳定晋北战局的作用。

五、娘子关作战

娘子关位于平定县以东、井陘县以西之正太线上，为晋冀间要冲，是太原的东面门户。

日军在10月10日攻陷石家庄后，以一部继续沿平汉线南侵，而以主力第20师等部沿正太线西进，企图迂回忻口、太原侧后，配合其在忻口正面进攻的部队夺取太原。这样，娘子关地区的局势遂告紧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确保山西，使晋北作战无后顾之忧。”在抽调第14集团军转用于晋北作战之后，又命令第1战区第26路军、第27路军、第3军及第17师等部转用于娘子关南北之线，以掩护第2战区之右侧。阎锡山于10月10日夜派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赴娘子关统一指挥作战。此时，第26路军除留第30师归第27路军总指挥冯钦哉指挥外，其余部队在第2集团军总司令（兼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率领下入晋增援，正向太原输送中。冯钦哉将第17师配置于娘子关与雪花山一带；第30师及第169师在左翼之张家井、西板山、曹庄一带；第3军在右翼之九龙关、测鱼镇、北障城一带。

11日，守军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日军即开始发起攻击。第17师于井陘附近仓卒应战。

12日拂晓，日军以飞机支援，战至18时，井陘亦被攻陷。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也相继被日军占领。据此，阎锡山急令孙连仲率部掉头东返娘子关，加强该线防守。

13日晨，日军继续西犯。大小尤窝之敌1000余人向第17师右翼旧关猛攻，战至14时将旧关攻陷。井陘之敌则向第17师正面雪花山阵地攻击，守军奋勇阻击，敌未得逞。为迟滞日军的进攻，当夜，第17师师长赵寿山率部趁夜幕向长生口之敌出击，正当部队攻击进展顺利之际，不意雪花山阵地被日军攻占。赵寿山立即调部队反击，激战至拂晓，部队伤亡逾千人，阵地仍未恢复，不得不退守乏驴岭一带。

在雪花山一带战况紧急之时，黄绍竑即令第3军主力向左转移，以策应第17师作战，其第12师于13日夜移至新关一带。与此同时，孙连仲率部抵达娘子关。

14日，第27师等部向旧关、核桃园及大小龙窝等地日军反击，曾一度攻占核桃园及大小龙窝。15日1时，阎锡山决定娘子关附近作战由孙连仲统一指挥，并限令16日消灭旧关之日军。15日拂晓，第12师向王家岭及旧关东南地区日军攻击；第27师围歼夫沟附近之敌。经两日战斗，守军共毙伤日军第20师之第77团团长江登行一上校以下500余人。

16日，守军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全线总攻，战至19日，守军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但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乏驴岭被日军攻占，遂不得不停止攻击，撤回原阵地。

日军对忻口正面攻击受阻，娘子关方面攻击进展缓慢，其华北方面军遂令第1集团军“部署精锐的一部迅速突破正太线方面的敌阵地。”此外，命令第109师的一部“21日入列第1军的指挥下，以协助攻占太原平原。”据此，第1集团军司令官于“19日命令第二十师以全力击败当面之敌，攻占阳泉平原；又在21日部署归其指挥的第一百零九师的一部（称为“昔阳支队”），沿赞皇——九龙关——昔阳大道进攻昔阳。”第20师根据上述命令，将部队分为两个纵队：以右纵队沿井陘—新关—石门口大道及其以北攻击；以左纵队沿微水镇（今井陘县城）—测鱼镇—石门口大道地区前进。

自21日起，日军增援部队逐次到达娘子关一带，以步、炮、空联合，向守军阵地展开了全线攻击。守军将士虽经顽强抗击，但因连日血战，部队减员过重，致使防线多处被日军突破。为此，孙连仲于22日电陈阎锡山，请速调生力军增援。

在此紧急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火速向娘子关东南敌之侧后挺进，寻机歼敌，配合友军阻止日军西进。该师于10月18日抵达平定以东。20日至24日，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打击进犯之敌。

25日，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决定以第386旅伏击日军第20师约1000余人的辎重队。26日拂晓前，旅长陈赓令第772团第3营在七亘村至甲南峪间地区设伏。9时许，敌进入伏击区，第3营向其本队发起猛烈攻击，经两小时激战，毙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其余日军逃回测鱼镇。刘伯承判断日军辎重队必将沿原定路线继续西进，决定第386旅在七亘村再次伏击敌人。28日，日军果然以步骑兵400余人掩护其辎重部队经原道西进，11时许进入伏击区。第772团第3营突然发起猛烈冲击，战至黄昏，歼日军100余人，缴骡马数十匹，再次打击了进犯之敌。

然而，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一直没有引起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忻口战役开始前提出的预置重兵加强娘子关防守的建议，也没有被完全采纳，直至日军逼近后，才调部队进至娘子关仓卒组织防御。加上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此打彼看，不知呼应。紧张方面紧打，兵力不足；无敌地区无事，游兵闲散。”以致未能有效地阻止敌之进攻。

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守军全线撤退。

30日，日军占领阳泉、平定后沿正太路及其南侧大道向太原、榆次继续进犯。晋东战局急转直下。

为了打击进犯之敌，阻止和迟滞日军的西进行动，八路军总部于10月28日率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30日抵达平定西南地区，统一指挥第129师及第115师主力，向沿正大路西犯之敌展开了连续的作战。

11月2日，第129师之第386旅在师长刘伯承、旅长陈赓指挥下，于昔阳东南之黄崖底一带，伏击由东冶头向昔阳进犯之敌第109师第136团一个营。共毙伤日军300余人，战马300余匹，八路军仅伤亡30余人。

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在师长林彪率领下，则进至昔阳以西之沾尚镇地区，待机歼敌。

11月4日，日军第20师先头两个团通过广阳进至松塔镇，其辎重队及一个营进至广阳。第343旅在旅长陈光指挥下，对敌辎重队发起猛烈攻击，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69～370页。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4卷，第231页。

经4小时激战，歼日军近1000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日军遭此打击后，不敢贸然西进，已进至松塔镇的两个团被迫回返广阳。

7日，第129师主力在第115师一部的配合下，又于广阳以东之户封村地区设伏，毙伤日军250余人。

八路军在黄崖底、广阳、户封村等地连续地伏击日军，予敌以沉重打击，从而迟滞其行动达一星期之久，掩护了沿正太路撤退的国民党军。

但是，从娘子关方面后撤的国民党军已不能组织有效的防御。致使平定、阳泉、寿阳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相继沦陷。忻口、太原处于日军大包围之中。

六、太原保卫战

太原是山西省首府，由于娘子关方面作战的失利，使太原危在旦夕。阎锡山为集中兵力固守太原，遂决定忻口守军全线撤退。根据阎锡山的指示，卫立煌于11月2日下令，对部队的编成、任务区分作了明确的规定。其要旨如下：以第15、第17军（欠第21师）等部为右兵团，第15军军长刘茂恩为兵团长，以主力确保莱水塢、川套里、窑子上之线阵地；以第19、第61军，第35军一部及第21、第47（已到达太原）、第54、第72、第73师等部为中央兵团，第19军军长王靖国为兵团长，其主力配置于西黄水、育龙镇至周家山之线阵地；以第14军及第68、第71、第94师等部为左兵团，第14军军长李默庵为兵团长，其主力配置于观象坡至西青善及东塢村至天门关之线阵地；以炮兵第5、第23、第28团为炮兵集团，炮兵司令刘振衡为指挥官，其主力占领凤楼阁、阳曲镇及栏岗村等阵地；以第85师及独立第5旅、第529旅为总预备队，分别配置于太原、新城村、新店村附近；飞行队由陈栖霞为指挥官，负责轰炸由忻口南进之敌。各兵团接受命令后，当即于2日21时开始向指定位置转移。

在忻口撤守的同一天，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保卫太原的方针是：“利用太原四周既设阵地线，实行依城野战，以阻敌前进，消灭其兵力，待我后续兵团到达，再施行反攻夹击而聚歼之。”同时，委卫立煌为第2战区前敌总司令，除第18集团军及第6集团军外，均归其指挥，委傅作义兼太原守备司令。并将第2战区长官部指挥所移驻交城。

11月4日，阎锡山等纷纷撤离太原。

对于太原的守卫，周恩来一直非常关注。还在忻口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即于10月12日向阎锡山等建议，必须转变作战方法，力争在忻口等地区求得小胜利。并指出，保卫太原，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多数兵守城，或正面堵击，在太原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对受领守城任务的傅作义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之后，周恩来一直坚持到11月5日夜，才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太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1987年版第543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89年版，第383页。

原。

晋北日军在获悉忻口守军撤退后，遂跟踪追击。4日，逼近石岭关。鉴于原预设阵地已难以立足，卫立煌遂决定将阵地转移于太原北郊。与此同时，由晋东方面西撤之部队，除第27路军及第17、第27师撤向太原附近外，其余部队均遭日军截击，被迫向榆次西南撤退。

6日，由忻口南下和沿正太路西进的日军相继逼近太原城郊。卫立煌除抽调第68师（即独立第8旅）、第71师及独立第7旅等部增援第7集团军守备太原城外，将主力转移至太谷、交城之线，以阻止日军沿同蒲路继续南侵。

在外围防守部队相继南撤后，守卫太原城垣的部队，仅有第35军的9个营及独立第1旅、第213旅等部10个营，共约19个营的兵力。奉命增援守城的部队，除独立第8旅之1个营于6日21时渡过汾河，进入城内外，其余部队均因受阻而循汾河西岸南撤。这样，“依城野战”变成了“孤城独战”。

7日，东、北两路日军在太原附近之狄村、双塔寺等地会合，太原城西汾河河上各桥均为其占领，太原城被敌四面包围。日军以步、炮联合攻城，并出动飞机向城内狂轰滥炸。激战竟日，城外守军大部壮烈牺牲，余部于黄昏撤入城内据守。入夜，傅作义将军亲自登城指挥，鼓舞士气。8日晨，日军凭借优势火力继续攻城。战至9时，城垣东北角及西北角被日军轰陷，东、北两面城墙亦被轰开突破口十余处，敌趁机向城内猛冲。守军将士奋勇截击，至午后4时始将各突破口封锁，仅在东北城角一处，仍与敌1000余人展开激烈巷战。黄昏后，日军一部空降于城中大校场，并四出袭击。守军官兵虽奋力血战，但终因伤亡过重，无力再战，被迫于21时由城南门突围，经文水向离石方向撤退。太原遂告陷落。

忻口、太原作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民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会战过程中，广大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热情。尽管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处处防守，正面堵击，兵力分散，尤其是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重视不够，致使娘子关失守，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以至太原被日军所占，但它仍不失为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会战。

第二节 八路军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和八路军的任务

日军占领上海、太原后，继续发展进攻。在华北，沿津浦线南犯之日军，于11月中旬进至黄河北岸，并准备攻占济南；沿平汉线南侵之日军，于11月上旬突破第1战区防线，占领豫北重镇安阳；沿同蒲线南下之日军，于11月8日攻陷太原后，继而侵占平遥、榆次等地；而沿平绥线西进之日军，于10月中旬已攻占归绥、包头。在华中，日军于11月12日侵占上海进而逼近南京。国民党军虽在上海、忻口等地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从正面战场的全局看，却处在严重的失利之中。

针对上述形势，毛泽东主席于11月12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

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他还强调指出：为实现全面抗战，在党内，必须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全国，必须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于华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在太原失守前，毛泽东即于9月12日至29日先后五次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明确了“关于坚持华北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太原失陷的第二天，毛泽东具体指示八路军各师：“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之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因此我分任四大区工作之聂部、贺师、刘师、林师（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须重新部署一番）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线之进攻。”11月13日，毛泽东又电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明确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力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良地开展游击战，创造根据地；同时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并决定第115师除一部创建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外，师部率第343旅适时转移至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20师继续创建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主力及第115师之第344旅由正大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晋察冀边区地处恒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关内的咽喉要道，扼制着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等交通大动脉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七·七”事变后，日军首先占领这一地区，企图把它作为占领整个华北，进而侵占全中国的重要基地。

早在1937年9月20日，毛泽东就指示八路军：“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

24日，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关于五台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地方党的布置。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

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的组织地方支部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

10月11日，毛泽东又电聂荣臻：“你们应着重一个月内建立武装与群众工作之基础，以便有充分力量反对日寇的进攻”。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第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于9月下旬率政治部机关、骑兵营、教导大队和第686团第6连等部组成若干个工作团进入阜平一带，着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0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又决定：聂荣臻副师长（11月2日任政治委员）率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及地方工作团等共2000余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创建工作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地区进行。其中：

在北部地区，杨成武、邓华率师独立团向冀察边界发展。

10月10日，独立团收复涞源县城。

16日，乘胜收复广灵城。23至26日，又相继克复灵丘、蔚县、浑源、阳原等县城。在积极作战的同时，独立团以民运科为基础增加部分人员，组成了若干个工作团、工作组，深入到各县、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使察南、冀西地区的抗日斗争蓬勃开展。

在东部地区，北方局于9月下旬即派王平等到阜平协同当地党组织开创以阜平为中心的抗日工作，在阜平县成立了“动委会”，在全县还组织了4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在这个地区活动的骑兵营，于10月8日至11月11日克复曲阳、唐县、完县、满城等县城，与此同时，他们还组建了4000余人的“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打开了以阜平为中心的抗战局面。

在南部地区，第120师第359旅于10月初在五台县柏兰镇组成约250人的工作团，在第717团政训处主任刘道生率领下，进到平山、盂县为中心的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

11月初，八路军总部又派第343旅副旅长周建屏来加强工作团的领导。他们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配合下，一面打仗、一面发动群众。10月29日，收复了平山县城。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近2000人的第一个“平山团”。赴盂县的工作组，建立了一个中心县委。随后，工作团又分赴阳曲、寿阳、平定、正定、灵寿、井陉、获鹿等县，全面展开滹沱河以南地区的工作。

在西部地区，八路军总部进驻五台县茹村一带地区后，总政治部派出以民运部和宣传队干部组成的工作团，开展了以五台、定襄为中心的群众工作。

10月下旬，总部特务团一部也留在此地开展工作。他们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协助下，很快建立起各县、区“动委会”。尔后，改造了五台、定襄两个县的县政权机构，广泛组织起农会、工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进而使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扩展到代县、繁峙、崞县、忻县等广大地区。

各地区工作团在一面作战、一面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财产、废除苛捐杂税等抗日的经济政策，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改造各级政权。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各地区工作团都迅速地打开了抗战局面。北部地区除组建了一批游击支队外，独立团已由出征时的1700余人发展到7000余人，还成立了党的特委和政权机构——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县的工作，东部地区的工作团和骑兵营，在各县都成立起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骑兵营自身也有较大发展。南部地区除成立了“平山团”外，还组织了井（陉）获（鹿）、平（山）井（陉）正（定）

获（鹿）、孟（县）平（定）阳（泉）寿（阳）等3个游击队。西部地区工作团及总部特务团留下的部队也都发展到2300余人，并成立了晋东北特委和游击司令部。

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便于各地区武装的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于13日以各地区工作团为基础成立了4个军分区：第1军分区（兼独立第1师），由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第2军分区，由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军分区，由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第4军分区，由周建屏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大大振奋了这一地区军民的抗战热情。各抗日武装主动出击，四处袭扰日军，断敌交通，攻取城镇，使其日夜不得安宁。日军为消除后顾之忧，于11月下旬调集第5、第14、第109师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兵力，由平绥、平汉、同蒲、正太等铁路沿线出动，分8路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首次大规模围攻。

晋察冀军区首长判断，日军此次围攻的目的，“是想压迫我们向深山退缩，以保证其交通线安全，但是，它的兵力不足，地形生疏，又不敢贸然深入我们的腹心地区”。因此，指令“各军分区把有基础有经验的团队部署在机动位置上，而依靠大量新组建的游击武装对付敌人的围攻，以削弱、消耗和疲惫敌人。”

自11月24日起，各路日军开始向晋察冀边区进犯。边区军民密切配合，奋力反击入侵之敌。

在北线，日军首先从关东军及华北方面军各抽调一部，分4路向第1军分区发起围攻。其中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部队分为三路：一路1500余人于11月24日由涿鹿、怀来出动，经桃花堡向蔚县进犯；一路1900余人于26日由天镇、阳原出动，与怀来之敌钳击蔚县；一路1400余人由应县出动，于27日分向浑源、广灵进犯。与此同时，华北方面军第14师之第15团3000余人作为一路，由保定、易县出动，并在飞机掩护下向涞源进犯。第1军分区部队的主力一部，配合民兵、游击队，采取各种战法，巧妙灵活地袭击敌人，以迟滞其进攻；主力部队则隐蔽行踪，寻机歼敌。

26日至12月5日，第1军分区先后经过大龙华、乱岭关和北口村等战斗，歼日军600余人，给北线围攻之敌以沉重打击，使其不敢贸然南犯。

自12月中旬起，南线之敌分4路对晋察冀南部地区开始了围攻。其中：日军第14师一部1700余人作为一路，于12月13日自新乐、定县出动，分向曲阳、行唐进犯。晋察冀第3军分区主力一部在曲阳以东之高门屯地区予敌以痛击，迫其退回定县、行唐。日军第109师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1500余人作为一路，由代县、原平、忻口向繁峙、定襄进犯。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部队乘敌后方空虚之际，夜袭原平镇，歼敌100余人，残敌分向代县、忻口逃窜。日军第5师第21旅2000余人、第109师一部1600余人各为一路，于12月15日由石家庄、获鹿、井陘及平定、寿阳等地出动，分向平山、盂县等地进犯。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军民密切配合，予敌以连续打击，使其疲惫不堪。与此同时，第115师之第344旅于平山、井陘间之小寨地区设伏，歼灭日军第5师第21旅100余人。第4军分区主力则于清城镇袭

击向盂县进攻之敌，歼灭第 109 师 200 余人。

21 日，日军第 5 师第 21 旅分由平山、井陘向温塘合围，第 344 旅及第 4 军分区各以一部分头伏击该敌，经数小时激战，歼其 400 余人。

为配合晋察冀军区反围攻作战，八路军第 120、第 129 师各一部，分别在同蒲铁路北段和正太铁路沿线展开破袭战，调动围攻晋察冀边区之敌回援。至 12 月 21 日，进犯晋察冀边区的日军除占据浑源、广灵、蔚县、定襄、盂县、平山和行唐等县城外，其余先后退回铁路沿线。

此次反围攻作战，晋察冀军区在兄弟部队的有力配合下，连续获胜，毙伤日伪军 2000 余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一胜利，进一步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战热情，使初创的晋察冀根据地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来领导和团结整个边区人民进行抗战。

1938 年 1 月 10 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隆重召开，民主选举了宋劭文、聂荣臻、刘奠基、吕正操、胡仁奎、李杰庸、孙志远、张苏、娄凝先等 9 人为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并推选来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1 月 30 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批准，取消了临时机构的名义，晋察冀边区政府行使政权职能。边区政府成立后，“全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开始稳定下来。有了政府，人民群众就有了靠山，同时，也使我们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

晋察冀军区为钳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于 2 月上旬对平汉、正太、同蒲铁路进行了破袭作战。2 月 9 日夜，第 3 军分区部队向平汉线保定至新乐段展开破袭，先后袭占新乐、定县、望都三县城及清风店、方顺桥等车站，并袭入满城和保定城关，毙伤日伪军 370 余人，争取伪军 100 余人反正，破坏铁路数十公里，焚毁新乐等 6 处火车站。9 至 16 日，第 1、第 2、第 4 军分区部队分别攻占了蔚县的九宫口、北口，袭击了浑源、忻口、原平、崞县、代县等城镇，给同蒲、正太铁路沿线之敌以有力打击。八路军前总在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这一胜利，“不但缴获了许多军用资材，而且钳制了正在沿平汉线南进之敌，直接援助了津浦线上的作战，兴奋了友军，打击了敌人，帮助了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为此，晋察冀军区于 12 日获得毛泽东主席的嘉勉。

日军遭到打击后，调集 1.2 万余人的兵力，从 3 月 4 日起，由易县、满城、完县、定县等地出动，向晋察冀边区再次发起了进攻。晋察冀军区部队于曲阳、阜平间的贾口、党城等地设伏，并以游击队向敌之后方交通线猛烈袭击，迫使敌不得不于 10 日夜由阜平撤退。

3 月中旬，敌华北方面军第 114 师以一个团的兵力，由易县向涞源进攻，企图打通易、涞间公路。

21~27 日，日军先后进占王安镇，侵入涞源。第 1 军分区于 25 日夜袭王安镇，毙伤日军 400 余人。并以一部围困涞源城，以主力不断出击敌之运输线。日军连遭打击后，于 4 月 11 日夜弃城回窜，第 1 军分区部队收复涞源、易县广大地区，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日益扩大，为尔后向平北、平西

和冀东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黄河以东，平绥铁路以南，汾离公路以北，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1937年9月16至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电示八路军总部：第120师应活动于晋西北之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北部地区，并向绥远、大同游击，以钳制敌军，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朱、彭副总司令具体部署第120师主力以灵活的游击战袭击左云方向之敌，并发动及组织晋西北及绥东群众，首先是在宁武、朔县、神池、五寨、平鲁、右玉、和林格尔、清水河、偏关、河曲、保德地域组织游击队，并派得力干部领导。

第120师遵照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率第358旅于9月28日抵达神池地区后，立即指令第358旅之第716团团团长宋时轮率该团第2营组成宋时轮支队（简称宋支队），赶赴雁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师主力部队则一面侧击沿同蒲铁路南侵的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一面在晋西北大力展开群众工作。

10月1日，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11月2日任政治委员）率政治机关大部 and 教导团共700余人组成工作团，到达岢岚、五寨、保德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和进行群众工作。工作团在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党委及“牺盟会”和“动委会”的配合下，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编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发动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在工作团的动员组织下，广大群众抗日情绪高涨，一个月内即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和脱离生产的自卫军达1.1万余人。并迅速建立起工、农、青、妇等抗日救国会及儿童团、少先队组织。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工作团继续开展了扩军工作。第358旅在崞县、宁武地区组成忻崞独立团，在汾阳、孝义地区组成了三泉游击队；第359旅在忻县、崞县地区组成了崞县独立团，留在平山，并陘地区的工作团组成了平山独立团；宋支队在雁北地区组织了3000人左右的游击队；师工兵营扩编为警备第6团，师骑兵连扩编为骑兵营。

1938年1月，第120师进行了整编训练。经过整编，全师由出征时的2个旅3个团8200余人，扩大到2个旅6个团共2.5万余人。各县也都成立了1000~2000人的自卫军和游击队。

自1938年2月中旬起，第120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对同蒲铁路北段及太原、忻县间的公路展开了破袭战。在18~27日的10天中，第120师即歼灭日军500余人，攻占平社、豆罗火车站和麻会、石岭关、关城镇等敌军据点。炸毁火车3列、汽车10余辆，破坏桥梁8座，拆毁铁路20余公里，并袭击了太原火车站和飞机场，有力地打击了入侵之敌。

正当第120师对同蒲铁路展开破袭战的时候，日军调集驻蒙军第26师、华北方面军第109师及伪蒙军各一部共1万余人的兵力，于2月下旬分5路向晋西北发起了进攻，妄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迫使第120师西渡黄河。

21日起，日军先后占领宁武、神池、偏关、河曲、保德、五寨、岢岚等7座县城及离石、军渡、碛口等地，并西渡黄河，一度攻陷保德对岸的府谷。

为粉碎敌之围攻，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委员关向应，率主力于28日由同蒲铁路星夜回师根据地，以第358旅主力转向离石、军渡以北地区，侧击西犯之敌；第359旅主力转至岢岚地区，阻敌南侵。3月2日，军渡、碛口之日军撤离黄河渡口，向北进犯，日军围攻晋西北根据地的企图已明。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主席于3月6日电示八路军总部及第120师：应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协同作战，集中主力打击敌军一路，“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它区域之作战。”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第120师首长决心集中4个团的兵力，首先打击五寨、岢岚之敌，尔后再向神池、宁武之敌反击。

3月7日，第359旅首先将日军第26师第11团1000余人围困于岢岚城内。敌连续被围三天三夜后，于10日弃城北逃三井镇，第359旅之第717团夜袭三井镇，歼敌300余人，俘敌28人，其余日军逃向五寨。三井残敌会同五寨之敌共1000余人，凭借五寨城固守。第120师以一部兵力围困五寨城，主力则集中在五寨至神池之间，相机歼敌。3月12日，日军400余人由五寨出城反扑，被第358旅之第715团击退。

17日，第358旅于义井以南之虎北、山口村与神池出援的日军1000余人遭遇，歼日军300余人，迫敌退向义井。

18日，三岔堡日军出动200余人增援五寨，又被第359旅之第717团击退。至此，五寨之日军完全陷于孤立。自3月20日起，日军被迫全线撤退。第120师遂收复五寨、保德、河曲、偏关4城，并乘胜截歼撤退之敌。21日，第120师在田家洼、凤凰山等地又歼敌300余人，并随即收复神池。31日，第120师又于石湖河地区歼灭日军300余人，并乘胜收复宁武县城。至此，被日军侵占的晋西北7座县城全部被第120师收复。

此次反围攻作战，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共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步机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这一胜利，不仅挫败了日军摧毁晋西北根据地的企图，而且大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从而，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

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界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这里高山连绵，地势险峻，向东可直下冀鲁豫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

早在1937年10月中旬，第129师刚刚挺进太行时，即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派遣秦基伟、赖际发率教导团第5连和部分干部，协同地方党在太谷、榆次、寿阳、平定、阳泉、昔阳、和顺等县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随后编成第129师独立支队（亦称秦赖支队）。

11月初，又派骑兵营深入临城、赞皇地区，开展冀西的游击战争。

11月13日，第129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布置开展游击战争的各项工作任务。会后，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部长刘志坚分别率领从部队中抽调的部分骨干组成的工作团与步兵分队，深入沁县、长治、晋城、武乡、襄垣、平顺、沁源、安泽、屯留等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并以师参谋长倪志亮负责

着手组织晋冀豫军区的工作。

工作团深入各地后，在中共地方组织及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密切配合下，通过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改造旧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在晋东南和冀西地区很快组织起了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和各种抗日自卫队，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至 1938 年 2 月中旬，除秦赖支队外，还相继由教导团派出部分干部组建了第 129 师游击大队（亦称谢张大队）；由教导团的另 30 余名干部与地方党协同组建了游击支队（亦称桂张支队）；以教导团 2 个连为骨干组成了先遣支队；第 771 团的 1 个步兵连和教导团的部分干部为基础组建了独立游击支队（亦称赵涂支队）；由第 386 旅派出 2 个连组成了挺进支队，第 129 师和各旅还直接扩建了一些部队，其中：由第 769 团抽调干部和 1 个连为基础扩建为汪乃贵支队，由师派出的部分干部组建了独立团，以第 772 团 4 个连为基础组建了补充团，师骑兵营扩编为骑兵团。此外，第 129 师还从教导团抽调 30 余名干部组成挺进支队，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进入冀南地区开展活动。随后，又以第 385 旅抽调 3 个步兵连、1 个机枪连和第 386 旅 1 个骑兵连组成东进纵队，于 1938 年 1 月中旬挺进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1 月 18 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 129 师政治委员。2 月初，第 129 师师部在辽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进一步实行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作了部署。会后，派新建的补充团南下，协同赵涂支队开辟太行山南部地区及道（口）清（化）铁路沿线工作。3 月中旬，又派师政治部副主任来任穷率骑兵团进抵冀南，协同先期到达的东进纵队创建与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2 月下旬，还派出部分干部协同中共晋豫边特委，发展了数支抗日游击武装，并于 4 月 28 日正式成立了晋豫边游击支队，唐天际为司令员，在中条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至此，晋冀豫边区的游击战争全面展开，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对日军构成一定的威胁。华北方面军之第 1 集团军为维护其后方交通、巩固占领区，遂调集 5000 余人兵力，于 1937 年 1 月 22 日起，由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等地分 6 路，以马蹄形的阵势向活动于寿阳以南地区的第 129 师部队进行围攻。刘伯承师长当即命令第 386 旅旅长陈赓指挥第 772 团在内线之花泉、松塔及南北军城等地打击敌人；第 769 团、汪支队、秦赖支队等部在外线袭扰和钳制敌人。八路军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先后在里思、松塔及南、北军城等地予进犯之敌以打击，迫敌于 24～26 日相继撤退。是役共毙伤日军 700 余人。第 129 师开创晋冀豫根据地伊始，首次粉碎敌之围攻的胜利，对鼓舞广大军民抗日的胜利信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推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8 年 2 月，第 129 师为了打击与钳制向晋南、晋西进攻的日军，与正太铁路以北的第 115 师之第 344 旅协同，向正太铁路阳泉至井陉地区的日军展开进攻。21 日夜，首先以第 386 旅设伏于井陉、旧关间的长生口附近。22 日拂晓，以第 769 团强袭旧关之敌，井陉之敌以 200 余人分乘汽车 8 辆增援。当敌进入伏击地域后，第 386 旅突然发起攻击，毙警备大队长荒井丰吉少校以下 130 余人。与此同时，第 344 旅袭击娘子关至井陉间之敌据点，毙伤日伪军 200 余人，拆毁铁道 100 余米，一度切断了正太线交通，有力地钳制了向晋西、晋南进攻之敌。

长生口战斗后，第129师南下寻歼邯（郸）长（治）大道之敌。该大道是日军西进的主要交通运输线，地形复杂，是比较理想的伏击战场。师领导经实地勘察后，部署第769团一部袭击黎城，团主力则伏击涉县可能来援之敌；以第386旅设伏于神头岭，准备歼灭潞城方向可能来援之敌。

3月16日4时许，第769团第1营按预定计划强袭黎城。黎城之日军向涉县、潞城求援。涉县援敌被第769团主力在东、西黄须击退。潞城援敌1500余人于9时30分全部进入第386旅伏击区。陈赓、王新亭指挥部队从东、西、北三面突然向敌发起冲击，血战至16时，日军除后尾的100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此战，第129师共毙伤敌1500余人，俘敌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第129师仅伤亡240余人。

神头岭战斗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之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战。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就连日军统帅部也把它看成是八路军的“典型的游击战”。

为进一步打击西犯日军，第129师首长决心在邯长大道上再次伏击日军的运输部队。副师长徐向前根据敌情和地形条件，决定把伏击的地点选在涉县至东阳关之间的响堂铺地区。具体部署是：以第771团及第769团主力预伏于响堂铺以北之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第769团一部前出到河南店钳制涉县之敌；以第772团主力集结于马家拐为预备队。31日8时许，日军第14师辎重部队汽车180余辆由黎城经东阳关向涉县开进，9时许全部驶入伏击区。伏击部队先向敌实施猛烈火力袭击，随即发起冲击，经2小时激战，将敌全歼。在战斗激烈进行之际，黎城及东阳关之日军400余人，涉县之日军200余人赶来增援，均被八路军阻援部队击退。16时许，当日军飞机10余架对响堂铺实施轰炸时，八路军伏击部队已安全转移。此战，第129师共毙伤敌森木少校以下400余人，缴获各种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焚毁汽车180余辆，自身伤亡300余人。

晋冀豫边区抗日斗争的迅猛开展，对华北日军构成严重威胁。为保障其后方安全，日军遂以华北方面军第108师主力及第16、第20、第109师各一部共3万余人，从4月4日开始，由同蒲、正太、平汉铁路沿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动，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将八路军主力和在该地区的国民党军，围歼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见附图3）

为粉碎日军的围攻，八路军朱、彭总副司令决定：采取以一部兵力钳制其它各路日军，集中主要兵力寻机歼灭日军一路的作战方针。第129师、第115师之第344旅及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部，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在部队中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并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了“空室清野”等各项准备工作，当日军开始出动时，八路军总部指令：第129师主力及第344旅之第689团由辽县以南转移至敌人合击圈以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各以一部兵力向平汉、同蒲等铁路出击，钳制日军。

4月10日前后，由榆社出动的第109师2个营被第129师独立支队阻滞于阔郊、马坊一带；由祁县、太谷出动的第109师1个团被防守在该地区的国民党军第94、第169师与八路军游击队阻滞于东西团城地区；由洪洞出动的第20师1个团被决死队第1、第3纵队和国民党军第17军等部阻滞于沁源地区；由涉县出动的第16师2个营被国民党骑兵第4师阻滞于麻田地区；由邢台出动的第16师1000余人被第129师先遣支队阻滞于浆水镇以东；由

元氏、赞皇出犯的第16师1个营被第129师游击支队和当地游击队阻滞于九龙关以东地区。至此，9路日军在八路军内线部队及国民党军和游击队的英勇抗击下，有6路日军被阻；只有由屯留、长治、平定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08师的3路，侵入晋东南根据地腹地，且不断遭到阻击袭扰，处于恐慌不安的境地。

4月11日，八路军总部令第129师主力及第689团由外线转向内线，进至武乡以北地区，寻机歼灭侵入根据地腹地的孤立之敌。

4月15日，侵占武乡的日军第108师之第117团及配属的特种兵共3000余人，北犯榆社扑空后，仓惶撤回武乡，并于当日黄昏又放弃武乡，连夜沿浊漳河东撤。第129师首长命令第772、第689、第771团沿浊漳河两岸平行追击，第769团沿武乡至襄垣大道尾追敌人。16日晨，八路军在武乡以东长乐村以西截住了敌军大部，将敌拦腰斩断。日军遭到八路军突然猛烈的打击，顿时乱了阵脚，1500余人及车辆、马匹被压缩在狭窄的河谷里，丧魂落魄，欲战无力，欲逃不能。此时，已过长乐村的日军为解救其被围的部队，集中1000余人向第772团左翼戴家坑阵地猛攻，一度攻占该地。12时，第689团赶到，经七八次反复冲锋肉搏，又将阵地夺回。14时，日军第108师第105团1000余人由辽县赶来增援，被八路军击退。

17时，日军又从辽县调第105团1000余人来援。此时，被围之日军已被全歼，第129师首长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此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2200余人，自身伤亡800余人，第772团团团长叶成焕光荣殉国。长乐村战斗的胜利，重挫日军锐气，对粉碎敌之“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后，各路日军纷纷撤退。八路军、决死队及国民党军乘胜追击，先后在沁源以南及沁县至沁源间、辽县至和顺间歼灭日军一部。

27日，八路军又在高平县以北的张店等地截歼日军1000余人。至此，敌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此役历时23天，八路军共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此次战役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日军企图用分进合击的战术驱逐或消灭晋东南八路军的计划，而且使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更加提高。从而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使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为八路军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条件。

4月下旬，晋冀豫军区正式成立，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兼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部主任，军区对外称第129师后方司令部。按各基干支队活动地区划分力5个军分区，各军分区对外仍以支队名义出现。秦赖支队为第1军分区，秦基伟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游击支队为第2军分区，桂干生任司令员，张贻样任政治委员；先遣支队为第3军分区，张贤约任司令员，张南生任政治委员；谢张大队为第4军分区，张国传任司令员，谢家庆任政治委员；赵涂支队为第5军分区，赵基梅任司令员，涂锡道任政治委员。

五、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晋西南地区位于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汾离公路以南，吕梁山脉纵贯南北，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早在太原失陷前，毛泽东主席就电示八路军总部，于适当时机派部队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

东又进一步指出：“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开始，因此，不但徐旅须立即迅速转移，林率陈旅亦不应在东边恋战，亦以立即开始转移为宜。”据此，八路军总部于11月9日令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南进，准备转移吕梁山脉，创建抗日根据地；第344旅则随八路军总部继续在正太铁路沿线活动。

第115师主力南下洪洞、赵城地区后，就地进行休整补充，12月底，从各团抽调部分骨干，加上2000余名新兵组成第343旅补充团。

1938年2月中旬，华北方面军第1集团军向晋西南地区发动大规模入侵，吕梁山部分地区变为敌后。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由洪、赵地区进至孝义地区打击敌人。2月19日，第343旅在孝义以西之兑九峪、辛庄等地袭击、侧击由孝义西进之敌，并于20日收复大麦郊。21日，该旅在川口与西犯之日军激战，阻止了敌之西进。第115师在积极打击日军的同时，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石楼、永和等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同当地中共组织一起展开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2月下旬，日军在占领隰县、临汾后，继续向西向南推进，直接威胁着陕甘宁边区的安全。第115师师长林彪（3月2日，林彪在隰县以北的千家庄被友军哨兵误伤，回延安治疗，由第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关于巩固战略枢纽和寻机歼敌的指示，一面组织工作队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一面率主力进至隰县、午城地区待机。

3月14日12时许，第115师直属队在午城镇以东地区与由蒲县西进的日军第20师先头部队遭遇，毙敌100余人。

16日，第343旅于罗曲、午城、井沟公路两侧设伏，将日军辎重部队200余人、骡马100余匹全歼。

17日，第343旅第686团于午城以西伏击日军运输队，截获汽车6辆，毙敌200余人。当日，第343旅又以第686团第3营和第685团两个连夜袭午城之敌，毙敌50余人，余敌乘夜幕逃窜。

午城战斗后，第115师首长判断日军连遭打击，定会进行报复。当即决定再次伏击敌人，令第343旅以第686团和汾西游击队预伏于井沟至张庄公路两侧，以第685团在午城以西阻击大宁援敌。果然不出所料，日军于18日急忙从临汾调集第108师步骑兵8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经蒲县西进驰援大宁。14时许，当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区时，第686团突然发起攻击，乘其队形混乱，展开反复冲锋肉搏，连续打退日军数次反扑。战至19日拂晓，日军除100余人逃窜外，均被歼灭。

午城、井沟战斗，八路军第115师共歼日军1000余人，焚毁汽车60余辆，缴获骡马200余匹、各种枪200余支、山炮2门及大批军用物资，自身伤亡200余人。这一胜利，予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给山西人民及友军以极大的兴奋，稳定了晋西南抗战的局势，对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地方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一、山西新军的建立和发展

“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力争取山西实力派阎锡山共同抗日，做

了许多统战工作。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表现出有利于抗日的进步倾向。

1936年9月，派人到北平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组成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任书记，主要任务是开展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决定成立领导秘密工作的山西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张友清负责。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等人到山西，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首先，接办和改组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接着，通过牺盟会及军政训练委员会，掌握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及军士训练班等13个训练团的政治领导和组训工作。在“七·七”事变前8个月的时间里，训练了2万多名知识青年，为以后扩大牺盟会的组织，组建山西新军和建立抗日政权准备了大批骨干。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北方局由天津迁到太原，加强了中共山西党的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向薄一波等传达了洛川会议精神，要求他们不放松一刻工夫和机会，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日军在占领平津后，很快侵入山西。阎锡山为应付危局，急于扩充实力。薄一波审时度势，建议组建一支新军，得到阎的同意。北方局对这一工作极为关注，指示今后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掌握武装上。从此，山西省公开工委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组建和发展新军上来。

1937年8月1日，以原来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第9团各一部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总队（相当于团），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各级军事干部由阎锡山委派旧军官充任，政治干部绝大部分由“牺盟会”派共产党员担任。决死队在成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为4个总队。到1938年初由原来的4个总队扩建为4个纵队（相当于旅）。第1纵队，由鲁应麟（旧军官）任纵队长，薄一波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总队；第2纵队，由陈庆华（旧军官）任纵队长，张文昂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第5、第6总队；第3纵队，由陈光斗（旧军官）任纵队长，戎子和任政治委员，下辖第7、第8、第9总队；第4纵队。由梁浩（旧军官）任纵队长，雷任民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1、第12、第13总队。

由牺盟会组织起来的新军部队还有政卫队和4个支队。1938年秋，政卫队扩大为旅级单位，张韶芳任代司令兼政治主任，下辖10个支队（营）。

1939年春，政卫队改为政卫旅。与此同时，中共地方党及牺盟会先后在晋西南地区组织起若干支自卫队和游击队。1938年秋，将这些自卫队和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政治保卫第1、第2、第3支队。是年冬，又将活动于晋南地区的县自卫队改编为政治保卫队第4支队。

此外，在“九·一八”六周年之际，中共太原市委恢复了总工会，成立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相当于团），简称工卫队，由郭挺一任队长，侯俊岩任政治主任。

在牺盟会各项工作迅猛开展的同时，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也迅即组成。

1937年9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太原后，与阎锡山等多次会谈，商定在第2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9月20日，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在太原成立。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中共代表

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长。动委会成立后，活动于晋北及察哈尔、绥远全省，积极配合八路军、牺盟会动员群众，组织人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首先以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和汾阳等县游击队合编为抗日游击第1路纵队，程子华兼任纵队司令，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5支队。到1938年3月，动委会先后共组建了25个基干支队。8月，第4支队随第120师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其余部队整编为晋西北保安第2区队，续范亭任司令员。到1939年夏，保安第2区队又统一整编为陆军暂编第1师，由续范亭任师长。这支部队是山西新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山西新军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帮助下，不断发展壮大，到1939年冬，下辖决死队4个纵队、第207、第209、第212、第213旅，暂编第1师及山西第3、第5、第6行政区组建的保安司令部所辖保安团，共发展到50个团，计5万余人。

山西新军在建制上归第2战区的晋绥军，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政策和策略的产物。

山西新军建立后，即分别活动于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地区，积极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及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河北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发展

中共河北省各地方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于“七·七”事变之后即在平西、冀中、冀南等地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8月10日，在中共北平市委和“东特”的直接领导下，组成一支数十人的抗日武装，活动于北平郊区圆明园附近地区。8月22日深夜，他们砸开北平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救出被囚禁的几十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部队迅速发展到1000余人。9月5日，这支武装打起了“国民抗日军”的旗帜，由赵侗任司令，下辖3个总队。

12月11日，该部开赴阜平地区进行整训。后经八路军总部批准，编为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由赵侗任司令员，高鹏任副司令员，下辖第1、第2、第3等3个总队。

第5支队整训后，即于3月下旬奉命返回平西地区。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第1支队第3大队为主组成邓华支队，进抵平西地区，为挺进冀东、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准备工作。两个支队相互配合，积极袭击日军，连续攻克敌军据点，逐步开辟了房山、涞水、良乡、昌平、宛平等县的抗日工作，建立了3个联合县政府和抗日救国会，使平西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为八路军向冀东挺进创造了条件。

在冀中地区，抗日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

“七·七”事变后，中共保属特委南移石家庄，改组为平汉线省委，李

中共北方局为了对流亡北平的东北军家属和学生进行群众抗日救亡工作，成立了“东北工作特别委员会”，简称“东特”。

曹玉任省委书记，统一领导河北省中部地区的各项抗日工作。石家庄失陷后，平汉线省委西迁阳泉与八路军第 129 师会合，所属保东、保南特委于 1937 年 10 月 10 日合并为保属省委，张君任省委书记，继续领导该地区的抗日斗争。此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红军团长孟庆山受中共中央派遣，回到家乡冀中，在高阳、蠡县、任丘、安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10 月中旬，国民党军第 53 军第 691 团团长吕正操（共产党员）遵照中共北方局回师北上抗日的指示，脱离向南撤退的国民党军，率部回师抗日。

10 月 14 日，该部在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部队改编后，继续北上，经博野、蠡县，攻占高阳，并收编了驻高阳的保安团。到 12 月上旬，人民自卫军即发展到 3000 余人。

12 月 12 日，人民自卫军主力赴平汉路西阜平地区进行整训，部队军政素质大大提高。

在人民自卫军去平汉路西整训的同时，中共保属省委将省委之军委改为河北游击军司令部，由孟庆山任司令员，统一领导中共地方组织在冀中区组建的各抗日武装。游击军司令部先以一些县人民自卫团为基础扩编成了第 1、第 2、第 3 等 3 个师，又以加委和收编的方式组成了 13 路抗日武装部队及 3 个直属团。

1938 年 1 月中旬，人民自卫军整训后由平汉路西返回冀中。1 月下旬，中共保属省委改为冀中省委，鲁任书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在冀中省委的领导下，相互配合，积极袭击日军据点，收编和消灭了 10 余股游杂武装。2 月间，人民自卫军以独立第 1 团组成北上先锋队，赴大清河北地区开辟工作。该部连克新镇、霸县、永清等县城，并收编了安次、武清、霸县、永清、固安等地联庄武装 4000 余人，初步打开了大清河北的抗战局面。3~4 月间，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在反击日军对冀中地区的春季“扫荡”中密切配合，共与敌进行大小战斗 100 余次，毙伤日伪军 1000 余人，自身伤亡 600 余人，并先后收复河间、高阳、安新等县城，充分显示了冀中军民团结抗战的威力。

1938 年 4 月下旬，冀中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进一步统一了冀中区党、政、军的领导。会后，中共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由黄敬任书记。接着，又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吕正操兼任主任。各专区成立了专员公署，健全了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5 月 4 日，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 3 纵队，同时成立了冀中军区，军区机关兼纵队机关，吕正操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8 月任职），下辖第 7、第 8、第 9、第 10 等 4 个支队，并成立 4 个军分区，至此，西起平汉铁路，东至津浦铁路，北迄平津铁路，南达沧（县）石（家庄）公路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在冀南地区，中共中央北方局于“七·七”事变之后即派马国瑞等回到冀南，组成冀南特委，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们先后在南宫一带组建了八路军别动大队，在赵县、藁城、栾城一带地区组建了抗日义勇军第 5 支队，在巨鹿也组建了抗日游击武装。特委还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对游杂武装进行争取工作。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赵辉楼等人也在宁晋、束鹿一带成立了民众抗日自卫军。上述工作的开展，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37 年 12 月中旬，八路军第 129 师挺进支队，由辽县进入冀南地区的

任县、隆平、尧山等地开展抗日活动。部队很快发展到三四百人，并将部分农民和收编的地方武装组成了两个游击支队。同月，第129师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由陈再道任司令员，李菁玉任政治委员，于1938年1月挺进冀南，与先期到达的挺进支队会合。他们先后在巨鹿等县建立了动委会，改组了南宫县政府，收编、改编了巨鹿、南宫等县保安团（队）和冀县的部分地方势力武装，争取了威县伪军警备旅反正。

力争取冀南地区各色地方武装共同抗日，东进纵队经与河北20民军赵云祥部及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段海洲部协商，由三方各派代表参加，成立了统一战线组织“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陈再道为主任委员，统辖冀南各抗日部队。军政委员会的建立，是八路军在冀南执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为了加强冀南的领导和军事力量，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于1938年3月19日开赴冀南。

20日，中共冀鲁豫省委在南宫成立，李菁玉为书记，宋任穷接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3月下旬，骑兵团等部向西南挺进，相继解放广宗、曲周、平乡、南和等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东进纵队第1团向北开辟了滏阳河西岸之冀县、新河、宁晋、束鹿等县的广大地区。到4月底，东进纵队发展到2万余人。冀南先后建立了20余个县的抗日政权。4月27日，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东进纵队机关兼军区机关，并相继成立了第1、第2、第3、第4、第5等5个军分区。“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具有政权性质）也于4月间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主任。至此，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

三、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

山东地处华北东翼，东濒大海，西邻冀豫，南连陇海铁路，北接平津，津浦、胶济两铁路纵横其间。境内有泰山、鲁山、沂蒙山、昆嵛山等山区，地形复杂。它是联结华北、华中两大抗日根据地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于山东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毛泽东极为关注，1937年9月25日曾指出：在山东应普遍的但是有计划的组织游击队。中共北方局也号召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

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于1937年10月在济南秘密召开了省委会议，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动群众，抓紧在日军开始入侵但尚未全面占领山东、国民党军溃退、人民群众抗日情绪高昂的时机，及时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起来参加部队，并争取和改造一些掌握在爱国人士手中的地方武装。省委决定，各地武装起义后，可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山东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会议精神，深入进行了政治动员，派代表到各地去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山东人民在中共各地组织的领导下，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徂徕山、泰西、鲁东南、鲁南、湖西等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抗日烽火在山东大地迅速燃烧。

在冀鲁边区，“七·七”事变之后，中共冀鲁边区工委于文彬、马振华

就在盐山组织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11月，日军侵占盐山等地，冀鲁边工委即在盐山之旧镇、乐陵之黄夹镇及宁津、庆三、无棣等地，领导人民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人民抗日救国军第1军”。起义武装先后数次袭击盐山之敌，1938年1至4月，曾攻克盐山、解放无棣、收复庆云县城，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同时，成立了乐陵、庆云、南皮三县民主政权。

在鲁西北地区，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即对第6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进行统战工作。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和推动下，范筑先于11月19日通电全国，宣布誓死留鲁西北地区坚持抗战，并将第6区保安司令部改为“山东省第6区抗日游击司令部”。随后，陆续收编了大批游杂武装，编成35个支队，并在10多个支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此外，鲁西北特委还在堂邑县组建了第1游击大队，不久以此为基础扩编成范部的第10支队。鲁西南工委在曹县组织了一支3000余人的武装，使用范部第35支队的名义。

在胶东地区，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在文登县天福山领导武装起义，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翌年1月中旬，胶东特委又在威海卫组织了一支武装，扩大了起义部队。2月上旬，正式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司令部，辖两个大队。起义武装曾夜袭牟平城，收复福山县城。在天福山起一——义的同时，中共掖县、蓬莱、黄县、莱阳等地党组织也相继举行起义，组织了抗日武装，并建立了掖县、蓬莱抗日民主政府。第3军于4月间将起义部队分别编为第1、第2、第3、第4路，每路下辖若干大队；掖县起义武装则编为第3军第3支队。全军共发展到7000余人。

在清河地区，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10月即派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与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密切合作，开办游击训练班，准备发动游击战争。长山失陷后，他们于12月26日在长山、临淄间之黑铁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该军于1938年1月袭入长山县城，在小清河伏击日军，击沉日军汽艇一艘，2月间，又于周村西白云山之三官庙击退日伪军400余人的进攻。与此同时，中共淄川矿区及章丘、益都、临淄等地党组织，也组织了抗日武装，并相继编入第5军，部队迅速发展到6000余人。

在鲁东地区，1937年12月29日，寿光县委的马保三和红军干部韩明柱在寿光城北牛头镇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8支队”。翌年1月27日，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又在潍县北之蔡家央子等地发动武装起义，组成“八路军鲁东游击第7支队”。3月，第7、第8支队于昌邑县瓦城会合，台编为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后转移到胶东掖县、黄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7月，该部又西返清河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徂徕山武装起义，是在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38年1月1日，在省委书记黎玉、宣传部长林浩和红军干部洪涛、赵杰等人的领导下，于泰安东南徂徕山之华光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成“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接着，中共莱芜、新泰等地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先后编入第4支队。部队组成后，相继在大汶口至新泰公路、泰安至新泰公路伏击日军。此后，第4支队兵分两路：一路向新泰、蒙阴、费县、泗水一带活动；一路向莱芜、博山、淄川一带发展。中共博山、泗水、临沂等地方组织

发动领导的抗日武装相继与第4支队会合。4月，第4支队南北两路会师莱芜城，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编为3个团。

在泰（山）西地区，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12月即派张北华、远静沧等到此地开辟工作。1938年1月1日，他们在夏张镇举行武装起义。11日，起义武装与中共肥城地方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会合，组成“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先后于1~4月间攻克肥城，夜袭津浦铁路上的界首村敌据点。此间，中共长清、太安地方组织发动的部分抗日武装先后编入自卫团，使泰西起义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

在鲁东南（后称滨海）地区，中共沂水县地方组织于1938年初在沂水以西公家疃一带组建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第6大队”，4月间，中共莒县地方组织在浮来山一带组织的“高房乡民众抗敌自卫团”，开赴沂水西南之泉庄与第6大队合编，使第6大队的力量得到加强。8月间，第6大队发展到两个营、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2支队”，坚持滨海地区抗日斗争。

在鲁南地区，1938年3月，日军逼近徐州，苏鲁豫皖边特委即分别在沛县、滕县、峄县等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5月1日，三支起义武装在枣庄以西的墓山会合，合编成“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1总队”。不久，中共临沂地区党组织在临沂、郯城地区组成的抗日武装“临郯青年抗日义勇队”也编入第1总队。之后，第1总队于5月间在临（城）枣（庄）公路、津浦铁路的临城、滕县段上多次伏击日军，破坏敌军交通线。

在湖（微山湖）西地区，1938年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又在铜山、沛县、萧县，丰县、砀山、永城、宿县等地发动武装起义。与此同时，中共鲁西南工委在单县、金乡一带也组织了抗日武装。6月13日，各地起义武装在丰县东南的华山镇会合，组成“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第2总队编成后，部队迅速发展到5000余人，坚持了湖西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到1938年5月止，中共山东省委及各地党组织，先后在山东一省的十几个地区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近4万人的抗日武装。各起义部队共作战100余次，解放县城15座，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为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山西、河北、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抗战，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向华北的战略展开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第四节 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

一、广泛发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冀、鲁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平汉、津浦铁路纵贯南北，在这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对于打破日伪对占领区的控制，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七·七”事变爆发后，该地区的人民群众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即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鉴于山区抗日根据地已初步巩固，力进一步发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打击并钳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于1938年4月21日向八路军发出了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

“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有计划的系统的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

22日，八路军总部令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2个团及1个支队挺进冀南；令先期进抵冀南的陈再道、宋任穷部仍发展冀南，并组建1个支队挺进冀鲁边；令宋时轮支队与邓华支队合组为1个纵队，深入冀东创建雾灵山脉根据地；令山区各抗日根据地部队积极活动，策应平汉路东我军迅猛发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冀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及八路军总部的部署，第129师决定全部主力以平汉铁路力分界线编为左右两路纵队：以第385旅之第769团、第115师第344旅之第689团及第5支队（即曾国华支队）组成左纵队即路东纵队，由徐向前率领向冀南挺进；以第386旅组成右纵队即路西纵队，由陈赓率领，展开于邢台、沙河一带，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

4月26日，路东纵队在副师长徐向前率领下从辽县出发，于5月初抵达河北省南宫地区，与先期到达的陈再道、宋任穷率领的东进纵队、骑兵团等部会合。徐向前的到达，加强并统一了冀南各部队的领导和指挥。为了配合友军在徐州地区的作战，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他指挥第689、第769团等部于5月10日进行了威县战斗，毙伤日伪军100余人。迫使驻威县的日伪军弃城西窜，驻临清、南和、平乡之日伪军，也先后逃往邢台。

在威县战斗的同时，“六离会”在汉奸李耀庭的暗中操纵下，于5月11日在南宫东南之张马、小屯附近，杀害路过此地的津浦支队政治委员王育民一行24人，并纠集会众1万余人，向八路军进攻。冀南部队忍无可忍，被迫将其击溃，并镇压了汉奸首领，巩固了冀南的中心区。

“六离会”事件被平息后，冀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即分兵向东、向南发展。至6月底，他们先后收复临清、高唐、夏津、枣强、成安、永年、肥乡、广平等县城，歼灭伪军近2000余人，开辟了卫河东西和漳河以北广大地区，并先后收编、改编了数十股各色武装和20余县的民团、保安队共2万余人。与此同时，第386旅政治委员王新亭率第771团由太行区进至永年、肥乡、成安地区；第385旅之汪乃贵支队进至赵县、藁城、栾城、宁晋、束鹿地区。至此，八路军挺进冀南地区的部队全面展开。

7月5日，第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由太行到达冀南。为加强正规军与军区建设，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对冀南地区的部队进行了整编：东进纵队第1、第3团合编为第1团，归第386旅建制；第771团与东进纵队第2团及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2师合编为第129师独立旅（8月21日，改称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汪乃贵支队与民众抗日自卫军合编为冀豫支队；各军分区基干队与各县民团、保安队及一部分地方势力武装合编为东进纵队第1~8等8个支队和1个独立团。

11月初，东进纵队再次进行整编，除第5、第6支队及独立团保留原建制外，其余各支队合编为第1、第2、第3团。经过整编，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在部队整编的同时，还从部队中抽调大批党员干部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和改造政权，至8月初，先后在近30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8月中旬，召开了各县代表会议，将冀南军政委员会改力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为主任，宋任穷力副主任。至此，以南宫为中心，西起平汉、东至津浦铁路，北起沧石公路，南跨漳河、卫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为钳制企图进攻潼关、洛阳的日军，乘势开辟漳河以南地区，第129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于8月30日令陈再道、王新亭率青年纵队、东进纵队、第689团和新1团等部发起漳南战役。

31日，各部首先进袭临漳以南贾河口、秤钩湾之敌，消灭伪军2000余人。至9月10日，又连续攻占回隆、楚旺、吕村集、崔家桥、大韩集、奚公集等重要集镇，消灭伪军近2000人。9月15日，第344旅副旅长杨得志率第688团、第689团及新1团组成漳南兵团，由王新亭、杨得志统一指挥，继续南进。25日，该部收复滑县、道口等城镇。

26日，又在汤阴西南地区追歼伪军一部，俘1400余人。经过近一个月的漳南作战，基本上肃清了平汉铁路以东、漳河以南、卫河以西，南北近100公里地区内的伪军和土匪，并协助中共直南特委建立了安阳、内黄、汤阴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八路军尔后向冀鲁豫边区发展创造了条件。

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

冀东位于河北省的东北部，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地带。早在1937年8月，毛泽东就曾指出，红军可以出一部兵力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1938年2月9日，毛泽东又指出：“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须作充分准备。”4月1日，八路军总部指令第120师抽调在雁北地区活动的宋时轮支队东进平西，与先期到达该地区的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会合，然后挺进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5月下旬，宋时轮支队抵达平西斋堂、杜家庄地区，与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下辖第11、第12支队等部，共5000余人。第4纵队经短期整训，6月8日由平西出发，向冀东地区挺进，沿途先后攻克昌平、延庆、永宁、四海、兴隆等城镇据点。除留一部在平北开展游击战争外，主力于6月下旬进抵蓟县以北的将军关、下营一带地区。

第4纵队向冀东挺进及沿途作战的胜利，给冀东人民以极大鼓舞。7月6日，中共冀热边特委首先在滦县、昌黎、乐亭等县发动抗日武装暴动，随即武装暴动的烈火又在以丰润、迁安、遵化、蓟县、玉田、三河、平谷、卢龙等县及开滦煤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燃烧起来。一个多月内，整个冀东地区共有22个县、1个矿区共20余万人民群众参加了武装暴动，组建抗日武装10余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即编为39个总队，达7万余人。冀东起义武装与第4纵队相互配合，先后攻克玉田、乐亭、卢龙、蓟县、平谷、迁安等6座县城及广大村镇，予日伪军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初步形成以蓟县、平谷、密云为基本区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8月中旬，八路军第4纵队与冀东暴动武装在遵化县铁厂镇胜利会师。

下旬，第4纵队、冀热边特委及抗日联军的领导干部，在铁厂镇召开联席会，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推举宋时轮、邓华为军区正、副司令员，下辖5个军分区，以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会议还计划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以统一抗日政权领导。铁厂会议后，第4纵队主力一部向北行动，准备北越长城进军都山，建立根据地；另一部主力向西行动，进军兴隆，建立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尔后依托山区逐步向平原发展。向兴隆山地挺进的部队，几经转战，进至白河以西，袭占赤城，歼日伪军200余人，同时袭占龙关城，歼敌一部，向都山进军的部队，遭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的阻击而退回滦河以西。

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和冀东人民大规模武装暴动，直接威胁了平津及北宁线的安全，日军于是急调第110师并纠合当地日伪军和东北伪满军于8月对冀东开始进行“讨伐”。第4纵队领导认为，部队苦战数月伤亡较大，弹药亦无法补充；加之暴动武装成分复杂，未经整顿，并且时值秋末，平原地区青纱帐已倒。提出除留下八路军骨干和一部暴动武装外，纵队主力和暴动武装大部转移到平西整训，准备来年再回冀东。10月中旬，冀东暴动武装四五万人随第4纵队开始西移，由于途中遭到日伪军的围迫堵截，暴动部队大部失散，一部随第4纵队抵达平西，一部随中共冀东地方组织返回冀东坚持斗争。

冀东暴动的胜利成果虽未能巩固，但暴动所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还保留下2500余人的骨干，暴动队伍失散的人员大部在各地顽强地坚持着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这些都是以后冀东抗日游击战争重新发展的重要条件。冀东暴动的成功和部队西撤途中的受挫，也为以后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中共中央军委在1938年11月25日致八路军总部及晋察冀军区的电报中指出：“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的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中共中央军委还决定，以第4纵队为基础，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此后，该地区的抗日斗争又重新发展起来。

冀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冀中地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自成立至1938年10月底的半年间，曾3次攻入保定东南关，2次攻入定县城，一度占领徐水，并先后进行方顺桥、献县、安国、安次，牛驼镇、青县、固安、陈官屯、沧县、马庄镇等大小战斗100余次，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为配合国民党军在徐州及武汉地区的作战，第3纵队还发动群众不断对平汉、津浦、北宁三大铁路进行破击作战，共拆毁铁轨3000余条，收割电线1000余斤，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行动。

为了创造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有利条件，冀中军区发动全区军民掀起了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

拆城工作，先于1938年1月在肃宁县城开始，接着是河间，继而是素以“固若金汤”闻名的蠡县城，随后，对冀中腹心地区的县城全面展开了拆除工作，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拆除24座县城的城墙。破路工作，几乎与拆城工作同时开始，起初是拦道挖横沟，后来改为顺道挖沟，破路工程变成了筑

沟工程，纵横贯连各村的大道沟，深达2米多，宽3米左右，大车可以行走，汽车、坦克难以通过。随后又在道沟两侧挖了各种掩体和防空洞，这既便于打击敌人，又利于群众安全转移。这种道沟，是冀中军民的伟大创举，对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了发展大清河以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于1938年六七月间移至任丘县青塔镇，并派出部队及工作团深入到任丘、河间、大城等地区开展工作。他们先后将河北游击军改编为第1战区独立第1支队第1旅和冀中军区独立第1、第2、第3支队，并将收容的联庄武装编为冀中军区独立团。至9月间，从大清河至北宁路间广大地区的抗日局面全面展开，成立了冀中军区第5军分区。

至此，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4个支队、5个独立支队及回民支队、挺进支队等部，共63120人。另外，各县还建有基干队等地方武装，冀中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西迄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达北宁路，南界沧石路，拥有44个县，人口约800万的广大地区。

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冀鲁边地区东临渤海湾，西逼津浦路，南靠黄河边，北迫天津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发展该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于1938年5月间决定：第115师组成的第5支队（曾国华为支队长），第129师组成的津浦支队（孙继先为支队长），挺进冀鲁边。7月上旬，第5支队及津浦支队由冀南地区出发，进抵冀鲁边区的乐陵、宁津地区，先后于7月下旬在庆云县西北之黑牛王地区歼灭伪军800余人，8月收复宁津县城，歼灭伪军1000余人。并与当地抗日武装密切配合，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

为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总部又决定派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第343旅政治委员萧华赴冀鲁边。萧华率该旅司、政机关及补充团部分干部共100余人，由山西出发，于9月27日进抵乐陵城。接着，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萧华为书记。成立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将该地抗日武装进行了整编：第5支队由3个营扩编为3个团；津浦支队由2个营扩编为3个营；新编第6支队辖3个团。

部队整编后，先后袭击沧县城东南七里淀、盐山城西孟村等日伪军据点，并对津浦铁路、沧（县）盐（山）公路进行了破袭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同时，他们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密切协同，相继成立了津南、泰山、宁津、鲁北、阳信、商河、惠民等若干个地方游击支队，并在沧县、南皮、东光、盐山、新海、庆云、无棣、宁津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1938年底，以乐陵、宁津为中心的冀鲁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基本建成。

八路军挺进冀鲁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行动，不仅开辟和发展了平原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比较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源，而且使平原与山区根据地相互依存、相互策应，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条件。

二、发展和保卫山区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在抽调部分主力部队挺进冀鲁平原的同时，在华北广大山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

发展晋冀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八路军第129师在徐向前等率主力一部向冀南挺进的同时，留在平汉路西的部队继续发展晋冀豫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4月下旬，第386旅在陈赓旅长率领下，进入平汉路西邢台地区，统一指挥先遣支队等部，由北向南横扫邢台、沙河、武安、磁县以西山区的伪军，连克峰峰、西佐、彭城等伪军据点，多次破坏邢台至磁县间的平汉铁路，并消灭该地区内的10余股土匪、汉奸及反动会道门武装。6月上旬，第386旅主力继续南下，进到漳河以南、道清路以北的豫北地区，统一指挥补充团、赵涂支队等部，相继攻克观台、水冶，袭入汤阴、辉县及潞王坟等车站据点。至8月间，该部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将日伪势力从山区驱至铁路沿线，并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在安阳、林县、辉县等山区建立了抗日政权，在豫北平原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

与第386旅在豫北展开的同时，第129师于6月12日又以第769团、独立团和汪乃贵支队组成新的第385旅，由陈锡联任旅长，谢富治任政治委员。该旅组成后，在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至邢台段以西地区继续袭击、伏击日伪军，粉碎了敌依托交通线扩大占领区的企图。

活动于晋南地区的第115师之第344旅，于7月6日，在沁水东南之町店附近地区袭击由晋城向侯马增援之日军第108师一部，歼敌5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八路军自身伤亡近500人。此役严重打击了敌人增援的行动，有力地策应了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在侯马地区的作战。

为了配合国民党军在徐州、武汉地区的作战，5~10月间，第129师统一指挥第385、第386、第344旅及各基干支队与当地人民群众一起，在晋冀豫边区对平汉、正太、道清等铁路进行了10余次破击，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行动。

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大青山位于绥远省阴山山脉中段，横亘于内蒙古高原。开辟这块抗日根据地，对于坚持绥远抗战，箝制日军向大西北的入侵，掩护陕甘宁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翼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指出：“在平绥路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为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根据这一指示，第120师决定以第358旅第715团及师直骑兵团1个连组成大青山支队，由第358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第358旅参谋长姚喆任支队参谋长。此外，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所属抗日游击第1路纵队之第4支队及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部分干部随同北上。

7月29日，大青山支队在李井泉、姚喆率领下，由晋西北五寨地区出发，开始向大青山挺进。8月下旬，大青山支队突破日军层层堵截，进到蛮汗山地区，除留下第715团第1营由姚喆率领在平绥铁路以南，开辟以蛮汗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保障大青山与晋西北的联系外，主力部队由李井泉率领继续向大青山腹地挺进。9月1日夜，支队主力由旗下营与三道营之间越过平绥铁路，胜利抵达大青山腹地——武川县之大滩、甘沟子一带地区，并很快与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蒙汉人民游击队会合。为迅速打开大青山地区的抗日局面，大青山支队于9月3日首袭陶林城（今察哈尔右翼中旗政府所在地科布尔镇）之日伪军。10日，该支队又挥戈西进，奔袭了乌兰花镇。

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支队决定由李井泉等率领第3营、第2

道清路，河南省北部与平汉铁路交叉的一条铁路线，由道口（今滑县）至清化（博爱）。

营第5连、第4支队第2连及绥蒙游击支队等部，挺进归（绥）武（川）公路以西，开辟绥西游击区；由姚喆率领第1、第2营的3个连，骑兵连及第4支队第3、第4连等部继续坚持和发展绥中区的游击战争；由第1营副营长邹凤山带领该营第3连及第4支队第1连等回师蛮汗山，开辟绥南游击区。

西进部队越过归武公路，直达萨拉齐以北的后脑包一带地区。10月1日，该部奔袭了包头东北的石拐镇伪蒙军，10月中旬，他们又袭击了平绥铁路线上的陶思浩、苏安盖、毕克齐等车站据点，直接威胁包头、归绥之日伪军。

11月，大青山支队粉碎了日军2000余骑兵分4路向萨拉齐以北山区的围攻，回师蛮汗山的部队，重新开辟了绥南抗日游击区。绥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地区以来，在中共地方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下，经3个多月的积极作战和工作，初步开辟了绥南、绥中、绥西3个抗日游击区，建立了绥蒙总动员委员会，并在3个游击区内分别设立了办事处，下属各县也分别成立了动委会，以代行政权职能。至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建成。

汾离公路三战三捷

1938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第115师的电报中指出：第343旅目前“仍以对同蒲、太军（太原至军渡公路）两路大肆破坏，妨碍敌渡黄河为主要任务，协助地方发展游击队为辅助任务。”遵照这一指示，第115师第343旅在汾（阳）离（石）公路及介休至灵右铁路展开了积极的破袭作战。

9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华中派遣军进攻武汉，以第108师一部沿汾离公路西犯，进攻柳林、军渡，并炮击黄河西岸宋家川，直接威胁着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为粉碎敌之企图，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决心在汾离公路上伏击日军辎重部队，以切断其补给线。

9月14日，第343旅之第686团设伏于汾离公路中段吴城镇以东的薛公岭，将由汾阳西进的日军20余辆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和200余名步兵全歼。

17日，第115师又以第343旅补充团在吴城镇以西的油房坪设伏，将从汾阳开出的日军运输汽车20辆及步兵100余人全歼。

日军在汾离公路上连遭打击后，其后方补给线被切断，被迫于9月19日由离石向汾阳方向撤退。第115师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第686团、补充团、第685团第2营及师特务连等部，再于20日设伏王家池附近地区，将东撤日军800余人全部消灭。

第115师在汾离公路连续三次伏击日军，共歼敌12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缴获各种枪560余支、战马100余匹，予敌以沉重打击。

晋察冀边区反击日军围攻

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边区1938年4月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积极向东向北发展游击战争。第120师之第359旅奉命于5月下旬由崞县进入浑源、广灵、灵丘等地，协同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向平绥线发展。在“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晋察冀军区和第359旅在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下，向平绥、平汉、津浦等铁路线和附近城镇据点发起了连续破击作战，一度攻克易县城，攻占定县车站及桃花堡、西合营、暖泉、北水泉等日伪军据点，袭入新乐、平山等县城，并击毁了北平近郊石景山发电厂设备，袭击了香山附近之日伪军。此次破击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1450余人，俘伪军130余人，缴获各种枪300余支，破坏铁路50余公里，使平汉线北段的交通一度中断。

八路军连续作战的胜利，使华北日军惊恐不安。为消除后顾之忧，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自9月10日起，日军先后调集第110、第26、第109师及独立混成第2、第4旅共5万亲入兵力，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围攻。

晋察冀军区及边区党委针对日军的企图，提出了“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保卫家乡”的战斗口号，在全边区进行了反围攻作战的组织动员和具体准备。

自9月20日起，集结于晋察冀边区周围的日军，开始向边区城镇要点进犯。

在东线，由平汉线之定县、望都、保定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10师于21日占领曲阳、唐县、完县等边沿城镇后，继续向阜平发展进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于9月22日分别在曲阳以东的赵邱和东北的刘家马等地毙伤日军300余人，迟滞了日军行动。10月3~4日，第1、第3军分区及冀中军区各一部在阜平以东之王快、方代口及东西庄一带地区伏击日军，毙伤敌1000余人。6日上午，日军侵入阜平城。

在西线和南线，由同蒲铁路之代县、定襄等地出动之日军第109师一部及由正大线之盂县、平山、井陉出动之独立混成第4旅，分路向五台、子洪店进攻，企图合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晋察冀军区第2、第4军分区部队分别在东冶、河边村及上社等地阻击日军的进犯。南线之敌北渡滹沱河，继续向柏兰镇发展进攻时，在牛道岭、石佛寺等地被歼400余人。

在北线，由平绥线之蔚县、广灵、浑源等地出动的日军第26师及独立混成第2旅，在9月20日占领北口、九宫口等地后，向涞源、灵丘等地发展进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与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密切协同，在邵家庄、冯家庄、居吉沟等地阻击日军，并于26日夜袭直峪。经6昼夜激战，共毙伤日军800余人，有效地迟滞了日军的行动。直至10月1日，日军才进占涞源、灵丘县城。

日军在侵占五台、阜平、涞源、灵丘等城镇后，即加紧修筑工事，建立据点，企图采取先分割后“清剿”的手段，达到各个消灭八路军主力，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在晋察冀边区反围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于10月2日电示晋察冀军区：“根据敌人构筑据点，步步推进，紧缩边区，及敌人顽强与敌人不足的优缺点”，应“相当的集中主力于我有利的各种条件（敌人弱，地形有利）方面，准备待机”；“以小部队与敌进行极不规则的小战，迟阻和疲惫敌人，以相当有效部队转入敌之后方交通线，打击敌之运输”；“如敌无弱可乘，不便我主力集中打击或消灭时，待敌人进至利害循环变换线，即将主力转至敌后方，仍以小部队分途逐渐引敌深入，使敌疲惫、疏忽、扑空，待敌转移方向或退却时，给敌以突然的袭击或追击”。并命令第129师“对正太路有计划的进行破坏，并相机以适当兵力越路北进，分途尾击敌人”。令第120师“积极地吸引原平、忻口、关城之敌，并相机越路东，尾击东进之敌。”

晋察冀军区遵照毛泽东等人的指示，于10月7日决定改变对敌斗争方式，以各大队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而以主力部队转移敌之包围线以外行动。各部队根据军区的统一部署，对敌展开了灵活的斗争。

10月中旬，侵入五台的西线和南线之敌共3000余人，在北线和东线日

军的配合下，分路向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台怀、石咀、金刚库地区进攻扑空后，于 13 日分路撤退。由正定向灵寿入侵的日军在同下村遭伏击后，被迫退回原据点。北线日军在第 359 旅等部袭扰打击下，退守涞源城。东线侵入阜平、王快、党城等地的日军，也连遭袭击，惶恐不安。

晋察冀军区首长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地决定：适当集中主力，相机歼灭困守城镇据点或撤退之敌。

10 月中旬起，第 1、第 3 军分区部队先后在曲阳至阜平的交通线上连续进行了 19 次袭击、伏击战。第 359 旅之第 717 团和第 1 军分区一部夜袭阜平城，迫使日军于 27 日晨弃城撤退。第 1、第 3 军分区乘胜收复阜平以东地区，在北部地区，第 359 旅主力与第 1 军分区部队密切协同，连续在蔚县、广灵、涞源地区出击日军。10 月 28 日，第 359 旅又于邵家庄、张家湾、黄台寺、贾庄地区伏击日军，歼灭独立混成第 2 旅 300 余人。至此，北线日军龟缩于涞源、灵丘等城，不敢轻易出犯。在南部地区，第 4 军分区以一部不断袭击侵入回舍、于洪店日军，另一部在第 129 师一部配合下，于 10 月下旬起对正太铁路展开了广泛的破击战，迫使侵入平山、孟县的日军回防正太线。在西部地区，进抵五台南部地区待机的第 120 师之第 358 旅，11 月 3 日夜，在滑石片地区设伏，歼灭了奔袭高洪口后回返的日军第 109 师 1 个营 500 余人，俘 21 人。

至 11 月 7 日，晋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基本结束，此役毙伤日伪军 52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570 余支、轻重机枪 49 挺、各种火炮 10 门及大批军用物资。反围攻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武汉地区的作战。

山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山东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创了山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然而，由于各起义武装成分新，缺乏领导骨干，指挥也不够统一，因此直接影响着起义部队的发展及各项抗日工作的开展。1938 年 5 月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电示八路军总部派遣部分主力部队入鲁，并决定派洪涛率 50 余名干部加强山东地区的领导力量。同时，对山东省委指出：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大量地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抗日根据地，使山东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个战略支点。5 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力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以郭洪涛任书记。6 月 8 日，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凡属我党领导、已得广大民众拥护，又邻近友党友军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宜。”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上述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对山东各地抗日武装实行了统一领导，决定以各大起义武装为基础组建成支队，分配一批有领导和战斗经验的红军骨干到各支队担任领导职务。至 1938 年底，将活动于沂水、莒县地区的第 4 支队第 6 大队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 2 支队；清河地区第 5 军编为第 3 支队；鲁中抗日联军独立第 1 师恢复使用第 4 支队番号；胶东第 3 军编为第 5 支队；泰西区抗敌自卫团和汶上县起义部队合编为第 6 支队；由胶东西返清河地区的鲁东游击指挥部（辖第 7、第 8 支队）仍用原番号；湖西起义武装编为挺进支队；在苏北邳县地区成立了陇海南进支队，此外，还一度成立了第 9、第 12 支队。

在整顿部队的同时，各起义武装大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日伪军。8 月间，在清河地区的第 3 支队先后袭击了张店、周村、黄台火车站；8 月 13

日袭击济南，一度攻入济南北关，占领伪省政府。9月，活动于鲁中区的第4支队先后对胶济铁路周村至张店段及张（店）博（山）铁路进行了袭击战，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与此同时，活动于胶东地区的第5支队数次袭击烟台之敌，并于蓬莱、龙口、栾家口连续击退了企图由海上登陆之日军。鲁南人民起义武装于9月间在临（沂）枣（庄）公路上的燕柱山伏击敌汽车队。泰西区的第6支队、滨海地区的第2支队等部，也都积极打击日伪军，扩大了抗日游击区。

为进一步统一山东各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2月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以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同时，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郭洪涛为书记。山东纵队及山东分局的成立，使山东起义武装的领导得到了加强，标志着山东各抗日武装由分散的游击队成长为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对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及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八路军自誓师出征至1938年10月，共作战1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缴获各种枪1.2万余支，收复大片国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及山东等大块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部队也由出征时的3.2万人发展到15万余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坚。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连续作战的胜利，钳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使其难以抽调兵力转用于正面战场。因而，对削弱日军的力量，遏制和迫使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加速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也起了重大作用。

第十四章 淞沪、徐州会战和华中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一节 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

一、日军进犯淞沪的企图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广大官兵激于民族义愤，奋起抵抗，同日本侵略军展开淞沪会战。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其中上海市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世界东方的金融贸易中心。优良的港口和京沪、沪杭甬铁路的交会，又使上海成为通柱国外和内地的枢纽和守卫当时首都南京的门户。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由于“一·二八”事变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即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了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大。

1937年7月17日，日本驻上海的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在给日本海军军令部的报告中就说过：“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后来，日军参谋部给天皇的上奏中也露骨他说侵占上海的目的，是“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8月9日，日本制造虹桥机场事件后，即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侨义勇团备战，并将日舰30余艘集中吴淞一带，陆军亦开始向上海调动。

在此形势下，中国政府认为上海战事已不可避免，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密令驻防京沪沿线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立即率所部开赴上海周围布防。同时急令该军驻西安的第36师火速向上海开进。8月12日，第87师主力进驻杨树浦一线，第88师进入闸北、虹口公园以北一带布防。

二、淞沪会战经过

（一）上海市区反击作战

8月13日3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虹口区预设阵地为依托；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至横滨路的中国守军开枪挑衅。9时许，日军在坦克掩护下沿宝山路进攻，中国守军第88师予以还击。15时，日军在海、空火力支援下，由租界再次向闸北地区宝山路、八字桥和天通庵路发起进攻，又被中国守军击退。（见附图4）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同时，军事委员会以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个师1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任务；苏浙边区部队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年增印，第284页。

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当日16时，第9集团军在炮火支援下向虹口、杨树浦之敌发起攻击，第87师占领沪江大学，第88师占领持志大学、五洲公墓、八字桥和宝山桥等要点。同日，中国空军轰炸了日本陆战队司令部和日海军第3舰队“出云”号旗舰，中日双方在上海空域展开了空战。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之断然措施”，同日，日本下达了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以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第3、第9、第11师（欠天谷支队）等部，作战任务力“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的重要地带。”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将全国临战地区划为5个战区，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决定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基地，阻止后续敌军登陆。

8月17日，中国军队再次向虹口、杨树浦方面之敌反击。第87师攻占了日海军俱乐部，并击退敌多次反扑。第88师在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等处与敌反复争夺。8月19日，中国军队又一次发起攻势，以从西安到达的宋希濂所属第36师加入战斗，与第88师、第87师一起，经一昼夜激战，突破日军阵地全纵深，攻入汇山码头。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抗待援，中国军队进展困难。第36师第215团第2营300余名官兵攻入华德路十字街口，突入巷内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不料被日军以坦克阻塞路口，遭到火力袭击，全部壮烈牺牲。

在此期间，中国空军亦与日本航空队展开激战，并积极攻击进犯的日本陆军和舰艇。8月14日，日本飞机分批袭击中国杭州及广德机场，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由大队长高志航率队长郑少愚、李桂丹两机群共27架战斗机、分途拦截，击落日轰炸机3架，首创空战胜利的纪录。8月15日，日本鹿屋及木更津等海军航空队，以轰炸机60余架，分别袭击中国杭州、嘉兴、曹娥、南京等机场。中国空军第9大队于曹娥上空，击落日军飞机4架，第4大队于杭州上空击落日军飞机16架，并协同第3、第5大队及航校暂编部队，于南京上空共同击落日军飞机14架。至16日，日本航空队又以轰炸机20余架分别袭击各地，又被击落8架。经3日激战，共击落日机45架，给日本鹿屋、木更津航空队以歼灭性打击。

8月17日，中国空军第4、第2、第7大队出动飞机44架，由副大队长孙桐岗及队长刘粹刚、董明德、杨鸿鼎等率领，分批前往轰炸虹口日军阵地，予以重创，并击落日机2架。日军高射炮火猛烈回击，中国空军队员阎海文座机被敌高射炮弹击中跳伞降落敌阵地，举枪击毙包围之敌数名后，以最后一弹自牧，壮烈殉国。

8月19日，中国空军为打击长江口外活动之日本舰艇，由第4、第2大队出动飞机20架，轰炸白龙港水域日舰，队员沈崇海驾机向日舰俯冲，炸沉日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

（二）淞沪地区防御作战

日本编组上海派遣军后，日军参谋部制定该军的作战方针是：以精锐的

兵团在浏河镇方面登陆，以主力在吴淞方面登陆，占领上海及其北面的重要地带。8月18~20日，日军第3、第11师先后由日本出发，至22日到达上海以东120公里的海域，换乘小舰艇准备登陆。第3战区鉴于敌登陆威胁增大，遂以第9集团军专负上海市区之作战，以新编成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负责吴淞镇以下沿江防线的作战。

8月23日晨，日军上海派遣军第3、第11师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于川沙河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中国守军与之展开激战，未能阻止日军进展。日军后续部队陆续上岸，即向吴淞、主山、罗店、浏河之线发起进攻。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立即抽调部队支援江防军作战，以第87师一个旅增援吴淞，以第98师、第11师向主山、罗店、刘行疾进，阻止上陆之敌。当日17时，第11师在敌机不断的轰炸下进至罗店附近，向敌展开攻击，毙伤其一部，收复罗店。此役影响重大，它不仅稳住了正面，而且掩护了后方的交通，保证了后续部队的陆续增援。与此同时，第98师亦将狮子林之敌驱逐。教导总队第2团与张华浜之敌形成对峙。

24日，第15集团军陈诚部先后进至上海，中国军队向登陆之敌发起反击。第98师向吴淞、宝山地区日军展开反攻，至傍晚将敌压缩至江边，歼其300余人，将进攻吴淞之敌击退。另一部收复宝一山，残敌向狮子林撤退。

27日晚，第15集团军再由同浦镇、新镇、罗店、蒲家庙之线向敌展开反击。日军第11师主力向罗店方面反扑，守军与敌反复进行巷战，罗店数次易手，终因伤亡过重被敌夺占。31日，日军第3师第68团在吴淞登陆，守军伤亡惨重，吴淞镇失守。9月1日，日军1000余人围攻狮子林炮台。第98师一部与敌反复白刃搏斗，多数牺牲。

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守卫宝山的第18军第583团第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浴血奋战；击退日军数次冲击。日军以炮击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內。第3营官兵同敌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多数壮烈牺牲。迄9月17日，中国军队全线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西南、双草墩之线，继续与日军对峙。

9月上旬，尽管上海中国守军伤亡较大，但斗志高昂，拼死抵抗，使日军进展缓慢。这一形势使日本统帅部焦虑不安。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8月31日即向日军参谋部紧急呼吁，请求派遣5个师速向上海增援。9月6日，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向天皇上奏说，“上海的陆上作战迟迟未有进展，需要增加陆军兵力。”为此，日军中央统帅部决定再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9月7日，以台湾守备队扩编而成的重藤支队，乘海军舰艇急驶上海，并将华北方面军后备步兵10个营及炮兵、工兵一部调到上海；9月11日又下令调华北方面军第9、第13、第101师及直属部队、兵站部队到上海作战，正式编成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在9月20日制订的《作战计划大纲》中，提出“大致以10月上旬为期，在华北与上海两方面发动攻击，务必给予重大打击，造成使敌人屈服的形势”，“以上海派遣军（以5个师为基干）击败上海周围之敌。”日军决心将侵华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向由华北转移到上海。

由于日军不断增兵，战争逐步升级，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9月11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296页。

以陈诚的第 15 集团军为左翼作战军，以张治中的第 9 集团军为中央作战军，以张发奎的第 8 集团军为右翼作战军。9 月 21 日，再次调整部署，朱绍良任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兼第 9 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任左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 19 集团军（薛岳为总司令）和第 15 集团军（罗卓英为总司令）；张发奎任右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 8 集团军（张发奎兼总司令）和第 10 集团军（刘建绪为总司令）。

9 月下旬至 10 月初，日军第 101、第 9、第 13 师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加入上海派遣军之作战。日军总兵力达 20 万人。9 月 30 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突破万桥、严桥、陆桥等处阵地。刘行方面的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较重。为了避免日军继续突破，10 月 1 日晚，第 3 战区司令长官部令左翼作战军各兵团，向蕴藻浜右岸陈行、施相公庙、浏河之线阵地转移，至 3 日拂晓前，完成新阵地的占领。10 月 5 至 8 日，日军第 3、第 9 师在第 11 师和 13 师一部的掩护下，向蕴藻浜地区实施猛攻。中国军队经数日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

11 日后，日军继续猛攻，企图进占大场，向南翔发展，截断京沪铁路。中日双方军队在蕴藻浜南岸阵地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10 月 15 日，中国军队第 3 战区重新调整部署，将蕴藻浜南岸地区划归中央作战军，令廖磊的第 21 集团军归中央作战军指挥，加入大场方向作战。中国守卫蕴藻浜南岸之部队，在第 21 集团军统一指挥下，19 日发起反击，适逢日军主力亦发动步、坦、炮联合进攻，双方展开大规模激战。中国军队由于装备落后，加之连日战斗，伤亡过大，攻击陷于停顿，26 日大场失陷。中央作战军遂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之线转移。中央作战军主力 27 日转至苏州河南岸新阵地，各掩护部队完成任务后亦陆续归还建制。唯第 88 师第 524 团第 2 营在团附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据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誓死下退。该营八百壮士孤军奋战至 30 日，乃退入英租界。国际上对中国军队这次英勇作战，赞为奇迹。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即发起攻势，双方死伤惨重。至 11 月 4 日，日军仍未突破苏州河。此时，第 3 战区根据战局变化，乃撤销中央作战军，将全正面划分为左、右两作战军，分由陈诚、张发奎指挥。

（三）杭州湾抗登陆及撤退

淞沪会战在中国军队的英勇坚持下，已延续两个月，日军虽增援至 6 个师，兵力达 20 万人，且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但仍未能获得决定性胜利。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这对其速战速决战略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日本统帅部急于在上海方面取得预期战果，决心采取新的措施。10 月 6 日，日军参谋部在给天皇的上奏中指出，要攻占上海，“预料还需要相当的时日和付出相当的代价”，“因此，目前刻不容缓的是迅速结束上海战役。”10 月 9 日决定增派一个集团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攻击上海守军侧背。

10 月 20 日，日军参谋部决定抽调第 6、第 18、第 114 师、国崎支队、

独立山炮第2团、野战重炮兵第6旅和第1、第2后备步兵团，组成第10集团军，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官，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协助上海派遣军作战。10月20日，日军又从华北抽调第16师等部编入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至此，进犯淞沪地区的日军已达两个集团军9个师，侵华日军的作战重点，已经转移到华中。当时日本留在国内的部队只有近卫和第7两个常设师。日军在中国，特别是在华中下的赌注，表明了在上海附近进行决战的意图。

日军选定的登陆地点，是位于上海南侧杭州湾北岸。这里海岸线平直，近岸有10米以上的水深，是淞沪地区最良好的登陆场。日军登陆后如占领松江城，即可切断沪杭甬铁路，与北面的上海派遣军配合，对淞沪地区之中国军队形成包围。

淞沪会战初期，中国军队曾设置杭州湾北岸守备区，以第8集团军4个师1个旅担任防守，防止日军增援部队在沿江沿海登陆。后因上海方面战事紧张，部分守备部队先后被调往浦东一带协助正面作战，以致从全公亭到乍浦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仅有第62师之一部及少数地方武装担任守卫。

11月5日拂晓，日军先以舰炮对金山卫附近中国军队阵地轰击数小时，然后第10集团军第一梯队登陆部队（第6师与第18师）在航空兵火力掩护下，于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卫、金山咀、漕泾等地登陆。中国守军在沿海岸担任警戒的部队为第28军步兵第63师的2个连，兵力薄弱，为敌军击破，日军登陆成功。5日上午，全公亭方面登陆日军已达3000余人，中国战区指挥官急调第62师、独立第45旅及新到枫泾之第79师前往阻击，并令在青浦之第67军推进至松江。但部队联络困难，行动迟缓，未能如期实施反击。日军乘机突击，后续部队源源上陆。

日军登陆成功后，即以第18师一部向沪杭铁路前进，第6师和第18师主力向松江进攻，当晚进抵金山县城、松隐镇、亭林镇一线。

11月6日，敌先头部队到达米市渡附近，傍晚渡过黄浦江，突破守军阻击，以主力向松江前进。中国守军第62、第79师分别向亭林镇、金山城发起反击，伤亡较大。指挥松江地区防御的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黄琪翔，组织第62、第107、第108、第26、第79师固守黄浦江各主要渡口，阻敌第6师、第18师渡江。

日军参谋部为统一上海方面作战指挥，11月7日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集团军编组成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其目标是：“以挫伤敌之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的机会为目的，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并规定：“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域为联接苏州——嘉兴一线以东。”8日拂晓，日军第10集团军主力渡过黄浦江，与中国军队第108师激战。9日占领松江城。

对日军第10集团军在金山卫的登陆未能扼制，其主力登陆后又未能阻止其向纵深扩张，在此情况下，中国军队本应果断撤出上海，向第二防线转移。当时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委会第一部作战组长刘斐及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等人，都曾就此向蒋介石提出正确的建议，蒋也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对前线下达了向吴淞线转移的命令。但下令后的第二天，蒋又突然召开紧急会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397页。
吴县至福山。

议，幡然变计，说现在准备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只要我军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将会主持正义，制裁日本，结束中日战争。因此，要收回撤退命令，让各部队仍回原阵地死守数日。这一决定使守军丧失了主动转移的有利时机，直至阵脚开始混乱，第3战区指挥部才于8日夜命令各部队向吴福国防线转移。

9日，守军开始全线撤退。右翼作战军第9、第15两集团军开始沿京沪线两侧地区撤退，因遭敌机轰炸，联络中断，陷于混乱，险成溃退。为掩护右翼作战军后撤，左翼作战军第15、第21两集团军在新泾河一线坚守至12日夜，完成任务后，始向吴福线转移。

为掩护上海方面中国守军顺利撤退，第67军在松江阻击由金山卫登陆的日军深入。11月6~8日，该军在松江县城与日军展开激战，击退敌多次进攻，完成了“死守三日”的任务，在向昆山突围中，军长吴克仁壮烈牺牲。

11月11日夜，中国守军在上海市南侧地区及浦东担任掩护之部队撤离。被隔绝于上海市内的守军4000余人撤至租界。日军即向上海市西、南方向推进。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在长江展开战斗。8月16日晚，江阴区江防司令部派出102号快艇，自江阴经内河潜至上海黄浦江，进至距日军旗舰“出云”号300米处，向该舰施放两枚鱼雷，均命中爆炸，使日军旗舰遭受重创。中国快艇在返航中被敌击沉，官兵洒水离艇。8月中旬，中国海军派出“甘露”等舰在江阴下游破除航海标志，堵塞航道，阻止日舰溯江上驶，同时，抽调通济、大同、自强、德胜、威胜、辰字、宿字等舰艇，以及国营招商局和各轮船公司征集的轮船23艘，合计35艘，下沉堵塞航道。随后，又征用民船、盐船一批陆续下沉，填补航道空隙，并在江阴一段分布水雷。8月下旬，中国海军为保卫首都，派平海、宁海、应瑞、逸仙等舰开往江阴封锁线，协同其他舰艇实施防卫，并与来袭的日本飞机进行了频繁战斗，至11月下旬，共击落日本飞机7架，重伤日本军舰两艘。中国舰艇损失惨重，大部被炸沉或炸伤。

11月13日，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了切断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并策应第10集团军登陆，将从华北调来之日军第16师在白茆口、浒浦口附近登陆，向常熟进攻，企图切断中国守军退路。上海派遣军除以两个师担任上海及后方要点的警卫外，集中7个师沿京沪铁路及其南北地区向吴福线进攻。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第二梯队第114师于10日在金山卫登陆后，向嘉兴方向进攻。担任江防的中国守军第40师及第21集团军所属各师，与日军展开激战，掩护战区主力向吴福线转移。

11月19日，日军分别攻占常熟、莫城镇，苏州亦同时失陷。第3战区为避免与敌决战，乃于是日夜命各部撤向锡澄线。这样，吴福线国防工事未来得及发挥作用即被日军占领。

日军统帅部曾规定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域为苏州——嘉兴一线以东，至19日其各部进抵该线后，并未停止前进，决定乘中国军队撤退混乱之机，继续向西追击。20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决定向南京追击。

日军突破吴福线后继续西进。

23日开始向锡澄线发起进攻。蒋介石下令死守现有阵地，但溃退之势无

法挽回。

25日无锡失陷。中国军队放弃锡澄线，一部沿京沪铁路向常州撤退，大部经宜兴往浙赣边境撤退。

27日日军切断江阴、无锡公路，29日攻入常州。

自锡澄线弃守后成为孤军的江阴要塞守备部队，从11月28日起受到日军围攻，与敌激战5日后，工事大部被摧毁，官兵伤亡甚多，遂向镇江方向突围。

12月2日，江阴要塞失陷。

11月9日，右翼作战军开始向乍平嘉国防线撤退，遭敌第6、第18师迫击。与敌激战至14日，嘉善失守。

19日，苏嘉线与沪杭线交会点嘉兴被日军攻陷，乍平嘉国防线被突破。守军退向南浔、青镇、长安、海宁一线。20日，蒋介石命令刚到达之第7军向吴兴急进，加强吴兴、广德地区防御，11月24日拂晓，日军在30余架飞机掩护下，攻占吴兴。30日占领广德。

12月初向宣城、芜湖西侵，主力北上进攻南京。此时，中国第7战区已经编成，刘湘上将力司令长官，即命第23集团军（川军6个师）支援第7军。

12月初，第21、第15集团军在第23集团军掩护下，经宜兴向孝丰、宁国附近地区转移；第23集团军亦向宣城以西及宁国转移；锡澄线守军即向南京转移。淞沪抗战至此结束。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西撤，历时3个月。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华中方面军，编成上海派遣军、第10集团军，下辖近10个师的兵力，共约28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和驻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总计兵力约70余个师，海军舰艇约40艘，空军飞机250架，投入战斗。广大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与有优势装备的敌人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坚守上海达3个月之久，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迷梦。

这次会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为上海工厂内迁，保存经济实力，以至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赢得了时间，松沪会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亦有其重要地位和影响。

淞沪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首都的门户，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虎视眈眈。中国无意把战争引向淞沪地区自伐肺腑，自损资源，以改变敌进攻方向，而是日本侵略者决意夺占上海。因此，在淞沪地区进行一战势必难免。在淞沪地区进行多大规模和多长时间的作战，要从中日双方的特点及中国长期抗战的全局利益考虑。在上海地区给敌以相当的反击和消耗，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后，逐次转移至第二、三防线，再从正面阻击，翼侧反击给敌以更大的消耗，在战略上是有利的。把70余万大军部署于敌掌握制主权、制海权的滨海城市，单靠拼消耗，拖时间，幻想求得国际干涉，解决中日战争，这是违背持久战战略方针和不利坚持长期抗战的表现，是战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因而给以后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陈诚也认为：“这

乍浦经平湖至嘉兴。

苏州至嘉兴。

次战略受政治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

三、南京失陷及日军大屠杀

日军侵占上海后，鉴于进攻发展顺利，中国首都南京也指日可待，侵华气焰更为嚣张。11月17日，成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直接受命于日本天皇。随后，设立了大本营与政府首脑的联席会议。

11月24日，日军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陆军参谋总长等在上奏作战计划中提出，利用在上海周围的胜利，不失时机地果敢追击，进攻南京。此时，日军乘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以8个师的兵力，分三路水陆并进，进逼南京。日军上海派遣军第11、第13、第16师沿京沪铁路及其以北进击南京。第10集团军第114师沿宜兴、溧阳、溧水公路前进；另以第6、第18师沿宁国、芜湖公路进攻芜湖，以断中国军队沿江往西的退路，国崎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攻占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后路。日军企图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11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召开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防守南京问题。会上多数高级将领认为，日军由京杭国道、京沪线和长江进逼南京，来势凶猛，而南京地处长江弯曲内侧，地形上背水，易攻难守。加以中国军队自上海撤退，战斗力受到削弱，短期内无法恢复，但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亦非上策，因而只能作象征性防守。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撤退。训练总监唐生智则坚持死守。他说，如果放弃南京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蒋介石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表示南京必须防守。此时，唐生智自告奋勇，表示愿意防守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唐生智到任后，于27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本人与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并预言“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付出莫大之代价。”他为表示破釜沉舟、拼死一战的决心，让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之间的船只撤走。其后，又命驻浦口之第1军禁止任何部队及军人由南京北渡，“如有不听制止者，可开枪射击。”

蒋介石把可以调动的兵力即调来防守南京，计有：宋希濂第78军、王敬久第71军、孙元良第72军、叶肇第66军、俞济时第74军、邓龙光第83军、徐源泉第2军团、教导总队和宪兵团等部，共计10余万人。这些大多数是刚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部队，未经补充休整，尚未恢复战斗力。

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到11月底，政府各机关已大部分迁至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长沙。

日军大本营于12月1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

12月2日，免去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兼职，任命朝香宫鸠彦王继任司令官，华中方面军即分路向南京逼进，决定夺取南京守军的既设阵地，准备攻城。12月5日，日军已到达南京外围阵地附近。当晚，日军第16师向第66军防守的句容阵地进攻，并从土桥镇、牧马场两翼迂回，另以一部由土桥镇转向新塘市断第66军后路。句容守军被围，与日军苦战，损失极大。

《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第18页。

《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9页。

6日上午，日军侵入孟塘。午后，日军进至高家庄、大胡山附近，第66军后方联络被切断。中国军队第36、第41及第66军各一部对该敌进行反击。日军第9师与守军第51师在湖熟镇展开激战，守军被迫后撤。

12月7日拂晓，日军猛攻淳化镇，中国守军英勇抵抗。8日，日军分别向东樵村、西庄附近包抄，企图断守军后路。第51师奋力抵抗，伤亡沉重，其第5营官兵牺牲甚多。在8日午后，该镇失守，中国军队撤至板桥镇。至此，日军已进入城郊，南京被围。同日，日军攻陷镇江炮台，第3师一部在此渡江，进击南京。

12月8日晚，日军向南京发起进攻。9日拂晓突进至光华门外大校场、通光营房。守军第87师后续部队赶到，将大校场日军击退。

12月10日，日军逼近南京城下，第114师、第6师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3峰同时进攻。当夜守军第156师选敢死队坠下城墙，将潜伏在城门洞内的日军及盘踞在通光营房的日军消灭甚多。12月12日，日军猛攻雨花台，守军第88师顽强抗击，伤亡惨重，中午雨花台陷落。第88师退守中华门。同日，敌第18师攻占芜湖，向当涂前进，中国军队后路被断。当日，日军以重炮猛轰中华门，城墙数处被轰塌，日军乘机蜂拥而入，守军抵挡不住，遂撤离中华门，于是南京城防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日军一部从中华门突入后，中日双方军队展开激战。接着光华门、中山门亦被突入。此时，日军国崎支队亦开向浦口，切断南京退向长江对岸的去路。

12月12日傍晚，唐生智接到蒋介石电令：“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随即召集各部队长官开会，下令一部渡江，大部实行突围。当时城内秩序混乱，军队难于掌握。唐生智率长官部少数人员在第36师掩护下由下关渡江而去。他所下达的突围令，只有第66军、第83军两部当夜由紫金山北麓和栖霞山附近突围成功，退至宁国一带，其他各部涌向江边。是夜从挹江门到下关一带，秩序混乱，纷纷争船抢渡。

南京之战，中国军队以10余万之众抗击日本侵略军。中国军事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不少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守军分别扼守正面很宽纵深浅短的外围和复廓阵地，缺乏机动兵力。战斗中，消极防守，被动应付，致使本可作为首都屏障、钳制敌人前进的金坛、句容、溧水等地轻易陷入敌手。负责策应作战的部队轻失芜湖，使中国军队陆上退路断绝，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致使守军在突围中，损失严重。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人城，肆意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日军国崎支队占领浦口，日军第16师进入下关，切断中国军队退路，并乘舰艇向江面正在撤退的渡船、木排射击。中国军队被敌枪炮击毙及舰艇撞翻而淹死者多达3000余人。

日军人城以后大肆“扫荡”，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当时城内剩下的居民和外地逃来的难民大部分已避入“安全区”。这个“安全区”，是11月下旬由留在南京的少数外侨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该委员会向中日双方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中国方面对之完全承认，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将区内军事机构全部迁出。日军当局也保证：“难民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安全区”内难民最多时达29万人。然而，“安全区”内并不安全。

12月13日上午，日军谷寿夫第6师由光华门、雨花门入城，立即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战斗目标，以各种火器射击，马路街巷之内顿时血肉狼籍、尸体纵横。14日，日军大部队涌入城内，继续搜杀街巷中的难民。日军在中山码头、下关车站等处对聚集江边的难民疯狂射击，枪杀数万人。

15日，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军人9000余人被押往鱼雷营屠杀。日军对集中在“安全区”的大批难民肆意屠杀。16日，从“安全区”搜捕数万青年绑赴下关煤炭港枪杀，将尸体推入江中。

在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大部分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士兵在被俘后惨遭杀害。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确认，“好些中国士兵在城外放下武器投降了。在他们投降后的七十二小时内，在长江江岸被机关枪扫射而集体的被屠杀了。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达三万人以上。”

12月17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后，对纵兵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最甚的第6师师长谷寿夫大加奖励。于是屠杀暴行愈演愈烈。展开了骇人听闻的“杀人竞赛”。

1937年12月，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在《紫金山下》的通讯中写道，“向井（敏明）少尉与野田（岩）少尉，举行杀人的友谊比赛，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就算赢得了锦标。在他俩碰头的时候，向井已杀了106个，野田已杀了105个，两个人拿着缺了口的军刀相对大笑。向井说，这一次竞赛，完全是很有趣味的事。”18日，日军将城郊难民及俘虏5,7万余人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猛扫，然后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浇洒煤油纵火焚烧。自12月下旬开始的“清街运动”和“难民登记”又使上万人头落地。日军野蛮地屠杀无辜的中国百姓，其手段之残酷，实在令人发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达20万人以上，仅掩埋的尸体即达15.5万人。日军进行集体屠杀后，往往将尸体焚化或投入江中，因此，被杀的中国军民总数在30万人以上。

日军进城后兽性大发，滥杀无辜，花样翻新，甚至杀人取乐。有的往难民身上先浇汽油，后用枪扫射，枪弹一着人身，火光随之燃起，被弹击火烧之难民，挣扎翻腾，痛苦之极，日寇则鼓掌狂笑，引以为乐。有的令难民脱光衣服，破冰入水捕鱼，看着一个个难民在水中寒栗万状，手舞足蹈。有的把难民杀后割下人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

日军除残酷屠杀之外，还大肆污辱中国妇女，肆意强奸、轮奸妇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而且奸污之后，残酷地将其杀害。

伴随着屠杀和奸淫的是大规模的抢劫和有计划的破坏。日军驾驶着汽车，直入各大公司、商店，将各种货物搬运一空，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抢劫之后，日军到处放火，南京城内主要街道的高大建筑物都被烧毁，断壁残垣，惨不忍睹。浩劫之下，昔日街市繁华的六朝古都成了一座尸横遍地、满目凄凉的死城。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还对中国图书、文献进行了大肆掠夺。根据日本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长的命令，日军派特工人员360人，士兵367人，苦1830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页。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

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十几辆卡车的图书，共抢去图书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这是日本侵略军对中国文化财富的野蛮大掠夺。

日军在南京灭绝人性的丑恶表演，连他们的盟友德国的代表在给政府的报告中也说，日军就是“兽类的集团。”日军空前野蛮的大屠杀并没有征服人们的抵抗意志，南京地区的抗日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着。

四、日本诱降及陶德曼斡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后，日本迅速向上海增兵。8月23日，日本第一批援军2个师投入上海作战，受到中国军队顽强阻击，陷于苦战。9月上旬，日本决定再增派3个师到上海。1937年9月13日，日军参谋部次长多田骏指出：“10月中旬，将在上海方面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也许是稍晚些时，但大概在同时，华北方面军将击败当面敌人，这将是媾和的最好时机，失去这个时机就会变成长期战争。所以从现在起，需要在外交方面开展秘密活动。”同日，日军参谋部制订《战争指导纲要》，决定以华北、上海方面决战为一个阶段，要利用这一阶段的决战成果，推动日中和谈。此时，日军同时在华北、上海两个战场作战，华北日军达8个师，上海日军亦达5个师，而日军统帅部估计11月左右，将会出现对苏作战危机，因此，9月20日，日军参谋部制订《作战计划大纲》，规定于10月上旬在上海、华北发动攻势，造成使中国屈服的机会，结束中日战争。

1937年10月2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决定“接受第三国公正的、劝告式的和平斡旋。”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象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这显然是赤裸裸地要求德国牵线搭桥，诱使国民政府妥协。

10月22日，德国外交部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德国愿意斡旋中日谈判。

10月30日，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转达了德国政府的意见，陈介表示希望知道日方的谈判条件。11月2日，广田向狄克逊提出了同中方谈判的条件。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命会晤蒋介石和孔祥熙，转达了日本提出的7项和谈条件，即：（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的“自治政府”；（2）将平津地区划为非武装地带，建立一个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亲日政权；（3）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设立国际警察队管制；（4）停止抗日政策；（5）共同防共；（6）降低日货关税；（7）尊重外侨权利。广田并威胁说，中国如不接受，日本将随着战争的进展，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攻陷上海，并占领苏州、常熟等地。11月下旬，日军向南京推进，月底，逼近南京。11月24日，布鲁塞尔会议以毫无作为而草草收场，使蒋介石企图借助西方大国遏制日本侵略的幻想化为泡影。全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453页。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34页。

〔日〕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20·日华事变》下，鹿岛研究所出版社，东京1973年版，第178页。

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并没有放弃与日本妥协、媾和的打算。它希望通过国际干预实现中日“和平”。蒋介石面对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于12月2日会见陶德曼，提出在以下条件下愿意与日本谈判：（1）停止敌对行动；（2）同意以日方提出的条件为谈判的基础；（3）德国参加谈判全过程；（4）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等。蒋介石一面对德国的所谓“调停”，表示衷心的感谢；一面又忧心忡忡地要求陶德曼和日方，对于今日采取的步骤严守秘密。并说：“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和平”。

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日本在华驻军相继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等傀儡政府，在这种状况下，因为胜利而洋洋得意的日本政府，于12月21日又提出了比先前的条件更强硬的要求，其基本条件是：中国放弃容共和抗日、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给予协助；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中国应给日本必要的赔偿，以上条件要求中国政府全部接受，并以战败国姿态表明对日乞和态度，限1938年1月5日、6日以前答复。日本这些贪得无厌的要求，就连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认为要中国政府接受是极端不可能的。

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方提出的新条件，转告给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中日秘密谋和的消息不胫而走，国内外报刊、通讯社都有所透露。蒋介石畏于共产党和人民的压力，以及国民党内多数不愿妥协投降的要求，不敢贸然接受这些十分苛刻的条件。日方为此表示强烈不满，1938年1月16日，日本宣布中止谈判。在当日近卫内阁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中，扬言要另外扶植伪政权，来“调整两国邦交。”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也于1月18日发表宣言，声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承认一切伪组织。至此，陶德曼的“调停”即告停止。

〔日〕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 20·日华事变》下，鹿岛研究所出版社，东京1973年版，第178页。
《法国外交文件》D辑第1卷，第780页。

第二节 徐州会战

一、津浦路南北两段的阻击战

日军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更为嚣张，于 12 月 24 日和 27 日相继占领了杭州和济南。12 月 14 日，日本在北平建立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8 年 1 月 16 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 月 18 日，又对上述用词补充声明，其含意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抹杀。日军华北方面军多次向统帅部提出“为使华北、华中连接起来，进行徐州作战以及对武汉之敌施加威压”的建议。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心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徐州是江苏省西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位于黄、淮两河之间，地据鲁豫皖苏 4 省要冲，为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周围，山峦重叠，河川纵横，在我国军事史上，向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中国军队控制着徐州，北可威胁济南，南可进逼南京，而且保持了我国军事上的大动脉——陇海路，确保郑县和平汉铁路南段的侧翼。

日军先后集中 8 个师、5 个旅（支队），约 24 万人，于 1938 年 1 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中国第 5 战区先后调集 11 个集团军和军团、64 个师，约 60 万人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见附图 5）

南线作战。从 1937 年 12 月中旬起，南路日军华中方面军指挥第 13 师从镇江、南京、芜湖渡江，沿津浦路北上，1938 年 1 月下旬，日军第 13 师主力攻占滁县、来安、明光、他河、藕塘，抵达池河东岸。日军第 13 师另一部攻占扬州后，即进击邵伯、天长一线。日军第 9 师一部攻占裕溪口后，循淮南铁路北进至巢县、全椒一线。中国第 5 战区的作战部署是：以李品仙之第 11 集团军和于学忠之第 51 军，利用淮河、淝河、佗河等地形障碍，阻止沿津浦路北进的日军。当正面北进日军向明光、池河镇一带进攻时，即为刘士毅所部第 31 军堵截。待日军从南京增调援军及重武器继续来犯，其主力被吸引到明光一带时，李品仙急令第 31 军让开津浦路正面，撤至铁路西侧山区伺机出击；同时，又以于学忠之第 51 军增援，由砀山南调至淮河沿岸，阻敌越河北进。至 2 月初，定远、临淮关、蚌埠等地相继失守。

2 月 8 日，日军向小蚌埠第 51 军阵地进攻，被中国守军歼灭 500 余人。2 月 9 日，日军强渡淮河。中国守军未能阻止敌军渡河。中国第 5 战区急调第 27 集团军之第 59 军及第 21 集团军第 7 军增援。2 月 10 日，中国军队于学忠之第 51 军所属第 114 师在王庄阵地同日军展开激烈争夺，几经血战阵地失守，中国军队伤亡 2000 余人。2 月 13 日，张自忠率第 59 军抵达淮河流域，在瓦疃集、姚集、固镇、蒙城一线，接替第 51 军战斗。

于此同时，廖磊率第 21 集团军到达合肥、舒城、八斗岭、下塘集之线。中国军队以第 51、第 59 军在淮河北岸节节抵抗；以韦云淞之第 48 军固守炉桥、洛河一线；刘士毅之第 31 军和周祖晃之第 7 军对日军侧背进行袭击。2

[日]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 年增印，第 479 页。

月 11 日，第 31 军围攻上窑，守军冲入圩内与敌肉搏，敌 300 余人向考城逃窜，日军被歼 100 余人。

2 月 16 日，周祖晃之第 7 军由张桥镇、老人仓一线向池河、定远日军展开侧击，并一度攻入桑家涧，日军不得不抽调淮河地区主力 6000 余人增援考城、上窑、他河、定远。

当日军回援淮南之时，张自忠之第 59 军乘机向火神庙、新桥日军反攻，敌退向曹老集。第 59 军分向苏集、湖口子、曹老集、王庄之线推进，将日军驱逐至淝河南岸，并朝淮河北岸推进。日军腹背受敌，无力再向北进攻，乃全部退回淮河南岸，沿邵伯、天长、盱眙、临淮关、蚌埠、怀远、三十里铺之线与淮河北岸中国军队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

北线作战。日军华北方面军第 2 集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两个师分路南下。一路由华北方面军板垣征四郎的第 5 师（该师于 1938 年 1 月配属第 2 集团军）沿胶济铁路东进，19 日与其海军会师青岛。旋即南下，连占沂水、蒙阴等地。至潍县后，沿台潍公路南下，试图夺取鲁南要地临沂，从东路进攻徐州。

2 月 21 日，日军第 21 旅旅长坂本顺率 3 个步兵团、1 个炮兵团、1 个骑兵团，共约 2 万人，向临沂突击，沿途遭到中国第 3 军团等部的节节抵抗。日军连陷诸城、莒县、沂水，于 3 月 5 日到达临沂以北之汤头、白塔一带，距城仅 10 余里。3 月 10 日，日军在坦克、飞机与炮兵火力掩护下，向临沂猛攻。

中国驻临沂守军实际兵力仅有 5 个团，以及从青岛撤退的海军陆战队。与日军激战后，守军庞炳勋部伤亡极大，连电告急。第 5 战区即令张自忠之第 59 军从肤县附近紧急驰援临沂，第 59 军于 12 日抵达临沂北郊之沂河西岸。

3 月 14 日凌晨，第 59 军强渡沂河，向敌发起反击，经数日激战，连克亭子头、大太平、申家太平、徐家太平、沙子岭等多处敌据点。3 月 16 日，日军向第 59 军石家屯东南至大安子、崖头、刘家湖、钓鱼台之线阵地反扑，敌机狂轰滥炸，第 59 军第 38 师伤亡虽重，仍然坚守阵地。

18 日，第 59 军与第 3 军团从东、南、西 3 面夹击汤头、王疃、傅家池附近日军，经过 3 天激战，先后攻克李家五湖、辇沂庄、车庄，日军被击退，向官具逃窜，中国军队取得临沂第一次胜利。这次战斗，张、庞两军共伤亡 3000 余人，日军亦伤亡约 3000 人。

3 月 20 日，第 59 军主力奉命调费县方面作战，日军第 5 师增援到达后，于 23 日再向临沂发动猛攻，庞炳勋部守军伤亡甚重，形势危急，第 5 战区又令第 59 军星夜驰援临沂，3 月 24 日，该军赶回临沂西北向日军侧背发起进攻，并派出一部增援庞部确保临沂。敌凭借优良装备，全力反扑。第 59 军奋战至 29 日，敌损失惨重。张自忠下令全线出击，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取得临沂第二次胜利。临沂保卫战的胜利，使日军第 5、第 10 师会师企图失败，为尔后台儿庄歼敌奠定了有利基础。

另一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 2 集团军之第 10 师沿津浦路南下。津浦路北段保卫战，原由中国军队第 5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 3 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由于韩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25 日，日军进占周村。

27 日占领济南。1938 年 1 月 1 日，矶谷廉介所部第 10 师占领泰安。1

月上旬，韩复榘所部放弃大汶口、济宁，退至曹县、城武（今成武）、单县一带，使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被打开，日军沿铁路线向南推进。韩复榘擅自撤退，被判处死刑，改任孙桐萱（原韩部所辖第12军军长）为第3集团军总司令。

2月10日，李宗仁为确保徐州地区安全，令孙桐萱部向运河以东推进，袭取济宁。2月14日，第22师渡运河，攀登入城，与济宁城内日军展开巷战。敌我短兵相接，由于日军大批增援，该师伤亡甚重，17日晚撤至运河西岸。

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突破曹福林之第55军阵地。24日，日军猛攻第12军阵地、25日进占杏花村阵地。中国守军向新泰、蒙阴发动反击，收复蒙阴。第3集团军与日军激战，歼敌1000余人，该集团军也伤亡3000余人，钳制了日军第10师一个旅，支持了津浦路正面的作战。

二、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3月上旬，日军第2集团军向参谋部申请增加兵力，追击当面之敌，得到批准。第2集团军即指示第10师向滕县进攻。又令第5师从临沂向峰县推进，配合第10师作战。第10师以第33旅为基干组成濰谷支队，于3月14日开始由邹县以南之两下店沿津浦路南进，当日攻占界河，并迂回守军第22集团军之侧背。

15日到达滕县，16日向滕县发动进攻，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

中国军队第5战区孙震第22集团军命令所属第41军第122师拼死防守滕县。17日，日军向滕县发动猛烈进攻，当日下午攻入西城。守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伤亡甚重，第122师师长王铭章殉国。

18日滕县、临城陷落。

20日韩庄、峄县失守。

中国第5战区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保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令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的3个师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令汤恩伯的第20军团以一部担任台儿庄至韩庄间运河南岸防务，以两个军向峰县（今晖城）、枣庄日军侧背攻击，准备配合孙连仲部围歼敌人。3月24日，蒋介石到徐州视察。同时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第一厅（作战厅）厅长刘斐等组织临时参谋团，于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白崇禧离武汉赴徐州前，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其寓所，商讨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对白说：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第4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在徐州以北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深加赞赏。

此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见李宗仁，劝李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张爱萍到徐州向李宗仁讲了几条：一是日本侵略军占济南后南下，孤军深入，骄兵必败；二是济南以南

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可以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李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并要张转告周恩来。

3月24日，日军濑谷支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向台儿庄猛攻，与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第31师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日军不断增加兵力，配以坦克、重炮实施攻击。

27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31师与敌展开了拉锯战，守军伤亡甚重。

28日，突入台儿庄之日军，被守军第31师围攻，损失甚重。29日，中国守军第20军团奉命以一部于30日对峰县佯攻，以钳制该敌南下，另以一部速向泥沟前进，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附近之敌，并极力破坏铁路、公路，遮断峰县与台儿庄之联络，并与进攻峰县之友军部队竭力阻止峰县南下之敌。

当日，中国军队第2集团军之第27师继续对日军展开进攻；第31师对台儿庄内之日军攻击；第30师分向南洛、三里庄前进，截断日军联络，阻止日军增援。蒋介石也在此日下达了死守台儿庄的命令。李宗仁遂令第2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再次严令汤恩伯部南下，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之敌。

3月30日，日军濑谷旅长鉴于福荣团在台儿庄被中国军队南北围攻，急令赤峰团驰援，濑谷亦亲自赶赴前线督战，全力对台儿庄守军展开激战。31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正当濑谷支队处于危急之时，日军第2集团军令攻击临沂的坂本支队于29日停止攻击，转向台儿庄驰援，该支队31日到达向城、爱曲地区，侧击第20军团。第20军团遂即命第52军和刚到的第57军一道围攻坂本支队，经数日激战，予日军以重创，使坂本支队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据日军《步兵第10团战斗详报》记载，台儿庄中国守军“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堑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

4月3日，中国军队向台儿庄之日军发起攻击。日军拼力争夺，占领了市街大部。守军逐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据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5日，蒋介石电汤恩伯：“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

6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第2集团军和第20军团围歼被围之濑谷支队。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峰县附近固守待援外，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

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歼灭日军1万余人。它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36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8页。

三、徐州外围战及中国军队撤退

台儿庄战役中，日军大本营发现中国在徐州地区集结重兵集团，认为是给中国军队主力一打击，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好机会。4月7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决定华北方面军以第5、第10、第14、第16师共4个师，向陇海沿线进攻，封锁兰封（今兰考）以东地区，切断中国军队退路，以主力南下进攻徐州，以1个师从兰封向商丘方向进攻，切断中国军队退路；命华中派遣军以第9、第13两个师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并占领徐州要地和津浦铁路全线。为协调华北、华中日军的军事行动，4月中旬，日军大本营还派出以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桥本群少将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到中国，进行协调和联络，指导南、北两兵团作战。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遂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徐州地区同日军进行决战，使第5战区的总兵力由初期的29个师增加到64个师另3个旅，约45万人。李宗仁将第5战区军队编为5个兵团：3个军组成淮南兵团，由李品仙任司令；4个军组成淮北兵团，由廖磊任司令；9个军组成鲁南兵团，由孙连仲任司令；3个军组成陇海兵团，由汤恩伯任司令；2个军组成苏北兵团，由韩德勤任司令。各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分别阻击日军。5月中旬，日军开始进攻徐州。在徐州北战场，5月1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集团军第14师从濮县地区南渡黄河，以一部到内黄集附近，截断了陇海铁路交通线。5月9日，日军第16师从山东济宁南下，向砀山、唐寨地区疾进，从西面攻击徐州。5月15日，日军第5师在鲁南同中国军队激战数日后，渡运河，向宿县推进，尔后进攻徐州。在徐州南战场，5月5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开始北进。5月9日，第13师攻占安徽蒙城，13日到达徐州西南的永城，从西南面包围徐州。5月10日，日军第9师北上，经蒙城、永城向徐州西南地区进攻，16日进入萧县附近地区，逼近徐州。从南京附近参战的日军第3师也随之沿津浦铁路急速北进，5月15日陷大营集之后，即在第9师右翼支队配合下向徐州推进。至此，南北两路日军完成了对徐州地区的包围。

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中国军队第23师师长李必蕃率部在鲁西菏泽战斗中，壮烈牺牲。中国军队第173师副师长周元率2000官兵在皖北蒙城防御日军进攻，拼死激战，周元和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在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台围的险恶形势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

16日，第5战区下达撤退命令，以刘汝明的第68军于徐州掩护撤退，以第24集团军留苏北，第69军及海军陆战队在鲁南、鲁中进行游击作战，主力分5路向徐州西南方向突围。各路大军突破日军的封锁线，撤向豫、皖之间山区。第68军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之后，于5月19日放弃徐州。至21日，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突破日军的包围，向皖北和豫南转移。

在第5战区部队突围之时，日军乘机占领了徐州及其附近地区。徐州失陷后，日军大本营又决定“扩大徐州会战战果”，进行追击作战。5月21日，日军大本营下令进攻兰封、归德（商丘）、永城、蒙城以东地区。29日，又下令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地区。按照日军大本营的命令，日军分兵数路，沿陇海路两侧向西追击。5月22日，日军第10师开始西进，相继攻

占亳县、拓城,6月5日到达太康。5月21日,日军第16师从徐州附近出发,相继攻占砀山、马牧集,5月21日到达归德。归德守军顽强抵抗两天后撤退。日军占领归德、杞县、通许、尉氏、朱仙镇。日军第14师于5月17日到达内黄集,准备进攻兰封。驻守鲁西南的中国第1战区薛岳兵团,为掩护第5战区部队突围,在兰封地区发动反击,与日军第14师激战。日军第14师于5月24日攻占兰封,遭中国军队包围,激战至30日,中国守军退却。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企图攻占郑县,然后沿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遂下令第10师向郑县推进。6月6日,日军第14师攻陷开封,7日又陷中牟,10日,该师骑兵团到达新郑南郊,炸毁了平汉铁路,12日炸毁了新郑南面的平汉线铁路桥。切断了平汉铁路线,郑县告急。

为阻止日军进攻,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竟于6月9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向奔泻而去,平汉线以东中牟、尉氏、扶沟一线,直到安徽、江苏,成为一片汪洋。6月12日之后,日军第14、第16师遭受洪水泛滥的威胁,乃组织向东撤退。花园口决堤虽暂时阻挡了日军的继续西进,但是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近90万人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如此“以水代兵”阻敌前进,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

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正面战场又一次大的会战。双方均投入数十万兵力,历时4个多月。日军虽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妄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国策却未能实现。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达到了一定的战役目的,为部署尔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宝贵时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尤其台儿庄大捷给了日军以有力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台儿庄之战是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的形势下进行的。作战的胜利主要是由于第5战区广大官兵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取得的,是由于及时捕捉战机,集中兵力围歼突出冒进之敌而奏效的。台儿庄战役固然取得胜利,但是由于受单纯防御战略思想的束缚,消极保守,台儿庄大捷后,未乘胜扩大战果,集中全力击破疲困之敌,致使日军濰谷支队残部和坂本支队余部撤至有利地形固守待援,尔后又未集中兵力,打击日军增援来的一路或数路,发展胜利,竟坐视日军从容地调整部署卷土重来。国民党军在徐州东北方向基本以阵地战实施重点防御,约30万大军被日军钳制,而未能抓住战机,以机动部队实施有力反击,或迂回敌侧后,战局呈现被动之势,且徐州以西、以南之后方兵力薄弱,致使日军乘虚而入,最后导致徐州失利。徐州会战对中国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国军队失去了钳制日军的战略要地和防御武汉的屏障,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这就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三节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

一、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虽然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拒不承认湘、赣、粤、浙、闽、鄂、豫、皖8省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的合法地位，仍调集重兵进行“围剿”。“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当局虽停止了军事“围剿”，但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红军游击队，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1日发出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特别强调：各红军游击队“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随后，中共中央又针对谈判中出现的问题，多次指示南方各红军部队：要坚持独立自主，拒绝国民党派人来游击队任职；不能无条件地完全集中，游击队驻地应背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不要移驻大地方，严防国民党的暗袭及破坏，避免重蹈闽粤边、湘鄂赣等地区的覆辙；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避免陷入右倾机会主义，指示要求各游击区的党和军队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应在党内外、军内外大力宣传党的政策，说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教育全体军民认清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对它可能采取的各种阴谋手段，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以及陈毅、曾山、张云逸等负责人分赴各游击队，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部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多数游击队都能根据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地分析形势，坚定而灵活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如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政权改用国民党政权的名称，游击队由国民党给予番号等，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各游击区先后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

中共中央在正确指导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同时，还派出代表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成立1个军，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于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始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4页。

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何鸣，与国民党谈判后，率部近千人到漳浦城集中，于1937年7月16日被国民党军包围，除部分突围外，大部被解除武装。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在改编时曾接受国民党派人任副司令等职。

书记。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2月上旬，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之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竹沟集结改编。全军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第1、第2两团，共23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3、第4两团，共1800余人；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5、第6团，共2100余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980余人。全军共1.03万余人，各种枪6200支（挺）。

1938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在开进途中，各部队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模范地执行群众纪律，受到沿途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称赞，在2~4月间，第1、第2和第3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4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会合后进至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继之，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二、京沪杭地区沦陷后中共中央开辟华中的方针和部署

京沪杭地区沦陷后，日本侵略军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仅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即有30余万人民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全市房屋1/3化为灰烬，在日本侵略军“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蛊惑下，沦陷区汉奸猖狂活动，到处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四处流窜抢劫；豪绅地主、帮会首领、土匪头目，纷纷收集武器，组织或扩充武装，自封“司令”，各霸一方，敲诈勒索。广大人民陷入国破家亡的痛苦深渊，迫切要求抗日自卫。

1938年春，敌华中派遣军协同华北方面军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地区后，国民党军队和旧政权机构大部撤走，苏浙皖大部地区已成敌后，然而敌军兵力不足，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尚无力顾及，伪政权亦刚刚建立，力量薄弱，这对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有利时机。特别是，由于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提出和实行，以及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迅速开展，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人民迫切希望新四军迅速挺进华中敌后，打击日本侵略军。而且，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苏浙皖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抗日武装，这就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创造了条件。

根据华中的战略地位、形势及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毛泽东于1938年2月15日，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指出：“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5月4日，毛泽东又对新四军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5月14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根据华北的经验，在

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胆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组织游击队，扩大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和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三、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新四军于5月间向所属各部提出该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同时，还具体地分析了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指出我军活动于交通发达的平原地区加之河川湖泊纵横，虽有小山，但公路甚多，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活动；而我军缺乏平地、河川战斗经验，以及与近代装备的敌人作战的经验；但是，敌人兵力不足，空隙地区甚多，而且我军素能团结群众，即使地形不利，同样能开展游击战争。并且强调指出：“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是开展游击战的最基本条件”。基于上述条件，新四军军部在指示中提出，本军的作战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歼灭大的敌人。”

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和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在大江南北同日伪军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

第1、第2支队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苏南地处京、沪、杭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该地区沦陷后，汉奸、土匪活动猖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开展苏南敌后抗战，钳制向华中内地进犯之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新四军以第1、第2、第3支队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由第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28日由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5月中旬，先遣支队到达苏南镇江地区。与此同时，第1支队在陈毅率领下由岩寺出发，挺进苏南。6月中旬，第1支队到达苏南溧水竹箴桥，随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并积极向京沪、京芜铁路及各公路线薄弱之敌展开袭击和破击作战。

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于镇江西南之韦岗，伏击乘汽车由镇江开往句容的日军。经半小时激战，毙伤日军少校以下20余人，击毁敌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新四军江南首战告捷，意义重大，在日军华中派遣军指挥机关附近的京沪铁路一侧，歼灭日军车队，不能不引起敌人的震惊。这一胜利更使苏南渴望解放的人民看到了光明，振奋了民心，提高了新四军的声誉。陈毅即兴作诗一首：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7月1日夜，新四军第1支队以第2团在丹（阳）北地区8个乡人民自卫团和千余群众的配合下，袭击镇江东南的新丰车站，突击队乘日军熟睡，攻入车站，并向顽抗之敌实施火攻，一举消灭日军40余人，摧毁其车站大部设施，并拆除一段路轨，使敌京沪铁路交通一度中断，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8月12日，第1支队第2团，夜袭京杭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句容城。突击部队由东南门之间架梯袭入城内，将敌逼退至县政府和教堂固守，在歼日伪军4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是袭击敌占中心城市南京附近的县城，对敌人的震动和对群众的影响颇大。新四军第1支队在京沪铁路、京杭公路连续获胜，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日军在加强城镇交通线守备的同时，调集兵力寻找新四军部队作战。8月23日，驻金坛之日军200余人乘船两艘出犯，其一艘沿丹（阳）金（坛）漕河北进。第1支队第2团遂于敌必经之珥陵镇设伏，毙伤其40余人，给出犯之日军以有力打击。

1938年7月，在第1支队挺进苏南后，张鼎丞率领第2支队进入苏南敌后，展开于京芜铁路以东、京杭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积极打击日伪军，并破坏其交通线。8月22日，日军调集4500余人，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由秣陵关、溧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分8路水陆并进，围攻小丹阳地区第2支队，企图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第2支队为打破日军的围攻，以1部兵力转至日军合围圈的外线，向当涂、陶吴等地日军据点袭击，钳制和调动敌兵力；另以一部兵力在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广泛袭扰和阻滞日军的进攻；以支队主力大部于小丹阳以西杨家庄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打击日军薄弱之一路，为配合第2支队的反围攻作战，第1支队主力和地方武装在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向京杭、京沪、句丹等公路展开广泛的破袭战，并派出小分队深入南京近郊袭击麒麟门等日伪据点，钳制敌人，进行策应。23日，日军由溧水、秣陵关、当涂三面对小丹阳地区形成包围，数路合击小丹阳。第2支队主力于鸡笼山给进犯之日军以有力打击后，迅速转移。日军合围失败，又遭到不断袭击，被迫于26日开始撤退。9月以后，日伪军又连续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多次“扫荡”。至12月，苏南地区军民先后粉碎日伪“扫荡”近30次，沉重打击了敌人，初步巩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第1、第2支队在对日军作战的同时，还大力摧毁伪政权，并正确对待当地各种武装。由于第1、第2支队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因而，绝大部分游击武装均愿与新四军合作共同抗日。其中丹阳抗日自卫团，在第1支队的指导下获得了发展，扩大到4000余人，扩建为丹阳县游击纵队。与此同时，第1、第2支队还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成立租息调解委员会，实行减租减息，稳定了社会秩序，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不少青壮年自动参军，群众主动支援军队作战。第1、第2支队还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陈毅还亲自争取了茅山地区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促使他们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战。

第3支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第3支队亦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60公里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区面对敌之长江交通线，日军经常出动“扫荡”，战斗频繁。9月底，第3支队在担任坚守青弋江阵地防御战中，多次

击退小股敌人的袭扰。10月29日，日军在湾址、凤凰闸、大洋桥等地集结800余人，准备向青戈江阵地进犯。第3支队以第6团一部在马家园、十甲村一线正面阻敌，以第5团一部在跑马山一带，待机向进犯马家园之敌实施侧击，并控制有力的预备队，伺机反击。30日，日军500余人由湾址向青戈江阵地发起进攻。第3支队于清水潭与日军展开激战，歼敌100人后，主动撤出战斗。11月3日，日军继续增兵后向马家园围攻。第3支队以主力向敌实施反击，并以小分队夜袭敌人的湾址及九里等据点，日军前后受袭，被迫于4日撤退。经四日连续作战，第3支队共歼日伪军300余人，给敌以重创，巩固了皖南前线阵地。

第4支队挺进皖中敌后

1938年4月底，新四军第4支队即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展开。5月上旬，该支队先遣队东进至巢县以南地区，12日，第9团一部在运漕河西岸蒋家河口伏击敌人，江北首战告捷，歼敌20余人。7月间，第9团4个连，袭击运漕地区伪军，毙其50余人，俘伪副司令以下100余人，缴获步枪150支，轻机枪6挺。9月3日，该支队以两个营在桐城以南的棋盘岭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部队，经半小时激战，一举毙敌70余人，俘4人，击毁汽车50余辆，取得了伏击战的重大胜利。此时，当地封建势力乘机搜罗上匪，勾结日伪，破坏抗战，第4支队于10月下旬攻克庐江、无为两县城，歼灭反动武装共3000余人。

为贯彻东进方针，开展江北地区统战工作，加强对皖中抗日战争的领导，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令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北上，11月抵达无为地区，当即与国民党桂系军队建立了统战关系，将庐江、无为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同时，第4支队又以一部推进至淮南铁路以东开展游击战争。第4支队经过半年的作战，打开了皖中地区抗战局面，使皖中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游击支队东进豫皖苏边区

1938年9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关于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开创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边区部队沟通联系的指示精神，决定开创豫皖苏边根据地，并以省委武装部长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300余人挺进豫东。9月30日，新四军游击支队由竹沟出发东进，经遂平于10月11日到达西华社岗，与豫东游击第3支队一部及先遣大队台编，扩大为3个大队，共1000余人，仍称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向鹿邑前进。10月27日，游击支队进至淮阳以北20余公里的窦楼时，遭到戴集的日军100余人进攻。该支队随即以直属队扼守窦楼，另以一部占领马菜园以北有利地形，钳制敌人，支队主力以勇猛动作，对进攻之敌翼侧实施包围，经两小时激战，歼日军数十人，残敌仓惶窜回戴集。游击支队在东进中取得初战胜利，给当地人民以很大鼓舞。

11月下旬，游击支队进入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相继取得西陵寺、陈寨、宋庄等战斗的胜利。随后，又粉碎睢、杞、太、商（丘）地区日伪军2000余人的“扫荡”，初步打开了豫东敌后的抗战局面，为发展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四军自成立至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较为顺利地完成了集中、改编和向华中敌后挺进的任务。在长江下游苏皖地

区的广大农村，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群众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经半年的英勇奋战，取得 100 余次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 3300 余人，初步实现了在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成为插向日军华中派遣军背后的一把尖刀，钳制了日军的兵力，支援和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对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的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十五章 武汉保卫战及广州作战

第一节 武汉保卫战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4个半月。会战由中国第9战区和第5战区联合实施，它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一、日军进攻武汉的战略企图和部署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的作战，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暂时搁置。1938年4月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亦决定实施武汉作战，在制定徐州会战计划时，即“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并把将来进行武汉作战也考虑进去。”5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决定了在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决定如此重大作战的理由是：“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统治中国。”

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日本政府研究国策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在提出的《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一文中称：“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武汉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6月24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规定：“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大概以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为前提，使内外各种措施均适应于此。”并于五相会议的前一天，发表了政府关于确立战时体制的声明，宣称日本有史以来之大军，于陆海空重事奋战，以达成帝国所期之目的，国家凡百施設，不可不集中于贯彻战争目的，确立官民一体长期持久之战时体制，以对应时局。为了配合进攻武汉的作战，7月12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又决定了对华谋略，其方针和要点是：“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其纲要如下：（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识，同时，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44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86页。

〔日〕木户日记研究会：《木户幸一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24～326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89页。

酿成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形势。（二）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三）利用、操纵反蒋系实力派，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四）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五）设法造成法市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六）为便于完成以上工作，应进行必要的策略性的宣传。”

关于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原拟以 1 个集团军沿平汉线南下，1 个集团军沿扬子江进攻，但由于考虑到华北“治安”不良，抽调兵力有困难，遂改变力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面地区，以 1 个集团军沿扬子江进攻。6 月 12 日，因黄河决口，淮河泛滥，主力沿淮河水运前进困难，又确定主力沿扬子江进攻，另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

根据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和日本政府的已定方针，6 月 18 日，日军大本营以大陆命令第 119 号下达了实施汉口作战的准备命令。其要点是：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华中派遣军应于扬子江及淮河的正面逐次向前推进，占领地盘，准备下一步的作战；华北方面军应准备进行部分作战，钳制敌人于北方，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其参谋总长据此指示：华中派遣军利用安庆作战之成果，与海军协同，伺机占领黄梅、九江之线。华北方面军应以一部分兵力向郑县方面挺进，钳制敌人，策应华中派遣军向汉口的作战。

日军根据大本营指示，将徐州会战后正在豫东、皖北地区的第 10、第 16、第 9、第 13、第 6 等师转移南下，集结合肥地区。又从华北及日本国内调遣部队，以加强华中方面冈村宁次指挥的第 11 集团军，增强逆江作战兵力。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 34 个师，其中日本本土只有 2 个师。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 14 个师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 2 集团军和第 11 集团军共 9 个师的兵力，约 25 万余人，以及海军第 3 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 120 艘，各型飞机约 300 架。

7 月上旬，日军大本营颁布华中派遣军新作战序列：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畑俊六
第 2 集团军司令官	东久迩宫稔彦王
第 3 师师长	藤田进
第 10 师师长	筱畑义男
第 13 师师长	荻洲立兵
第 16 师师长	藤江惠辅
第 11 集团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
第 9 师师长	吉住良辅
第 27 师师长	本间雅清
第 101 师师长	伊东政喜
第 106 师师长	松浦淳六郎
第 6 师师长	稻叶四郎
直辖兵团	
第 116 师师长	清水喜重
第 18 师师长	牛岛贞雄
航空兵团	

日军进攻武汉的部署为：第11集团军辖5个师集结九江附近，攻占黄梅、九江后，在瑞昌、德安一线依次集中兵力，分兵沿长江及两岸从正面进攻武汉并切断粤汉线，迂回武汉以南，从东、东南两面合击武汉。日军沿长江南岸向武汉推进为主要进攻方向。第2集团军辖4个师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向武汉推进，进攻信阳，切断平汉线，从北面包围武汉，进行配合作战。派遣军直辖3个飞行团协同陆军作战，海军第3舰队溯江西上，掩护并配合陆军攻占沿江要塞，攻取武汉。（见附图7）

二、中国保卫武汉的政治动员及作战方针和部署

自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全民族的力量空前团结，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日本侵略军进行英勇的作战。但在中国，主要在国民党内，存在着悲观的“亡国论”和轻敌的“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台儿庄大捷后，“速胜论”在国民党内迅速抬头。徐州失陷后，“速胜论”销声匿迹，但“亡国论”又迅速抬头。为肃清“亡国论”和“速胜论”在全国军民中造成的思想混乱，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深刻揭示了中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到战争的发展进程，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坚定了全国军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武汉保卫战时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关系最好的时期。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通过了召集国民参政会的决定。国民政府还成立了一些抗战机构，一度开放了一些党禁，有限度地给人民以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等权利。

在徐州会战前，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保卫武汉的任务，并派遣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工作，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日寇现正倾其全力继续向我国进攻，中国的西北部、中部与我们的首都武汉正在危急中。在全国人民面前，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强全国团结，不屈不挠，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建议用一切方法动员全国人民誓与日寇战斗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同汉奸亲日派分子做严厉的斗争。”强调“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以击破敌人前进部队，消耗敌人的力量。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以达到收复失地，创立许多抗日根据地与支点的目的。”1938年7月5日，毛泽东等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建议：“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之，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与此向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武汉保卫战的宣传与动员，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打击了“亡国论”的反动气焰，促进了全国抗日的

高潮。

这一时期，武汉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从全国各地来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与武汉青年一起，先后组织了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工人抗日自卫队、农民抗日自卫队、战地服务团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更是利用各种形式，团结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武汉地区的“七·七”周年献金活动、做慰问袋和写慰问信的活动、百万棉背心征募活动、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等，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拥护和响应。武汉医药征募会举行讲演会，组织宣传队分赴各街道及轮渡码头、车站等处讲演，征募慰劳费，募捐前线受伤将士极需的医药品。武汉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积极征募棉背心、布鞋、毛巾、牙刷等慰问抗日官兵，当时，在武汉三镇设立了6座固定的献金台，献金之热烈令人感动。从沦陷区跋涉来汉的避难同胞，将节衣缩食的钱献给国家；老年人献出积蓄；工人、小贩等献出劳动挣来的钱；流亡的青年学生在献金台附近擦皮鞋，把所得投入献金柜内；文艺界举行献金公演，将报酬全部献出；妇女中有人献出心爱的戒指和耳环等。许多在武汉的外国朋友及华侨也踊跃献金。这一切使“保卫大武汉”的抗日救国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推动的抗日救国运动，对国民政府积极组织武汉保卫战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7月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提案和建议。这对推动国民党抗战，特别是促使国民政府准备武汉保卫战起了积极作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2月13日，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1938年日军攻陷瑞昌之后，又制定和完善了武汉保卫战的作战计划，其作战指导方针是：“国军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先摧破敌包围之企图，尔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指导要领是：“第五战区应以现在态势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第九战区应极力维持现在态势，并须确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使尔后作战容易，尤须先击破经瑞武路及木石港西进之敌。”“武汉卫戍部队准备改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13师）准备推进使用于五战区，3师、55师使用于九战区与敌决战。”“第一、二、三各战区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

国民政府保卫武汉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军队于华中地区，运用第5、第9两战区兵力，以粉碎敌继续进攻能力，重点防御江南地区，节节抗击敌向武汉的进攻，消耗敌军，以换取至少4个月的时间。确定中国军队防御的重点

《武汉日报》，1938年4月10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60～662页。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5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206页。

放在武汉外围：一是部署重兵坚守马当要塞，把日军阻止于鄱阳湖以东地区，阻止其溯江西犯；二是在武汉外围部署主力军，利用鄱阳湖和大别山以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沼等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从南昌、九江、黄梅、皖鄂边境、豫鄂边境之大别山一线为第1防御地带，实施这次抵抗；以田家镇、广济、罗田、麻城、武胜关一线为第2防御地带，进行决战。

划分战区，调整兵力部署。徐州会战后；中国守军第1战区程潜所部主力退至河南信阳以西，第5战区李宗仁所部则退守鄂豫皖边境大别山一带。第3战区顾祝同所部驻守九江以下的长江南岸一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适应当前作战局势，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决定调整作战序列，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新编组的第9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主要防御鄱阳湖西岸及田家镇要塞以东地区，防止敌人突破防御阵地，所辖第1兵团在南昌至德安附近鄱阳湖西岸一线组织防御，阻敌西进；第2兵团在德安至九江一线组织防御，阻止敌人沿长江进攻武汉。第5战区所辖第3、第4兵团担任长江以北、大别山东麓地区的防御；武汉卫戍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固守武汉核心地区和武汉外围沿江要地。

1938年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成武汉会战中国军队作战指挥序列：

总指挥：蒋介石

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长江南岸）

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

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辖第32、第18军）

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

第29军团军团长李汉魂（辖第64、第70军）

第37军团军团长王敬之（辖第25军）

第4、第8、第66军

第74、第29军

鄱阳湖警备司令部

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

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辖第72、第78军）

第3集团军总司令孙桐宣（辖第12军）

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辖第13、第98军）

第32军团军团长夫麟征（辖第52、第92军）

第11军团军团长田北要塞指挥官李延年（辖第2军）

田南要塞指挥官霍揆彰（辖第54军）

武汉卫戍区总司令罗卓英

江南区指挥官周岳（辖第75军）

江北区指挥官万耀煌（辖第6、第16军）

武汉警备司令郭忏（辖第94军）

第37军

湖北全省防空部队

第30军团军团长卢汉（辖第60军）

第26军团军团长万福麟（辖第53军）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白崇禧（代）（长江北岸）

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

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兼）（辖第30、第42军）

第26、第55、第87军

第4兵团总司令李品仙

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缙绪（辖第44、第67军）

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兼）（辖第84、第48军）

第28军团军团长刘汝明（辖第68军）

第26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辖第10军）

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辖第31、第7军）

第19军团军团长冯治安（辖第77军）

第27军团军团长张自忠（辖第59军）

第24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辖第57、第89军）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辖第20军）

第51、第71、第45军

第17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辖第1军）

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各兵团部队自6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准备。苏联援华志愿航空大队参加了这次会战。

三、武汉保卫战作战经过

日军进攻武汉分两个方向。一是以第11集团军沿长江及其沿岸地区向西进攻武汉。此为日军主要进攻方向。二是以第2集团军自合肥地区西进，沿大别山北麓西犯，然后沿平汉铁路地区南下进攻武汉。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从6月到10月底同日军展开一系列的防御作战。

（一）长江及其沿岸地区的防御战

从淞沪会战到南京失守，华中战场的中国军队遭受严重损失，当时南京到武汉间的封锁线尚未完成，长江沿线空虚。但是，日军未沿长江西进。徐州会战后，日军以3个师沿陇海路西进，准备由豫东平原和皖北地区沿平汉线西犯，席卷郑县、开封，然后南下信阳，与沿长江进攻的另1个集团军协同进攻武汉。但黄河决堤挡住了豫东日军的进攻势头。日军大本营又改变部署，以主力沿长江、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中国军队的武汉防御阵地由对北及东北变为对东和东北正面。日军集结在淮河两岸的主力华中派遣军第11集团军约6个师沿长江西进。

1938年6月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命令第6师，从庐州（合肥）附近南下进攻安庆，第6师坂井支队因阴雨天气及道路破坏，前进缓慢。为增强突击力，日军华中派遣军调驻台湾的适应亚热带气候作战的波田支队担任溯江作战的先遣部队，协同海军沿长江进攻安庆。6月11日夜，该支队在海军20余艘舰艇护送下驶抵安庆附近水面。翌日凌晨，波田支队在大雨中偷袭登陆，向安庆进攻，迅速占领了城郊的飞机场，守军杨森第27集团军所属1个师及

保安部队未经力战，安庆即于12日沦陷。中国军队第27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在安庆西北集关等地继续阻敌前进，主力则向太湖方向转移。

日军华中派遣军攻占安庆后，为隐蔽沿长江西进的主要作战方向，指示所属进行欺骗宣传报道，企图引诱中国军队把注意力从日军的溯江作战转移到江北陆地。

6月13日，日军第6师板井支队占领桐城。14日得知波田支队已攻占安庆，奉命改变进攻方向，向中国军队大别山防线的前沿阵地潜山县进攻。潜山地区是保卫武汉主要阵地的大别山脉的最右翼据点，由川军2个师防守。

18日，日军坂井支队攻占潜山城。此后，日军第6师沿长江北岸、大别山之南的狭长地带向西突击。

中国第26集团军和第27集团军所属部队素质和装备欠佳，防御正面过宽，且战斗不力，使日军长驱直入，守军轻失安庆，又连失潜山、石牌等要地，直接导致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间第一道屏障——马当封锁线危急。

马当位于江西省彭泽县境内，处长江中游，与安徽省相接。长江右水道流经马当山下，江面狭窄，水流湍急，素称长江天堑，军事要地，中国第16军所属部队与马当江防要塞守备部队防守马当。国民政府在京沪沦陷后，为阻止日军西进，确保武汉安全，在马当从江心横贯两岸构筑一拦河坝式的阻塞线。阻塞线两岸山峰险要处设有碉堡和炮台，水陆两相配合，形成了一个较坚固的防御阵地。中国海军还在马当江面，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9艘，布雷1600多具。

6月24日，日军集中第3舰队10余艘舰艇输送波田支队向马当进攻。马当此时仅配置有江防要塞守备部队数百人，当敌陆海军向马当要塞阵地进攻时，只有江防要塞守备部队在阵地与敌人作战，第16军和马当要塞司令部的各级指挥官大多数去参加军政大学结业典礼，直到下午才会餐完毕。6月26日，日军波田支队在海主火力支援下实施登陆作战，守军江防总司令和第16军军长命令第167师增援马当要塞，该师迟迟未能到达，当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要塞。第16军军长李温市率第53、第167师反攻马当。6月28日，第16军所属部队驰往香山、香口，并由东、西夹击马当要塞之敌。这时，白崇禧正在田家镇要塞视察，当得知日军已在马当要塞登陆，即用电话指挥驻彭泽的第167师薛蔚英师长，率部火速从彭泽到马当的公路兼程驰赴香山增援。而薛蔚英当时没有遵照白崇禧的命令行动，改走崎岖小路，耽误战机，被查办枪决。

日军占领马当要塞后，29日攻占彭泽县城，湖口告急。

30日，第9战区任命第43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军司令官，第43军所属第26师赴湖口，接替第77师防务。7月3日，日军开始登陆，前来接防的第26师尚未接防完毕就与日军交火，奉令回援的第77师力敌钳制，未能增援，第26师陷于孤立。该师官兵来自四川，系由保安队临时编成，全是新兵，武器又劣，轻重机枪很少，但在师长刘雨卿率领下仍奋力厮杀，苦战两昼夜，炮台守兵伤亡甚多。第26师阵地终被日军突破，该师所剩兵力不到1/3，于当夜向南突围。7月4日夜湖口失守，马当、湖口丢失，九江失去屏障。

中国空军以汉口与南昌为基地。连日出动轰炸机与战斗机，攻击安庆至湖口间敌舰艇，予以重创。

湖口沦陷后，日军集结兵力，以波田支队、第106师、海军陆战队约1

个旅、第3舰队所属舰艇约数百艘，积极准备向西继续进攻。中国第9战区，以第1兵团部署于鄱阳湖西岸，策应九江方面防御，以第2兵团部署于星子、九江之线。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即策定以第25军、第29军团、第54军、第9集团军防守星子、姑塘、九江、码头镇、瑞昌等地区。

7月22日午夜，日军波田支队及伪军一部，在军舰20余艘、汽艇100余艘支援下，冒雨夜潜都阳湖，23日零时在姑塘登陆，中国守军预备第11师竭力抵抗，击沉敌汽艇10余艘。激战3小时后，日军登陆成功。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得到报告，即令第15师、第128师增援姑塘，务于拂晓前歼敌。但第128师未能到达，反自溃败，退往九江、星子地区。24日，日军波田支队与第106师会攻九江，翌日晨发动总攻，第4军欧震部虽匆匆赶至，但因控制机动以防不测事态，未能投入使用。是日夜，日军攻进城内，双方展开激烈巷战。26日晚，第2兵团以态势不利，伤亡过大，当晚遂放弃九江。同日，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告不守。日军突破了中国军队主阵地。

8月1日，第2兵团总司令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南方面自即日起，由薛（岳）吴（奇伟）两总司令负责，张发奎总司令即行调汉。”

中国军队在九江一带集中有数十万军队却败不旋踵，一是由于当局固守九江的决心下得过于仓促，以致后勤准备不周，粮食补给困难。二是败于军纪不良。张发奎自陈“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忤之气。”

在此时期，日军一面派兵占领前进阵地，一面集结主力。7月14日，华中派遣军发出作战准备命令，令第2集团军将部队集结于合肥附近，伺机占领六安、霍山，准备沿大别山北麓作战。令第11集团军攻占黄梅、九江，接着占领瑞昌——德安一线，准备以后的作战。但日军部队分散在各地，北抵晋绥、南达余杭，还有的部队远在日本国内，输送集中成为一大难题。在炎热的气候下乘车船长途行军，人员伤亡增多，日军集中部队缓慢。此时，日本和苏联发生张鼓峰事件，日军以1个师与苏军激战，未能取胜，而又怕引起日苏全面战争，妨碍对华作战，经交涉，日苏于8月10日在莫斯科签定了停战协定。此事件也使日军大本营对进攻武汉作战行动，稍有迟延。日军主力迟至8月下旬才集中完毕。

日军大本营鉴于其华中派遣军所属第11集团军主力于九江附近，第2集团军主力于合肥附近，已分别集中完毕，遂于8月22日下达进攻武汉附近的命令，其要点为：“华中派遣军与海军协同，攻占汉口附近之要地，在此期间，力争击破多数之敌。攻占汉口附近后，应力求紧缩占据地。”其参谋总长复加以指示：“华中派遣军向汉口之作战，不得越过信阳、岳州、南昌附近。”此次作战之目的，以攻略占据汉口附近之要地为主眼，将捕捉击灭中国军，列为副目的，以达其“将国民政府驱逐于中原之外”之政治目的。同时，进攻广州，切断中国国际补给线。

这时，中国政府决定的战略防御方针是：保持现态势，消耗敌军兵力，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之阵地，先摧破敌包围武汉企图，尔后集中兵力，由南北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第5战区防御大别山主阵地；第9战区阻止敌沿长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5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78年版，第218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7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6页。

江西进。并根据日军进攻重点在长江以南，遂将防御重点放在长江以南沿岸地区。

8月末，日军华中派遣军根据所属第11集团军及第2集团军大致完成战略展开情况，遂按原计划全面发起向武汉的大规模进攻。日军第11集团军向中国第9战区发动了总攻势。

在长江北岸，日军占领安庆、潜山后，打开了沿长江北岸西进的通道，有精锐之你的第6师在海空火力直接支援下，从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间大举西犯，直接威胁武汉。

早在6月22日，中国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断定日本侵略军进攻武汉只能循溯江西上一途，建议“应充分采用内线作战原则，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于太湖、宿松、英山、广济间狭隘地区，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然后转移兵力，将敌各个击破。”7月，第5战区判断“敌以长江为进攻我武汉干路，其江北岸之主力似集结怀宁、合肥，将以主力由潜山趋太湖、宿松，一部由岳西、英山迂回，与长江各日上陆之敌呼应，策应其主力之作战。合肥附近之敌或向我六安、霍山攻击，以资牵制我兵团之转用”。故确定：“战区应置重点于右，以积极之行动确保豫鄂皖边区山地及长江沿岸各要点，击破或阻止侵入之敌，以屏障武汉之翼侧。”并根据上述判断和基本方针，部署了各兵团的任务。

8月2日，日军第6师占领太湖城后，又进占宿松，与第3师汇合，进迫黄梅。刘汝明所部第68军与日军激战3日后退出黄梅城，8月3日，中国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亦往第4兵团指挥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决定反攻黄梅，侧击太湖、潜山等日军据点。各部于8月6日开始行动，但战至17日并无进展。国民政府军委会为遏制日军西进，决定再次发动反击以挫敌锐气，以第68、第84军固守黄梅西北一线阵地，另调第31、第7、第10军及第29集团军一部由黄梅东北及太湖、潜山西北山地从侧翼攻击日军。

8月下旬，日军第6师在中国军队反击下，被迫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军队日益猛烈的攻势。8月26日，中国军队刘汝明部第68军第119师克复太湖、潜山，28日，第68军收复宿松。第68军和第84军又向黄梅附近之敌发起猛烈进攻，激战两昼夜，一度逼近黄梅。

黄梅方面日军补给线被中国军队切断，日军被迫在小池口方向由长江水路获得补给。日军据险死守，从30日起又以主力进行反突击，反复展开阵地争夺战，第68、第84军当夜向广济撤退。日军尾随迫击，于9月6日突破田家寨、笔架山阵地。李品仙部第4兵团所属第84军与第3兵团第26军于广济以东与日军展开激战，与此同时，第4兵团另调援兵第67军和第48军前往广济以东地区阻敌，因行动迟缓，未能阻敌西进。至9月9日，日军攻占广济。李品仙兵团连日征战，损失严重，在广济附近丛山口阵地与四望山阵地争夺战中，中国军队第174师和第15师拼死战斗，牺牲官兵达数千人。

中国军队防御黄梅、广济地区的战役，也是保卫武汉的第一线决战，对武汉的安全有直接的重大影响。战役一个多月，中国军队调集川、鲁、桂3省5至6个军的部队。但因处处防御，指挥不统一，难于互相支援，敌人打到哪里，就由该地守备部队抵抗，主动反击不力，被敌各个击破，结果全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6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51～652页。

失守。

广济失守严重影响到田家镇要塞的安全，田家镇为武汉锁钥之地，是在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堡垒。官池口要塞与其夹江对峙，共扼长江航路，是武汉三镇的门户。蒋介石 8 月 6 日曾电示田北要塞指挥官第 11 军团军团长李延年，指出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及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而崇山对峙，江面狭窄，复有相当工事及备炮，洵我国最坚之要塞。”令其“长久固守，以利全局。”

日本海军虽横行江中，但其陆军未能突破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侧背陆地阵地时，也难于突破这道坚固封锁线。8 月 23 日，日军第 11 集团军曾命令第 6 师集中主力，在进入广济附近后，应急速攻占田家镇，以保障日本海军舰艇溯江西进。

9 月 17 日，日军第 6 师与第 3 师一部集中兵力约 1.5 万人从广济南下，迂回攻击田家镇。中国守军第 2 军军长李延年率所属第 9 师和第 57 师，以及田家镇的要塞炮兵部队，与进攻之敌展开激战。中国第 5 战区派 3 个军进行策应，钳制南下日军。

日军第 6 师为攻占田家镇，组成今村支队（临时改编成驮马部队），以适应山地进攻需要。9 月 22 日，第 6 师和今村支队与中国守军第 9 师在田家镇附近松山等地的战斗最为激烈。中国守军凭借既设阵地，在要塞炮兵及军师炮兵部队有效火力的支援下，沉着应战，迎头痛击来犯之敌。许多负伤的官兵，裹伤后继续战斗。阵地被敌炮火摧毁，就利用弹坑作掩护，继续抗击敌人。弹药用尽，即与敌进行白刃战。两日激战，中国守军第 25 旅伤亡官兵约 800 人。第 9 师师长坚持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在保卫田家镇要塞的战斗中，第 9 师伤亡旅长以下军官 100 余人，士兵 2000 余人。第 57 师损失也很严重。

9 月 28 日，日军海军增援部队到达田家镇长江水面。日军出动飞机 70 余架，集中人炮 100 多门，对田家镇实施袭击，摧毁了田家镇防御工事。日军第 6 师与今村支队在海军支援下，向田家镇发动进攻。

29 日攻陷田家镇炮台，中国军队被迫退却，田家镇失陷。日军第 11 集团军机密作战日志记载，在田家镇战斗中，日军“第 6 师以步兵 3 个营为基干编成今村支队，命令其出发攻占田家镇，但优势之敌从蕲春方面及广济以南前进，切断了它的退路。为此，第 6 师先派出一个步兵营增援，接着又抽出一个步兵营、两个山炮连前去救援。当时，广济周围之敌乘第 6 师的兵力分散，以击败之目的，从四面下分昼夜采取猛烈攻势。”日军第 6 师 9 月 30 日电报向第 11 集团军报告称：“今村支队的损失甚重，截止现在查明我方损失为，战死 284 人（内军官 7），负伤 866 人（内军官 15），合计：150 人，预料还要增加。”

日军第 6 师攻占田家镇后，伤亡惨重，加之官兵患霍乱病减员，迟至 10 月 17 日休整补充完毕后，才继续西进，22 日占领上巴河，24 日晚攻占汉口以北的黄陂，于 25 日首先攻进武汉。

在长江南岸地区，日军第 11 集团军以第 27、第 9、第 106、第 101 师约 4 个师的兵力在长江南岸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 9 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判断日军于九江得手后，将以 1 个师以上兵力进攻瑞昌、南昌。他认为虽在瑞昌与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 695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 年版，第 160 页。

德安地区已集中 20 多个师，但沿江沿湖防御兵力薄弱，敌仍可能实施登陆作战。他请示蒋介石能否集中兵力主动给日军一次打击。蒋介石即表示：“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

8 月上旬，中国第 9 战区拟定作战计划，决定以一部兵力配置沿江各要点及南浔路，主力控置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从翼侧攻击深入之敌。第 1 兵团担任南浔路（九江至南昌）正面防御，屏障南昌，侧击西进日军。第 2 兵团担负瑞昌一带作战任务，保卫武汉，并掩护南浔正面的西侧翼。

8 月上旬，日军开始在瑞昌附近长江水域扫雷。8 月 11 日，日军波田支队在瑞昌附近江岸港口登陆。8 月 21 日，日军第 11 集团军命令波田支队进攻长江要塞马头镇，遭到中国第 31 集团军的有力阻击，攻势受挫。日本海军沿长江前往增援，亦被马头镇炮台炮火击退，这时，日军第 11 集团军获悉中国军队增兵瑞昌，从背后威胁波田支队，便命令第 9 师进攻瑞昌。8 月 24 日攻陷瑞昌。8 月 31 日晨，中国第 52 军主力乘敌立足未稳，向瑞昌西部的大郊山实施反击，歼敌甚多。9 月 7 日，日军波田支队、第 9 师一部与海军陆战队协同，在其海空火力的支援下，强攻要塞，反复夜袭，战斗激烈。中国守军予敌大量杀伤，己方也遭严重伤亡，最后要塞阵地被毁。马头镇经 8 昼夜恶战，于 14 日陷落。中国守军第 31 集团军退守富池口。中国守军利用富池口天险，同日军血战近 10 天，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日军采用施放毒气手段，于 9 月 24 日陷富池口。

在九江以南南浔铁路地区，从 7 月至 8 月，日军进攻部队与中国军队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8 月 4 日，日军第 11 集团军第 106 师进攻庐山北麓，中国军队利用有利地形，重创日军，遏制了日军攻势。至 8 月 9 日，日军第 106 师连排长死伤达半数，团营长一级指挥官死伤达 8 人，几乎失去了进攻能力。为增援第 106 师，日军第 11 集团军命令第 101 师向庐山东南面的星子地区发动进攻，进而向德安推进。8 月 21 日，日军第 101 师进攻星子，并向庐山南麓推进，中国第 25 军等部在星子一带同日军展开拉锯战。日军第 101 师久攻星子不下，而第 106 师已无力发动攻势，在这种形势下，日军第 11 集团军将第 27 师投入战斗。

9 月中旬，日军第 27 师从瑞昌向武宁推进，沿途受到中国军队阻击，进展缓慢，直到 10 月 5 日才占领箬溪。期间，中国第 9 战区司令长官命令薛岳兵团 3 个军，在德安以西阻击日军。

9 月 21 日，日军第 106 师于德安正面攻击未逞，以其所属第 136 旅向南进攻万家岭，企图包围中国第 1 兵团德安阵地左翼。中国军队第 1 兵团总司令薛岳及时令第 66 军 2 个师、第 74 军 2 个师、第 4 军 2 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自 9 月底起开始围攻，战斗惨烈。日军第 136 旅伤亡惨重，武器装备损失严重。第 66 军克石头岭，第 74 军猛攻长岭、张古山，争夺酷烈。10 月 8 日，日军第 11 集团军发现第 106 师陷于绝境，慌忙派飞机主运弹药粮秣救援该师。并派第 27 师前往救援。

10 月 9 日，薛岳下令各师选派敢死队数百名合力攻击，当晚攻占万家岭、雷鸣鼓等地。此役，薛岳兵团毙敌 3000 人，伤敌更多，俘虏 30 多人，缴获轻重机枪 50 多挺、步枪 1000 多支，军马 100 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为改

变战局，日军第 11 集团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同第 106 师，并令该师向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兵第 13 团配属第 101 师，令该师向德安东南推进；与第 27 师协同，会攻德安。中国守军进行了半个多月的阻击战，才最后放弃德安。10 月 27 日，德安失陷。薛岳所部退至修——水。11 月 1 日，日军第 101 师攻占永修。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

（二）武汉以北地区大别山北麓的阻击战

7 月 14 日，日本华中派遣军下令第 2 集团军向安徽合肥集结，准备向武汉进攻。7 月中旬至 8 月下旬，日军第 2 集团军第 10、第 16、第 13、第 3 师相继在合肥地区集结完毕，8 月 20 日，日军第 2 集团军下达作战命令，决定分南北两路作战，北路第 10 师沿安徽六安至河南光州一线，向信阳推进，第 3 师力后援跟进；南路第 13 师沿安徽霍山至河南商城一线向武汉北面推进，第 16 师尾随第 13 师为预备队，并担负交通线的警备。

8 月下旬，中国第 5 战区在大别山北麓加强防御部署，以第 3 兵团在六安、霍山以西至商城地区设防，准备迎击日军。其所部第 51 军部署于六安地区；第 77 军部署于霍山方面；第 71 军控制于商城东侧附近，准备对进攻之敌实施反突击。

8 月 27 日，日军华中派遣军第 2 集团军发动进攻。28 日，日军第 10 师击败中国第 51 军，占领六安，继续向河南固始推进。

29 日，日军第 13 师突破中国第 77 军阵地，攻陷霍山，向河南省商城推进。9 月 2 日，日军第 13 师攻占叶家集，当夜强渡史河，进攻富金山。中国第 71 军（军长宋希濂）在富金山高地顽强阻击日军的进攻，不断反击敌人，予敌以沉重打击，歼敌 1000 余人，使日军每个连平均减员到 40 人。营长一级的军官伤亡也多。

9 月 7 日，日军第 2 集团军令正在向固始推进的第 10 师，派遣濂谷支队增援第 13 师作战。濂谷支队在向富金山前进途中，在方家集北侧受到中国军队阻击，无法前进。日军第 2 集团军又将第 16 师调到叶家集，支援第 13 师，并给第 13 师增配独立机枪队、独立轻装甲车队和炮兵部队等，加强该师攻击作战力量。9 月 11 日，日军发动强大攻势，中国第 71 军被迫撤退，12 日，富金山失守。9 月 16 日，日军第 16 师攻占商城。9 月 17 日，日军第 2 集团军命令第 13、第 16 师突破大别山中国军队防御体系。9 月 20 日，日军第 13、第 16 师向沙窝、新店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巧妙阻击日军。日军第 13 师、第 16 师在突破大别山作战中，激战 1 个多月，以战死约 1000 人，伤约 3400 人的代价，才突破大别山地区防线，于 10 月 25 日，占领麻城，然后沿宋埠、黄安（今红安）、河口镇向武汉推进。

向固始、潢川、罗山、信阳进攻的北路日军第 10 师，于 9 月 4 日渡过史河，6 日进攻固始，中国守军第 71 军第 181 旅抵抗一天之后撤退，固始失陷。9 月 12 日，日军第 10 师逼近潢川，遭到中国第 59 军阻击。9 月 19 日至 20 日，日军相继攻占潢川、光山、罗山等地，逼近信阳。这时，中国第 5 战区增加兵力，在信阳、大别山地区同日军第 2 集团军所属部队展开激烈的攻防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战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 年版，第 142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 年版，第 151 页。

战。

9月20日，日军第2集团军下令第10师进攻信阳，第3师在光山地区待机增援。9月28日，日军第10师改编为驮马部队从光山出发向信阳进攻。中国第17军团所属刚到战场的第1军与第45军向罗山附近日军展开攻击，迫敌退守罗山城。日军冈田支队在罗山附近受到中国军队第17军团所部从两翼的围攻，日军第10师主力迂回到罗山南侧地区，向中国第17军团右翼发动攻击，中国第17军团两面受敌，被迫撤退。9月30日，日军第10师在罗山以西继续向信阳发动攻势，又受到中国军队阻击，激战两昼夜，才于10月2日夜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在中国军队的持续阻击下，日军伤亡惨重，其中，步兵第39团由从庐山出发时的2800人，到9月末减少到不足800人。在这种形势下，10月2日，日军第2集团军令第3师从光山出发，经罗山北侧向信阳东北推进，策应第10师进攻信阳，于10月9日到达信阳东北15公里处的大洋河镇，10月11日进至信阳北侧，切断了平汉铁路交通线。日军第10师冈田支队于10月11日到达信阳东面，第10师主力到达信阳南面，与第3师一起包围了信阳。10月12日，日军在优势炮兵火力和坦克掩护下攻占信阳。中国守军进行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610人。10月16日，日军第10师从信阳南下，沿平汉线西侧向武汉推进，相继突破平靖关、武胜关。中国守军在桐柏山地区顽强抗击日军进攻。日军第3、第10师于10月26日占领桐柏山地区后，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11集团军进攻武汉。

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日军第9师10月27日攻占贺胜桥，切断了粤汉线。日军第27师从箬溪出发，10月18日攻占辛潭铺后，配合第9师向粤汉线推进，27日占领桃林镇。

武汉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为保存军力以利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军委会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地区部队，长江南岸部队撤至湘北及鄂西地区，长江北岸地区部队撤至鄂北、鄂西北地区。蒋介石当晚离武昌飞往衡阳。日军第6师26日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同日占领武昌。27日，日军第116师与第6师各一部占领汉阳。至此，日军攻占武汉三镇，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

在保卫武汉的作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下，与进犯的日军飞机进行了激烈战斗，取得了重大战果。5月19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升、第19队副队长佟彦博，各驾一机自汉口起飞，至宁波前进基地降落加抽后，直飞日本，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各城市散发了传单，并侦察了军港及机场情况，次日分别返回玉山、南昌，后安返汉口机场，首次完成远征日本本土的任务。6月中旬，日军沿江而上向安庆等地开始进攻后，中国空军以主力轰炸长江日军舰艇以及芜湖等地日军机场，并抗击日军飞机的空袭。前后5个月的作战，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日军飞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保卫武汉的作战。在作战中，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在中国空军配合一道对日军的作战中，取得了突出的战绩，其中许多人血洒长空，贡献出宝贵生命。（见附图6）

在日军沿长江向武汉进攻时，中国海军在九江至汉口间水道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武汉前卫之田家镇设置海岸炮，在武汉门户之葛店设立武汉区炮队，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47页。

并在葛店至田家镇间布水雷。9月中旬起，中国海军一部与日舰在田家镇要塞展开激战，击沉日舰艇多艘，有力地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

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毙伤敌近4万人。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使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武汉保卫战使日本战略进攻被迫停止，军事战略为主的方针彻底破产。攻占武汉以前，日本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想通过强大的军事进攻，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迅速占领整个中国。经过中国军民15个月的奋力抵抗，日本兵力伤亡近45万人，军费支出近100亿日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都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国内人民反战情绪不断增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猛烈开展，大片失地的收复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钳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拖住了日军的正面进攻，使日军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日军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以主力回师占领区对付游击战争。这也意味着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彻底破产，被迫转入长期持久的不利局面。

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新阶段中，正面战场的压力减轻，有利于正面战线正规军的补充整训，逐步恢复战斗力，坚持长期抗战。在敌后战场，由于日军集中兵力对付抗日根据地军民，战争的规模和频繁程度都将超过以往，抗日游击战成为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敌后战场激烈的争夺战，将使敌后军民受到巨大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并将为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为坚持持久抗战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广州作战

一、中日双方的作战准备

早在 1937 年 12 月末，为切断中国南方物资补给线，日本陆军就提出了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作战的设想，但遭到日本海军的反对而中止。

1938 年 5 月，日军大本营为了尽早结束“中国事变”，在确定进行武汉作战时，就认为同时进行攻占广州的作战较为有利，但由于船舶运输准备不足，所以决定待攻占武汉之后再实施广州作战。7 月，日军大本营认为船舶运输除满足武汉作战外，尚有余裕，遂决心在进行武汉作战的同时，进行广州作战。7 月 13 日，日军大本营制订《以秋季作战力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规定：“广东作战的目的，是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并挫败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志。”8 月中旬，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开始研究攻占广州的计划并进行攻占广州的作战准备。

9 月 7 日，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作了攻占广州的决定。同日，下令编组第 21 集团军，担任攻占广州的作战任务。9 月 19 日，下达第 21 集团军战斗序列，由古庄干郎中将任该集团军司令官，下辖第 5、第 18、第 104 师和第 4 飞行团等部队。并决定由海军第 5 舰队配合第 21 集团军，进攻广州附近要地，切断中国主要通往国外的补给线。

9 月 26 日，日军第 21 集团军决定将进攻广州分为两期进行：第一期，从 10 月 12 日开始，主力部队在大亚湾登陆，经惠州向东江推进；第二期，待后续部队到来后，突破东江防线，向广州北方推进，进攻广州，另以一支部队在海军配合下，于 10 月 27 日进攻珠江口虎门要塞，向广州逼近，配合主力从东北面进攻广州。根据日军大本营的指示，日军第 5 师陆续集结于青岛，进行登陆和攻占虎门要塞的战斗训练。第 18 师于 9 月下旬在上海北部集结并补充装备，加强登陆作战训练。第 104 师于 9 月下旬集结大连，进行登陆作战准备。

10 月上旬，日军第 5、第 18、第 104 师分别由青岛、上海、大连乘船起航，进抵澎湖集结，完成作战准备，待命出动。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封锁了中国东海岸，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便成了中国从海外输入物资的主要地区。国民政府在广东设立第 4 战区，由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由于广州邻近香港，日本如果进攻广州将损害英国利益，引起英国的对抗，因此，国民政府认为日本不敢贸然进攻广州。所以，没有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而将抗战重点放在华中，从各省、包括属第 4 战区的广西，抽调大批兵力到华中作战，导致华南兵力单薄。在武汉作战期间，甚至还从广东抽出 4 个师的兵力参加武汉保卫战，使广东兵力减少到 8 个师。广州防务松懈，兵力空虚，成为日军易于突袭的目标。这时，中国第 4 战区第 12 集团军负责广东防务，余汉谋任第 4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 12 集团军总司令，下辖 3 个军（8 个师），其部署为：第 135 师守备虎门要塞地区，第 151 师驻惠阳，第 157 师驻潮汕地区，一部驻大亚湾附近，第 156 师驻增城，第 154 师驻从化，第 158 师驻广州东郊，兵力分散，戒备松弛。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 年增印，第 106 页。

1938年9月7日，蒋介石从广东省长吴铁城处得到情报，称日军在进攻武汉的同时，进犯华南。10月8日，吴铁城又急电告蒋：“据香港英军情报机关消息，敌拟派4师1旅大举南犯，或在本月真日（11日）前后发动”，指出主要攻击地区在大鹏湾、虎门一带。蒋介石及军令部对此情报不以为然，认为广州方面不会发生大的战事，还要求余汉谋抽兵增援武汉。

10月10日，蒋介石致余汉谋手令：“无论如何，须加抽一师兵力，向武汉增援，如能增此一师，即可确保武汉，否则，武汉将失，粤亦不能幸保。”

二、广州失陷

10月11日夜，日军第21集团军第5、第18、第104师编成输送舰队，从台湾海峡澎湖地区出发，进入广东大亚湾，当夜，月光皎洁，海面风平浪静，中国军队在滩头阵地守备的兵力仅为新编成的1个特务营，对敌行动毫无察觉。10月12日凌晨，日军在海军第5舰队数十艘军舰和100余架飞机掩护下，分别乘约300艘登陆舰艇突然在大亚湾强行登陆。中国守军溃退。当日，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昭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同一天，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调兵保卫广州。10月13日，日军第18师在大亚湾登陆，几乎未受到抵抗，便长驱直入，迅速推进，占领淡水后，于14日到达惠州附近。日军第104师在大亚湾登陆后，连续攻陷平海、稔山、吉隆，13日进抵惠阳南侧地区，作为后续梯队，尾随第18师推进。

10月14日，日军第18师以优势兵力向惠阳发起进攻。惠阳中国守军仅1个团。日军15日攻占惠阳，16日再陷博罗，19日进占增城。中国第4战区集中3个师的兵力在增城附近地区阻击日军，展开激战。日军在增城地区作战中投入兵力共5000余人，伤亡400余人。

10月20日，日军第18师突破中国军队防御，于21日到达广州东郊，中国军队发动反击，但未能击退日军进攻。当晚，日军第18师进入广州，中国守军撤离，广州失陷。

日军第104师于10月17日到达惠阳，21日进抵增城后，为切断中国军队退路，继续向广州以北推进，22日攻占太平场，23日占领从化，与日军及川支队会师。

日军第5师10月21日在第5舰队配合下，进攻珠江口虎门要塞，22日晨乘船到达珠江口，然后溯江而上。

10月22日夜至23日晨，日军第5舰队出动110架飞机配合舰队炮火，轰击并摧毁了虎门炮台。当晚日军第5师占领虎门要塞。

26日攻陷广州西面重镇佛山，29日到达广州南部。至此，日军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要地。

对于第4战区轻弃广州，中外各界人士反应很大。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于10月23日致蒋介石的电报称：“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据最可靠友人报告：罗斯福总统已悟事势非高论所能挽救，正苦思切实援助步骤，

盼望我能坚持一两个月。 ”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日军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并为其以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的基地。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

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

一、陕甘宁边区的正式形成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再次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随后，在国共两党代表谈判中达成协议，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9月6日，中国共产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并在延安成立。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等9人为边区政府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指定划以陕西省之延安（肤施）、安塞、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延长、延川、枸邑（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鄜县（富县）、米脂、绥德、葭县（佳县）、清涧、吴堡，甘肃省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并以宁夏省之花马池（盐池县）及神（木）府（谷）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之募补区。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伟大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关心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

早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就确立了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的边区建设总方针。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任务和提出的建设方针，陕甘宁边区在已经开始的各项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抗日军事各方面的建设。

二、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

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陕甘宁边区依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于1937年4月制定出第一个选举条例，并从5月开始，实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到1937年11月，完成了乡、区、县各级选举，成立了边区各级议会和人民民主政府，从而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亦称陕甘宁特区政府。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

实行议会（后为参议会）民主制度，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的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在乡、区、县各级选举的基础上，于 1937 年底进行边区议会的选举。毛泽东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这一选举。

1937 年 11 月 13 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要求八路军必须积极的热烈的参加特区大会的选举，并指出：“当此抗战紧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特区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日的普选的民主政治，做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特区大会的开幕，将更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周围，在活的榜样之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为救亡图存而抗战到底。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在巩固和开展全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也是国共合作迅速走上新的阶段的推动力。”1937 年 11 月 22 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向特区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进行特区政府民主选举的指示》，提出这次选举运动的总方针是：“要使特区成为抗战与民主的模范区域，去影响与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改造南京政府的政治机构，实行全面的全民的抗战，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特区政府的民主选举是要产生真能领导抗战保卫特区的政府。”

1937 年 12 月，陕甘宁边区经过选举，产生了 500 多名边区议员，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边区议会未能及时召开。1938 年 11 月 25 日，陕甘宁边区根据首届国民参议会制定的省、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将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选的边区议员改为边区参议员。

1939 年 1 月 17 日至 24 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参议员 145 人（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 12 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陈绍禹）、洛甫（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讲演。

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作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报告强调指出：“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会议还听取了边区政府各厅、处以及高等法院的工作报告。经过热烈的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是由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提出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革命三民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施。纲领规定在边区实行“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而战”的彻底的民族主义；“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的彻底的民权主义；“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改革所得之利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及其他可能开办之工业”，“发展边区商业”，以改善人民生活的彻底的民生主义。

会议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

《党的工作》第 48 期，1937 年 12 月 1 日。

《解放》第 68 期，1939 年 4 月 4 日。

《解放》第 68 期，1939 年 4 月 4 日。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以及根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和统一战线，发展经济、教育等 12 件重要提案。

大会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力为副主席，林伯渠、高自力等 15 人为边区政府委员。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曹力如为边区政府秘书长。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边区参议会的创立，使边区的人民抗日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础，保证和推动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并且为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至全国实行民主政治树立了榜样。

1939 年 2 月 6 日，边区政府委员在延安宣誓就职，第一届民选政府正式成立。至此，边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关进一步健全起来。朱德指出：“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是：（一）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二）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主要领导人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专员公署和区公署，分别为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三）司法机关，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设县法院，边区和县的法院院长，由边区和县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边区高等法院，是三者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是抗日人民的政权，它的阶级基础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了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实行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突出地表现在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主选举等方面。

第一，边区政权是真正的抗日的人民的政权。它属于抗日的人民，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够而且被吸收参加政权工作。

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边区参议会、边区最高行政机关边区政府以及各级地方参议会和政府，都由人民选举产生。《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中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各级参议会之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之”；边区参议会之职权：“选举边区政府主席、边区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委员；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等。《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 3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7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 版，第 741 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1 辑，档案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56～159 页。

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之登记，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重要的法律政策规定，切实保证了人民群众参加政权、管理政权的权利，充分体现由人民当家作主。

在边区各级政权的组成成分上，包含了各个阶级。例如在 1937 年固林、延长、安定、曲子四县当选的各级参议员中，其成分的百分比如下：

此外，各级参议员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妇女。

第二，边区的民主是抗日人民的民主，一切抗日的人民都享有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等等。

第三，边区人民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边区政府不仅从政策上规定了人民的政治自由，而且从实际上保障了人民政治自由的实现。由于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边区民众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民众团体，例如各业工人有 95% 加入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会，妇女 70% 以上加入了妇女救国会，绝大多数青年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商人也组织了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此外还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文化技术性质的组织。

第四，保证了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在选举区域内，如有少数民族……其人数……有法定人数五分之一以上者，单独进行该民族居民之选举，得选出正式议员一人。”边区政府坚决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扶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正确处理汉回、汉蒙之间的争执与纠纷，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蒙民、回民居住的地区，开办抗日蒙回学校，并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第五，边区政府是廉洁的抗日政府。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是由各级参议会选出，而各级参议会议员，则由选民根据生产单位与区域直接选举出来。人民有权监督、检查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对于渎职或不称职者可以随时予以罢免。边区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上至边区政府主席，下至乡政府乡长，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

1939 年，边区行政领导每月最高的津贴为 5 元，县长每月津贴 2.5 元，每天粮食 1.4 斤，菜钱 4 分。边区政府严禁任何贪污，贪污 500 元以上的，即要被处死刑。这种廉洁的作风，在我国政治史上是一个光辉的创举。

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战争环境和艰难险恶的条件下，加强民主政治的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各抗日阶层的团结和合作，充分发挥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参加抗战及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使陕甘宁边区这个历史上曾是政治落后的地区，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模范，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模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三、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特殊的政治地位，赋予它极其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它一方面要承担抗战经费的供给，承担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留守部队财政开支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又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边区经济逐步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但这里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加之长期战争的影响，人民的生活依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了发展和巩固边区，使边区成为支持抗战的坚强堡垒，担负起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总后方的战略任务，必须大力进行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加强边区的自给能力，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供给，支持长期抗战。

早在 1937 年 4 月，边区政府就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计划，并开始实施。全国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个大纲领》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指导边区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力争利用“外援”的收入，达到“休养民力”的目的。

所谓“外援”，主要是指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抗经费（一部分用于边区开支）和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的捐款和援助。外援对抗战初期的边区经济有着重大的作用，从 1937 年 7 月到 194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共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 1640.5 万余元（法币），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捐款 812 万余元（法币），中共中央拨出了 1409 万余元协助边区，占边区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其中，1937 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 77.2%，1940 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 70.5%，外援收入，使得边区政府有可能减轻人民的负担，休养民力。

休养民力的另一方面，是边区政府极力减轻人民的负担。1937 年仅征收救国公粮 1.4 万石，占收获量的 1.27%。

1938 年征收救国公粮 1.59 万石，占收获量的 1.32%。

1939 年以后，边区脱离生产人员增加，粮食需要增加，1939 年征收救国公粮 5.2 万余石，占收获量的 2.29%，1940 年征收救国公粮 9 万余石，占收获量的 6.38%，其余不足部分，由边区财政拨款在外地或向农民购粮。

在税收方面，边区政府取消了过去 42 种税收，只征收盐税和部分货物税，并实行统一税制，降低税率，一切税收除一次统证外，没有任何附加和重征。边区政府对工业一般不征税。

1938 年只征税 27 万元，1939 年也才征税 50 万元，边区人民负担大大减轻。

在土地政策方面，早在 1937 年 3 月，边区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5 月，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的公民权。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进一步调整边区内各阶级的关系，明确宣布：“凡地主土地在工农民主政府时代未被没收的，不再没收，土地所有权仍属地主”，“已被没收了土地和房屋的地主回到边区来，可由政府分给与一般农民一样的一份土地和房屋，并享有公民权”，“出租土地给农民，只要地租不苛刻，政府不加以任

何干涉。”

边区政府还明确宣布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投资，奖励工商业者发展边区经济。除严禁高利贷剥削，严禁操纵市价垄断投机外，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废止过去苏维埃时代的劳动保护法，实行仲介制度，即在政府指导下的劳资两利，订立合同，根据各地不同的生活条件，酌量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良工人生活待遇。

上述政策的实行，调整了边区各阶级的关系，取得了边区全体人民的拥护，大大促进了边区建设。

边区政府还采取许多重大措施，以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

农业方面：

（1）鼓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边区政府制定了奖励垦荒的政策，规定荒地一经垦熟，即永为所有，大量组织外来移民进行垦荒，同时鼓励边区内移民垦荒，规定移民三年不交公粮，减少义务负担，提供安家费，解决口粮、种子、农具等问题。边区政府还把开垦荒地列入每年的生产计划，广泛宣传动员，组织落实。（2）组织劳动互助合作，调剂劳动力。边区政府提倡、组织和领导群众，组织劳动互助社，调剂劳动力、畜力的不足。

1939年3月，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规程》，使劳动互助社有组织地发展起来。

（3）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劳动力。（4）开展生产运动，奖励劳动，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1938年边区政府开始奖励和宣传劳动英雄，召开边区农业竞赛展览会。1939年，边区开始大生产运动。

1939年2月2日，在国内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毛泽东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中央领导人亲自带动下，边区军民迅速投入生产运动，掀起了第一次生产热潮。

1939年的生产运动以农业为主，全边区共开垦荒地105万多亩，其中机关、部队、学校共收获粗粮1.4万余石，细粮9500余石，各机关经费自给达30%，边区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

（5）实行农贷，增加生产建设投资。

1939年边区政府生产投资140万元，1940年又增加到200万元。（6）兴修水利，种植树木，以利农耕和改良土地。

1939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就兴修水利5493.2亩，植树139万余株。

（7）开办农业学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以加强农业指导，提高农业技术。

商业方面：废除苛捐杂税，奖励手工业生产，严禁投机、垄断和屯积居奇，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减税减息，发展合作社运动。同时修理和开辟公路以利交通运输。

公营企业方面：加强对石油、煤矿的开发，扩大纸厂的规模，创立难民工厂，改良印刷厂。

《解放》第68期，1939年4月4日。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73页。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使边区的经济从内战时期的残破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耕地面积 1937 年为 862.6 万余亩，1940 年为 1107.6 万亩，增加了 39.3%；粮食产量 1937 年为 111.36 万余石（1.67 亿余公斤），1940 年达到 162 万余石（2.43 亿余公斤，尚欠庆阳、吴堡、鄜县三县的统计），增加了 40% 以上。畜牧业得到很大发展，牲畜头数大幅度增加，1938 年，牛 10.26 万余头，驴 7 万余头，羊 76.14 万余只。到 1940 年，牛 19.3 万余头，驴 12.5 万余头，羊 172.5 万余只。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城乡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工业方面：首先是小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1940 年边区私人手工业比 1939 年增加 1 倍，国营企业也有了初步基础。从 1938 年起，先后创办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制革厂、制鞋厂、印刷厂、机器制造厂、石油厂及八路军制药厂等。还有制灯、肥皂、面粉等工厂。到 1939 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业与资金均比 1936 年增加 5 倍以上，解决了边区部分需要。

商业方面也开始发达起来。以前歇业的老店铺重新开业，到 1939 年初，又新开设了 1000 多家店铺。此外还发展了一批公营商店。农村集市重新开放，安塞、定边、淳耀等 8 县开辟了 30 多个新集市。

合作事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除消费合作社外，还有生产合作社如纺织合作社等。边区的合作社，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它是调剂市场、便利人民的经济组织。

交通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开辟了定庆、庆临、延志、延靖、绥靖等许多汽车路与大车路，并对已有道路进行了大力改造。交通公路的建设，保障了国防军事交通，发展了运输事业，帮助了经济的发展。

边区经济的发展，使边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不但解除了饥饿的威胁，而且有许多家庭有了剩余，能拿到市场上交换，并有余力添置农具和生活用品。在农村，贫困户数逐渐减少，中农户数逐渐增多。如安定县 4 个行政村 228 户，在 1936 年前，中农 10 户，1940 年春有中农 126 户。在城镇，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多，工人失业基本上消除，工人的工资普遍得到提高。

从全国抗战爆发到 1940 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及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为支持长期抗战，也为逐渐摆脱对外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一）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教育政策，继承和发展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教育的革命传统，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实行了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和新政策。

早在 1937 年 5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的政策，“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

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应该“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又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进而提出了全民族的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同时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中国共产党一向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努力争取、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为劳动群众服务。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这是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列入教育方针，作为办教育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为了使边区的文化教育更加适合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教育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方面，全国抗战爆发后，开办了许多高、中级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并加强了原有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又相继决定边区中等学校和完小（高级班）为干部性质的学校。这样，大大加强了干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8、70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18页。

部教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不但解决了边区需要的干部，而且为全国抗战乃至全国解放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干部。在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强了冬学、识字班、夜校、半日班、读报组等形式的教育。为了加速扫除成年人中的文盲，以新文字作为扫盲工具，大量扫除边区的文盲。在儿童教育方面，改革全部公办的作法，采取了公办与民办公助兼施的方针，促使民办公助学校大大发展，公办学校也得到加强。

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在制度、课程和教学上，针对边区各条战线的实际，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实际，也作了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加适合边区抗战的需要。

大办干部学校。全国抗战开始前，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了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师范学校等。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干部的培养和教育，把创办干部学校当作教育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陆续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办了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女子大学、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农业学校、组织干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自然科学学院、医科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边区师范学校、行政学院等一大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

中共中央党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主办的专门负责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至1937年7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在到达陕北1年的时期内，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六中全会后，陈云兼任党校校长，为党校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党校也继续得到发展，为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提高党的高、中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名扬中外的最高军事学府。全国抗战开始时，“抗大”已举办了两期，培养了3800余名军事、政治干部，输送到抗日的各条战线。全国抗战开始后，各地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给“抗大”增添了培养知识青年成为革命干部的新任务，“抗大”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悉心关怀着“抗大”发展，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题词中指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抗大”第3期于1937年8月1日开学。全校学员编为3个大队。另外，还有老干部军事队、青年军事队、老干部游击训练队等，全校共13个队，学员共1272人。

1938年3月~5月，本期学员陆续毕业，其中一半以上学员毕业后即奔赴抗日战场，成为坚强的抗日干部。

“抗大”第4期于1938年4月16日开学，12月陆续毕业。本期先后编成8个大队、43个队，学员共5562人。其中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学员共4655人，约占全校学员总人数的83%，部队和地下党干部有907人，约占

毛泽东：《抗大三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39年5月30日。

17%。另外，还有来自东南亚的爱国华侨青年，以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友人。

为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挺进敌后，建立第一、第二分校。1939年1月，何长工、陈伯钧等率“抗大”部分师生从延安出发，分别到山东和晋察冀兴办“抗大”第一、第二分校。同时，在延安的总校第5期于1939年1月28日正式开学。总校直属5个大队、41个队，学员共4962人。6月，“抗大”总校奉命挺进到晋东南办学，留下的一部分师生在延安组成“抗大”第三分校。“抗大”在陕北3年多，共培养学员15621人，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干部。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所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的革命学校。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正式开学，成仿吾任校长。

1938年3月，为了加强陕北公学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调罗迈（李维汉）任陕北公学副校长兼党组书记。

陕北公学的创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毛泽东指出：“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作了著名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中共中央还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要到陕北公学讲课。毛泽东亲自带头，经常到陕北公学作形势报告。

陕北公学是一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校，它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实行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凡有志参加抗战，年龄在18岁以上的青年，身体健康，不分文化程度，不分性别、出身、职业、信仰和党派，都可以入学。它一面招生，一面开学，学员到校，随即编班上课。陕北公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依据抗战的实际需要进行安排，学制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班（即学员队），一般学习3~4个月，一种是高级研究班（即高级队），学习一年。陕北公学采取半军事化编制，分大队（连）、分队（排）、班（学习小组），一切行动实行军事化。

陕北公学的学员，除最初从“抗大”转来的200多人外，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也有从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及朝鲜等地回国的华侨爱国青年。陕北公学从1937年8月开始接收学员，到11月1日正式开学，已有学员近600人，编成5个学员队。到1938年3月，共编成27个学员队，接受和培训3000多名学员。7月，中共中央在陕西枸邑开办了陕北公学校分校，由李维汉任校长。

1938年底，为适应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对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陕北公学抽调2000多名学员和工作人员，与“抗大”抽调的人员一起到敌后创办“抗大”分校。陕北公学总校与分校合并，主要是办大学部，着重培

养抗日教育事业的师资和理论研究人才。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战时青年训练班、工人学校4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前往晋察冀边区办学。

1939年12月，陕北公学在延安复校。

1941年8月，陕北公学并入延安大学，陕北公学至此正式结束，先后共培养1万余名学员。

陕北公学创造性地发展国防教育，在教育方针、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民主生活和艰苦奋斗作风等方面所创造的经验，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普遍意义，为不少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所采用。毛泽东在参加陕北公学第一期第三批学员毕业典礼时发表演讲指出：“中国不亡，因为有陕公”，给予陕北公学高度的评价。

中共中央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学校（1941年7月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改为中央研究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和专门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也创办了一批干部学校。如中共陕甘宁边区党校（后改为中共西北党校）、各分区党员干部训练班、边区行政学院、边区农业学校、鲁迅师范学校，边区第一、第二、第三师范学校等，还有工程、合作、司法、公安等干部训练班。另外，边区青年抗敌救国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工会等群众组织，也都开办了各自的干部训练班。这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兴办，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在职干部教育。中共中央既重视干部学校的教育，也十分重视在职干部教育。为加强干部教育的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9年2月成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李维汉任正、副部长，具体负责干部教育的各项工作。1939年3月，颁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了在职干部教育的动员大会，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此后，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延安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的干部及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学习，全延安在职干部参加学习的有2100余人。到1940年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迅速增加到4000余人。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学原则、学习方法等作了明确的规定。6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召开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朱德、任弼时、李富春等出席大会。大会总结了在职干部教育的收获、经验，提出了今后改进的意见。10月20日，中央宣传部发表了《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

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广大干部提高了文化水平，不识字的干部摘掉了文盲帽子。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同时，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大大推动了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在职干部教育的开展。

中学教育，陕甘宁边区的中等教育，基础十分薄弱，仅有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和米脂中学共3所中等学校。1938年边区

李维汉：《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第6页。

政府又开办了边区中学，1939 年 6 月，鲁迅师范学校和边区中学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边区第一师范学校）。9 月，边区政府又兴办了关中师范学校（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和三边师范学校（边区第三师范学校）。1940 年夏，边区政府又在庆阳设立了陇东中学，并接办了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至此，边区共有 4 所师范和 2 所中学，在校学生达 1000 余人。

小学教育。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和物质上的困难，采取“因陋就简”的办学办法，使边区小学初等教育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边区小学教育发展状况表

成立边区以前	120 所	学生人数不详
1937 年秋季	545 所	学生 10396 人
1938 年秋季	733 所	学生 15348 人
1939 年秋季	783 所	学生 22089 人
1940 年	1341 所	学生 41458 人

社会教育。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后，就开始大办社会教育。1937 年 4 月颁布《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规定：“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的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在社会教育组织形式上，设立夜校、冬学、巡回训练班、俱乐部、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组。

1937 年边区开始大办冬学，当年办起冬学 619 所，学生人数达 1 万余人。

1938 年，社会教育得到更大普及，办起冬学 723 所，学生人数达 1.2 万余人；识字组 5560 组，人数近 4 万人；夜校 599 所，人数 8245 人；半日校 236 所，人数 3994 人。1939 年，边区提出当年消灭文盲 3 万人，社会教育各组织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至 1940 年，各种社会教育组织仍继续发展，共开办 5469 处，学生近 6 万人。边区的社会教育，对于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闻出版工作。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在延安出版了关于政治（《解放》、《共产党人》）、军事（《八路军军政杂志》）、文化（《中国文化》、《文艺突击》）、妇女（《中国妇女》）、青年（《中国青年》）、工人（《中国工人》）、科学卫生（《国际卫生》）等专门刊物，并出版了《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边区群众报》等，还出版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边区各分区也都出版了日报，有的县也办了报纸。广大群众还办了许多大众化的黑板报，随时随地宣传党的政策和新人新事。

卫生工作。边区建立了组织上、设备上相当完善的医院（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能实行近代医学上的一般手术。最重要的是努力克服了许多医药上的困难，用边区土产的原料，制成了各种中西药品，使一般药品达到部分的自给。各县也兴办了卫生院、医药卫生合作社等医疗机构。提倡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和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同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培养医护卫生人员，推广新法接生，禁止妇女缠足等。通过这些工作改变了边区农村不卫生的落后面貌，增强了人民体质，促进了边区人畜两旺。

文艺工作。全国抗战开始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从全国四面八方云集陕甘宁边区，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形成了一支阵容可观的文艺队伍。他们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用文艺这一锐利武器，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延安的民主空气和自由环境，为革命和抗日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各种文艺组织、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早在 1936 年 11 月 22 日，由丁玲、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成仿吾等发起成立了陕甘苏区第一个文艺领导机构——中国文艺协会，使陕甘苏区文艺运动由零星的分散状态发展为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活动。

1937 年 11 月 24 日，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它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含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世界语音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族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会、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文艺顾问委员会等众多文化艺术团体。协会的任务“在于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我们伟大人民群众之民族的自觉，争取思想界的民主，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

1939 年 5 月 14 日，又成立了与“边区文协”并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其他专业性的协会，如 1938 年 1 月 9 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音协”），1939 年 2 月 10 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简称“边区剧协”）和“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边区美协”）。这些协会活动内容甚多，如组织创作，观摩演出，举办展览，创办期刊，开办讲座，进行辅导评奖等等。陕甘宁边区还涌现出许多文艺社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烽火剧团”、“边保剧团”等，出版了《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文艺月报》、《新诗歌》、《部队文艺》、《歌曲月刊》、《部队歌曲》、《边区戏剧》等几十种文艺刊物，创造出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诗歌、音乐，有力地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文艺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结合起来，构成了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宏图，为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

一、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建设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第359旅第718团，第129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第385旅（欠第769团），共9000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与陕甘宁边区地方武装保安队和自卫军，担负保卫边区的任务。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以萧劲光为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各留守部队。

1937年9月，在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之下，成立东地区与西地区两个留守处。以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鄜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为副主任，统一指挥第120师第718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和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以定边、盐池、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枸邑、淳化等县划为西地区留守处，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统一指挥第129师第385旅旅部、第770团和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

1937年10月2日，八路军各留守部队除第770团番号不变外，统一改编为警备第1~第8团。另有骑兵营和鄜甘独立营。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称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的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留守兵团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38年1月，成立绥德警备司令部，陈奇涵任司令员，郭洪涛任政治委员，毕占云任参谋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3月，日军对边区河防开始发起进攻。为统一边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增强河防保卫力量，4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地方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此时边区部队计有1个旅、10个团、10个保安队、1个独立营，总兵力有1.5万余人。

1939年，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军委对边区部队进行了调整。7月，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拨归留守兵团建制，随后与鄜甘独立营合编为留守兵团直属特务团。8月，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

10月，第359旅奉命率第717、第718团由晋察冀边区返回陕甘宁边区，接替绥德警备区防务，并归留守兵团指挥。

12月，以绥德警备司令部为基础，成立警备第1旅司令部，下辖警备第3团、警备第8团，调防关中地区。1940年2月，警备第6团拨归第120师指挥。4月，第359旅雁北支队和第4支队先后到达陕甘宁边区归建。

10月，第719团亦抵达陕甘宁边区归建。至1940年底，留守兵团部队计有第385旅、第359旅、警备第1旅及警备第1、第4、第5团及特务团、骑兵团，连同保安司令部所属备部队，总兵力3.1万余人，长短枪1.5万余支，轻重机枪1077挺，迫击炮17门。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亲自出席了会议。毛泽东还在

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的道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以“加强战斗准备”、“部队正规化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提高部队纪律，紧密与人民团结”作为兵团的主要工作。1938年12月，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确立留守兵团的工作方针是：“在备战的姿态下，加紧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加紧生产，克服困难，以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与集体生产的场所，把每个战士变成抗日的优秀干部，是保证今后战斗任务完成的重要条件。”从此，留守兵团在政治建军的道路上，向着部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迈进。

（一）留守兵团的政治建设

留守兵团成立后，在兵团首长及兵团党代表会议中，都强调了以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在部队中建立了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制度，规定了政治教育内容，适时地进行时事政策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结合部队的思想实际，及时纠正错误思想。留守兵团各部队营以上干部，普遍组织了政治学习小组，并选送干部进入中共中央举办的学校学习。

1940年，留守兵团开办了兵团军政训练班，分批调集兵团营以上军政干部在职学习，施以较系统的军事政治理论教育。对连以下干部战士主要是加强时事与政策教育，普遍扫除文盲。为促进部队的文化学习，留守兵团政治部提出了学习文化的具体要求：干部识字要在2000字以上，战士识字在要500字以上。经过几年学习，留守兵团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留守兵团还非常重视党内教育，不断加强连队党支部的建设，注意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举办支部委员、支部书记训练班，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这对提高党员质量、巩固党组织发挥了作用。留守兵团政治部还出版了《烽火报》和《烽火副刊》，创办了烽火剧团，成立部队艺术学校，用各种形式配合教育。

留守兵团通过不断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政治建设，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阶级觉悟，不断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为部队正规化建设和提高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留守兵团的正规化建设

留守兵团在坚持政治建军的根本方向的同时，十分重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在1937年12月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道路的指示，确定统一部队建制，提出奠定部队正规化基础的口号，强调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此后，健全了指挥机关，成立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机要处，并召开各种业务会议，研究制定统一的规章制度。

1938年8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时，颁布了建立正规军队制度各种草

萧劲光：《留守兵团五年来工作总结》（1942年7月28日）。

《陕甘宁解放区抗日战争史》（初稿），第51页。

则，并开始试行。

1939年5月，在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进一步颁布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参谋工作条例》等。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

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军事素质，是留守兵团正规化建设的根本内容之一。留守兵团特别重视部队的军事战术和技术训练，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事训练主要靠抓干部教育，搞示范教学。留守兵团每半年召开一次兵团干部会议，每次干部会议都是实际的干部训练，一方面汇报交流训练情况，一方面讨论制定下一步教育计划，然后进行统一标准的训练，再回去训练下级干部。在部队，以团为单位，建立由团长、政治委员、副团长、参谋长及各营营长组成的教育委员会，集体领导本单位的教育训练工作。各营有营一级干部和各连连长组成的教育小组，负责训练排以上干部，然后再去带动战士训练，形成了一个教育训练网。在战术训练方面，注意统一战术思想和战斗动作，坚持以近战战术为中心，以班、排夜间战斗、河川战斗等特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为训练重点。技术训练方面，着重训练射击、刺杀、投弹、迫近作业，使四大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经过几年的军事训练，留守兵团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改善部队生活和供应，减轻人民负担，留守兵团根据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展部队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了“生产、学习”的口号，开展从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运动，大力种植蔬菜，喂猪，养羊，开磨坊，办合作社，动员战士学会做鞋、织布、织毛衣毛裤、袜子，改善了部队的伙食和军需品、日用品等供应。仅1939年就垦荒2.5万余亩，在遭受天灾的情况下仍收到2590石（38万余公斤）的细粮。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指示，留守兵团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广大指战员不仅开荒、种粮种菜，还开办了毛纺厂、被服厂、鞋袜厂、皮鞋厂、木工厂、大车厂、煤窑、砖瓦窑、瓷器窑和各种作坊，进行畜牧业、运输业、商业等多种生产经营；留守兵团1940年全年垦荒2万多亩，收粮2400多石（36万余公斤），经营获利223.65万余元，并为以后的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开创了历史上军队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先例，既改善了部队的生活，保障了各项任务的完成，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二、陕甘宁边区地方武装建设

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和自卫军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共同担负着保卫边区安全的光荣任务。

1937年8月，边区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原陕甘宁边区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除一部分编入八路军留守兵团外，

其余部分则编成 10 个保安大队和若干县保安队，共 5000 余人。1938 年 4 月，保安司令部及其所辖保安部队划归八路军留守兵团领导。

1939 年上半年，保安部队先后改编为各独立营。

保安部队统一指挥系统后，加强了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保安部队还进行了自给生产，解决了部分军需用品和日用品。保安部队不仅配合留守兵团肃清了边区匪患，保卫了边区人民的财产和生产安全，而且担负着部分的河防守备任务，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打退了日军对河防的进犯。

边区的自卫军，是群众性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平时值勤放哨，战时配合主力军作战。它既是主力军的经常补充者，也是保卫边区的重要武装。

1937 年 10 月 1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保安司令部颁发《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规定：“抗日自卫军系边区内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抗日武装组织，同时是抗日的后备军。”“凡边区的劳动公民，自愿执行抗日自卫军的任务与遵守抗日自卫军的纪律，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身体强健者，均有加入抗日自卫军的光荣权利。”从此，整理、扩大与训练自卫军便成为全边区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人民抗日自卫军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到 1939 年，边区 80% 的壮丁参加了人民抗日自卫军，人数达 22 万余人，其中有基干自卫军 3 万余人，另外还有 2.8 万余人的少年先锋队。其次，自上而下地建立了指挥系统，村设班和排，乡设连，区设营，县设团，统归保安司令部指挥。每年利用冬闲，对自卫军，特别是基干自卫军进行一次冬季训练，训练的内容有梭镖刺杀、投弹、布雷、射击、盘查放哨以及侦察敌情等。自卫军每人至少有一件旧式武器（如红缨枪、马刀、步枪、土枪等），以及经常备有担架及运输工具，准备参加战勤工作。自卫军在抗战和巩固边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据统计，在 1939 年到 1940 年边区破获的汉奸案、土匪案、伪钞案等近千起，都是自卫军参加或是自卫军破获的。在保卫边区的战斗中，每次都有自卫军参加，负责运送伤病员和给养物资等。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采取主力兵团（留守兵团）、地方兵团（保安部队）和民兵（抗日自卫军）三结合的体制，使边区的机动作战、河防、边防的保卫以及部队锻炼和补充均得到全面的照顾，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坚强力量。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军民坚持持久抗战，保卫和巩固边区的斗争

太原失守后，日军逼近黄河，威胁边区安全，陕甘宁边区担负着正面阻止日军渡河西进，拱卫西北大门的艰巨任务。

一、固守千里河防，粉碎日军的进攻

陕甘宁边区的东面是黄河大塄。边区河防线北起府谷，南至宜川，蜿蜒1000余里，它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也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通道。从1938年起，日军向边区河防不断发动进攻，企图强渡黄河，突破西北重要门户，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威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中枢的安全。

为加强河防的守备，八路军留守兵团以警备第6团驻防神府地区，守备葭县北、万户峪、沙峁、磐塘、马镇、贺家堡等沿河各渡口；以警备第8团调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螳螂峪、宋家川、李家沟、丁家畔、康家塔、枣林坪等渡口；以警备第3团驻防清涧，守备河口、界首、枣林坪（不含）等渡口；以警备第4团驻防永坪地区，派出1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以警备第5团驻防延长，守备凉水岩、马头关、清水关等渡口。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还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神府（神木、府谷）和五县（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等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1937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整个河防划为3个地段，分别由神府、两延河防司令部和绥德等5县警备司令部负责设防，萧劲光兼任河防总指挥。当日军逼近黄河东岸时，河防守备部队进入临战状态，边区军民立即进行紧急动员。

在河防战斗中，各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以主动、灵活、积极、坚决、突然的战术动作，粉碎了日军对河防的多次进攻。

1、神府河防战斗

1938年2月，侵入山西的日军以第109师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侵占中阳、离石，27日，进占黄河东岸要口军渡、碛口，直迫河防，并猛烈炮击西岸吴堡、宋家川河防阵地。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扼守宋家川一带渡口，警备第3团以一部兵力渡河，向柳林敌后袭击，3月3日，军渡、柳林之敌均向离石撤退。在此期间，驻大同日军第26师亦向晋西北进攻，连陷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河曲、偏关等7座县城，直逼神府河防。3月12日，进占保德的日军第26师一部2000余人，附炮20余门，携带渡河器材，13日进抵神府磐塘渡口对岸，首先炮击河防阵地，尔后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强渡黄河。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守备部队及神府武装沉着应战，在日军密集渡河时，以突然猛烈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并以机动兵力一部，乘日军渡河混乱之际，迂回渡过黄河，袭击日军侧背，在八路军第120师积极配合下，迫使进犯河防的日军撤退。此次战斗，共计毙伤敌140余人，警备第6团仅伤亡6人。同时，八路军第120师在晋西北收复被日军占领的7座县城，粉碎日军的首次围攻，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2、第一次宋家川战斗

1938年4月，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的日军第109师在离石一带

集结约 1 个旅的兵力，附火炮 30 余门，于 5 月再次向黄河东岸军渡渡口进犯，企图突破留守兵团黄河西岸阵地，占领陕西省宋家川（今吴堡城）渡口。为打破日军企图，留守兵团未等敌到达河岸，即令警备第 8 团主力东渡黄河，进至汾离公路翼侧，以伏击、袭击等手段，寻机打击日军。5 月 10 日夜，该团在离石城西北王老婆山地区袭击西进日军，击溃日军 1 个营，歼灭日军 200 余人，警备第 8 团伤亡 80 余人。日军渡河企图再次遭到挫败，随即撤退。

3、凉水岩、马头关河防战斗

1938 年 12 月下旬，山西日军在占领大宁、吉县、永和后，即准备大批渡河器材，伺机向黄河东岸逼进。

1939 年 1 月 1 日，日军分 3 路，每路 1000 余人，附炮 10 余门，向黄河沿岸的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挺进，先后占领上述三据点河东阵地，当即以猛烈炮火轰击河西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阵地，并以飞机 10 余架投掷毒剂弹，在破坏数段河防阵地后，即在火力掩护下进行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 5 团乘日军运动集结时，进行猛烈火力还击，击毁其部分船只，歼敌一部，日军被迫撤回黄河东岸。与此同时，八路军河东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日军运输队。日军在攻击受挫，后方交通又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于 1 月 4 日开始撤退。警备第 5 团以一部兵力东渡黄河，向日军发起追击，在大宁城西的曲峨镇给日军以打击后，安全撤回河西。此役共歼灭日军 80 余人，警备第 5 团伤亡 8 人，中毒 10 余人。

4、第二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日军对边区河防的三次进攻均遭失败，于是调集重兵，向宋家川与马头关、凉水岩等处，同时发起进攻，企图钳制河防部队兵力，乘虚实施重点突破。

1939 年 5 月，日军由太原增调 2 个师至汾阳、离石，并携带大批渡河器材，于 6 月 4~5 日，日军一路 1 万余人进占军渡，在黄河东岸构筑工事，并以炮火轰击河西宋家川、枣林坪一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 8 团河防阵地。6 月 6 日，日军又以 1.5 万余人进占孟门、碛口两镇，并以飞机竟日向河西河防阵地及陕甘宁边区内地城市进行猛烈轰炸。同日，日军 1 个团共 2000 余人，由隰县、大宁出动，附炮 20 门，于 6 日晚分别占领马头关及泥金滩河东阵地，并向西岸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 5 团阵地轰击。

面对日军重兵压境的情况，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与动员全边区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援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大力支援下，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坚守阵地，在宋家川方向经 3 昼夜激烈战斗，使日军始终未能接近河岸，渡河未成。在马头关、泥金滩方向，八路军河防部队在日军飞机轰炸和毒剂攻击下，沉着应战，也粉碎了敌人渡河企图。

在此期间，黄河以东八路军部队于敌后积极活动，破袭日军交通线阻敌运输，积极配合作战。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此时，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 8 团分兵一部渡河东进，收复李家垣（军渡以东）、柳林，击毙日军 50 余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 5 团乘日军撤退至河滩集结时，进行突然火力袭击，毙伤日军 30 余人，至此，日军对边区河防最大的一次进攻又告失败。

5、第三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 年 9 月 4 日，驻汾阳、离石日军约三四千人，附炮 30 门，进占军渡，构筑工事，修筑军（渡）离（石）公路，企图巩固河东阵地长期据守，

待机进攻。为粉碎日军在黄河东岸立足的企图，留守兵团河东侦察部队乘日军立足未稳，猛袭军渡以东之穆村、薛村，并破坏了军渡和薛村的公路。9月6日，日军向碛口进犯，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即于河东孟门等地抗击消耗日军。同时，留守兵团河西部队又以一部兵力渡过黄河，迂回至日军后方，活动于柳林、穆村、军渡间。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河东部队袭扰下，日军遂于12日龟缩至柳林、穆村地区。

6、碛口河防战斗

1939年11月初，日军调集1万余人，准备大批渡河器材，于20日分4路由晋西大武、离石、柳林、穆村等地，向碛口合围，同时以一路奔袭葭县渡口。23日，日军主力占领碛口、孟门两镇，开始向河西实施猛烈炮击，并以一部2000余人，在火力掩护下，集结碛口河滩，放船漕渡。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立即对集结与渡河之敌猛烈射击，将日军击退。此时，留守兵团河防左翼部队警备第6团以一部兵力，趁机渡过黄河，袭击日军侧后，经5小时战斗，迫敌分路撤退。此次战斗，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共毙日军100余人，俘虏日军2人，自己伤亡12人。

7、第四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年12月初，日军集结驻离石、柳林兵力4000余人，炮20余门，再次进犯军渡，炮击宋家川，于12日占领李家垣后，加强对河西阵地实施炮击，企图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东侦察部队当日军向李家垣进犯时，即在李家垣以南山地对敌阻击，随后，转向军（渡）离（石）公路打击日军。经5日战斗，日军因侧后不断遭到打击，于16日向东撤退至柳林。留守兵团乘机收复军渡、李家垣。

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和人民自卫军的支援下，在晋西北人民和八路军直接配合下，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将河西的顽强防御和河东的积极进攻结合起来，依托黄河天险和工事，以猛烈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同时，以机动部队大胆渡过黄河，迂回敌之侧后，给敌以突然打击，挫败日军的渡河企图，打退日军的进攻。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以数千至万余人的兵力，在优势火力的支援下，向边区河防频繁发动23次进攻，付出重大伤亡，却屡遭失败。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使千里河防始终未被日军突破，这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江河防御作战中，是绝无仅有的辉煌战绩。

二、肃清边区匪患，维护边区安定

全国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原有的土匪基本上已被消灭。但在全国抗战爆发，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敌特汉奸有计划地破坏边区，边区土匪再次蜂起。据统计，除三五零星的土匪外，共有土匪40多股，约4000余人，枪2000余支。

为了安定边区社会秩序，保卫和巩固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进行了剿灭土匪的作战。

留守兵团根据陕北高原地形复杂、土匪分散的特点，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同时，采取不咎既往等争取瓦解的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动员边区广大群众，配合了留守兵团的剿匪作战。

从 1937 年 11 月开始，留守兵团首先集中警备第 1、第 2、第 5 团和 2 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 2000 余人的兵力，在三边（靖边、安边、定边）地区的官滩、盐池以北的■蜡梁、安边以北的仓房梁，对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 3 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 100 余人，马 100 余匹，缴获枪械 60 余支。与此同时，留守兵团第 718 团在鄯县以西的黑水寺、张村驿一带，消灭了实为上匪的 2 股“地方民团”，缴枪 70 余支。

1938 年 2 月，留守兵团清剿黄龙山区，经勇猛穷追，将该地的股匪大部歼灭，击毙土匪 100 余人，缴枪 70 余支。在安定南区一带窜扰的刘志清股匪，也被留守兵团部队全部歼灭，经过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陕甘宁边区各地的土匪基本上被肃清，共计消灭土匪 36 股，击溃土匪 10 余股，生俘匪徒 900 余人，缴获轻机枪 10 挺，步马枪 1700 余支，迫击炮 2 门，子弹 20 余万发。

三、实行全面抗战动员，巩固后方，支援前线

全国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率先进行了全面的抗战动员，要求全边区军民立即一致动员起来，进行全民族抗战。

1937 年 11 月 15 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信，提出要把边区变成抗战动员的模范，要求党的一切支部成为抗战动员的核心、要求各个群众组织把抗战动员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1938 年 3 月 3 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告民众书》，号召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发动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争，配合政府军队抗战，独立在敌人后方抗战，坚持边区的抗战，努力帮助政府军队做好各项后勤工作；号召一切民众团体，动员组织自己的力量，保证一切抗战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了加强抗战动员工作，边区政府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委员会），开展广泛的抗战动员工作。

1、动员群众参军

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在 1937 年、1938 年两年中，动员了 8000 余名青年参加抗战部队。

1940 年春，原计划动员 3500 名青年参军，结果有 5000 余名青年报名参军。加上抗战爆发前参军的人数，陕甘宁边区参军人数总计达 3 万余人。有些地方参军的人数占总人口的 10%。

2、动员人力、物力、畜力，支援前线

1937 年 11 月晋南形势紧张，边区沿黄河各县，在 7 天之内就动员了 1 万余头牲口组成运输队，开赴山西前线帮助军队运输物资，并为前方将士募送毛袜、手套 10 万双。

1938 年 3 月起，在日军不断向边区河防阵地发动进攻中，陕甘宁边区广泛动员自卫军组成交通队、担架队等直接到战地服务。在河防任务紧急时期，边区动员各地自卫军整营出动，协助部队修筑河防工事，加强河防力量，为保卫河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由于边区抗战动员工作进行得普遍、深入和持久，边区人民在配合政府剿匪锄奸、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以及积极缴纳救国公粮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和作用

一、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指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战争的中枢。

为了指导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一系列关系抗战全局的重要会议，如洛川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制定了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以及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这里从事了巨大的理论研究，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理论著作，对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和历程，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以及转弱为强等，都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时期全面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

延安是全国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的中心阵地。许多爱国的理论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学者志士，纷纷来到延安，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才荟萃的地方。抗战期间，边区成立了哲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抗日问题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党建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文化协会 30 多个，经常进行学术讨论，研究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陕甘宁边区还出版了 30 余种报刊杂志及大量社会科学书籍。延安又是向全国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出版发行马恩列斯著作即达 50 种（册）。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武装了群众的思想，它对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坚持抗战，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和指导全国抗战卓有成效，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成为国内外所瞩目和向往的地方。青年学生成批地奔赴延安，爱国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不断来到延安，国外友好人士也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和边区各地服务和访问考察。继 1936 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之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苏联友人白列斯托夫、马里果夫、英国记者贝特兰、德国记者希伯、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一行、印度医疗队柯律华一行等，相继来到边区，许多记者对边区的所见所闻，作了客观的报道。英国记者贝特兰说：“延安虽小，却的确有它的首府气象。而且从政治上说来，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因而在统一战线之中起着日益增加的作用，所以也许可以算得中国的第二重要的城市了。”在这里“‘虚伪、信命和徇私’……被坚决地全部推翻了。单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共产党的革命不是含糊的。”

二、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敌后抗日根据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256 页。

（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6 年版，第 98、136 页。

地的总后方

全国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同陕甘宁边区存在着依赖关系。作为首席抗日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在全国，在一切抗日根据地中，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

陕甘宁边区是培养训练抗日干部的重要基地。全国抗战爆发后，大量的培养和造就干部以适应全民族全面抗战的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万分急迫的任务。在这里，中共中央先后创办了 20 多所各类干部学校，培养训练出政治、军事和文化技术干部 4 万余人。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革命干部的熔炉，使大批工农干部提高了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水平，使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提高了思想觉悟，得到了锻炼和改造，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坚强的革命干部，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全国各条战线。

陕甘宁边区在保证后方大量脱产人员供给的同时，还经常向前线运送粮食、被服、医药以及其他物资，并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畜力支援前线。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承担了八路军的大部分重伤病员的医疗任务，还安置退伍残废军人 1.5 万余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 8 万余人，使前方将士无后顾之忧。

三、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

陕甘宁边区虽然人口下多，面积不大，原有经济文化基础落后，但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边区的进步受到普遍的称赞，就连大后方的进步人士也认为“值得全国各地仿效”。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第一个彻底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边区实行的“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方式的民主选举，使各级政府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从而奠定了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边区实行的参议会民主制，是抗战时期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的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全中国也应该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陕甘宁边区又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试验区。示范区。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立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实行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各项主要任务在这里都得到了实行，成为全国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取得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宝贵经验，造就的大批建设人才，对指导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是坚强的抗日堡垒。由于边区民主制度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边区的抗战动员工作是全国进行得最早、最充分的地区。边区成立的“民族抗战后援会”，下辖的抗日救国民众团体有 25 个，其分支机构遍布于边区各地，参加的人数占到总人口的 80% 以上。边区自卫军扩大到 22.4 万亲人。边区大批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走上抗日前线。由于边区军民密切配合，进行全面的抗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不但使具有陆空装备优势的日军始终未能突破边区河防，而且使匪特的捣乱破坏和国民党顽军进攻未能得逞。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始终是一个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坚强抗战堡垒。

陕甘宁边区是自力更生的榜样。边区由于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脱产人员不断增多，财政十分困难，特别是由于国民政府停发边区经费和八路军军响，敌伪对边区实行封锁政策，再加自然灾害的影响，边区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边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边区克服了困难，而且为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成为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战胜困难的典范。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尽了极大的努力，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第十七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一节 “七·七”事变后，日本把中国东北变成扩大侵略的兵站基地

“七·七”事变后，日本极为重视中国东北在其扩大侵华战争中的作用。

一、命令关东军出动部队，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立即于7月8日晨召开会议，判断“苏联因内部纠纷及干岔干事件”的教训，目前北方可望平安无事。因此，应乘此时机对冀察给予一击”。同时，关东军司令官向参谋总长提出报告称：“鉴于华北局势，已令独立混成第1、第11旅主力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立即出动之准备”。

当时，关东军序列如下：

司令官	植田谦吉	上将
参谋长	东条英机	中将
第1师	师长	河村恭辅 中将
第2师	师长	冈村宁次 中将
第4师	师长	松井命 中将
第12师	师长	山田乙三 中将
独立混成第1旅	旅长	酒井镐次 少将
独立混成第11旅	旅长	铃木重康 中将
第1～第5独立守备队		
骑兵集团（骑兵第1旅，骑兵第4旅）		
骑兵第3旅		

关东军飞行集团

7月8日20时10分，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衅，华北发生事端。对此，关东军正以极大的关心和坚定的决心，严重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关东军司令部对其管区以外的事项，独断发此声明，尚无前例。关东军在发表声明的同时，先后派遣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情报科长宫永恭次上校、情报参谋田中隆吉中校飞往东京，要求面见中央当局陈述意见，敦促中央当机立断。日本驻朝鲜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也向参谋部报告说。“第20师之一部已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并建议日本当局利用这个时机“推行统治中国的宏图”。

日本政府和最高军事当局，为了充分发挥它所占领的中国东北这个巨大战略基地的作用，迅速占领华北及征服中国，于7月11日召开五相会议，决

1937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在黑龙江干岔子南水道击沉苏军炮艇1艘，击伤1艘。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154页。

飞行集团，系飞行师的前身，1937～1942.4.15以前称飞行集团，以后称飞行师。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4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4页。

定“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5个师，目前暂用3个师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以加强中国驻屯军。经奏请天皇批准，18时35分由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下达临参命第56号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将所属部队中的下列部队迅速派往华北：

独立混成第1旅主力；

独立混成第11旅主力；

关东军飞行集团之一部（侦察、战斗、重轰炸机各2个中队）

上述部队，自通过满华边境时起即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但飞行集团之一部则应立即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关东军司令官在作战初期，应对中国驻屯军提供兵站交通业务之援助”。

7月29日，日本又以关东军第2师之一部编成第2混成旅（旅长关龟治少将，8月1日以后为本多政材少将）。以关东军一部编成第15旅（旅长筱原诚一郎少将），以第3独立守备队编成堤支队（支队长堤不夹贵中校），派往华北，参加中国驻屯军对华北的战略进攻。

8月10日，由上述调至华北的多数部队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官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9月20日后为笠原幸雄少将）。8月中旬，由关东军第2师的1个营编成的大泉支队（支队长大泉基少校），编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至此，该兵团辖混成第2、第15旅和两个支队。独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分别于8月16日和30日归建后，也编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10月5日，独立混成第11旅改编成第26师。察哈尔派遣兵团负责察哈尔地区的作战和与华北方面军的配合。

1938年1月4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改编成驻蒙兵团（司令官莲沼蕃中将），直属日本天皇。7月4日，驻蒙兵团改编为驻蒙军（司令官为莲沼蕃中将，9月12日改为冈部直三郎中将），辖第26师、独立混成第2旅、骑兵集团（集团长小岛吉藏中将）、第5通信队等，配属给华北方面军，在华中派遣军主力的协同下，参加攻占徐州的作战后，于6月中旬归建回到东北。

与此同时，日本为准备对苏作战和迫于东北抗日联军强大压力，又不得不加强“满洲”地区的兵力。

1937年8月，将中国驻屯军第2飞行集团（集团长安藤三郎少将）调归关东军。10月，将第8师调入东北境内关东军序列，到1937年底，关东军已达5个师。

日本为进一步扩充关东军的实力，从1938年初起，关东军在师之上设集团军建制。1月，编组第3集团军。7月，编组第4集团军。同时，将第23师和第7师调入关东军。1939年春，关东军增编第6~第9独立守备队，并新编第1~第8国境守备队。5月，编组第5集团军。8月，编成第6集团军。9月，关东军飞行集团扩编为航空兵团。

1939年10月日本关东军编制序列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

关东军司令部

第3集团军司令官尾高龟藏中将

第 2 师 师长吉本贞一中将
第 8 师 师长塚田攻中将
第 12 师 师长上村清大郎中将
第 4 独立守备队
第 1、第 2 国境守备队
第 4 集团军司令官后宫淳中将
第 1 师 师长横山勇中将
第 8 独立守备队
第 5、第 6、第 7 国境守备队
第 5 集团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中将
第 11 师 师长内藤正一中将
第 24 师 师长黑岩义胜中将
第 6 独立守备队
第 3、第 4 国境守备队
骑兵第 3 旅
第 6 集团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
第 23 师 师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
第 8 国境守备队
关东军直辖部队
第 4 师 师长山下奉文中将
第 7 独立守备队
第 7 师 师长国崎登中将
珲春驻屯队
第 1、2、3、5、9 独立守备队
第 1 坦克旅
关东军炮兵队
野战重炮兵第 3 旅（欠一部）
关东军高射炮队
航空兵团

二、疯狂“讨伐”抗日联军，强化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七·七”事变后，日军为稳定其战略后方，以利于向关内大举进攻和加强对苏战备，更加疯狂地对抗日联军进行“讨伐”。从 1937 年夏到 1939 年 3 月，日伪军主要以三江（黑龙江、松花江、牡丹江）地区为“讨伐”重点，同时也对东边道地区继续进行“讨伐”。“讨伐”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计划越来越完备，反动措施也越来越毒辣。既有对抗日武装直接进行军事“围剿”的“治标”，也有动员日伪一切机构和力量，采用各种手段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孤立瓦解抗日武装的“治本”。关东军于 1937 年 6 月 11 日制定了《东北防卫地区治安整顿计划纲要》，决定“增加 1 个兵团的力量”参加对该地区的“讨伐”。7 月 16 日，关东军发布第 1063 号命令及附件《关东军司令部关于 1937 年第二期治安整顿计划要领》，进一步作了具体部署。其主要做法是：

第一，日军和伪满军集中兵力首先对活跃在三江地区的抗日联军主力进

行大“讨伐”。要求，“各地区防卫司令官”“彻底做好各自担任地区内的治安整顿工作”，管好各该“地区内的日满军警”；“第2、第3、第4、第5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应命令驻扎在自己防卫地区以外的部队，听从该所在防卫地区司令官的指挥，担负起治安整顿任务”；“飞行集团应根据要求，配合各兵团的‘讨伐’活动”；“日满军仍然继续做高度分散的部署”，以“充当治安整顿的中枢”；“北部东边道的治标工作，仍由满军独立进行”；对三江地区，在落叶期以后“集中使用特设游击队”。这种游击队，要在9月中旬以后组建起来；第2师两个独立连（每连定员100~150人。装备重机枪及其它所需武器，下同）；第4师两个独立连；第12师两个独立连；第4独立守备队两个独立连；第5独立守备队1个独立连。除此之外，各地区防卫司令官也可根据需要，在报告关东军司令部以后，组织使用游击队。日伪军以高度分散的部署来限制抗日武装的活动和迅速掌握情况，而特设游击队则用于对发现的抗日武装实施机动打击。

第二，日伪统治者极力推行建立“集团部落”，制定无人区的政策，以切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而使人民群众得不到抗日联军的保护，使抗日联军丧失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集团部落”，农民称之为“归大屯”，或“归屯并户”。“集团部落”形状，一般为正方形，边长200米X200米的，收容100户；300米X300米的，收容200户。周围挖有3米多深的壕沟，上有3米多高的土墙，墙上设置铁丝网，每隔100米修一座炮楼，由自卫团、治安队以至日伪军（1个班至1个连的兵力）进行警备，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均受到监视。1934年开始在伪间岛省建立“集团部落”36处，1935年一举达到1172处。

1936年，日伪当局制定了《治安整顿三年计划》。加紧建立“集团部落”；这一年共建3361处。1937年又建立4933处，到1938年末达到12565处。日伪当局在建立这些“集团部落”时，大批地破坏烧毁民房，迫害以至屠杀群众，仅1937年至1938年2月，为建立“集团部落”，就在伪三江省的桦川县南部地区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群众1.3万亲人，荒芜土地2100多垧，伤害牲畜4800余头。其中，仅冷家沟一屯就被烧毁民房300余间，伤害牲畜60头，毁掉水井7眼，无家可归的群众冻饿死30余人。

日伪当局还在“集团部落”内普遍推行街村制，实施保甲连坐，加强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住证明书、身份证，1939年8月以后又加上了指纹鉴定。“集团部落”的建立与强化，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抗联部队的活动。

第三，日伪当局在广大城乡收缴武器，进行政治诱降和“大检举”，瓦解抗日队伍，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群众组织。日伪当局估计，在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之前，散在民间的枪械不下130万支。到1937年末，收缴总数达150万支。虽然比预计的超出20万支，但仍认为有许多枪支未收回，便大幅度增加警察力量进一步彻底收缴。

1938年收缴221161支，1939年收缴143047支。所谓政治诱降，就是日伪军在对抗日联军进行“讨伐”的同时，组织军警官宪搜捕被打散后三三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16~835页。

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编：《满洲国警察史》中译本，1990年版，第244、536页。

五五潜入民间的抗联人员，劝其“归顺”及通过叛徒奸细等策动抗日军政人员中的下坚定分子叛变。“归顺者”要供出同伙，填写“归顺誓约书”、“归顺批准证”，列入“归顺匪徒名册”，并接受所在地警察署每月至少一次的考察。

1936年度日伪共捕获这类人员14630人。从1938年2月起，为配合对三江地区抗日联军的“讨伐”，伪满警察全力开展了“北满地区特别归顺工作”，在各省维持会、协和会及叛徒奸细协助下，于1939年策动救世军军长王荫武、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第9军军长李华堂等，先后率多名部下叛变投敌。日伪在东边道地区进行“讨伐”时，也由日伪军警一起在现地组成了“省归顺工作班”，伪满警务司组成“中央特别归顺班”，对抗日联军部队开展了瓦解工作。

1939年10月，日伪开始“东南部地区治安整顿工作”时，重又组成了“特别临时归顺工作班”，与“讨伐”相呼应，瓦解抗日联军1000多人。日伪当局除以军事“讨伐”与招降相结合，“围剿”抗日武装之外，还在军事“讨伐”地区和其他地区实行所谓“大检举”，搜捕与残杀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和民众，摧残与破坏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反日党派的组织 and 群众团体，使整个东北地区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所谓“三年治安整顿”期间表现尤为猖狂。

1937年4月15日，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和伪滨江省警务厅破坏了中共哈尔滨市特委及其所属地下组织之后，又破坏了中共大连市委、磐石中心县委、柳河县委和抚顺特支等。这次大逮捕一直持续到11月，先后共有745人被捕入狱，其中195人惨遭杀害。据伪滨江省警务厅司法科司法股长筑谷章造在1954年8月18日写的笔供：“在四月十五日早晨一齐动手……逮捕总数是二百零七名……将其中四十三名判处死刑，四十名处有期或无期徒刑”；“关于大连、柳河、磐石等地……共逮捕约三百人，判处死刑的一百余入”。1938年3月15日凌晨起，佳木斯日本宪兵队及所属各县宪兵分队、分遣队与当地日伪军警计1000余人，根据长期侦察和叛徒告密而掌握的情况，在伪三江省的汤原、依兰、桦川、富锦、勃利五县及佳木斯市，实行“一起大检举”，制造了“三·一五”事件。这次“大检举”持续到7月8日，有共产党员及抗日群众328人被逮捕，其中8人被杀害，81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使上述一市五县的中共地下组织和救国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使东北抗日联军失掉了地方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的有力支援。

第四，日伪当局采取严厉的经济控制和经济封锁措施，妄图使抗日联军失去生存和战斗的条件。“七·七”事变后，日伪当局对农产品的购销采取了垄断政策。

1938年8月，制定了《米谷管理制度纲要》。

11月公布了《米谷管理法》和《满洲粮谷股份公司法》，规定稻米、高

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编：《满洲国警察史》中译本，1990年版，第290～210页。

《黑龙江党史资料》第7辑，1986年，哈尔滨出版，第215～216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6～108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6～187，190～191页。

梁、玉米、谷子、大豆等粮食的购销、加工、运输均由伪满政府控制。同时，还规定“集团部落”不许到4公里以外去种地。秋收时，要清查地亩，核实产量，强制农民如数缴粮，防止瞒产私藏，如有私人买卖粮食，一经警察密探查知，不仅粮食要没收，还要严加惩处。另外，在抗日游击区附近的大小城镇，实行物资专卖，用各种复杂手段对购买者加以限制。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实行“配给制”，特别是对布匹、棉花、胶鞋、食盐、药品控制更加严格。凡是资助、供应抗日联军或代为采购枪弹、粮食、服装、医药等物资者，一律按所谓“经济犯条例”，以“通匪”罪论处。

总之，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些反动措施，妄图使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分离，尽快消灭抗日武装，以实现其把中国东北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的目的。

第二节 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全国抗战

“七·七”事变后，东北沦陷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东北地区局部抗战变成全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配合全国抗战，袭击敌人后方和削弱敌人兵力，钳制日本侵略军入关，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新的抗战形势增强了东北抗日军民的抗战必胜信心，使东北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见附图8）

一、策应全国抗战，掀起东北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后，东北各地党组织、抗联各军也向广大东北人民发出抗日救国的号召，并积极领导东北抗日军民的对敌斗争。

1937年7月25日，在中共南满省委领导下的抗联第1路军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全体同胞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则，乘机崛起，为“恢复中国人之东北”而战，接着于8月20日，发布由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署名的布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野心，号召东北人民在全国总动员之下，“响应中日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8月25日，中共吉东省委以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名义发布《关于抗日救国宣战运动的紧急通知》，提出了东北抗日军民的斗争任务：动员群众以一切财力、物力、人力援助抗日联军，号召伪军哗变，反正救国，集结抗日部队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等，动摇敌人后方，同关内对日作战相呼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9月18日，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也发出紧急通知，号召东北人民为配合全国抗战而积极行动起来，抗捐抗税，反对劳役和征兵，反对归屯和建立“集团部落”，破坏敌人兵站、仓库、交通，参加抗日队伍，袭击和消灭日本侵略军。

在全国抗战的鼓舞下，东南满、吉东、北满抗日游击区的广大群众，热烈响应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号召，秘密组织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支持抗日联军。仅据北满的汤原、依兰、桦川、富锦4县统计，抗日救国会和分会共发展到103个。一些地方还组织起游击连、农民抗日自卫队等抗日武装。依兰、佳木斯、富锦各地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参加抗日队伍。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卢沟桥事变，鬼子打进关。杀人放火，到处起狼烟。这一日，众百姓，扛枪上了长白山。”歌谣生动地反映了广大群众抗战杀敌的热情。至于以物资援助东北抗日联军，更成为群众的普遍行动。送粮食、运武器的到处都有，就连开明绅士也都行动起来了。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16页。

《东北人民抗日歌谣选》.第25页。

他们在春秋两季给抗日联军送粮、送菜，杀猪做饭，慰劳部队。

1937年8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从桦川县火花沟向依兰县境转移途中，于20日到24日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在“九·一八”国耻日，组织松花江下游地区爱国群众举行抗日反满大暴动。9月5日，中共汤原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制定了组织暴动的具体方案。抗日联军第6军第3师积极配合。同时，还派人加紧修理土枪、土炮，赶制大刀、长矛，为暴动作了充分准备。

9月17日和18日两天，汤原县格节河区人民举行抗日反满大暴动。1000余名暴动群众在宝宝山集会，县委领导人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号召大家不忘“九·一八”，不忘国耻，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与会群众群情激愤。接着，暴动群众手持武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了《告同胞书》等6种标语和传单，同时割断了汤原县城至莲江口等地的电话线。砍倒电线杆30余根，烧毁公路桥梁数座，完全阻断了通往汤原县城和佳木斯交通。驻守在格节河区丁家粉房的日本守备队，受到群众抗日暴动的威慑，整日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并于20日深夜狼狈逃走。在格节河人民进行抗日反满暴动的同时，汤原县龙区、鹤区、汤区也相继发生了反日暴动。这些抗日反满暴动，严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者，表现了广大东北人民不甘作亡国奴、誓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反抗精神，在松花江下游地区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在全国抗战和人民反日斗争高涨形势的影响下，许多地方的伪军和伪警发生动摇，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伪军伪警纷纷反正，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

1937年7月12日，宁安县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150人，经抗联第5军第1师参谋长张镇华等人进行积极工作之后，由大队长李文彬毅然率领全队倒戈抗日，击毙日本指导官津村昌、日本教官加藤直秋等8名，焚毁森林警察队的防所及附属设施，携带全部武器装备投向抗联第5军。7月15日，官兵被编为抗联第5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张镇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团。为欢迎该部反正抗日的爱国行动，抗联第5军举行了军民联欢誓师大会，发布了《三道河子森林警察队反正抗日救国告各地民众及满军满警书》，指出：“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各地满兵、满警现在就应当一齐哗变出来，反正救国”。会后，周保中军长亲率警卫旅移师依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继三道河子森林警察大队起义之后，驻依兰伪军第38团机枪连等共118名士兵，于8月21日携带迫击炮1门，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步枪100余支举行起义，参加了抗日联军第6军，被编为第1师第6团。9月10日，驻勃利伪军第29团600余人，也在牡丹江东小河沿附近反正，加入抗联第8军。这些伪军警起义，引起了驻守在依兰、桦川、富锦、宝清一带的伪军第23、第24、第26、第30、第35团以及第38团残部的动摇，致使伪统治者惊恐异常。为防止伪军起义，日伪当局不得不采取监视、缴械甚至遣散等办法，严加控制和防范。

二、抗联备军广泛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日伪军

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下，东北抗日联军广大指战员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加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伪军的不断反正，抗联队伍扩大，实力增强，为了配合全国抗战，全力钳制日军入关，各部队都猛烈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

为了适应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共满洲省委被日伪破坏后先后成立中共南满、吉东、北满省委的实际情况，东北抗联亦随之编成第1、第2、第3路军，分别归三省省委领导。各路军划分了活动区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

第1路军（1936年7月组成）

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杨靖宇 副总司令 王德泰

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杨靖宇 参谋长 安光勋

政治部主任 宋铁岩

第2军军长 王德泰（兼） 政治委员 魏拯民 政治部主任 全光

第2路军（1937年10月组成）

总指挥兼政治委员 周保中 副总指挥 赵尚志

（1940年2月2日任职）

第4军军长 李延平 副军长 王光宇 政治部主任 黄玉清

第5军军长 柴世荣 政治部主任 宋一夫

第7军军长 李学福 政治部主任 郑鲁岩 王效明（后）

第8军军长 谢文东 副军长 滕松柏 政治部主任 刘曙华

第10军军长 汪雅臣 副军长 张忠喜 政治部主任 王维宇

第3路军（1939年5月组成）

总指挥 张寿箴 政治委员 冯冲云

第3军军长 许亨植 政治部主任 张兰生

第6军军长 张寿箴（兼） 政治部主任 冯冲云（兼）

第9军军长 李华堂

第11军军长 祁致中 政治部主任 金正国

（一）东南满抗联第1路军频频出击，奋勇作战

1937年7月中旬，杨靖宇亲率抗联第1军直属部队约150人从桓仁西进，拟袭击奉（沈）吉线铁路列车，以造成抗日声势，扩大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途中，在兴京县（今新宾县）永陵街附近黄土岗山中与日军松原部队遭遇，激战达6小时之久，终将敌人击退。战斗中，随军部行动的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李东光牺牲。尔后杨靖宇率所部继续在兴京、桓仁、宽甸、本溪等地开展游击活动。9月，第1军第1师奉命到宽甸县小佛爷沟，同杨靖宇率领的第1军军部会合，经过充分准备，杨靖宇指挥军部直属部队和第1师3团共200余人，于10月31日袭击了宽甸县双山子和四平街的守敌。这次战斗，采取了围点打援的部署。首先派小股部队切断四平街通往本溪、桓仁等地的电话线，只留下通往双山子的线路；同时，将主力埋伏在敌军援兵必经的要道小佛爷沟山头 and 道路两旁。然后分兵三路佯攻四平街，迫使守敌向双山子求援，以便诱歼驻双山子之日军。战斗开始后，驻守在四平街的日军陆岛排急忙向各地求援。驻双山子的日军守备队接到求援的电话后，即由水出佐吉营长率领日军守备队和部分伪军，分乘3辆汽车急往四平街增援。当敌人进

入伏击圈后，抗联的优击部队开始猛烈射击并发起冲锋，敌汽车一辆被击毁，水出营长及同车的日军当即毙命。此时，围攻四平街的抗联部队按计划撤向指定地点。日军排长陆岛得知援军受阻，立即率兵出四平街前去援救，结果又遭到杨靖宇所率部队的截击，陆岛排长等多人被击毙，这次战斗仅2小时便胜利结束，共毙伤日伪军营长以下40余人，烧毁敌汽车2辆，缴获步枪30余支。

12月4日，杨靖宇率领抗联第1军直属队等约300人，在本溪县南营房附近同日军川野、木越、福本部队及驻南营房伪治安队等作战。次日，该部在南营房东南之老边沟山区又与日伪军作战，前后共毙伤敌人30余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30支。

第1军第3师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的指挥下转战于清原、开原、东丰、西丰和抚顺、沈阳东郊等地。7月18日，该师一部在开原县东松木岭与日军冈田“讨伐队”作战，击毙冈田中校和坂本少校等13名。同月，又在清原县七道河子设伏击毁日军汽车1辆，毙敌20余人。9月13日，师长王仁斋率小分队潜入沈阳郊区，在东陵附近智擒伪奉天省公署土木厅日籍官员村上博等。

10月5日，又潜入抚顺城内活动，使敌人不得安宁，10月下旬，王仁斋率队返回清原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钓鱼台遭到敌人伏击，英勇牺牲。

抗联第2军在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该军政委魏拯民的领导下，也在额穆、辉南、■江（今靖宇）、抚松、桦甸等地同日伪军英勇战斗，屡创敌军。

1937年8月，第2军独立旅之一部，在额穆老黑顶子与伪军作战，给敌人以有力打击，9月，第4师教导团在柳河与日本守备队和伪军作战，击毙日军营长以下10人。第5师在穆棱二站设伏，击毙日伪军20余名。第6师教导队一部在抚松西岗与伪军展开激战，毙伤敌人20余名。

10月26日，魏拯民指挥第2军教导团、独立旅和第6师夜袭辉南县城，取得重大胜利。辉南县城是日伪在南满的重要军事补给基地，驻有100余名日军守备队，还有一支60余人的伪警察大队和部分自卫团武装。战斗前，抗联攻城指挥部派侦察员对城内敌人军事设施、兵力部署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侦察，做出了周密的战斗部署。

26日凌晨2时，攻城开始，主力迅速从敌人防守较弱的南门攻入城内，敌人仓促应战。在抗联部队凌厉攻势下，20多名日军被击毙，并解除了部分伪警察的武装，受到打击的伪军龟缩回去再不敢出动。抗联部队立即打开敌军仓库和洋行，搬出大批粮食、布匹、棉花、药品等军需物资。对群众则秋毫无犯，还散发了《告民众书》、《告满军士兵书》等抗日救国传单。拂晓，结束战斗撤出具城。这时，前来增援的日伪军和海龙治安队，也遭到打援部队第6师第8团的迎头痛击。此次战斗，击败守城的日伪军，缴获大批物资，解决了部队所需冬装，扩大了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给群众以很大鼓舞。

辉南战斗以后，部队又分散活动，第6师第8团转往临江一带，独立师一部仍随第2军军部活动。11月中旬，魏拯民率部进入濛江县活动。12月，在江排子大森林中夜行军时发现敌军的一处宿营地，敌人正围着一簇簇火堆休息，枪支架在一旁，魏拯民指挥部队以突然袭击歼敌200余名，并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及两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抗联第1、第2军积极配合作战，在南满铁路沿线的两侧到处袭击敌据点，炸毁列车，焚烧军人库。在半年多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数十次战斗，

歼灭大批日伪军，并在盘石、柳河、临江、长白等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把南满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二）吉东抗联各军英勇战斗，消耗日伪军事力量

“七·七”事变后，抗联第4、第5、第7、第8、第10备军在中共吉东省委的领导下，在西起哈（哈尔滨）长（长春）线东侧，北达松花江右岸，东抵乌苏里江畔的广大地区，对日伪军积极发动进攻，扰乱了敌人后方，造成了很大声势，取得了许多军事上的胜利。

1937年7月14日，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第1师埋伏在穆稜县十站西盘道岭，袭击由牡丹江开来的日伪军用火车一列，击毙日军100余名、伪军30余名，击伤众多。7月25日，第5军第1师一部利用内部关系，解除了刁翎腰围子伪警察队及自卫团防所的武装，俘敌23名，缴获步枪21支、手枪2支。25日，第5军第1团第3连、教导队及第4军第3团，在三道通经6小时鏖战，击退日军170余人的进攻，击毙日军少校、中尉军官以下10余人。8月3日，该部队在刁翎兴隆沟、双鸭子“集团部落”，解除了自卫团的武装。8月13日，抗联第2、第4、第5、第8军各一部共250人，在第5军副军长柴世荣指挥下，对在三道通修建兵营的120余名日军发动攻击，激战半日，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4支、子弹500发。8月14日起，抗联第5军军长周保中指挥警卫旅在十大户与日军激战一天，毙敌官兵20余人，8月15日，抗联第5军第1师第2团，在牡丹江五河林半拉砬子设伏，击毙日伪军20名。以后，该部向绥宁西老爷岭方向推进，不断袭击敌人兵站，破坏交通运输。

8月21日，日军黑石部队600余名骑兵再次从孟家岗出动袭扰。抗联第5军军长周保中指挥第5军警卫旅、第8军第3师及独立师等部队共400余人，经过周密侦察和准备，用伏击战歼灭了这支日军大部。战斗前，抗联第5军警卫旅埋伏在五道岗南北高地1.5公里长的阵地上，隐蔽待机；第8军和独立师骑兵部队担任诱敌任务。是日10时，日军骑兵先头部队被诱进抗联部队伏击圈，接着日军骑兵主力也进入抗联部队伏击地区，这时，担负伏击任务的警卫旅战士一起向敌人进行猛烈射击，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顿时秩序大乱，数次企图冲出伏击圈皆被击退。与此同时，抗联诱敌部队也趁势向敌先头部队实施反击，将敌人压缩到岗南大道两侧。15时，抗联部队全线发起冲锋，敌骑兵200余人拼命突围，向太平镇逃去，16时，战斗结束。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300余人，打死战马200余匹，缴获钢盔、马刀、弹药等战利品甚多，五道岗伏击战后，这里的日军半个多月不敢外出骚扰。周保中近回牡丹江岸四道河子第5军军部，警卫旅由第5军第2师师长王光宇率领向主清转移。途经太平川时曾伪装成日军“讨伐队”，打开反动地主李家大院。随后在富锦县安邦河又与敌人激战，接着进入宝清与第5军第2师第5团会合。8月22日，第5军第1师第3团在师参谋长王毓峰和该团团长领导下，解除了伪军张营第3连的武装，击毙伪军1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72支、子弹万余发、皮大衣100余件。

东北抗联第4军自成立以来，转战于宝清、密山、饶河、虎林、勃利一带。1937年8月，第4军代军长李延平指挥第4军和第5军各一部，在二道河子公路上成功地伏击了来自宝清的一支日军部队，歼敌100多人，缴获步

枪 100 多支、轻机枪 3 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抗联第 7 军指战员积极发动群众，反对敌人的“集团部落”政策，宣传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政策，分化敌人，争取伪军哗变。这一系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第 7 军的队伍不断壮大，并组建了一支骑兵部队。

1937 年 9 月，为了对付敌人的冬季“讨伐”，第 7 军全部集中到虎饶地区，积极准备和储藏给养，在山区建立密营地。

东北抗联第 8 军是由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救国军改编而成。自 1936 年 9 月成立起到 1937 年 10 月，这一年的时间里，各部队积极活动在依兰、方正、勃利、桦川等广大地区，密切配合各联军部队，同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东北抗联第 10 军在汪雅臣军长率领下，经常袭击舒兰、五常、苇河一带日伪据点，并北进至延寿、方正一带，配合抗联第 3 军作战。

1937 年夏，第 10 军 100 余名战士攻打山河屯伪警察队，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

为了进一步发展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1937 年 9 月 27 日，周保中在牡丹江左岸的四道河子主持召开中共吉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决定继东北抗联第 1 路军之后，将吉东各抗日部队组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 2 路军，组织筹备委员会及成立总指挥部，以加强领导。

10 月 10 日，东北抗日联军第 2 路军筹备委员会成立，并发表通告，周保中任第 2 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随后，周保中先后到主清、饶河等地，对抗联第 4、第 5、第 7 军进行整顿，并率领部队向敌人发起新的进攻。他们利用夏秋季节，在图（图们）佳（佳木斯）铁路以东、松花江南攻击日军薄弱据点和屯垦军，取得许多胜利，第 5 军第 3 师第 8 团袭击驼腰子敌人采金船，经过激烈战斗，将保护该船的武装人员全部缴械。第 9 团又在虎林黑咀子街后营救出 200 多为敌人筑路的工人，并卡住敌人运货车，获得大批物资。10 月下旬，第 5 军第 2 师与警卫旅等部队，攻破富锦、宝清之间大孤山伪军防所，击毙敌军 10 余人，日本指导官和伪署长狼狈逃窜，团总以下 50 余名伪军被俘，缴获步枪 50 支、手枪 2 支。此后第 5 军军部转移到依兰，同第 8、第 9 军部队联合打击日伪军，进行了许多战斗。例如：11 月 5 日在依兰大岭顶子截击日伪军卡车战斗；9 日小烧锅战斗；17 日路家屯战斗；19 日大苇子沟战斗；12 月 12 日依兰横道河子战斗等等。

11 月，第 5 军第 1 师第 5 团第 2 连与第 2 军第 5 师部队，在刁翎西北楞一带同日军骑兵部队激战 5 小时，毙敌 17 名，伤敌 9 名。12 月 12 日，抗联第 5 军和第 7 军各一部联合作战，袭击宝清七星河镇，取得了 1937 年冬季反“讨伐”斗争的又一胜利。第 5 军在 1937 年一年之内在一系列大小战斗中，共歼敌 1000 余人，毙伤日伪军官百名以上，缴获枪支弹药、马匹、军需品甚多。由于游击战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抗日胜利的信心，各师、团都有扩大，第 2 师新编了 1 个游击团，军部教导队扩编为教导团。

东北抗联第 4 军经过整顿后，加强了中共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组织性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在 1937 年冬季反“讨伐”斗争中，第 4 军在第 5 军部队的配合下，积极主动地向敌人展开进攻。同年冬，第 4 军副军长王光宇率领第 4 军与第 5 军各一部共 100 余人在宝清活动时，遭到数百

名日军“讨伐队”包围，该部在王光宇指挥下奋力反击，毙伤日军40余人，突围成功。

12月28日，王光宇率领第4军与第5、第8军各一部共100余人，在反日救国会的配合下，袭击了桦川县聚宝山伪警察署，缴获警察署全部武装，计轻机枪1挺、步枪140余支、手枪6支和大量弹药，部分伪警人员在中共抗日救国政策的感召下，自愿参加了抗联部队。不久，抗联第4军在孙大脖子缴获伪军1个连的武器，得到轻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和一些其它物资。

抗联第7军和第5军一部骑、步兵共400余人，于12月12日民合袭击了七星河镇，消灭伪军1个连，毙伤日军30余人，其中击毙日本指导官和教官各1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迫击炮1门和其它许多军用物资。

抗联第10军，在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部成立以后，仍继续战斗在五常、舒兰一带。

中共吉东省委、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部对所属各军进行整顿的同时，根据部队发展和斗争形势的需要，于1937年10月成立了下江联军教导队，专门训练团以下干部。抗日联军第4、第5、第7、第8军共派出100余名学员参加训练，翌年3月结束。这些部队经过整顿和干部训练，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提高了组织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使部队进一步巩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为进行更加艰苦的抗日斗争做好了准备。

（三）北满抗联部队积极开辟新游击区，主动进攻日伪军

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的指示精神，东北抗联第3、第6、第9军及独立师，分别在松花江下游两岸和小兴安岭西麓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内的广大群众与抗联部队相呼应，积极开展扒铁路、毁桥梁、割电线、袭击敌人兵站、破坏交通枢纽等斗争，扰乱敌人后方，严重威胁着日伪在北满的统治，被日军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

抗联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张寿钱）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即发展到10个师。第1、第2、第3、第8师，活动在松花江以南的宾县、珠河、延寿、方正、苇河、五常、双城等县。第4、第10师活动在依兰、桦川、富锦、勃利、萝北、宝清、密山等县。军司令部直接领导的第5、第6、第7、第9师，活动在松花江以北的汤原、通河、巴彦、木兰、东兴、铁力、庆城、海伦、通北、龙门、奇克（逊克）等县的一些地区。

1937年7月，赵尚志率领部队在通北县境内多次袭击伪警察分驻所，给伪警以沉重打击。7月10日凌晨2时左右，袭击该县王通使屯，烧毁该屯警察分驻所，活捉分驻所长等5名，缴获步枪、手枪13支，马30匹，同年7月，第4师师长郝林率部在勃利县青龙山小五站一带活动时，遭到勃利县200余名日伪军的包围，郝师长掩护部队突围，不幸中弹牺牲，陆希田继任第4师师长。随后，该师成功地策应了20余名伪军哗变，并将40余名伪军缴械。

11月，第4师部分骑兵与第6军第1师共250人联合编成模范师，挺进饶河、抚远境内活动。同年冬，他们与抗联第7军共同在乌苏里江岸国宫镇、蒿通镇等地袭击敌人。第3军第5师骑兵部队在师长景永安率领下，在依兰

以东肖家屯与驻四合山的日伪军激战，给予敌人很大杀伤。尔后，该部又与第5军警卫旅第1团一起，在小门傅屯同日军150余名骑兵战斗3小时，毙伤敌人20余名，活动在海伦的第3军第6师第73团，同年秋在师长张光迪率领下，攻占侯家大屯，摧毁了伪警署；俘虏了伪警察署长和伪警察多名。第3军第9师在师长李振远率领下活动在汤原西部地区，7至10月间多次与日伪军作战，共缴获步枪100余支、轻重机枪6挺、炮1门、子弹数万发，击毙日军七八十名，俘虏伪军数百名。

11月间，第3军第9师根据军司令部的指示，经通河、木兰转战到海伦，与第3军第6师第73团会合，共同开展抗日斗争。

抗联第6军在军长戴鸿滨率领下，也积极在松花江下游及小兴安岭西麓开展游击活动。为反对“集团部落”政策，开辟三江平原游击区，首先在集贤夹信子解除了反动地主自卫团的武装，没收其全部资财。1937年7月，戴鸿滨率领军部保安团、特务连和第2、第4师共700多人进行西征，穿越小兴安岭，到达海伦县八道林子与第6军第3师先遣部队会师。随之乘胜攻击敌军重要据点叶家窝堡和吕缸烧锅，歼敌30名，缴获重机枪1挺，尔后，第6军远征部队又转战于绥棱、通北等地，攻克朱家站，缴获大量军需物资。8月中旬，戴鸿滨召集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返回汤原。九十月间，戴鸿滨率部返回汤原，投入了新的战斗。在此期间，第6军第5师开辟了绥(滨)同(江)抗日游击区，多次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同年10月，第5师在绥滨、同江连续袭击“集团部落”，不断打击农村保甲制伪政权，分化与争取伪警察，从而解除了绥滨第5区伪警察署和自卫团武装，缴获步枪40余支。11月，第5师蒲鸭河后方密营遭到敌人破坏，师部率领第1、第2团越过松花江进入富锦县别拉音山西部地区，与抗联第11军师长李景荫部会台。不久，这两支部队共300余人袭击了伪军第4军管区教导队，击毙日本教官1人，俘虏伪军1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

12月，抗联第6军争取了依兰县暖泉子伪自卫团团团长张广文率领40名自卫团员起义抗日，经中共富锦县委同意，将该部与安那河游击连合并编为抗联第6军第4师第17团(张广文任团长)，主要活动在汤原西部地区，保卫北满临时省委机关和第6军后方基地。

东北抗联第9军自改编以来，在松花江下游地区配合第3、第6军英勇战斗，打击敌人。根据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对部队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划分了作战区域。军部在方正县大罗勒密先后开办3期军政训练班，共训练了100多名干部战士，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第1师政治部主任郭铁坚率部活动在依兰、方正一带。第2师政治部主任王克仁率部在勃利一带活动；9月，转赴主清，与抗联第5军第2、第3师一起开展游击活动。

抗联独立师在祁致中率领下，战斗在富锦、宝清、桦川一带。1937年7月，独立师一部袭击了富锦县七区伪警察署，然后直驱同江县五顶山，攻下伪自卫团防所，解除37名团丁的武装。8月，又袭击了宝清县凉水泉子伪警察分驻所。此间，独立师第2旅政治部主任金正国率部在桦川县孟家岗长碰子，伏击向佳木斯护送驼腰子金矿黄金的一连伪军，当场击毙伪军杨参谋长等10余人，其余向独立师投降，缴获100余支枪和数百两黄金。8月21日，独立师一部与第8军第3师配合，将桦川县孟家岗日军黑石部队骑兵之一部诱至五道岗大道第5军警卫旅伏击圈内，协同攻击，取得重大胜利。同年10

月，抗联独立师在富锦第二区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 11 军，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军部下辖 1 个师，师长李景荫；师下辖 3 个旅。另有军部保安连和少年连。第 11 军编成后，部队分开活动，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第 1 旅仍留守依桦地区，协同其它留守部队，保卫后方基地安全。

11 月初，日军开始“冬季大讨伐”，日军步、骑兵约 2000 名在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向桦川、富锦、主清等地的抗联部队实施进攻。

11 月 1 日至 12 日，日军恃设桥场游击队和宪兵队一起，对桦川县七星砬子山里的第 11 军根据地密营发动进攻。第 11 军密营遭到严重破坏。

11 月 12 日祁致中率领军部和第 3 旅第 7 团，在富锦县富亭岗西北的黑鱼泡附近，同日伪军激战 3 小时，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11 月下旬，该部又到同江县十一甲以及阳川等地缴了伪自卫团 130 多人的枪械。

12 月末，军长祁致中赴苏求援。部队由师长李景荫率领坚持抗日斗争。

总之，东北抗联各军从“七·七”全国抗战爆发之后至年底，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广阔地域，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先后作战 300 余次，打击日伪“讨伐队”，破坏敌人交通和通信设施，袭击日伪军事据点，歼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钳制了 10 余万日军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同时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抗日联军队伍也进一步壮大。

第三节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严重地打击了日本殖民政策的实施，钳制了大批日军人关作战，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日本为消灭东北抗日联军，解除其后顾之忧，以便充分地利用它在东北的这块占领地，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从1938年起，大量地向东北增兵，对东北抗日联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讨伐”。同时，对东北人民和抗日志士，加紧推行其世界上罕见的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措施。因此，给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带来极大的困难。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的广大指战员，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中，一方面不断克服着自身存在的严重弱点，一方面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一、东北抗联各军进行西征和分区作战

1938年以来，日本侵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队加紧实施分区包围，多路“扫荡”，采取“铁壁合围”、“蓖梳山森”、“来回拉网”等办法，企图把抗联队伍一网打尽。特别是对南满和抗联部队比较集中的松花江下游地区用兵更多，“扫荡”的规模更大、更残酷。日伪军在南满“围剿”杨靖宇率领的抗联部队，一次就出动11个军管区的兵力。在松花江下游，日军用4个师以上的兵力和大批伪军，进行长期的“三江大扫荡”，对吉东省委和抗联第2路军所在地的依兰、刁翎地区，日军9000人“围剿”达6个月之久。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抗联各军决定向西远征和分区作战。

（一）抗联第1路军向山区转移，中共南满省委召开老岭会议，部队改编力3个方面军

战斗在南满地区的抗联第1路军，冲破敌人1937年冬季“讨伐”后，决定留第1师在桓仁、宽甸、本溪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由杨靖宇率领第1军主力于1938年初北上，开辟辑安老岭抗日游击区，实施分区作战。3月13日，第1军直属部队共500余人，奇袭修筑中的通（化）辑（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该部兵分三路，同时袭击了老岭隧道西口的施工现场、十一道沟发电站和十二道沟供应仓库，全歼守敌，烧毁了大批建筑材料，破坏了机器设备，大获全胜。翌日，该部队又在杨靖宇率领下，在距老岭西南10公里的十七道沟，与前来追击的日军部队及伪警察队120人激战4小时后，安全转移。4月，拔除了太平沟等敌据点。5月，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2军政委魏拯民率领抗联第2军一部，自辉南、金川、临江一带来到老岭山区，与杨靖宇会晤。抗联第1、第2军会师后，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1路军总部于1938年5月11日至6月初在辑安老岭五道沟联军密营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即第一次老岭会议。会上根据全国和东南满地区敌我斗争形势，决定了“在坚

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中，保存实力，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的方针；并提出为打通与关内八路军的联络，第1军应再次组织西征。会议还补选魏拯民兼任第1路军副总司令。

老岭会议结束后，抗联第1路军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在准备再次西征的过程中向敌人展开了猛烈进攻。6月6日，魏拯民率部按预定计划先攻下通辑公路上的蚊子沟敌据点，以诱敌前来增援，杨靖宇则率领第1军主力部队埋伏在蚊子沟西南方的公路两侧，待机歼敌。6月12日，伪军索景清旅第32团一部共140余人前来搜索时，在家什房子沟口被杨靖宇指挥的伏兵全部歼灭。接着，杨靖宇指挥抗联第1军教导团和第2师共600余名，连续两次袭击修建中的通辑铁路土口子隧道工程现场等，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其中6月24日第二次袭击时，有许多被解放的中国劳工当场参加了抗日联军。日本工人福间一夫也一起参加抗联队伍，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此期间，抗联第2军第4师转战在桦甸、蛟河、延吉等地，曾袭击蛟河县大青配“集团部落”，歼灭日军守备队20名，还在蛟河县漂河地区夜袭过日军部队。第5师在陈翰章指挥下，配合抗联第5军攻打了宁安县杨木背，击毙日军守备队30人；袭击了宁安县陡沟子“集团部落”，将自卫团全部缴械并处决作恶多端的伪自卫团长。第6师在金日成率领下转战在抚松、■江、临江、辉南一带。6月下旬，攻克抚松县南岗伪军第3团炮台，歼敌80人。7月，在辉南击溃70名伪军的进攻，毙敌26名。接着又在■江头道花园与200名伪军激战，取得了胜利。

正当老岭山区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发展的时候，传来了抗联第1军第1师长程斌在本溪境内率部叛变的消息。抗联第1路军总部随即于7月中旬在老岭山区召开紧急会议，即第二次老岭会议，决定取消第1军再次西征的军事行动计划；统一改变部队编制，撤销第1军、第2军番号，组成警卫旅和3个方面军，实行1区作战。以后，抗联第1路军先后进行了改编。警卫旅由原第1、第2军教导团合编而成，在杨靖宇的直接领导下，活动于金川、■江、辑安一带。第1方面军由原第1军第1师编成，主要活动在辑安、临江、通化、金川、辉南、■江等地。第2方面军由第2军第6师编成。主要活动在长白、抚松、临江、■江、和龙、安图、延吉、琿春、敦化、额穆、桦甸、宁安等地。

1938年8月2日，杨靖宇指挥抗联第1路军警卫旅和第1方面军一部共400余人，在辑安县城北方的长岗附近山地，伏击伪军索景清旅骑兵第42团和步兵第32团余部，经激烈战斗，毙伤敌人60余名，俘虏30余人，其中击毙日本指导官步兵上尉高风武治和骑兵中尉西田重隆，缴获机枪9挺、步枪130支、手枪4支及其许多军用物资，彻底消灭了这个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索旅。9月下旬，杨靖宇率部离辑安北上，向河里山区转移，在1个多月的行军中，沿途同敌人进行了14次战斗。

10月17日，部队渡过浑江到达临江县外岔沟，准备通过四方顶子向河里前进。不意遭到日军部队及1500多名伪军的重重包围。敌东边道“讨伐”司令乘飞机在上空指挥，双方激战竟日。抗联部队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未能突出重围。18日，夜幕降临，敌人进一步缩小包围圈。杨靖宇沉着果断，指挥部队从敌人兵力薄弱处奋力突出重围，使日本侵略者长期策划消灭杨靖宇部队的阴谋计划遭到破产。从此以后，杨靖宇率领第1路军总部警卫旅等转战在桦甸、金川、上江等县境，并于1939年春攻打桦甸

县柳树河子、木箕河及敦比大蒲柴河等敌据点，连续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与此同时，第1方面军几度进出辑安县境，多次袭击伪警察署和“集团部落”。第2方面军在临江分兵活动，转战在长白、和龙及安图、辉南等县。还曾过鸭绿江到朝鲜境内进行游击活动。第3方面军是于1939年7月最后完成改编的。在此之前，第4师和第5师曾配合总部警卫旅分别进行过攻打木箕河和袭击镜泊湖北湖头水电站工程等战斗。改编后，8月在安图县大沙河、大酱缸等地又取得了歼灭日本宫本“讨伐队”等重大胜利。

抗联第1路军自1938年7月决定改编为3个方面军，至1939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杨靖宇、魏拯民的统一指挥下，实行分区作战，积极打击敌人，使日伪军不得安宁，据日伪统计，仅1939年6至12月。抗联第1路军就与日伪军进行战斗276次，其中总指挥部49次，第1方面军23次，第2方面军41次，第3方面军55次，归属不明部队108次。其中第3方面军尤为活跃。

在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杨靖宇总司令收到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1938年11月5日发出的《给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向沦陷在敌人统治下已七年多的东北同胞们，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下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并“致最崇高的民族革命敬礼！”电文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继续抗战，停止日寇的进攻，以准备将来的反攻。”电文转告：“八路军一个支队曾到冀东游击。”最后“希望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志士及全体同胞，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期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电报不仅表达了中共中央对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极大关怀，而且为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增添了坚持斗争的力量。

（二）抗联第2路军第4、第5军主力西征，总部及所属留守部队原地坚持反“讨伐”斗争

抗联第2路军的反“讨伐”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自1938年初开始，敌人的军事“讨伐”日益加紧，抗联部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为了粉碎敌人企图将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部队“聚而歼之”的阴谋，打通与活动在东南满抗联第1路军和挺进到热河的八路军的联系，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第2路军第4军和第5军一部作为主力，包括王荫武部救世军等共680余人，向抗联第10军活动的五常、舒兰地区转移，采取新的军事行动。1938年5月1日，第4、第5军领导干部在主清召开会议，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这支西征部队分步兵、骑兵两路，统一由吉东省委书记兼抗联第5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负责政治军事领导，第5军军长柴世荣、第4军军长李延平和副军长王光宇等分别负责指挥各部队。7月1日，先遣队出发，7月2日远征部队从勃利县刁翎地区北上，袭击了牡丹江岸三道通，经过激战突破

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1939年。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182页。

敌人防线。尔后沿四道河子迅速西进，在荒无人烟的高山密林地带艰苦行军150多公里，越过老爷岭，7月8日逼近苇河县楼山镇。7月12日拂晓，西征军出敌下意地发起猛攻，顺利地占领了楼山镇，俘虏伪森林警察中队以下达40余人，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和粮食等。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当西征部队从楼山镇撤出后，敌人从中东路沿线及延寿、方正调来大批日伪军进行追击和堵截。西征部队遂决定分开行动：柴世荣率第5军教导团、第1师第2团及王荫武救世军部队共210人返回勃利县刁翎地区后方基地；关书范率第5军第1师110人南下，准备经过横道河子、老爷岭与第2军第5师会合后再西进；李延平、宋一夫率领第4军第1、2师和第5军第2师共360人继续西进，奔赴五常。

但是，由于继续西进的队伍对这一带的地理情况不熟悉，一度误入延寿县境，多次与敌进行遭遇战。7月末部队复入苇河县境，同南进迷路的第5军第1师巧遇，遂又一起向五常进发，还袭击了珠河县的元宝镇和沙河镇。这一带尽管曾是抗联第3军的旧游击区，但早已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各地修筑起“集团部落”，统治甚严。西征队伍步、骑兵行动参差，给养困难，只得靠强攻敌人据点来夺取，不断造成伤亡和减员。这时又发生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叛变投敌事件，造成极坏影响。8月初，敌人调集3000余名日伪军警进行追击和堵截，西征部队与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8月下旬终于进入五常县冲河山区。但因敌军的重兵封锁和分割包围，无法同闻讯前来接应的抗联第10军靠拢会合，被困饿于荒山野岭之中，仅能以山果野菜充饥，人员减少至200人。为缩小目标，决定第4军与第5军分开活动。第4军继续在五常县山区艰苦奋斗，9月下旬遭敌包围，由于作战牺牲、饿毙和逃亡，队伍减员很大。到11月下旬以后，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相继牺牲，第4军参加西南远征的部队损失殆尽。第5军西征部队在向舒兰转移途中遭受严重损失，第1、第2师失掉联系。第2师余部返抵宁安，与第2军第5师会合，一起转战在额穆、敦化一带。第5军第1师余部于9月初在头道河子渡过牡丹江，11月返回刁翎抗日游击区。其中第1师等部于10月中旬返回牡丹江地区时，在乌斯浑河渡口（今属林口县）遭敌袭击。抗联第5军妇女团冷云等8名战士，为掩护大队转移，猛烈向敌人射击，在子弹打光、后退无路的紧急时刻，宁死不屈，毅然决然地背扶着受伤的战友，步入浪花翻滚的乌斯浑河，溺江捐躯，壮烈殉国。这8位女英雄是：指导员冷云、班长杨贵珍、胡秀芝，原第4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

“八女投江”的壮烈事迹，激励和鼓舞着广大抗联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奋斗。

抗联第2路军总部及其所属留守部队——第4军留守处、第5军第3师及第7、第8军等部队，为策应第4、第5军主力西征，保卫后方基地和密营，在周保中的领导下与强敌周旋，展开了激烈的反“讨伐”斗争。

1938年春，大批日伪军及伪兴安军骑兵部队分路进攻富锦、宝清境内的抗联密营，3月18日，200名日伪军和100多名伪兴安军骑兵向主清西沟与宝石河子之间的尖山子第5军密营逼进。负责保卫密营的第3师第8团第1连得知敌人出动的消息，便由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等带领14名战士向蓝棒山北麓的李炮营出发，途中与敌遭遇，遂占领小孤山迎击敌人。敌人将小孤山四面包围，并以机枪和迫击炮猛烈射击，第1连战士不畏强敌，坚守

阵地，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临近黄昏时，指导员等多人已先后牺牲，弹药也已打光，双腿被炸断的连氏命令两名总部交通员和另外两名受伤战士转移，然后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近 100 人。不久，抗联第 2 路军总部为烈士们举行了追悼会，决定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以纪念为国牺牲的抗联战士。这 12 名烈士是：李海峰、班路遗、朱雨亭、魏希林、陈凤山、李芳邻、夏魁武、王仁志、张全福、杨德才、王发、李才。总指挥周保中亲笔写下诗文，悼念这些壮烈殉国的战士。

烈士山战斗之后，敌人继续向山区进犯，由于抗联战士浴血奋战，在这段时间里第 5 军第 3 师的密营没有遭到破坏。

1938 年 6 月，日伪在富锦、主清等地也加紧推行“归屯并户”政策。抗联第 2 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吉东抗日游击战争形势，并对各军的反“讨伐”斗争作了具体部署。第 5 军第 3 师奉命将第 8 和第 9 团分开活动。从 6 月中旬起，第 8 团 100 余人由主清抵达桦川县驼腰子地区，活动将近 3 个月，多次与敌人作战，钳制了敌人，在完成掩护西征部队西进的任务之后，于 9 月中旬又回到富锦、宝清地区坚持斗争。第 9 团在宝清东部与第 7 军第 3 师组成第 5、第 7 军联合部队，其任务是在宝清等地相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进行给养征发和军需品筹集，选择有利时机打击敌人。6~7 月间，这支联合部队在宝清南部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袭击伪警察署，捣毁“集团部落”，截断密（山）宝（清）公路，与敌人作战多次，钳制了大批敌人兵力。8 月，敌人进一步加强对富锦、宝清一带的进攻。13 日晨，近 200 名日伪军骑兵在飞机火炮掩护下，突然袭击了抗联小团山子临时看守所。第 9 团团团长戴克正指挥 14 名战士英勇抗击，激战 3 小时，团长以下 11 人壮烈牺牲。此后，联合部队一直处在敌人“讨伐队”的“追剿”之中。经联合部队干部会议研究决定，8 月 23 日留一部在双鸭子坚持活动；80 余名骑兵由李文彬、景乐亭两位师长率领奔赴大旗杆，进至富锦、同江一带，与第 7 军第 9、第 10 团取得联系，并负责筹措给养和服装。

在此期间，第 2 路军总部警卫部队与在主清活动的第 9 军第 2 师联合作战，取得数次胜利。9 月初，周保中率领这支部队由主清向依兰、方正地区转移，9 月下旬抵达刁翎地区。不久，在与西征返回的第 5 军及救世军的部队会合。这时，敌人动用约 1 个师的兵力寻歼抗联第 2 路军总部和第 5 军军部。11 月初，敌人调集大批“讨伐队”在数架飞机配合下，对牡丹江岸的五道河子、喀上喀、土城子等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集中袭扰，又向南推进。周保中率领总部直属部队 90 多人在牡丹江岸莲花泡、夹皮沟狭小地区，利用森林、山洞等巧妙地与敌人周旋 1 个多月，同派出去的小分队及第 5 军军部也中断了联系，形势十分险峻。到 12 月下旬才转移到牡丹江东岸，摆脱了敌人的“追剿”，同第 5、第 9 军和救世军军部取得联系，共同筹划突围斗争。

1939 年 1 月 6 日，周保中在柳树河子主持召开了中共吉东省委临时会议，着重处理了第 5 军第 1 师师长关书范动摇叛变问题，稳定了部队情绪，坚定了克服困难抗战到底的信心。随后，接连打了几次胜仗，部队也受到很大损失。3 月，日伪军约 6000 人，编成 10 余支“讨伐队”，对第 2 路军留守部队轮番进行围攻。第 2 路军处境十分困难。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刁翎地区钳制敌人，主力分路向外线转移。4 月初，第 2 路军总部和第 4 军留守部队开始向宝清、密山方向转移。日军步、骑兵约七八百人跟踪追击。周保中等指挥所部在葫芦崴子（今海林县境内）组织还击，毙

伤日军 120 余人。尔后越过图佳铁路，于 6 月 29 日到达宝（清）密（山）附近的蓝棒山临时后方基地。柴世荣率领第 5 军在向穆棱方向前进中被敌人发觉，遂于泉眼河设伏，激战 5 小时，共歼日伪军约 300 人。5 月初，第 5 军部队终于到达镜泊湖一带，与第 1 路军的第 3 方面军取得了联系，共同开展活动。在舒兰活动的第 10 军由军长汪雅臣率领于 6 月化装成伪军，在小南门至九十五顶子山的途中，消灭日军数十名。9 月，又在亚布利消灭日伪“讨伐队” 100 余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抗联第 8 军在日伪军频繁的军事“讨伐”和政治诱降之下，到 1938 年冬各师相继瓦解。

1939 年 3 月 19 日，早已动摇的军长谢文东率军部部分人员叛变投敌。随后，副军长腾松柏也投降了敌人，抗联第 8 军全部瓦解。

（三）抗联第 3、第 6、第 9、第 11 军的主力部队远征

1937 年底至 1938 年初，北满抗联部队领导人——第 3 军军长赵尚志、第 6 军军长戴鸿滨、第 11 军军长祁致中越界进入苏联国境以后，日伪军对松花江下游地区的进攻有增无减。抗联各军与众多的围攻之敌进行艰苦的奋战和周旋，给予敌人以有力打击，同时自己也受到严重损失。为了突破敌人包围，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 1938 年 6 月初作出决定：将第 3 军由 10 个师缩编为 4 个师和 1 个警卫团；北满抗联各军主力部队立即分批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以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7 月，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钱（李兆麟）在萝北麻花林子召开军政干部会议，以贯彻省委关于组织西征的决定。

参加这次向西远征的有抗联第 3、第 6、第 9、第 11 军主力部队共 700 多人。在北满临时省委统一领导下，由张寿钱、金策、魏长魁、冯治纲具体组织，分三批进行。第 9 军军长李华堂因不同意远征，带领部分队伍潜入深山躲避，后于 1939 年 7 月率部携械投敌。

首批远征部队由第 3 军政治保安师师长常有钧、第 9 军第 2 师师长郭铁坚和第 9 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率领所部共约 150 多人组成，已于 6 月出发。部队分别渡过松花江，在通河小古洞集结并筹集给养后，即向海伦方向前进。途中遭敌袭击，魏长魁牺牲。6 月底，部队到达庆城九道岗附近时，再次遭到敌人包围。在突围时，常有钧和郭铁坚失掉联系，遂率政保师及第 9 军第 2 师第 4 团部分人员，于 9 月下旬到达海伦第 3 军第 6 师后方，在后来的战斗中，常有钧被叛徒杀害。郭铁坚率领第 9 军第 2 师第 5 团 60 多名战士空围后，继续前进，由于作战牺牲、饥饿、伤病，在 11 月到达海伦八道林子时只剩下 20 余人。

第二批远征的有两支部队：一支由第 6 军参谋长冯治纲、第 2 师师长张传福率领的军部教导队和第 2 师第 11 团及第 1 师第 6 团共 200 余人组成；另一支由第 3 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 6 军第 3 师师长王明贵、第 3 军第 3 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率领的第 3 军第 3 师和第 6 军第 3 师第 8 团、第 1 军第 12 团及第 4 师部分队伍共 300 余人组成。

第 6 军远征部队于 8 月上旬从萝北老等山出发，8 月 23 日，在汤原黑金河西沟岔口遭敌袭击，张传福师长及 7 名战士牺牲，给养和马匹大部散失。当时正值雨季，阴雨连绵，风雨交加，战士们穿着湿透的衣服，吃着野菜山果继续前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和堵截，冯治纲率领部队日夜兼程，过草

甸，穿树林，披荆斩棘越过小兴安岭。经过 1 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到达海伦东部八道林子，与第 3 军第 6 师师长张光迪所率部队会合。

第 3 军远征部队在金策等率领下于 9 月 6 日从萝北出发，冒雨入沼泽地行军，几天之内就有 10 名战士因饥寒患病而死，马匹也因疾病接连死去。部队进入汤原老游击区后，打垮伪自卫团筹备了一些给养，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给部队一些粮食和牲口，部队继续西进，伪汤原县治安队 300 多名骑兵尾追而来。远征部队以少数机枪手对其进行伏击，把敌人甩掉。为了缩小目标，远征部队决定步、骑兵分道前进，渡过汤旺河后，进入人迹罕至的小兴安岭密林。抗联战士忍饥挨饿，跋山涉水，经过：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 10 月 8 日抵达海伦白马石与第 6 军远征部队会合。

第三批远征部队由第 6 军军部教导队、第 11 军第 1 师共 100 余人组成，张寿钱亲自领导。第 11 军第 1 师师长李景荫负责行军的一切计划和指挥。1938 年 11 月初，部队在富锦集结，以后，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经萝北县境，到达汤原东部联军密营。进军途中曾奔袭鹤岗，筹备冬装和给养。

12 月 8 日，部队沿叉巴气河到达小兴安岭南麓王肇风密营，稍事休整。12 月 12 日，部队绕道北上，转向西行，穿越小兴安岭，向绥棱县境进发。在那寒冬季节，广大抗联战士顶风雪、冒严寒，前进在林海雪原之中。一些战士双脚被冻坏，步履艰难；给养断绝，战士们用雪水煮橡子、榆树皮和牛皮靬充饥，还要时常同围追堵截的敌人战斗。在露营地，战士们便围在篝火旁取暖、睡眠。这支部队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在 12 月 29 日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第 6 军第 3 师会师，胜利完成了西北远征的任务。这样就粉碎了敌人妄图把抗联队伍“聚歼”在三江省的阴谋，保存了北满抗联部队的主力，为开辟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组织北满抗联部队主力远征的过程中，以及在征途上，张寿钱和他的战友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露营之歌》，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将士们英勇、艰苦的战斗生活。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意哪怕松江晚浪主。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渍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兄弟们！镜泊瀑泉唤起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震长纆，缚强奴，山河变。
万里烽烟。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晶莹，致垒频惊马不前。

革枯金风疾，霜晨火不燃。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丛〔重〕山。
奋斗呀！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黑暗一扫完。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
团结起，赴国难，破难关，
夺回我河山。

北满抗联主力部队陆续到达海伦后，立即展开了创建新的游击区的斗争。

1939年1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九次常委会，总结反“讨伐”斗争和远征的经验，提出了北满游击运动的新方针和主动利用敌人弱点，及时地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以少胜多的灵活游击战术。会后，北满抗联西北临时指挥部为迅速开展黑嫩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将所属的抗联第3、第6、第9、第11军部队，按在不同区域活动的实际情况，统一编成第1、第2、第3、第4支队和第1、第2独立师。部队改编后，各支队、独立师进一步加强了部队建设。并与广大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黑嫩平原逐步站稳了脚跟。

1939年春，他们已协助建立了讷河县委，并在讷河、嫩江、克山等地发展了抗日救国会组织。同时，还成立了一支有三四十人的武装游击队——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抗联各支队时常以轻骑部队寻找敌人薄弱环节，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歼灭敌人，缴获敌人的武器和粮食。第2支队所属第6军第2师第12团，在支队长冯治纲率领下深入德都平原地区活动，先后取得在田家船口击溃日伪“讨伐队”及在谷家窑从尾追的近1000名伪军包围中突围的胜利。第2、第3支队混合部队也在攻克孙家船口及进攻青石岭木营的战斗中获胜。第3支队袭击日本移民团森林采伐场及日本森林采伐作业区，缴获数十匹良马，使第3支队变成了骑兵部队。第1、第4支队也多次与敌人作战，予敌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遭到了严重损失。

二、抗联各部队转入深山密林，坚持艰苦奋斗

（一）抗联第1路军化整为零，在长白山区艰苦转战

1939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对松花江下游抗日游击区进行严重破坏之后，又组成“日满军警宪特东边道联合讨伐司令部”，以日本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队长野副昌德为司令官，纠集7.5万余兵力，重点在东南满地区的通化、间岛、吉林三省实行疯狂的“大讨伐。”这次“讨伐”，敌人不采用以往集中兵力“进剿”的办法，而是派出精锐部队占据东南满大小城镇和山

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青年出版社，1946年版，第6页。

材据点，对抗联第1路军各部队进行长期封锁和分割包围；同时派出“出击队”、“挺进队”、“游击队”、“警防队”、“特搜班”、“工作班”等各种名目的“讨伐队”，到处搜寻抗联部队，一旦发现踪迹，就在飞机支援下穷追不舍。敌人为了捕杀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还专门组成“富森工作队”、“程斌挺进队”、“唐振东挺进队”等。敌人采取军事“讨伐”、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等手段，向抗联第1路军实施全面进攻，使东南满抗日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游击区不断缩小，抗联第1路军最后不得不进入通化及东满的密林山区，处于极度艰难困苦的境地。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杨靖宇和魏拯民于1939年10月1日至5日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召开中共南满省委和第1路军主要领导人会议，商讨对敌斗争策略。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将队伍化整为零，编成小部队，分散活动，以冲破敌人的“讨伐”。会后，抗联第1路军各部便在长白山区的■江、抚松、金川、辉南、桦甸、敦化、和龙、临江、辑安等地同敌人周旋转战，坚持艰苦斗争。

杨靖宇为了钳制敌军，使抗联各部队顺利转移，率领第1方面军部分队伍和总部直属警卫旅400余人，转战于桦甸夹皮沟、■江瓮圈、金川回头沟等地。入冬后，山林里气温常常在—40℃以下，大雪封山，抗联部队的衣食极度困难，战斗空前激烈，往往甩掉一股敌人，又遇上一股敌人，很难有机会休整。杨靖宇所带领的队伍在恶劣环境和残酷斗争中不断减员和失散，到1940年1月初，还剩200余人，月底就只剩60余人了。由于警卫旅第1团参谋丁守龙被俘叛变，供出杨靖宇的行踪，于是敌人调集多支“讨伐队”进行跟踪追击。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始终无法摆脱追击之敌，部队大量伤亡。到2月15日杨靖宇身边只有6名战士了，当晚，他命令警卫员黄生发等4名负伤战士转移，他与另外两名战士继续前进。2月18日，两名战士去找食物时，在大东沟屯附近牺牲。杨靖宇只身一人，饥寒疲惫，又患感冒，仍坚持与敌人周旋。2月23日，杨靖宇在■江县城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陷敌重围，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肠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这种不畏困难、威武不屈、战斗到最后—息的英雄气概，使敌人也为之震惊。

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优秀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人民政府于1946年将■江县改为靖宇县。诗人郭沫若也题诗《咏杨靖宇将军》：

“ 头颅可断腹可剖，
 烈士难消志不磨，
 碧血青蒿两千古，
 于今赤旆满山河。 ”

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1路军在副总司令魏拯民领导下，继续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1940年3月13日至15日，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南满省委扩大会议，作出了从部队抽调部分干部到地方工作，以恢复党的地方组织，密切同群众联系等项决定。会后，魏拯民抱病出征，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广大指战员紧密团结在魏拯民周围，在长白山区艰苦转战。

第1路军警卫旅主力在同杨靖宇分开后未能如期与总部会合，后与魏拯

民会师，一起坚持斗争。第 1 方面军主力部队在临江、■江县境频繁出击，仅 3 月份内，就连续袭击了珍珠门、大阳岔、三岔子、湾沟、大板石沟等地的伪森林警察队和日军长岛工作班。但这支部队在与敌军的残酷搏斗中，自己也遭到严重损失，严寒与饥饿也造成大量减员。第 2 方面军主力部队于 1940 年春在抚松、安图、和龙一带寻找敌人薄弱环节，积极而灵活地攻击敌人。3 月 25 日，又在和龙县红旗河取得了消灭日伪军“前田讨伐队”队长以下 140 余人的重大胜利。1940 年春，第 3 方面军在敦化牛心顶子山的几处密营遭到破坏后，失去了后方基地，处境更加困难。当他们袭击了敦化县黄泥河车站撤退到牛心顶子山时，遭到跟踪而来的日伪军 2000 余人的包围。这支抗联部队在激战中伤亡 30 多人，最后利用夜暗寻隙突出重围，转移到敦化一带，后又经延吉到达汪清，与第 5 军第 2 师会合，一起坚持斗争。

（二）抗联第 2 路军各部小股部队在乌苏里江左岸等地坚持游击活动

随着抗联第 2 路军总指挥部从刁翎地区向宝清转移，敌人即调集重兵对这一地区进行严密封锁，并不断对抗联部队展开进攻，形势极其严重。1939 年 7 月 10 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向各部队党组织发出了《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目前严重阶段的斗争任务紧急通知》，就加强部队领导，改变活动方式以及对敌斗争策略，作出了具体要求。第 2 路军所属部队根据《通知》精神，把部队改编成小股部队分散游击，以灵活机动的战术，破坏敌人交通线和军事设施，截夺敌人运输车辆，袭击敌人据点，积极打击敌人。7 月上旬，第 2 路军总部警卫部队在富锦县李金围子西北截获敌人一支运输队。7 月 28 日又袭击了富锦县兴隆镇附近的杨家“集团部落”。第 5 军第 3 师一部伏击了桦川县驼腰子日本采金船；8 月又袭击了宝清县柳毛河日本采金公司，均取得胜利。在此期间，该师第 9 团与第 7 军补充团共同袭击了虎林县黑咀子敌人的秘密军火库工程，解救出 300 多名劳工，其中 100 多人参加了抗联部队。11 月，第 5 军和第 7 军联合部队在大碰子东山和七星河地区与大批日伪军激战，毙伤不少敌人。

1939 年冬，敌人以数十倍于抗联部队的兵力集中向依兰、桦川、富锦、宝清各旦山边和森林地带大举进攻，使抗联第 5 军第 3 师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第 5 军和第 7 军在冬季反“讨伐”斗争中都受到很大损失。在敌人严密封锁下，部队给养经常发生困难，战士数日吃不到粮食、食盐，有时竟以树皮果腹；为防止暴露目标，往往露营时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医少药，还要日夜行军打仗，许多战士因饿、冻、病死亡，部队减员很大。1940 年 1 月，第 7 军缩编为两个团，由王效明任参谋长，全军只有 200 余人。3 月，第 2 路军总指挥部将第 5 军第 3 师仅有的 20 余人编入总部警卫部队。抗联第 10 军一直在五常、舒兰、榆树等县山岳地带孤军奋战，他们在与第 2 路军总指挥部的联系被敌人隔断的情况下，仍依托五常县南部的崇山密林，采取小股部队分散出击的方式，坚持开展游击活动。当时，第 10 军除从木场工人支援和袭击伪森林警察队解决给养外，经常几天吃下上顿饱饭，伤病员更是缺医少药。当年流传这样一首抗日歌谣：

“抗联医院不简单，
条枝软床稀乱颤，
松树桦皮当天棚，

绿草青苔当地毯。
伤员们，钢铁汉，
没有医药不呻唤，
一日三餐吃不饱，
伤口没好上前线”。

这首歌谣反映了第 10 军后方医院的真实情况，也表现了抗联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军长汪雅臣的眼睛、右臂、腿部等处，曾先后 9 处负伤，伤口溃瘍化脓，仍坚持工作和战斗。

（三）抗联第 3 路军各部在黑嫩平原英勇斗争

北满抗联各支队实行分区活动，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1939 年 4 月 12 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召开了第二次执委会议。会议郑重讨论了重大组织问题，其中一项是改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以第 3、第 6、第 9、第 11 军为基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 3 路军及总指挥部。5 月 30 日，抗联第 3 路军在德都县朝阳山后方基地正式成立。张寿箴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治委员。接着成立了三个地区性指挥部：龙北指挥部（指挥许亨植，后为冯治纲），龙南指挥部（指挥李景荫），下江指挥部（指挥徐光海）。各部队在黑龙江省北部十几个县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抓注敌人统治薄弱的环节，进攻车站，袭击机场，攻克村镇，解除伪警察署（所）的武装，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先后开辟朝阳山（德都县境）、阿荣旗（齐齐哈尔西北）、甘南等游击区。在嫩江两岸活动的部队，在 1939 年下半年内，与敌作战 40 余次，攻占讷何等城镇，歼敌 250 余人，缴获 500 余支枪。9 月，第 3、第 6 军联合袭击德都县伪警察署，毙敌 100 余人，缴获 100 余支枪。11 月，第 6 军一部在德都凤凰山反击日伪军“讨伐队”，击毙日军上校、中校各 1 人，少校 3 人，缴获长短枪 100 余支、机枪 5 挺。

抗联第 3 路军在黑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平原游击战术，即：灵活地大步前进、大步后退、迂回作战，伺机袭扰敌人；在群众未发动起来的地方，采取远距离奔袭，寻找敌人薄弱环节，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在群众已发动起来的地方，采取深入敌人内部，以里应外合的方式打击敌人。

抗联第 3 路军各部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在黑嫩平原与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打破了日伪的所谓“黑（河）、北（安）、龙（江）三省汇攻计划”。同时抗联第 3 路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约有 1/3 的指战员在战斗中牺牲。到 1940 年 2 月，第 3 路军各部只剩下 500 余人。

在北满抗联主力部队向黑嫩平原远征，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的同时，北满抗联留守部队在敌人严密封锁、疯狂“讨伐”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英勇奋战，艰苦奋斗，打击并钳制了敌人的兵力。一年半以来，这支留守部队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付出巨大牺牲，但却为坚持松花江下游游击区的斗争，配合北满抗联主力部队的西征作出了贡献。

三、东北抗日联军各路军缩编为支队，顽强地坚持对日伪军作战

1940年春，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在反对日伪军“大讨伐”的斗争中，遭到严重挫折，受了很大损失，原有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大都被破坏，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3万余人减到不足2000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便于对日作战和指挥，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省委代表和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召开会议，确定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制定了新的游击活动计划，决定第1、第2、第3路军所属的11个军缩编为10个支队：第1路军各军缩编为第1、第4、第7支队；第2路军各军缩编为第2、第5、第8支队；第3路军各军缩编为第3、第6、第9、第12支队。

伯力会议结束后，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返回东北，第1路军各部远在南满地区，被敌隔断，无法听到伯力会议精神的传达，因此，在1940年仍以3个方面军的番号活动。

1940年4月以后，抗联第1路军警卫旅一部转移到东满一带活动，并于7月在东宁县境与第2路军季青所部会合。随后又向南返，准备接出第1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率领的队伍。警卫旅另一部在敦化、宁安等地转战，曾在宁安鹿道东北、镜泊湖北湖头等地袭击敌人。后来两支队伍都在对敌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只有少数人员重返东宁片底子。第2方面军在安图、敦化、延吉一带多次与日伪军警作战，并袭击了敦化县哈尔巴岭车站等，年末去东宁活动。第3方面军在第5军一部西去联络第10军时，曾于7月下旬攻入五常县冲河镇，后返回镜泊湖周围。

12月8日，第3方面军指挥陈翰章所部在宁安镜泊湖南湖头小湾湾沟被敌包围，在突围战斗中，陈翰章壮烈牺牲。陈长期战斗在镜泊湖畔，被当地人民誉为“镜泊英雄”。第1路军各部在连续反“讨伐”斗争中，相继遭受重大损失。到1941年初，第2方面军一部约200余人转移到中苏边境休整，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1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因病无法随军转移，留在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密营休养，终因疾病冻饿于1941年3月8日逝世。这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又一重大损失。当月，第1路军一部改编为第1支队。

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同保中和新任副总指挥赵尚志于1940年3月上旬返回下江地区，向崔石泉、王效明等传达伯力会议精神。4月初，召开第7军党代会，决定将第7军改编为第2支队，王汝起任支队长，王效明任政委。此后，该支队曾袭击宝清南日军屯垦小队，在大岱河设伏歼灭伪军20余人，袭击富锦县柳大林子伪警察队与自卫团，奇袭宝清县七星河镇，攻打密山县东二道岗日本移民开拓团等。在抗日联军胜利的影响下，驻宝清七星河镇的伪军约300人于9月中旬反正。敌人获悉后，急派飞机多架狂轰滥炸，并以大股兵力尾追，起义人员大部分逃散，只有34人正式加入抗联。活动在宁安地区的抗联第5军因受敌阻隔，未能与第2路军总指挥部取得联络和实行改编。

1940年冬，第5军一部在军长柴世荣率领下转入边境休整，另一部在新任军政委季青率领下转到珲春、汪清一带活动。奋战在五常山区的第10军，1940年9月袭击拉滨铁路日伪重要城镇据点山河屯及伪警察署，缴获大批粮食和其他物资。

1941年初，第10军在九十五顶子山露营时遭到敌包围，军长汪雅臣负

伤被俘后牺牲，部队突围散失，但仍有少数人员坚持斗争，直到抗战胜利。

第3路军新任政委冯仲三返回东北战场后，到海伦和绥棱向中共北满省委和第3路军总指挥张寿箴等传达伯力会议精神。经研究决定，将龙北部队编为第3、第9支队，将龙南部队编为第6、第12支队。经改编和整顿的抗联第3路军，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和后方群众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各支队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多次袭击日伪军事据点获胜。1940年8月，第3、第9支队由冯仲云指挥，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攻占克山县城重创日军守备队，缴获各种枪100余支。

10月13日，第3支队突然冲进嫩江城北的霍尤门车站，毙伤日军多人，俘虏伪军警100多人，缴获步枪120余支、弹药2000余发、战马200余匹和大批粮食、衣物等。第12支队于8月开赴肇州、肇东、肇源地区。

11月8日，第12支队联合当地义勇军及抗日救国会等地方组织一举攻占肇源县城，将伪军全部缴械，并打开监狱，解放了被关押的爱国者和群众。是役击毙日籍警务股长以下10余人，俘虏伪警察116名，缴获机枪5挺、长短枪300余支、子弹3万余发及其他军用物资。抗联队伍迅速扩大到140余人，并大部改为骑兵。但12月以后，大批日伪军进行反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肇惨案”，抗日群众惨遭镇压。为保存实力以利再战，第12支队向木兰、东兴、铁力转移。第2支队在青冈、明水、拜泉三县地区活动，也取得一些胜利。入冬以后，由于敌人加紧“围剿”，自然条件恶劣，各支队都先后遭受一些挫折和严重损失。

这样，到1940年末和1941年初，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已经进入极端艰难困苦的阶段。许多主要领导干部相继牺牲，抗联部队人员锐减。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广大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决心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除将部队陆续集中到中苏边境地带实行整训以利再战外，仍派留第3路军第3、第6、第12支队和第2路军第2支队一部，在北满地区和饶河一带，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其环境之困苦，斗争之残酷，时间之长，在战争史上是少见的。东北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大量消耗和钳制了敌人，对全国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一节 国内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抗日救亡斗争

一、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较之“九·一八”事变以来又有新的发展。在全国，从城市到乡村，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农大众，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民族存亡的关心，迅速形成一股锐不可挡的滚滚洪流。

7月8日，北平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学生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马上派代表赴宛平县城，对英勇抗敌的前线将士表示北平人民誓作坚强后盾的坚定态度。8日下午，被派的代表抵达宛平前线，冒着炮火向城上的守军将士递交慰劳函件及旗帜。守城将士和代表们一起宣誓：抵抗到底，与城共存亡，决不撤退。7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联络了协和、平大附中、同仁、道济、妇婴红十字等医院，腾出可容纳数百人的病房和床位，做好一切收治前线伤员的准备。上述单位还与各使团医官、妇女协会、青年会、国际妇女会、女青年会、基督教联合会、救世军、卫生局、戒毒所、银行、新药业等取得联系，采取共同行动救治伤员。北平城内的一些招待所，每日派人在德胜门至西直门之间巡逻，沿途查询有无负伤官兵，一旦发现，立即接回救治。在“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仅崇文门外东大地第一收容所，就收治伤兵200余人。7月21日，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提出，为了支援前线抗战，教职员工中，有月薪者，由各该单位制定捐助办法，开展捐钱捐物活动。同时号召财源宽裕者实行特别捐。

北平从“七·七”事变到沦陷，历时不到一个月。但北平市的各阶层和各救亡团体，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支前工作，为保卫北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会，是“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地。这个多年以来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都市，人们对帝国主义有着刻骨仇恨。因此，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抗日救亡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首先表现为组织上的大联合。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就有“救国会”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救亡团体。但由于国民政府奉行对日妥协政策，各条战线上的救亡团体既不能联合，又不能公开活动，因而其作用大受影响。全国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改变，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公开，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通过它在各条战线上的活动分子，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协”），这是上海最早由“救国会”改组为“救亡协会”的组织，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张志让等83人担任理事。成立初时有团体会员73个，个人会员251人。团体会员中包括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

继“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以后，9月12日又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这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据成立

的当天统计，团体会员有 28 个。其中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益友社”、“蚁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职协”的成员不仅有店主、经理、工程师、工商业者，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店员和工人，社会成分广泛，动员量较大。该会由沙千里任理事长。

此外，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成立了自己的救亡协会，这些协会都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1937 年 7 月 22 日，国民党上海当局，邀集了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简称“后援会”），并通过政府明令该会是上海所有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其它抗日救亡团体均需加入并隶属于“后援会”。因此，前述各抗日救亡协会成立后，在名义上都加入并隶属于“后援会”，但在行动上，“救亡协会”和“后援会”仍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实现了大联合以后，高高地举起抗日的旗帜，广泛持久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在淞沪会战中，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支援前线的工作。仅“文协”就组织了 30 多个宣传队和 40 多个慰劳团，同时与“职协”、“学生抗敌后援会”等协作，向前线派出多个战地服务团。1937 年 9 月 18 日这一天，是“九·一八”事变 6 周年纪念日，“文协”等 40 多个抗日救亡团体，组织了 3000 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要求政府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

11 月初，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死 4 名英国驻上海的士兵，在英国驻上海的机构力牺牲者举行葬礼时，各救亡团体联合组织了 3000 余人的送葬队伍，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口号，同声高唱抗日歌曲，慷慨激昂之情扣动人心，许多行人感动得为之落泪，不仅动员了群众，而且争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在众多的抗日救亡团体中，有的专门设立了演讲股，有的专门设立了演出科，还有的专门设立歌咏组。郭沫若、钱俊瑞等知名人士，常应“文协”之邀，出席各种集会和发表讲话。“职协”还动员其属下组织，在上海全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了许多演出队，不仅在上海城区演出，还深入郊区和内地，甚至到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演出。在进行口头宣传鼓动的同时，各抗日救亡团体还办了大量的报纸、刊物。其中“职协”创办了《职业生活》，“文协”创办了《救亡日报》，其他救亡团体创办了《世界知识》、《抗战三日刊》、《妇女生活》、《读书》、《朋友》等等。与此同时，各抗日救亡团体还积极开展救国募捐、救护伤员等活动。

上海沦陷后，租界未被日军占领。一些未及转移的抗日救亡组织的成员，利用租界作掩护，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斗争。他们以“联谊会”、“俱乐部”等名义，向上海人民传播抗战消息，发动募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筹集药品和其他物资。

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在比较不发达地区和边远省份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东南沿海的福州市，一些进步爱国的文化人士组织了“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并在其属下设立了“乡村工作团”、“救亡剧团”、“救亡歌咏团”等，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贵州省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也很活跃。“七·七”事变发生后，“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行了自己的油印刊物《贵州学联》，首期全文刊

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还利用寒假的时间，背着背包，步行数十里，到偏僻的山村安营扎寨，在广大乡村大量书写抗日标语，教唱和普及抗日歌曲。他们的活动，使这个处于偏僻地区的省份也迅速动员起来。

二、工人阶级的抗日救亡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虽然不如欧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强大，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却始终起着先锋的作用。在“七·七”事变中，地处前线的长辛店地区的工人，立即动员起来，向宛平、广安门、南苑等地运送了大批的枕木、铁板、铁轨，并帮助宛平驻军构筑阵地。卢沟桥地区的工人和农民，抽出了大批劳力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送情报，运送伤员，并且积极向军队提供粮食、饲料。甚至连磨刀师傅也到军营为部队的伙房磨刀。在“廊房事件”中，廊房车站的铁路工人，自动组织起来护路护厂，并派代表与当地驻军联络，主动帮助驻军解决困难。干津夫陷后，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工人，除了昼夜加班为前线输送军队和物资外，还抽调了大批工人组成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数十万工人纷纷组织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踊跃参加支前工作。有的工人愤怒捣毁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工厂、码头、仓库，不少工人离开日资工厂，宁可失业也不为日本人做工。在香港，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从8月15日至10月15日，20多艘日本轮船上的600多名中国籍海员毅然离船回国。在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前夕，广大工人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帮助政府和爱国资本家向大后方迁运了大批的工厂和物资，大大减少了经济损失。

上海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和当地进步工会组织，继续领导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日军占领租界之前，共产党和进步工会以租界作掩护，运用合法手段将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其中在金融界，组织了“银行业职员联谊会”，有会员约5000人；在洋行华籍职工中组织了“华联俱乐部”，有会员约6000人；在店员中组织了“益友社”，有社员万余人；在电车工人中组织了“电车工人消费部”，有成员千余人。上述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动员和组织了数千名男女加入新四军。截止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占领租界，各种组织均被取缔，上海工人的抗日斗争被迫采取分散的方式进行。

华北部分地区沦陷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占区秘密工作的开展，广大产业工人或参加八路军，或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坚持抗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工矿单位建立的工人游击队就有40多支。太原失守前，中共党员薄一波等人通过与阎锡山的关系，在太原等地组织了以工人、学生为主要成分的山西工人自卫队，是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太铁路、阳泉煤矿、榆次纱厂等单位工人，都组织了自己的游击队，后来合编为榆太游击支队。济南失守后，山东淄博煤矿向八路军输送了4000多名兵员，还组织了2000多人的游击队，配合山东的八路军作战。地处华北与东北咽喉地带的开滦煤矿工人万余人，1938年3月举行大罢工，一直坚持到5月。七八月间，唐山、赵各庄、村西、开滦等矿工人7000余人，举行抗日大暴动，暴动工人一部分由节振国率领转入农村加入冀

东人民抗日联军，一部分由于武器装备太差，缺乏训练和有利的组织指挥而溃散，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次暴动，对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1939年9月，山东淄博地区矿工将日军发电总厂炸毁，烧毁淄川洪山煤矿，使日本侵略者损失20余万日元。以青岛纱厂工人为主体的峙山游击队，经常出没于峙山一带袭击日军，给当地日军造成很大威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较之全国其它地区的发展更为深入。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据1939年至1940年的统计，晋察冀边区有县级工会31个，会员约7万人；陕甘宁边区有县级工会20个，会员2.7万余人；晋东南、晋西南、山东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都有基层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共有工会会员50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积极参军、参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据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春，通过晋东南各级工会登记的参军和支前的工人就有3万余人。同蒲铁路有工人8000人，直接参加八路军的在700人以上。北岳区19个县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间，工人参军的有5270人；冀中区在1941年的一年中，工人入伍的有4300多人；山东淄博矿区，从“七·七”事变到1937年12月，有4000多人加入八路军或游击队。广大工人除直接参军参战外，还积极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各项生产活动，为战胜敌人的包围、封锁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作贡献。据统计，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工人70余人，到1941年发展到6400余人。工业发达区和中心城市沦陷以后，一些工人带着机器来到根据地，他们不要边区政府任何投资，自己组织起来，成立生产合作社，由小到大，逐步形成生产能力，生产各种军民用品，满足根据地的需要。

三、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妇女奋然而起，以空前的规模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践，使中国妇女深深懂得，要发挥妇女的作用，首先在于组织起来。因此，在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过去个别分散的斗争，通过各种组织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

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是“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由何香凝、宋庆龄等妇女领袖倡议于1937年7月22日在上海成立。在这个抗日救亡团体中，有知名人士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杨虎城夫人等。成立的当天，何香凝宣布该妇女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后，立即分别通电各省，要求各省也成立相应的妇女组织。

1937年8月1日，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参与下，在南京成立了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宋美龄任主任委员。成立当天，宣布该会的宗旨是发动海内外妇女同胞“输才尽力”，为“保全国家的完整，保护民族的生命，应该尽人人的力量”。该会成立后，

也致电全国，要求各省成立分会。在该会的号召下，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以省长、市长夫人为首的妇慰分会。

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与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虽然不尽相同，但抗日救亡的目标是相同的。为了统一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前者于1937年8月4日主动改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简称上海妇慰分会）。据9月中旬的统计，该分会有团体会员20余个。上述两个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初，由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的沦陷，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的战争难民，其中儿童尤甚。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邓颖超、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刘清扬、沈兹九等人，联络各党派和各界，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中国儿童保育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广东、广西、安徽、四川、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陕甘宁边区以及香港、南洋各地华侨社会，都建立了“中国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各党各派各地区的妇女领袖到庐山举行妇女工作谈话会。中共方面的邓颖超、孟庆树参加了会议。会中，宋美龄提出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改组并扩大成为全国性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会议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

庐山妇女工作谈话会的召开，是国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由以反共为宗旨向以抗日为宗旨的一个转变。“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1934年2月在江西南昌提出的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宣扬封建道德的思想灌输运动，其目的在于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是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工具，是一个反共组织，宋美龄将其改组为以抗日为宗旨的组织并容纳了邓颖超等共产党员，形成了左、中、右各派力量联合的抗日救亡团体，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转变。改组后的“妇指会”，在各派的共同努力下，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在1938年淞沪会战周年纪念时，该会仅在武汉一地就动员了400多个团体，组织了380多个宣传队，开展声势浩大的保卫武汉宣传活动。在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妇指会”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

1939年3月发动了献金活动，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也陆续建立起来。在陕甘宁边区，中共边区党委于1937年7月作出了《关于妇女工作的决定》，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下的妇代会改组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妇女统一战线组织。随后，成立了边区各县妇女联合会。在晋察冀边区，1938年3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边区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了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在各中央局、省委都成立了专门指导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机构，北方局由杨尚昆、南方局由邓颖超、东南局由李坚真、陕甘宁边区由郭洪涛、山东分局由史秀云、北方分局由张瑞华、广东由张越霞、琼崖由刘秋菊、江苏由陈修良、河南由吴平、浙江由刘英、鄂豫皖由陈少敏等人担任妇女书记或部长。继各中央局、省委妇女救亡领导机构建立之后，从1939年3月至1940年夏，晋西

北、晋东南、冀南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建立了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系统。

组织战地服务团体赴前线，是妇女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的重要形式之一，全国各地几乎都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其中较有影响的如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地服务团和广西南宁、玉林妇女战地工作队等等。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立于1937年10月，其中大部分为女工。该团成立后，主要服务于罗卓英部，始时参加淞沪会战，后于1937年11月随军撤退至南昌、汉口，接着转战于苏、浙、赣、鄂、豫、湘等省。

1940年以后，国民党反共磨擦加重，由于服务团中有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国民党方面不允许她们在罗卓英部立足，被迫遣散。服务团员中一部分加入了新四军，一部分奔赴延安。

1937年8月，由丁玲任主任的第18集团军（八路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以后进入山西，在山西走遍了16个县市、60多个村庄，行程在1500公里以上。有时3天连演7场戏，越演情绪越高。只要一提服务团，老百姓几乎家喻户晓。

抗战初期成立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也是名声显赫的战地服务团之一。1937年9月，服务团由湖南到达淞沪会战前线。救治了大批伤员，坚持在前线服务将近3个月，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抗战中，妇女们除了进行战地服务以外，大量经常性的工作是在后方开展宣传鼓动和募捐钱物活动。“七·七”事变一发生，各地妇女团体就组织歌咏队、演讲团、戏剧组，采取各种形式向前线将士和后方人民宣传抗日到底的思想，坚定人们对抗战的信心。

上海组织的“孩子剧团”，是全国千千万万个孩子剧团之一，成立于1937年9月。淞沪会战中，孩子剧团在市民中巡回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话剧，曾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上海失守后，孩子剧团随军撤离，一路上，除继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老剧目外，还增加了演唱《在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深得官兵和群众的赞扬。孩子剧团到达武汉后，还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的接见，最后列编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一直坚持抗战宣传。

献钱献物也是广大妇女救亡的一项重要活动。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头几天，北平的妇女献了大批的钱物。山西太原的妇女捐献的金银首饰折国币达7000余元。“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何香凝率先捐献银元500元。在一天时间里，各救亡团体收到的金银玉器就有200余件。在捐献活动中，“妇慰会”的常委们积极带头，几天内购买救国公债23000余元。山东胶东地区的妇女，在抗战爆发后3个月的时间里，捐献了黄金50两，白银1万余两。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全国各地妇女募得现金1300余万元，金银首饰折款在5000万元以上。

在抗日救亡浪潮中，许多女青年和男子汉一样，积极参军参战，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部队专门设立了女军人训练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第5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女生大队、浙江绍兴妇女营、广西女学生军、八路军学兵队女生区队、新四军教导总队第8队、广东省第8区民众抗日自卫团妇女干训所等。

八路军学兵队女生区队在八路军学兵队中的序列为第5区队,有学员120余人,1937年11月7日正式成立并开学,1938年2月,在日军沿同蒲铁路大举南侵时,学员们被输送到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等抗日根据地。

第5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女生大队,1938年1月成立于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任青年军团长。女生队共有300多人,经训练后,活动在以潢川为中心的豫东南各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七八月间,日军进攻豫东南以后,女生队即随军撤离。

广西女学生军是广西学生军的一部分,有130人,1937年11月在桂林受训,12月中旬开抵武汉。

1938年2月由武汉开赴豫鄂皖前线,1939年2月以后进入大别山坚持抗日斗争。

浙江绍兴妇女营成立于1938年5月,分为宣传、武装、救护3个队。其中武装队开始时仅有17人,活动于平湖、海盐、海宁、嘉兴一带。1938年11月22日,妇女营奉命配合省自卫队偷袭日军王店据点,该营从硖石附近出发,渡过钱塘江,急行军20余公里到达王店。战斗发起后,妇女营负责火力掩护任务,战士们用步枪以集火射击压制日伪军,一直坚持了几十分钟,完成任务后安全撤离返回驻地。妇女营直接参加作战,一时成为百姓当中流传的佳话。1939年2月,周恩来在绍兴接见了妇女营战士。

第二节 少数民族和台湾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蒙古族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的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其中主要集中在察哈尔北部和绥远地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在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长期斗争中，蒙古族始终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抗日战争中，蒙古族人民继续发扬了这一传统，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发展起来的。在日军占领绥远以后，与其毗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就一直关注着蒙古族人民的斗争。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首先召开了专门讨论发动蒙古族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会议，提出“蒙古平民王公团结一致抗日”和“蒙汉联合抗日”的口号。会后立即派出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深入伊克昭盟，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

1938年4月，中共中央为加强蒙古族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成立了“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并以八路军警备骑兵第1团开进伊克昭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中国共产党派到绥远进行抗日斗争组织工作的党员，很快便在鄂托克、准格尔、乌审等地建立起党的秘密组织，在贫苦牧民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发动工作，以后又建立起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敌委员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同时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了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朗等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在蒙古族上层人士的支持下，成立了蒙汉游击司令部，并在鄂尔多斯草原建立了多支就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八路军警备第1团的活动也逐步地向桃力民、包头方向发展。

在“七·七”事变到归绥、包头沦陷期间，中共党员杨植霖和蒙古族青年高凤英等，在归绥以东滕家营子地区建立了一支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在大青山南麓和归（绥）武（川）公路沿线。至1938年秋，游击队的兵力有200余人，以骑兵力主。这支游击队的活动，为八路军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8年秋，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进入绥远的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得到蒙族人民的大力支援。

至1939年春，大青山支队逐步将步兵改为骑兵，在改建骑兵的过程中，广大蒙族人民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在牧民中掀起献马卖马热潮，很快解决了建立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匹问题。牧民们还不计报酬主动献技，充任义务教官，帮助战士学会养马、驯马、骑马、医马本领，在蒙族人民的协助下，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一支骑兵队伍就建立起来了。除此之外，在各地区还建立了10支由蒙汉各族人民组成的地方游击队。

在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绥远地区蒙汉各族人民在物质上也给予八路军以巨大支援。据1941年绥中地区的不完全统计，一年中，武川县交公粮8万余石，军马800匹；陶林县交公粮4万余石，军马200匹；归凉县交征款3万元，军马100匹。整个地区还征集了大批物资，折银洋约200万元，其中仅皮大衣就有4000余件，洋布100余匹。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广大蒙古族人民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支援抗战，而

且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仅大青山地区，惨遭日军杀害或因支援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就在1万人以上。

二、回族人民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族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迅速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在陕甘宁边区，回族人民组织了“陕甘宁救国宣传团”、“回民战地服务团”、“伊斯兰青年学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他们出版刊物，编演戏剧，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河北，文安县夏村回民在日军进攻文安时，自动组织起来袭击日军船只，打死打伤日军多名。冀中地区的回民群众，在抗战开始时就建立了“回民抗日救国会”、“回教公会”、“回民公会”等救亡组织。

1938年8月，又专门召开回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冀中回民抗战救国联合会”和各地的分会。晋察冀、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和延安，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组织。这些回民抗日救亡团体，对于动员和组织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回族人民武装抗日的斗争也十分活跃，许多地方都组织了回民支队。在河北，有活动在定县、河间一带的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活动在香河一带的冀东回民支队；活动在定县的7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献县、河间一带的8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任丘、肃宁、文安一带的9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武清、永清、雄县、霸县一带的10分区回民支队。上述各回民支队，总兵力达3000人。此外，在山东、华中和陕甘宁边区，也有人数不等的回民支队。

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是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一支回民抗日队伍，也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之一。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开始时，活动在定县一带的抗日义勇军第9支队，发动回族青年刘文正和白仲庆、马国忠等人，组织了两支回民抗日队伍。刘文正领导的回民抗日队伍有200多人；白仲庆、马国忠领导的回民抗日队伍有130多人。1938年初，河北人民自卫军主力由平汉路西返回冀中后，将活动在定县一带的回民支队加以整顿，编成河北人民自卫军干部教导队。这时，刘文正领导的回民武装发展很快，他们在河间组织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活动在献县一带的回民抗日武装领导人马本斋率200余名回族青年来到河间，参加刘文正的回民教导队，马本斋任队长。1938年6月，河北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由安平迁到河间，与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合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约300人，马本斋任总队长。

1939年7月，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郭陆顺任政治委员，兵力约200人。

从1940年春开始，日军加紧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围攻。回民支队奉命在深县以南开展抗日战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30余次，毙伤日伪军500余人，5月，在康庄地区运用伏击手段，一举毙俘日的军80余人。此战受到冀中军区的表彰，授予“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的锦旗。毛泽东还为此专门题写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的题词。

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回民支队继续转战于清河、交河和子牙河以东等地区，常常出敌不意地给日伪军以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冀中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日军封锁的斗志。

回民支队的发展壮大及其斗争业绩，与马本斋的名字是紧密相联的。马本斋生于1901年，少时家境贫苦，四处流浪，后加入东北军，从战士升到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乡为民。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武装，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41年，马本斋指挥冀中回民支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由于他熟悉地形、民俗，善于指挥作战，常常给日军以突然打击，因而日本侵略者对他恨之人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消灭回民支队或逼迫马本斋投降。

8月4日深夜，日军从河间、献县、沙河桥、淮镇、景和等据点，出动1000余人的兵力，突然包围马本斋家乡献县东辛庄。次日清晨，日军将全村群众驱赶到清真寺门前的草坪上，用机枪和刺刀逼着群众供出谁是马本斋的母亲。群众不供，日军就灌以辣椒水、用火烧、用刺刀挑。马本斋母亲目睹惨状，不忍乡亲们为她流血牺牲，愤然高喊：“我是马本斋的母亲！”她毫无惧色地大声质问日伪军：“你们不是想抓马本斋吗，他是我的儿子，他就在河东岸，你们怎么不到那里去抓他呢？”日军把马老太太带回河间，软硬兼施。首先让叛国分子哈少符劝马母给儿子写信，要儿子为营救母亲而投降。马母当面痛斥哈少符是民族败类，指出他们祸国害民的罪行迟早要被人民清算。此计不成，日军的指挥官亲自出马，许诺：“你要是写信叫马本斋来河间谈判，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复”。马老太太怒目而视，指着日军指挥官说：“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叫他去当的，我儿子打你们是我叫他打的，叫我写信劝他投降，万万不能。马本斋就在河东，你们去找他嘛！抓我这个手无寸铁的老大婆干什么？讲条件，就是让本斋不要管我，好好带着回民支队彻底消灭你们这群强盗”。马母在日军看押下进行绝食斗争，于9月7日从容就义，时年68岁。临终前，马老太太对被押在她身边的一个亲戚说：“告诉本斋，叫他好好打鬼子给我报仇，给乡亲们报仇”。马老太太凛然殉国后，朱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等联名致电冀中军民，电报说：“冀中回民支队支队长马本斋同志的母亲，为敌人俘去，在胁迫利诱和凉水灌鼻等残酷严刑下，不仅拒绝为敌奸劝降自己的儿子，并表示决不屈服，而且严厉斥责敌人，终被折磨以死。在听到这个悲痛消息以后，我们认为象这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女子，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优秀的代表，这样惊天动地忠于中华民族的无上气节，足以愧死一切充当日寇走狗，出卖民族的衣冠禽兽，愧死一切对抗战大业表示动摇的民族败类。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回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绝不灭亡最具体例证。而我们八路军人中，有这样深明大义勇敢坚定的母亲，正是我们八路军的光荣。我们仅以悲愤的热忱，向马母英灵致崇敬的悼念，并向我们的马本斋同志，致以兄弟的慰问！”

日军胁迫马母劝子投降的阴谋失败后，仍不死心，继续利用汉奸特务诱骗马本斋投降。马本斋坚持中华民族爱国仇敌的高尚品格，并一一识破日军的阴谋，先后将劝降的敌特哈少符、马庆来处死。马本斋失去母亲以后，继续指挥回民支队，驰骋于大清河两岸的子牙河以东地区。在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作战中，回民支队转战于冀鲁豫和鲁西地区。马本斋也被提升为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数年来，回民支队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歼日伪军3.76万余人。马本斋于1944年2月7日病逝于冀鲁豫后方医

院，葬于辛县张鲁集，终年 43 岁。

除冀中回民支队外，渤海回民大队也是抗日战争中较有影响的一支少数民族抗日武装，1940 年 8 月成立，1941 年秋改编为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约 400 人，在几年的斗争中，这支部队共攻克日伪军据点 20 余处，歼日伪军 380 余人。

其他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的回族人民，有许多青年参加了正规军，转战于抗日战争前线，洒热血于对敌搏斗的战场。有的参加了本地的抗日斗争。他们都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东北和华南各地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最早最重，尽管日本侵略者与伪“满洲国”傀儡实行最野蛮、最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但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32 年初，朝鲜族人民在长白山地区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开始时没有武器，他们就用长矛、大刀、火枪与侵略者展开斗争。在夺取敌人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以后，在长白山南麓建立了游击基地，转战于安图、抚松一带。朝鲜族人民对自己的游击队给予巨大的支持，无代价地给游击队提供粮食、布匹、衣被等物资，使游击队顺利地渡过一个又一个严冬。抗日英雄朴吉松，是游击区朝鲜族儿童团员，在日军放火烧毁他居住的村庄时，他与其他七八个人侥幸逃出，躲进森林里。没有吃的，就以树皮草根充饥，宁肯饿死、冻死，也不向日伪军投降。后来他终于找到东北抗日联军，当了一名游击队员。从东满转战到北满，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日军俘虏。日军动用了所有的酷刑，企图逼迫他说出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他宁死不屈，最后高唱抗日歌曲从容就义。朝鲜族女战士朱新玉，当了 9 年机枪射手。一次在取给养途中被日军包围，她为掩护 6 名战友突围不幸被俘。在日军的酷刑面前，朱新玉毫无惧色，愤怒揭露日军蹂躏东北人民的罪行，最后高唱《红旗歌》就义。象朴吉松、朱新玉这样的抗日勇士，在朝鲜族人民中不胜枚举。

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地区，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同甘共苦，从“九·一八”以来就一直坚持斗争。

1937 年 9 月，汤源县格金河各族人民为声援关内抗战，组织了数千人举行抗日反满（洲国）大暴动。参加暴动的群众割断了汤源县城至莲江口、鹤岗之间的电话线，砍倒电杆、破坏桥梁，逼使日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在东北满族人民聚居的地区，也发生过多反对“满洲国”的斗争。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有许多满族战士，他们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兄弟一样，冒着严寒酷暑，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从一条山脉转战到另一条山脉，从一个村庄战斗到另一个村庄。他们的斗争，有效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在全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也十分活跃。

1939 年 2 月，日军占领海南岛以后，在海南岛黎、苗等少数民族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根据与国民党海南岛当局达成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以广东省第 14 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的番号，在琼山、文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独立队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吸收了大批黎、苗等少数民族青年参军，部队迅速由改编时 300 多人发展到 2000

多人，游击战争也扩展到东方、昌感、万宁、陵水、保亭、崖县等地区，最后向五指山发展。聚居在五指山地区的苗、黎等少数民族，举行了著名的白沙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数达2万多人，沉重地打击了占领海南岛的日伪军。

1939年11月和1944年10月，日军两次占领广西南宁。聚居在广西南宁、防城、邕宁、上思、扶绥、武鸣、宾阳、平南、蒙山等地的壮、汉、瑶族人民，组织了大批的支前队伍，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物资。在日军占领南宁、梧州期间，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组织了自卫队与日军进行斗争。

各少数民族通过抗日斗争，加强了同汉族人民的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全民族的团结，是抗日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

四、台湾和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台湾同胞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祖国大陆就予以极大的关注，经常提醒大陆人民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1931年6月，日本侵略军制造“中村事件”，《台湾新闻报》专门就此发表社论，揭露这是“武力外交”的“惯用手段”，提醒全国人民“军阀勃勃欲动”，“国民而深警醒”。“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新闻报》从9月26日开始，连续报道事变的真相，向台湾人民传递大陆人民抗日斗争的信息。“七·七”事变后，大陆人民举国抗战的行动给台湾同胞以极大鼓舞，他们进一步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斗争，用实际行动支援大陆同胞抗战。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间，宜兰等地数千名矿工举行暴动，袭击当地警察，焚毁日军弹药库，夺取武器，最后进入阿里山与高山族同胞联合起来，坚持抗日斗争。1938年夏天，台湾爱国者将日军久留米储油库炸毁：使可供日军使用6年的汽油全被烧掉，并炸死炸伤日军70多人。

1939年3月，高雄地区1000多农民壮丁为抵制日军征兵举行起义，夺取日军的枪支并与之激战，牺牲600多人。同年10月，基隆地区被强征入伍的300多名壮丁领到军械后，掉转枪口当场暴动，经数天战斗杀伤日军170余人，暴动后进入丛林坚持斗争。由于当时台湾所处的环境条件的限制，上述斗争没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但它却充分表现了台湾同胞的民族精神和斗争意志。

为了适应台湾地区的斗争条件，台湾同胞除了愤然举行武装暴动以外，还采取了多种形式进行斗争。他们或以隐蔽的手段破坏军需生产；或故意拖延征工、征粮、征税时间；或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碍运输。有的被强征到达前线后还利用机会进行斗争。台胞林新夏，1939年被日军强征到海南岛当监工，他利用当监工和担任日语翻译之便，经常了解日军的动向，多次向当地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使日军常常遭到出其不意的伏击。

在岛内的台湾同胞开展多种形式抗日斗争的同时，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台胞也积极行动，投身于抗日战争的行列。

1937年8月，厦门的台籍同胞首先组织了“抗日复土总联盟会”，接着，在上海的台胞也先后成立了“中华台湾革命党”和“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1939年，上海台胞进一步联合，组织了“台湾革命党”。

1939年春，在大陆日军占领区的台湾同胞，秘密组织了“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此外，在福建也成立了“闽台协会”等组织。1940年3月，台湾

同胞部分抗日组织派代表共同组成“台湾革命同盟”。该盟先后在闽南、浙东分设“南方执行部”和“北方执行部”，创办《新台湾》和《台湾民声报》等刊物，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初，“南方”“北方”两个执行部先后撤销，成立南方、福建、直属第1区、直属广州区、直属汕头区以及厦门、曲江、上海等8个分会，形成了遍及半个中国的台湾民众抗日团体。

台湾革命同盟还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台湾抗日义勇队”，这个武装组织是1938年建立的，人数最多时达300余人，分为3个队，活动在浙江沿海一带，1942年转移至福建，在龙岩设立指挥部。义勇队成立以后，经常进行对日军的骚扰活动。

1942年6月17日，日本侵略者在厦门举行霸占台湾47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一天，义勇队深夜出动，向日军设在厦门的“兴亚院”投掷数枚炸弹，同时在全市广为散发抗日传单，引起日军的震动。6月30日，义勇队以炸药炸毁厦门虎头山日军油库，再次显示了力量。7月1日，日军举行庆祝厦门市伪政府成立3周年活动，义勇队在会场上向参加庆祝会的日军投掷炸弹，炸死炸伤日伪军数十人。义勇队的骚扰活动大大鼓舞了厦门人民的斗志。义勇队除以军事活动对日军进行骚扰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在福建、浙江等地建立制药厂，制造了大批药品支援前线。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虽然未能大规模发展，但他们的斗争行动，起到了大陆人民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有效地配合了大陆人民的抗战。

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和澳门同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始终积极参加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港、澳地区是祖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国际补给线，大量的抗战物资由港、澳上陆转运内地。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港、澳设立了许多联络国际支援抗战的机构，均得到港、澳同胞的全力支持。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配合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了大量捐款支援祖国抗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日军占领香港。在香港沦陷期间，港、澳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援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派出武装工作队，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元朗、罗湖、沙田等地区，发动群众，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弹药，共获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数百支以及一批其它军用物资。接着开展游击活动，首先在元朗捕捉处决一批为日军服务的罪大恶极的汉奸，迅速控制了大雾山。同时在元朗、沙田等地组织了两支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西贡区的乌蛟腾村、王亚村，大埔区的罗湖、船湾、九龙坑一带，先后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新兵训练队。西贡区还成立了“游击之友”小组，以小规模骚扰的方式打击日伪军。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于1942年3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下辖长枪队、短枪队、海上队和市区队。港九大队成立后，采取了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高度灵活机动，强调打小仗、打巧仗，先后取得了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俘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炸毁九尤桥的胜利。以香港渔民为主要成分的海上游击队，经常袭击日军由香港到台湾、汕头的运输船只。1942年8月15日，海上游击队在大鹏湾黄竹角伏击日军为运输船护航的“海上挺进队”，激战2小时，击毁日军机帆船3艘。以后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袭击日军，缴获多艘装载军用物资的运输船。

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三节 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一、华侨社会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世界各地的华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给祖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有力的声援。全国抗战开始后，祖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实际行动给华侨社会以极大的鼓舞，使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向更有组织、更大规模、更讲实效的方向深入发展。

在马来亚新加坡，当华侨们获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各华侨团体的领导人立即行动起来，互相联络，共商救国大计。马来亚新加坡的侨领李俊成、叶玉堆、周献瑞、陈延谦、李光前、陈六使等，在“七·七”事变后立即进见陈嘉庚，商请由陈嘉庚出面组织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工作。陈嘉庚毅然应允，并积极活动。经过串联和协商，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接着，马来亚地区12个区的华侨，经过联络协商，成立了“华侨筹赈会”。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的领导下，该地区华侨筹赈祖国抗战的工作普遍地开展起来。为了进一步统一该地区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领导、规划和行动，在陈嘉庚的倡议下，建立了“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通讯处”，作为领导华侨支援抗战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统筹该地区华侨救国工作。陈嘉庚亲自任通讯处主任。

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1938年，菲律宾华侨援助前敌委员会和印尼侨领庄西言，先后致电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统一组织南洋各地华侨团体的筹赈工作，以更好地发挥华侨的整体力量。陈嘉庚十分赞同这一建议，在争得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参与下，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庄西言、李清泉、侯西反、李铁民等华侨知名人士参加了常务委员会，由陈嘉庚任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任副主席。“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据国民政府统计，到1940年底，南洋各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达436个。

在缅甸，1937年8月1日，在仰光成立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至9月，“救灾总会”下建立了130多个分会。9月间，又成立了“缅甸华侨妇女救灾总会”，同时也在各地成立了分会。除上述两个“救灾总会”是缅甸全国性的华侨筹赈组织外，在缅甸还有“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等抗日救亡团体。

旅居美洲的华侨在得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后，也立即行动起来。在美国，7月8日夜，纽约全市侨团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纽约全侨救济总委员会”。10月，侨领司徒美堂发动纽约市54个侨团，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作为统筹纽约地区筹赈工作的组织。在此期间，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援救中国委员会”，旧金山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后援总会”等组织。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建立了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团体。

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较早。在“七·七”事变前，英、法、德、荷、比、葡、瑞士等国，都建立了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华侨抗日救亡组织。

1936年9月，在陶行知、钱俊瑞、陆瑾、黄琪翔、胡秋原、陈铭枢等人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了“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个组织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世界各地华侨在建立、健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的过程中，还创办了众多的报纸、期刊，作为自己的喉舌，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呐喊。

这些刊物、报纸种类之多和发行量之大，在华侨社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颇有影响的，在巴黎出版的有《全民月刊》、《联合战线》、《祖国抗战情报》等；在英国出版的有《解放》、《民主阵线》等；在比利时出版的有《抗战消息》；在苏联出版的有《工人之路》；在德国出版的有《抗联会刊》、《反帝战线》、《反帝斗争》、《海外论坛》、《中国出路》、《尖哨》、《抗战情报》、《动员》、《救亡》、《呼声》、《蹶起》、《铁血》等；在纽约出版的有《华侨日报》、《五洲公报》、《先锋报》、《大美晚报》、《民气日报》、《新报》等；在旧金山出版的有《世界日报》、《学生周刊》等；在曼谷出版的有《曼谷日报》、《华星日报》、《华声报》、《民国日报》等；在菲律宾出版的有《菲岛华工》、《战时店员》、《学生战线》、《民号周刊》等；在越南出版的有《国民日报》；在马来亚新加坡出版的有《星洲日报》、《本坡要闻》、《马来亚要闻》、《南洋要闻》、《南洋商报》等。

众多的华侨报纸、刊物，在抗战爆发后都不断地发表社论、专论和报道，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励人们支援中国抗战。全欧侨联出版的《祖国抗战情报》，每天发行1000多份。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四家华文报纸，每家每天至少出两次刊登祖国抗日消息的专号，有的报纸以全部版面刊登抗日消息还嫌不够，报馆的职工还加班加点刻写蜡纸印刷宣传品散发。在越南出版的《国民日报》，过去只在出版地南析销售，“七·七”事变后，由于大部分版面刊登祖国抗日的消息和文章，大受侨胞们的欢迎，销售范围迅速扩大到河内、金边、万象、曼谷等地。《马来亚要闻》和《南洋要闻》有时甚至以全部版面刊登侨胞捐输的消息，极大地推动了侨胞筹赈活动的开展。

在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有着广泛的影响。该报为陈嘉庚1923年创办，抗战前就在华侨社会中颇有名声。抗战一开始，《南洋商报》就以其固有的爱国传统大量刊登抗战的消息和评论，对海外华侨的舆论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为把《南洋商报》办成真正的宣传抗日、激发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的报纸，董事经理决定在国内物色编辑人才。经周恩来推荐，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东方杂志》的主编胡愈之于1940年2月出任编辑主任。胡愈之到任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有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每周有一篇专论，并与香港国际新闻社保持不间断的联系，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南洋商报》还重点宣传了不分党派、不分老幼、不分智愚，以全国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思想，深得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拥护，因而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南洋商报》的成功，使得许多侨报争相仿效，纷纷向国内聘请编辑人员。如《汇总报》聘请乔木（乔冠华）、郑森岛等，此举曾一度惊动了英国殖民当局，竟误以为“乔木”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政论家“乔木”（胡乔木）而不许入境。《星洲日报》聘请了俞颂华等。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也通过华侨在南洋办了几家刊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些刊物和各地侨报均在共赴国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大华侨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积极开展了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在南洋，华侨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因而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成效显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南洋各地华侨几乎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在马来亚，各地华侨组织发起“救国连索运动”，其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在“救国连索运动”中，每逢有日本船只到达马来亚檳榔屿等港口时，抵制日货的组织都派人查验，如有日货则采取各种办法予以阻滞。平时组织锄奸团四出巡查，检查各商店、摊贩有无出售日货者，一经发现日货，即进行规劝教育，对屡查屡有者，则进行处罚。在泰国，各华侨商家议定，宁可没有利润，也不出售日货。过去以购销日货为主的商家，一律改国货或欧美货。工作在码头、车站的侨工，也都自动组织起来，火车、轮船一到，立即上前盘查，如有日货，就组织力量暗中破坏。在缅甸，1937年10月10日，各华侨团体组织了抵制日货大游行。在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地区，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也此起彼伏，使日本货成为过街老鼠。各地华侨的行动使日本遭受巨大损失。战前，日本渔船在海上捕鱼后都在新加坡上岸销售，战争爆发后，渔船往往不能靠岸，经营渔货的日本商店不是无货就是无人购货，许多渔店被迫关门。战前，新加坡每月从日本输入约为400万元叻币，战争爆发后的月输入仅为100万元。据马来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至1938年2月，马方输入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数字的锐减说明，在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日本在经济上所遭受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

二、华侨对祖国抗战的经济支援

全国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都把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采取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而且这种援助活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步深入，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系采取临时募捐的方式，筹集一笔又一笔捐款汇回祖国。后来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时日的延长，许多华侨团体和侨领们感到抗日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非经长期艰苦的奋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一些地区的华侨团体逐步把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1937年10月，马来亚檳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常月捐”宣言，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中国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长期抗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来认月捐。”华侨团体制定的月捐办法十分详尽周到，非常切合华侨社会各阶层的实际，因而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能够长期坚持。如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议定的月捐办法分为十一等，其中：优等无限，一等1000元、二等750元、三等500元、四等300元、五等200元、六等100元、七等50元、八等30元、九等20元、十等10元。不是厂主、店东的职员和职工，按月薪十分之一义捐。新加坡华侨筹赈会也规定了12条月捐办法。月捐运动开展起来以

后，迅速取得巨大成果。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如果以个人平均每月捐款数比较，则美国华侨居冠。美国有华侨10.3万人，每月捐款总数达58.3万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约为5.6美元。

除了常月捐以外，还有“特别捐”，“献金”、“认购公债”等等款形式。“特别捐”主要是通过劝募、游艺、球赛、义演、义卖、发售奖券等为专项用途捐款。1939年至1940年，美洲华侨力增强祖国抗战的空军力量，开展航空救国特别捐活动，仅此一项就筹得美金630多万元。1938年12月，武汉台唱团赴南洋为筹集抗战资金义演，侨领陈嘉庚等人积极组织 and 动员华侨购票，筹得国币1150万元。“献金”则是在举行节日、纪念日活动或个人祝寿、结婚等喜庆时，进行一次性捐款。如元旦献金、“七·七”献金、“九·一八”献金等。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在一天之内就献金3万多美元。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国航空节，一天就募得献金合国币630余万元。在1938年“七·七”这一天，泗水华侨组织了几支募捐队，一清早就背着钱箱走街穿巷，收集“七·七”献金。该市汽车运输商陈林将一天营业所得悉数捐给了募捐队。该城的光华照相馆专门发售“七·七”留影的纪念券，将所得收入全部交给募捐组织。巴达维亚华侨在举行“七·七”周年纪念活动时，将全城划分为20个区，分头开展献金活动。全市华侨还素食一天，将节余的钱献给祖国抗战。除了特别捐、献金等形式之外，各地华侨还成立了专门的国债劝购组织。在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期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华侨认购了2.5亿元以上。从1937年至1942年，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

爱国侨领陈嘉庚不仅为组织华侨筹赈祖国的机构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抗战开始他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接着又在当地认捐“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后来又捐200万元供扩充学校的基金。菲律宾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印尼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南侨总会常委侯西反，全美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和阮本万等，在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爱国巨商胡文虎，一次就认购救国公债20万美元，还捐赠200万元国币供建设残废军人疗养院和烈士遗孤教养院之用，1938年9月，又将存于国内银行的200万元巨款全部认购救国公债。

侨汇和投资也是华侨在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尽管国内战事频繁，形势极不稳定，但侨汇和华侨回国投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逐年增加。据国民政府统计，抗战开始后，1937年的侨汇为4.27亿元（国币，下同），1938年为6.44亿元，1939年为12.7亿元，1940年为13.2亿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南洋和香港均被日军占领，并对中国的侨汇实行封锁，因而南洋地区的侨汇骤减。但美洲的侨汇仍维持较高水平。每年达到7000至8000万美元。抗战爆发后，华侨对祖国的投资也很踊跃，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可以生产90多种成药提供前线使用。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大大促进了云南的矿物开发。爪哇华侨集资在四川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糖厂。马来亚华侨向广西运去新式机器，并投资1000万元帮助改造和扩大广西锡矿。

海外华侨的捐献、购债、侨汇、投资，对祖国抗战起着巨大的作用。据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 1940 年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披露，1939 年全国战费（不含敌后战场）为 18 亿元，而当年华侨捐款及侨汇即达 13 亿元。此外，华侨还捐赠了大量物资。据统计，在抗战的头 3 年里，海外侨胞捐献飞机 217 架，坦克 23 辆，救护车 1000 余辆，物资总数在 3000 批以上。尤其是华侨捐赠的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种多，质量好。同时多是根据国民政府开列的药单捐赠的。到 1940 年初，华侨捐赠的药品在 1000 “单位”

以上。这些药品对于救治抗战中的伤病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华侨对祖国抗战的人力支援

全国抗战一开始，各地华侨就掀起一股回国服务、参军参战的热潮。在印尼，1937 年 10 月，庄西言、柯全寿、许启兴等人发起组织救护队。当招募人员的消息在报上刊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报名者竟达 400 余人，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在泰国，当华侨得知祖国急需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以后，立刻有 300 多人报名应召。在马来亚新加坡，许多著名医生放弃自己开办的医院、诊所，率领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救护队。在菲律宾，华侨们踊跃集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先后组织了 4 批战地服务队回国。华侨组织的回国服务团体，在祖国抗战的各个战场上吃苦耐劳，救死扶伤，给祖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爪哇华侨救护队和吧城华侨救护队，成立于 1937 年 10 月，是回国较早的华侨救护队之一。爪哇华侨救护队在祖国缺医少药的关键时刻，携带了大量抗日战场上急需的金鸡纳霜（奎宁）等药品回到祖国，并立即奔赴各个战场救治伤员。被前线伤病员称为及时雨救护队。吧城救护队随队带回 9 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于 1938 年 6 月到达武汉，并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场救护工作。以后又转战于长沙、桂林等地，在长沙会战中救治了大量伤员。

菲律宾华侨劳工团联合会回国慰劳团成立于 1939 年初，团长王西雅，政治指导员沈尔七，全团 23 人，主要由学生、工人、店员等组成。

1939 年 5 月，该团带着华侨捐赠的大批药品、100 多面锦旗和一付铜管乐器，从马尼拉出发，途经香港取道越南从广西入境，于 6 月中旬到达桂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帮助下，经湘、粤、赣等省于 8 月初到达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尔后分别到 1、第 3 团和第 3 支队开展宣传慰问工作。在完成宣传慰问任务后，团员们纷纷要求直接参加战场的作战。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新四军教导总队为他们举办了集训班，经集训后，大部分人分配到新四军各部参加敌后游击战争，其中沈尔七、唐其忠、陈洛恨等人先后光荣牺牲。

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成立于 1939 年 1 月（简称东团），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该团成立后，由于要求参加的人数太多，在东团下又先后设立了吉隆坡队、两才队、文森队、加影队等 12 个队。

1939 年夏天，东团带着巨款和五六十担药品、衣物等，经香港进入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地区的战地服务工作。

广州失陷后，旅居南洋的琼崖华侨，于 1938 年 11 月在香港召开了海外琼崖华侨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和“琼崖华侨回

每“单位”药品共 50 余种，可供容纳 500 名伤兵的后方医院 1 个月之用。

乡服务团”。下分香港团（团长范世儒）、赵南团（团长符克）、星洲团（团长陈琴）、泰国团等。全团共 276 人。在 1939 年至 1940 年间，该团先后在文昌、琼山、琼东、乐会、万宁等县开设医疗所，为当地军民服务。在战斗中，他们曾经救治过一名被日军刺了 18 刀的年轻妇女，被群众称为“神医”。有一次，日军飞机轰炸琼山县甲子圩，炸伤数十人，但经琼团医护队抢救，无一人死亡。琼崖华侨回国服务团不仅以人力和技术支持琼崖抗战，而且不断地从海外运回医疗器材，帮助冯白驹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建立野战医院。

广州、武汉失陷后，由于支援中国抗战的海上国际交通大部被遮断，西南边镜上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陆上重要通道。滇缅公路由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 1146 公里。沿途翻越滇西的横断山脉，道路崎岖险峻，气象变化无常。保证这样一条公路运输的畅通，需要大批技术熟练的司机、修理人员和护路技术人员。当时国内人材奇缺，无法满足滇缅公路运输的需要。华侨领袖陈嘉庚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出面，通过南侨总会在华侨中招募司机和技工。南洋华侨报名者达数千人。最后，南侨总会批准了 3200 人分 9 批先后回国服务于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上的工作非常艰苦，除了随时有被敌机炸死炸伤的危险外，还要过“三关”：第一是“疟疾关”，滇缅公路通过疟疾流行区，许多侨工一到就染上此病，一病就是一年半载，甚至两三年不愈。每隔一天或两三天发烧发冷一次，有时行车至半途病发，只能在路旁的草窝里躺着，等待发热发冷过后才能继续开车。第二是“险路关”，滇缅公路许多路段山高坡陡，通过悬崖峭壁，特别是三台山一段，终年雨雾笼罩，路的一边是看不见底的深谷，由于潮湿多雨，路面特滑，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翻入深谷之中，非经过多次来回适应是不敢在这样的路段上开车的。第三是“雨季关”，每年雨季，终日大雨不停，能见度极差，加之山洪暴发，滑坡经常发生，随时都有被山洪和滑坡吞没的危险。在这种条件下行车修路，平均每天都有七八个人献身。但广大侨工毫不顾及自己，用生命和鲜血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除了滇缅公路上的侨工以外，其他服务于各个战场上的侨工也都一样努力地为祖国服务。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的力量薄弱，广大华侨为了加强祖国空军，不仅大批捐款为祖国购买飞机，而且还积极举办各种航校，挑选最优秀的华侨青年加以培训，输送回国驾机参战。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在波兰特市举办的航校，共培训了飞行员和技师 70 余人。美国的其他地方和加拿大、南洋地区的华侨，也积极向祖国输送飞行员，到 1939 年初，仅菲律宾就输送了 16 名飞行员回国参战。华侨飞行员在保卫祖国的空战中，创造了振奋人心的战绩。1937 年 8 月 14 日，日军工牌鹿屋航空队 18 架飞机两批由台湾起飞，窜入广德、杭州等地上空，企图袭击中国空军基地。归侨飞行员陈瑞钿、雷炎均、黄泮扬、苏英祥、黄新瑞等与国内飞行员一起驾机迎战，以 3 比 0 大胜日机，一时名震中外。1938 年，陈瑞钿在华中的一次空战中，遭到 3 架敌机围攻，当他弹药耗尽，不能再向敌机攻击时，毅然驾机与敌机相撞，由于日军飞行员胆怯躲避，两机翼相擦同时坠地，陈瑞钿敏捷跳伞负重伤。其他归侨飞行员的战绩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据广东省的统计，抗战期间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 4 万多人。广州失陷以后，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在香港组织一批华侨和港澳工人，回到广九铁路沿线的主安地区，与当地人民相结合，组成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莞模范壮丁队。仅东江华

侨回国服务团就有 50 多人参加了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据统计，抗战期间先后加入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的华侨及港澳同胞主 1000 人以上，加入琼崖游击队的有 200 乡人。加入抗日军队的华侨青年经过战争的磨炼，许多人成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或军事指挥员。印尼归侨女青年李林，1940 年任八路军第 120 师第 6 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时，在作战中英勇牺牲，被誉为女英雄。

第四节 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一、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中国全国抗战开始后，在国际上首先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的是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各阶层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

在欧洲，1937年8月，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援助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呼吁书，号召英国工人阶级大力开展援助中国、保卫远东和平的活动。英国铁路工人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集会，表示铁路工人将尽一切努力抑制政府将工业原料输往日本。英共主席波立特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抗战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都应当为帮助中国取得胜利作出贡献。英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援华运动，建立了“英国援华运动总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民权保障会”等十几个援华组织。1938年6月13日至19日，英国各援华组织发起“反日援华周”。英国民众踊跃捐钱捐物支援中国抗战。英国援助中国委员会几乎每周都收到大批药材、衣物。仅在1937年10月底的一周内就将1800码消毒纱布，1224磅棉毛织品和大批绷带运交宋美龄。此外，一些社会团体还开展各种募捐义卖活动筹集资金。伦敦市长领导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就募得捐款15.2万英镑，衣物数十万件，支援中国。法国的“法中之友社”1937年11月13日召开各援华抗日团体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法国政府制止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等决议。

12月22日，又召开反日大会，邀请吴玉章等人介绍中国抗战形势，通过了援助中国反侵略的决议，并致电蒋了石，表示法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西班牙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发生后，致电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也向国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加强反帝斗争和援助中国的宣传，并以抵制日货、拒绝装运往日本的武器等手段，制裁日本法西斯。拥有1900万会员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于1937年9月通过决议，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和发动会已国援助中国。

1939年9月，该会又在苏黎世开会，通过了中国代表朱学范提出的《加紧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援中国，其中仅募捐一项，就筹得556万法郎。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90多万会员的国际运输总工会，于1938年在卢森堡召开了有34个国家（地区）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各国代表共同提出的援华制日提案，决定国际运输工会的会员工人停止为日本装运军火、汽油等战略物资。

在美洲，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于1937年7月29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应当得到美国人民各种形式的尽可能援助”。美共还号召美国工人阶级“停止给日本运送一切军火”。美国费城拥有10万工人的产业工会，于1937年10月28日通过一项抵制日货的决议，决定“会员的家庭下购日货”。全美学生会于同年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了有50余所大学代表参加的援华反日大会，代表们当场将身上穿戴的日本丝袜、围巾烧毁。在中国

码，英制长度单位，1码=3英尺=0.9144米。

驻美机构和美方有关机构的组织、推动下，美国各阶层人士和民众筹赈中国的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1938年7月，美国卸任总统胡佛，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旧金山市民和中国人民将节约“一碗饭”的钱捐给中国抗战。全美至少有100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共筹得美金100万元。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发起“美国妇女购赠‘希望书’运动”，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领衔签名者达数百人，每人捐美金十元百元不等，几天时间就募得9万多美元。

1941年5月18日，美国援华联合会总会与美国各地中美两国知名人士的联合组织，共同发起完成500万元救济中国伤兵难民的“中国周运动”，有14名州长和200名市长发表了宣言，号召本地区民众踊跃参加。

在亚洲，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朝鲜人民，除了在国内坚持斗争外，大批爱国者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结合参加抗日斗争。金日成等朝鲜爱国者，率先在中国东北组织了以朝鲜人为主体的游击队，在中朝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为朝鲜的独立解放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对中国的抗战提供了可贵的帮助。1938年至1940年，朝鲜爱国者在韩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下，于武汉、重庆等地先后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来到延安的朝鲜志士，建立了“朝鲜义勇军”，他们都参加了中国抗战。在中国抗战期间，越南人民和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也以极大的热情支援中国抗战，胡志明来到中国，并参加了八路军，辗转于延安、重庆、昆明、桂林之间，在领导越南革命的同时帮助中国抗战。菲律宾、泰国、马来亚、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的人民，与侨居在这些地区的华侨联合起来，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活动，在政治上、经济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述许多地区的人民开展了武装斗争，与中国人民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国家，但日本人民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多次公开揭露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本质，表示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期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等，曾在延安工作，建立了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直接帮助中国抗战。日本许多知名人士、活动家、作家，如鹿地亘和夫人他田幸子，以及绿川英子、山田和夫、成仓进等，曾长期居住在延安或重庆，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侵略军的官兵中，许多人被俘后在八路军的教育和帮助下，翻然悔悟，加入反日本法西斯的行列，建立了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在“觉醒联盟”、“反战同盟”和其他日本人进步团体的领导和推动下，反战的在华日本人以多种形式对日本的士兵进行反战宣传。有的日本士兵被俘后还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勇战士。

二、白求恩、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印度援华医疗队

1938年初，正当中国抗战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托著名的加拿大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组织医疗队，支援中国抗战。

白求恩，1890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1936年曾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白求恩接受委托后，率领医疗队于1938年3月到达延

安。5月，医疗队由八路军驻地陕北的清涧出发，到达神木县贺家川八路军第120师重伤员收容所。在这里，白求恩对重伤员进行检查和处理后，继续深入根据地，于6月到达晋察冀边区，在五台金刚库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接见。白求恩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曾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十分感人。

1938年5月，白求恩由清涧到神木县贺家川时，行程300多公里，历时12天。行前，白求恩自己借来木工工具，亲自动手制作了驮运医疗器械的木箱子。经过12天行程到达贺家川以后，一小时也没有休息，就先查看了每个伤病员。吃过晚饭，白求恩又立即提着手电筒进行第二次查房，对每一个伤病员的伤势及生活情况都作了详细记录。查完房以后，又立即将自己带来的30多件毛毯、床单、鞋、袜等，一一分发给急需的伤员。第二天一早，白求恩又检查手术室，发现房顶没有天花板，手术时灰尘会落到伤口上，便立即组织医务人员缝制一个手术帐篷，接着便是做一整天手术。由于白求恩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使许多伤病员得到及时治疗而挽回了生命。白求恩到了晋察冀边区以后，与在贺家川一样，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去松岩口研究模范医院的计划，后来，白求恩又不顾个人安危，多次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极其危险的冀中平原为八路军救治伤员。白求恩被任命为晋察冀边区卫生部顾问以后，想方设法举办卫生训练班，为根据地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医疗卫生骨干。1939年11月，白求恩在为一名头部患蜂窝质炎的伤员手术时，在掏取碎骨的过程中左手中指被划破，感染上致命的病毒，未及处理又立即参加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黄土岭战斗，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在参加这次战斗中，白求恩虽感不适，但为了抢救战士的生命，他默默地坚持着。战斗结束后，当人们用担架将他抬到河北省唐县的黄石口时，病情已极端恶化。这时白求恩已预感到自己的病难于救治，便抢在昏迷之前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交待自己的希望和未及办完的事情。信中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

今天我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患者。

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唐县逝世。白求恩逝世的消息使聂荣臻以及接受过他治疗或者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不泪下。晋察冀边区政府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河北唐县军城村修建了白求恩墓。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高尚精神，称颂他是一个“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外国人。

白求恩逝世后，为了发扬白求恩精神，1939年12月1日，八路军总部颁布命令，将八路军设在延安的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不仅是白求恩精神的象征，而且也是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象征。在这个医院里，除了中国医护人员以外，还有一批援助中国抗战的著名的外国专家和医务人员。如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国名马海德）、印度医生D·S·柯棣尼斯(Kotnis)、M·M·爱德尔(Atar)、B·K·巴苏(Basu)、德国医生汉斯·米勒(Hans Mueller)、朝鲜医生方禹镛、澳大利亚医生富莱(Richard Frey)，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医疗部医生保尔舍克(Borcic)等。这些外国专家和医护人员，舍弃自己在国内的和平生活，到中国最艰苦最危险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中国军民一样地住窑洞，吃小米，穿草鞋，着粗布，共同力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其中乔治·海德姆和柯棣尼斯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一所名符其实的国际医院。它不仅在医务人员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支援，而且在经济、医疗器械方面，也得到国际上的大力支援。保卫中国同盟负责人宋庆龄在香港等地开展各种募捐活动，为医院筹集下一批又一批医疗器械和资金。英国朋友约翰·桑勤克诺弗特，曾慷慨地给医院捐献一辆大型救护车。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曾协助用飞机将一批医疗器械运到延安。在根据地人民和国际的支援下，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最终发展成为拥有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总共1.18万张病床的医疗网。

与白求恩一样在中国竭诚地力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还有印度援华医疗队。该医疗队是印度国民大会组织和派遣的。成员有队长M·M·爱德尔，队员M·R·卓克尔、D·S·柯棣尼斯、B·K·巴苏、D·木克吉等5人。医疗队于1938年9月17日到达广州，29日到达武汉，由于武汉失守，11月21日撤至重庆。在重庆经过多方交涉和几番周折，最后才获准去延安。在由重庆赴延安之前，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谭文山应五位印度医生之请，给他们每人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爱德尔称安德华；卓克尔称卓凯华；柯棣尼斯称柯棣华；巴苏称巴思华；木克吉称慕客华。

1939年2月12日，医疗队到达延安，14日受到毛泽东、王明的接见。3月18日，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被派到八路军军医院任外科主治医生。卓凯华被分配到卫校任教师。以后，印度医疗队又先后到各抗日根据地服务。他们在中国期间，积极工作，细心诊治伤员，以最大的热忱帮助进行护士教育和由医院代训的学员临床教学。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还会同延安的名医为周恩来会诊治疗骨折的右肘，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医疗队的5人当中，巴苏华和柯棣华在华工作时间最长。

巴苏华，1911年生，印度共产党员，1938年毕业于印度医科大学，同年9月来到中国，1939年3月至10月，在八路军军医院外科任主治医生，同年11月与爱德华、柯棣华一起，先后到晋东南、晋察冀前线作救护工作，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0年11月回到延安后，除继续服务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还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并在朱德任主席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中负责编辑《中国报道》杂志。

1943年6月回国。1985年卒于印度。

他们当中有的名字后来在报刊上写成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并一直习惯地沿用着。

柯棣华，1910年生，1938年印度医科大学毕业，志愿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来中国。柯棣华具有极为高尚的国际主义品质，在他离开印度到达重庆的时候，接到父亲在国内去世的消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劝他回去料理后事，他含泪谢绝说：“我们到中国来，不到延安就是没有达到目的”。柯棣华到延安后，在八路军军医院工作。这里虽然环境艰苦，比起被日军四面包围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还是安全舒适一些。可是柯棣华在医院工作不足半年，就提出要到抗日根据地的前线去。经毛泽东的慎重考虑和批准，柯棣华与爱德华、巴苏华离开延安，先到晋东南，后到晋察冀。在晋察冀，他们参加了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的火线上，柯棣华连续工作13天，接收800多名伤员，为585名伤员施行手术。在最紧张的时刻，柯棣华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柯棣华在担任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期间，在医疗药品的供应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上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为晋察冀边区的医疗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称他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家。”按照印度政府的规定，援华医疗队每年轮换一次。到1940年9月，柯棣华和巴苏华在华服务已届两年，印度政府多次催促他们回国，毛泽东也电促他们取道延安返印。但柯棣华却不肯离开。他热爱中国，憎恨日本法西斯，把能在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看成是自己最大的愉快。在他来华一年半的短时间里，就学会了中文。在敌后战争最困难最艰苦的1942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心甘情愿地在中国当一名普通的反法西斯战士。

柯棣华的身体历来不甚健壮。他患有严重的由寄生虫引起的癫痫病，到敌后战场以后，由于环境艰苦，营养不良，食无定时，居无定所，癫痫病越发严重。根据他的病情，领导多次劝他返回延安然后回国治疗，他却拒绝说：“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要还活着，就一不能离开伤病员。”由于顽固的癫痫病频繁发作，抢救无效，柯棣华于1942年12月9日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逝世，年仅32岁。对柯棣华的逝世，抗日根据地军民万分悲痛。各地军民都为柯棣华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毛泽东专门送了亲笔书写的挽词。挽词写道：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三、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是首先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共同申明两国均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规定“两缔约国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日本侵略者向华北华中发动大规模进攻，美、英等国采取“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中国无疑是有利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也是一个打击。《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商定了《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政府总数为5000万美元贷款，以向苏联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之用，年息3%，中国政府以茶叶、皮革、兽毛、锡、锌、钨、棉花、桐油、药材和红铜等偿还。1938年7月1日，中

苏代表又商定年息 3% 的第二笔 5000 万美元的贷款，分 5 年偿还。1939 年 6 月 13 日，中苏代表再次商定年息与前两次相同的第三笔 1.5 亿美元的贷款，分 10 年偿还。1940 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总数为 2 亿美元的两笔贷款。

苏联除了以贷款的形式援助国民政府抗战以外，还向中国提供大批军用物资。据国民政府方面的统计，在 1937 年到 1941 年中国抗战的 5 年里，中国向苏联购买了各种飞机 997 架，坦克 82 辆，火炮 1000 余门，机枪 50000 余挺，汽车 1000 余辆。

苏联除了以军用物资援助中国以外，还派出一批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帮助中国军队的训练，并且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先后来华参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 2000 多人，他们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等城市的空战，还多次出动轰炸机轰炸日军的机场、车站、港口、仓库、舰船等军事目标。据统计，苏联志愿队在华期间共参加了 20 多次重大战役，仅 1938 年即击落日军飞机 100 余架，炸沉日本舰船 70 余艘。在作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 200 多人在中国牺牲。

苏联援助中国抗战，主要直接援助了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几乎没有直接援助。如果敌后战场也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局面将会大为改观。

四、美、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美国政府采取了所谓“中立”的立场和“不干涉”政策，不仅对中国的抗战没有提供必要的援助，相反，在客观上鼓励了日本的侵略。日本占领南京以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才逐渐发生变化。

1938 年，国民政府派胡适使美，经过反复交涉，中美两国订立了桐油贷款协定，获得美国 2500 万美元贷款的援助。此后，又先后达成滇锡贷款（2000 万美元）、钨砂借款（2500 万美元）、金属借款（5000 万美元）、平衡资金借款（5000 万美元）等援助款项。但这些借款，只采取商业交易形式，不能在美国直接购买军火。

1940 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谈话，承认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联系，表示美国愿意承担这些国家兵工厂的责任，这才打通了中国直接在美国购买军火的渠道。然而，中国自广州失守以后，海上国际交通大部断绝，单纯依靠滇缅公路运输不敷需要，购得军火也只能少量运入，美国方面也常以运输问题为借口拖延供货时间，因而中国实际得到的军火与需要的距离仍然很大。

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较苏、美等国少，战争开始时，由于英、法对日采取妥协政策，因而对国民政府要求在对日问题上进行军事合作的事宜始终未予积极响应。中国为维护滇缅、滇越、桂越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曾与英、法两国政府多次洽商军事合作问题，也未取得一致认识。1938 年底，在美国给中国第一笔贷款后，英国先后给中国商业信用贷款及外汇平准基金等贷款共约 1000 余万英镑。法国亦给中国贷款 1.8 亿法郎。

〔苏〕安·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478 页。

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一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为经济贫困地区，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能够长期坚持极端艰苦的敌后抗战并使自己日益发展壮大，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从而真正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了广泛深入的人民战争。

一、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开辟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项重大决策。在敌后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最根本的问题是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全国抗战爆发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也随之流亡或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实际上除少数仍坚持抗日外，大部分是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有的则变为汉奸政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

10月16日，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人民的抗日政权。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为了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政府来领导战争，原来的政治机构必须实行民主的改造。”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指出：作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不可分离的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首先是从建立半政权性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团体开始的。

随着国民党旧政权的分崩离析，华北、华中敌后许多地区一度陷入极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为了动员、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以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为骨干的各种形式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23~424页。

的半政权性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团体，如晋东北、晋西北各县和察、绥两省以及冀西的某些县份，成立了“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冀中各县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冀南地区成立了“民众抗日救国会”，苏南地区成立了镇（江）句（容）溧（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以及江（宁）当（涂）句（容）溧（水）四县抗战总会等组织。这些都是在抗战初期为适应战争环境而成立的，它们一时成为战时动员、组织、武装群众和维持地方秩序的机关，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或者代替已经撤退或瓦解的国民党旧政权，或者排除被摧毁的敌伪政权，而在当地实行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停征田赋、废除苛捐杂税以及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合理负担等政策，实际上成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过渡性组织。这些组织的建立，在当时起到了推动抗战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们还不是健全的行政机构，不能行使政权的全部职能，不能有效地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因此，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已成为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迫切任务。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各地方组织与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紧密配合，积极进行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

在晋察冀边区，各县政府除晋东北山西第1行政区主任兼五台县长宋劭文和盂县县长胡仁奎（均系中共地下党员）外，其余原国民党政府官员全部逃散。聂荣臻率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开辟了晋察冀根据地后，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领导成立了“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各县成立了工、农、青、妇等群众抗日团体，同时以山西第1行政区主任来劲文和动委会的名义，向各县委派县长，建立了39个县政府（含冀中已开辟地区）。为了建立集中、统一领导的抗日政府，支援八路军抗战，保卫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召开了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后经阎锡山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1938年1月31日，正式批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并任命了各委员。边区政府的成立，宣告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这对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其他敌后根据地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边区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取消半政权性质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边区行政委员会统一委任县长。在县以下，设立区、村（镇）公所。3月初，晋察冀边区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代表大会同时在阜平召开，分别选举产生了各自的领导机关。到3月底，边区各地“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一类的组织全部结束，政权和群众团体分开，各自建立起独立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系统。抗日民主政权自上而下建立起来。

在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基层政权的统一和最高政权的建立，经过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在晋东南，实际由中共领导的牺盟会有较大的力量。牺盟会作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组织形式，在山西抗战危急的关头，经过阎锡山同意，不失时机地组织和发展新军（抗敌决死队），接收和改造各地政权，建立“牺盟县政府”（又称抗日县政府）。对县以下的村长则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法，逐步撤换旧村长，由共产党员或抗日积极分子担任。到1939年初，晋东南的基层政权大部分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县政权，普遍成立了行政会议，吸收各界代表参加，扩大政权的民主性，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为民选政府准备了条件。晋东南各县政府由山西省第3、第5

专员公署领导，戎伍胜和薄一波分任公署专员。冀西各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在旧政权完全瓦解，根据地创建的同时。由中共地方组织和由杨秀峰主持的统一战线组织“冀西民训处”共同建立的。

1938年9月成立冀西专署，统一领导冀西10个县政府。豫北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修武县抗日政权是在原国民党政权瓦解，中共豫北特委派人和当地抗日爱国人士协商后于1938年4月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建立起来的，并获得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批准。涉县则是由中共涉县县委派出工作队，由点到面，逐步改造旧村政权后，才建立起抗日县政府的。冀南地区，在八路军部队东进驱除日伪军、摧毁敌伪政权和组织、恢复社会秩序后，中共冀鲁豫省委组织各阶层民众成立冀有及各县动委会，担负起抗日政权的职能，然后成立各群众抗日团体，选举县长，建立县以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

1938年2月召开军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统战性的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8月，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

1939年9月冀南行政区第一届参议会选举产生了冀南行政委员会，组成了冀南最高行政机关。

1940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的决议，为统一冀南、太行、太岳地区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山西第3、第5行政专员公署经过协议，建立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作为过渡性质的全区统一政权组织。“冀太联办”的成立，标志着晋冀豫边区政权开始由分散走向统一。

在山东各地，从1938年春开始，蓬莱、黄县、掖县首先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7月，中共山东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迅速建立与恢复各县、区、乡、村政权。9月后，冀鲁边成立了津南、鲁北两个专员公署和15个抗日民主县政府，鲁西北建立了6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在其他地区，有的建立了一些区、乡政权，有的建立了类似县政权的“办事处”机构。但是，在根据地迅速发展，政权建立工作进展缓慢。

193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115师发出指示，认为山东“过去没有利用良机大量的普遍的争取政权”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今后除自上而下争取政权外，还应自下而上争取政权，决不应放松争取县、区、乡政权的一切机会。此后，山东各级党组织加快了政权建设的工作。至1940年，全省已建立350个区级政权，70余个县政权，10余个专区级政权和2个行政公署。

1940年7月山东各界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以后者行使省政府职权。

在晋绥边地区，初期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大多数地区中共是以牺盟会、动委会的名义开展工作的，中共以牺盟会的名义派出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为县长，通过动委会也掌握了一批政权。

1940年1月15日，在兴县召开晋西北各界代表大会，2月1日，正式成立了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统一领导晋西北、大青山两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工作。

在华中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开始由于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认识不足，未能独立自主地在新四军控制的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多数地区只成立了“抗敌自卫会”，“民众动员委员会”，“抗敌工

作委员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统战机构。后来，中共中央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华中敌后大力开展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凡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的地方，毫不迟疑地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3月17日，淮南定远县城解放，共产党员魏文伯出任定远县长，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界代表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是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至年底，华中敌后已建立了47个县抗日民主政府，亦即华中敌后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活动地区，已有1/3建立了新型的抗日民主政府。

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根本原则。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立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系列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加强民主政权建设。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光辉著作，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目前局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要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2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八路军、新四军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批示中，重申了执行2月1日决定的重要性，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将华北、华中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还提出政权人员分配，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及中间派，应各占1/3。并对选举政策、施政方针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和政策，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民主政治的榜样。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陕甘宁边区在民主政治和政权的建设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被誉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而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陕甘宁边区为榜样，加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晋察冀边区于1940年进行了普选运动，选民占公民的70%以上，中心地区（如平山、灵寿等县）达90%以上，民主选举产生了由边区到村级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颁布了20条施政纲领（简称“双十纲领”），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原则和任务、人民群众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他具体政策都作了明确规定，使根据地的施政工作有章可循。晋冀豫、冀鲁豫边区从1938年间至1939年夏，由初步民选产生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8月成立“冀太联办”之后，实行普选，建立各级政权，并制定了各种施政条例，使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走上轨道。晋绥根据地于1940年2月1日成立了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后，颁布了施政纲领，接着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整顿。与此同时，在山东及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开始大力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41页。

开展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

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根据地内的经济，是以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加之战前连年军阀混战，天灾频繁，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衰落的状态，人民的生活异常困难。同时，根据地不仅长期处于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之中，而且经常直接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摧残，农田被破坏，房屋被烧毁，耕牛、农具、粮食等生产和生活资料被抢走，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在这样的地区建文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并使之成为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基地和抗战的坚强堡垒，必须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培养持久抗战的物质基础，以保障战争供应，改善人民生活，调动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据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同时，大力进行了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一）发展生产事业

发展生产，以农为主，重视多种经济，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一项基本方针。农业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生产事业。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首先是发展农业。

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各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制定了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等政策，以调动广大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停止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指示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人生活。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凡尚未实行的，必须毫不犹豫的立即实行。”

1940年2月，《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进一步指示：“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强调指出：“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减租减息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调节农民与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相互利益和关系的最恰当的政策。根据中共中央的政策，华北、华中各敌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67页。

后抗日根据地都先后宣布实行减租减息。1938年2月9日，晋察冀边区政府首先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条例规定：“地主之上地收入，不论租种伴种，一律按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钱主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年利率不准超过一分（即百分之十）。”并规定废除正租之外一切杂租和各种名目的高利贷。到1940年上半年，中心区北岳区的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仅在第1、第2、第3、第5等4个专区16个县中，总计减息32万余元，仅第2、第5两个专区就有1840余顷土地减了租，减租额12290石粮食。冀中区大部分县和平西中心区也初步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各地先后作出了“五一减息”、“二五减租”和“半分减息”的决定。

1938年6月以后，在条件较好的辽县、和顺、沁县、邢台、赞皇等县初步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借粮反霸斗争。

1940年2月1日，晋察冀边区政府修正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地租的最高额“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和承租人的“永佃权”。此后，边区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高潮。同年12月3日，“冀太联办”公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

12月15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也颁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减租1/5，减息2.5分。

1940年4月，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普遍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并取消一切附加”，“不论新欠旧债，年利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并禁止现扣租、现扣利以及剥皮利，臭虫利、印子钱等高利贷。

减租减息政策在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团结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热情，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是抗日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和措施。由于战争的破坏，再加上自然灾害，使农田锐减。在生产技术和农业投入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和增加的情况下，扩大耕地面积就成为增加农业生产总量的一个主要方面。

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时就提出了扩大耕地面积、防止新荒、开垦荒地的方针。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垦荒单行条例》，规定凡本边区内未开垦之地及已垦而连续两年来未经耕种者，不论公有私有，一律以荒地论，准许人民无租耕种，土地所有权归承垦农民。在当年春耕中，边区人民就开荒约3万亩。

1939年秋，边区政府又颁发了《垦修滩荒办法》，规定先由土地所有人积极垦修土地，土地所有人不能垦修土地者，由地方政府招人垦修。1940年，边区开展“修滩运动”，边区政府为此发放300万元贷款。晋冀豫边区为鼓励开荒，决定将开荒地免征3年公粮延长到5年，以调动农民的开荒积极性。有的地区还规定，对为逃避合理负担故意不垦种以及逃亡将土地遗弃者，一律无条件招人开垦，地权归承垦人。对抗属和无力耕种者，则设法借款、代耕，助其开垦。在晋绥根据地还规定，开垦生荒地免征公粮3年，免征地租

5 年；开垦熟荒地免征公粮 1 年，免征地租 3 年；而开垦河滩则免征公粮 5 年，免征地租 5 至 20 年。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都提出了开垦荒地的规定。

由于政府鼓励，广大农民、部队和机关人员纷纷垦荒，使根据地耕地面积逐年增加。据统计，仅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第 3、第 5 两个专区 1940 年就开荒 12.7 万余亩；第 1 至第 5 专区的修滩总数达 15.6 万余亩，这些荒地的开垦，河滩的修复，使根据地的粮食生产逐年上升。

兴修水利，是农业增产的又一条重要途径。为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根据地政府都十分重视兴修农田水利。以晋察冀边区为例，早在 1938 年 2 月，边区政府就颁发《奖励兴办农田水利暂行办法》，后来又制定了《兴修农田水利条例》，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大搞农田水利，鼓励农民挖渠凿井，扩大灌溉面积，力争旱涝保收。各地区都大力兴修水利，1940 年春，冀中区修筑堤坝 30 余处，长 260 余公里，疏通河道 9 条，长 80 余公里，100 多万亩土地及时种上了农作物。北岳区修筑堤坝 310 多处，开凿渠道 2000 余条，打井 3500 余眼，使 17 万亩土地及时得到灌溉。

科学种田，是提高农业单产的关键所在。根据地政府积极扶植和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改进农具，并改变旧的粗放式耕作习惯，实行精耕细作。有的根据地还成立了专门的农业研究机构，集中科技人员，克服种种困难，改良种子，研制农具，除虫灭病。

根据地政府十分注重农时，春种和秋收时减少会议，停止支差，发动各方面力量支援农业。每年春耕时节政府都调拨好种子，准备出贷款。基层政权对劳动力的组合、调拨，畜力的调配做好安排。在 1940 年春耕中，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要求各级政府以农救会为主，建立春耕委员会，领导春耕，还公布了贷粮贷款办法、劳动调剂法，春耕中各地组织了由 56000 人参加的代耕队 3228 个。晋察冀边区为解决农民春耕中的困难，各级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募集借贷运动，全边区共募集和借贷粮食近 4 万石，补充和调剂农具 11 万余件，募集款 50 余万元，基本解决粮食农具种子方面的困难，支援了农业生产。根据地政府还提倡、组织劳动互助，以调剂劳动力、畜力的不足。

根据地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但也十分注意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使农、林、牧各业都得到发展，广辟财源，提高人民生活，支持抗战。根据地繁荣农村经济的另一途径就是把发展农业和发展手工业、家庭副业结合起来，为根据地创造更多的物资和财富，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

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民用军需，克服了各种因素造成的经济困难。

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虽然以农业为王，但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军用品（枪弹、医药等）和生活必需品生产自给显得十分迫切。因此，发展工业，使工业品逐渐达到自给自足，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政策，这是敌后根据地发展生产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各根据地在缺乏技术和设备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就地取材，在艰苦奋斗中创业，实行以手工劳动为主，木制铁制机器并用。根据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各根据地除政府办工厂外，还组织部队、机关、学校发展工业。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还着重发展合作工业、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政府奖励并保护根据地内外工商业家和华侨来根据地投资发展工业，对工业给予定期免税和低利贷款。实行抗日的劳动政策，取消对资本家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奖励地主商人创办工业。上述政策和措施，使根据地的工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基本

上满足了敌后广大军民的需要。

（二）发展商业

发展商业，是抗日根据地整个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重大措施。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商业贸易“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各根据地所制定的总的商业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采取统制主义，即统制对外贸易；对内贸易采取自由主义，即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总的要求是把边区不必需的货物尽量销售出去，把必需品（特别是军用品）尽量交换回来；禁止敌方奢侈品向根据地倾销，严禁粮棉资敌。为此，各根据地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晋察冀边区政府规定：第一，除特殊商品外，“绝对禁止日货入境”，如有私运入境者，一经查出，“货物没收，人以汉奸论罪。”第二，执行税则，严稽走私。军火器材、电讯材料等 32 种货物为免税入口货物，粮食、棉花、布匹等 18 种货物为禁止出口货物。其他出入口货物，则视对敌我利大小，分别课以轻重之税。对于违反政府法令，私自贩运者，一经查出，区别情节，予以罚款和治罪。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和奸商的破坏、扰乱，促进了根据地商业贸易的发展，保证了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

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以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根据地的商业系统有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和合作社商业。他们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分工协作，各得其所，各根据地一般都先后成立了贸易局，领导商业贸易事宜，普遍设立贸易栈，并在若干重要村镇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国营及公私合营商店的业务范围主要是：采购批发及零销根据地内外各种军需民用必需品，并购集土货，办理输出业务。它们是商业贸易系统中的骨干。私营商业几乎全部为中小商人，且小商贩占绝大多数。根据地政府允许他们合法经营非违禁商品并赚取适当的利润。在不违反政府法令的前提下，根据地政府奖励私人商业，扶助中小商人繁荣市场，允许根据地内外商人和百姓在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私商的发展，弥补了国营商业的不足。

（三）发展合作事业

发展合作事业，是发展根据地全部经济的重要环节。合作社组织包括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形式。它是一种群众性的协力互助的经济组织。它的集股，完全出于群众的自愿。其宗旨是：增加生产，活跃市场，平定物价，改善民生。由于合作社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广泛的群众性，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和根据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例如晋察冀边区政府于 1939 年颁发了《合作社暂行规程》，1940 年边区银行发放了 300 万元的合作贷款，并训练了 200 多名干部，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从而大大推动了这一组织的迅速发展。其北岳区在 1938 年仅有合作社 14 个，到 1940 年发展到合作社 4120 个、社员 498 478 人，股金 1018490 元。合作事业的发展，活跃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

（四）创办银行，巩固敌后抗战金融

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创建初期，货币市场十分混乱，除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原来的各省和地方也发行各种钞票，此外还有日本侵略者和傀儡政权发行的“军用票”、“蒙疆券”等。日伪军利用伪钞强行收购和掠夺物资，搅乱金融，破坏经济。

1940年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人民抗日武装生活难以维持。为了支援抗战，自力更生地发展根据地经济，稳定根据地的金融，打击敌人的经济掠夺，并解决抗战财政供给的困难，各根据地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发行了货币（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般称“边币”，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统称“抗币”），统一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的银行有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号、冀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等。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起，先后成立了淮海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淮北地方银号、淮南银行、大江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江南银行和浙东银行等。

边币和抗币发行之初，受到伪钞和土杂钞的包围。为了开辟自己的货币阵地，占领市场，各根据地采取了“发行和巩固本币，保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的货币政策，并于1940年前后，澄清了金融市场，初步建立了本币市场。

根据地银行对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银行成立时的业务纲要均强调了本身业务是发展经济，为扶助经济而办理贷款和投资业务。各地银行都尽其所能，发放了相当数量的生产和商业贷款，帮助群众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的部分困难。

这对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促使本币与生产结合，稳定金融市场，增加生产，促进贸易以及巩固根据地政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加强财政建设

加强财政建设，以保障抗日军队和民主政府的物质供给，支持长期抗战，是根据地建设的基本任务。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建设，一开始就是在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进行的。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地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财政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主要是：从一切为了抗战出发，立足于自力更生，整顿财政，开源节流，发展生产，保障抗日部队供给，改善民生，逐步达到收支平衡。为此，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 1、废除摊派制度，实行合理负担。抗日根据地政府建立后，普遍宣布废除不合理的摊派制度，对原定的捐税，除保留较合理的部分外，其余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实行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原则的合理负担。在开始实施合

理负担办法时，是由各县动委会出面，根据抗日部队的军需任务，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向“有钱者”筹粮筹款。这种“县合理负担”对初期解决抗日部队的军需供给，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不是通盘的财政措施，负担面往往集中在少数“有钱者”身上，不可能保证长期抗战军政费用开支的需要。合理负担从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开始步入正轨。

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了《村合理负担实施办法》，规定以村为基础，每年实行合理负担两次。各种负担（后来包括公粮征收）皆按村户“分数”（根据其财产、收入和消费的情况制定）而计算。这种负担办法比过去的办法更趋于合理，负担面由少数人扩大到50%左右。农村中大多数贫农、雇农负担较轻或免于负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激发了他们生产和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同时也减轻了根据地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负担，促使了根据地小商业的活跃。

晋察冀边区的村合理负担起到了示范作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此都先后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合理负担的办法。抗日战争中，由于各根据地认真贯彻了合理负担政策，使抗日经费来源保持了稳定并能逐年增加。合理负担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全面实行统筹统支。随着根据地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形势的发展，财政收支日益浩繁。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军政民的最低需要，根据地政府陆续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了财政顶决算，审计、会计、金库等财政制度：实行统筹统支，量入为出，一切部队、团体均不准向群众征粮收税，一切税收，均归政府，文金库保存；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所有军政费用概由政府筹划供给；坚决反对贪污浪费等等。总之，根据地的财政，立足于自力更生，精打细算，保证了抗日部队的需要和政府各项开支，有力地支援了敌后的抗战。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大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

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极其重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在艰苦激烈的战争环境里，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干部教育

为了坚持敌后抗战，迫切需要培养成千上万的抗日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首先大力发展干部教育。

干部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开办高、中等学校及各类干部训练班，造就和培养各级各类干部。

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武装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各系统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发展起来。1938年至

1940年3月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除抗大总校和华北联合大学外，军事学校系统有抗大第一、第二、第六分校，晋察冀军区军事学校，晋察冀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冀南军政干部学校，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山东鲁南军政干部学校和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等，八路军各部队还办有随营学校或教导队。党校系统除中共北方局党校外，中共晋察冀分局和中共山东分局都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区党委，如晋察冀、晋西北、冀南、晋东南（1939年12月分为太北、太南、太岳三个区党委）、鲁南、鲁西、胶东等区党委，先后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地委一般都办起了党员干部训练班。此外，抗日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也举办了各种干部和专业学校以及干部训练班，如晋察冀边区抗战建国学院、白求恩卫生学校、晋察冀边区群众干部学校、冀中抗战学院、冀中民运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晋东南民族革命干部学校、晋东南抗战学院、晋东南群众干部学校、山东省财政经济学校、筑先抗战学校等。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训出大量干部，他们绝大多数人经过抗战烽火的锻炼和考验，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建设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同时，各地区的中等学校在抗战前期亦以干部教育为主，培养了一批青年军、政、民干部。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推广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从1940年开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始进行在职干部的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军政素质。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为满足部队和根据地发展的需要，开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军队系统有新四军教导队（教导总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皖东干部学校、鄂豫挺进纵队随营学校等。上述学校后分别改建、合建为抗大第四、第五分校等。新四军各支队都办有教导队或随营学校。中共各地委和县委大多办有党校或党员干部训练班，各地区也办有各种干部训练班。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办各类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军事、政治和其他各类专业干部，保证了部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

（二）群众教育

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几省交界的山区或农村，文化教育也极不发达。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加强民族意识，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各根据地都把扫除群众中、特别是青壮年中的文盲作为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开办冬学、民校对广大群众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则成为完成上述任务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晋察冀边区，1938年就认真开展了冬学运动。《抗敌报》发表专文论述开展冬学运动的意义及重要性，提出开办冬学的10条具体办法。该年，在阜平就办起冬学190多处，入学人数达7600余人，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了冬学识字活动。

1939年的冬学是在日军大规模的“扫荡”中进行的，冬学与抗战的政治任务相结合，形成了热烈的群众学习运动。据统计，这一年全边区冬学增至5379处，比1938年增加了1倍，参加人数由1938年的18万人增加到39万余人。各地在冬学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午后半日学校、夜校、救亡室等，开

展经常性的文化教育。晋冀豫、冀鲁豫边区,抗战前文盲约占人口总数的 95 ~ 97%, 经过几年的冬学运动, 文盲人数逐年减少。到 1940 年, 已办起冬学 1801 处, 有 73824 人入学, 占文盲总数的 23.5%。晋绥边区的冬学运动, 从 1940 年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山东根据地从 1939 年开始利用冬学进行群众教育。

1940 年, 仅泰山区 7 个县就有 14 万人参加了冬学, 其中有 2 万人识字 300 个以上。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成年群众(主要是农民)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一年一度的冬学。办学方针是“明理第一, 识字第二”。华中——各根据地对办学都很重视。据统计, 苏南常州、苏州两县 1940 年曾动员组织 80%左右的农村青壮年参加了冬学。

对儿童进行小学义务教育是群众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各根据地创建初期, 主要进行小学的恢复和小学教育的改革和提高, 使小学教育普遍发展, 并且出现全新的面貌。晋察冀边区, 1938 年初, 边区政府认真进行小学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规定原有的小学一律恢复, 校址被占用的一律迁出, 被焚毁的另找民房或寺庙暂用, 同时规定小学生一律免费。边区自编了国语课本、国难讲话等新的教材。到 1939 年, 小学增到 7000 余所, 小学生增至 40 余万人。晋冀豫边区, 至 1940 年 7 月, 全区 32 县有小学 3770 所, 其中以晋东、太南及太岳最为发达, 有些地区已超过战前水平, 有近 1/3 的县恢复到战前水平的 81 ~ 93%。晋绥边区, 1940 年起颁布教育政策, 编印新教材, 优待小学教师, 使小学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当年 9 月底据 19 个县的统计, 有完小 26 所, 初小 1393 所, 学生 61938 人。山东根据地, 1940 年召开省文化教育宣传座谈会、战地国民教育座谈会, 提出了加强小学教育的建议, 此后山东小学教育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华中在全国抗战前小学教育比较发达, 但屡遭日伪“扫荡”摧残, 学校和学生数均显著减少, 但各抗日根据地对小学教育十分重视,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不仅恢复而且发展了小学教育。如苏北盐城的小学很快就由 200 所增至 700 所。

总之,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群众教育, 使各根据地的成年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文盲状态, 提高了抗战的觉悟和生产建设的能力, 使学龄儿童也能受到应有的政治、文化教育。这些都成为夺取抗战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 新闻出版

在文化教育建设中, 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部队、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积极创办了油印、石印和铅印的各类报纸、杂志, 印刷出版了多种书籍。通过这些印刷品将国内外战况、党的方针政策及时进行了传播。

据统计, 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大小报纸共计 150 种以上, 杂志 140 种以上。其中较有影响的报刊和杂志主要有: 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抗战报》、《边政导报》、《冀中导报》、《挺进报》、《救国报》等报纸和《战线》、《新长城》月刊、《边区建设》、《边区教育》等各类杂志; 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人民报》、《冀南日报》、《鲁西日报》、《中国人民报》、《战友报》等报纸和《抗战生活》、《华北妇女》、《前线》、《战场》等各类杂志; 晋绥根据地出版的《抗战日报》、《晋绥大众报》、《战斗报》等报纸和《人民时

代》、《中国青年》（晋西版）、《青联》等各类杂志；山东根据地出版的《大众日报》、《胶东大众报》、《群众报》等报纸和《大众》、《战地妇女》、《山东群众》等各类杂志。

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政治部出版了《抗敌报》、《战士园地》等，新四军各支队还有油印小报 30 多种。

除报刊杂志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发行都有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出版发行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论著以及大量的抗战读物和文化书籍。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的各类报刊、杂志，内容丰富，文字简洁，时效性强，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在被敌人分割包围的艰苦环境中，为坚定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激励和鼓舞抗战士气，揭露敌人的残暴罪行和分化瓦解日伪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四）抗战文艺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也十分活跃。自 1938 年起，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文救”、“文协”分会及“文联”等组织，创办了许多刊物。这些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动员一切文化力量，推动人民参加抗战和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艺，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向工农兵群众，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创作出大批反映战争现实，讴歌根据地建设、揭露敌人罪行的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和小说。抗战文艺对激励军民的抗日斗争，揭露和瓦解敌人，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造成了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长期坚持并巩固发展的基础。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大地出现了举国抗战的形势。如何顺应民意，变革各项制度与政策以适应抗战需要，便提到了国策位置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之下，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一度表现出进步的倾向。

一、国民参政会的设置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就表示强烈不满，要求“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国民党曾被迫作出决议，召集国民参政会。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许诺，并未付诸实施。直至全国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政治才出现新的转机。坚持抗日的各党派、各阶级目睹国势艰厄，痛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误国害民，强烈要求开放政治，实行民主，集中全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也纷纷呼吁国民政府设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机会。

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成立了战时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并设国防参议会，邀请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抗日党派代表人物、社会名流为参议员。这个参议会没有任何职权规定，对任何议案均无决定权。与会的参议员只能坐而论道，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是，国防参议会容纳国内各抗日党派领导人参政议事，毕竟是抗战开始后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国民党执政以来邀集各党共商国是之先声。国防参议会即成为后来“国民参政会的胚胎”。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3月31日，大会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4月1日，大会《宣言》指出：“为适应战时之需要计，应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趋于简单化，有力化，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俾集中全国贤智之上以参与大计。”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12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实施。该条例凡15条，规定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而“特设”的机构。置参政员总额150名（后增至200名），在年满30岁，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或女子中，选任曾在各省市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3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88名；选任曾在蒙古、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6名；选任曾在海外侨民居住地工作3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谙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6名；选任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3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50名（后增为100名）。国民参政员的入选，是由国民党各省市政府和党部联席会议、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提出候选人，由国防最高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57页。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会议汇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付国民参政会资格审议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人选）审议，最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的。规定“现任官吏不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参政会的正副议长直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条例》还规定，参政员任期为一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参政会每3个月开会一次，会期为10天，必要时，召开临时会议或延长其会期。休会期间，设置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以听取政府各种报告及决议案之实施经过。

6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81次常务会议决议，选任汪兆铭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21日国民政府予以公布。另公布国民参政员名单，共200名。其中国民党员89人，占44.5%；共产党员7人，占3.5%；青年党7人，占3.5%；国社党6人，占3%；社会民主党1人，占0.5%；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名，占0.5%；无党派89人，占44.5%。共产党及中间党派的名额被列入“文化团体”、“经济团体”之中。共产党参政员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中间党派及其他知名人士有沈钧儒、陶行知、王造时、史良、张申府、黄炎培、江恒源、梁漱溟、曾琦、左舜生、李璜、张君勱、罗隆基、章伯钧、罗文干、陶孟和、张奚若、莫德惠、杜重远、王卓然、许德珩、张澜、陈嘉庚、邹韬奋、谭平山等。

从国民参政会的组织和参政员的产生，可以看出：第一，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政员以党派代表的资格参政，而只能以地区和经济、文化团体代表的名义出现。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第二，国民党和追随国民党的无党派人士占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国民党参政员比其他党派参政员的总和还多几倍。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及其他进步民主人士所占比例甚少。周恩来称国民参政会是一个“作客的机关”。第三，国民参政员不是由民选而来，而是由国民政府选请而来，因此离民众期望的民意机关，还相去甚远。第四，国民参政会没有决策权力，参政员虽有“听取权”、“询问权”和“建议权”（后来加了“调查权”、“审议权”），但国民参政会的决议案都必须由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方能有效，实际上还是由国民党最高当局裁决。正如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所说，“国民参政会只是一个代表民意发言的机关，执行之权却在政府”。因此，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受国民党控制的最高咨询机关。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为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反映民意的场所，对于团结各族人民，促进抗日民主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有利的，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国民参政会首届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等7名中共参政员发表题为《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的声明，指出：“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青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新1版，第113～11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28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页。

邹韬奋：《我对于参政会的希望》（1938.3），原载《全民抗战》1938年第1号。

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所以，我们——共产党人除继续地努力于促进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能以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对国民参政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了会议。毛泽东未参加会议，他在致大会的电文中说：“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出席这次参政会的参政员共160多人。国民党及其政府官员，英、美、瑞典、法、意、比等国使节，以及中外记者等1000余人到会。一些国际援华组织、华侨团体纷纷致电祝贺。会议由议长汪兆铭致开幕词。大会宣读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自重庆发来的贺电及书面训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戎装佩剑，登台致词。他说：“此次国民参政会，成立最重大的意义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他表示“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会议先后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部部长的报告。许多参政员听了报告后，慷慨陈词，提出询问。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作了施政报告后，参政员许德珩“情绪激昂，离开座席，直趋主席台前，手指台上，痛斥豪门贵族，贪官污吏，寡廉鲜耻，误国害民，与会参政员无不为之振奋。”

这次大会收到的提案共130余件，经过讨论、审查、修正，通过了100余个议决案。由中共参政员陈绍禹领衔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号召全国军民积极帮助政府，为全部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努力奋斗。这一提案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诚意，得到全体参政员的拥护，共有68人联署，成为这次大会代表性最广的提案。与此类似的还有郑震字和王家禎的提案。大会将三案合并讨论。中共代表陈绍禹、青年党代表曾琦、蒙古、新疆等代表相继发言，热烈拥护政府抗战建国的政策，全场爱国情绪力近年集会中所罕见，最后，全体起立一致通过《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场内掌声雷动，历数分钟不止，此为国民参政会最有意义最有重要性的表示。参政员胡景伊等21人提出的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也获全体参政员一致起立通过。此外，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分别提出的保卫武汉、军队建设、改善县區政治机构的提案，参政员邹韬奋、褚辅成、王造时、许德珩、梁漱溟等人提出的动员民众、实行地方自治、设立地方民意机关、救济灾民、乡村工作等提案，亦获通过。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5日。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7日。

《武汉文史资料》，第16辑。

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各抗日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同汪精卫投降派进行了斗争。会议之前，汪氏即同日本帝国主义者私通款曲，密议“和平”条件；会上，又大造“和平”舆论。汪派参政员李圣五、陶希圣提出《对德意外交采取分化方略案》，要求改善与德意关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请德意出面调停，与日本和谈妥协。这一提案遭到中共参政员的极力反对。由于此时汪氏投降派面目尚不能为许多参政员所识破，而使此案以《对德意外交应积极注意》为题予以通过。

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于7月15日闭幕。经过各界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较多符合民意的决议，确立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后胜利”的国策，宣布了“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大会《宣言》宣示中外，“中国民族从不敌视日本人民，至今依然。中国抗战之目的，纯为自卫，中国必须恢复其领土主权行政完整，此乃任何国家立国自存之最小限度立场”；“特代表我全体国民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及其一届一次会议的隆重召开，举国上下为之一振。这次会议表现的团结统一与民主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但是也必须看到，这次大会所通过的许多有利于推动团结抗战的决议和宣言，只是一些原则条文，要把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尚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召开五次大会。第二次大会于1938年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时值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全国抗战和统一战线面临严峻考验。大会前夕，汪精卫大放“和平烟幕”，制造妥协舆论，并加紧投降活动。一时间，国内形势恶化，人心浮动，有鉴于此，大会开幕之日，毛泽东致电汪精卫，指出，当此全国抗战进入最严重阶段的时候，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举国上下精诚团结之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使我国民族国家转弱为强之关键，开展胜利局面之枢纽。中共参政员在会上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该案痛斥汉奸亲日派妥协投降的无耻论调，引起广大参政员的强烈反响，参加署名者达67人之多，占出席人数的55.3%，创造了历届参政会提案联署人数的最高纪录。华侨参政员陈嘉庚未能到会，从新加坡发来一份“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电报提案，矛头直指汪氏之流。汪派参政员极力辩解，广大参政员则痛斥投降派，坚决反对议和。经过斗争，该案被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得以通过。

这次大会闭幕之后一个半月，身为议长的汪精卫就带着几个亲信死党分子公开叛国投敌了。国民参政会议长由蒋介石继任。1939年2月召开的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以及尔后的两次大会，通过了一些提案，重申抗战到底的既定国策，声讨汪逆卖国罪行。在一届三次大会上，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宣读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共同目标，以及精神动员的实施方案。许多参政员提出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参政员董必武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提案，要求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障。参政员周览、马君武等51人联署提案，要求国家制度进行重要改革，建议“政府行动应法律化”、“政

府设施应制度化”、“政府体制应民主比”。这一提案震动了大会，触及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统治。

一届三次大会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进行反民主反共活动，在各地与共产党制造磨擦，并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压制共产党、压制民主的独裁面目，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 1939 年 9 月召开的一届四次大会上，中共参政员要求国民政府保障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如左舜生、张君勱等提出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经过激烈斗争，蒋介石作出“实施宪政”的许诺。

蒋介石实施宪政的许诺，不过是迫于形势的搪塞之词，并无真正实行的诚意，而在反共反民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 1939 年冬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 1940 年 4 月召开的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利用军政部长何应钦作军事报告的形式掩盖反共磨擦的事实真相，连篇累牍地攻击共产党、八路军。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向何应钦提出质询：“总长所举电文，多与事实不符”。八路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参政会，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何应钦的诬蔑不实之词，说明国共磨擦真相，使一些参政员恍然大悟，纷纷批评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制止磨擦，团结抗日。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一意孤行，不久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出现分裂的危险。

1941 年 3 月上旬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参政会，中共参政员先后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临时办法十二条，作为参加大会的条件，因国民党拒不接受，故决定不参加本次参政会。这一正义行动，得到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在共产党的全面政治斗争面前，在国内外不赞成反共分裂强大舆论之下，蒋介石被迫缓和国共关系，并且做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中共参政员出席了 1941 年 11 月召开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一以及第三届历次参政会（1942 年 10 月、1943 年 9 月、1944 年 9 月）。但是，国民党反共方针终未放弃，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治愈来愈暗淡，到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第四届第一次参政会，国民参政员几乎为国民党独占，参政会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工具。国民党打着宪政的幌子，企图召开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反对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因此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以示抗议。

纵观历届历次参政会，它在国共合作抗战形成高潮时应运而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曲折前进，又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虚应场面，以至收场。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尽管它一成立就不尽如人意，而且越来越走下坡路，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利用这个合法的讲坛，进行了大量有利于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的工作，使国民参政会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在其成立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国民参政会在中国抗日战争和民主政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战时经济方策的施行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落后，发展极不平衡。近代中国经济的重心偏集于东部沿海沿江等地区，其中工业 70% 在沿海，而广大内地，尤其是西北、西南地区经济十分落后。“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工

业集中的上海及沿海其他地区先后陷于敌手，致使中国的经济遭到巨大损失。国民政府的平时经济体系受到破坏；财政税收骤减；而抗战军兴，战费猛增；后方经济负担加重；各地军需民用物资普遍缺乏。由于国民政府对中日全面战争准备不足，举措不力，战争伊始即出现经济困难的局面。

国民政府为了应付战争，首先，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建立军事经济机构，实行金融外汇管制，动员和协助沿海工厂内迁，建设大后方经济，其次，为了促使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建立全面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战时体制，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针、经济机构、具体经济政策上，逐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不少方面收到了一定效果。

（一）战时经济方针的确定

1938年3月，国民党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关于经济问题列出8条，作为战时经济方针政策：

（1）“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2）“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3）“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4）“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5）“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6）“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7）“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开辟航线。”

（8）“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

在会议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强调：“目前之生产事业，应以供给前方作战之物质为第一任务。战争之胜负，每以后方对于前方物质供给之能否充裕为断。”

同年6月，国民政府新组建的经济部根据临全大会通过的经济纲领，拟定了《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其中，列出五条主要原则：

（1）“提高经济行政的效率”，（2）“充实内地生产能力”，（3）“奖励经济事业之发展”，（4）“力谋军需器材之供应”，（6）“筹划经济立国之大计”；并且从经济行政、农业、工矿业、商业、水利等方面阐明了战时经济的具体方针政策。

临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等文件，为国民政府制定和调整战时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表明了国民党战时经济方针的基本确立。国民党的战时经济方针有两个基本点：其一，“以军事为中心”。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团结抗战局面形成，因此，国民党把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的轨道，不仅为坚持持久抗战并赢得战争最后胜利所必需，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一致愿望所在。其二，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487页。

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建国经济建设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89年第3、4期。

“实行计划经济”。以“计划经济”作为战时国家经济的基本政策，同时对金融、外汇、进出口货物等实行统制政策，其目的在于依靠国家干预，加强对战时经济的控制。开始贯彻“计划经济”方针时，各经济部门制定各种经济计划纲要、计划草案、计划大纲，还曾成立“中央设计局”，“主持全国政治经济建设之设计及审核”。但是，由于缺乏整体的长远规划，所定具体计划多不可行，或不能互相配合，或不能贯彻始终，故难以通过计划经济达到控制战时经济的目的。

随着“计划经济”的不断失灵，国民政府逐步加强经济统制，连年颁布大量经济统制法令。到1941年3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正式确定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由国家政权依靠行政法律的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到1942年国民政府公布并实施《国家总动员法》，战时经济方针，由“计划经济”到“统制经济”，经过了四年的艰苦调整过程，方得以确立。但是，国民党的经济统制，并未能够挽救其最终走向衰落的国统区经济。

（二）战时经济行政机构的调整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战时经济的需要，国民政府在不削弱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对经济行政机构陆续进行了调整，首先在军事委员会下建立了一套经济行政机构，以应付战时紧急经济事务。军委会下属的经济行政机构，包括资源委员会、第三部、第四部、农产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对外贸易调整委员会等。在战事弥起的情况下，上述一些机构曾发挥过某些作用。然而，本来重叠紊乱的经济机构，又陡增新的弊端。从1938年开始，对庞杂的经济行政机构又进行了大规模调整。

为“适合战时需要”，国民政府将行政院下属的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将军委会第三部、第四部、资源委员会，及直隶国府之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统并入经济部。军委会农产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管辖。军委会贸易调整委员会，改隶财政部。军委会对外贸易调整委员会和经济部国防贸易局归并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行政院之铁道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公路部分并入交通部。军委会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所设立的运输联合办事处改隶交通部。此后，国民政府又先后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水陆运输联合委员会，成立农林部、粮食部等等。随着“经济统制”政策的强化，1941年2月，在行政院内正式成立了“经济会议”蒋介石自任主席。该机构的设立，加强了经济的设计决策与执行督导的统一，强化了对全盘经济的控制。1942年“经济会议”改为“国家总动员会议”，作为战时最高统制机构。

国民政府经济机构的多次调整，对战时社会经济的运行，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其调整是在紧张多变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一些机构往往随事而设，临时补苴，一边调整精简，一边膨胀冗滥，带有很大应付性；加之国民党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因此其官僚机构的腐败性质，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的弊端，得不到根本改变。

（三）主要经济政策与经济统制措施的实施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统制措施，现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1、财政金融方面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给中国的财政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占战前岁入总额 80%，占总税收 90% 的关、盐、统三税锐减。以 1936 年度与 1939 年度相比较，关税由 36900 万元减至 8600 万元，减少 77%；盐税由 22860 万元减至 10100 万元，减少 56%；统税由 17560 万元减至 1900 万元，减少 89%。而军费则急剧膨胀，1937 年军费即占总支出的 66.4%，1940 年军费则占总支出的 74%。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 1939 年 1 月在财政报告中说：“就财政言，历年收支本感不敷，抗战以后，税收不及平时之半，而支出则倍于从前，此一年半之亏短达二十万万万元以上。”为了筹划军费，并解决其他开支，国民政府采取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措施：

一是增税。抗战开始后，一方面调整旧税，主要是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增加货物征税的范围，并改变征税标准，调整征税税率；一方面开征新税，如遗产税、过份利得税等。

1938 年 7 月公布“非常时期过份利得税条例”，资本在 2000 元以上之营利事业，其利得超过资本额 20%，财产租赁之利得超过财产价额 15% 者，按超过额课以 10%~50% 之超额累进税，1941 年开始，还实行了地方田赋收归中央接管统筹整理并改证实物的政策，烟、粮、盐、糖及其他日用生活品实行国家专卖制度，以及货物征税和战时消费税改为从价征收政策等。以上措施对增加税收起到一定作用。

1941 年第 4 季度盐税收入约达 1.7 亿元，是上一年同期的 3，4 倍。

1942 年烟草、火柴、食粮专卖收益约 18 亿元，占岁入总额的 21%，相当可观。

二是举债。国民政府自 1937 年 9 月发行第一笔“救国公债”，至 1944 年发行“同盟胜利公债”止，共发 19 笔公债，总计国币 150 亿元，英金 2000 万镑，美金 2 亿元，关金 1 亿元，共合国币 223.06 亿元。1937 年至 1942 年前，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 23 次，共计 9.95 亿美元，6954.7 万英镑，10.3 亿法郎，1.2 亿元国币。

三是增发纸币。1936 年法币发行额为 12 亿元，1937 年为 16 亿元，1938 年为 23 亿元。1938 年的指数与 1937 年 6 月比较，增加 64%。1939 至 1941 年逐年发行增长率平均为 87.3%，三年间增加了五倍半以上。

为稳定剧烈动荡的金融市场，1937 年 8 月 15 日，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明令限制提取存款。同月，核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沪成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设四行联合办事处，后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

1939 年 9 月 8 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改组“四联总处”，由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使四联总处成为最高金融决策机构。这对于全面统管金融事务，稳定法市市场，实施外汇统制，扶植经

《民国档案》，1986 年第 2 期，第 74 页。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 年版，第 416~420 页。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 年版，第 421~422 页。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 年版，第 275 页。

济、增加抗战之能力，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和特权人物，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大发国难财，加之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机构本身腐败，弊端丛生，贪污盛行，使财政金融不久即走向困境。

2、工矿业方面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保存经济实力，维持与发展工矿业，以利长期抗战，采取了两项重大战略措施，一是动员与组织沿海沿江等战区厂矿内迁，二是鼓励与扶植大后方工矿业的开发，尤其是建立中国内地的重工业基础。

1937年12月，军委会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中正式提出了工业的总动员计划。

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工矿业建设的基本方针为：“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发展各地之手工业”。6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明确规定了“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工矿业建设方针。在施行战时工矿业发展政策中，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除组织协助沿海沿江等战区工厂内迁（在下一节有专述）外，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运用国家资本，重点发展重工业。主要负责国营工矿业的资源委员会等机构，掌管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以比较雄厚的资本，保障战时军工和大后方基础工业的发展。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开发大后方经济提到重要日程。资源委员会在战前矿产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调整计划，加紧了对西南、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开发。矿产开发的战略目标，一是尽力开发和增加有关国防的产品，如石油、钢铁、煤焦、铜锌等，求得自给；二是尽量开采并改进进出口矿产品的质与量，如开千冶炼钨、锑、锡、汞等，作为易货物资。资委会除对煤、铁、钨、锑、锡、汞、金等矿产资源进行继续调查和开发外，还发现了铝土、磷、锰、铬等一批新矿藏，并对甘肃玉门油矿进行了勘测与开发。这些都为大后方重工业的建立提供了原料，动力等主要物质条件。在工业投资上，国民政府明显地向重工业倾斜。战前在已登记的工厂总数中重工业仅占14.68%，在工业资本构成上重工业仅占18.27%，抗战期间在工厂总数中重工业上升到35%，工业资本构成上重工业则上升到50%以上，尚不包括军工企业在内。抗战中，资委会工矿业投资最大的是电力、石油、钢铁工业，其次是电工、金属、机械等工业。电力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备条件。资委会大力创立内地电力工业基础，以国营电厂主供工业用电，并注重水力发电，使电力事业成为资委会发展最快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的需要。石油是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重要能源，但战前中国只有延长等数地生产少量石油。

1938年设立甘肃油矿筹备处，商调陕甘宁边区所属延长油矿两架美制钻井机以应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决无疑我，立即允为照办”，并协助装运。资委会聘请专家展开钻探、提炼等工作。1939年开始出油，尔后产量逐年猛增。

1939年生产原油12.9万加仑，汽油0.4万加仑，1942年原油即达1426.2万加仑，汽油达189.6万加仑，这对缓和战时后方部分地区液体燃料的紧张状况起到一定作用。钢铁是军工制造及其他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料。在发挥内迁和内地原钢铁企业作用的同时，资委会根据煤铁产量和质量以及运输等条件，确定以大量投资在川、滇兴建冶金工业基地，主要是拆迁汉阳兵工厂

及大冶矿场的重要设备，与兵工署一起重点建立了大渡口钢铁厂，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建立了云南钢铁厂等钢铁企业。为了统筹后方钢铁生产、进口及销售事宜，国民政府设立钢铁委员会，发展后方钢铁事业，以缓解战时钢铁需求的紧张状况。据统计，1941 年内地生铁产量达 6.3 万吨，钢达 2000 余吨。除此之外，电工、金属、机械等工业由于资委会投资也较多，因此亦获得长足的发展。煤炭、化工等工业资委会投资较少，但由于省营、民营投资规模较大，所以发展也比较快。总之，国民政府通过资委会等部门运用国家资本大力发展国营工矿业，使国家资本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民营工业的发展速度。

鼓励海内外投资，奖助民营工矿业。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颁布了《非常时期工业奖助暂行条例》、《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等一些鼓励奖助民营工矿企业的法规和政策。为扩大奖励范围和奖助项目，规定凡国民在后方兴办国防及民生之重要工矿者均可呈请奖励，减低或免除出口税、原料税等，在一定区域内享有 5 年以下专利权，并实行保息和低息贷款；鼓励工业技术进步，对于革新、发明创造给予专利奖励和奖金补贴；以低价便利获得材料与工具；推进工业教育，招募和训练技术人才；对华侨在抗战时期投资国内农矿工商与国防有关的经济事业，华侨资本占资本总额 60% 以上者，可呈请各项奖励和优惠，等等。由于国民政府实行了一些奖励和扶植政策，加之广大职工和民族工业者的爱国热情，不但使战区厂矿比较顺利地实行了内迁，而且广大民营厂矿在大后方得到蓬勃的发展。民营企业到 1942 年达到高峰，仅设立新厂即达 1077 个。

1939 年以前，大后方民营厂以生产军火为主，1939 年起，后方民营厂矿生产重点逐渐转向非军工生产。

推进战时工业合作社运动。“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以工业生产力目标的群众性的经济救亡运动。最初是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发起的。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的设想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国共两党领导人和有关人士以及一些驻华使馆人员的支持，国民政府并拨款作为开展组织工业合作社的基金，1938 年 8 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孔祥熙出任理事长，艾黎被聘为技术总顾问。同年底，在重庆建立工合总会与理事会，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工合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工合总会共建立了西北、晋豫、东南、浙皖、湘桂、滇黔、川康等 7 个区的办事处，成立了 1900 余个合作社，社员达 2 万余人，自有股本近 400 万元，每月生产产值达 1700 万元。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按月拨款 18 万元，其次是银行贷款和中外人士的捐款。各地合作社所经营的业务包括纺织、服装、制革、化工、机器、电器、五金、卷烟、制糖、交通用具、印刷文化用品等许多方面，生产大批军需民用品，对补充战时经济的不足，支援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3、交通运输方面

交通运输关乎国家经济、军事的命脉。至武汉、广州失陷，日军占领了中国的绝大部分铁路线，使本来十分落后的交通运输遇到更大的困难。为了建设战时的交通运输事业，国民政府在《抗战建国纲领》中规定了“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开辟航线”四大任务，并且组建交通部，统一主管全国交通规划，建设与经营国有铁路、公路、邮电、航政，

并监督公有民营交通事业等。为适应抗战和发展经济的需要，特别是保障军事运输任务的完成，国民政府还制定了军事征用法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实行战时交通运输管制，而且专设军事管制机构，强化战时交通运输工作的管理、监督与检查，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

重点建设国际交通运输线，抗战时期，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把交通运输建设的重点放在国际交通运输线上。这固然与国民政府依赖外援的战争指导思想分不开，但同时也是为了打破日军的封锁，保障抗战与战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客观上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系，从而具有世界意义。抗战开始后，国际交通运输线的建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建设国际铁路干线。抗战初期，苏联支援中国抗战比较积极，为便于接受其援助，利用旧轨建设了宝（鸡）天（水）铁路。为了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动工修筑了湘桂、黔桂、滇缅、叙昆铁路的部分路段。二是建设国际公路干线。在西北，修通长 3400 公里的兰新公路线，与苏联铁路线相连接，成为西北唯一的国际运输线。在西南，主要是修筑滇缅、滇越等公路。其中修筑滇缅公路，1937 年底动员 15 万民工，在改善昆明至下关段的同时，从下关延修至中缅边境的畹町，一年即完成通车。三是开辟国际航线。抗战开始后，与美国合办的中国航空公司，曾增开武汉至广州、重庆至香港航线；1938 年与苏联签订中苏通航合约，联合兴办中苏航空公司，开辟了重庆至莫斯科航线。

着力改善后方交通运输。国民政府以修筑公路为主要目标，采取改善旧路与兴建新路并举而以改善旧路为主的方针，建设交通网络。在西北，以兰州为中心，改善和新建西北各省公路干线，并与河南、湖北、四川诸省公路接通。在西南，除发挥贵阳这个西南公路中心的作用外，加强重庆与成都、贵阳、昆明、长沙等各省会公路沟通，接通西南交通线与西北交通线及国际交通线的联系。同时，为了补充公路动力的不足，对 20 条内河进行航道疏浚，建造浅水轮船提倡木船运输，增加水运能力，并发展水道联运和水陆联运，提高了后方运输能力。

动员海内外人民发展大后方运输事业。广大内陆地区铁道、公路运输十分落后，但民间的人畜舟车驿运却蕴藏着巨大潜力。1938 年 10 月全国水陆交通会议决定，“利用全国人力兽力之运输，以补充机械之不足”。

1939 年交通部设立驿运管理机构，统管全国水陆驿运行政与经营业务。在国际交通线、军事运输干线以及各地运输支线上，卓有成效地展开了驿运工作，尤其在短途运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 1940 年为例，大后方各驿运干线的货物运输总量达到 3462 万余吨公里，为同年大后方公路汽车运输总量的 18.3%，而以货运吨数计算，驿运总吨数达到汽车运输总吨数的 36.9%。

4、商贸方面

“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商贸中心上海的进出口停滞。国民政府为打开商贸工作的困难局面，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后改为贸易委员会），整理商贸事务。

1938 年 3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在《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提出两条政策措施：

(1)“加速添设国内交通线路,开辟扩充国际交通线路,发展交通机构,使各种物资之运输得以畅通,更进而改进对外贸易”;(2)“管理贸易,增加国产品出口,减少奢侈品非必要品入口,以裕外汇”。1938年6月,经济部关于商业建设,主要提出如下方针与办法:

一是输入之管制。对战时输入外货严加审核:为国家急需的货物,如军用品以及有关国防工业及交通需要的机器材料等,尽先购置输入;为在某种限度内为国家必要的货物,而可由艰苦节约得不超过此限度者,限量输入;为与战事及民生无甚必要,或虽亦需要但国内得勉力自给者,一律禁止输入。

二是输出之促进。为保障军需民用,且禁止各种物资偷运济敌,明令限制保留物资的出口。同时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积极提倡和奖助剩余产品的输出,并开拓国际销路,鼓励桐油、茶叶、生丝、原棉、麻、皮毛、锑、钨、锡等农矿手工产品的出口。

三是运销之调节。国内贸易,首要的是对棉、粮、燃料等关系军事民生的物品进行调节运销,其次对茶叶、麻丝、皮毛、木材等物品进行调节,以期货畅其流,物尽其用。

四是物价之平准。以兼顾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为原则,平准战时物价。

五是国货之提倡。为扶植生产,扩大推销,以支持抗战,提倡全国上下一律使用国货之风气。

此外,国民政府还先后制定了许多商贸方面的法规和管制措施,以及对重要商品的统购统销政策。这对于满足军事与民生的基本需求,增强战时经济力量,稳定战时经济生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茶叶、桐油、猪鬃、羊毛、生丝等大宗农产品和钨、锑、锡、汞、铋、钼等特种矿产品的易货贸易,对于维护债信,从外国换回战时急需物资,起了重要作用。

5、农业方面

国民党临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为农业国家,大多数人民皆为农民,故中国之经济基础在于农村。抗战期间,为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更进而加以奖进,以谋其生产力之发展。”大会提出了一项《战时土地政策法》。所刊“战时土地政策大纲”,主要内容:

(1)中央及地方应设土地利用指导管理机关,改善农业生产技术,严格控制生产种类,以提高土地利用的精度;(2)应设垦务机关,制定开垦计划,统筹办理全国垦务;(3)扶导和组织农业合作;(4)工业原料和出口品等待设立国际贸易机关所统制;(5)地籍整理,实行地价税、增价税、遗产税,并一律采累进制;(6)设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7)奖励人民以土地呈献政府,并应没收汉奸土地,征收利用不良之土地,依法分配于伤兵难民等;(8)公私荒地之承垦,首为受伤阵亡将士家属,次为战区难民和各地无土地之贫民;(9)规定地租额不得超过地价百分之七,并严禁任意撤佃抗租。

国民党的这个战时土地政策,对调整租佃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动员人民抗战是有益的。但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地位所决定,国统区农民

(台)《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604、610页。

《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第34~37页。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70页。

朱子爽编:《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版,第54~57页

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土地问题也根本得不到解决。抗战初期，除山西、浙江等国统区曾实施过战时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外，绝大部分地区或停留在口头上或根本不予执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的战时土地政策即被搁置而中辍了。地主豪绅则蜂起加租加押，土地兼并之风大盛，地主粮商乘机囤粮抬价，导致粮价暴涨，物价随之飞涨，尤其1940年四川等地粮食歉收，市场粮食奇缺，群众叫苦不迭，农民更是不堪忍受。

统观国民政府所施行的战时经济方策，在某种程度上是顺应全国抗战历史潮流、符合民族利益的，而且取得一定成绩。既保证了长期抗战和国统区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又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提供了国家实施战时经济的经验教训。全国人民以抗战大局为重，刻苦坚忍，不怕牺牲，发扬民族传统美德，对战时经济的维持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国民党统治阶级的腐败，政府官僚机构存在的种种弊端与恶习，治标多、治本少，条文多、落实少，讲得好、做得差，加之贪官污吏、不法分子中饱私囊，因此战时经济建设的预期目的远未达到。

三、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开展

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逐步加深。在中国共产党号召武装抗日的推动下，全国文化战线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以上海、北平为中心，各地的抗日团体、抗战刊物大量涌现，反对不抵抗政策和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降为次要和服从地位。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迅速建立起来。尤其在武汉失陷之前，“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

（一）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组建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武汉，全国的救亡团体、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流及大批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于武汉。当时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此时，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对日作战是比较积极的，对待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过去也有了一些改变。在文化领域，国民政府以往的文化专制主义有所收敛，为顺应抗日统一战线与民主的历史潮流，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政策与措施。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由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担任此要职，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一个重要标志。政治部下设4个厅，第三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著名进步文化人士郭沫若担任。

第三厅于1938年4月1日正式成立，下设3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

由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阳翰笙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科长和科员中还集中了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第三厅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巩固国共合作、扩大文化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为了搞好这次宣传，周恩来与第三厅一起多次进行研究，他指出：这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要到工厂农村里去，到前线，到战壕里去，去提高广大工农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文字宣讲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口头宣讲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无论漫画、电影、戏剧都要使人看了听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在4月7日至13日宣传周中，每天安排一个主要节目，分为文字宣传日、口头宣传日、歌咏宣传日、美术宣传日、戏剧宣传日、电影宣传日、游行宣传日等。第一天文字宣传和开幕大会，适逢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当晚举行了10万人的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整个武汉三镇沸腾起来了。

在“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参与领导第三厅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除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化装表演车和举行画展以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外，还组织慰劳团到各战区慰劳将士，并举行“七·七”献金运动，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全体成员组成“中共献金团”，带头参加献金。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者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

第三厅成立后，还建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等，并把由沪辗转来汉的孩子剧团接受为第三厅直属剧团。经过集训，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战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孩子剧团则留后方活动。

武汉失守后，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逐步由比较积极抗战转为比较消极抗战。1938年底，第三厅本部由武汉辗转到达重庆。国民政府为籍制第三厅，借口战时紧缩，大量压缩编制，裁减人员和经费，把原来3个处9个科压缩成4个科，将处一级裁撤。在困难的环境下，郭沫若带领大家开展不懈的斗争，编印出版了《抗战小丛书》、《抗战二年》、《抗战三年》、（《抗战一年》在武汉编印）、《抗战文艺》、《抗战壁报》、《敌情研究》、《中国报导》、《日寇暴行实录》等大量宣传书刊，还编印了其他宣传品。

1940年11月，第三厅被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了一个研究机构。为利用合法身份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郭沫若受命担任文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阳翰笙为副主任委员。文工会聘请了茅盾、老舍、陶行知、沈志远、张志让、邓初民、杜国庠、王昆仑、翦伯赞、侯外庐、郑伯奇、田

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4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页。

翁植耘：《郭沫若第三厅，文工会及其创作活动》，见《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3页。

汉、洪深、马宗融、卢于道、胡风、黎东方、姚蓬子、吕霞光等著名文化人士为专任委员和兼任委员。文工会初建阶段，经常举办各种讲演会和座谈会，工作开展得相当热烈。此外，在重庆还组织编写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文艺作品、文章诗歌等，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如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等，借古鉴今，古为今用，获得了极大成功。

（二）群众性抗战文化团体的建立与文化艺术的发展

在筹组第三厅的同时，为了把云集武汉的众多的文化界人士更好地团结起来，积极推动文化界抗战团体的组建。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布成立。大会推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45人为文协理事，周恩来和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宋美龄、孙科、柳亚子、陈立夫、陈诚、何香凝等被选为名誉理事。“文协”不设主席，老舍为总务主任，担负领导工作。“文协”成立，这是全国文艺界乃至文化界广泛的统一战线建成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抗战文化团体于武汉纷纷成立。它们对团结文化界同仁、宣传群众、支持抗战起到重要的组织作用。

全国抗战初期，各种抗日救亡和进步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创办出版。如上海《救亡日报》、《烽火》、《七月》，成都《金箭》，广州《抗战戏剧》、《文艺阵地》，长沙《抗战日报》，武汉《新华日报》、《群众》、《抗到底》、《弹花》、《救中国》、《战地》、《抗战电影》、《抗战文艺》、《戏剧新闻》、《五月》、《全民抗战》等等。武汉失守后，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大西南，重庆、桂林等地又有一些报刊陆续创办。但前后有不少刊物未能办到底，即被迫停刊。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被称为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嘹亮号角，连同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文协”会报《抗战文艺》等，在抗战文化导向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涌现出来。剧作家创作出许多与时代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好剧目，如《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台儿庄》等，音乐家创作了许多反映全民抗日的救亡歌曲，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到敌人后方去》、《救国军歌》、《洪波曲》、《赶豺狼》等。诗人写下许多战斗诗篇，陆续出版了《开拓者》、《新时代》等10余种诗刊，“七月诗派”以其自由、奔放、粗犷的自由体诗展现在人民面前。作家们创作了《卢沟桥演义》等大量小说和《战地书简》、《游击中间》等报告文学。电影艺术家们摄制了大量抗战影片，如《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东战场》、《光复台儿庄》、《热血忠魂》、《八百壮士》、《游击进行曲》、《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华北是我们的》等。

在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旗帜下，文化界凭着本身的团结和努力，已经给中国的文化运动创造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光明前途，中国的文化运动接受了一次划时代的洗礼，它将要吸收一切进步文明的成果，开放出一枝光辉灿烂的花朵。

（三）抗战文化的战斗作用

“七·七”事变以后，文化界继承发扬了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文化的光荣传统，把抗战文化作为反侵略的锐利武器，开辟了一条抗日的重要战线。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这一响亮口号下，广大文化工作者走出亭子间，勇敢地深入战地和农村，用各自特殊的武器，肩负起宣传抗战、揭露敌人、鼓舞民心士气的伟大使命。全国抗战开始后的前几年里，“‘文化下乡’、‘文化入伍’，风起云涌，与时俱涨。作为教育、宣传、鼓励士兵民众抗战，并增强其战斗意志的歌咏、戏剧、绘画、新闻报导、木刻，活跃在敌前、敌后，以及后方的每个平常下为文化人足迹所履的角落。”以戏剧为例。

“七·七”事变第二天，上海文化界集体创作并演出了第一部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充分表达了“用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血肉和敌人相持于战场”的决心，演出工作者战斗热情之高昂和观众反映之强烈是空前的。“八·一三”事变后，汇聚在上海的10余个救亡演戏队分途到各地进行抗战宣传，演出了《八百壮士》、《我们要反攻》、《在烽火中》等许多反映淞沪抗战的剧目，激发了人民奋起自卫、抗日救亡的热忱。上海沦陷后，全国18个戏剧团体，全国几乎超过95%以上的戏剧人才都集中在汉口。在第三厅组织下，各演剧队、宣传队分头进行巡回演出，为被侵略者呐喊，为战士们颂扬，发挥了战斗威力。旅居香港的戏剧工作者仅1938年就开展了近200次抗战演出活动，演出剧目达六七十种之多，其影响之大波及到南洋华侨。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文化工作者还创作演出了小型化、通俗化的活报剧、街头剧甚至茶馆剧、游击剧等，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演出极为广泛，观众印象极为深刻。各演出队不仅深入到战场、敌后、大后方，有的还到东南亚各地进行演出。抗战中不少作家投身杀敌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因各种原因牺牲的戏剧工作者就有36人。

对于抗战戏剧的历史功绩，剧作家田汉曾这样评价：“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又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

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勃兴、在与各种逆流的搏击中艰难前进的。进入抗战相待阶段之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日益尖锐，这场斗争必然反映到文化战线上来。广大文化界人士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政府的文化专制以及大肆泛滥的复古文化等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在暴露黑暗展示光明，坚持抗战与民主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战斗作用。同时造就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革命文化战士。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新1版，第229页。

《大公报》1944年5月20日。

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1942年），《戏剧春秋》2卷2期。

第三节 战区工厂、学校内迁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沿江各地的工矿企业和高等院校，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内迁运动。这是中国持久抗战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也是广大实业、教育各界抗日救亡的辉煌之举。工厂与高校的内迁，在中国抗战史乃至民族发展史上写下光荣而珍贵的一页。

一、沿海地区工厂内迁

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集中于沿海和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又受到侵略威胁。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集中了民族工业的大批精华。据经济部对工厂登记统计，1937年底全国工厂总数为3935个，仅上海即有1235个，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省份有2063个，占总数51%，一旦战事扩大，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摧残。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早就对这种不利于国防的工业布局表示担忧，一再呼吁把沿海工厂迁到内地，以保存经济实力。全国抗战前，政府虽有工业重心内移建立后方基地的设想，个别兵工厂已行迁并，但沿海地区工业迁移基本没有动作。“七·七”事变后，平津失陷，上海危急，日军的炮弹打进了厂房，国民政府方被迫议决将沿海厂矿向内地迁移。

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设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部署各项紧急动员事宜。资源委员会旋与沪厂家洽商，劝导迁移，并拟迁移各机器厂、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大中华橡胶厂、康元制罐厂和民营化学工业社，由政府补助迁移经费56万元，在10年内每年奖励金额25万元，允由政府代商银行低利息借款329万元，并允拨给用地500亩。

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议决：“奖励金暂从缓议，余通过。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力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由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连夜赴沪督导迁移。

12日，林继庸在上海召集五金、机械、化学、冶炼、橡胶、煤气等厂方代表，接洽迁移办法。旋即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简称迁委会），由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在监委会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确定工厂迁移的目的地为武昌，如有相当理由经监委会批准可迁入其他内地。决定由资源委员会派员在武汉主持划地及银行接洽事宜，并由迁委会派员驻武汉，成立武汉办事处协助工作。同时派员在沿途协助转运事宜。迁委会成立、内迁工作正式开始未及两日，“八·一三”沪战即发生了。

国民政府原打算只援助与军火制造直接有关的工厂，计划一个月内完成内迁。但随着战事日紧，要求内迁的厂家不断增加。到9月中旬已有125家民营厂报名内迁。鉴于请迁者日多，原案56万元已不敷分配，资源委员会于9月18日向行政院提出《迁移工厂扩充范围请增经费办法》。经行政院议决，旋由新设的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于9月27日召集各关系机关会议，决定增拨经费、地亩额，再迁天利氮气厂，天盛陶器厂，天原电化厂，

天厨味精厂，三北、公茂、和兴、中华等8家造船厂，以及中华书局等文化印刷厂10余家。

同时，国民政府明确规定了战区厂矿迁移原则。迁移之工厂矿厂分为两种，一为军需厂矿，一为普通厂矿。军需厂矿，包括兵工所需之机械、化学、冶炼工厂及矿厂，动力及燃料工厂及矿厂，交通器材制造工厂，粮食及被服工厂，医药品工厂，其他军用必需品工厂，由政府命令迁移，而予以下列诸项奖励：（1）补助迁移费；（2）免征各种转口税及落地税，并得按军用品减收运费及优先运输；（3）拨给建厂地亩；（4）由政府担保或介绍银行借低利息贷款；（5）发给奖励金等。普通厂矿，为军需厂矿以外之厂矿，由该厂自愿迁移；经主持机关核准后，得予以免税免验便利运输，代征地亩等便利。

此外，还对民营工业提出了扶植政策：（1）对于战区厂矿，设法迁移内地，辅助复工；（2）对于后方工厂，设法增加资本，扩大产量；（3）对于新兴企业，予以种种奖助，俾得创办；（4）对于工业材料之必需取给国外者，设法统筹购储，分配使用；（5）对于工业之所需之技术员工，设法增求登记，分发服务。

在国民政府优惠内迁政策的鼓励和有关部门的督导下，深明大义、救亡图存的广大内迁厂矿职工和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迁厂的热情十分高涨。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激烈进行的同时，一场规模空前的中国近代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展开着。迁厂工作极其复杂，困难重重，在日军炮口下把大量的机器设备拆运出来，其风险更是显而易见。尤其交通阻滞，运输极为困难，铁路车辆皆供军用，工厂迁移均以民船经苏州、镇江转轮上溯，途迂行缓，间受阻挠，困难殊多。然而，内迁各厂满怀爱国激情，“誓不以厂资敌”，冒着连天炮火抢拆、抢装、抢运，长途辗转，历尽千辛万苦，陆续抵达武汉。正如有人所说，“冷冰冰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地区工厂大规模拆迁工作被迫停止。上海及附近各工厂物资沿长江迁移的运输，至12月10日镇江运输站撤退，乃告一段落。除去公营及国营工厂不计外，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及材料共有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由于战事发展迅急，加之其他种种原因，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迁出的工厂为数较少，有的只将部分机件迁出。内迁的工厂多为五金机器厂、电工厂、化学厂、造船厂、文化印刷厂及制药厂，还有少数纺织及轻工业厂。

以上海为主要地区的内迁工厂绝大多数集中于武汉地区。据统计，截至1937年12月1日，由上海迁到武汉之工厂，经迁委会、监委会补助迁移费或予以便利援助迁移者凡123家，迁移机器材料12000吨以上，工人约1500人。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之厂矿达137家，机器重量25700吨，随同内迁的技术工人2300余名。

武汉，这个华中重镇，自国民政府撤出南京后一度成为全国政治、军事、

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1938年6月），《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35页。

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第14页。

《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页。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各内迁工厂陆续到武汉后，立即着手测地建厂，招工购料，设法开工。在武汉先后成立了迁鄂工厂联合会和工矿调整委员会驻汉办事处，以协助内迁厂的安置与复工。在 1937 年内复工的有 37 家，1938 年元月，又有 27 家复工。据复工仅一二月统计，60 余厂承造军用品的产量总值，即达 170 余万元，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然而，相当多的内迁厂家到汉后未能适时复工。除政府安排不周以及电力不足等问题外，主要是购地问题旷日持久不得解决。有的厂家见武汉无法立脚，加之战争日益紧迫，干脆直接迁往四川等地。

日军占领南京后，其侵略矛头直指武汉，国民政府以武汉为轴心筹设工业区域的计划遂成泡影。迁汉工厂大多立足未稳，不得不考虑再度内迁问题。

此时，正在汉口养病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积极争取滞留武汉的工厂转迁到四川，并派四川工业专家和官员由川飞汉向各厂家介绍四川的资源、设厂的环境，而且在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料、捐税等方面给予优惠与方便。各厂家深受感动，纷纷报名迁川。1937 年 12 月底有 20 余家工厂表示迁川，翌年 1 月中旬已准备即可迁川工厂达 41 家。当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派员与厂家代表到重庆及四川其他拟迁厂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勘测，尔后又组织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安排迁川各项事宜。

二、武汉地区工厂拆迁

南京失陷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地区工厂继续内迁到四川、贵州、湘西等大后方。工矿调整委员会遂着手动员武汉地区迁汉工厂和原有工厂再度内迁，进行抗战以来第二次工业大迁移。1938 年 3 月 22 日，刚由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成的工矿调整处，召集武汉三镇机械厂家代表讨论迁移问题，催促各厂做好一切准备。工矿调整处除协助迁川工厂外，还规定了工厂迁桂、迁滇协助办法，同时，招募各种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派往适宜的厂矿或技术机关服务。

6 月 9 日，日军逼近马当防线，国民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业，各类大小工厂，凡对军需民生有用者均在拆迁之列。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迁移费用由以前的无偿拨付改力提供贷款，运输、复工奖金缺乏者给予低息贷款，凡来不及拆迁的工厂皆予炸毁。

7 月 17 日，国民政府决定留汉各政府机关人员须于五日之内迁往重庆。工矿调整处得知武汉形势将届严重关头，益加紧敦促拆迁工作。除四川、湘西两处已派有人员部署外，还派员赴湘南、广西、陕西等地布置迁厂事宜。在武汉地区，工厂拆迁分两部分进行。一部分是外埠迁汉工厂的再迁，共迁出机器钢铁工业、造船工业、电焊工业、电器及无线电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纺织工业、矿业以及其他工业共 170 多个厂家。另一部分是武汉原有工厂的拆迁。工矿调整处派遣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分头四处劝导督促，并协助工厂拆迁。武汉三镇着手拆运者，有化学工业、机器翻砂工业、织染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厂家共 150 余个。

至 8 月中旬，除少数工厂被限期拆迁外，一部分厂家迁往湘西、湘南、

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 年版，第 22 页。

《民国档案》，1986 年第 3 期，第 60～62 页。

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大部分厂家迁往四川。及至武汉撤退，除沙市尚有数厂外，武汉地区厂矿大迁移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内迁工作转向宜昌与重庆之间，宜昌为迁川的中转站，各厂物资在此换乘木船入川。自7月下旬以来，政府各机关人员继续西移，在宜昌候轮者人数逾万，兵工署及民营厂矿物资络绎不绝，在宜昌江边堆积如山。武汉失守后，宜昌岌岌可危。在轮船运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又雇用木船，紧急疏导，紧张抢运，入川各厂陆续抵达目的地。宜昌航运直至1940年6月中旬宜昌沦陷乃告终止。

据统计，截至1938年底，迁往内地的厂矿已达304家，机件重量达5万余吨。这304家厂矿中，迁往四川的有134家。详见下表：

内迁厂数统计表

(1938年12月底)

迁往省区 业 别	四川	湖南	广西	陕西	其他 省区	共计
机器五金	51	55	10	3	3	122
电器无线电	8	6	2		1	17
陶瓷玻璃	5	3	1		1	10
化 学	22	4	2	2	1	31
罐头食品	7	3		1	4	15
印刷文具	19		3			22
纺 织 染	10	44	2	14	1	71
其 他	8		1			9
矿 业	4	3				7
共 计	134	118	21	20	11	304

上述厂家，到达目的地后，积极筹备建厂复工。至1938年年底，复工者达81家，产品价值已达438万余元。

在上海、武汉工厂拆迁的过程中，其他战区的部分工厂也相继拆迁转移。如河南郑州、漯河、许昌、孟县，山东济南、青岛，山西绛县等42家工厂迁往陕西关中地区（其中一部分再迁入川），拆卸机械1.5万余吨。

在众多的民营工厂实行内迁的同时，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兵工署、军需署管辖的兵工厂、军需厂也先后奉命迁往内地。除少数迁往湘西、贵州等地外，多集中于四川重庆地区。较大的兵工企业，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以及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含迁汉的上海炼钢厂和汉阳钢铁厂及大冶炼铁厂、六河沟公司湛家矶炼铁厂、萍乡煤矿的部分设备）均迁往四川重庆地区；巩县兵工厂先后辗转迁往长沙及湘西安化、沅陵等地。由于对兵工企业实行了比民营企业和普通国营企业更为优先的政策，因此，兵工厂的迁移相对来说比较彻底和顺利。这对于迅速建设后方战时兵工生产基地，保障军队作战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个工厂内迁工作持续到1940年基本结束。据统计，截至1940年底战区内迁民营厂矿448家、内迁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其中大部分迁入四川，计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3家，其他省区23家。

这些内迁工厂中，机械厂占 40.4%，纺织厂占 21.65%，化工厂占 12.5%，教育文具厂占 8.26%，电器厂占 6.47%，食品厂占 4.91%，钢铁厂占 0.24%，其他厂占 5.57%。此外，自动迁移的工厂亦有百余家，合计内迁厂矿达 600 余家。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部分工矿企业的内迁，是在全国抗战开始后特定战争环境下进行的空前的工业战略转移。尽管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对战局发展估计不足，对战略后方选择失当，内迁行动仓促，致使一些厂矿企业一迁再迁，不少工厂迟迟不能复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由于广大内迁厂矿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艰苦奋斗，政府有关部门如工矿调整委员会（处）和内迁厂矿联合组织的奖助、督导，这场工业迁徙运动仍不失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创举。

其一，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经济力量。内迁工厂虽然数量有限，但是内迁厂家多为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实力较为雄厚，门类较为齐全，其中不乏重点与名牌厂家。这场内迁运动，不但迁出了几乎所有直接支持战争的军工企业和支撑大后方工业的机器设备，而且同时随迁了大批企业管理与技术人才。上海内迁的民营工厂数量多、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其中有“开全国机械制纸工业之先河的”龙章造纸厂，“设备与资本素列全国制罐业第一”的康元制罐厂，“执上海橡胶业之牛耳”的大中华橡胶厂，“中国最大之纺织厂”的美亚丝织厂，居全国搪瓷业之首的益丰搪瓷厂，还有资本雄厚的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新亚制药厂、华生电器厂等。这些内迁厂迁出了大量的以工作母机为主的先进设备，发电机、马达等动力设备及各种原材料。内迁的许多科技管理等人才也成为战时工业的宝贵财富。

其二，促进了中国西南等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大后方民族工业发展的基础。战区工业西移，尤其数百家民营工厂内迁，大大促进大后方军需民用工业的发展，迅速使西南地区成为民族工业基地。重庆的机器业战前只有 10 余家，到 1940 年就发展到 133 家。豫丰、申新、裕华、沙市等纱厂的内迁，使西南后方的纱锭猛增 10 倍以上，为纺织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永利、天原等化工厂的内迁和创造性的生产，为西南后方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化学原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军事和民用的需要。支秉渊的新中工程公司由上海迁武汉，1938 年再迁湘西祁阳，以拓荒者的姿态惨淡经营，逐步发展为一个从采煤、炼铁、轧钢、发电到制造机床、蒸气机、发电机、轧钢机乃至炭精、工具夹的联合企业。随后胡厥文的新民分厂也移来此处，使这一地区成为新的工业区。新中、新民以及华成电器厂在湘桂地区形成三大支柱，发展为三十工业生产集团。新中由于以制造内燃机等出名，被誉为“全中国动力的发祥地”，华成亦被誉为中国的“动力之母”。由于内迁工厂发挥了主干作用，促进了一批工矿企业的兴建，为后方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其三，形成了战时大后方若干新的工业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战前严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战区部分工厂内迁，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中国工业分布极不平衡的局面，但是抗战期间向大后方移植了若干现代工业，形成了以四川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新的经济和工业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沿

吴文建：《中国工矿业之内迁运动》，《新经济》7 卷 9 期（1942.8.1）。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 年版，第 257 页。

海地区工业过分集中而大后方工业极端薄弱的状况，尤其西南地区的工业大为改观。

到 1940 年，西南已初步形成重庆、川中、广元、川东、桂林、昆明、贵阳、宁雅 8 个新的工业中心区。各区工厂分布情况如下表：

区别 工业类别	重庆 区	川中 区	广元 区	川东 区	桂林 区	昆明 区	贵阳 区	宁雅 区	合计 区
机 器	159	16	2	8	17	11	6	6	225
冶 炼	17	23	3	20	4	6	1	2	76
电 器	23	3	0	0	8	7	0	0	41
化 学	120	100	1	4	8	25	7	9	274
纺 织	62	31	1	4	23	18	1	3	143
其 他	48	14	0	2	7	13	3	0	87
合 计	429	187	7	38	67	80	18	20	846

广大内迁工厂为支持全国抗战、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1939 年 11 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与部分国民党参政员在重庆参观了部分民营内迁厂，并题词赞扬。周恩来的题词是：“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的题词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邓颖超的题词是：“合作奋斗，发展生产”。

1942 年元旦，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会上展出各厂家的各类产品和各种图表，展示内迁生产的成绩。中外人士交口称赞：在战时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民族工业仍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在短短四年中创造出令人震惊的奇迹。国民党军政要员林森、冯玉祥、居正、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各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国驻华大使都前往参观，并题词勉励。周恩来参观渝鑫（大宝）钢铁厂时题词：“没有重工业，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战时大后方尤其重庆工业的勃兴，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经济现象。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好景并不长，到 1942 年达到顶点后，便日趋衰落。正如有人所说，辛勤培植的后方工业，“宛如昙花一现，瞬息逝去。”

三、战区部分高校内迁

全国抗战之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办的各种高等学校共 108 所，其绝大部分分布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尤其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内，108 所高校即有 91 所遭敌破坏，其中 25 所因被破坏严重而停办。在高等教育面临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匆忙下令沿海各高校内迁。教育部指示平、津、沪、京等地的一些重要高校西迁西南与西北建立抗战教育基地。1938 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

国民政府《经济部报告》（1940 年），重庆市档案馆藏。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 年版，第 246 页。

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为了扶持高校内迁和建立战时教育基地，国民政府制定与颁布了一些教育改革政策，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如对内迁学生实施生活救济，以解决生活困难和稳定战时高校的教学秩序；对大学学生进行登记并分发到战区服务或到各高校借读；对在校生，酌量减免学杂费用，并发放贷款（后实行公费教育制度）。据统计，自 1938 年 3 月至 1939 年止，教育部津贴各校贷金者达 10 至 14 万人。又如高校招生实行变革，以扩大招生面。1938 年教育部颁布统一国立与省立高校的招生命令，在大后方与战区、游击区甚至敌后分设招生点，统一招生考试；对因战争而失学的学生，只要持有“同等学历”证明，可以免试入大学，或到其他大学借读；对文化程度尚不够升入大学的考生，由各大学开办“先修班”予以容纳；允许各文法科大学改变战前行政院的限制进行招生。此外，对失业教师进行登记与分配工作，并且增加师范教育，以解决高校师资力量。为适应抗战需要，还下力培养职业建设人才，并鼓励科学研究。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战后开始施行的一些进步的教育政策、措施，对于支持和扶植高校内迁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沿海、沿江各战区的高校内迁，是在战争爆发后或战火迫近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随着战争的变化，内迁的高校又一迁再迁，使这场中国教育史上教育中心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运动，持续了 8 年之久。自 1937 年到 1939 年，中国东部战区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在卢沟桥事变后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又迁至昆明，正式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北洋大学、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陕西台组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东北大学等 31 所高校迁至四川，国立浙江大学先迁浙西天目山，再迁江西、广西，后迁至贵州遵义；国立中山大学迁往滇南澄江，等等。

从 1940 年开始，英美与日本关系日趋恶化；上海租界形势紧张，后日军侵占东南亚和南亚，华南亦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租界与原迁云南、广西等地的高校又相继内迁，如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等从上海租界迁往重庆；滞留北平的私立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原迁滇南的国立中山大学迁往粤北；迁到昆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艺专、国立同济大学等迁至四川。

内迁高校最后多集中于四川，其中重庆 25 所，成都 7 所，共计 48 所。迁川各高校，除中央、武汉、中央政治学校等少数儿所以外，一般规模不大。各校因辗转播迁，原有师生人数大为减少，一般减少 50%。据不完全统计，1938 年上期 16 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 4647 人（尚包括在川招收的一部分学生），教职员仅 1063 人。1940 年，26 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 10772 人，教职员 2782 人。1942 年，30 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 13510 人，教职员 2686 人。在全国抗战的前 5 年，学生人数约增加 2 倍，教职员人数约增加 1.5 倍。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40 年 26 所学校毕业生共有 1826 人，1942 年 30 所学校毕业生共 3000 人左右。

在整个高校内迁过程中，广大知识分子充分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艰苦奋斗精神。内迁高校的众多师生背井离乡，辗转奔波，历尽艰难险阻，饱经“流亡大学”的艰苦岁月。各高校内迁之后，困难日益增多，内迁之初，大都校舍简陋，又常遭受敌机轰炸，教学设备与图书十不存一。战争旷日持久，物资奇缺，米珠薪桂，政府救济近乎杯水车薪。教师薪金锐减，七折八扣，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学生生活更是清贫不堪。然而，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并未因困难而动摇，高等教育也未因战火而中断。广大师生含辛茹苦，自强不息，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适应抗战人才的需要，内迁高校增设了一些系科与研究所，一些高校还增设国防教育课程，开办各种形式的短期训练班与专修科，并与工厂结合进行战时科研与战时生产，有效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内迁高校还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服重重困难，利用战时后方相对稳定的条件，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如西南联大，融三校精华为一体，名师三集，阵容强大，文、理、法各系所开课程均比战前充实、完备，许多课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许多科研项目取得较好的成绩。文科如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专著、王力的语法理论、吴晗的《历史的镜子》等；理科如华罗庚的《堆垒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都在中国教育史与科技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再如浙江大学，在竺可桢领导下，学术研究活动十分活跃。苏步青教授写成《射线曲线概论》一书，被法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之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工淦昌教授提出用K电子俘获办法寻找中微子，他的重要发现，成为世界物理学的重要成就之一，他的名字因此写进了世界性原子核理论教科书；贝时璋教授的《半年鱼之细胞学研究》、谈家桢教授的《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及研究》、卢鹤绂教授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罗宗洛教授的《微量元素及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等等，都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震惊与重视。其他许多内迁学校也涌现出教学和科研的优秀成果。

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高校内迁运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一笔。通过内迁运动，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华，促进并推动了大后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西南地区高校云集，人才荟萃，文化教育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以内迁高校为主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抗战与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教、外交筹各方面的人才。据统计，除中等学校、职业学校培育出数以百万计各种抗战与建设人才外，后方高等院校在抗战中即培育出毕业生达77600人。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战前准备不足，直到战争爆发才仓促动员，内迁过程中又缺乏通盘计划，各校自行其事，仓惶搬迁，颠沛流离，在播迁过程中遭到严重损失；在教育方针与内容上，国民政府反对变更教育制度和彻底的民主改革以适应抗战需要，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并在高校中推行“训育制度”，加强对师生的思想控制与特务监视，使高校难以为抗战报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如此，抗战期间高校内迁运动的成绩，广大高校师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编 小 结

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底,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全面战略进攻,中国进行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侵略者动员了几乎全部的军事力量,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几个月灭亡中国。中国则力求抗住日军的战略进攻,最大限度地消耗其力量,使战争趋向不利于敌的持久局面。平津失陷、淞沪告急的形势,加速了中华民族团结的进程。国家面临空前的危难,全民加强了新的凝聚。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奠定了中国不败的重要基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战略问题上相互协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双方的情况特点及其战争规律,提出了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中心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指明了具体道路。国民党部分地接受全国人民的意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表现了一定的进步,召集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召开了国民参政会,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存在,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进行政治机构、经济体制和文化活动等方面的某些改革,从而使全国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救亡的高潮,形成举国上下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国共两党的军队作了合理的分工,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担负挺进敌后,发动、组织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收复被占领土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从敌后钳制、消耗和消灭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

正面战场是战略防御阶段的主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虽由于战略指导的某些失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未充分发动民众参战,使得多数作战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并丧失了过多的国土和城市。但广大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不惜流血牺牲,进行顽强的作战,仍给敌人以相当的打击。每次会战都能持续一月至数月之久,并能在会战后期跳出日军的大包围圈,保存了军队的主力。

在敌后战场,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展开了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战略行动。日军主力气势汹汹地向中国腹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迎敌而上,向敌占区挺进;日军在正面不断占领新的地区,而在后方却不断丢失已占领的地区。八路军、新四军自挺进华北、华中敌占区以来,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支援下,对日军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10余块抗日根据地,从而极大地钳制了日军的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加快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就这样,在前后两条战线的突击下,终于粉碎了日军狂妄的战略企图。

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所以能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进攻,根本的原因在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中国实行了最不利于敌人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展了最大限度发挥自己优势的敌后游击战争。

日本侵略者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侵华战争出现如此不利的局面,是它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底,日本侵略军将正面战线推进到包头沿黄河至风陵渡及开封、合肥、安庆、信阳、武汉、九江至杭州之线,并占领了广州附近地区。表面

上看，似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然而，日军虽在中国领土上前进了 1800 余公里，但并没有击溃或围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日军虽到处制造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大屠杀，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更加坚强；日军虽占领了中国包括首都南京在内的北平、天津、杭州、广州、武汉等一批大中城市和大片的国土，但并未能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日军在正面战线取得某些胜利，但后方占领区则遭到根本性的失败，敌占区的广大地域又被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夺回。总之，由于日本侵略者错误的估计形势，在脱离实际和一厢情愿的战略指导下，倾巢而出对中国 15 个月的全面战略进攻，并未达到预定的任何目标，相反兵力、财力和资源的消耗已到困难的程度，战略进攻不得不被迫停止。

1937 年，日本法西斯首先制造“七·七”事变，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迅速扩大到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冀、察、绥、晋、鲁、苏、浙、豫、皖、赣、鄂、粤等 10 余省区，战区面积约 160 万平方公里，中日双方投入兵力 400 余万人。“七·七”事变实际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全面爆发的起点。

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中国奋起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战争，实质上这是世界基本矛盾在亚洲地区的全面激化，是世界各大国在亚洲剧烈争夺的初期形式。中日全面战争把 30 年代初期欧亚两洲的局部危机，扩大成了牵动全局的世界性危机，日本法西斯的刀锋开始直接触动英、法、美、苏在亚大地区的战略利益。尽管欧美各大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困扰或从本身利益出发，企图让中国打头阵，拖住日本的手脚，自己避免正面与日本对撞，不愿过早陷入战争。但是，现实存在的尖锐矛盾却将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各大国以不同方式卷了进来。苏联从反对法西斯侵略和保卫其远东安全出发，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即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迅速以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援助。英法美等国虽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政策，但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抗争。国际联盟多次召开会议，虽未作出制裁日本侵略的具体措施，但谴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鼓励援助中国。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及正义人士，都把中国全民抗战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线，纷纷给以道义的、物质的和人员的支援，一时间在中国汇集了国际反法西斯的一支可观的力量。

不畏强暴的中国人民，没有辜负世界人民的期望，以空前的民族团结和战斗，粉碎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打乱了日本的侵略计划，初步稳定了东方的战局，为各民主国家争得了加强国防迎击侵略准备的宝贵时间，并为自己坚持长期抗战，积蓄反攻力量，进一步转变战略态势，奠定了有利基础。

第四编 转入相持 (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一节 相持阶段到来前后的国际环境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前后，正是国际局势急剧恶化的时期。在欧洲，德意法西斯疯狂扩张，英法美等国却一味地妥协让步，终于导致欧洲战争的爆发。在远东，英法美为了应付欧洲危机，奉行一条对日本的绥靖政策。苏联有与西方各国携手遏止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强烈愿望，但是在西方一些国家一再拒绝集体安全政策的情况下，也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为首要任务。这种状况使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地位，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战带来不利影响。

一、慕尼黑协定与欧洲战争爆发

1937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新的经济危机，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及英美等国对此所抱的“中立”态度，刺激了德意在欧洲的新冒险。

1937年11月5日，德国召开了有三军总司令参加的秘密会议——霍斯巴霍会议。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今后新的扩张目标是“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取得成就”，“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

1938年2月，德国开始着手实现这一计划，向奥地利提出了一系列无理的要求。3月11日，德军越境进入奥地利。13日，德国宣布奥地利并入德国。英国的默许态度早在1937年11月就已明确，英国枢密大臣哈利法克斯向希特勒表示：欧洲秩序的改变，“也许是注定要发生的。在这些问题中有但泽问题、奥地利问题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英国希望看到，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和平演变进行。”1938年4月2日，英国正式承认奥地利并入德国。法国与美国也相继宣布承认。

紧接着，德国又将矛头转向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宣布，要在不久之后解决苏台德问题。5月30日，他又规定，必须在10月1日前实施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绿色方案”。9月3日，希特勒命令公开进行对捷克的战争准备。

面对捷克危机，英国首相张伯伦早有定见：“我们无法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它可能成为同德国开战的一个借口。……因此我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证的想法，也不想法国履行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方面向法国人提供保证。”法国虽然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同盟关系，但并无履行义务的决心，尤其在英国一再要其谨慎从事，不要指望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了摆脱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烫手的土豆”，英法两国一面不断向捷克斯洛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472页。

同上，第486页。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伐克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向德国让步，一面频繁示意德国，请求举行首脑会晤，探求和平解决的办法。9月15日、22日、28日，张伯伦不惜屈尊三次飞往德国，并向希特勒许诺：“你完全可以不战而立即得到一切主要的东西。”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德、意、英、法四国首脑在排除当事者捷克斯洛伐克和与捷克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苏联的情况下，在慕尼黑召开会议，达成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其中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及其一切附属设施和物资无偿移交给德国。协定的附件规定：英、法、德、意共同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不受侵犯。

英法在慕尼黑的妥协不但没有带来欧洲的稳定和“一代人的和平”，相反，却使欧洲分崩离析，战争提前到来。慕尼黑会议引起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大混乱。各个中小国家在心理上受到极大震撼，它们深深感到英、法不足恃，原有的欧洲秩序已经摇摇欲坠，因此，纷纷修订自己的外交政策。

1939年2月24日，匈牙利参加了《反共协定》。罗马尼亚则表示，“既不偏向轴心国，也不偏向西方”。另有一些国家则借机强行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

慕尼黑会议及其结局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对英、法等国长期抱有的期望。自30年代初东西方战争策源地形成以来，苏联一直奉行联合英、法，共同对付德、日、意法西斯侵略扩张的集体安全政策，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苏联发现自己虽为欧洲大国之一，却被排除于事关欧洲前途的国际会议之外。严酷的现实迫使苏联不得不考虑调整自己的政策。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苏共第18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申明苏联的对外政策为：“执行维护和平和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按照这一中立自保的政策，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慕尼黑的又一后果是进一步鼓励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冒险。1938年10月21日，刚刚获得苏台德地区的希特勒又为德国指定了新的扩张目标，他命令部队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地区，并对立陶宛的默默尔地区提出领土要求。10月20日，德国外长向波兰大使提出，把但泽归还德国，并在波兰领土上建立一个走廊，使但泽与东普鲁士连结起来。

1939年3月16日，德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宣布将《慕尼黑协定》中并不包括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并入德国。3月23日，希特勒亲乘“德意志号”战舰占领了默默尔地区。4月3日，希特勒批准了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4月7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

德、意新一轮的扩张把英、法逼进了死胡同，迫使它们不得不在三四月间先后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比利时、荷兰、土耳其等国提供安全保证，形成了事实上的军事联盟。与此相对应，希特勒于4月28日宣布废除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又于5月22日与意大利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结成了所谓“钢铁同盟”。至此，欧洲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

1939年8月23日，德国在完成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避免东西两线作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军事科学院编：《斯大林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战的部署后，于 1939 年 9 月 1 日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9 月 3 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欧洲战争正式爆发。

二、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

自 1938 年起，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对远东的影响是巨大的。英美等西方国家虽然不甘心丧失自己在中国的既得权益，屡有抗议日本乃至有限援助中国抗战的表示。但是实现对日妥协，却是这一时期英美远东政策的主流。

1938 年 9 月的欧洲慕尼黑协定，鼓励了日本在远东的扩张。1938 年 11 月 3 日，日本公然发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明确宣布要以日本的“新秩序”取代英美为主的东亚旧秩序。

11 月 8 日，外相有田八郎向美国大使表示，“今当东亚天地正展开新的形势之际，仍以事变前适用的观念乃至原则来衡量现在及将来的事态，不仅不能给解决当前问题带来任何办法，而且不能有助于确立东亚的持久和平。”12 月 29 日，有田又对外国记者团声称：“将来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应在三国（指“日满华同盟”——著者）新体制的国际和经济自主所能允许的必要限度内，且必须不享有政治特权。”

面对日本的新挑战，英美等国面临三种选择，其一，大力援助中国，积极介入中日战争，以实力对抗日本，保全自己的在华利益。但是，英美等国不愿承担与日本全面交恶的风险，尤其在欧洲危机的情况下，更担心因此而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地位，促使日本加速靠拢德、意。其二，与日本全面妥协，承认其扩张要求，以稳定远东，集中力量于欧洲。但是，这不仅意味着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丧失殆尽，而且会危及其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和战略地位，因此很难为英美所接受。既不愿对抗，又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于是就只能选择第三种折衷的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挫折日本的扩张锋芒，使其知难而止，在合适的时机，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让步，实现双方有条件的妥协，从而保全西方国家在华的基本利益。“东亚新秩序”出笼后，英美的反应强烈。1938 年 12 月 30 日，美国对日本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申明“门户开放”原则不容某一方面片面取消，反对“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英国继美国之后，也于 1939 年 1 月 14 日照会日本，表示“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用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在频繁交涉、抗议的同时，英美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抗战给予适当援助，以免因中国的崩溃而丧失制约日本的筹码，才首次决定对华贷款。这些贷款不仅迟迟难产，而且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如借款对象不能是中国政府，必须由民间机构出面，借款不能用于购买军火，借款必须是商业信贷的方式等等。英美在援华问题上的这种态度，无非是要维护其“中立”立场和正常的对日关系。

英美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虽有抗议表示，但举措相当谨慎。日本工业对外依赖性最大，美英是其主要的贸易对象。

1939 年 1 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指出：日本对美英法三国的出口贸易占其总出口的 70%，其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工业原料。尽管各国都了解日本这一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朝云新闻社，1975 年版，第 131 页。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8～1939）》，波士顿，1939 年版，第 246～251 页。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8～1939）》，波士顿，1939 年版，第 253 页。

弱点，中国也屡屡提请英美各国实施对日本禁运，以削弱日本的战争力量。但英美等国却不敢触动这一敏感的神经。它们不顾中国及世界舆论的反对，竭力维持与日本的贸易关系。

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出口了价值7.16亿美元的各类物资，为同期对华出口值1.41亿美元的5倍多！1938年，日本从美国获得的各类战略物资竟占其总进口量的45~91%。由此可见，英美等国所维护的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对中国抗战造成的危害远甚于它们对华的有限援助。至于英美等国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所奉行的双重性政策的目的是，其外交官员有过明确地表白。武汉失守之际，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给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声称，英国要“对交战双方维持友好关系……以便在和平谈判及以后时期我们能尽到适当的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拖延时间，期待双方终至完全精疲力尽，允许我们帮助实现这个悲惨冲突的合理解决”。

1938年10月后，日本被迫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开始改变侵华方针，着重从政治上诱降中国。英美等国视此为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良机。

1938年11月1日，英国向日本表示，愿意就中日和平问题进行斡旋。1939年1月10日，法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思默在赴任前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进行了一次谈话，透露了他的使命。他说：鉴于欧洲和远东局势，通过对远东特别关心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使目前的中日冲突得以有效而公正解决的紧迫性正在加剧，其时机似乎就要到来。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指出：欧美列强对结束中日冲突终于发挥作用的时刻就要到来，特别是英国此刻要正式表态，日本也在探索同样的道路，“我们将在远东与英国采取同样的行动。”

英美两国也分别向日本表示，如果日本建议修改九国公约，他们愿意参加为此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为了促成中日停战，英国外交官员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游说。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首相表示：如果日本同意缔结和平协定，英国政府愿意承担使中国方面停止一切排日活动的责任。1939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提出具体建议：放弃满洲，中日实行合作，取缔反日活动，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等。西方各国酝酿的“远东国际会议”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在它们谋求缓和与日本关系的行动中，确实存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内容。针对国际投降主义者的阴谋，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国际投降主义者“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1939年7月15日，英日在东京开始谈判。

24日，双方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页。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

《顾维钧回忆录》（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7页。

《顾维钧回忆录》（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9.340页。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572页。

以赞助”。《有田——克莱琪协定》实际上是英国在东方放任侵略，纵容掠夺战争的又一丑行，是“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严重步骤。

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更加急于对日妥协。1940年4月12日夜，德国即将席卷北欧前夕，英、美、法三国大使一齐会见蒋介石，再次劝告中国“及时对日媾和”。英国大使说：“目前英、法要全力对付德国，无暇顾及中国。英、法不愿使中国灭亡，所以再三劝告采取对日和平方针。日本方面在英、法、美的监视下，也决不会提出过苛的要求。……对中国方面来说，也会使巨大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如加紧建设，不难恢复到战前状态。”法国大使说：“上次本人奉本国政府之命，会同英国大使劝告应与日本媾和，但未见成效，……现在法国面临着欧洲危急，在不得已时为了维持法属印支的安宁，停止滇越铁路的运输也未可知。若走其他路线则代价太大。因此中国要想避免巨大的损失，只能与日本和解。”否则，“将来万一无人支持而继续抗战的话，将不可避免地蒙受更大的打击。”美国大使说：“我代表本国政府向贵国进行忠诚的劝告，即日停止战争，在英、美、法三国援助下和日本进行谈判。”

1940年6月，德国入侵法国之后，日本在德、意支持下要求英、法封锁滇缅、滇越运输，实行对华禁运。6月19日，法国封闭了滇越铁路；7月15日，英国屈服于日本压力，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中国西南的国际通道因此而封闭。

总之，中国抗战相待阶段到来前后，由于欧洲危机的加深，英美等国急于实现对日妥协，它们奉行了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让步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慕尼黑绥靖政策在远东的翻版，它使中国人民的抗战面临严重的威胁，迎合了日本急于通过政略和谋略来摆脱困境的侵华战略的需要。

三、苏联的远东政策

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欧洲战争，对苏联的对外政策造成了极大冲击。苏联放弃了坚持多年的集体安全政策，转而采取了一条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为主的外交路线。这个外交路线对苏联远东政策的影响在于，进一步加强了延缓苏日战争、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基本考虑。1938年10月以后，苏联继续贯彻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使之能够长期牵制日本的政策。1938年两次对华贷款1亿美元，1939年后继续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以便中国购买各类军用物资。当然，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各种援助有其自身的打算。1940年12月，斯大林对即将赴任驻华武官的崔可夫指示说，“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尽管如此，苏联的对华援助仍然非常可贵，通过支援中国抗战也确实达到了束缚日本发动侵苏战争手脚的目的。

苏联远东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对待日本。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3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85~186页。

[苏]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1938年以后。苏联为避免德日的两面夹击，迫切希望远东苏日关系的稳定。1938年4月4日，苏联政府建议日本政府通过谈判解决一切争端。这一建议不但未得到响应，日本反而于当年夏和1939年春夏之间，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地区两次对苏武装挑衅。苏联利用日军主力久困中国战场之机，坚决反击日军。特别是在诺门坎战役中，苏军重创了日本关东军，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实力。日本迫于中日战争的困扰，也产生了暂时稳定日苏关系的意向。

1939年12月31日，苏日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苏日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向苏联付清了背着中国买卖中东路的最后一笔欠款，苏联同意将苏日渔业协定延长到1940年12月31日。

1940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在题为《关于1939年12月31日苏日协议》一文中表示，苏联政府和舆论界十分重视苏日关系的正常化，苏联方面愿意促进它的实现。3月底，苏联政府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日本毕竟应该理解，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它的利益受到侵犯。只有这样理解，日苏关系才可能圆满地发展下去。”在苏联政府的不断努力下，1941年4月13日，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双方“维护彼此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在另一方处于第三者一国或数国的军事行动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期间严守中立。此外，在签署的共同宣言中公开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1938年以后，苏联在欧洲动荡、自身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谋求缓和苏日矛盾的各种努力，对牵制日军的对苏战争冒险，避免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而且，在此期间苏联也未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但是，苏联对日缓和关系的一些举动，尤其是《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特别是苏日双方互相保证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严重损害中国东北和外蒙古领土主权的行为。对日本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北方苏联的顾虑，增强了南进的决心。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枢密院答询时声称，在冲击美英，冷却中苏关系这一点上，中立条约“对我有利”。

[苏]C·A·戈尼昂斯基等：《外交史》第4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译本，1980年版，第203页。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日]深井英五：《枢密院重要议事备忘录》，岩波书店，1953年版，第150页。

第二节 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

一、日本侵华方针变化的原因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结束，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经过 15 个月全面战争，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动摇，对苏战争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动荡，日本急欲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去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转折”。这些内外因素，尤其是侵华战略的破产，迫使日本在 1938 年 10 月以后对其侵华方针作出重大修订。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中国战场的态势

“七·七”事变时，日本企图经过速战速决的战略，重现甲午战争迅速取胜的一幕。这个战略方针着重依赖武力，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必要的兵力，在有限的作战空间里，摧毁中国的战争力量和战争意志，一举达成日本的战争目的。小国寡民、资源贫乏的日本最忌讳战争旷日持久，因为这将造成日本国力的无限消耗，难以实现其世界战略。然而，15 个月的战争结果却是，日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而其力求避免的不利状况成为现实。

至 1938 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上投入了近百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 45 万人伤亡的代价，换来的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窘境。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不久，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格局。在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 4000 公里的正面，日军面对着 200 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另一方面，在相当于日本本土近 3 倍的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战线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至 1938 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已发展到 15.6 万人，新四军发展到 2.5 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 5000 万人以上。日军仅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

尽管日军已由战前的 17 个师扩大为 34 个师，并将其中绝大部分投入中国战场，但同时应付前后两个战场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日本的战史著作就此指出：“占领地区内特别是华北和华中方面，由于徐州和汉口作战而兵团外调，移动频繁，造成后方兵力不足，只能保持点和线，前线方面也在扩大，以致到处配备薄弱。敌人乘此弱点，遂这次企图扰乱我军后方乃至进行局部反攻。”

在这样一种战争态势下，日军若想继续维持战略进攻的势头，就必须投入更大的兵力和更多的物资补给，并准备承担远甚于以往的人员及物资消耗，即使如此，日军也没有胜算的把握，更何况 15 个月的战争已使日本的军力、国力不堪重负了。

捉襟见肘的日本兵员、军需动员状况

经过 15 个月战争，日本痛感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抗战意志和能力。战争的实际进程无论在规模、时间、强度等各方面，均超出它初期的预料。日本的战争能力开始暴露出严重破绽。

战争开始后，日本大规模扩军，先是在 1937 年扩编了 7 个师，继而于 1938 年又扩编了 10 个师，使其师的总数翻了一番。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扩军，使日军的兵员组成出现问题。日本陆军省军务部门统计：1938 年 8 月 1 日，侵华日军成员中的现役兵仅占 11.3%，预备役兵占 22.6%，后备役兵占 45.2%，补充役兵占 20.9%。由紧急动员而造成的这种畸形的兵员结构严重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对此，日军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整理军队。

与兵员动员的窘况相伴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动员补给同样难以为继。开战之初，日本轻视中国，设想无须大规模的军需动员，仅凭现有军需储备一举击败中国。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持久，各类军需物资的消耗直线上升。日本被迫于 1937 年 10 月开始实施“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此次军需动员除了涉及原有的陆海军兵工厂外，还动员了约 3800 家民营工厂，对民营工厂的利用率达到平时的 2.5 倍。尽管如此，军需物资的生产补给情况仍然达不到日本军事当局的预期成果。参见下表：

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实绩（%）					
武器	弹药	飞机	坦克	轻装甲车	钢盔
70	60	66	27	43	100
防毒面具	卫生材料	兽医材料	海运器材		
97	90	87	80		

1938 年 6 月 2 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就军需动员的状况上奏天皇：“虽然官民一致协作，昼夜工作，异常努力地从事各自所担负的军需品的整备补给，但由于各种原因，……武器、弹药、飞机、坦克重要军需品的生产未能达到预期成果，这是非常遗憾的。”

第一次军需动员按计划至 1938 年 3 月 31 日止，历时 6 个月。但战争不但没结束，反而日形扩大。日本只好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时间为 1938 年 4 月 1 日至 1939 年 3 月 31 日。为了保证计划指标不再落空，当局把动员的民营工厂扩大到 4000 多家，并采取了诸如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换言之，以降低质量来满足对数量的要求。但是，第二次军需动员仍然达不到战争的实际需要。日本兵工总厂负责人报告说，坦克装甲车的生产数量不能适应急速扩充的军备；小口径火炮供需失衡；观测用具和光学兵器的整备状况极其不良；至于弹药的补充供给只是到 10 月武汉、广州作战结束后才有所转机，此前不能达到军需的要求。战后日本的战

[日]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朝云新闻社，1975 年版，第 149 页。
[日]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 2 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120 页。
[日]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 2 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121 页。
[日]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 2 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121 页。
[日]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 2 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242 页。
[日]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 2 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243 页。

史著作也指出：“步枪、炮弹都不够用，到 1938 年 6 月，连学校用的教练步枪都被收回。”

兵员及军需物资动员补给方面存在的种种困难，限制了日军进一步发展其战略进攻。

战争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

日本经济是一种对外依赖程度极高的经济，其工业能力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直接取决于来自海外的各种原材料。日本历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重要的是要控制原料产地。然而，15 个月的对华战争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大量的战争消耗却造成日本各类物资的极端匮乏、进而动摇了日本脆弱的经济基础。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3 月，短短 8 个月内，日本就连续 4 次迫加临时军费，累积总额高达 74 亿日元。这是日本从事甲午战争（2.00475 亿）、日俄战争（15.08472 亿）、第一次世界大战（8.8166 亿）和“九·一八”事变（19.3125 亿）四次对外战争战费总和的 163%，是 1936 年日本预算总岁出（22.82 亿）的 3 倍多！这笔巨额战费不仅造成日本的财政拮据，而且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庞大的战费支出绝大部分用于武器弹药及各类军需品的生产，这些物资一经产生即脱离于再生产之外，成为对经济发展毫无意义的纯消耗。这种消耗使日本的出口产业因原料不足而出口能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材料的大幅度减少，最后使整个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转受到破坏。

由于战争影响，1938 年度上半期，日本的进、出口分别比上一年度减少了 32.9% 和 19.6%。为了弥补贸易萎缩造成的物资短缺，日本只好动用国内的黄金外汇储备。战争爆发后，日本原有的 388 吨黄金仅仅剩下 25 吨，其余的都作为贸易决算而输往美国等国家。即便如此，战争带来的物资匮乏的情况仍很严重。

为了满足战争需求和准备在世界更大的范围的争夺，日本竭力企图扩大生产能力，并为此而制定了 1938 年物资动员计划，然而该计划在半年后就无法继续实施，被迫于 1938 年 6 月进行大改订，修改后的计划基于物资短缺的现状，全面压缩一切与军需无关的产业的物资供给量。仅以钢铁类为例：当时一般民用的普通钢材的需求量是 478.4 万吨，修改后的计划仅供给 306.9 万吨，削减了 36%。原计划中对准军需和铁道省所需 66.6 万吨普通钢材是保证供给的，而修改后的计划仅供给 54.46 万吨，削减了 18%。钢铁短缺对各产业的影响极为严重。与 1937 年末相比，日本钢村碾压设备的 33%，平炉设备的 11% 变为闲置。由于工厂建设、矿业开发等所需钢材削减了 55%，一些急待扩充的产业面临威胁。日本国内一般私营铁路所配给的钢村仅够用来修缮，根本谈不上任何发展。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朝云新闻社，1975 年版，第 115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 2 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50、183、361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 2 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271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朝云新闻社，1975 年版，第 122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 2 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 年版，第 214～217 页。

苦于物资问题对经济发展和战争能力的制约,1938年6月物资动员计划改订后,日本政府特意向全国发表了全面统制物资的声明,声称:“中国事变虽因徐州陷落而使战局呈现一大进展,但前途仍很辽远。……值此之际,要完善后方设施,使作战不受影响,以达成帝国期望之目的。”“为此,当前急务在于最有效地贯彻运用物资的统制。即排除万难,把振兴出口、增加生产、统制消费等有关政策彻底强化。在此,政府按照新情况,树立了优先充实军需品和输出产业原料的物资供给计划,期待彻底实行这一计划中的各紧要方策,以巩固国防,维持国民经济。”声明要求贯彻节约、配给、回收、实行战时简朴生活等十大措施,并规定对钢、铁、金、银、铜、铅等32种物资实行强化的使用限制。

出于对物资短缺及其对经济影响的考虑,1938年,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从缓解经济困难的角度建议早日结束战争。

1938年5月,“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在《我国经济国力判断》的报告中提出:(1)尽早结束战争,实现和平;(2)不能和平之际,依靠缩小战争规模来全力充实国力,改善国际收支。同年7月,企划院在《我国经济国力判断(第二次)》中也指出:“必须迅速寻求收拾中国事变的方策,……在看不到生产力扩充和贸易进展的情况下,树立对今后战争的计划是至难之事。”

侵华战争陷入长期化破坏了日本的世界战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原本是将此作为有利于其对外扩张总体战略的首要环节考虑的。即通过速战速决,建立以日本为首的“日满华同盟”,再依靠这个“同盟”赋予日本的强大力量,实现其南进和北进的大扩张。经过15个月战争,这个预想彻底破灭了。侵华战争不但未能帮助日本的总体战争计划,反而成为沉重的包袱,使日本在即将到来的“国际大转机”面前失去了从容应付的能力。

为了准备新的世界大战,日本陆军自1935年夏起,对本国的综合国力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于1937年5月以世界大战为目标,制订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要纲(陆军内部用)》,要纲的方针指出:“大约以1941年为期,筹划计划中的国防重要产业的振兴,以便一旦有事之日,在日满、华北的范围内,使重要资源得以自给,同时谋求平时国力的飞跃发展,确立指导东亚的实力。”1937年6月,陆军将该计划提交内阁讨论批准,但是,这一事关日本总体扩张战略的计划却由于侵华战争的影响而迟迟不决,一直拖到1939年1月17日,才在内阁会议上以《生产力扩充计划》为名确定下来。日本内阁三长官,对这一重大计划的拖延作了解释,其中企划院总裁指出,该计划难产的原因之一就是重要产业扩充用的物资极不充分,所以不能着手实施。而物资问题直接源于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苏两国分别以对方为敌手,加紧扩充在远东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 2 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22~224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22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 2 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72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 1 计划编》,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591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 2 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141页。

的军备，以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然而，侵华战争却使日本的对苏战备受到严重削弱。由侵华战争而加剧的日本对苏军备的严重不足，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对苏的强硬立场。在 1938 年夏的张鼓峰事件和 1939 年春夏的诺门坎事件中，日本都因侵华战争的掣时而被迫对苏作出让步。

总之，经过 15 个月的战争，日本朝野感到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已经破产，单凭武力无法征服中国，侵华战争已经对日本内外经济政治造成巨大影响，并成为日本实现其世界战略的沉重包袱。有鉴于此，日本被迫对既定的侵华方针作出重大调整。

二、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要点

采取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战争初期，日本盲目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采取了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战速决的方针。1937 年 12 月攻占南京后，日本狂妄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企望以武力迫使中国屈服。

武汉会战前，日本战略进攻的能力已经衰减，中国战场的持久态势渐趋明朗。面对这种状况，日本军政上层围绕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产生了激烈争论。石原莞尔认为当局者“徒然强调积极作战，过于相信武力的优越，他们不理解中国事变持久战的根本含义，置兵于绝境，耗尽了国力。”日本军部也从实际的战争过程中感到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强烈要求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负责经济动员的一些部门则从经济困境的角度提议另谋解决事变的途径。

于是，武汉会战后，日本被迫将原有方针改变为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新方针。

1938 年 10 月 21 日，内阁会议在《关于时局的处理方案》中表示，“国民中只管依靠武力工作解决事变，希望迅速完成武力工作，并以此作为事变结束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提出“今后，不仅要用武力，更要倾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总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1938 年 11 月 3 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一改以往“惩膺暴支”、“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在“合作”、“提携”、“互助”等道义招牌下对中国发出政治诱降。声明说：“帝国所希求者即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秩序。此次征战的最终目的即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这个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已经把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变为政治进攻为主的新方针，企图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条件，利用并扩大中国的内部矛盾，迫使国民党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把处于僵局的战争引向政治解决的路途上去。

按照新方针的精神，1938 年 11 月 18 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及参谋部制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朝云新闻社，1975 年版，第 119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朝云新闻社，1976 年版，第 464 页。

[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 下》，《文书》，原书房，1965 年版，第 401 页。

定了《抗日政权屈服或崩溃的要领》，对所谓“政略”进攻作了详尽规定：“除作战行动外，当前大致要采取以下方策：（1）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和建设；（2）进行建立新中央政权的工作；（3）酝酿反蒋、对日和缓气氛和争取民众等工作；（4）进行反共宣传；（5）促使抗日军队内部崩溃；（6）利用高宗武一派，争取新官僚和民众；（7）进行西南独立工作；（8）收买和利用杂牌部队及各种武装团体；（9）促使第三国（特别是德、意、波兰）否认蒋政权；（10）促使第三国（特别是英、美、法）放弃援蒋政策；（11）加强对苏谋略。”这些“政略”进攻的内容几乎包含了非军事的政治、经济、外交、舆论宣传、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其目的一是通过巩固占领区和炮制伪中央政权，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面前造成一种矮化中国抗日政权的既成事实，并结合外交上孤立中国，动摇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二是通过反共宣传挑拨国共两党关系，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嫡系军队与杂牌军队之间以及抗日征与亲日派之间的矛盾，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阵营，达到日本外部军事进攻达不到的目的。

停止正面战略进攻，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

在确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方针后，日本的军事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的文件中，对新的军事战略的各要点作了阐述。

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战争。文件指出：“虽要利用攻占武汉、广东的余势，致力干事变解决，但是，要迅速取得成果，预料尚有困难。为应付长期作战，……以攻占汉口、广东为行使武力的时期。然后，自主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别要防止急躁。”

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文件声称：“虽然肃清抗日残余势力的工作仍须继续进行；但主要有待于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与谋略工作。”

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文件要求战地日军在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

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文件规定，在华日军要把巩固占领区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对正面战场则要求把“兵力配备限制在最少限度内。”

依据新的军事战略，日军在结束武汉会战后，即着手调整部署，实行向保守占领地的持久战态势的转变。

1938年10月，日军在华有24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兵集团（2个骑兵旅）和1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有13个师、1个支队；华南第21集团军有3个师；华北方面军有8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0页。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页。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页。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554页。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554页。

日军的主力在正面战场。其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师陆续遣返归国休整，同时按照保守占领地的要求，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编制的师和独立混成旅，替代回国部队。

至 1939 年底，侵华日军新部署基本完成后，在中国派遣军（1939 年 9 月组建）隶属之下的侵华日军共有 24 个师、20 个独立混成旅、1 个骑兵集团。这些部队分为 4 个战略集团，其各自的兵力及任务如下：第 11 集团军配置在武汉地区，下辖 7 个师、2 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对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以攻势防御为特点的作战；第 21 集团军辖 4 个师、2 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第 13 集团军辖 4 个师、4 个独立混成旅，主要任务是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华北方面军作为最大的战略集团其兵力为 9 个师、12 个独立混成旅和 1 个骑兵集团，负责确保已占据的华北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从上述日本军事战略的变化及相应的部署调整中可以看出，日本的侵华军事行动在整体上已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保守，就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而言。日军军事打击的重点已经转向后者，日军在其后方的作战活动更加频繁。自 1939 年 1 月至 1940 年 3 月，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的意图，连续实施了 3 次治安肃正计划，其中心是用武力“讨伐肃正”，以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尔后建立各级伪政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巩固占领地区。

建立长期自给体制

1938 年底，日本修改侵华方针的原因之一是要减少军力、国力的损耗，因此，建立长期自给体制，就成为其新的侵华方针中的重要内容。日本原企图迅速战胜中国，在中日“经济提携”的名义下，取得种种经济上的权益。但是，战争持久化及消耗的剧增，使日本等不及“经济提携”的实现，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在已经占领的地区进行“自主的建设。”

1939 年 3 月 30 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在《从战争指导观点出发处理目前各案件的准则》中，也把在“治安地区，特别是在其中的主要地区进行必要的建设”作为持久战争的一个主要手段，并强调：“目前在重要治安地区确立治安和建设尤为重要。为此，要在逐渐形成重点的同时，为长期计划制订各种措施。”

鉴于战争长期化已不可避免，日本开始要求侵华日军努力提高独立生存能力，实现长期自给，企图以“节流”方法减轻日本国力的负担。

1938 年 12 月 6 日，陆军省及参谋部提出：在为恢复治安而固定配备充分兵力的同时，要“努力使其实现长期自给的局面”。1939 年 3 月 30 日，再次要求“要使现地兵团为了部队的生存而采取长期持久自给的态势，……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朝云新闻社，1975 年版，第 7～8 页；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朝云新闻社 1976 年版，第 295～297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朝云新闻社，1976 年版，第 283 页。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 年版，第 557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朝云新闻社 1976 年版，第 289～290 页。

努力充实整備战力，同时尽量节减人力、物力的消耗。”要求侵华日军在现地实现“自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战争经济的贫困程度。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89～290页。

第三节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制定抗战新阶段的战略任务

就在日本着手修改其侵华方针的同时，中共中央及时预见到战争形势即将发生的变化，于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17 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 30 余人，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毛泽东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并在此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毛泽东的报告和政治决议总结了以往抗战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今后抗战的发展趋向，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战略任务。

一、对抗战以来的总结和对今后抗战形势的估计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依据已经表现出的敌、我、友三方面优劣条件的发展变化，对 15 个月的抗战进行了深刻总结，他指出：经过 15 个月抗战，中国有了很大进步，但尚未达到足以反攻胜敌的程度；日本已面临重重困难，但尚有余力；国际上虽已给予中国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但国际形势尚未达到最有利之时。这种状况决定了敌优我劣的基本态势还不会很快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抗战是长期持久的战争。在长期的战争较量中，日本的强势因素将随着战争进程而逐渐衰减，其小国寡民，兵力、财力、物力的先天弱点，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与整个中华民族及本国人民的绝对对立，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等等，不仅不能克服，而且将日益发展深化，最终决定了日本必然失败的命运。与日本相反，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中国所具有的雄厚的战争潜力，将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质和中国自身的不断进步而更加发扬壮大，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也将日趋有利于中国。在中、日双方所具有的诸条件中，日本的优势条件是暂时的、脆弱的，中国的优势条件则是根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此，只要中国坚持抗战不妥协，坚持在持久战中逐步发挥自己的潜力，最后的胜利就一定属于中国。

六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对目前的战争形势及其可能出现的变化进行科学的估价，以便规定党在今后抗战中的各项战略任务。在这方面，中共中央表现了极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对于日本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及时预见到：虽然整个的敌我力量对比中，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尚未改变，但经过武汉会战，敌人的强势已经进一步发挥了，之后将衰减下去。虽然敌人在总的力量上仍将具有一些余威，但其兵力不足与分散的根本弱点将更加暴露。而且日本的整个国力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可能用于中国方面的已所剩无几。因此，日本战略进攻已接近一个顶点，敌我相持的局面即将到来。

关于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将会采取的新的侵华方针，毛泽东准确地指出：日本在被迫停止战略进攻后，将转入军事上保守占领区，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向我进攻。在政治攻势中，“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在军事上敌“将于一定时机抽兵进攻游击战争，企图巩固其占领地，使中国反攻

困难。”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虽然总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中国，但就目前来讲，“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甚至还“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这种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关于今后国内的抗战形势，全会在充分认识各种积极因素的同时，强调了将会出现的各种困难，并特别告诫全党必须认识目前及今后的严重问题，即：“可能在一部分人中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抗战营垒中可能产生意见分歧甚至某些分子的动摇与局部叛变。”

二、制定抗战新阶段的各项战略任务

1938年11月6日，六中全会一致通过政治决议。决议提出：“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人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

决议还规定了中华民族当前的紧急具体的任务：

（一）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

（二）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三）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扩大原有的军队，创造更多的新军，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技术装备和训练，保卫西南西北，停止敌之进攻。

（四）广大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

（五）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

（六）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改善政治机构，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效能。

（七）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工、农、商、学、文化界、妇女、青年、儿童各种组织），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

（八）为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和生产热忱，实行相当必要的民生改善。

（九）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增加收入，节省支出，克服抗战中的财政经济困难。

（十）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

（十一）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使日寇断绝外国军火和军事原料的供给，使我国能够得到友邦的军火、军事原料、医药材料、技术人员及财政的帮助。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606、608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640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49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十二）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国的斗争。

（十二）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

（十四）厉行锄奸（汉奸、敌探、托洛茨基分子等）运动，巩固抗战的前线和后方。

（十五）发展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

全会特别强调了新阶段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将这一点提高到事关抗战能否坚持、能否胜利的决定性地位。毛泽东就此指出：“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战争的长期性与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是不能分离的。”“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民族，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各个阶层中一切生动力量，过是唯一无二的方针。”

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而日本又在竭力分化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因此，全会的政治决议特别提出：“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为了顺利进行抗日持久战，就必需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同时又建议国民党适当解决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密切两党关系，保证长期合作。

三、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军事战略方针

由于预见到在即将到来的新阶段中，日军将集中主要力量保守占领区，向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动残酷的进攻，因此，六中全会要求全党继续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和战区，并把巩固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作为党的军事战略的首要问题。全会提醒全党全国：在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敌后游击战争所要面临的新形势是，一方面在广大地区中仍能广泛地发展；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战略地区，特别是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势将遇到敌人残酷的进攻，出现非常艰苦的局面。因此，全会要求，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全会分析了敌后游击战争在各地的不同情况，明确提出今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毛泽东具体指出：“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另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

毛泽东还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各项具体措施：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752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644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3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3～754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3～594页。

“第一，必须广大地发展一切敌人后方地带的游击战争，并创立多数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第二，必须依照华北榜样，留置或派遣足够数量之正规军队于敌后各个战略区域，作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骨干。这些军队应该逐渐学会游击战术，加强政治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创立根据地，并帮助敌后民众游击队与游击战争逐渐提高到正规军与正规战争的道路上。第三，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必须发动所有男女人民卫国保乡热忱。除动员他们大批加入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与补充留置敌后的正规军外，把他们组织到半军事性质的抗日人民自卫队中去。抗日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应成为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的普遍与经常的民兵制度，他们是不脱离生产的。第四，必须协助人民组织广泛的游击队，这是脱离生产的，各县各区都应该有，成为袭击敌人保卫地方的普遍的小队伍。第五，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其军事政治文化娱乐的教育，用以提高其战斗力。第六，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正确的军事政治制度，实现官兵的平等待遇，经济公开。第七，改造土匪部队，使他们走上抗日，肃清我军后方的及被敌利用的土匪。第八，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第九，依照敌情与我之战略需要，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新的战争情况。第十，必须依照战略需要，统一敌后各部队与行政区之领导，以便集中抗敌力量，消除内部矛盾；但应反对互相吞并的军阀行为。”

为适应发展华中和华南的需要，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为贯彻“巩固华北”的方针，全会决定充实北方局，并在会后命令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于1938年12月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和山东地区，巩固和发展这些地区的游击战争，准备抗击日军即将展开的反扑。

在中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关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及时制定了适应战争发展变化的各项战略任务，为全党全国人民在新阶段中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作了预先部署。这次全会的各项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认识战争、把握战争的卓越能力，以及对战略新阶段的正确指导。

第四节 国民政府调整军事政治策略

武汉会战后，日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国民政府采取了军事打击为辅和内部分化的政治进攻为主的新策略，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连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调整对内对外的军事、政治策略，调整后的策略既有整顿内部、抵制日本分化中国阴谋，培植力量以继续持久抗战的积极方面，又有限共、溶共，打击国内进步力量等不利于团结抗战的消极方面。这种情况充分表现出中国抗战的极端复杂性。

一、南岳军事会议及第二期抗战方针的确定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第3和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会议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下着重从军事角度检讨了过去抗战的得失，判断了当前战争的形势，确定了今后二期抗战的军事方针，并据此调整了部署。

会议上，蒋介石阐述了对抗战全过程的基本设想：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军、岳阳沦陷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在第一期抗战中，由于中国是在各方面均劣于敌人的情况下抗战的，因此，第一期抗战的战略是，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机动地使用主力部队，层层打击、逐步消耗敌人，诱敌深入于有利我军决战的地域，完成最后战胜敌人的部署。武汉撤军、岳阳沦陷以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这是因为，经过第一期的抗战，“敌人兵力的使用……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今后他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而且他已经派到中国境内的这许多部队，随战区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疲敝不堪，……因此，无论他在形式上是如何获得胜利，他这种胜利，亦已到了最高限度，不能再有增加。……所以敌人侵略战争，今后只有一天一天的随兵力之消耗减损而趋于失败，在另一方面，我们过去虽然遭受了挫失，但我们的挫失，客观上也只是到此限度为止；从今以后，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布置的完成，以及军实的增强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策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是：“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但第四战区应尽先集中有力部队，转移攻势。”

这个方针的特点在于，注意了游击战争的作用，决定派遣部分力量争夺敌后控制权；对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虽然要求发动有限攻势，但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

南岳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划分战区，调整部署。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171~1173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区为河南及安徽一部，兵力为1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区为山西及陕西一部，兵力为32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14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区为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兵力为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区为两广，兵力为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区为皖西、鄂北、豫南，兵力为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区为甘、宁、青及绥远，兵力为6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旅；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辖区为赣西北、鄂南及湖南，兵力为52个步兵师；第10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区为陕西，兵力为9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

此外，在敌后新设立两个战区：鲁苏战区，司令长官于学忠，辖区为苏北及山东，兵力为7个步兵师；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辖区为冀察方面，兵力为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

还有23个步兵师归军事委员会直辖；9个步兵师和1个步兵旅担任大后方川、康、滇地区的警备。

总计在第二期抗战之初，中国军队总数为242个师，40个旅，特种部队在外。

国民政府的二期抗战的方针中，全面整训部队是一个重要内容。自“七·七”事变以来，全国抗战已持续了一年多。中国军队损失了大量人员和装备，海空军战力锐减，陆军因伤亡过重，兵员大多不及编制的一半，因此，南岳军事会议突出强调了整训部队的必要性，蒋介石在会上指出：南岳军事会议“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并宣布，将“全国部队分三期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办法是“将全国现有部队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

整训军队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订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在教育训练方面，要求通过短期训练，提高官兵技术、战术技能。要求注重发挥官兵的进取心，培养官兵的攻击精神和强韧的战斗意志。为了学习游击战，军训部在湖南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训练班任教。在改订编制方面，精减非战斗的机构和人员，充实作战部队。按照这一原则，军事委员会决定原有的军委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和基本战略单位师的7级指挥机构中，废除兵团、军团两级，并以军力基本战略单位，还决定废除旅级编制，以便战略指挥和战术指挥都能更加灵敏快捷。此外，对兵员补充、后勤保障等方面也提出了相应的改进要求。

上述二期抗战的指导方针及相应的各种军事计划无疑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一方针并未贯彻始终，特别是在反共倾向逐步加剧的情况下，二期抗战方针的内容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派往敌后本应对日游击作战的部队逐渐成为与中共抗日武装磨擦的主力；连续发动有限攻势的规定在1939年以后也基本被消极应付所取代，整训部队日后也成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代名词。造成二期抗战方针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根

本原因不在军事，而在于政治上反共倾向的抬头。

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继南岳军事会议之后 4939 年 1 月 21 日至 31 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初召开的一次对抗战颇具影响的会议。有 155 名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和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出席。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亲任主席，主持了会议。五届五中全会的内容涉及第二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问题。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表现出积极与消极方面交相并存的双重性。

在抗日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武汉会战后，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着重从政治上进行诱降。中国国内、尤其是国民党内妥协求和的空气再度上升，对此，五中全会在其宣言中重申：“吾人所求为合乎正义之和平，非屈服之和平，屈服只以助长侵略。中国若怵于日本暴力，以屈服谋一时之苟安，则将降为日本之殖民地。”表达了坚持抗战的意向。蒋介石也在题为《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开幕词中，批评了对日和平的倾向，表示要坚持抗战。蒋介石表示：“我们的精神绝对不要被敌人所胁迫，我们更绝对不能受敌人的欺骗。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唯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但是，五届五中全会在抗战问题上也存在不彻底的方面。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目前如果妄想妥协，希求侥幸的和平，就无异自投罗网，自取灭亡。须知敌国前首相近卫上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所谓调整国交的谈话，实在是诱降的文告，而不是讲和的条件。如果依此而讲和平，老实说就是降服。”蒋介石虽然反对现时对日妥协，但并未断然排除与日本谈判媾和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时机和条件。

党务问题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着重考虑的又一主要问题。“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治生活的焦点已集中在对外抗战方面。但是国民党由于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后被迫走向抗战，形势变化急剧，各方面都难以适应抗战的要求。因此，抗战以来，国民党非但没有因抗战而面目一新，其政治影响和地位反而呈现了下降趋势。对此，国民党中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感，他们担心出现抗战胜利，党国消亡的结局。蒋介石针对国民党本身面临的这种严峻形势指出：近来抗战形势日趋有利，国家危险已经过去，本党的使命将日益艰巨。但是，“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我们现在要振兴本党，领导革命，第一根本要务，就是要树立党基，巩固党基！”并把“重整党务，恢复党誉，以巩固本党的基础”作为“本届大会最大的任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版，第 543 页。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1 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年版，第 1210 页。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1 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年版，第 1210 页。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1 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年版，第 1207 页。

务。”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重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这本无可非议，尤其是其加强党务整理发展国民党力量的目的也包含有适应抗战需要的考虑，这当然是抗战事业所必要的。对此，中共中央早已明确表示欢迎，并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在对外抗战，对内民主的前提下愿意看到国民党力量的发展。但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党务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和立场又包含有不利于对外抗战，不利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团结合作的消极因素。其集中表现为，这次全会把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及其在全国政治影响和地位的提高，视为国民党自身颓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唯恐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坐大”会危及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出于这种考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确定了“限共、防共、溶共”的基本方针。

这个方针在会议及以后的文件中得到了贯彻。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党务问题决议案中提出：“今后本党应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之发展。过去本党组织仅偏重城市而忽略乡村，致广大之农民群众易为异说所乘”；“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矛头所指，显然针对中国共产党。会后，国民党中央连续制定了一系列秘密文件，如：《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4月）、《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异党问题处理办法》（1939年12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12月）、《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草案》等等。这些文件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口号下，利用国民党执政党的地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防范、限制、排斥乃至打击。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制定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方针时还是有所顾忌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无法抹杀；全国同胞要求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呼声非常强烈。在这种状况下，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则采取了既合作又限制的双重政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限共、防共、溶共”为基调，避免采取公开摊牌的作法，就是其矛盾心态的反映。国民党中央在制定上述秘密文件时，也一再要求其各级组织：“本党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在此团结御侮时期，关系极为重要，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倘不慎而泄露入异党分子手中，则不仅易滋误会，甚且发生磨擦。为防患未然计，嗣后各地方党政机关关于应付异党之对象与办法，必须层层负责，尽量避免书面传递之办法。各机关拟具对策时，亦应根据地刀事实、环境；立言不可动辄用中央口气或翻印中央所颁布之原则。”既要限共、防共，又不愿承担破坏两党关系的责任，这种政策虽然有别于内战时期的反共政策，避免了公开破裂两党关系的极端作法，但与前一阶段国共两党间比较融洽的合作关系相比，无疑是一个倒退，其对两党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抗战事业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215、1218页。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53页。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648页。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644页。

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表现出的双重倾向，中共中央有恰当的分析认识，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全党的指示信中认为：五中全会的主要方针，仍为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对此，应该加以赞助和发扬；但是其抗战目标的局限性和防共、溶共、反对民主政治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对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应该赞助其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的积极方面，对其缺点错误，则应根据我党六中全会决议，进行口头上文字上的批评解释工作，目的是要以我们和全国大多数人民拥护的彻底抗战路线，来克服他们的不彻底抗战路线。”

第二十一章 巩固华北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

第一节 巩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回师华北。为此，1938 年底，日军大本营从华中、华南抽调第 10、第 27、第 5 师加强华北方面军，并组建第 12 集团军。

1939 年底，华北方面军兵力为 9 个师、12 个独立混成旅、1 个骑兵集团。

1940 年，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基本上没有变化，兵员总额约为 30 万人。华北伪军在 1940 年达到 10 余万人。

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确保占领区的“安定”，先后制定 1939 年度（1939 年 1 月至 1940 年 3 月）、1940 年度（1940 年 4 月至年底）“治安肃正计划”。日军企图首先集中兵力摧毁抗日根据地，尔后分数兵力占领要地建立据点，再依托据点，对八路军反复进行“讨伐”，并最后消灭八路军，从而达到由“点线”扩大为“面”的占领。1939 年的作战步骤是：先集中兵力“扫荡”冀中、冀南、冀鲁边等平原地区，再对晋西、晋北、五台、太行、鲁中等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敌情变化和中共中央赋予的“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指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作好迎接严峻形势的准备。要求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健全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以调动农民积极性；注意征集资财，发展生产，爱惜民力，以支持长期战争；加强宣传教育，以坚定军民抗战胜利信心。针对日军先对平原根据地“扫荡”的计划，1938 年 10 月至 12 月，八路军总部先后命令第 120 师主力挺进冀中、第 129 师主力挺进冀南、第 115 师主力挺进冀鲁豫边平原和山东地区，巩固抗日根据地。

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1938 年 12 月 23 日，贺龙、关向应奉命率领第 120 师直属队、教导团、第 716 团、独立第 1 支队由岚县出发，开赴冀中后，留下第 358 旅（辖第 714 团、独立第 1 团、独立第 2 团、鲁备第 6 团、独立第 6 支队），及山西新军决死第 4 纵队、工卫旅，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几个游击支队（后编为暂编第 1 师）等部，坚持晋西北抗日游击战争。此时，晋西北地区还有晋绥军骑兵第 1 军、暂编第 33 军、游击第 3 师和第 11 专署保安队等部。

1939 年 3 月 1 日，日军第 109 师、独立混成第 3 旅备一部共 4000 余人，分 5 路进攻静乐、岚县、方山。静乐守军赵承绶部不战而退。日军当天占领静乐，从此静乐县城成了日军一个重要据点。第 358 旅调第 714 团、警备第 6 团保卫根据地。3 月 9 日，静乐日军 1000 余人进占岚县，第 714 团在岚县县城周围不断袭击和伏击敌人，次日，日军弃城撤回静乐，接着，第 714 团在警备第 6 团和工卫旅的配合下，收复方山，粉碎了日军的围攻。

为保障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第 358 旅第 714 团

和独立第1团，担负了繁重的护送任务。

1939年一年中，独1团完成10多次护送任务。8、9月，第714团往返穿插同蒲路6次，完成了护送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东进华北敌后的任务。担任护送任务的部队在一次又一次穿越敌封锁线中，与阻击、追击之敌进行了艰苦的战斗。

1940年初，阎锡山发动的进攻山西新军的“晋西事变”被粉碎一一后，晋西北成为完全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对敌斗争，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大力展开政权建设和军事建设。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晋西北、晋西南两个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以林枫（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赵林为正、副书记。2月1日，成立了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续范亭为主任，接着整顿专员公署、县政府和区、村政权。

随后，又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关向应任副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的党政军民工作。成立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续范亭任司令员，罗贵波任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2月10日指示：在一年之内“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战略枢纽”。2月26日，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在临县窑头召开第120师和新军旅以上干部联席会议，根据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统一部署军事工作。3月10至19日，召开了晋西北各军参谋长会议，总结1939年整军工作，制定1940年整军计划。会后，第120师和新军开始整军。

从4月起，第120师对部队进行整编和补充。主力部队共补充1.2万余人，充实了编制，第714、第715、第716团、第4团均达到3000人；师特务团、第2团均达到2000人。彭358旅改编为独2旅，辖第714团、第5团、第6团（后改称第9团）。新军的整军，从3月开始，为期4个月，补充了3000余名新兵。整军后，暂编第1师辖第36、第37团，决死第2纵队辖第4、第5、第6团，决死第4纵队辖第19、第20、第35团，工卫旅辖第21、第22团，共12092人。经过这次整军，新军实际上成为由中共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

1940年2月23日，日军开始对晋西北进行春季“扫荡”。当天五寨日军500余人向南进攻，暂1师、工卫旅与敌激战一昼夜，将敌击溃。随后，宁武、静乐、太原、大武、柳林之敌连续出扰。日军共出动1.2万余人，占领岚县、临县、方山3个县城和11个市镇。到4月1日，第120师和山西新军将日军击退，收复上述各城镇，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伤亡600余人，毙伤日军100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枪百余支。

5月中旬，日军开始准备夏季“扫荡”。日军第1集团军在驻蒙军配合下，将第26师一部由大同、平鲁、朔县等地向偏关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3旅由岢县、代县等地向五寨、神池、宁武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9旅由忻县、太原等地向静乐、河口、文水等地集结；独立混成第16旅在离石、大武、柳林等地集结，其总兵力约2.5万人。日军的作战企图是：先进占岢岚、岚县、交城以西及方山、临县并占领黄河各渡口，切断晋西北各军退往陕甘宁边区的道路，尔后由北、东、南三面向晋西北根据地中心合击，以歼灭晋西北守军主力部队。

第120师根据对敌情的判断，决心在战役初期以广泛的游击战，消耗敌人，相机歼敌一部，在战役末期乘敌疲惫，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于运动中。据此指导方针，作出具体部署：第358旅并指挥独立第2支队，集结于王狮、普明之间地区待机；以独立第3支队集结于岚县以北之河口地区，准备打击向岚县进攻之敌；以独立第1旅进至临县、三交以东地区，相机打击由大武向临县进犯之敌；以决死第2纵队在离石、方山之间活动，以决死第4纵队在汾（阳）离（石）公路沿线，袭敌据点，断敌交通；以独立第2旅与新军暂编第1师集结于奇岚、五寨以西地区，相机打击由五寨向奇岚进犯之敌；师特务团及新军工卫旅，活动于文水、交城西北地区，积极袭击钳制敌人，配合内线之反“扫荡”。此外，第120师还令驻河西宋家川之第359旅第718团，准备以一部兵力东渡，在军（渡）离（石）公路沿线配合作战。

6月7日下午，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800余人由静乐向岚县进攻，8日晨占岚县。独立第3支队从10日至13日不断袭击岚县之敌，伏击静岚公路敌之运输队。为打击进占岚县之敌，第120师令第358旅由白文镇开赴岚县、静乐以南地区，15日，第358旅到达东村附近。

12日起，交城、草张头、古交、静乐之敌出动，合击文水、交城西北对久、双龙镇地区，该地师特务团和工卫旅，跳出敌台击圈，使敌扑空。15日敌占对久、双龙镇。

此时，第120师判断北面之敌将由五寨进攻奇岚，南面汾、离之敌北犯为主要进攻方向，静、岚之敌对南北两面将取策应动作。遂部署第358旅集结于东村以南待机，独立第3支队钳制岚县之敌；独2旅与暂1师靠拢一同打击五寨向奇岚前进之敌，钳制该敌并向西北方向吸引。

在东村附近活动的第358旅16日得悉，由静乐进攻对久、双龙地区日军村上营700余人北返米峪镇，似将继续向静乐行动。米峪镇附近地形较好，敌增援亦较为困难。第358旅决心抓住有利战机，歼灭该敌于运动中。16日下午，该旅和独立第2支队进至米峪镇以北大夫庄附近设伏，但米峪镇之敌未动。第358旅主力立即向米峪镇开进，准备在预期遭遇战中歼灭该敌。

17日7时，第358旅前梯队第4团进到曹家庄以东与米峪镇出动之敌遭遇。该团迅速抢占两侧高地，先敌展开攻击。9时许，第716团加入战斗，经激战将敌四面包围。至17时，第358旅向敌发起总攻，将敌大部歼灭，残敌窜入土窑内顽抗。18日，旅主力向赤坚岭转移，留第4团战至19日将残敌全歼。此役全歼日军700余名。米峪镇战斗是第120师主力回师晋西北后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胜利。

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一部16日由五寨、新屯堡出动，17日占奇岚。6月20日，日军“扫荡”全面展开。

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由汾离公路一线向北，独立混成第9旅由岚县等地向西、向南合击临县、方山地区。柳林之敌1500余人18日北上，连占孟门、碛口、安家庄、清凉寺、兔板寨，24日到克虎寨。大武之敌2000余人分两路北上，一路经峪口21日占方山，路经三交22日占临县及临县北之窑头。23日窑头之敌派出1000余人，25日占罗峪口。

独立混成第9旅占岚县后兵分两路，一路向西南，经普明直扑方山；一路先向西后向南，经大、小坪头、任家坡、花子村，22日占窑头，与独立混成第16旅北上部队会合。

日军村上营被歼后，静乐、古交、交城三路日军共1500余人，20日拂

晓赶到米峪镇附近，企图报复。当时，第358旅主力已向西北方向转移。日军又企图与由方山北上、由普明南下的部队一起合击第358旅于赤坚岭。第358旅由赤坚岭，经寨上、康宁镇，冲破日军围追堵截，24日进到兴县西蔡家崖附近与师直会台。

日军合击临县、方山的同时，在北面，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由奇岚向西北，驻蒙军谏山、石九支队由偏关、三岔向西南合击保德、河曲地区。奇岚之敌6月20日出动，24日进占保德。到6月25日前后，日军推进到黄河岸边。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20余日的“扫荡”虽占据数座空城和一些村镇，但歼灭晋西北守军主力的企图未能得逞。敌不甘心失败而归，遂在撤退前以独立混成第9旅力主，南北敌人各一部分4路合击兴县地区。28日，临县窑头之敌约1500人兵分两路北上。29日岚县之敌约1200人西进，保德、奇岚之敌30日会合于咸康，然后南下。30日，窑头北上之敌与岚县西进之敌进占兴县，再次扑主。

7月1日，第120师判断反“扫荡”已达末期，兴县之敌有可能向东撤退，决心集结第358旅、独1旅及独立第3、第5支队于兴县以东二十里铺附近地区伏击东退之敌。命令独2旅尾追保德向奇岚撤退之敌，并以一部转至兴县东北地区阻击兴县之敌向奇岚撤退。

7月3日，第358旅由康宁镇西北到达冯家沟地区，独1旅及第5支队到达明通沟以南地区。4日，师部进至羊湾子指挥战斗。

4日8时，兴县日军2000余人沿大川向东撤退，11时进入二十里铺伏击区。独立第1旅第2团和第715团占领明通沟至奥家坪以南伏击阵地之部队，立即向东窜敌之本队发起攻击，敌遭突然袭击，伤亡惨重，被迫展开，进行顽抗。17时，第358旅赶到加入战斗，反复向敌猛攻。但因北面空虚未能形成包围，且各部加入战斗先后不一，未能形成同时的突然攻击，致使敌固守村庄顽抗，难以迅速解决战斗。4日晚，由保德南撤之敌1000余人到达兴县，5日晨继续东窜，企图与兴县东撤之敌协力向东突围。此时，第120师预料已难全歼敌人，遂以一部尾击侧击撤退之敌，主力撤出战斗。敌仓惶突出包围，于7月6日撤回岚县。

二十里铺战斗，歼敌700多人，再次给敌以沉重打击。第120师伤亡430余人。

夏季反“扫荡”，历时月余，共作战250余次，歼日伪军4500多人，缴枪300余支，收复了兴县、临县、方山、保德、河曲等县城。

（二）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初步巩固

1938年11月，大青山支队在粉碎日军对大青山东部和绥西萨拉齐以北山区“扫荡”后，在大青山地区立住了脚，建立了绥中、绥西、绥南三十游击区。12月下旬，第715团主力奉命由大青山开赴冀中，留下相当于1个营的兵力加上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第4支队共七八百人，坚持斗争。此时，大青山支队重新调整了部署，决定第1营所留部队在绥南活动；第2营所留部队、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机关及第4支队，随大青山支队司令部在绥中活动；第3营所留部队仍在绥西活动。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活动在伊克昭盟的绥蒙工作委员会和大青山工作委员会（又称特委）合并，成立中共绥远省委，白如冰任书记。1939

年3月，绥蒙工委由伊盟到达大青山，与大青山支队会台。

1940年4月中共绥远区党委与雁北地委合并组成晋绥边区党委，书记白如冰。

为便于对敌作战，从1938年冬起，大青山支队着手改建骑兵，以从战斗中缴获的马匹和群众支援的马匹逐步改建，到1939年夏，除绥西部队一部分未改建骑兵外，其余部队全部改为骑兵。并经批准，大青山支队改编为骑兵支队，下辖3个营，发展到1000余人。

大青山土匪活动猖獗。为稳定社会秩序消除扰民祸害，1938年12月，大青山支队开始剿匪。经过两三个月作战，共消灭大小土匪40余股，约1500人，匪患得到初步平息。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团结蒙古民族共同抗日的指示，大青山支队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宣传蒙汉平等，共同抗日，支持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切实保护蒙民的利益。边委会还规定不在蒙民聚居的土默特旗、四子王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等旗县设立行政机构，不推翻王公制度，对一般投日的蒙古族上层人士不轻易戴“蒙奸”的帽子。对伪蒙军采取争取其抗日、反总的政策，促进了蒙古族地区团结抗战局面的发展。

1939年，大青山八路军数量增加，活动范围扩大。绥南部队活动在蛮汗山、马头山和长城内外，并派骑兵挺进丰镇东部地区。绥中部队活动范围扩大到陶林以东土牧尔台和陶林至集宁之间灰腾梁地区。绥西部队发展到土默川、固阳一带。

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深为不安。1939年5月，日伪军5000余人，分6路“扫荡”大青山。八路军绥中部队转移外线，威胁陶林，袭扰平地泉（集宁）、红格尔图等日的军重要据点；绥南部队撤离蛮汗山，进入敌后丰镇、兴和间活动，打击与钳制敌人。使其“扫荡”半月即草草结束。6月至8月，日军又多次“扫荡”大青山，并采取增设据点、分段搜剿、清查户口、封锁物资及派遣特务进行破坏等手段对付八路军，斗争形势更为困难。1940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在大青山实行“三光”政策。在“扫荡”中，日军焚毁万家沟至水磨沟、察素齐至陶思浩铁路沿线，以及大滩、银贡山、淖尔梁一带所有的村庄，砍光了铁路沿线所有的树木，并采取修建公路、强行并村等手段，压缩八路军活动范围，但仍未能阻止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1940年8月，晋绥边区党委在大青山西梁村，召开绥远各界——抗日团结会议，成立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远办事处，作为领导绥察敌占区抗日斗争的最高行政机关，从此动委会正式转变为抗日政权。由姚喆任主任，杨植霖任副主任。办事处设绥西、绥中、绥南3个专员公署和绥东游击区，领导萨拉齐、固阳、武川、陶林、归武、托和清、归凉和丰镇等9个县政府。

10月，骑兵支队第1、第2、第3营扩充为第1、第2、第3团，分别活动于绥南、绥中、绥西。

到1940年冬，骑兵支队、战动总会第4支队兵力共达到2000余人，绥察独立第2支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和党政工作人员有1000余人，共达3000余人。两年来，大青山支队主力和游击队同日伪军作战120余次，毙伤日伪军859名，俘伪军近千名，缴枪596支，战马802匹，骆驼70峰。骑兵支队牺牲196名。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到 1938 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扩大到 73 个县,其中有 31 个完整的县,部队发展到 7.5 万余人,并组织了成百万的人民自卫队。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 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派第 120 师主力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八路军第 3 纵队和扩大自己的三大任务;派第 120 师副师长萧克到冀热察地区,组织冀察热辽挺进军,以便改变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失利后冀热察地区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还决定在延安组织抗大分校,开赴敌后办学,直接为根据地培养急需的干部。抗大第二分校 2500 余人,于 1939 年 1 月 28 日到达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陈庄一带。

为加强对边区各项工作的领导,1938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分局。

1939 年 1 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撤销晋察冀分局),以彭真、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 4 人为委员,彭真为书记。北方分局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边区党、军队、政权和群众工作实行全面领导。

1939 年 1 月,北方分局在平山县蛟潭庄召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会议决定今后的任务是:努力巩固根据地。从此,边区进入了以巩固为主,稳步向前发展的新时期。

(一)第 120 师主力挺进冀中,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坚持

从 1938 年 11 月到 1939 年 4 月初,日军对冀中进行了五次围攻。

从 1938 年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9 日,日军第 110、第 27 师各一部共 6000 余人,由平汉、津浦等铁路沿线出动,对冀中进行第一次围攻,企图肃清大清河以北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8 年 12 月 21 日至 1939 年 1 月 24 日,日伪军 1500 余人进行第二次围攻,进攻安国、博野、蠡县,企图把储龙河以西的部队驱逐到河东。日军经过这两次围攻,占领了雄县、霸县、安国、博野、蠡县 5 座县城和一些重要市镇。

2 月初,日军以 7000 余人进行第三次围攻,矛头直指冀中中心区的河间、任丘地区。

正在这时,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第 120 师直属队、教导团、第 716 团、独立第 1 支队等部,从新乐与正定之间通过平汉铁路,于 1939 年 1 月 25 日进抵河间惠伯口地区,与昌正操、程子华领导的冀中军区、八路军第 3 纵队会合。接着,第 120 师第 715 团主力,2 月 8 日到达冀中安平县西南地区。

1938 年 9、10 月,中共领导下的冀中抗日武装号称 10 万,占有 24 座县城。但部队成员新、成分复杂,组织领导不够健全,在日军的连续围攻下,形势迅速恶化,根据地日趋缩小,冀中局势动荡不安。

面对这种形势,第 120 师首长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打几个胜仗,稳定冀中军民的情绪,增强坚持平原的信心。第 120 师决定师独立第 1 支队(欠第 1 营)以沧县、青县、交河、饶阳为活动地区,袭扰津浦线,其第 1 营配合冀中第 1 军分区活动;以师直属队 4 个连新组织独立第 2 支队,配合冀中第 3 军分区活动;以第 716 团 3 个连新组织独立第 3 支队,配合冀中第 5 军分区活动;师部率领第 716 团为机动部队,在河间、任丘方面伏击敌人,并相

机袭击和占领河间、任丘。冀中军区以北上挺进支队为机动部队。

1月底，日军已进占大城、任丘、高阳、河间、献县，并企图进犯肃宁。2月2日晨，河间日军200余人和伪军一部，沿公路向肃宁方向开进。行至曹家庄以北地区，第716团及师独立第1支队与该敌展开激战，并阻击河间、任丘援敌400余人，入夜敌向河间撤退。第716团等部直追至河间城才撤出战斗。此战歼敌150余人，挺进冀中初战告捷。

2月4日，河间日军1000余人向大曹村袭击。第716团依托村庄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再歼敌300余人。

日军遭数次打击，暂停进攻肃宁，第三次围攻遂告结束。

2月6日，日军2400余人开始第四次围攻，重点指向滹沱河以南的武强、饶阳、深县。为再次打击敌人，7日，第120师师部率第716团继续南下，进至武强西北的任家庄、东西唐旺地区。日军迅速占领了饶阳、武强、武邑、深县、束鹿城。9日，北面安平之敌600余人进至王村，饶阳之敌步、骑兵300余，坦克、装甲车数辆，进至邹村，10日拂晓，敌向邢家庄实施合击。奉命赶到该地参战的第715团，以近战火力给敌突然打击，激战至16时，在毙伤日军13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

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冀中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随后，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成立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委，吕正操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20师和第3纵队。

3月，日军向冀中增兵约7000人，连同原来侵入冀中的日军一部共约9000人，集结于大城、河间、献县、饶阳、藁城等地，3月18日开始第五次围攻，企图在文安、大城、任丘间歼灭八路军主力。3月20日，日军合击肃宁东南的东湾里、窝北，21日至23日合击任丘以南的南马村、泗水地区，25日合击任丘、文安间的吕公堡、梁召地区，但屡屡扑空，仅占领肃宁、任丘、文安三县城。4月1日，第五次围攻结束。至此，冀中所有县城都被日军占领。在此次反围攻中，冀中部队成功地避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合击，使敌主要企图未能实现。

第五次围攻结束后，日军进行分散“扫荡”，扩张据点，修筑公路，破坏抗日政权，建立和扩大伪组织，使八路军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冀中区总指挥部从冀中敌我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利用战斗间隙主要整理、训练、扩大部队，开展地方工作；避免决战，积极打击由据点出扰之敌和敌之运输队，俟青纱帐起再行反攻。

在第五次反围攻期间，3月20日，第120师在河间县太平庄、南马村整编，将第715团和冀中独立第4支队合编为师独立第1旅，旅长高士一，政委朱辉照，副旅长王尚荣，辖第1、第2、第3团和第715团，全旅共计4392人；将第359旅在冀中扩编的特务团拨归冀中军区建制，以加强冀中军区机关警卫力量；另成立师独立第4支队，到冀中第2军分区活动。4月8日，在高阳西南河西村将第716团和冀中独立第5支队合编为师独立第2旅。旅长魏大光，政委王同安，副旅长廖汉生，辖第4、第5团和第716团，全旅共计4000人。

4月20日，第120师师部和独2旅由河西村到达河间东北齐会地区，与独1旅靠拢，准备整训。得悉河间日军800余人、伪保安队数十人，随行大车80余辆，满载给养弹药，22日北犯，到达齐会西面的三十里铺。第120师判断这股日军可能在北面敌军配合下实施合击。第120师在该地区有7个

团近万人，兵力占绝对优势，决心抓住战机，消灭敌人之一路。

23日拂晓，三十里铺之敌东犯齐会村，包围齐会村的第716团第3营，第120师乃以一部钳制北面之敌，令第716团第3营固守齐会，以主力对围攻齐会之敌实施反包围。日军在内外夹击下，死伤惨重。为免遭歼灭，24日南逃找子营，又再次陷入包围。连日苦战突围，已溃不成军，适逢25日黄昏前北风大起，飞尘蔽天，日军乘机南逃。第120师追击10余公里，残敌100余人、大车10余辆于26日逃回河间。这次战斗，第120师在敌人据点稠密的狭小平原地区集中7个团兵力，连续激战3昼夜，歼敌700余人，取得了平原歼灭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此役给横行于冀中的日军以沉重打击，也充分显示了第120师部队的坚强战斗力。

5月，张宗逊、张平化奉命来到冀中，师部为便于指挥作战，命令组织张纵队，张宗逊、张平化任司令员、政治委员，辖独1、独2旅。

1939年秋，国民党顽军向陕甘宁边区属地鄯县（今富县）进逼。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第120师抽调第359旅到陕甘宁边区绥、米、葭、吴之线，第120师师部及在冀中所属部队移至第359旅原驻地区，并准备师部再移至晋西北，以利指挥。据此，第120师命令第359旅开赴陕甘宁边区，并部署第2、第3、第4、第5、第6等5个支队，由第3支队支队长贺炳炎、政治委员余秋里统一指挥，留冀中坚持斗争，尔后率其余部队分两个梯队西移，至9月25日先后抵达行唐西北的南北城寨地区。

第120师自1939年1月挺进冀中，到7月，共作战160余次，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对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第120师进入冀中的部队共6400余人，离开冀中时部队发展到21900余人。

1939年3月，冀中军区按照八路军总部整军训令和晋察冀军区的部署开始整军，第一期抽调6个大队和第4军分区独立2团，到平汉路西北岳区，整编成第16、第17、第18、第32等4个团，8月上旬返回冀中。同时，冀中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训。8月，方强率领八路军总政治部战地工作考察团来到冀中，直接帮助冀中第二期整军。这次冀中军区集中各军分区新编成的第21、第22、第23、第24等4个团，在军区驻地武强县北代村周围于9至11月进行3个月整训，各军分区的其他部队和军区直属的警备旅、回民支队自行整训。经过1939年整军，冀中军区建成14个主力团，即第16、第17、第18、第21、第22、第23、第24、第27、第29、第30、第32、第34团和警备旅第1、第2团。此外，军区还有回民支队、任（丘）河（间）大（城）支队和5个游击总队。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

七八月，冀中区遭受了空前大水灾，水灾期间，战斗相对缓和。9月，冀中洪水退落，青纱帐倒，日军准备分区“扫荡”。

从10月8日到22日，日伪军6000余人首先“扫荡”大清河北地区。12月3日至7日，日军1500余人“扫荡”平汉路、沙河、滹沱河之间的三角地区。12月中旬至12月末，日军集中兵力1.2万余人，第三次分区“扫荡”冀中。这一次日军对大清河北、滏阳河东南和子牙河东西，以及滏阳河以西以北和滹沱河两岸三个区域同时进行“扫荡”。半个月时间里，冀中八路军作战13次，伤亡450多人，毙伤敌1200人以上。

冀中军区部队在1939年频繁的反“扫荡”中，作战383次，毙伤日伪军9414名，俘日伪军1718人，付出伤亡3851人的代价。

日军为巩固对冀中平原的统治，从1939年12月前后开始推行“囚笼政

策”，大举修路，以深沟高垒连结碉堡据点，并以县城等重要据点为中心，在外围修数道公路，既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孤立小块，又便于其机械化部队运动。

与“囚笼政策”相互配合的是不断的分区“扫荡”。

1940年2月21日到3月5日，日军1000余人，“扫荡”沙河、滹沱河、唐河之间地区。3月17日至30日，日军6000余人又在滹沱河以北、潞龙河以东、子牙河以西地区实行分区“扫荡”。此时，冀中7个主力团和在冀中的第120师独立第3支队及津南自卫军，已经南下晋冀豫、冀鲁豫地区执行其他任务。

从4月10日至5月底，日伪军3万余人对冀中进行为期50天的第二次春季“扫荡”。这次“扫荡”，时间长，行动诡秘，稳扎稳打，连续合击，增修公路，构筑据点，至5月中旬据点达到400个左右（1939年底177个），并封锁河流，控制渡口，使冀中形势空前严峻。为了协助冀中反“扫荡”，晋察冀军区派来两个团。冀中军区留下相当兵力以营或连为单位灵活作战，一部主力转移到平汉路西山地，集结整训，作战与整训的部队轮流替换，以保持持续力量。冀中军区机关大部转移路西，负责人轮流带部分工作人员在路东负责指挥。50天反“扫荡”中，八路军作战91次，牺牲879名，负伤624名，毙伤日军2942名，伪军419名。

为保护麦收打击日军抢麦和破坏麦收的计划，冀中军区重新部署，以在北岳区休整后的一批部队投入作战，以营为单位，分散配合地方游击队、游击小组积极活动，打击据点伸出之敌，袭击据点，将敌人孤立围困于据点之内，发动群众破坏交通。从6月1日至25日，作战44次，毙伤日军515人，伪军226人，在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保卫麦收的胜利。

6月下旬，青纱帐逐渐繁茂，冀中南下的部队归来，于是发起青纱帐战役，至8月中旬，冀中部队作战146次，毙伤日军2189名，伪军422名，收复15个据点。

（二）北岳区的巩固

1938年9月20日至11月7日，日军集中5万兵力围攻北岳区后，从11月中旬到1939年春，对北岳区边缘区进行频繁的骚扰，不时以部分兵力伸入根据地腹地，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或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并破坏生产。

北岳区针对敌人的行动特点，1939年春至秋末，以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在敌人据点附近和交通线开展游击活动；主力部队集结于机动位置，加紧整军。二者轮流替换。

1939年，北岳区多次集中兵力，对深入根据地比较孤立之敌予以歼灭性打击。3月13日，日军600余人深入灵山，向庞家洼进犯，第3军分区第2团毙伤其130余人。3月25日，孟县日军300余人经上社据点东犯上、下鹤山，第2军分区第4团歼敌270余人。

5月8日至6月25日，日军第1集团军以第36、第109师、独立混成第3、第4旅各一部，分四期对北岳区西部——晋东北五台山周围进行“扫荡”。

5月11日，五台、繁峙各据点日军合击台怀镇扑空后分路撤退，其中由大营进到神堂堡之敌，在撤退中遭第359旅第718团、教导营、骑兵大队的阻击和包围，13日晚日军突围，改取小路向西北逃窜。14日晨日军逃到上下

细腰涧地区，适与向东机动的第 717 团遭遇。该团向敌猛扑，将其压迫于山涧。随后第 718 团等部赶到，向敌展开南北夹攻。经 20 余小时激战将敌大部歼灭，残敌在砂河之敌接应下，回到大营。此役毙伤日军 700 余人，缴获炮 5 门，轻重机枪 19 挺，步枪 400 余支，使日军的“扫荡”遭到沉重的打击。

5 月 18 日，日军开始第二期作战，发现五台山西部山地并无八路军大部队，原定 3 个星期的作战，只进行 4 天便于 21 日草草收场。第三、第四期作战也由于八路军适时向东部转移而扑空。第四期作战中，华北方面军直辖的第 10 师一部配合行动，亦无收获。

日军第 109 师参谋山崎重三郎后来回忆：“1939 年 5 月的五台作战是继 1938 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结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收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作战。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

5 月 7 日，梁各庄日军 500 余人沿涞（源）易（县）公路西进占领大龙华后，留驻 300 余人在大龙华建立据点，企图与涞源日军相呼应打通涞易公路，将第 1 军分区南北分割。该军分区以第 1 团、第 2 团 1 个营、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连、游击第 3 支队、第 5 支队共 3000 余人，于 5 月 20 日凌晨 1 时向大龙华之敌突然攻击。天亮后易县、梁各庄等处日军来援，亦被阻止。战至下午，全歼大龙华之敌，并歼灭援敌 100 余人，缴获日军文件 50 多册。

大龙华战斗后，日军出兵报复，利用雨季对第 1 军分区的易县、满城、徐水地区进行“扫荡”。军分区经过 20 多天战斗，于 7 月 28 日结束雨季反“扫荡”。

9 月 23 日，日军独立混成第 8 旅第 31 营以及灵寿、正定、行唐、无极等县伪警备队共 1500 余人，民夫 200 余人，大车数十辆，突然集中在灵寿县城，企图奔袭晋察冀军区后方机关。晋察冀军区和第 120 师判断日军可能经慈峪沿磁河左岸大路进攻北岳区南部重镇陈庄，遂决心以津南自卫军正面钳制敌人，节节抗击，诱敌深入至磁河左岸大路谭庄、岔头段，以主力伏击进犯之敌。

25 日，日军从灵寿出动，先后占领慈峪、南谭庄。26 日，该敌又将辎重由慈峪运回灵寿，伪装撤退。27 日拂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报第 120 师：日军留数百人守慈峪，主力 1000 余人沿磁河西南鲁柏山南麓小路向陈庄轻装疾进，第 120 师主力立即沿磁河左岸向陈庄机动。日军于 27 日 11 时抢先占领陈庄。第 120 师判断日军孤军深入，必然下敢久留，决心在日军回窜时歼灭之。遂以主力在陈庄以东磁河两岸的司家庄、高阳庄、冯沟一带设伏，并一部兵力进至陈庄南面的长峪待机。

28 日晨，日军人烧陈庄后，沿磁河左岸大路向东撤退。为防止受到伏击，途中又变换方向。突然向南徒涉磁河，隐蔽其撤退路线。在渡磁河后，仍然向东，沿磁河右岸（南岸）、鲁柏山北面山脚小路撤退，正陷入伏击区。当日黄昏，第 120 师部队对敌发起总攻，并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战至 30 日下午，日军 1100 余人全部就歼。由慈峪北援的日军也被打退，撤回灵寿。

1939 年，北岳区的部队按照军区部署，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两期整军。整军后。北岳区编成第 1、第 2、第 3、第 4、第 5、第 19、第 20、第 25、第

26 团，教导团、骑兵团、特务团及游击军。

日军独立混成第 2 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力打通涞易公路，11 月 2 日，以第 4 营从插箭岭出发袭击走马驿，第 1 营从白石口出发袭击银坊。晋察冀军区决定以一部兵力钳制、堵击由插箭岭出动之敌，集中第 1 军分区第 1、第 3 团、第 25 团两个营、游击第 3 支队，第 2 军分区第 2 团，共 6000 余人，伏击向银坊进攻之敌。

11 月 3 日，向银坊进攻的日军 520 余人在雁宿崖被全歼。阿部规秀得知后，4 日亲率涞源、插箭岭的日军 1500 余人向雁宿崖急进，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报复。5 日下午，该敌进至雁宿崖，八路军已向东转移。日军报复心切，6 日晨继续追击，同时，日军第 110 师于当日派两个支队从唐县、完县北上，进行策应。

晋察冀军区决定，在黄土岭附近再歼灭东进之敌，通知第 120 师特务团赶来参战，并令第 20、第 26、第 34 团钳制易县、满城、徐水的敌人。（见附图 9）

6 日晨，日军由雁宿崖东进，黄昏进入黄土岭村。黄土岭位于涞源、易县交界处，往东到上庄子是一条长 2.5 公里的山谷，利于设伏。八路军乘夜秘密部署于上庄子南北高地上。

7 日拂晓，日军继续东进，15 时全部离开黄土岭进入伏击区。此时，八路军突然发起攻击，将敌围困于狭沟里，100 余挺机枪集中火力向敌射击，日军死伤惨重。16 时后，日军独立混成第 2 旅指挥部亦被迫击炮击中，阿部规秀当即毙命。8 日晨，日军主力向司各庄方向突围。第 2、第 3 团、特务团尾追突围的日军，中午，晋察冀军区得知日军援军已到西北面的三岔口，日军第 26 师、第 110 师各一部均已出动增援，乃指示部队撤出战斗。黄土岭战斗，毙伤日军 900 余人，缴获满载军用品和给养的骡、驴 200 余头。特别是击毙敌酋阿部规秀，引起敌军上下的悲鸣。哀叹：“名将之花，殒落在太行山上”。

11 月 16 日至 19 日，日军驻蒙军对涞源县南部地区进行了“扫荡”。

20 日起，日军以阜平为目标，集中约 2 万人分 7 路台击晋察冀军区、第 120 师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晋察冀军区部队及第 120 师主力适时向外转移。26 日，日军进占阜平。八路军不断袭击日军后方点线，迫使日军主力不得不于 12 月 3 日放弃阜平。8 日，日军全部撤回原据点，从 10 月 25 日至 12 月 8 日，北岳区八路军共作战 108 次，伤亡约 2000 人，毙伤日军 3600 余人。

1940 年春、夏，北岳区抓紧战斗间隙，加强根据地党政军等各项建设，深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实施民主选举，并于 1940 年 8 月 13 日正式公布了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简称《双十纲领》）。

晋察冀军区在 1940 年 1 月至 6 月，分两期开展了政治整军运动。通过整军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三）冀热察地区抗日斗争的恢复和发展

1938 年秋，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遭受挫折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强冀热察地区的工作，12 月下旬，第 120 师副师长萧克带领近百人离开晋西北岚县，1939 年 1 月下旬到达平西。2 月 7 日，在平西三坡正式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下辖第 11、第 12 支队及西移平西的冀东抗日联军

等，共约 5000 人。同时成立冀热察军政委员会，萧克任书记。随后，又成立冀热察区党委，马辉之任书记。3 月，冀热察军政委员会和区党委召开全区党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以“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展冀热察游击战”作为战略任务。

1、平西

1939 年 2 月初、4 月底和 6 月下旬，日军 3 次“扫荡”平西，每次出动 2000 余人，持续 1 周左右。挺进军打退日军进攻后，利用青纱帐期积极主动向外打击敌人。

1940 年 3 月 9 日，日军独立混成第 2、第 15 旅共 6000 余人，及伪军 3000 余人，从矾山堡、桃花堡和门头沟等地出动，分 10 路向平西根据地中心区斋堂镇合击。在平西的挺进军第 7、第 9、第 10、第 12 团等部，以少数兵力在民兵配合下，袭击、消耗、疲惫敌人，以主力寻机各个击破敌人。经半个月作战，共毙伤日伪军 600 余人，击落敌机 1 架。

至 1940 年 8 月，平西根据地东南起平汉路，北到平绥路，西达谢家堡、板城，南接北岳区第 1 分区，共有大小村镇 1100 多个，人口总数约 30 万。

2、冀东

1938 年 11 月初，冀东抗日联军西进受挫，剩余部队返回冀东后，冀东地委（10 月由冀热边特委改称）和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在柳沟峪召开干部会议，号召坚定信心，坚持冀东抗战。至年底，在丰润、滦县、迁安地区抗联部队恢复到 1400 余人。

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后，日军加强了对该地的统治，并从 1938 年 11 月至 1939 年 6 月，对抗日游击活动地区 5 次进行大规模“扫荡”。其中，1939 年 5 月开始的第 5 次“扫荡”，持续 1 个月，动用日伪军约 2 万人，首先从长城喜峰口到古北口、从密云沿平榆公路到卢龙，对游击区构成包围，尔后逐步压缩，反复“清剿”。冀东抗日武装在广大群众支援下，以高度分散的游击活动，打破了日军的“清剿”。

1940 年 1 月 1 日，冀东区党分委在遵化县葛老湾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已有的游击区，开辟新区，建立多块小游击根据地；正式建立第 13 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并将留在冀东的部队暂编为 8 个总队，由第 13 支队司令部统一指挥。会后，冀东分委主要领导分头带领部队在西部密云、平谷、蓟县地区，中部丰润、玉田、遵化地区，东南部丰滦迁地区创建和巩固根据地。

1940 年 5 月初至 6 月上旬，日军出动 4000 余人对各个游击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冀东八路军、游击队作战 47 次，毙伤日伪军 1500 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 400 余支。

7 月 4 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命令，撤销冀东办事处，建立边区行政委员会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冀东专署），焦若愚任专员。7 月 25 日，挺进军第 13 支队番号撤销，建立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政治委员李楚离。此时，冀东部队共 2600 余人。冀东游击根据地发展成丰滦迁、丰玉遵和密平蓟三块地区，人口共 100 余万。

3、平北

1938 年 6 月，八路军第 4 纵队挺进冀东时，曾留下第 36 大队、骑兵大队，在白河以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昌滦密联合县政府，后因敌人不断进攻，当第 4 纵队主力西撤时，平北部队也退出该地。

1939年青纱帐期，挺进军第34大队再次进入平北游击，但未能站住脚跟。

1940年1月冀热察区党委成立平北工作委员会，王伍任书记，并以挺进第9团第8连为骨干组成平北游击大队，进至昌平、延庆之间的后七村，向东北发展。4月，苏梅接任平北工委书记，带挺进军警卫连进入平北，平北游击大队改为支队，不久发展到500余人。

4月，挺进军第10团第3营经昌平北部山区，进入密云县北山地区。5月下旬，第10团主力由平西进到密云县与第3营会合，活动于丰宁、滦平、密云地区。到6月为止，创建了昌平、延庆地区，白河西岸地区，延庆北部地区，黑河以西、长城以东地区，四海、永宁以北地区，赤城以北地区，共6小块游击根据地，建立了4个联合县政府。

9月23日到11月，日伪调集毛000余人，对丰滦密地区进行长达78天大“扫荡”。第10团主力转移到潮河以东与敌周旋，并在密云北部冯家峪设伏，歼灭日军100余人。

12月初，日伪调集1500余人“扫荡”平北西部的延庆、怀来以北地区，平北游击支队在东山庙毙伤日伪军100余人，经数日作战即将日伪军逼退。

三、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

（一）第129师主力挺进冀南，冀南平原游击战争的坚持

1938年11月15日，日军3700余人，兵分4路长驱直入“扫荡”冀南。

17日占领南宫。冀南八路军在徐向前指挥下，16天作战28次，毙伤日伪军600余人，迫使日伪军于11月30日撤出冀南中心区。

日军进攻冀南的同时，鲁西地区的日军11月14日从东阿过黄河，进犯鲁西，15日攻占聊城，山东第6专区专员、保安司令范筑先与守城将士700余人牺牲。

为坚持冀南、鲁西北抗日阵地，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师部、第386旅补充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等从大行出发，12月21日到达冀南。随后，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由延安回到冀南师部。

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第129师将冀南游击军区改称冀南军区，并与东进纵队分开，宋任穷任司令员、王宏坤任副司令员，仍下辖5个军分区。东进纵队由陈再道任司令员。

12月12日，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到达鲁西北后，指挥第386旅补充团、第344旅第688团及12月9日组建的师先遣纵队（司令员李聚奎，辖津浦支队、青年纵队第3团等），协助当地党组织掌握的范部第10支队（后扩建为筑先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张维翰），恢复抗日局面。

1939年初，日军从平汉、津浦铁路沿线调集第10、第110、第114师各一部共3万余人，大规模“扫荡”冀南。1月7日，西线日军首先从石家庄、邢台、邯郸等据点出动，陆续侵占赵县、隆平（今隆尧）、平乡、广平等县城。根据当时冀南的形势及平原地形的特点，第129师将主力分为第385旅、第386旅、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和先遣纵队等数个作战集团，与地方武装结合，分区活动，寻机歼敌，并派出小分队广泛开展游击战，钳制与消耗敌人。

2月初，东线日军由泊头、德县、聊城出动，会同西线日军，分路向根据地中心推进，至2月9日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冀南中心区所有县城。

此时，第129师主力即转至敌人侧后，打击其交通运输线和后方据点，以钳制和调动敌人，创造有利战机。第386旅利用敌气焰嚣张，每次遭到袭击必派出部队报复的规律，多次袭击威县，诱敌出犯。2月10日，在威县南面香城固设伏，速战速决，全歼由威县出犯的日军第10师1个连200余人，次日，当敌以2000余人乘汽车70余辆前来反扑时，第386旅又灵活地经丘县、馆陶转移至冠县地区，使敌连续扑空。此后，冀南部队以分散的活动配合地方武装打击敌人，带领群众改造地形，坚持平原的游击战争。至3月，冀南部队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

1939年3月7日，刘、邓率主力一部返回太行后，徐向前带一部兵力由豫北返回冀南南宫、威县、清河地区。在此之前，第386旅以政治委员王新亭、副旅长许世友为首组织工作团，带先遣支队第3大队返回冀南，坚持冀南抗日斗争。

（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晋冀豫、冀南交通破击战

1939年1—2月间，日军开始进行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大“扫荡”的准备，由正太、同蒲铁路沿线出动，先后侵占和顺、辽县、翼城、浮山、安泽等城镇，4月初占领平遥以南的王和以及白晋公路线上的南关。

7月3日，日军以第20、第109师主力及第108、第20、第35、第36、第10师、独立混成第4旅等部共5万余人，由第1集团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挥，先后由和顺、太谷、南关、安泽、大交、博爱、武安等地出动，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企图围歼第129师部队，分割和摧毁抗日根据地。

7月6~9日，朱德、彭德怀先后就作战指导原则指出：基本上采取分区游击战，削弱敌战斗力，阻敌修路筑点，隐蔽主力于机动位置，力求能歼灭日军单独行动的营。据此，第129师进一步调整了部署，划分了各部队的作战区域。

7月6日，日军第109师、独立混成第4旅各一部占领沁县、武乡、辽县等县城，并向榆社地区合击。当日军第109师一部进至榆社以西云簇镇时，第129师第386旅向敌展开攻击，歼其一部，迫敌回窜。敌独立混成第4旅在辽县以西石匣村，遭第385旅伏击，死伤300余人。沿邯长路西犯之日军，在涉县以西之河南店遭到第129师特务团的打击，暂缓西进。敌合击企图破产后，即控制交通线，分割根据地，占领长治、屯留、襄垣等城镇，打通了白晋路北段。8月，敌占领黎城，打通了邯长路。第129师遂对占领交通线之敌进行袭击、围困，迫敌于8月下旬撤出阳城、晋城、沁水等地，收缩至长治周围地区。当敌第20师一部经高平向长治收缩时，八路军第344旅在高平以北三甲镇设伏，毙伤日军160余人。第129师在7~8月的反“扫荡”中，共作战70余次，歼敌2000余人。

12月上旬，第129师按照八路军总部破袭邯长公路的命令，增调第385旅第769团、第344旅第688团主力及第689团主力一部、青年纵队第2团、晋冀豫边游击纵队第1梯队第1大队等部到邯长线，以加强突击力量。12月8日起，当地原有部队开始进行不间断的破坏袭扰。

14日，主力部队到达，开始大规模的袭击。

22日攻克黎城以南的赵店镇，23日袭入黎城，残敌向东溃退。攻击部队乘胜收复东关，并继续向东追击，25日12时收复井店镇。这次作战，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城及据点23个，太南、太北重新连成一片。

1940年4月11日至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着重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并正式宣布成立太行军政委员会，以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3区。从此，根据地的巩固进入一个新阶段。8月1日，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杨秀峰为主任，薄一波、戎子和为副主任，辖3个行政区，15个专区，115个县。

1939年第129师部队进行了两期整军。

1940年春，第129师在政治整军的基础上，于五六月间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第129师辖第385、第386、新1、新4、新7、新8、新9、新10、新11等9个旅及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

1939年冬开始，日军积极实施“囚笼政策”，第129师号召全区军民“面向交通线”，打破敌分割和封锁根据地企图，集中力量展开交通破击战。

1940年4月5日，第129师部署平汉路东鲁西北、冀南和路西太行部队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规定开始行动后，轮番不断实施破击。4月7日至27日，在两万民兵和群众配合下，第129师部队对平汉铁路内丘至邢台段及由平汉铁路沿线伸入冀南腹地的几条公路干线进行破击，共破坏铁路5公里多，公路100余公里。

1940年6月17日，驻枣强、故城、阜城等据点日军700余人，掩护铁道守备队，胁迫数千工人修筑德石铁路。7月23日，冀南军区集中新7、新9旅主力，在群众配合下破击德石路，并以一部兵力破坏枣强、故城地区公路，钳制周围敌人。当夜，第25团将青兰至王七庄段路基大部彻底破坏；24日，第27团将王七庄至小兰段路基破坏。破路部队多次伏击出犯之敌，保证了破路顺利进行。至31日，共破坏铁路路基12.5公里，破坏公路90公里，并歼敌一部，使德石铁路不得不延缓施工。

晋东南方面，1940年春，驻长治日军第36师开始修筑白晋铁路，由北向南，到5月初已修到沁县。第129师决心抓住日军第36师主力南下，守备兵力减弱的时机，集中太行、太岳部队主力，破坏白晋铁路北段，部署以师特务团、第385、第386旅为骨干分别组成北、中、南段破击队。

5月5日夜，破击战开始。北段破击队5日夜至8日夜破铁路5段，炸毁桥梁9座，击退由东观向南关增援的敌人两批。但炸毁南团拍大桥较晚，致使日军6日由子洪南发火车3列载兵300余至来远增援。中段破击队，6日在来远及其附近与来援的日军激战终日。第769团进攻南关，至7日拂晓将日军大部歼灭，并解救修路工人1000余人，缴获炸药1000余箱。南路破击队侧重于击，歼敌一部。

此次破击战，破坏日军白晋铁路50余公里，炸毁桥梁50余座，炸毁火车1列，歼敌350余人，参加破击的群众达8000余人。

日军为控制平汉线邢台至沙河段，切断太行、冀南联系，1940年初修成邢台至羊范、沙河至公司窑等公路，由伪“剿共”第2路高德林部守备，其重要据点刘石岗、范下曹各驻伪军1个营。第129师为打破敌人割裂太行、

冀南的企图，发起武（安）沙（河）破击战，以第385旅、新11旅、冀中警备旅，分别进攻刘石岗、范下曹据点，钳制武安援敌并相机破路。6月20日夜破击战开始，到22日9时击退援敌，全歼范下曹守敌，刘石岗之敌亦于21日仓惶逃走。此次作战，毙伤敌500余人，俘敌181人，并破坏公路6公里，铁路5.5公里。

四、冀鲁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发展

1938年10月，第129师进行漳南战役后，直南、豫北地区已开辟了安阳、内黄、汤阴、浚县、滑县等新区，并在安阳、内黄、汤阴3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组建了抗日武装八路军黄河支队。11月，活动于曹县的范筑先第35支队与该地抗日自卫队合编为冀鲁豫第5支队。12月中旬，八路军第344旅第688团两个连进到鲁西南活动，扩编为第344旅特务团。

12月，第344旅独立团，从河南临淇出发，进入直南。

1939年2月16日，第344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一部由山西高平到达直南，3月9日在濮阳井店同独立团、特务团、黄河支队、第5支队等合编为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大队，共180人，以后相继成立了第4、第5大队、独立大队、豫北大队，到年底发展到1万多人。冀鲁豫支队的成立，统一了直南、豫北、鲁西南中共抗日武装的领导。

4月25日夜，冀鲁豫支队袭入金乡县城，毙伤日伪军150余人，俘伪军100余人。随后，南下曹县。

7月初，日军1万多人开始“扫荡”鲁西南，先后占领定陶、成武、菏泽、东明等县城。冀鲁豫支队在定陶城附近毙伤敌一部后，摆脱敌人的合击，各大队分别转向敌侧后活动。支队部及第1、第2大队转至陇海路北侧曹县、考城、单县一带不断袭击敌人，连续取得胜利，迫使敌于7月中旬停止“扫荡”。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日军又对鲁西南进行了两次“扫荡”，均遭失败。1939年，冀鲁豫支队在反“扫荡”作战中，毙伤敌伪约2000人，俘虏敌伪536人，自己伤亡649人。

1940年4月30日，黄克诚率第2纵队主力第344旅等部，由晋东南抵达冀鲁豫区，冀鲁豫支队进行了新的组编调整。第5大队与清丰独立团合编为第344旅第688团；第1至第4大队编为新2旅，杨得志兼旅长；独立大队、豫北大队与独立游击支队合编为新3旅，旅长韩先楚。同时，成立了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兼第2纵队政治委员，崔田民任军区政治委员，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下辖3个军分区。

1940年6月5日，日军集中第35师和骑兵第4旅等部共4000余人，分3路“扫荡”濮阳等地区。冀鲁豫军区新编第3旅第8团，在小渠、黄村与敌遭遇，歼敌4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此后，敌调集1.5万余人向直南清丰、濮阳地区进行合击。这时，第344旅和新编第2旅主力已奉命开赴华中支援新四军。新编第3旅等部则分散进行游击战，使敌到处扑空，又不断遭到袭击，不得不于6月18日结束“扫荡”。

由于冀鲁豫支队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群众踊跃参军，使冀鲁豫支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1.7万余人。抗日根据地发展成直南（南乐、清丰、濮阳、东阳、长垣）、豫北（内黄、滑县、浚

县、安阳)、鲁西南(成武、定陶、金乡、菏泽、巨野、曹县、单县)三大块,为坚持长期对敌斗争奠定了基础。

五、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一) 第 115 师师部率第 343 旅挺进鲁西

从 1938 年底开始,日军增强驻山东的兵力,组建第 12 集团军,下辖第 5、第 21、第 114 师、独立混成第 5 旅、骑兵集团等部,并开始由城市和交通要道向乡村伸展。

为适应对敌斗争的新形势,统一山东抗日武装的领导和增强山东抗日武装的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1938 年 12 月成立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下辖 6 个支队。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命令第 115 师主力一部开赴山东。第 115 师立即派第 343 旅第 685 团由晋西出发,12 月下旬,到达湖西地区(微山湖以西),与当地人民抗日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支队。

1939 年 3 月 1 日,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第 343 旅余部到达鲁西郛城地区。为了打开局面,鼓舞群众抗日斗志,第 115 师决定拔除郛城西北伪军据点樊坝。3 月 4 日凌晨,第 686 团向樊坝发起进攻,战至下午即将守敌 1 个团 800 余人全歼。

樊坝战斗后,第 115 师除留第 686 团第 3 营坚持运(河)西地区外,继续东进季(山)西地区。3 月 10 日,到达东平县东北部的夏谢村,与中共泰西地委和山东纵队第 6 支队会合。此后,罗荣桓向鲁西、鲁中区中共党组织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5 月初,日军从济南、泰安、兖州、东阿、汶上等地调集日军 5000 亲人和伪军一部,分 9 路“扫荡”泰西。从 2 日起,开始向汶河南岸及东平、汶上等地进攻,至 10 日,日伪控制山外各要口,形成封锁圈,逐步向内压缩。此时,第 115 师师部、第 686 团、津浦支队等部,以及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等共 3000 余人,被包围于陆房周围纵横各约 10 公里的地域内。

11 日,日军向陆房连续发起猛烈进攻,但均被击迟。入夜,第 115 师等部在日军收缩兵力,包围监视,准备次日进攻的间隙,隐蔽地由西南方向分路突围,12 日晨,全部跳出敌人包围圈。陆房突围战斗,毙伤日伪军 1300 余人,自己伤亡 360 余人。

8 月 1 日晨,日军第 32 师约 1 个营 400 余人由汶上县城出动,向第 115 师师部驻地梁山地区进犯。为打击日军气焰,第 115 师决心以师特务营、骑兵连、独立旅第 1 团第 3 营等部歼灭该敌。8 月 2 日上午,当日军到达梁山南麓前集附近时,特务营以一部袭击敌人,诱敌进入梁山西南独山庄。黄昏后,独立旅第 1 团等部向独山庄发起攻击,经反复肉搏,激战至次日晨,将敌全歼。这次战斗,共毙敌 300 余人,俘日军 24 人,缴获野炮 2 门,九二式步兵炮 1 门,轻重机枪 15 挺,步枪 150 支,军马 150 余匹。

(二) 八路军第 1 纵队的成立和山东纵队的发展

1939 年上半年,日军先后对津浦路西,胶济路北,以及胶东,苏鲁边,

鲁中的泰（安）莱（芜）边，进行了普遍的分区“扫荡”，占领了大部分县城。6月上旬，日军以第5师为基干，第21、第32、第114师及独立混成第5旅各一部共2万余人，开始“扫荡”鲁中，日军队临沂、平邑、新泰、莱芜、临朐、安丘、诸城附近同时开始行动，以沂水、莒县为合击点。

9日，从北部胶济路进攻的日军占领莒县、沂水，从西部津浦路、南部滋（滋阳，即兖州）临（沂）公路进攻的日军进占大店镇、河阳镇、坦埠、南麻一线。山东纵队采取游击战术，以一部兵力在内线坚持斗争，以第1、第2、第3支队分别活动于外线新泰、费县、鲁山等地，钳制与打击敌人，第4支队在泰（安）莱（芜）边待机。经月余战斗，共作战70余次，毙伤敌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对山东的首次大“扫荡”。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8月1日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在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8月9日，山东军政委员会批准成立，由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委员，朱瑞为书记。

山东军政领导机构进一步健全的同时，大力加强了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重视政权建设的指示，5月24日，山东分局决定，加紧建立专署、县、区抗日民主政权。随后还强调：“敌人‘扫荡’，县、区、乡政权破坏，各地均须按照前电，恢复抗日政权，并保证党的领导”。此后，中共在莱芜、莱南、博山、淄川、章丘泰安、泰西、益都、新泰、泰（安）宁（阳）、蒙阴、邹平、长山、临淄、曲（阜）泗（水）宁（阳）边和长（山）桓（台）益（都）边，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从此，建立与发展民主政权的工作普遍开展起来。

山东纵队经过三期整训，已初步实现正规化，各种制度均已建立，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随后，山东纵队整编成第1、第2、第3、第4、第5旅及第1、第5支队，总兵力达5万余人。

（三）第115师挺进鲁南

为巩固鲁南根据地，1939年9月至10月，第115师师部、随营学校、第686团及新扩编的特务团等部，分批挺进鲁南腹地抱犊崮山区。原在鲁南的山东纵队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改编为苏鲁支队，归第115师建制。

第115师进入鲁南后，首先开辟了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临、费、峰、滕边区。接着于1939年冬至1940年初，陆续派东进支队、苏鲁支队一部及原在湖西区的苏鲁豫支队第2大队，开辟了郯（城）码（头）平原地区。为打开向鲁南北部天主教山区发展的道路，打通与沂蒙山区山东分局的联系，第115师以第686团、特务团、苏鲁支队及苏鲁豫支队第1大队，于2月14日一举攻占与日伪勾结的大地主据点白彦，3月连续粉碎了日军数百人至2000余人的3次反扑，在激烈的白彦争夺战中，共毙伤日军800余人，缴枪350余支。

4月中旬，日军第12集团军以第32、第21师和独立混成第6、第10旅各一部共8000余人，对抱犊崮山区大举合围“扫荡”。4月14日，日军分别由邹县、滕县、枣庄、峰县、临沂、费县等据点出动，首先“扫荡”根据地边沿区。4月21日，开始向中心区——费县南部的大炉地区推进，实施大合击。第115师将第7、第686团、东进支队、教导大队、苏鲁支队、峰县

支队和运河支队等转移外线活动，袭扰抱犊崮四周敌人点线；师部率特务团、边联支队坚持内线，在抱犊崮山区东麓的大炉、车辋、埠阳一带与敌周旋，多次避开敌人合击。经 20 余天苦战，迫敌于 5 月上旬结束“扫荡”，撤回原据点。在反“扫荡”中，八路军共作战 30 余次，毙伤日伪军 2200 余人。

第 115 师第 343 旅主力和师直转入山东地区后，至 1940 年 10 月，部队已扩大到主力团 7 个、新团 12 个，共计 42815 人，地方部队 2 万人，建立了两个军区及 6 个军分区，并将第 115 师部队 1 统一编成教导第 1、第 2、第 3、第 4、第 5、第 6 旅。

第二节 新四军东进北上，开辟新区

日军侵占武汉后，以 7 个师又 1 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长江中游武汉、南昌之间地区，以 4 个师又 3 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长江下游苏、浙、皖地区，力图以城市和交通线据点为依托，扩大其对占领区的控制。华中地区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因受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未能在苏、浙、皖广大地区失陷后，适时向敌占区挺进，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丧失了许多有利时机。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确定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中原局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以刘少奇为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和军队的工作。

1939 年 1 月 28 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根据中原地区的形势和特点，中原局决定撤销中共河南、湖北两个省委，成立中共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豫南等区党委，规定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未沦陷地区党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支援敌后抗战。并对开展武汉外围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作了部署。4 月中旬，刘少奇离开竹沟，返回延安。

为贯彻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 年 2 月 23 日，周恩来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根据华中的情况，提出了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三条原则：即：（1）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里发展。并据此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

为加强对长江以北乃至整个华中沦陷区工作的领导，1939 年 9 月 17 日，刘少奇由延安出发，月底再次到达竹沟。11 月初经豫皖苏边区涡阳，于月底，抵达皖东定远县藕塘附近山黄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一、第 1、第 2 支队东进北上，江南指挥部成立

1939 年，新四军第 1、第 2 支队坚决贯彻执行“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在巩固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实行东进北上。

1939 年初，日军在茅山根据地周围频繁“扫荡”，修筑公路，增设据点，对茅山根据地实行封锁。新四军在反“扫荡”的同时，在金坛地区和溧（水）武（进）公路沿线，主动出击，先后在水阳镇、官陡门、东湾等地给日军沉重打击。

1 月 6 日，“扫荡”宣城之日伪军 130 余人北撤，当晚进至芜湖以东的水阳镇。7 日晨，第 2 支队第 3、第 4 团在水阳镇以北 1.5 公里处设伏，毙伤敌 30 余人。1 月 21 日凌晨，第 2 支队第 3 团突然袭击芜湖日军机场外围据点官陡门，经 20 分钟战斗，毙伤伪军 70 余人，俘伪军 60 余人，并将伪军据点捣毁，第 3 团仅伤两人。

2月7日,第1支队第2团攻击溧武公路日军重要据点东湾,火烧碉堡,将东湾据点日军全部歼灭,并击退来援日军两批(共300人),在1小时的战斗中,共歼日伪军200余人,缴枪20余支。接着该团又于2月18日袭击延陵敌据点,歼日伪军80余人。

1939年初,新四军第1支队以第2团在丹阳游击纵队配合下,挺进扬中,将该地伪军消灭,并以第3、第4支队各一部北渡长江,进至大桥、嘶马、吴家桥一带,从而控制了通扬运河以南沿江地区。同时,主动与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二李”)取得联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关系。

1939年4月初,陈毅命令第6团准备东进江南东路地区。5月5日拂晓,第6团由常州附近越过京沪铁路,在戴溪桥地区与“江南抗日义勇军”会合,成立“江抗”指挥部,梅光迪任指挥,叶飞任副指挥,以“江抗”名义继续东进。5月下旬,“江抗”在无锡东北的黄土塘与日伪军600余人遭遇,歼敌百余人,取得东进途中第一次战斗胜利。6月24日夜,“江抗”袭击京沪铁路中段日军重要据点浒墅关车站,经1小时战斗,全歼该地日军50余人和伪军1个中队,炸毁铁桥1座,使京沪铁路停运3天。随后乘胜东进,进入常熟境内,在阳澄湖畔与常熟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民抗”取得联系。

7月,“江抗”以约1个团的兵力南越京沪铁路,进入青浦,与当地游击队会合。7月23日,上海日伪军一部到青浦“扫荡”,“江抗”击退日伪军后,跟踪追击,竟于天黑后冲进上海虹桥机场,当即击毁敌机4架,使京沪线上日军大为震惊。“江抗”在东路地区连战皆捷,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大批青年踊跃参军,“江抗”遂扩编为第2、第3、第5路。此后,“江抗”与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常熟、嘉定、青浦等地抗日游击队配合,共同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游击根据地。随后,“江抗”奉命西撤,留下部分地方武装,继续坚持当地斗争。

11月7日,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在苏南的第2、第4团、新3、新6团、“江抗”、丹阳游击纵队及苏南地方武装。同时,成立苏皖区党委,统一领导苏皖、苏南、苏北三个特委。“江抗”第2路到扬中后,与丹阳游击纵队台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进至扬州、泰州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此外,第4团主力与“挺纵”一部合编为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

二、新四军军部率第3支队等部坚持皖南抗日阵地

1938年12月,在皖南坚持抗战的第3支队(欠第6团)由青弋江防区奉调铜陵、繁昌沿江地区。当月和1939年8月,第1支队第1团、第2支队第3团先后由苏南敌后调回皖南,归新四军军部直接指挥。到1940年秋,在皖南又已陆续组建了新1团、新3团,军部特务营也扩大为特务团。

日军为维护长江交通,不断对皖南进行“扫荡”。1939年日军5次进犯繁昌。1~2月,繁昌两失两克。5月20日至23日,日军1000余人第3次进

东路地区指无锡、江阴公路以东的江阴、无锡、苏州、常熟、太仓地区。

犯繁昌，第3支队和第1团毙伤日军300余人，将日军击退，新四军伤亡100余人。11月8日至23日，日军2000余人第4次进犯繁昌，新四军毙伤日军450余人，将敌击退，自己伤营长以下77人，亡连长以下38人。12月21、22日，日军1000余人第5次进犯繁昌，再次被击退。

1940年4月，日军调集第15、第17、第116师各一部共1万余人，对国民党军防守的青弋江地区及新四军防守的南陵、繁昌地区大举“扫荡”。4月24日，日军一路约5000余人由湾陵、黄墓渡攻占南陵，尔后以2000余人沿青（阳）南（陵）公路向西南方向前进。企图迂回青阳。26日，新四军第1团在父子岭伏击该敌，经8小时激战，毙伤日军370名，新四军伤亡84人。

日军另一路约4000人，由繁昌以北的三山镇、横山、峨桥等地于4月24日开始向繁昌及其以南地区攻击前进。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24日在马家坝、25日在繁昌以南的九郎庙以机动防御，迟滞敌人前进，毙伤日军140余人。26日该敌向何家湾前进，新四军第3团与敌遭遇，先敌抢占苏家林、何家湾有利地形，阻击敌军，经9小时激战，毙伤日军300余人，迫敌转向木镇前进。5月3日，第5团第1营在铁门门伏击由繁昌向中分徐前进的日军运输队，毙伤日军60余人。

在4月23日至5月3日的反“扫荡”中，新四军进行战斗10余次，毙伤敌近1000人。

1940年10月4日，日军又以第15、第116师部队为基干伪军一部，共1万余人，由大通、铜陵、荻港、湾沚出动，向皖南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扫荡”。7日黎明，日军5000余人攻陷南陵以南三里店，接着开始向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外围的田方、草鞋店、吕山发动猛烈攻击。新四军第3支队及第1、第3团，在军长叶挺亲自指挥下，经一昼夜激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击退其进攻。日军遭打击后，8日经枫坑东渡青弋江，占据了国民党军第52师驻守的泾县城，新四军跟踪追击，围攻泾县，9日晨夺回该城。

三、江北指挥部成立，第4、第5支队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为加强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领导，促进新四军第4支队继续东进，开展江北统战工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到达江北无为地区。随即与豫鄂皖边游击总司令、安徽省主席廖磊建立了抗日统战关系，并将庐江、无为地区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纵队司令员，黄岩任政治委员，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

1938年12月，第7团越过淮南路，进入合肥青龙厂及定远一带；1939年3月，第4支队司令部、政机关及特务营，也先后进至淮南路东。

5月6日，叶挺到达庐江县东汤池，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接着，整编了部队，第4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7、第9、第14团。以第8团为基础扩编为新四军第5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辖第8、第10、第15团。

江北指挥部成立后，以第4支队活动于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的定远、合肥、滁县、全椒等地，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8月2日夜，日伪军500余人分由滁县腰铺、全椒出动，3日拂晓前包围

了宿营于张二房的国民党滁县常备壮丁队，第4支队第9团一部主动出击，毙伤日伪军40多人，击退了日伪军，救出滁县常备壮丁队。这一行动，增进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

8月下旬，第5支队第8、第15团挺进津浦路东，第10团于10月也进入津浦路东，开辟了以来安县城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9月3日，日军侵占来安县城，第5支队将其收复。11月21日，日军再次侵占来安，第5支队展开围攻，毙伤日的军200余人，于23日收复来安。

12月，日军从南京、明光（今嘉山县）、蚌埠等处，抽调5000余人，部署于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

12月19日，日军开始“扫荡”津浦路西藕塘以南的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至21日，陆续占领上述各地。周家岗至复兴集一带皆力山地，便于开展游击战，江北指挥部决心采取灵活战术打击敌人并歼其一部。

21日至23日，第4支队第7、第9团与敌激战3天，毙伤俘日伪军160余人，迫敌退回全椒，取得了进军皖东后第一次反“扫荡”的胜利。新四军装备简陋却能以少胜多，使当地人民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1940年1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江北前敌委员会改成皖东军政委员会，由郑位三任书记。中原局撤销了中共苏皖省委，成立津浦路西省委（书记张劲夫）和津浦路西省委（书记刘顺元）。经过短短三四个月，至1940年3月，皖东各方面的工作得到迅速发展，第4、第5支队由7000余人扩大到1.5万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5000余人。

第4、第5支队在皖东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

1939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无理电令新四军江北部队调到江南，此后蒋介石、顾祝同一再催逼，并指使国民党顽军进攻第4支队；同时，苏北韩德勤部准备进攻津浦路东第5支队。

为了巩固华中的抗战局面，中原局决定首先集中主力于津浦铁路以西，重点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对桂军力求缓和，巩固路西抗日阵地；在路东尽量争取韩德勤部独6旅中立，延缓关系破裂时间，待路西形势缓和后，再挥戈东向，击退韩德勤的进攻。同时，为了保卫皖东，发展苏北，中原局多次请求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

3月初，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颜仁毅等部袭击驻定远县大桥镇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被第4、第5支队击溃并歼灭一部。

3月21日，韩德勤乘新四军第5支队主力在路西活动，集中第89军第117师两个团、独6旅3个团、盱眙县常备旅秦庆霖部等约1万人，围攻路东第5支队驻地半塔集地区留守部队和机关。中原局决定半塔集部队固守待援，江北指挥部率第5支队、苏皖支队东援，并调挺进纵队主力一部西援。从21日至28日，半塔集部队打退优势兵力的连续进攻，顽强地守住了阵地，为增援部队机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顽军见半塔集久攻不下，东西援军又未能阻止，形势不利，当即撤退。

29日，新四军分四路出击，经王店集、莲塘战斗，将进犯顽军击溃，并跟踪追击，直至三河南岸。至4月8日，顽军全部退往淮河北岸主应、淮安地区。8月，第5支队与八路军第5纵队共同开辟了淮（阴）宝（应）区，使皖东、淮海两区打通了联系。

在此有利的形势下，中原局抓紧在皖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首先建立了

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后陆续建立了滁县、凤阳、来安、嘉山、天长、盱眙、仪征、六合、高邮、宝应等县抗日民主政府。4月18日，建立了津浦路东各县抗敌联防委员会办事处和路东联防司令部。8月1日，成立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

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特别是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合，引起日军极大不安。8月下旬，日伪军万余人部署于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来安、六合、天长、高邮、明光、五河、八斗岭等据点，9月初开始对路东“扫荡”，企图包围半塔集、大田郢江北指挥部，歼灭新四军，摧毁路东抗日民主政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第14团、独立第1、第2团等部，以游击战与日军周旋，第5支队主力和八路军第5纵队第5团在外线积极袭击敌人。从9月5日至17日，与日伪军作战65次，毙伤敌近600人，新四军伤亡200余人。日军除在盱眙建立一个据点外，均撤返原防。

四、游击支队（第6支队）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睢杞太地区后，连续取得对日伪作战的胜利，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支队进一步扩大。1939年初，游击支队主力由豫东东进商丘、亳县、永城地区。这时日伪军正三路合击亳县（国民党军驻守），并已侵占亳县东北的芦家庙。2月8日，游击支队第2营到达芦家庙附近，9日凌晨配合友军台击芦家庙之敌，经3小时战斗，毙伤伪军200余人，俘伪军参谋长以下100余人，残敌逃回坞墙。新四军仅伤亡18人。

5月，彭雪枫留第1团坚持永城、亳县、商丘、夏邑地区，率第2、第3团进军淮上地区。

游击支队主力进军淮上后，豫皖苏边区将永城地区的鲁雨亭部改编为游击支队第1总队，随即建立了永、夏、萧、宿、亳五县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9月，游击支队主力由淮上回师涡阳、蒙城、宿县边之曹市集附近整训。接着，支队主力开赴永城、涡阳、萧县三角地带，以团为单位，分区开展地方工作，组织地方武装。

1939年底，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部队除第1、第2、第3团及第1总队外，新增由地方武装改编的第2、第3总队，共1.2万余人。此后第6支队大力进行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工作，抽调干部充实永、夏、萧、宿、亳五县政权，建立“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作为边区的最高行政机构；以主力部队北上商丘、宁陵和砀（山）南等地开辟新区，成立了砀南县政府，发展和扩大地方武装，先后成立永城、萧县，宿县3个独立团。

1940年3月中旬，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永、萧地区，遭到失败。4月1日，日伪军又集中3000余人，对永城东北地区进行反复“扫荡”。第1总队及第3总队一部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300余人，挫败了敌人的进攻，但第1总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总队长鲁雨亭以下200余人牺牲。在连续打破日伪军的“扫荡”后，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淮上地区指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宿（县）蒙（城）凤（台）公路以东地区。

五、新四军、八路军协同开辟苏北

（一）八路军一部南下

1939年11月11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在一两个月后，游击支队主力部队及豫皖苏省委干部抽一部，到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并指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水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下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5万至10万人枪，惟须指导下级避免与韩德勤的基本区域发生冲突”。

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研究了华中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认为向西发展受第1、第5战区限制，且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因此确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强令江北新四军南调。3月初开始，国民党顽军先后进攻皖东津浦路西和津浦路东新四军。刘少奇连电请示中共中央调八路军南下支援新四军。3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议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4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国民党顽军在鄂中、皖东、淮北正大举进攻新四军，“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

5月下旬，八路军第2纵队第一梯队第344旅由刘震、康志强率领，从鲁西南定陶出发，经曹县、砀山在黄口附近跨过陇海铁路。6月20日，先后到达涡阳县新兴集与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部会合。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新2旅（欠第4团）于6月下旬到达新兴集。第2纵队南下部队5个团共1.2万人。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彭雪枫、黄克诚两部于7月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原新2旅）、第4（原第344旅）、第5（原第6支队第1、第2、第3团合编）、第6旅（原第6支队第1、第3总队合编）及游击司令部。随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也南越陇海铁路抵达泗县。

8月，黄克诚率第4纵队第2旅、第4旅第7团等部，到达皖东北半城、魏营子、双沟镇一带。根据中原局决定，将所有涡河以北、津浦路以东中共领导的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以黄克诚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1支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改编）、第2支队（第4纵队第2旅、第4旅第7团改编）、第3支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改编）和皖东北保安司令部（地方武装改编）。并成立苏皖军政委员会，以黄克诚为书记。

重新整编后，第4纵队辖第5、第6旅，共9个团1.7万余人；第5

纵队辖3个支队，共9个团约2万人。

第4纵队坚持豫皖苏边的游击战争，并分别进军怀远、凤台以及淮上等地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第5纵队以一部坚持皖东北游击战争，主力东渡运河，挺进苏北沐阳、宿迁、淮阴、涟水、东海等地，初步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坚持皖东北斗争的第5纵队第2支队主力配合新四军第5支队开辟了淮（安）宝（应）地区，粉碎了日军对淮南津浦路东的“扫荡”，又在淮河北岸双沟一带击退了敌1000余人的进攻。

（二）江南新四军北上，黄桥战役

皖南、江南（即苏南）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1月19日“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的指示，1940年上半年继续坚持皖南、江南阵地。

对于皖南、苏南新四军发展方向，中共中央一再指出：新四军江南部队应向北发展，皖南部队除留一小部坚持外，军部率主力渡江北上皖北，如无法直接从皖南渡江，则东移苏南，与苏南新四军会合，在苏南发展，或待机北渡到苏北，开辟苏北。

5月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提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错误；无论华北、华中或华南，无论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都应该“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6月10日，陈毅向中央报告：冷欣部第63师与第40师等部对江南指挥部（溧阳竹箦桥）形成大包围，向新四军挑战。

正在这时，苏北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还在5月中旬，挺进纵队返回苏北吴家桥一带。5月17日，与进犯日军500余人激战一昼夜，将其击退后，转移至通扬运河以北郭村一带休整。但“二李”在韩德勤煽动下，以“侵占”其防地为借口，于6月下旬向挺进纵队下最后通牒，限令3天内退出郭村。

6月28日晨，“二李”所部13个团由李长江指挥开始进攻郭村。新四军挺进纵队2000余人，在郭村顽强坚守至30日，苏皖支队昼夜兼程赶到。加上“二李”所部1个团另1个营起义，使新四军兵力增加到相当于5个团。7月2日“二李”部队溃退到塘头，李长江逃回泰州。

7月3日，陈毅到达郭村，命令乘胜攻下塘头，但为争取“二李”中立，不进泰州。4日，挺进纵队一举攻下塘头，陈毅立即向李明扬表示，只要李军不再攻击新四军，新四军即停止反击李军，并释放俘虏，归还缴获之枪械，如果李军不阻碍新四军东进黄桥，还可让出郭村、塘头。李明扬在兵败城危的情况下，接受陈毅提出的条件，答应让新四军通过他的防区东进，并在将来韩德勤与新四军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53、754页。

7月8日，粟裕率领新6团、第2团到达塘头，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师。7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下辖第1、第2、第3纵队，共约8000人。

东进黄桥开辟泰（兴）、靖（江）、通（南通）、如（皋）地区，可以据此向东向北发展，改变华中抗战局面。7月25日，新四军由江都大桥地区东进，26、27日通过“二李”防线。28日，击溃由通扬运河沿线曲塘南下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两个团，29日，歼灭驻黄桥的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两个团2000余人，何部特务团400余人在陈宗宝指挥下举行战场起义，新四军进占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随后，进入如皋、如西地区。

9月3日，韩德勤部分左、右两路由曲塘、吴家集、海安、姜堰一线南下。左路军由第89军第117师（欠第1旅）、独6旅、保1旅组成，右路军由“二李”、陈泰运等部组成。9月5日，左路军占营溪。6日，新四军反击，夺回营溪，歼保1旅1个多团。韩军其他各部撤回姜堰、海安一线。

9月13日，新四军向姜堰发起攻击，14日占领姜堰。而后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韩德勤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9月27日，陈毅在姜堰军民代表会议上宣布：愿意退出姜堰。但又接到韩德勤电报：新四军必须立即撤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陈毅当即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

9月30日，新四军如约退出姜堰，交由“二李”、陈泰运接防。当天，韩德勤下达进攻黄桥的命令，以第89军和独6旅等为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从北面、东面进攻黄桥；以“二李”、陈泰运部为右路军，以保1、5、6、9、10旅为左路军，分别从西面、南面进攻黄桥。

顽军中路军11个团，1.5万余人。新四军有9个团，其中只有3个主力团，共7000余人。陈毅决心分割包围顽军中路军各部，逐一歼灭；遂以第3纵队守黄桥，第1、第2纵队集结于顾高庄、横港桥之间待机。

10月4日4时，顽军开始总攻黄桥。4日晚，第1、第2纵队在黄桥西北之高桥歼灭独6旅大部。接着6个纵队将第89军包围于黄桥北面，至10月5日9时，将其大部歼灭，独6旅、第89军残部溃集营溪。10月6日8时，新四军追至营溪，再歼顽军一部，7日黄昏乘胜占领海安，随后又连下富安、安丰，10日占东台。

中共中央当时力争国内时局好转，确定采取完全自卫的立场对付反共磨擦，在苏北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韩军进攻黄桥后，八路军第5纵队5个团日夜兼程南下。先后击溃顽军保安第2、第8旅各一部，进占阜宁、东沟、益林，直下盐城，10月14日，与新四军在东台北面的白驹镇胜利会师。

黄桥战役，韩德勤的主力第89军、独6旅几乎全军覆没。“二李”和陈泰运部经新四军争取，保持了中立。黄桥战役后，苏北指挥部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及苏北临时参议会，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并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县政权，组建地方抗日武装。至此，新四军、八路军协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

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苏北阜宁东沟，与黄克诚会合。

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叶挺任总指挥，

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六、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武汉沦陷前后，中共豫鄂边区地方组织抵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指导下，创建了抗日游击队，为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豫南，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于1938年3月东进抗日，在确山县竹沟镇设立了留守处，竹沟留守处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的重要活动基地。

1938年10月12日，信阳沦陷，中共豫南特委争取信阳县长李德纯合作抗日，于11月以信阳县常备队、警卫队与中共领导的竹沟留守处1个分队、“77军桐柏山区工作团”中的两个分队等编为“信阳挺进队”，共300余人。信阳沦陷前后，在平汉路东信（阳）罗（山）边，以中共开办的训练班为基础，建立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至1938年底有200余人。

鄂中，1937年12月，通过董必武的上层统战关系，由陶铸主持在应城汤池创办了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此后，中共党组织又举办了汤池临时学校，培养了数百名抗日干部。1938年10月，中共鄂中特委作出“一切服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将几支游击队与国民党应城县常备队合编为“应城县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总队”，简称“应抗”）约500余人。同时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许金彪在孝感中和乡组建的抗日自卫队，也改称“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约500人。

鄂东，1937年11月，中共湖北省工委即与红28军在黄安县（今红安）七里坪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随后，又举办青年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新四军第4支队于1938年3月东进抗日，在七里坪设立了留守处。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书记郭述申接着成立了鄂东特委和（黄）安麻（城）、经（扶）光（山）、罗（山）南、（黄）安北4个县委，恢复和重建该地区的农村党组织，发动群众抗日。

10月28日，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在黄冈张家山将游击队整编为“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到11月发展到400余人。为取得合法名义，后改编为第21集团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共730余人，被划定以麻城夏家山为防区。

1939年1月起，中原局先后组织力量向豫鄂边区敌后挺进。1月17日，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和随行干部共160余人由竹沟南下，1月下旬到达四望山，与信阳挺进队会合。根据中原局关于沿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的区域发展的方针，2月底，李先念率部离开四望山，向平汉路东信、罗边挺进，3月在信阳南面的灵山冲大寺口与新四军第6游击大队会合，随即在信罗边成立了中共中心区委，开展群众工作，发展抗日武装。为了开辟黄陂、孝感地区，5月，第6大队及第5大队一部，向驻黄陂蔡店、李新湾一带的伪军第8军司令部奔袭，经激战俘伪旅长以下3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此役，对创建鄂东抗日根据地有重要意义。

4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组织委员陈少敏（女）率领约1个连的兵力离开竹沟，30日到达四望山信阳挺进队。6月初，又率信阳挺进队两个中队继续南下，6月6日，到达鄂中安陆赵家棚。

李先念于4月从灵山大寺口向鄂中挺进，在小悟山青山口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会合，随后一同开抵平汉路西安陆赵家棚地区。5月中旬，鄂中区

党委在应山县组建的两个中队亦前来会合。为统一指挥，上述三支部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

5月1日，鄂中区党委军事部长陶铸率领“应抗”挺进大队等部，夜袭云梦城。在伪军内应未能打开城门的情况下，部队由南门城墙缺口冲入城内，围攻伪维持会、公安大队驻地大庙，歼伪军一部，解救被关押的群众多人。在孝感敌派出坦克部队增援时，“应抗”已顺利转移。这是中国军队在鄂中第一次袭入敌占县城，给鄂中人民极大鼓舞。

6月上旬，李先念、陈少敏率挺进团第1大队到达京山县大山头与鄂中区党委会台。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在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公开树起新四军的旗帜，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团队和挺进团队。8月，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成立第4团队。此外，豫南特委于6月又建立第3团队（一般称之为信南3团队），豫鄂边区党委于7月建立第5团队，11月初，该团队与信南3团队合编，仍称信南3团队。

支队建立后，在平汉路两侧积极打击敌伪，消灭土匪，振奋了民心，扩大了活动地区。8月14日，日军400余人由西北向罗山朱堂店进攻。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2团队为打击该敌，以1个大队节节抵抗诱敌向罗山方向深入，以主力配置于朱堂店西南，相机出击。日军进攻受挫后，第2团队主力立即向敌翼侧出击，敌施放毒剂掩护突出包围。此役毙伤敌80余人，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接着，为扩大战果，该团队又袭击信罗公路五里店敌据点，迫使伪军1个中队投降。

10月13日，罗店、贾店日伪军700余人，以隐密动作向驻京山县新街的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进行偷袭。驻该地第1团队立即以部分兵力正面阻击敌人，以主力向敌两侧发起攻击。两翼伪军被击溃，中路日军孤立，遂施放毒剂掩护撤退。第1团队又将敌包围压缩于黄家台祠堂边的洼地，连续猛攻。黄昏后，日军数路赶来解救，残敌焚毁大批尸体后仓惶突围。此役，缴获许多军用物资，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9年10月31日，第2团队一部在襄（阳）花（园）公路之同兴店，伏击由安陆开往花园之敌骑兵300余，毙伤敌100余人，第2团队亦伤亡50余人。第4团队进击长江埠附近伪军吕华奎部，歼其1个中队。第5、第6团队各一部，在石板河以南截击由皂市调赴京山的日军500余人，毙伤其一部。敌屡遭打击，图谋报复。12月5日，日伪军1500余人，闪击豫鄂边区领导机关驻地——京山马家冲。边区领导亲自指挥部队抗击敌人，在毙伤日伪军70余人后，当晚胜利突围至八字门。

11月16日至19日，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在四望山召集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问题。会议决定：撤销豫鄂边、鄂豫皖、鄂中3个区党委，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由郑位三为书记，陈少敏力副书记，委员共11人；由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3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并将3个地区的武装统一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1940年1月，豫鄂挺进支队改称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2月中旬，李先念率第2、第4、第5团队，在广大群众支援下，

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进攻汉阳侏儒山伪军汪步青部。从西路进攻的第5团队，首先到达并向伪军展开进攻，夺占侏儒山街道，毙伪营长以下100余人。由于从东路进攻的第2、第4团队在系马口与出援的日军遭遇，未能按时到达作战地区，第5团队于拂晓撤出战斗。此役震动了武汉，盘踞武汉三镇的日军慌忙戒严三天。此后，第2团队赶赴天门赖兴场，开辟天门以西地区。日军集中1000余兵力，分7路向该团队进攻，并于拂晓前将驻地包围。全团队指战员沉着战斗，与敌反复肉搏，激战到中午后胜利突出包围。

为了还击鄂东坚持反共和屡次进攻新四军的顽固派头目程汝怀，1940年1、2、4月，豫鄂挺进纵队主力三进三出大、小悟山，在鄂东抗日武装的配合下，给程顽以有力反击，一度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

1940年5月，日军向枣（阳）宜（昌）地区发动进攻，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豫鄂挺进纵队各部分别袭击黄陂、随县、孝感、安陆、应山、应城、京山及礼山各县境内的据点20余处，并在群众配合下，破坏小河溪至夏店、花园至东阳岗、花园至应山、安陆至巡店等公路五六十公里，收割电线5000余公斤，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进攻。5月17日，川军第125师李团被日军包围于安陆以北之李家冲。第7团队闻讯主动驰援，向日军攻击，使友军得以安全突围。

6月中旬，日军占领襄樊、宜昌等地，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原局指示豫鄂挺进纵队主力由鄂中向西发展，配合国民党军打击敌人，并改善鄂中敌后抗日阵地。根据上述指示，纵队主力挥戈西进，直指白兆山地区。该区地势险峻，西北与大洪山相接，南可控制汉（口）襄（阳）通道，东可扼制平汉铁路，是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阵地。6月下旬，挺进纵队控制了白兆山和坪坝。新四军控制坪坝，切断了安陆与坪坝以西三阳店日军据点之间的联系。7月，日军第3师两个营1200余人，从安陆进至雷公店集中后，向坪坝进犯。第1团队和第2团队一部待敌进至坪坝以东三四公里时，即主动向敌侧后迂回攻击，敌慌忙后撤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和村庄顽抗，经整日激战，敌于黄昏焚尸30余具后逃窜。敌不甘心失败，9月，又以600余人沿小路隐蔽前进，企图偷袭，但又被第1团队、第3团队以迎击和截击挫败。10月，敌再以骑兵1000余，于夜间由坪坝以西之三阳店进行奔袭。第6团队和第3团队一部在崔家冲进行伏击，敌伤亡惨重，遗尸数十具，向应城溃退。日军遭受三次打击后，不得不放弃占领坪坝的企图。豫鄂挺进纵队牢固地控制坪坝，保障了白兆山南方门户的安全。

挺进纵队控制白兆山后，为了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扼制襄河及其两岸敌人的交通线，7月，以第5、第6团队各一部挺进京山南山。不久，改造地方政权，成立了南山行政委员会，京山南部地区出现了抗日新局面。与此同时，纵队还派第6团队等部先后进军襄（河）西，与当地中共特委领导的武装会合，并成立襄西地委和军政委员会，使襄西敌后游击战争进一步扩大。8月，在南山成立指挥部，率第5团队全部及第4、第2团队各一部进军天门以西，开辟了天西地区。

8月1日，豫鄂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在白儿山南麓召开边区县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确定了继续完成战略展开的任务，决定成立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作为边区最高的政权机关，以加强边区政权建设和统一领导战争动员工作。9月1日，按照“三三制”原则，经选举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到1940年底，平汉铁路以西各县基本区完成了基层的民选工作，全边区建立了9个

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军政大会后，纵队主力部队的团队、大队、中队、分队改称团、营、连、排，使纵队向统一和正规化迈进一大步。纵队主力由小到大，逐步扩大为拥有 1.5 万人的游击兵团，在两年中，对日伪军作战 280 余次，毙伤日军 2490 人，俘日军 13 人，毙伤伪军 8114 人，俘伪军 1258 人，争取伪军反正 2650 人。

豫鄂边区地处武汉外围，面临敌顽夹击的复杂形势，而且长期孤悬敌后，与其他根据地隔绝，根据地开辟甚为艰辛。豫鄂挺进纵队的创造和发展，中共中央曾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第三节 华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斗争，派张文彬到广东整顿和加强党组织；1937年底，又派廖承志到香港建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号召党员军事化，决定各地党组织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广州失陷后，1939年1月，广东省委召开第4次执委扩大会议，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决定广东党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是：积极在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力量，准备在抗战最后阶段起决定作用，并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在东江、琼崖建立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一、东江、珠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九（龙）铁路纵贯其中。

1938年4月，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成立，领导东莞、宝安和增城（部分地区）3县党的工作。县委争取国民党东莞县社训总队的支持，7月建立了东莞常备壮丁队。县委还以农村党员为骨干，建立了5个游击小组。

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国民党东莞县政府退出东莞县城。

13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在东莞县城建立了东莞模范壮丁队，队长王作尧，全队150人。19日，日军占领石龙，东莞常备壮丁队和模范壮丁队一部立即开赴石龙附近东江河畔的峡口布防。20日，在峡口打击了渡河进犯的日军，翌日，又组织40余人的队伍渡河伏击敌人。

10月中旬，中共增城党组织争取国民党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增城县统率委员会第3区指挥部的支持，建立了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县第3区常备队，全队100余人。

17日，常备队在增城县仙村圩竹园涌附近，伏击行驶于东江的日军船只，击沉橡皮艇一艘，击毙日军10余人，缴获木船一艘。

10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为加强对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书记梁广，领导香港、澳门、海员工作委员会、中山、番禺、南海、顺德、惠阳、东莞、主安的党组织。随后，东南特委派曾生（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伯明、谢鹤筹3人组织惠阳工作团，到惠阳整理党的工作，建立惠（阳）宝（安）海（丰、陆丰）工作委员会，12月2日，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在惠阳县淡水镇周田村建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共100余人。

12月7日，日军由淡水撤退。游击总队团结当地抗日武装收复淡水，摧毁伪政权，成立了惠阳县第2区行政委员会。

1939年元旦，东莞模范壮丁队等120人组成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

1939年2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中共东江特委，书记林平。5月，在坪山成立东江军事委员会，由梁广、梁鸿钧负责，领导曾生、王作尧两部队。

1939年春，日军为确保广州和珠江、西江交通线，收缩兵力，撤出惠州

等城镇和东江部分占领区。国民党军进占惠州，设立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四五月间，工作尧、曾生领导的部队先后改为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4游击挺进纵队直辖第2大队和第3游击挺进纵队新编大队。

从1939年夏天开始，新编大队在大小梅沙、葵涌、沙头角、横岗一带，积极打击日军。9月初，日军500余人再次在大亚湾登陆，占领葵涌、沙鱼涌，切断东江与香港、南洋的国际通道。12日，新编大队夜袭日军，战至天明，克复葵涌、沙鱼涌，日军从海上撤退。

12月，新编大队在横岗鸡心石伏击由东莞两渡河返回深圳的日军1个营，毙伤日军30余人，毙战马3匹。

第2大队活动于东莞、宝安地区。11月，第2大队对宝安县城南头镇进行包围封锁，迫使守城日军于30日晚从海上逃走，收复南头。

到1939年底，新编大队发展到500余人，第2大队发展到200余人，并分别在坪山圩和乌石岩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1940年2月初，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命令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到惠州集训，企图借集训之机，解除武装。3月初，国民党顽军第186师等部共3000余人包围坪山、乌石岩。第2大队、新编大队突围后，向海、陆丰转移。由于国民党顽军前堵后追，损失很大。

在这关键时刻，廖承志从香港转来了中共中央5月8日的指示：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同时不怕磨擦，才能生存发展，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根据这一指示，曾、王两部于8月下旬返回宝安县上下坪村。

9月中旬，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上下坪村召开部队干部会议，确定坚持东宝惠地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放弃国民党军番号，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原新编大队改称第3大队，第2大队改称第5大队。

上下坪村会议后，10月初第3大队挺进东莞县大岭山客家洞地区，开创大岭山区抗日根据地；第5大队活动于宝安敌后，开创以阳台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1月初，东莞地区日军200余人由原街等地出动，向大岭山区进犯。第3大队于黄潭村突然向敌出击，毙伤其数十人，打退敌人的进攻。此后，又连续袭击东莞太平、主安公路线日军据点，打击了日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为建立大岭山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珠江三角洲中的南海、番禺、顺德、中山（含今珠海市、珠县）等四县位于广州南面。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南海、顺德及番禺相继失陷。1939年8月，日军第一次在中山登陆，不久即撤走。1940年3月，日军第二次在中山登陆后，控制了石岐、唐家湾、前山等要点。日军在番禺建立护沙纵队，在中山建立伪军第43师，在各县建立伪政府及自卫、保安大队。

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番禺、顺德建立有南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林锵云，在中山有县委。日军攻陷广州后，中共党组织立即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大革命时期的南海县农民运动领导人吴勤组织了“广州市郊游击第2支队”（简称广游2支队）。中共广东省委东南特派刘向东、严尚民到广

游2支队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该队曾先后在沥窖附近海面伏击日军运输舰，在广三路小塘车站袭击日军，多次取胜。南顺工委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特务中队，1939年5月，派出游击队员潜入顺德县城（大良），袭击日军，有所斩获。是年冬，日军再次进攻大良，广游2支队与特务中队在金骨咀、旧寨两地，打退敌人的进攻，威震三角洲。

1940年夏，广东省委从中共中央派给广东的干部中，抽调谢一 182——立全、谢斌到广游2支队分别担任军事教官和参谋。同时，广东省委决定加强对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将南、番、顺、中四县划出，成立中心县委，直属省委领导（原属东南特委领导），派罗范群任书记。

南顺中心县委成立后，决定在顺德县城附近以西海村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将林铭云领导的游击队并入广游2支队，称广游2支队独立第1中队，进驻西海。1940年11月5日，日军300多人进犯西海，广游2支队毙伤日军4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西海保卫战的胜利。

二、海南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1937年8月起主动与国民党琼崖当局谈判，直至1938年10月22日，双方达成协议，将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下辖3个中队共300人，冯白驹任独立队队长。

1939年2月10日，日军以台湾混成旅一部，在海军支援下，在海南岛北部的天尾港登陆，占领海口、琼山、定安、文昌等地。14日，日军又以第5舰队一部，在海南岛南部的三亚港登陆，占领三亚、榆林等地。

当2月10日日军在天涯港登陆时，冯白驹即令第1中队赶往南渡江重要渡口潭口协同国民党军阻止日军东进。第1中队当天上午赶到潭口时，国民党军已不战而退，第1中队冒着敌机的轰炸，一直坚持到黄昏。潭口阻击战，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良好影响，独立队迅速发展。3月，琼崖特委将独立队改称独立总队，冯白驹任总队长，下辖3个大队和1个特务中队，共11个中队1400余人。

独立总队成立后，第1、第2大队活动于琼山、文昌地区，第3大队活动于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地区。3月，第1大队在琼文公路的罗牛桥伏击日军的运输车辆，击毁汽车1辆，歼日军上校以下20余人。6月，化装潜入文昌县城，袭击日军北门哨所，歼敌一部。第2大队于5月在海口市郊长村桥附近袭击监督群众修路的日军，缴枪7支，日军遭独立总队连续打击后，6月起出动1000余人对琼文地区进行“扫荡”，总队以主力一部西渡南渡江，插入敌后琼山、海口郊区活动，并向琼山西部发展，与第3大队打通联系，同时，在琼山第一区建立游击区，迫敌撤退。

1939年6月，新任国民党广东第9区行政督察专员吴道南来琼后，反共磨擦变本加厉，削减直至停发独立总队军饷，迫令将独立总队缩编为1个大队，并派部队向琼文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周围推进，企图消灭独立总队。

为了避开敌顽夹击，保存力量，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琼岛长期抗战，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决心将领导机关转移到琼崖西部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10月下旬，总队对日军的重要据点那大，进行了军民联合的围攻战。独立总队在国民党情县县长陈宗舜和各乡镇行政人员支持下，动员民兵1500人，

持火药枪的群众 2000 余人，中共儋县县委领导的武装 200 余人，加上第 3 大队 200 余人，共 4000 余人。10 月 21 日，围攻开始。那大驻日军 100 余人，另有伪军 1 个中队，共 200 余人，围攻持续到 11 月 5 日，那大日军因给养断绝，孤立无援，乘夜晚突围向儋县县城新州逃去。6 日晨，那大被攻克，伪军中队 80 余人被俘。

12 月琼崖特委在琼文游击根据地召开会议，决定特委和总队领导机关由文昌地区向西南的临高、儋县、白沙交界的纱帽岭地区转移，并决定抽调第 1 大队第 2 中队、第 2 大队第 6 中队和原特务中队合编组成特务大队，掩护领导机关西移。第 1、第 2 大队主力仍留琼文地区活动，后成立东路指挥办事处，符振中为指挥，陈乃石为政治委员。

1940 年 1 月 25 日，琼崖特委及独立总队领导机关开始向西转移，2 月中旬到达琼山、澄迈、临高交界的美台地区。这时，那大及其附近地区已被日军重新占领和控制，特委及总队遂决定在美台地区创建根据地。

特委和总队在美台地区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在仁兴、岭仑、岭南、和安、兰洋、南坤等乡组织了“农民抗日救国会”、“青抗会”、“妇救会”等抗日民众团体。为加强根据地党组织建设，成立了中共美合特区委员会（书记谢志德），由特委直接领导。为发展抗日武装，积极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美台周围各乡有 100 多名青年加入独立总队，美合还建立了一支 70 多人的美合自卫队，其他各乡村也组织了自卫队。同时，活动在昌江的第 3 大队第 9 中队扩编为第 4 大队，以第 3 大队第 8 中队为基础扩编成立了第 5 大队。1940 年 7 月，成立了西路指挥办事处，马白山为指挥，符荣鼎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 3、第 5 大队。1940 年夏，在美合根据地创办了琼崖抗日公学。公学办了两期，培养学员近 1000 名。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琼崖的抗日斗争，在 1940 年 1 月 26 日和 3 月 11 日的电报中指出：冯白驹部应作长期坚持计划，在琼崖放手开展工作，驱除一切汉奸反动势力，领导全岛人民抗日；不要依靠国民党发响，要自力更生，扩大部队，并委派县长，建立区乡政权，为了加强琼崖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还派庄田、李振亚、覃威等领导干部和机要通信干部于 1940 年 7、9 月先后来到琼崖，使琼崖和延安一度沟通电台联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特委和独立总队领导机关作了调整和充实。特委由冯白驹任书记，李明任副书记；总队由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总队长，李振亚任参谋长，王业高任政治部主任。

在总队领导机关调整充实的同时，特委和总队于 1940 年 9 月决定撤销东、西路指挥办事处，改设支队，将活动于琼文根据地的第 1、第 2 大队合编为第 1 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和警卫连；将活动于澄迈、临高、儋县的第 3、第 5 大队合编为第 2 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和警卫连；特务大队和第 4 大队直属于总队。

到 1940 年冬，独立总队已由 1938 年 10 月改编时的 300 余人发展到 3000 余人，枪 2000 余支，活动遍及琼山、文昌、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万宁、琼东、乐会、定安等 11 个县，建立了琼文平原根据地、美合山区根据地、六连岭根据地和澄临儋、昌感等地区的小块游击根据地。独立总队已成为琼崖抗战的主要力量。

1939 年、1940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经过艰苦频繁的战斗，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和“扫荡”，巩固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了华

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到 1940 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总兵力扩大到 50 余万人。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关键性的两年。日军停止战略进攻后，将作战重心转向对付抗日游击战争，依恃其兵力和装备的优势，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消灭和驱逐抗日武装，恢复和巩固其占领区，以挽回在后方的失败。敌后战场斗争的形势，直接关系到能否给敌军以大的消耗和削弱，迅速发展壮大自己，逐渐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敌后争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中国战局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执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将侵略者陷入全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正面战场作战中曾骄横一时的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作战中陷入了被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使敌难以应付，不断的袭击、伏击使敌受到沉重的伤亡消耗。在对付日军“治安肃正”作战的两年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日军巩固占领区、扩大对“面”的占领的企图，取得了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使战局出现了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大变化，它对坚持持久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具有深远意义。

第二十二章 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有限攻势

第一节 1939 年武汉外围地区的三次会战

武汉会战后，日军华中派遣军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在撤销第 2 集团军时，将第 2 集团军所属的第 13、第 16 师及派遣军直辖的第 3、第 9 师，均转隶第 11 集团军，使第 11 集团军兵力扩大到 7 个师（即第 3、第 6、第 9、第 13、第 16、第 101、第 106 师）。

1939 年 1 月 19 日，第 11 集团军增加独立混成第 14 旅，3 月 15 日，增加第 33、第 34 师；同年 6 月至 7 月，第 9、第 16 师先后调回日本。

在武汉外围的中国守军，长江以南是陈诚、薛岳指挥的第 9 战区，有 52 个步兵师；长江以北为李宗仁指挥的第 5 战区，有 34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1 个骑兵旅。

面对武汉地区周围中国守军将近 100 个师的包围态势，日军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打击国民党军，以动摇国民党军的抗战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为此，日军在 1939 年 3 月、5 月、9 月先后发动南昌作战、襄东作战（即随枣会战）和赣湘作战（即第一次长沙会战）。

一、南昌会战

南昌是江西省省会，南浔、浙赣铁路相交其南。武汉会战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曾企图攻占南昌。但由于其第 106 师在德安西北万家岭遭中国第 9 战区第 1 兵团沉重打击，未能渡过修水，乃决定待武汉会战结束后再进攻南昌。

1939 年 1 月 31 日，日军第 11 集团军制定了南昌会战指导策略，2 月 6 日，华中派遣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3 月 9 日，日军确定 3 月 20 日发起攻击。日军作战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掩护其长江中下游交通，以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其部署是：以第 101、第 106 师，并集中重炮兵 4 个团又 1 个营，坦克 1 个团又 1 个营，攻占南昌；以第 6 师主力从修水两岸地区向武宁、三都附近攻击，阻止国民党军增援南昌；另以第 101 师村井支队从都阳湖西北岸星子南下，在吴城登陆，打通赣江及修水水道，切断浙赣铁路，日军驻华航空兵团主力以及中国方面舰队第 2 联合航空队、第 1 根据地队协助第 11 集团军作战。

2 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判明日军有攻占南昌的企图。3 月 8 日，蒋介石致电薛岳：“第 9 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 3 月 10 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 3 月 15 日。”薛岳以部队整训未毕，补给困难，提请延期实施。在此期间，日军抢完于 3 月 17 日开始攻击。

当时第 9 战区在赣北、湘北的部署概要如下：

第 19 集团军罗卓英部防守南昌地区，该集团军以第 70、第 49、第 79、第 32 军及第 29 军预备第 5 师，于箬溪以东修水南岸至都阳湖西岸，由西向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朝云新闻社，1983 年版，第 351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 784 页。

东并列防御；第 30 集团军王陵基部第 72、第 73、第 78 军防守武宁地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樊崧甫部第 8 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占领防御阵地；第 31 集团军汤恩伯部任鄂南、湘北守备，第 1 集团军卢汉部及第 74 军控制于长沙、浏阳、醴陵地区，为机动部队。

3 月 18 日，日军第 101、第 116 师各一部，由星子乘军舰、汽艇南下，向吴城镇进攻，中国守军第 32 军等部进行顽强抗击，激战至 22 日，日军进攻仍来得逞。23 日晨，日军在优势的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分 3 路围攻吴城，并不断发射燃烧弹和毒剂弹，守军伤亡惨重，于 24 日放弃吴城。

3 月 17 日，日军第 101 师一部，从永修东面修水支流向第 79 军防地逼进。18 日，张公渡、永修间日军第 106、第 101 师开始炮击修水南岸阵地。3 月 20 日 16 时 30 分，日军开始总攻前的炮火准备，以猛烈炮火，间以毒剂弹轰击第 49、第 79 军阵地达 3 小时后，主力由虬津方面强渡修水。当时因下雨修水水位上涨，虽对囚渡不利，但水位上涨却使守军前沿阵地被淹，水上障碍物大部分被冲走。日军顺利渡河，占领了前沿阵地，尔后向纵深发展，并以坦克部队配属第 106 师，实施快速突击。

日军一部沿南浔线攻击，在修水南岸涂家埠遇到顽强阻击。

22 日 17 时，日军坦克部队攻占安义，21 时进占奉新，23 日，日军第 106 师进入奉新。日军继以第 106 师一部西趋高安，阻击对方援军；主力由安义、奉新左旋扑向南昌。南昌只有保安部队，罗卓英急令第 32 军由修水南岸涂家埠一线退守南昌，至 26 日，第 32 军只有 2 个团到达南昌。此时，日军坦克部队逼近南昌西北赣江桥，守军奋勇炸毁桥梁，将敌阻止。日军步兵由南昌西南曾家、生米街横渡赣江，切断浙赣铁路。27 日，日军猛攻南昌，经过激烈巷战，守军伤亡甚重，奉令向进贤撤退。

武宁方面，日军第 6 师主力自 3 月 20 日由箬溪附近开始攻击武宁东北守军第 8、第 73 军阵地，22 日，又以一部由巾口南渡，进攻第 78 军阵地，激战数日，双方伤亡均重。至 27 日，第 9 战区第 72 军接换武宁东北防务，继续阻敌西进。日军再度发动进攻，并以一部迂回第 78 军右翼，该两军被迫后撤。29 日，日军攻陷武宁。第 30 集团军退守烟港街南北一线，与日军对峙。

4 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罗卓英统一指挥第 3、第 9 战区各一部共约 10 个师反攻南昌。方针是：“先以上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

21 日，反攻开始。第 9 战区第 1 集团军第 184、新编第 10 师，向奉新日军攻击；第 11 师主力监视靖安日军，一部向滩溪挺进，至 24 日，日军退守奉新。第 74 军主力向高安附近日军攻击；第 74、第 49 军各一部北渡锦江，向大城、生米街一带日军攻击，至 26 日，克复高安、大城、生米街，并一度攻入牛行，日军退守高安东北一线。此后，第 9 战区部队进展困难，无力切断南浔线。

第 3 战区第 32 集团军，以第 16、第 79、预备第 5 师及预备第 10 师一部，于 23 日渡抚河向南昌方向攻击，至 26 日，克复南昌东南市汉街，逼近南昌。27 日，日军第 101 师得到海军陆战队支援，进行反扑。第 32 集团军攻击受阻，遂以第 26 师加入战斗。到 5 月 5 日，攻克南昌东侧的飞机场及南昌火车站。7 日，南昌日军与前来增援的第 116 师，在航空兵配合下，不断反击。

第 32 集团军伤亡很大，所属第 29 军军长陈安主中将殉国，攻击受挫。5 月 9 日，奉令停止反攻。

日军此次进攻南昌，在主攻方面，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采取佯动佯攻等手段，钳制对方。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凸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点，这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守军在修水南岸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便全局被动。在防区被突破后，没有彻底破坏交通，致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突进。

二、随枣台战

1939 年 5 月初，日军第 11 集团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 5 战区军队与敌展开了为期 20 余天的随枣会战。

武汉会战后，鄂中沙市至已东一段长江江防、鄂北、豫南、皖东大别山区划归第 5 战区，第 5 战区地处国民政府中枢门户的川东要冲，辖第 11、第 21、第 22、第 29、第 33 等 5 个集团军和江防军。其部署是：江防军（司令郭忏）担任长江沿岸及襄河（襄樊以下的汉水）以西防务；第 29、第 33 集团军组成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担任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防务，重点置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第 11、第 22 集团军组成左集团（总司令李品仙）担任大洪山外翼，经随县城至信阳外围防务，重点置于襄（阳）花（园）公路方面；以第 21 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在大别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战区采取“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便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同时与平汉路东大别山区内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威胁平汉路的交通”的战略。

1939 年 4 月上旬，第 5 战区向随县以东地区及安陆、应城、天门等地区出击，并向平汉路南段（武胜关以南）袭扰。同时，第 31 集团军汤恩伯部（2 个军 6 个师 2 个独立旅），由湘北转用于枣阳方向。

早在 1939 年 3 月 22 日南昌会战之时，日军第 11 集团军就已得知中国军队将发动攻势和第 31 集团军移调枣阳以南地区的情报。3 月 28 日，制定了打击第 5 战区主力的《作战指导大纲》。4 月中旬，日军第 33、第 34 师到达武汉，第 11 集团军兵力达到 9 个师 1 个旅，随即制定了《会战指导大纲》，决定乘新部队到来老部队尚未离开的机会，在 5 月上旬采取快速奔袭，在枣阳附近捕捉和歼灭第 5 战区主力兵团。

日军计划先以第 3 师从桐柏山南麓地区快速奔袭，突破第 5 战区左翼，将对方相当力量钳制于该地区，并以一部由信阳向桐柏县方向迂回；尔后，以主力第 13、第 16 师、骑兵第 4 旅，由钟祥及其以东地区，向枣阳南侧及其西北地区迂回突进，围歼第 5 战区主力于枣阳周围地区。

4 月下旬，第 5 战区在日军大部队向鄂中集中的情况下，停止攻势行动，调整部署，准备应敌。李宗仁对当面敌情判断为：“不下三师团之敌，将以主力由浙河及其以北地区西向，有力之一部由钟祥附近北向，夹击我在襄河东岸之主力兵团。”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36～537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 826 页。

第5战区决心以主力实行攻势防御，粉碎日军企图，长久保持襄河东岸地区；襄河西岸地区部队一部渡河攻击，竭力钳制日军兵力，以利主力作战。战区将主力控制于襄花公路方面，以左集团第11集团军、第31集团军负责该方面防务。以第22集团军为第二线兵团，其第41军位于唐河、自河及襄河右岸；第45军集结于茅茨畈，暂归李品仙指挥，准备对钟祥方面使用。

5月1日，日军第3师开始向随县地区发动进攻。日军由应山以西的淅河、徐家店一线进攻守卫郝家店、孙家寨之线的第84军第173、第174师，当日陷郝家店、孙家寨。第173、第174师乃转守塔儿湾。第二天，日军猛攻塔儿湾，并向守卫高城附近的第13军第89、第110师发动攻击。经两天激战，4日，塔儿湾失守。高城阵地，亦被迫放弃。第13军所部转守漂水西岸阵地。此后，日军遭到越来越顽强的抵抗，5月8日以前，日军未再获进展。

5月5日，日军主力第13、第16师及骑兵第4旅，向第5战区右集团发起进攻。日军由京山、钟祥以北三阳店、洋梓一线向第59军第180、第38师，第77军第37师发动猛烈攻击。迅速突破长寿店、流水沟及其附近阵地。第59军一部退守襄河西岸，一部北退，日军跟踪前进。7日夜，日军进入滚河一线。8日，日军攻占枣阳，一部进抵襄花公路双沟（樊城东北约30公里）附近，切断了左集团后方联络。

为使左集团摆脱日军前后夹击的地位，第5战区随即调整部署，命令左集团主力依桐柏山，面对随枣盆地占领侧面阵地，侧击北进之敌，不得已时，则分向唐河、新野撤退；并以第39军及第13军一部，分别留置大洪、桐柏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8日，第84军第二线阵地被日军第3师突破，遂于9日开始向唐河、白河西岸转移，14日到达方城。

10日，日军主力方面陷湖阳镇、新野，驻信阳日军第3师1个团迫近桐柏县城，日军合围即将告成。当晚，第31集团军在第1战区第68军第119师掩护下，向泌阳转移。

12日，日军攻陷唐河及南阳，遭牟庭芳部（第121师）与第2集团军反击，被迫退出南阳，集结于枣阳以北地区整理。

此时，中国第2集团军从西兴集、保安寨出动向唐河南岸反攻；襄河两岸右集团和江防军袭击日军第13、第16师侧背。从13日起，日军被迫开始撤退。第5战区利用主力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态势，下令各部队尾随追击。

14日，第2集团军第30军击退唐河方面日军。16至19日，坚持大洪山的第39军，在大洪山北侧长岗店一线阻击南返的日军第3、第13师各一部，予敌重创。至24日，第5战区先后收复枣阳、桐柏等地，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均退回原地区，至此，大体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这次会战，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尸5000余具。第5战区也受到较大损失。这次会战，第5战区进退主动，适时转移外线，立于有利地位。日军撤退时，追击、阻击得力，取得较大战果。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430页。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1页。

三、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开始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见附图10）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湖南省乡长沙。该地遭大人浩劫后已逐渐恢复。武汉、南昌会战后，第9战区与日军对峙于洞庭湖东北岸、新墙河北岸、通城、武宁、奉新东南，以及锦江两岸，对当面日军“不断采取游击及反击行动”。

1939年8月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开始调整和集结部队。9月1日又下达了临战准备命令。日军企图集中兵力打击第9战区主力兵团，稳定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借以挫伤国民党军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并推进汪精卫伪政权出笼。其部署是：以集团军主力（第33师、第6师主力、第3师上村支队、第13师奈良支队以及集团军直辖部队），由岳阳及其以东地区南进，在汨罗江畔平江周围地区围歼中国第15集团军；以另一部（第106师主力配属第101师佐枝支队等），由赣北靖安、奉新及其以南地区西进，消灭高安附近之中国守军，尔后转向修水上游策应湘北方面作战。

日军参战兵力有步兵约10万人，陆军航空兵团第3飞行团（支援作战飞机约100架）及海军一部。

早在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即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4月15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9战区：

“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如此，则我军必须在岳麓山构筑坚强工事，并附有力炮兵，俾得射击敌舰与长沙，惟须先行指定目标，测定距离。”

5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又致电第9战区：

“赣北方面，以游击战消耗钳制敌人，对该方面之敌予以反击。

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高安方面，我军须纵深配备，并准备敌如进攻高安时，应自主的放弃高安，诱敌深入而侧击之。”

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有进攻长沙的可能，遂遵照军事委员会上述指示，制定了“战区决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军，以利我主力方面之作战”的方针，加紧调整部署，严整战备。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湘赣公路、湘鄂公路及九江、武宁、平江、长沙间公路，粤汉铁路岳阳至株洲段、湘赣铁路株洲以东，都在民众的支援下进行破坏或者拆毁，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及重炮兵难以行动。

第9战区可使用兵力为47个师，其中32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人）以及海军布雷队一部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截至9月14日，其兵力部署是：第20集团军霍揆章部6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西岸；第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78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0页。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72页。

15 集团军（8 个师）以第 52 军主力守备新墙河阵地，第 79 军守备长安桥至麦市间阵地，第 37 军守备湘阴以北湘江亘汨罗江右岸阵地；第 27 集团军杨森部第 20、第 73 军共 4 个师以及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 8 军等 2 个师又 2 个挺进纵队位于湘、鄂、赣边幕阜山区；第 30 集团军第 72、第 78 军共 4 个师守备武宁以西蒲田桥、琵琶山一带阵地；第 1 集团军第 58、第 60 军共 4 个师守备靖安、奉新以西张家山、麻下、会埠一线阵地；第 19 集团军第 32、第 49 军共 4 个师，守备莲花山、马形山以及锦江右岸阵地，第 4、第 70、第 74、第 5、第 99、新编第 6 军和第 11 师共 15 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分别集结于长沙以南以东的湘潭、株洲、衡山、衡阳，浏阳，及赣北上高、宜丰、万载等地。

9 月 14 日夜，日军在赣北开始钳制性攻击。第 106 师以主力由奉新、靖安一线西犯，至 18 日，已先后侵占第 1 集团军守备的会埠、上富、村前街等地，威胁高安左侧背。同时，日军第 106 师配属的第 101 师佐枝支队由大城南犯，18 日侵占祥符观，续向高安逼近。第 32 军于 19 日放弃高安。

20 日，日军第 11 集团军命令第 106 师在消灭高安附近之中国守军后，以一部掩护左侧背，主力进入修水、三都附近，切断第 30 集团军和湘鄂赣边挺进军的后路。据此，日军第 106 师即以佐枝支队在奉新西南地区实行防御作战，以 1 个旅开赴武宁，主力则在上富镇附近集结，准备西进。

当日军进攻第 1 集团军和第 32 军时，在安义游击的第 1 集团军第 183 师回师南进，18 日，趁日军撤退之机，占领上富。17 日，第 74 军由上高、宜丰、万载地区推进至高安以西之灰埠、泗溪、棠浦一线，19 日攻占村前街。21 日，第 32 军一部乘夜在左家渡附近北渡锦江，奇退日军，于 22 日晨克复高安。

在湘北，9 月 18 日起，日军第 6 师及奈良支队连续攻击第 52 军新墙河北岸警戒阵地，第 52 军逐次退守新墙河南岸。至 22 日。第 195 师仍顽强坚守在北岸比家山据点。9 月 23 日晨，日军第 6 师、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突破守军阵地。第 52 军退守新墙河东南高地。

日军上村支队于 9 月 22 日 18 时由岳阳启航，23 日晨，一部在洞庭湖东岸鹿角登陆，主力迂回归罗江口以南，在营日登陆，突破第 70 军第 95 师阵地，继续向东南突进，企图切断粤汉铁路和长沙，平江间公路。

鄂南方面，日军第 33 师于 9 月 21~22 日由通城附近出动，进攻第 79 军前进阵地。23 日，攻陷第 79 军主阵地麦市，24 日攻占桃树港，续向福石岭攻击。日军第 33 师企图楔入渣津，切断第 9 战区湘北、赣北间主要联络线，尔后向平江地区进攻，协同日军第 6 师、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围歼第 15 集团军。

9 月 24 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湘北战局紧张，召开最高幕僚会议，确定：

“第 9 战区作战，应……保持幕阜山根据地，在铁路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则以有力兵团相机予以打击，尔后依状况将主力逐次转移株洲、浏阳、醴陵地区；并以第 4 军控制于湘潭方面，掩护湘、桂、黔各路。”

并命令在广西全县训练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 5 军以主力推进

衡阳，1个师推进衡山，准备增援湘北作战。

25日，第52军主力向汨罗江南岸转移。日军第6师、奈良支队跟踪南进，逼近旧罗江北岸，一部伪装难民，偷渡汨罗江，袭占新市。上村支队一度占归义，被第70军反击克复。26日，日军猛攻汨罗江南岸，激战竟日，但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区福石岭，日军围歼第15集团军于汨罗江畔的企图破产。

日军第11集团军乃决定：“以主力向东迂回，在平江周围消灭预想从通城以南地区向南退却之敌兵团”，

27日命令第6师、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向平江及其西南地区突进。

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以第2、第25、第59、第60、第77、第195师共6个师，埋伏于福临铺、上杉市、桥头驿地区和长沙及其以东地区；第70军转移至浏阳河以南株洲、渌口市等地，沿湘赣铁路和渌水布防；第4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不含）之线；第79军一个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两个师协同第20军攻击桃树港之敌第33师。

9月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迂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作战。日军第6师、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77师伏击圈。第6师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第566旅的伏击。30日，第25、第60、第195师向永安市（捞刀河南）、上杉市、石门痕日军猛烈反攻，日军已无力再南进。

日军第33师，27日屡攻福石岭不下，遂以主力绕福石岭以西向南突进，攻占龙门厂，30日攻占朱溪厂。主力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在献钟以西三眼桥与奈良支队先头部队会合。此时，第79军尾蹙日军第33师南下，开始向嘉义、献钟日军攻击；第20军向长寿街、龙门厂、朱溪厂日军攻击；第8军正由通山以东地区兼程南下，准备协同第20、第79军夹击日军第33师。

赣北方面，9月23日，日军第106师主力开始向修水方向西进。26日，其右纵队经九仙汤、沙窝里突进了修水东南约30公里处的黄沙桥，为第72军新编第15师堵截。左纵队至25日攻占上富、横桥、甘坊。第9战区为防止日军继续西犯，26日命令第32军由高安向万载集结，准备开赴铜鼓布防。第9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命令第60、第74军围歼日军第106师左纵队。25~29日，该两军遵令攻击甘坊、冶城一带日军，27日，第74军第57师克复上富，遮断日军退路，并逐渐将日军包围于甘坊附近。

日军第11集团军见主力方面不断遭到伏击、侧击和夹击，赣北方面第106师处境不妙，意识到态势日益不利，遂于29日下令撤退，同时命令第33师经渣津东攻修水，接应第106师。

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4日，又克复汨罗、新市等处。至9日，第195师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10月5日，日军第33师东窜修水城。10月6日，日军第106师在第33

师策应下，开始由沙窝里分向奉新、靖安、武宁撤退。守军各部开始反击，当日，第 15 师攻克郭城市，向沙窝里挺进。第 51 师攻克桐木石，向九仙汤挺进。9 日，第 30 集团军克复修水，15 日克复三都，并继续追击，逐步恢复原阵地。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集中兵力 10 万之众，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 9 战区第 15 集团军的作战目的，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大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两次会战相比，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对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 2 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 3 万余人。

长沙会战期间，1939 年 9 月 23 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 11、第 13、第 21 集团军。西尾寿造上将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同时，解散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

第二节 抗击日军封锁中国大陆的作战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切断了中国由香港到大陆的主要国际交通线，但中国仍能由华南沿海西江地区、深圳、汕头以及桂越公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输入部分补给物资。为了进一步增加中国坚持抗战的困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便把切断中国对外联系、封锁中国大陆，作为侵华的重要战略。因此，日军于1939年1月15日侵占涠洲岛，2月入侵海南岛，6月在汕头登陆，8月占领深圳，11月进攻桂南，企图实现对中国的彻底封锁。

一、海南岛、汕头沦陷

日军早就企图侵占海南岛，以便把它作为南进的跳板和轰炸中越、中缅交通线及封锁华南沿海的基地。

1939年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攻占海南岛。日军大本营1月17、19日指示第21集团军以饭田支队（1月31日改称台湾混成旅）协同海军第5舰队在2月上、中旬“攻占海口附近要地”，而后“海军伺机占领榆林港附近”。

2月8日晚，日军从珠江口的万山群岛启航，10日凌晨在海南岛北部澄迈湾东北角开始登陆。当地武装保安队抵抗微弱。当日，日军占领海口及琼山县城，接着占领了定安、青澜港。

中国共产党人冯白驹领导的独立队，曾开赴南渡江重要渡口潭口，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构筑工事，阻敌渡江，后转到琼山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2月13日，日本海军3个陆战营，从琼州海峡出发，14日在三亚港登陆，占领三亚、榆林。尔后，日军南北对进，侵占海南全岛。蒋介石发表谈话称：日军入侵海南岛，等于发动太平洋上的“九·一八”。

广州失守后，汕头成了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补给物资由此经潮（州）韶（关）公路输入内地。1939年6月6日，日军大本营命令第21集团军与海军配合攻占汕头一带要地。9日，该集团军与海军第5舰队确定了具体协同计划。

6月21日，日军第104师一部及海军陆战队等共万余人，在海军舰队和航空兵的支援下，于汕头海岸登陆，潮州、汕头地区守军第4战区第9集团军独立第9旅和部分保安部队对登陆日军进行了抵抗。次日，日军占领汕头，27日占领潮州。

此外，8月14日拂晓，日军第21集团军以第18师1个团又1个营在宝安附近登陆，当日占领深圳，次日占领沙头角一带。

二、桂南会战

南宁位于邕江与桂越公路交点上，为中国国际交通线上的战略要点。桂越公路由越南那岭经广西龙州至南宁，南接海防经河内、凉山、同登至那岭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37—338页。

铁路。

1939年9月，中国开始在那岭至龙州间的水路上（左江）利用帆船内运。滇越铁路由海防至云南昆明，1938年5月后的一段时间内，每月输入物资3000吨。滇缅公路从缅甸腊戍经云南畹町、保山至下关，长735公里，南连仰光至腊戍铁路，中国购买的军用品多由此进口。1938年12月，从仰光转运第一批军用品沿滇缅公路到了昆明。1939年前11个月中，滇缅公路输入物资27980吨。

从1937年9月27日起，日本外务省多次与法国谈判，要求禁止中国由越南输入物资。欧洲战争爆发后，日军企图利用法、英卷入对德战争的时机，攻占南宁及尤州等桂南要地，直接切断桂越公路，建立航空基地，更有效地轰炸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彻底切断中国西南补给线；并配合汪精卫在两广策动政治分化的阴谋；还准备以桂南为跳板，伺机南进法属印度支那。

1939年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切断南宁公路补给线的作战命令。10月19日，中国派遣军命令第21集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第5师、台湾混成旅共约3万人，另有第5舰队、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支援作战，以陆、海军协同“在钦州以南地区强行敌前登陆，首先迅速进至钦州及防城附近，然后攻占南宁附近各要地”。上述参战日军于11月上旬集结于海南岛三亚港。

中国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受佳林行营指挥，担负两广地区的防御任务。第4战区以第16集团军夏威部第31、第46军共6个师又4个独立团，守备桂南及粤南东兴至阳江一带海岸。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军队准备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军事委员会判断短时期内日军不致进攻桂南，第4战区乃将第64军两个师由明城、鹤城附近调往西江以北地区，配合冬季攻势，遗防由第31军接替。在此之前，第16集团军判断，日军若欲进攻桂南，最有可能以主力由粤南沿海电白、水东、梅菪登陆，经玉林、贵县向宾阳前进，威胁南宁；而由钦县、防城地区登陆的可能性不大，并据此制定了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水东、茂名、北流一线以西粤南、桂南只有第46军2个师又2个独立团防守，兵力单薄。

11月13日，日军从海南岛三亚港起航，15日晨，日军第5师利用疾风暴雨的天候，突然在钦州湾企沙、龙门登陆，分路北上，16日下午陷防城。16日晚，台湾混成旅在钦州湾东岸登陆，17日攻占钦县，接着进入小董附近。

由于桂南守军兵力空虚，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使优势日军迅速深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令第5军由湖南衡山乘火车至桂北永福，在宾阳集中后向南宁前进；另派第99军从湖南湘潭及贵州贵阳向柳州集中；令第36军自重庆及湖北当阳南下，在宜山附近集中。

日军进展迅速，其第5师击溃邕江以南第46军新编第19师后，11月22日傍晚已进抵邕江南岸，从东南、正西夹攻南宁。此时只有第5军第200师1个团赶到南宁附近，与刚调到南宁的第46军6个团一起仓促应战。24日，被迫放弃南宁。

南宁以北是错综复杂的山岳地带，与内地联系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由南宁北上经20公里处的高峰隘到武鸣，另一条是由南宁向东北延伸经50公里处的昆仑关至宾阳的邕宾公路。

12月1日，日军推进至高峰隘，4日夺取昆仑关，控制了南宁北通内地的两条交通道路的要隘。

南宁失守，不但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而且日本航空兵以此为基地将危害西南大后方。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心收复南宁，责成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到迁江亲自指挥作战，除令空军（飞机约100架）、炮兵（2个营又2个连）、坦克支援外，并继续抽调步兵第66军由江西吉安赴宾阳参战。桂林行营令第4战区部队于昆仑关、高峰隘以北地区占领阵地，钳制当面之敌，掩护主力集中。12月中旬，奉命参战各部（共约14万人）大部陆续抵达战场。12月16日，桂林行营下达作战命令，作战方针是：

“军以攻击北攻之敌，收复南宁之目的，乘敌后续部队未到以前，一举转移攻势，将敌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而歼灭之，攻击开始时机，预定12月18日拂晓。”

其兵力具体部署是：北路军（第38集团军徐庭瑤部第5军、第99军第92师）以主力从宾阳方面、配合坦克，攻击昆仑关，一部切断南宁至昆仑关敌之联系，歼灭昆仑关之敌，而后协同其他部队攻取南宁；东路军（第26集团军蔡廷锴部第46、第66军共4个师），以陆屋，灵山为根据地。配合地方武装，破坏郁江以南敌后交通，阻敌增援昆仑关；西路军（第16集团军夏威部4个师及地方武装）以2个师攻击高峰隘之敌，将敌主力吸引于该方面，一部袭扰郁江以南敌后交通，一部进至巨宾路之四塘，阻止南宁日军增援昆仑关；第99军第99、第118师为总预备队，于宾阳古辣附近待机。

邕宾公路由昆仑关向南，依次为九塘、八塘、七塘、六塘、五塘、四塘。防守八塘及其以北地区的日军为第5师骑兵第5团、步兵第21团、第42团第2营。昆仑关为日军主阵地，由步兵第42团第2营、炮兵2个连又1个排据守。日军占据昆仑关制高点，构筑坚固工事并加设移动铁丝网。

第5军决定以一部攻取昆仑关，以主力于八塘、七塘间包围日军而歼灭之。12月18日，第5军以荣誉第1师为左翼队向昆仑关正面攻击；以新编第22师为右翼队进攻五塘、六塘，阻敌增援；以两个补充团为左侧支队向七塘、八塘间进行钳制活动；第200师为预备队。18日下午，日军第5师第21团团团长三木吉之助率团主力由南宁乘汽车赶到九塘，指挥昆仑关作战，桂林行营也令总预备队第99军的两个师向日军后方七塘行包围攻击。

19日，荣誉第1师挫败日军第21团的反击，继续攻击昆仑关。此时，第99军攻占山心和七塘，切断了昆仑关日军后方交通。

20日，第5军以第200师增强昆仑关方面攻击力量，坦克一度冲入昆仑关。21日，割裂九塘与昆仑关日军联络；中国空军出动飞机支援地面部队的攻击，向当面日军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日军第21团已完全陷入包围。

邕武路方面，西路军向高峰隘等地攻击。

19日，第135、第170师克复香炉岭、高峰隘。

20日，又克新圩。不料日军由高峰隘以东山道窜入，攻击部队翼侧受到威胁，遂撤至葛圩附近。

日军第5师鉴于其第21团在昆仑关、九塘地区被分割包围，乃急派第21旅旅长中村正雄少将率部增援，并命令正开赴龙州的第9旅急速遣回1个营。

20日10时,中村支队(2个营为基干)从南宁出发,行至五塘附近时,即不断遭受伏击和阻击,24日16时30分,其先头部队突破重围到达九塘。五塘到九塘25公里路程,中村支队连续处于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中,4天4夜的苦战突围,虽未被全歼,但伤亡极其惨重。中村正雄途中多次中弹,苟延到25日终于毙命九塘。由南宁出援的第21旅第42团一部,在邕宾公路上也连续遭到包围,经不断突围才于24日艰难地通过八塘。

23日,日军第5师又命令第9旅主力由龙州“排除万难,日夜兼程向南宁急进”。24日,第9旅主力开始返回,27日行抵山墟附近,为西路军第188师及龙州教导总队包围截击,直至29日才回到南宁。为支援在昆仑关地区陷入困境的第5师,台湾混成旅主力在东路军阻击下,虽经南宁进入七塘、八塘,并于28日与九塘日军取得联系,但因受公路两侧高地阻援部队的夹击,再无力前进。

28日,桂林行营增调第66军第159师攻击昆仑关以东敌据点,29日,第5军以步、炮、坦克协同,对昆仑关再次发动猛烈攻击。

30日,以新编第22师超越第200师,左与第159师,右与荣誉第1师并列,继续围攻昆仑关。至31日,终于攻克昆仑关,该地日军除一部突围外,大部被歼。

接着,第5军于1940年1月4日攻占九塘,11日攻抵大潭至六落之线,尔后,第38集团军在该线与日军对峙。

攻取昆仑关,是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军兵种协同配合,对日军攻坚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它使日军第5师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其第21旅旅长以下被歼灭者超过半数。中国军队牺牲也大,仅第5军就伤11100人,阵亡约5600人,失踪约800人。

在广东,1939年12月24日,日军第21集团军以第18、第104师及近卫混成旅等部开始进攻粤北,企图攻占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韶关。由于桂南方面第5师处境危急,安藤利吉决定攻下翁源后,即将兵力向桂南转移,并于12月29日命令第5师“仍然要确保南宁及附近要地,以便于转用兵团的到来”。1940年1月7~13日,日军第18师、近卫混成旅从海路进到钦县,尔后分别集结于南宁以南和七塘附近。日军在桂南兵力增至7万人左右。此外,日军大本营从关东军调来2个飞行中队支援作战。1月10日,日军第21集团军制定《宾阳会战指导方案》,其部署是:以第5师、台湾混成旅在四塘、五塘间展开,分向昆仑关、思陇突进;以第18师、近卫混成旅分别经甘棠、那河向宾阳迂回,切断昆仑关一带对方补给线和退路。

攻克昆仑关后,为收复南宁,中国军队继续向桂南增调部队。1月13日,前线高级将领开会,确定作战方针为:“以攻克南宁为目的,先确保现态势,待后续兵团集中完毕后,对郁江两岸之敌,同时开始攻击而歼灭之。”并决定郁江南、北两岸,各设统一的指挥官,夏威任南路兵团总司令,吴奇伟任北路兵团总司令。夏、吴二人在同月31日被任命为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

中国军队预定部署是:郁江北岸——第38集团军(辖第2、第5、第6、第36、第99军)和第37集团军叶肇部第66军守备昆仑关及其东西一线,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67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77页。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7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33页。

第16集团军第1纵队2个师在高峰隘以北与敌对峙；郁江南岸——第26集团军（辖第46军、4个独立团）和第16集团军第2纵队2个师又2个团，分由东西两面夹击日军钦邕交通线，阻敌向郁江以北增援和集中。预计参战总兵力15万余人。

1月26日，日军先发制人，发动“宾阳作战”。此时，中国军队后续兵团9个师中的8个师尚未到达指定地点。

1月28日，日军第5师1个旅、台湾混成旅、近卫混成旅主力，在第5师统一指挥下，向邕宾公路以北高地第99军实施步、炮、坦克联合攻击，次日，防守八塘的日军第5师第9旅向西夹击第99军。

在此以前，1月26日，日军第18师从邕江南岸东进，29日攻取永湾，准备北渡邕江。同时，近卫混成旅先遣队攻占鹿颈。桂林行营为掩护左侧安全，急令刚到宾阳的第2军第76师等部向甘棠前进。

30日，日军第18师会同近卫混成旅进至甘棠一线；邕宾路西侧日军亦同时向第99军正面和第36军右翼攻击。

1月28日，军事委员会命令从2月1日起由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负责指挥桂南方面作战，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到桂南协助。张发奎鉴于甘棠为当时桂南战局关键所在，乃调集部队预定2日攻击甘棠之敌，并令第5军主力在迁江一带构筑第二线阵地。

但是，日军2月1日在甘棠方面先机发动总攻。日军第21独立飞行队全部出动，大肆轰炸正向甘棠开进的第6军第49师及后方桥梁。特别是第38集团军总司令部被炸，一时指挥通讯中断，致甘棠北面高地为日军第18师、近卫混成旅突破。2月2日下午，日军近卫混成旅一部窜抵宾阳城郊。宾阳原驻有第5军第200师，日前，第5军奉令撤往迁江构筑第二线防线。第200师主力由宾阳撤走，日军乘虚轻取宾阳。3日，第18师进抵清水河畔邹墟大桥，才为北岸新编第33师阻止。张发奎鉴于宾阳失守，昆仑关一带守军交通补给受到威胁，遂令第38、第37集团军向上林、大览撤退。3日，日军再次占领昆仑关，8日进占武鸣后开始撤退，沿途烧杀抢掠，残暴之极，至13日，大部退回南宁。

为了巩固对两广南部地区的占领、并将它作为进攻中国内地和南进的基地，2月9日，日军大本营下令撤销第21集团军，组成华南方面军，统辖粤南、桂南日军。桂南日军第5师、近卫、台湾混成旅编为第22集团军，原第18师师长久纳诚一任司令官。该集团军在邕江南北岸及钦邕公路设防，伺机行动。

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日军趁机再次向龙州进攻，7月2日占领龙州。9月下旬，第5师一部进入越南，西南桂越、滇越国际交通线随之彻底断绝。第4战区部队利用桂南日军兵力减少的机会，10月13日开始围攻龙州，23日在郁江北岸发起全面攻击。28日克复龙州，30日收复南宁。到11月30日，日军全部被逐出桂南。

在桂南会战中，由于中国军事当局对日军近期进攻桂南的可能性及其登陆的可能方向判断不准确，致使日军在初期未遇坚强抵抗即顺利登陆，并长驱直入占领南宁和昆仑关等要地，控制了桂南的交通要冲。但军事委员会能迅速定下收复南宁的决心，立即由500~900公里以外急调10余个师赶赴战场，并对敌组织空、炮、但等军兵种支援的优势反攻，夺回昆仑关，给敌第5师第21旅以歼灭性的打击，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掌握了桂南战场的主

主动权。这一决定性的胜利，使日军第 21 集团军不得不从粤北抽调第 18 师主力及近卫混成旅增援，以解救第 5 师方面的危局，从而被迫改变广东方面翁英作战的原定计划，放弃进攻韶关而只以翁源为作战目标，造成敌战略上的部分被动。

第三节 1939 年冬季攻势和枣宜会战

一、1939 年冬季攻势

1939 年 10 月，国民党军第 2 期整训完成，部队战斗力有一定加强。适值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可能增兵再攻长沙。为进一步消耗日军，乃决定将整训部队主力分别拨归第 9、第 5、第 3 战区和第 2 战区，准备于 11 月下旬及 12 月上旬，全面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上述 4 个战区为主攻战区，其他战区实施助攻。11 月下旬，军事委员会下达任务，概要如下：

华北方面，第 1 战区攻击开封、博爱，钳制敌人；第 2 战区首先切断正太、同蒲铁路，并肃清晋南三角地带日军；第 8 战区以一部协同第 2 战区作战，主力攻击归绥（今呼和浩特）附近日军。

华中方面，第 3 战区以主力约 11 个师，切断长江交通，分向湖口、马当、东流、贵池、大通、铜陵、荻港间伺隙进攻，一举突进江岸，占领坚固阵地；并以轻炮兵火力及敷设水雷，封锁长江。第 5 战区扫荡平汉线南段信阳、武汉间日军，进取汉口；并向汉（阳）宜（城）公路日军攻击；切断襄（阳）花（园）、汉宜公路。第 9 战区，向粤汉铁路北段正面日军攻击，重点指向蒲圻、咸宁一带，并向武昌挺进；同时攻击南昌及南浔铁路，进击瑞昌、九江日军。

华南第 4 战区以一部相机攻占潮州、汕头，主力扫荡广九铁路及南宁日军。

在华北，原计划以第 1、第 8、第 10 和冀察战区配合第 2 战区作战。但是，国民党顽军以发动冬季攻势力掩护，掀起了反共军事磨擦。此外，驻晋南日军第 37 师先于 12 月上旬开始进攻中条山，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只有第 1、第 8 战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攻势。

第 1 战区：12 月 1 日开始攻击，在豫东，第 3 集团军以豫皖边区游击部队切断开封、兰封附近公路、铁路，第 81 师于 17 日突入一一开封，焚毁日军第 35 师一部的指挥所及仓库；21 日，骑兵第 2 军一度攻入商丘，并击溃由安徽砀山增援的日军骑兵部队。在豫北，12 月 6 日，新编第 5 军、第 47、第 9 军等部队，攻至安阳附近，尔后在汤阴、淇县、浚县、沁阳、博爱等地，破坏交通设施，切断了日军豫北交通；1940 年 1 月 1 日，第 9 军一度攻入沁阳，歼灭日军第 35 师一部。

第 8 战区：以第 35 军攻击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所在地包头；第 81 军一部攻击安北；骑兵第 6 军等部队袭击绥包铁路，阻止日军增援。12 月 18 日开始行动。

20 日拂晓，第 35 军乘驻包头日军一部出城执行任务之机，以便衣队潜入包头，接着，主力部队攻入城内，袭击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及重要仓库，日军骑兵集团第：旅直属队及第 13、第 14 团急忙由萨拉齐、固阳、安北前来救援，第 1 旅直属队当日 16 时到达包头。第 13、第 14 团受到第 35 军阻援部队的围攻损失惨重，第 13 团伤亡过半，第 14 团团团长小林一男上校被击毙。在增援日军抵达包头开始反击后，23 日，第 35 军撤出包头，退回五原地区。

日军驻蒙军为施行报复以除后患，1 月 28 日，以骑兵集团主力（配属独

立混成第2旅1个支队)、第26师及伪蒙军一部乘卡车由包头等地向五原开进。2月3日,突入五原。2月中旬起,日军主力开始撤出五原地区,但在五原留下了伪蒙军和日军桑原特务机关,由绥西警备司令官水川伊夫中将坐镇五原,守备绥西。为巩固对该地的占领,3月初,又派以伪蒙古政府警察队为名义的数百名日军进驻五原。

3月20日夜,第35军反攻五原,激战至22日,击毙日军水川伊夫中将、大桥上校,消灭日伪军4000余人,五原敌军和特务机关被全歼。当驻蒙军派出救援的骑兵集团主力和第26师一部于26日进抵五原时,群众早已空室清野,只剩一座空城。日军唯恐遭受袭击,停留数日将日军尸体收集火化后,仓惶撤离。从此,日军再未敢进犯绥西。五原大捷曾受到军令部嘉奖。

华中方面第3战区:在得到军事委员会加强之第86军、第18军的2个师以及一部分炮兵后,从12月12日起,以第32、第10集团军各一部分别袭扰南昌及杭州日军,第32集团军曾于12、18两日攻入南昌城,予日军以重大打击。第10集团军于13日晚攻入杭州、富阳、余杭各城,破坏了日军指挥机构及仓库。

1940年1月21日,日军由杭州南渡钱塘江,攻陷萧山,并向绍兴袭扰。经第10集团军部队反击,迫敌退守萧山。

第3战区另以第18、第21、第25、第50、第86军共14个师,编为长江方面攻击军,区分为左翼、中央、右翼3个兵团,攻击当面日军第13集团军第116师。

12月16日,各部向获港至贵池一线发起猛攻,到处展开近战肉搏,攻克日军沿江据点多处,到17日晚在大通、莎港间突破日军第116师左翼,挺进至江岸,炮击日舰,布放水雷,一度切断长江航运。20日,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在飞机轰炸和舰炮火力支援下进行反扑,攻击部队遂退守进攻出发阵地,以小部队向江岸钻隙突进,继续袭扰敌人。

第5、第9战区共50多个师统一于12月12日向当面日军第11集团军发动攻势。

第5战区第22集团军第41军第122师第364团在群众协助下,经一夜激战,攻占日军外围据点擂鼓墩,缴获野炮一门;第124师强攻滚山,前仆后继,予敌重创,受到战区长官部嘉奖。

第9战区曾克复靖安及通山、阳新各附近据点。

此次冬季攻势无论是作战规模,还是军队的战斗意志均大大超出日军意料。日军战史写道:

“到了12月12日四周敌人一齐向集团军的所有正面出击而来,其规模之大还是未曾有过的。而经过40天的时间一直到1月20日左右,两军仍然不见胜负。在此期间,我第一线部队几乎都成了一个个孤立的部队,在敌重兵包围中孤军作战,缺粮少弹,伤亡很大……

“敌人的进攻意志极为顽强,其战斗力量不可轻视。在战术上,鼓励采取夜战,隐蔽中接近和包围我军据点,善于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弹进行近战。武器弹药充足,补给能力也很强。”

冬季攻势给予日军相当大的打击。日军竭力掩盖其遭到的损失,但也不得不承认仅第11集团军就伤亡约达8000人。

二、枣宜台战

（一）战前概况

1940年5~6月，日军进攻枣阳和宜昌地区，是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对正面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

早在1939年中国军队进行冬季攻势的初期，日军第11集团军为改变被动局面就打算向宜昌方面进攻。冬季攻势结束后，日军立即准备实施报复性的反击作战。

1940年2月25日，第11集团军制定了《会战指导方针》，其作战目的是：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5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做出贡献。

4月7日，又确定了《第11集团军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方针是：“自5月上旬开始神速地进行机动，首先在连接随县、襄阳一线以北地区，消灭敌第5战区兵团之主力，接着将汉水右岸之敌压缩在宜昌附近消灭之。”

日军认为，进攻宜昌，将沉重打击第5战区。宜昌离重庆仅约480公里，是重庆的门户，攻占宜昌，可以直接威胁重庆，有战略价值，有利于“桐工作”的成功。

日军第11集团军投入枣宜作战的部队，有驻防江北的第3、第13、第39师，从江南调来的第40师、第6师他田支队、第34师小川支队、独立混成第14旅、吉田支队、临时混成第101旅，以及集团军直辖的坦克第7、第13团、野战重炮兵第6旅。此外，中国派遣军从第13集团军派遣第5师仓桥支队、第22师松井支队，还有第3飞行团、中国方面舰队第1分遣支舰队、第2联合航空队、汉水支队协同作战。统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指挥。

1940年3月中旬，第5战区获悉日军将大举进攻。3月24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日军“约下月初、中旬，确有进攻荆沙宜昌之企图”；并命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届时由鄂北直出汉宜公路”，打击西进日军。4月17日，蒋介石提出“此次敌军如果西犯，其目的决不在夺取宜昌与襄、樊，而在打击我军以后，使其可安全退守，此乃必然之势，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亦必佯动”。因而指示第5战区从右集团河西部队以及江防军抽调部队，东渡汉水参战。

4月27日，第5战区确定了《作战指导计划》，概要如下：

方针：战区以一部取广正面，分路挺进敌后方，积极施行袭扰，主力适当控制于后方，相机以先发制敌行动，于枣宜地区与敌决战。

各兵团部署是：江防军司令郭忏，辖第26、第75、第94军、第128师共10个师，于襄河、东荆河右岸阵地极力拒止敌渡河，尔后与右集团协力，在荆（门）当（阳）东南地区与敌决战；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辖第29、第33集团军共12个师，以一部固守襄河两岸阵地，巩固大洪山南各隘路口，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91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453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4~935页。

以主力置于长寿店以北地区，机动击破进犯之敌；中央集团总司令黄琪翔，辖第 11 集团军、第 45 军共 6 个师，于高城至随县以西一线拒敌之进犯，不得已时，转移于唐县、环潭间，俟预备兵团之加入，自两翼包围击破进犯之敌；左集团总司令孙连仲，辖第 2 集团军计 6 个师，于明港、小林店、天河口一线拒敌，并准备以有力部队协力于襄花路之作战。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辖第 31 集团军，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辖第 22 集团军（欠第 45 军及第 123 师），暂位于双沟；大别山游击军总司令李品仙，辖第 21 集团军、豫鄂皖边区游击部队，对沿江敌据点及交通并淮南路之敌进行袭击，以有力部队对平汉南段之敌攻击。

（二）会战经过

枣宜会战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 1940 年 5 月初至 5 月下旬汉水以东枣阳地区的作战，一是从 5 月 31 日至 6 月中旬汉水以西宜昌地区的作战。

5 月 1 日，日军第 3 师和第 40 师石本支队从信阳以北开始西进，向泌阳、枣阳方向进攻，5 日，进占泌阳、桐柏一线。5 月 2 日，日军第 13 师由钟祥沿汉水东岸地区开始北上，向枣阳进攻，翌日，占领长寿店、黄家集等地。5 月 4 日，日军第 39 师和第 6 师池田支队从随县附近向第 5 战区中央集团发起攻击，次日，突破守军高城、安居镇一线阵地。日军企图以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将第 5 战区主力围歼于白河东南枣阳地区。这实际上是一年前随枣会战时日军战术的翻版。根据日军进攻的态势，5 月 5 日下午，第 5 战区下令调整部署：以第 29 集团军担任大洪山游击根据地的作战；豫鄂边区游击纵队及第一游击纵队，担任桐柏山游击根据地的作战；江防军（欠第 75 军）准备以有力部队东渡汉水策应右集团作战；右集团（欠第 29 集团军）主力在汉水东岸围击北犯之敌；中央集团于现地极力阻止敌人，不得已时，主力转移唐、白河西岸；左集团指挥第 2、第 31 两集团军及第 92 军，打击由信阳以北西进日军，万不得已时，转移于唐河两岸之线；原属江防军的第 75 军（军长周岳）、在江防军整训的第 11 集团军第 39 军先向快活铺、宜城间前进，归战区直辖。

至 5 月 7 日，日军各路分别进占唐河、随阳店和汪家集，对枣阳形成包围态势。守军在各阵地进行抵抗后及时转向外线。只有第 84 军第 173 师在枣阳附近掩护主力撤退时，遭优势日军围攻，损失惨重，师长钟毅阵亡。8 日，日军占领枣阳，但围歼守军主力的企图落空。第 5 战区司令长官部由老河口退驻鄂西北均县，李宗仁仍留老河口指挥所。5 月 8 日，日军第 11 集团军宣称“汉水东岸作战的目的已经完成”，下令准备汉水西岸的作战。接着，日军第 3 师准备在樊城东北集结，由樊城、宜城间渡河；第 13 师准备向南收缩，以便在宜城、沙洋附近渡河。

5 月 10 日，蒋致电李宗仁：“希严令张自忠、周岳各部，速向东北方猛攻当面之敌，与孙连仲、汤恩伯两部相协同，击灭敌人要”，“应乘敌态势不利、退却困难之好机，以全力围攻捕捉歼灭之于战场附近，尔后即向应城、花园之线追击。”

据此，第 5 战区向日军展开反攻。以第 2、第 31 集团军及第 92 军由北

向南，第 39、第 75 两军由西向东，第 29、第 33 集团军由南向北；并以第 94 军进出汉宜路深入京山、皂市、应城、云梦地区，攻击日军后方联络线；同时第 7 军及鄂东游击队，攻占了平汉线上的鸡公山、李家寨、柳林车站等据点，第 92、第 66 两军先后克复泌阳、桐柏、明港，对深入枣阳周围地区的日军形成包围之势。

在北线，5 月 12 日开始，第 31 集团军等部由东、南、北三面向正在樊城东北集结的日军第 3 师、石本支队逼近，并连夜进行顽强的攻击。日军粮弹不足，连日陷入苦战。5 月 15 日 12 时，日军第 3 师第 29 旅旅长在致该师师长的电文中说：“敌之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按目前情况看，平安返回甚难，望乞增援 1 个营。另外，希望在白河右岸采取收容措施（连续出现伤员）。 ”

15 日正午，日军第 3 师在集团军坦克团协同下，开始摆脱包围，16 日夜在枣阳地区集结。

日军第 3 师此次被围攻损失严重。据《第 5 战区枣宜会战经过及检讨》中称：“溯自信阳敌于东日倾力进犯时，兵力约达两万，而 5 月 10 日以后，由新野、唐河向枣阳撤退时，仅七八千余，其中虽间有向桐柏、信阳退窜者，但被我击歼数目亦在四千以上。 ”

在南线，5 月 10 日，第 5 战区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已率部东渡汉水进到枣阳以西的峪山、黄龙垱一带，与撤退之敌展开激战。随后又奉命截击南逃的日军第 13 师，在枣阳南部歼其一部。5 月 14 日张部进抵方家集，向撤退之敌近 6000 人进行侧击，将其截为两段。日军退路被切断遂全力向张部反扑。此时，张自忠恰与司令长官部之间通信联络中断，与北线友军难以配合，张自忠亲率第 74 师、骑 9 师及总部特务营与日军 5000 余人血战竟日，复激战通宵。第 2 天，日军调集飞机 20 余架，炮 20 余门，轮番轰击。5 月 16 日晨，张部进至宜城东北罐子口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敌猛烈炮火的轰击下，被迫退至南瓜店附近。日军得知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部被包围，集中全力展开疯狂围攻。张自忠数次中弹，多处负伤，仍镇定自若指挥战斗。终因实力悬殊，第 74 师和特务营伤亡殆尽，张自忠壮烈殉国。

日军在宜城东北地区反扑得逞后，乘机大举反击。5 月 19 日拂晓，日军由枣阳及其东北、西南一线向西北方反攻。第 5 战区部队猝不及防，有利的态势再度丧失，遂退往白河以西。21 日，日军渡过白河，并进入邓县、老河口以东地区及樊城西北地区后，停止追击，开始撤退。

汉水以东枣阳地区的作战，日军虽突进至预定地区，但未能消灭第 5 战区的主力部队，相反，在守军的猛烈反击下，一度陷于被动，损失消耗超过预料。在阻挡住中国方面的反击后，虽又转取攻势，挽回主动，但锐气已大减。

5 月下旬，汉水以西宜昌地区的作战开展。5 月 25 日，日军第 11 集团军下达了准备西渡汉水的命令，决定以第 3、第 39 师于 5 月 31 日夜分别由襄阳东南和王家集一带奇袭渡过汉水，合力进攻宜昌。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朝云新闻社，1983 年版，第 197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 969 页。

张自忠为抗日战争时期集团军总司令中最先作战殉国的一人，后追晋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并曾于 1944 年 8 月将宣城县改称自忠县。北平、天津、汉口、徐州、济南，上海、重庆等大城市，都命名有张自忠路。

宜昌是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屏障，倚山傍水，雄踞长江上游东端，俯瞰江汉平原，是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第5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系主要经过宜昌。武汉会战后，即由江防军（辖3个军又1个师）负责长江以北、汉水以西的江防。

战前，第5战区得知日军可能进犯荆门、沙市、宜昌地区，但“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企以为敌不至拿宜昌，即拿宜昌，亦不久守”。从军事委员会到第5战区都仅仅立足于在汉水以东地区“先发制敌”，“打破敌渡河西犯企图”，而没有认真研究倘若在汉水东岸作战失利，敌军果然西犯宜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的计划。5月初，日军在河东发起攻击后，第5战区抽调江防军主力第94、第75军，以及右集团河西部队大部东渡汉水参加对日军作战，以致江防更为空虚。

日军第11集团军在汉水以东作战，遭第5战区的抗击和反击，部队损失不小，曾准备放弃第二阶段的作战。但顾虑就此停止作战，将意味着已定作战计划中途受到挫折，以后会失掉集团军统帅的权威，同时辜负了天皇的信任。因而，该集团军首脑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仍执行既定计划。

从5月31日19时30分起，日军第39师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炮火准备，尔后强行渡河；24时起，日军第3师亦开始渡河。日军未受到大的反击，拂晓前大部渡过汉水。6月1日，日军第3师轻取襄阳。6月3日，日军第11集团军令第3、第39师以远安、荆门一线为目标并列南下。并令第13师、池田支队、汉水支队等部准备在4日夜从旧口镇以南地区渡过汉水西进。

江防军纵深的数线防御阵地，都是正面向东。日军从襄阳南下，由左翼横插守军第二、第三线阵地，危害甚大。当阳、荆门以北之远安、南漳等县，是不设防的后方城镇，未作任何战备。防守宜昌、当阳一带的第75军、第94军（欠第55师）又被调走，宜昌几乎成为一座空城。与江防军左翼相邻的右集团河西部队，因总司令张自忠阵亡，士气受到影响，在日军进攻下，虽奋力抵抗，终未能守住阵地，而退往鄂西北山地。

6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第5战区分为左、右两兵团。左兵团辖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第22集团军孙震部、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和第68军刘汝明部，兵团长由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右兵团辖第33集团军冯治安部、第29集团军王缙绪部及江防军，派政治部部长陈诚兼任兵团长。以确保宜昌、襄（阳）樊（城）之目的，从西北向东南，对渡犯襄河之敌侧背攻击，压迫于襄河及湖沼地带而歼灭之。并命令熟悉江防的第75、第94军人速由汉水以东赶回汉水以西江防军归建。

6月2日晚，陈诚抵达万县，3日进入宜昌附近三游洞开设指挥所，并请准将其嫡系、驻重庆整训的第18军（军长彭善）紧急船运前线，担任宜昌守备任务。

6月4日21时，日军第13师等部从旧口镇以南地区开始渡河，5日开始西进，与由北面南下的日军第3、第39师遥相呼应。6日晚，北线日军进至观间寺——荆门一线，守军第2军退往远安；南线日军进至荆门、十里铺一线，守军第94军第55师、第26军等部退守当阳、董市间主阵地。在此时期，守军反攻部队第41军于3日克复襄阳，第77军于4日克复南漳、宜城。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页。

8日，日军池田支队相继攻占江陵、沙市。第26军萧之楚部不沿宜沙公路向宜昌退却，以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而是分由董市、白洋、红花套、甘老背等渡口南渡长江，脱离战场，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6月9日，日军第39师向当阳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守军第18军第11师放弃当阳。

准备担任宜昌守备的第18军率第18、第199师部队，6月8日至10日陆续进抵宜昌地区，其部署是：以第18师守宜昌城，第199师配置于宜昌西北南津关、小溪塔（今宜昌县城）地区，掩护第18师左侧和机动使用，第18师以54团守宜昌城区，第52、第53团守备宜昌前沿右至长江江岸、左至镇镜山一线阵地。

6月10日，日军第13师等部开始逼近守军第18师阵地，11日拂晓，展开全面攻击。至10时许，第18师右翼第52团阵地正面被日军突破，日军趁势直扑飞机场，致使城区守军孤立，第一线部队腹背受敌。宜昌城守军主动摇，未指挥部队顽强抵抗，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宜昌就于12日陷落。

12日，日军第11集团军见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命令各部迅速摧毁宜昌的军事设施，准备返回。

15日，令部队撤回汉水东岸。

16日，第5战区左兵团第2、第31集团军主力，已尾随敌第3、第39师南下，进抵荆门、当阳以北地区，此时，右兵团亦调整部署，于16日起向荆门、当阳、沙市、十里铺等地日军反击。

17日，第18军尾追撤退日军，收复宜昌。

日军攻陷宜昌后6月14日，在欧洲正是巴黎陷落的日子。日本陆军参谋部受急剧变化的欧洲战局的刺激和鼓舞，南进论抬头，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呼声高涨。日本海军航空兵此时正对中国大后方重庆等地实施战略轰炸，提出把宜昌作为航空中继站很有战略价值。日军认为，占领宜昌，有利于更有效的轰炸重庆，直接威胁国民政府，促进“桐工作”的实现。于是，6月16日，陆军参谋部命令中国派遣军暂时确保宜昌。为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随后又将关东军的第4师调归第11集团军序列。6月17日，敌第11集团军又急令已撤到宜昌东面10公里土门垭的第13师等部再攻入宜昌。此后，守军在江陵、宜昌、当阳、荆门、钟祥、随县、信阳外围之线与日军形成对峙。

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设第6战区（1939年10月1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为便于作战指挥，曾以湘江为界，将第9战区划分为第6、第9战区。1940年4月，第6战区撤销），以陈诚任司令长官，辖境包括鄂西、鄂南、湘北、湘西及川东等地。

日军攻占武汉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为达到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迫使国民政府妥协的目的，在加强政治诱降活动的同时，纠集兵力对武汉南北地区发动了南昌、长沙、随枣、枣宜作战，以及封锁中国交通线的桂南作战。中国第3、第4、第5、第9战区部队，对日军的有限攻势进行了有力抵抗，并于1939年对日军展开了冬季攻势，先后取得长沙、昆仑关及五原等地作战的胜利。但由于指导上的某些失误，未能抓住有利战机，给敌以有力反击和更大消耗，特别是武汉地区的几次会战，邻近各战区缺乏紧密的配合协同，不能以积极行动钳制日军兵力，策应主要方面作战，使敌能逐次转用兵力，各个击破，实现了战役企图，招致了守军的惨重损失。

这一时期，日军加强了航空兵对中国大后方的袭扰、轰炸。日军以航空

兵着重进行战略、政略的作战，并调整了航空兵部署。航空兵的作战任务由主要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改为主要打击国民政府政治、军事中枢，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从武汉失陷至 1940 年底，日军航空兵对中国大后方发动了 4 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重点轰炸中国陪都重庆，同时对成都、兰州、长沙、常德、芷江、恩施以及洛阳、延安等地进行轰炸。 1940 年 5 月 18 日至 9 月 4 日，日机在对重庆、成都等重要城市进行的空前大规模的轰炸中，共出动飞机 4555 架次，投弹 27107 枚计 2957 吨，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击落击伤日机 403 架。

第二十三章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一节 日本的“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方针

一、“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方针的形成及其发展

随着侵华战争的进展，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地区日益扩大，日本在占领区所推行的各种政略、战略，逐渐综合形成为系统的“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政策体系。

日本的侵略对象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国，工业落后，军力较弱，无法在短期内击败敌人。但中国有广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能够长期同优势入侵者相周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各种爱国抗日武装，坚持在日占区进行游击战争。中国游击战争始终保持着对“面”的控制，而使日军被局限于“点”和“线”的占领，牢固而有效地拖住了日军。

日军虽然占领了包括首都南京及战略枢纽武汉等城市在内的大块地盘，却无法巩固在占领区的统治，征服中国的战争目的始终未能实现。国小、兵少、资源缺乏的日本侵略者，不能不求助于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手段以补其不足，冀日充分利用占领地的人力、物力而为其战争服务。因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就成为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基本方针。

日本的“以华制华”方针又是其总力战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8年，日军统帅部提出《昭和军制建设纲要》，强调：“总体战发展到顶点，就要毫无保留地统一部署国家的全部力量，并始终指导和运用它来贯彻战争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分为武力、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四个方面，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同时确定，为达成日本的战争目的，应建成以“日满华”三国合作的“核心圈”，并“确保其绝对安全”，此外要强化“同有关系国家的合作而防卫自给圈”。即从军事战略和经济资源等多种角度来设计对占领地的统治与利用。

日本“以华制华”方针的中心目标在于，继军事占领完成之后巩固其政治统治。因此，在占领区建立适合于日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或行政组织，这是“以华制华”战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些殖民政权同台湾、朝鲜等地的统治在形式上有不同特点。日军占领台湾和朝鲜后，实施的是“总督制”直接统治，不存在任何名义的“自治”机构。相比之下，日本在大陆占领区则都伪善地挂有“自治政府”之类招牌，要求建立各级政权都“必须真正适合于汉民族的特性”，或者“在各方面讲求自强之道，广收人心”，达成征服战争的实际目的。

日本“以华制华”方针推行的原则是实行“分治合作”。1938年7月19日五相会议制定《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中规定：“方针：帝国从内部对中国政权进行指导的目标，在于对这次事件的解决有利，并促进日华两民族的合作，又与确立日满两国不可分割的友好关系相结合，以适应我国

〔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151页。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的国防国策。……恩威并施，以促进一般民族的自发的合作”。又规定：“在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使各个政权进行以下工作：努力打倒和摧毁抗日容共政权，特别是要拉拢反蒋反共分子，以激起他们之间的内讧。”同年11月3日御前会议制定《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强调“新中国政治形态政策应遵循分治合作原则加以推行”。并具体划定“蒙疆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上海、青岛、厦门各地应按既定方针作为特别行政区域。”

“分治合作”原则的推行，形成了由日军控制的日占区六大块政区和政权，计有东北、“蒙疆”、华北、华中等四大地区殖民政权，还有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区及以广州、海南岛为中心的华南区等两大军管地区。汪政权名义是关内占领区最高政府，但其势力由日方限定仅能达及京、沪两市及苏、浙、皖等部分地区的“点、线”上。1942年日本实行“对华新政策”，大作表面文章，“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汪政权也想乘机扩大实权，收编各地傀儡，但由于日本并未改变“分治合作”原则，从中掣肘，扩权之望落空。在东北地区，日军则将全境划为19省，进行更为细致的分割控制。

分而治之原则的制定，按日本的愿望是能够以“蛇吞象”的方式，逐渐吞并中国，同时使国民政府地位下降，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

二、日军在各占领区建立伪政权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是1932年初在东北地区成立的伪“满洲国”。随着“以华制华”方针与“分治合作”原则的制定与推行，在其军事势力所及之处加紧建立各种殖民统治机构。

伪政权的建立及“以华制华”政策的推行必须物色亲日分子或汉奸分子。

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特意提出建立新傀儡政权时应“网罗在全中国有信誉的人才”，“要有足以号召全中国的主义和纲领。”日军情报工作十分重视挖掘各地各方面“实力人物”的情况。如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曾收集整理内蒙方面“实力人物”近40名的详细材料，编成清册。根据实际需要，针对“实力人物”的具体情况，施加利诱与威逼。例如对北洋将领吴佩孚，自30年代初至其1939年去世数年间，日本不断逼其出台，为“华北自治”或改组各种傀儡政权服务，终被拒绝。侵略者还十分重视傀儡政权之间的相互促动，总是利用走在前面的傀儡分子去拉拢更多的投降派与中间派，以收到“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华北，日本先炮制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企图以此为杠杆，“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在内蒙古，日本的方针是“使内蒙同中央分离而独立”，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390～391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76页。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3页。

《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中译本，1980年版，第43页。

其后则将“向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扩大。”

日本军队是各占领区的统治力量，也是扶植傀儡政权的策划机关。在华北，日军自侵占平津等地后，于9月4日在华北方面军属下设立特务部，直接负责傀儡政权事项并统管对华北的谋略行动。在占领东北后华北是日军最力重视的地区，对华北的扩张与统治筹谋甚早。继炮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5.11.）、“蒙古军政府”（1936.5）后，1937年7月底，日军分别在平津两地建立了治安维持会。提出：“建设华北人的华北”等口号，为建立更大的殖民政权作出准备。8月14日，由关东军司令部提出建议：“华北政权大致以五省自治为最终目标，先将河北及山东二省（将来包括山西）组成一个政权。另将察南、家北合并建立一个政权，前者设于北平，后者设于张家口，两政权内各配以有能力的日本顾问，日军则专门负责确保各地治安。有关政治、经济等的指导问题，由设在北平、张家口的大特务机关长通过日本顾问对其外交、经济、内政方面进行幕后指导。”关东军上述建议基本上被采纳，9月初华北方面军建立特务部直接统管并加以实施。特务部长喜多诚一郎少将成了华北地区傀儡系统的操纵人。9月23日在天津成立了“平津治安联合会”，为统管华北中心地区的过渡性的殖民机构。这些维持会的头目多是华北政界的旧官僚、政客。

对于各傀儡政权的地位等级问题，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曾发生分歧，关东军建议暂不急于建立统管各地的中央政权，而是建立“仅仅具有政府基本象征”的联省政府。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喜多则于10月提出《关于树立华北政权之研究》报告，强调：新建政权不只为华北地方政权，而应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如果只成立地方性政权，则不足以吸收第一流的有名望者同日本合作，且容易被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所压倒。该报告为陆军首脑机关批准。

12月14日，即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军炮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正式成立。由于未能物色到象样的有影响的人物，新建政权的主席职空缺，政府根据三权分立体制设三个委员会，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以五色旗为国旗，继用中华民国年号，以北平为“首都”。原“平津治安联合会”于第二天宣布解散。这个伪政府的主体在于行政委员会，下设行政、治安、文教、法制及赈济等五个部，王克敏兼任行政部长。各地治安维持会逐次归于该政权名义统辖之下。这一临时政府，虽是按“中央政府”的名义建立的，但实质仍为地方性傀儡政权。日军坚持“分治合作”的殖民统治原则，对其管辖范围及同蒙疆政权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仔细的规定。

日军所称的“蒙疆”，包括察哈尔、晋北、绥东等地区，关东军对该地插手甚早，该地区的殖民机构由日军操纵和控制。“七·七”事变后，关东军8月27日占领张家口，9月4日即建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占领大同后，又于10月15日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0月14日进攻归绥（今呼和浩特），17日占包头，于10月27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决议撤消原“蒙古军政府”，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并改归绥为“厚和”。11月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540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41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44页。

22 日，三个政权代表在日军操纵下会商于张家口，组织“蒙疆联合委员会”，主席云王，副主席德王，关东军派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

1938 年云王死后，德王继任主席。1939 年 9 月 1 日，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改名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由于日军专横跋扈，德王不满日本政策而于 1939 年辞职，最高顾问金井就完全接管委员会的职权。

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是日本所重视的又一块占领区。日军进犯上海之后，于 1937 年 9 月 23 日，在上海宝山建立第一个伪“自治委员会”。12 月 5 日，建立“上海大道市政府”。翌年 1 月 1 日建立“南京自治委员会”，接着又建立“杭州自治委员会”。3 月 27 日，在崇明和扬州成立伪“自治委员会”。至此，在华中地区共建立县、市一级的伪组织 40 余个。对于该地区成立的政权机构，军部最初设计的级别低于华北伪政权，而华中派遣军和海军方面则试图以南京的伪政权为最高政府。1 月 30 日。军部提出的《昭和 13(1938)年以后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确定各地政权之关系为：“新兴政权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均应首先分别在其各自领域内培养实力，逐次自行扩大其势力范围，帝国对此予以联系、调整，不使其相互对立。时机成熟时，根据彼等之自觉，作为中国自身问题，指导其自然实现合并。”3 月 28 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府组织采取三院七部制。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司法院长章士钊（拒绝出任）。行政院下设外交、内政、财政、绥靖、教育、实业、交通等七部。其中比华北政府多一个名义上的外交部。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加快建立各省及市的伪政权。1938 年 4 月 24 日，成立南京市政督办公署，原“自治委员会”取消。4 月 28 日，成立上海市政督办公署，大道市政府与之合并。5 月 23 日，在苏州成立伪江苏省政府，陈则民任省长。6 月 22 日，在杭州成立伪浙江省政府，汪瑞闳任省长，10 月 28 日，在蚌埠成立伪安徽省政府，倪道烺任省长。为加强对上海、南京二市的控制，1938 年 10 月 4 日和翌年 3 月 2 日，先后将上海、南京市政督办公署改为上海、南京特别市政府。

日军为将这南北两大伪政权合并为统一的伪中央政府，1938 年 9 月 9 日，华北临时政府王克敏与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曾在口军安排下，在大连协商建立联合机构。22 日在北平建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双方各派 3 人组成，下设秘书、政务两处，作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组织筹办机构。年底，汪精卫出逃重庆，日军准备以汪为首建立新的最高政府，北平“临时”与南京“维新”政府的联合计划才搁置一边。

三、伪军的编组和运用

在军事领域，日军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主要是直接利用中国人组织伪军，或征调劳工参加军事差役。

1932 年伪满洲国政权成立后，日军将东北降军收编，数量达 14 万之众，统辖于伪满“军政部”。1933 年 8 月 9 日通过炮制《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将伪满军划为 5 个军管区。至 1937 年伪满军共分 6 个军管区和 4 个警备军，辖混成旅 28 个，骑兵旅 5 个，总兵力近 10 万人。对伪满军由日本现役军官组成军事顾问团进行指挥，在军政部内设有顾问部。此外，日军还委派大量

日本军官直接担任伪满军各级指挥官，对伪军实施直接指挥。伪满军队完全是日军的附庸军。

“七·七”事变后，日军不断扩大作战地区，兵力不足的矛盾日渐突出，遂大力组建伪军担任警备和协助日军作战，特别是对占领区的“治安肃正”作战大量使用伪军，而且随其占领区扩大，组建和收编的伪军也快速增长。在华北方面，1937年1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原冀东伪“保安队”5个总队共1.7万人为基础，伪军的组建加快了步伐。1938年8月，伪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在通县和清河分别建立军官学校、军官训练队、军士教导团等，培养伪军的骨干。1939年10月，正式组建伪“华北治安军”，齐燮元任总司令，下辖第1、第2、第3集团另两个独立团。1940年10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合并后，华北成立政务委员会，伪“华北治安军”改为“华北绥靖军”，仍由齐燮元任总司令。

10月起，又先后组建第4、第5、第6、第7集团另5个独立团。伪蒙军在“七·七”事变时第1、第2军的基础上，至1939年春发展到9个师另1个炮兵团，由李守信任总司令。在华中方面，1938年3月，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陆续组建伪绥靖军，至1939年春，在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指挥下，共有苏州、杭州等7个绥靖司令部和绥靖军1个旅另3个团。1939年12月，伪政府在上海举办军官训练团，培训伪军骨干，汪精卫自任团长。1940年4月，成立苏豫边绥靖总司令部，胡毓坤任司令，下辖暂编第1军、河南皇协军等共10个师。1941年1月，又将苏浙皖绥靖军升编为第1方面军，任援道任总司令，下辖7个师。在华南，至1940年底成立了伪“广东和平建国军”，总司令黄大伟，下辖5个师。

最大的伪军集团为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军”，于1940年3月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后正式组建。汪政权设置了军事委员会，汪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领特级上将衔，在军委会名义之下，在各日占区设置高级军事机构，保持名义上的建制。1942年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之后，汪政权表面上的“独立性”增加。同期日占区国民党部队以“曲线救国”的旗号大量投降，伪军数量达于极盛，其正规军数量达3个方面军、3个集团军及华北绥靖军、苏豫边绥靖军等。共67师、20个旅、11个集团。据八路军延安总部1943年公布数字，该年伪军总数达62万人。

日本对关内伪军的控制形式同东北伪满军有所不同。关内伪政权和伪军在形式上多有一套独立的指挥系统，战术部队以下一般没有专设的日本人顾问或指挥官。各部队直接听命于配置地区日军部队指挥官的指挥，在华北及华中等地，日汪之间的协定规定，日军首长即可指挥伪军的团长及其下属官兵。可见，汪政权“和平救国军”比较东北等地各系统伪军，虽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实质上仍然完全是一支附庸军队。汪政权不仅政治上完全为日军所控制，其数十万伪军也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指挥。军官教育、军事训练、武器装备等方面，均由日本人掌握。日军对汪伪军的方针是明确的：“配备、指导及使用……等方面，实质上应由日本军队统辖。”

日军对各地伪军所担负的任务，在各时期有所变化。汪政权正式登场后，

集团无固定编制，每集团约以2~4个团编成。

《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

〔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9页。

1941年1月31日，日军统帅部在《中国方面武装团体之整備及其指导要纲》中规定：“一、中国方面武装团体在近期内基本宗旨，应以协助我占领地区之治安肃正为主，并使之成为完成国民政府政策之支柱，此外除特别规定，应考虑各地方特色为乡土之自卫安民而加以整備和指导。二、今后随着事变处理与国民政府的发展，逐渐在占领地全境对其加以综合整備、刷新军容，以日本军队为后盾而独立担任治安之维持，在可能的条件使之协助日本军队的作战。”日军在各地战争愈是陷入困境，其兵力不足问题愈是突出，对伪军的扶植便愈是积极，使用范围也愈加广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军还正式对英美军队宣战，虽无力直接投入战斗，却也起到了呐喊助威的作用。特别是在华北等地战场上，由于日军主力不断抽走，伪军担负了更多的作战与守备任务。当然，伪军士气低下，战斗力很差，完全不是抗战军民的对手，伪军的参战和发展并未挽救日军在华北等占领区军事形势的日趋崩溃。

四、兴亚院的成立和作用

随着新建傀儡政权的增加，日本决定建立一个管理占领区傀儡政府的统管机关，以便于协调对华政策。

1937年10月，曾在内阁之下设置掌管占领区殖民经济事项的第三委员会，以协调各方意见。1938年初，法制局提出建议，设置东亚事务局以作为专门处理有关中国问题的中央机关，而外务省只作为外交机构处理单纯的外交问题。在企划院，提议设置性质相同但更大规模的“对华院”。这些提案，使日本军政当局关于设置对华机关的主张进一步统一并确定下来。1938年9月29日宇垣辞职，近卫兼任外相，上述设置“对华院”案立即被付诸实施。

同年10月1日，日本召开五相会议，正式决定建立“对华院”。确定其宗旨是：“对华院及其现地机关之设置，负责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领域全部事务，各军特务部及其他机关在该院现地机关设置之时起，即将此等事务一并向其移交。”12月16日，又将对华院改称“兴亚院”，其组织法规定：兴亚院总裁由首相担任，副总裁由外、藏、陆、海各大臣担任。兴亚院的任务和权限是：“在中国事变之际，担任处理在中国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有关确定政策的事务以及特殊会社之业务监督”等等。在各主要占领区设置兴亚院联络部，并规定有关军事及警备事项，各联络部必须接受各地方陆、海军高级指挥官的指挥。

兴亚院的设置，使日本对占领区的殖民统治更加集中。这种集中，是军部及各地驻军权力的进一步扩大。兴亚院名义上是掌管占领区军政权力的机关，但兴亚院及其各地联络部，都是日军手中的工具。日本在各占领区的驻军司令部，才是各伪政权的太上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兴亚院体制为基础加以扩大，成立了“大东亚省”，配合军部管理新占领的各个地区。所以，兴亚院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对各占领地区殖民统治的强化，也是日本军政当局为克服矛盾，特别是协调军部与外务省步调的重大措施。

〔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8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华北治安战》 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106页。

第二节 汪精卫叛国投敌及伪中央政权的建立

一、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七·七”事变后，汪精卫的妥协投降主张更加露骨，纠集同伙形成为“低调俱乐部”，主要成员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以及熊式辉等人，经常在周佛海家中策划对日妥协活动，散布投降气氛。周佛海说：“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按汪精卫等人看来，中国的抵抗没有意义，抵抗必败。汪针对蒋介石的在最后关头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说法，散布：“‘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周佛海则说：“如果战争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汪精卫集团一方面鼓吹抗战失败主义，一方面怂恿国民政府当局利用陶德曼调停，尽快接受日方条件，对日停战。

南京失陷之后，由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献策，向汪精卫、蒋介石建议，建立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来对抗共产党的思想与文化主张，为蒋、汪接受。1938年初在武汉正式成立“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总部设汉口，先后还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活动经费每月5万元，由军需署支付。“艺文研究会”是低调俱乐部发展后的公开组织，也是由汪派控制的宣传喉舌与行动机构。武汉沦陷后，总部迁重庆，继续活动。由“低调俱乐部”与“艺文研究会”的活动，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妥协投降派集团势力。

同年初，汪派成员，担任外文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与“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拉上了关系，商量促成中日“和平”。在西义显安排下，董道宁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见面。随后，又以汉口政府第三势力代表人士身份，先后与日军参谋部谋略科长影佐祯昭、中国班长今井武夫、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进行了会谈。3月，汪派干将高宗武又由周佛海安排以特派员身份，到香港和上海活动。在上海见到了董道宁，二人一起南下香港，同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进行会谈。高宗武向日方介绍了“低调俱乐部”活动情况，说对日“和平派”将“逐渐占有势力”。经过商谈决定将影佐致张群、何应钦信件不直接交张群和何应钦，而由周佛海交蒋介石和汪精卫。4月16日，高宗武再到香港见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意向：东北四省、内蒙“可留待他日协议”。而河北、察哈尔“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以上述条件为基础，可以先停战进行交涉。但此时，日军正进行了徐州会战，对停战未表示意向，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日～24日《中华日报》。

《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11～12页。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日～24日《中华日报》。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7页。

〔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中和平工作秘书》，文献社，1962年版，第135～136页。

徐州会战后，日本内阁改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加强了对华外交攻势。高宗武于6月14日再到香港，表示汪精卫等第三势力愿意作为中介促成“和谈”。7月5日高宗武到日本，在影佐安排下会见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重申上述观点，希望开展“和平运动”。高宗武、董道宁的对日勾结，是汪集团投日的第一个步骤。

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制定《适应时局之对中国谋略》，以“为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为方针，要“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几天后又制定《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再度确认反蒋、反共、对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等原则。随着汪派的对日活动，日本将诱降目标转移到以汪精卫为重点，同时还包括唐绍仪、吴佩孚等人身。而汪精卫、周佛海等通过对日活动，取得了联系与共识，也积极筹划正式投日。

10月，日军攻占了武汉、广州等地，未能达到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目标，遂加强了政治诱降活动。同期，土肥原等人策划拉拢吴佩孚的计划为吴拒绝，而准备投日的唐绍仪被国民党军统局杀死，日本的诱降目标完全集中在汪精卫身上。在广州失守的当天，汪发表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如日方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11月3日，近卫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修改了第一次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提法，同汪的声明相呼应而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实质是公开鼓动汪派加紧投日，近卫声明立即得到汪派响应。7日，汪精卫、周佛海委托梅思平与高宗武作为全权代表，同日方会谈。地址选在上海虹口的“重光堂”。12日至14日晚，梅、高二人与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会谈达成初步协议。基本内容是讨论双方各自的和平条件，并安排汪等出逃投日的行动计划。

关于汪等投日计划安排是：汪精卫等人接日本政府所确定的“和平条件”之后，则设法去昆明，公布日华和平解决条件并由汪发表声明同蒋介石断绝关系，乘飞机去河内，再转香港，与日方配合发表收拾时局声明。在上述行动完成后，配合云南及四川地方军将领在西南地区建立新政府，并发布日华合作政策，推进和平运动。达成初步协议之后，今井武夫急速回日，向军部报告情况。军部决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会谈。11月18日，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及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到达上海。

19日晚，双方正式会谈。

20日19时，双方以高宗武、梅思平及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协议的主要内容有：（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扎中国，内蒙地带作为防共特殊区域；（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日本人有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四）关于经济合作，中国方面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389~390页

《申报》1938年10月22日。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1页。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304~308页。

北资源方面，予日本以特殊的方便；（五）中国方面补偿日本在华侨民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协定之外的日军，自日华实现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如日本政府对上列解决时局的条件予以发表，汪精卫等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双方共同发表日华合作和反共政策声明，俟机成立新政府。此外，又缔结《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就进一步缔结军事同盟等问题达成了协议。重光堂会谈达成的上述协议，标志着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已经完成。

以重光堂协议为基础，汪精卫寻找机会于12月18日逃离重庆飞至昆明，会同已经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于19日转飞河内。同期逃离重庆的还有陈公博、林柏生（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人。22日，近卫政府发表第三次声明，配合汪的出逃行动，呼吁国民政府“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声明日本愿意“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汪精卫则于29日作出响应，发表致蒋介石等人的《和平建议》电报，又称为《艳电》。该电吹捧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要求国民政府“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相呼应，一齐向中国政府发动了空前的政略攻势。

但此时汪集团的要求同日本的允诺还存在有较大分歧。日本的目的是将汪作为工具或傀儡，完全控制中国，在重光堂会谈中所使用的一些冠冕堂皇词句，目的在于诱使汪脱逃重庆，至少可以造成国民政府的分裂。在近卫的声明中则未提撤兵等字样。而汪的企图是通过推进“和平”运动而改组国民政府，建立个人的最高统治权，要求日本在合作中给予其应有的让步。汪认为此时还应该同日本讨价还价，在《艳电》中写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30日，汪又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方提出四点希望：“（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磨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三至六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开支。（三）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

这些主张，完全反映了汪甘当傀儡的心愿及以儿皇帝身份收拾时局的野心。汪出逃河内是汪集团降日的重大步骤。

二、汪精卫集团出逃的影响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汪精卫出逃河内，日、汪分别发表的近卫声明与《艳电》，形成一股险恶的妥协投降逆流，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日、汪所期望的那种国民政府迅速分裂，风起响应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相反，全国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汪反逆浪潮，对于投降派形成巨大压力。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7页。

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1页。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26页。

在《艳电》发表后的第三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指出汪的出逃是叛国行为，《新华日报》也发表了《汪精卫叛国》的社论及一系列文章，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罪行。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这是“中国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开始分裂”。号召全国军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其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

在国民党内部，也纷纷斥责汪精卫集团，要求国民政府予以严肃处理。何香凝在香港发表文章，斥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汪原来企望响应其行动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余汉谋等人通电斥江“谬论缪辞，为敌张目”，要求对汪“明正典刑，以肃纪纲”。西康刘文辉也责汪“言行逾范”、要求对其“严峻处分”。其余各战区将领，各省政府官员，民众团体，海外华侨也都纷纷通电谴责汪集团。云南龙云虽与蒋有隙，但也不愿随汪降日，并将汪离开昆明情况向蒋报告，提出了对策建议，随后公开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中央的态度是“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汪集团的出逃行动，及其《艳电》的公开发表，遭到全国各界的激烈反对，完全出乎汪的意料，也使各种潜在的投降派受到了震慑。

面临汪精卫的出逃事件及全国各界民众的讨汪热潮，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采取了相应的软、硬两手对策。最初，蒋介石试图封锁汪逃至河内的消息，以免造成混乱。29日汪之《艳电》发表，舆论鼎沸，蒋仍“欲处以宽大”。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由于群情激愤，最后乃形成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明确其性质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撤消其一切职务，还决定发表对汪的通缉令。但蒋介石对汪表示“惋惜”，试图再留一条路使汪“幡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故未正式通缉汪，对汪派人员也表示了安慰，曾令驻英大使郭泰祺致电汪去欧洲休养。2月中旬，蒋派同汪关系甚密的国民党老资格党员谷正鼎，带了出国护照和巨款，劝汪去欧洲休养，也可以随时写文章打电报对国事发表意见，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以免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坚持投降立场，谷正鼎劝说无效。

蒋介石在“软”的一手行不通的情况下，又采取“硬”的一手，首先惩罚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林柏生。林作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骨干分子，在其主持的《南华日报》迅速发表汪的《艳电》。17日，在香港被二人用铁棍击中头部，差一点丧命，此后林被迫改换姓名，隐藏起来。与此同时，军统局又筹划了对汪精卫的刺杀行动。汪逃到河内后，迁移到河内高朗街27号，军统局工作组寻找下手机会，于3月21日对汪住宅实行突袭。结果，被击毙的是汪最亲近的心腹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到河内两天，汪将卧室让与他们，自己住在隔壁房间，曾仲鸣夫妇成了替死鬼。在刺杀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即决定派遣参谋部中国科科长影佐祯昭去河内，协助汪转赴上海。国民政府除继续开展政治讨汪运动之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牵制日本对汪政权的扶持。

三、汪精卫建立伪国民政府

早在汪精卫住河内期间，汪集团就抓紧时机制定其政治纲领，筹划建立

能够迎合日本口味，能与重庆政府对抗的政权。首先，汪集团在河内成立了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伯生等 8 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其下建立政治、一一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治与军事两委员会由汪精卫担任主任委员。财务由周佛海充任主任，周还兼任政治、军事两委员会的秘书长，成了汪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这个最高委员会及三个委员会构成了汪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

1939 年初，曾对汪集团大力支持的近卫内阁辞职，平沼骐一郎内阁继任。汪集团欲了解日本新内阁的态度，并催促日本采取更多的扶助，遂由高宗武携带汪集团的政见，于 2 月 21 日赴日，向平沼内阁表示：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汪协助斡旋；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汪以在野资格斡旋；如果要汪出来负责，他将出马。

汪集团的投靠使日本感到满意。3 月，日本决定成立以汪为首的新政权，并在刺汪案件发生后，立即派影佐祯昭前往河内，准备将汪转移安全地带。4 月 18 日，经化装到达河内的影佐、犬养健等人与汪见面，双方仔细研究汪的行动细节安排。汪为掩人耳目，租用了一艘 760 吨的法国小船“冯·福林哈芳”号，而日本的北光丸号船载着影佐等人跟在后面。5 月 6 日抵达上海虬江码头。8 日，进驻土肥原公馆，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汇合。从此，上海成了汪集团的活动中心。

汪到上海后，立即着手筹建伪政权。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和褚民谊等人经反复商讨，制订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规定汪派“和平运动”的宗旨是：“此次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同时决定三个行动步骤：第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基础上，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聘党内外人士参加，由中央政治会议举任行政机构，改组军事委员会。第三，组成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同时，北京“临时”、南京“维新”政府立即取消，宣告重庆政府为伪政府，并发布前线各军对日停战命令。

汪集团决定以此纲领同日本进行协商。5 月 31 日，汪偕同周佛海等 11 人在日方的影佐、犬养等人陪同下，飞赴东京。

日本方面，平沼内阁建立，内部曾对于建立汪政权工作产生分歧，但经过协调又达成统一，于 1939 年 6 月 6 日经过五相会议批准，制定《中国新中央政权建立方针》，其要领有：

“一、新中国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现有政权（临时、维新政府）组合而成。

四、中国将来的政府体制，应适应其历史和现状，以分治合作为原则。有关内容应依据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高度防共自治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作为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除沿海特定岛屿外，内政问题原则交由中国方面，尽量避免干涉。

六、重庆方面在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第一及第二项的情况下，即认作为屈服，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成员。”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29～232 页。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朝云新闻社，1983 年版，第 23 页。

6月18日，汪精卫启程回中国，按日方意图拼凑“中央政权”，汪在华北、上海、广东等地活动，广泛拉拢各方要人，收效甚微。日本驻上海武官的电报也评论道：“对江派的和平表示衷心欢迎者，已无一人”。8月28日，汪好不容易才纠集到一部分汉奸，在上海召集其预定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其力量 and 影响却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报告：“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

经过汪集团在上海各地奔波筹备，和对日本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在1939年12月30日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另8件《秘密谅解事项》、3件《机密谅解事项》等。其主要内容有：在军事上，日本拥有防共名义下的驻屯、维持治安权，并要求保持对驻屯地区铁道、航空、通讯、港湾的控制权益，汪伪军队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或教官。在经济上，日汪共同开发华北资源，要保证日方在华北的经济上处于优越地位，要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内保有指导经济的行政权，要赔偿战争以来“日本臣民所蒙受的权力，利益之损失”。日汪双方规定上述秘密协定“永不公布”。但不久，高宗武、陶希圣因内部之争，逃出上海，于1940年1月21日在香港公布了日汪密约的全部内容。

1月23日，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直接参与，北平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同汪精卫在青岛协商建立伪中央政权。以此为基础，汪集团于3月20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正式组建汪记“国民政府”。形式上采取了“五权分立制”，汪出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汪精卫在分封部下的同时，还空缺出一些部长等高级席位，以引诱蒋派人员入伙。

30日，汪精卫集团大小汉奸各就伪职，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地址设原考试院旧址，当天公布其《国民政府政纲》，发布了《还都宣言》。伪临时、维新两政府则分别发表解散宣言，实行“统一”。当晚，汪又发表对日广播讲话，对日本的扶植表示感谢，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汪政权二号头目周佛海同时发表广播词说：“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汪伪政权的正式建立，表明汪精卫集团完全沦为日本的工具。

四、日汪条约

日本扶植汪政权，对日蒋关系带来新的冲击。对于日本的政略战略攻势，国民政府也采取了多方面的对策。

1939年12月，针对日汪之间订立“新关系调整要纲”及若干秘密谅解事项，国民政府发动了自武汉会战之后一次重大的进攻作战行动——冬季攻

〔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6页。

〔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4，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16页。

《中华日报》1940年3月31日。

势，使日军“深感敌军还健在”。汪政权正式建立后，国民政府即于 1940 年 3 月 30 日下令悬赏拿办汪精卫。而同时，重庆政府也同日方保持接触，进行会谈。

3 月 30 日，日本扶植汪精卫政权在南京宣布正式成立，汪伪政权号称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和日本是“兄弟之邦”。但实际上，该政权从策划到正式建立，全为日本操纵和控制，根据日汪密约，自成立之日便在内部设立“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尤以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为汪集团之太上皇。汪政权名义虽为“中央政权”，但实际管辖范围小得可怜，华北地区和蒙疆地区仍为日本另行控制的伪政权，连“国旗”也与汪政权不同，分别为五色旗和四色七条旗。汉口地区长期作为日本单独的军管区，后建立了伪湖北省和汉口市政府，名义归属南京，而实际上唯日军第 11 集团军之令是听。故汪集团有人自我解嘲说，汪政权政令不出南京城门。

为了加快获得日本承认，汪以日汪密约为基础，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于 8 月 31 日和日本缔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共 5 件。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两国政府为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的关系，应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相敦睦的措施。

第三条：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起见，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

第四条：两国政府相约，派遣于中华民国的日本军队依据另项规定，在撤兵尚未完了之前，对共同的治安维持予以紧密协作。在必须维持共同治安的期间内，有关日本国军队的驻扎地区以及其他事项，两国另行协议决定之。

第五条，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基于以往的惯例，或为确保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必要期间内，依据两国间另行协议决定，得驻泊其舰艇部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特定的地区。

第六条：两国政府基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

关于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国紧密合作，加以开发；关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及日本国臣民应提供必要的便利。

两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为发展一般通商，以及便利而合理地供给两国间的物资。两国政府对于增进长江上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国与华北及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为紧密合作。

第七条：随本条约所规定的日华新关系的发展，日本政府应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政府为日本国臣民的居住和营业，应开放其本国领土。

上述条件，将使中国完全由日本控制，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汪之间的日华基本条约，远远超过以前《二十一条》等条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最为屈辱的条约。而汪集团一伙，却对这一条约甚为满足，在制定之时，周佛海竟认为：“以战败国之立场，而能得此，较可心安理得。”

日本策动对国民政府诱和的“桐工作”遭到失败后，11 月 30 日同汪集团签署了《日华基本条约》，并宣布正式承认汪政权。在签订基本条约的当天，汪政权还伙同伪满洲国发表了《日满华共同宣言》，表示“三国”相互承认。随日本之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法西斯仆从国相继承认汪政权。汪

精卫也终于就职伪国民政府主席，发出通电，登上儿皇帝的宝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汪精卫登基典礼的第二天即4月1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弥吉郎会见新闻记者，他回答关于汪政权的独立性问题时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独立性就象满洲国一样。”像“满洲国”那样附属于日本，这也是日本对整个中国的侵略目标。

第三节 日本的殖民经济掠夺与殖民文化

一、殖民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变化

经济掠夺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日本“以战养战”的主要内容之一。日本对于占领区的经济，一方面从总体上全力保持其自然经济状况，尽力延缓或阻挡华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直接控制占领区经济命脉，对日本所需战略资源实施殖民开发，同时根据不同地域和行业，制定具体的掠夺政策。

在东北地区，日本在 1931 年至 1936 年间殖民开发的基础上，加速了战略基地建设，并调整政策，由军部和财阀携手，从一般的农业、资源掠夺转向为以机械、化学、钢铁等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殖民开发。1937 年 1 月，关东军制定《开发满洲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决定要大规模发展满洲的煤、钢和汽车、飞机等重工业。5 月 29 日更由军部提出《重要产业发展五年计划纲要》，对东北殖民经济各项指标大幅度提高，其中飞机一项要求年产 3000 架，占其全部产量 30%。东北殖民经济的发展成为日本战争经济的重要支柱。据统计，到 1942 年东北生产的钢材占日本全部生产量近 1/3，铝占其所需量的 40%，日本所需 38 种军需物资有 14 种由东北供给，致使“在亚洲大陆地面部队作战的装备物资补给，大部依赖满洲的工业”。

在华北地区，日本的经济战略是以华北之所有补东北之所无，或以华北之有余而补东北之不足。1938 年 11 月的御前会议制定《调整日华关系新方针》，强调在华北、蒙疆地区“以寻求日满缺乏的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为重点”，在贸易领域“采取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使中国对日物资供应“趋于便利合理”，在农业领域要求由中国“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同年成立“华北开发公司”，收编原“兴中公司”等作为子公司，并增设龙烟铁矿、华北盐业、华北矾土矿业公司等，以经营煤、铁、电力、交通等各行业的经济殖民开发。

在华中地区，以原在上海等地的殖民企业为基础，于 1938 年建立“华中振兴公司”统筹对该地区的经济掠夺，该公司到 1941 年又发展附属公司 13 个，控制华中地区的水产、蚕丝、煤、铁、电力各业的生产 and 销售。并由 1940 年正式建立的汪伪政权加以配合，除各类殖民生产，还直接实施对广大民众的巧取豪夺。如捐款一项，1942 年发动“献金运动”就有什么“国防献金”、“献金购机”等各种名目，1943 年后在汪政权之下建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和“全国物资统制委员会”等，强化对各种战争及生活物资的搜括。江南一带本为中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但由于汪政权按日军指令，全面推行战时经济体制，以“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方式为日军输血打气，连日方也承认，汪政权方面，由于战争与军需的压力，“疲惫逐渐达于极点”。

日本对占领区总体上的经济政策是实现“日、满、华经济一体化”。日本对每一个傀儡政权的经济要求均十分苛刻。1938 年武汉会战后由御前会议制定《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规定“日满华就资源的开发、关税、贸易、

《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日本评论社，1950 年版，第 22 页。

《太平洋战争史》2，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 233～234 页。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48 年版，第 1302 页。

航空、交通、通讯、气象、测量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定。” 1940 年 11 月 13 日，御前会议制定《中国事变处理要纲》，重申在经济方面“中国须承认日本于前项地域开发，利用国防上所必需的资源”。

日本的经济战略囊括整个亚大地区，它以日本本土及中国的东北构成其“中心圈”，以中国其它地区和印度支那半岛及南洋地区作为日本的“自给圈”，又以印度和澳洲作为“补给圈”，综合而成为“大东亚共荣圈”。

1941 年 1 月 25 日，统帅部制定《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领》，规定了一系列对华经济掠夺目标，其中两条为“（一）日军在当地独立生活的必要物资，及属于物资动员范围之物资，特别是对地下埋藏资源，帝国对华要求数额之全量应如数取得；（二）在取得上述以外的一般物资时，只要治安情况等现地形势许可，则避免通过压力取得，而尽量尊重中国的习惯和原来的经济组织，通过正常的经济手段，圆满且恰当地取得之。同时应避免过分压迫民需，特别是食品资源，以资收揽民心，且便于我之长期取得。”

日军上述经济政策与计划，由于遭受占领区抗战力量的打击。未能全部实现，但其在华军队的自给率在一个时期确有所提高：

由自给率变化可见，实行殖民经济掠夺，通过“以战养战”来运转战争机器，或实现其驻军现地自给，这种经济战略已经构成日本侵华战争指导的重要方面。

自给比例 年次	人 员		马 匹	
	华东(中)	华北	华东(中)	华北
1939 年	41 %	36 %	27 %	50 %
1940 年	75 %	45 %	66 %	55 %
1941 年	83 %	55 %	83 %	65 %

二、经济掠夺

（一）对工矿、交通的掠夺和统制

“七·七”事变后，中国东北地区除原有的“南满铁路股份公司”外，日本侵略者又设立了伪“满洲重工业股份公司”，股份 4.5 亿日元，公司在接收“满铁”一些重工业如煤、钢铁、有色金属、机器制造和比学工业的基础上，又陆续设立和接收一些子公司。到 1944 年止，满洲重工业公司资本达到 28 亿余日元。该公司的重要子公司有：本溪煤铁、东边道开发、阜新炭矿、密山炭矿、满洲轻金属、满洲矿山、满洲铝矿、满洲飞饥、满洲汽车等。上述“满业”、“满铁”两个大垄断组织，完全独占了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和

〔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 年版，第 406 页。
〔日〕《大本营陆军部》 2 ，朗云新闻社，1983 年版，第 132 页
〔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 年版，第 530 页。
〔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 年版，第 533 页。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第 276～277 页。

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由于日本殖民主义经济急剧扩张，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几乎无以生存，至 1945 年，日伪资本在东北工业中已高达 99.15%。

日本对中国关内沦陷区工矿业掠夺和控制，采取了“军管理”、“委托经营”和“中日合资”、“租赁”、“收买”等多种形式。在华北占领区，日本侵略者初期采取“军管理”的形式，将劫掠的工矿业交给日本财阀的“公司”代为经营，企业主权仍归日军。在华中占领区，日军初期采取“委托经营”的形式，即由日军当局委托有关“公司”来经营管理劫掠来的工矿企业。“中日合资”、“租赁”、“收买”等形式，则主要是利用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政治力量强制加以实行的。

1938 年 11 月，日本同时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与“华中振兴股份公司”等两大国策公司，分别主管对华北和华中的经济掠夺。

“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是在“兴中公司”的基础上建立的。“兴中公司”建立于 1935 年。日军在“七·七”事变后武装占领华北地区，对华北各业的管制事项便大多委托“兴中公司”等殖民公司主管，如同年 12 月，受军方委托经营占领区电力事业，11 月受托主管龙烟铁矿，1938 年初受托经营井陘、正丰、磁县、阳泉等各地煤矿。此外还承担军用道路建设与汽车修理等，“兴中公司”势力大增。

殖民地财产及中国内地的广阔市场，对日本财界具有非常的吸引力，而日本政府也以经济掠夺为战争的基本目标，进行迅速而详尽的计划安排。1937 年 10 月，内阁政府设置了“第三委员会”，委员长为企划院次长青木一男，委员有外务省东亚局长、大藏省理财局长及陆、海军省军务局长等 5 人，12 月 6 日第三委员会制定了《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决定以国策公司为主，并广泛引进国内财界力量，和“引进第三国的投资”，将整个华北经济纳入日本本土经济体系。1938 年 3 月，内阁正式制定了在华北与华中建立“国策公司”的计划大纲，4 月组建了筹建委员会，委员长为日本经济联盟会长乡诚之助，委员除各省次官及两院议员各 5 名外，还有各大中财阀代表，“满铁”与“兴中公司”总裁也是代表。而一切人事安排则主要由陆军省军务局直接控制。

10 月，“开发公司”正式完成筹建，规定其宗旨是“密切日满华北经济、促进华北经济开发，以谋求华北的繁荣，以其强化我国防经济。”首任总裁为前拓务大臣大谷尊由。

“开发公司”成立时资金总额 3.5 亿元，日本政府与华北伪政府各出资一半。而日本“出资”部分，包括了日军所掠夺的华北地区之车辆、机械、电信设施以及铁道等原有之中国财产，据统计，这一类“实物投资”竟占大半比例。如“开发公司”所属“华北交通公司”实收资本 23970 万元，中国原有铁道器材设备折合资金达 14970 万元，所属“华北电信电话公司”实收资本 2000 万元，中国原有设备器材折合资金达 1250 万元，日本在军事占领之下，实行这种“借鸡孵卵”的办法，实力不折不扣的军事劫掠。

“华北开发股份公司”经营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其下属子公司到 1943 年 10 月已发展有 29 个，成为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最大殖民垄断组织。其主要子公司及经营业务是：

“华北交通股份公司”是下属交通运输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子公司。由于交通运输业关系到整个占领区的军事运输，利润极大，军方、满铁及各财团

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日本占领华北初期曾由满铁代管，1939年4月才组成“华北交通股份公司”，统管华北地区铁路、公路、水运、港湾等交通运输事业。资金由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出资1.5亿元，“满铁”出资1.2亿元，伪北京临时政府出资0.3亿元，合计3亿元，公司总裁为满铁理事宇佐美宽尔，3名理事也是“满铁”派出的，所以，该公司仍为“满铁”等旧殖民机构所控制。

“华北电信电话股份公司”，1938年7月正式成立，资金共3500万元，由伪临时政府、“开发公司”和原有“华北电信总局”等出资。在“蒙疆”地区，则于1938年5月在张家口设立“蒙疆电气通信设备股份公司”，资金总额为1200万元。

“龙烟铁矿股份公司”，1939年7月成立，资本约2000万元，年产约70~80万吨铁矿石，供石景山制铁所等使用。

“兴中公司”成立于1935年，划归“华北开发公司”统辖，“兴中公司”下属又有若干子公司。

“华北盐业股份公司”，1939年8月成立，资金2500万元，年产盐约250万吨。华北消费仅50万吨，其余约200万吨即4/5输入日本。

除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这一最大垄断组织之外，其它还有一些所谓的“合办事业”，如“中华航空股份公司”、“华北电影股份公司”、“华北东亚烟草公司”等，它们构成日本对华北地区的巨大而复杂的吸血管道。

在华北建立殖民掠夺“国策公司”的同时，日本在华中也建立了属于同性质的“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同年11月正式营业，其资金1亿元，由日本政府与伪政权各出一半。同华北一样，日本的“出资”也以劫掠所得的企业资财充当，或军用票、伪钞或债券等支付。在公司所属于公司和经营手段等方面，则同华北有所区别。在华北以新建企业为主，而华中地区是同中国原有企业“合作”，具体办法是由南京伪政权将原有官、私有企业进行估价，然后作为“现物出资”而纳入“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并与其所属有关子公司进行合作。日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较之于华北更为“让步”的措施，是因为中国在该地区的工商业势力比较强大，日本试图充分利用此经济力量来为其殖民利益服务，以表面的“让步”来怀柔国民党及中国的资产阶级。

“华中振兴股份公司”拥有子公司13个。其主要的有：“华中水电股份公司”、“华中矿业股份公司”、“上海内河轮船股份公司”、“华中电气通信股份公司”、“华中蚕丝股份公司”、“上海恒产股份公司”、“华中水产股份公司”、“华中城市汽车股份公司”、“华中铁道股份公司”，等等。

在华南等地区，日本通过军管直接劫掠或由“台湾拓殖股份公司”、“台湾银行”等既有机构组织代行。

1939年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后，即以日本国内派遣的大批“技术人员”，设立“经济局”、“产业试验所”等机构，并组织日本商社前往海南进行“经济开发”。随后设立农场、制糖、橡胶等股份公司20余个。

（二）对农业的掠夺

“七·七”事变后，日本除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继续进行残暴掠夺外，对中国关内占领地农业也开始大肆掠夺。

在土地方面，日本侵略者以移民形式大批掠夺中国的土地。1937年至1941年，日本在东北实行第一期移民，计划移民10万户，实际移入85086户。此外，还有“义勇队”训练生移民达5万余人。在关内，“七·七”事变前，有日侨8万余人，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侨即增加到近7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移入的农业人口。大批日本移民涌入中国，掠去当地农民的大片土地。“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建立“土地调查委员会”，进行“土地调查”，对日本所需要的土地，随时加以圈占和没收。如“中日实业公司”没收了中国军粮城、茶堤两大农场的土地5.6万亩，日伪合办的“垦殖公司”，圈定冀东沿海地区的土地达7万顷之多。日军以修筑兵营、演习场、飞机场、仓库、碉堡、公路、封锁沟墙等，任意侵占的土地更是不计其数。因此，日占区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以棉田为例，1934年山西省为248.2万亩，河北省为1503.1万亩，山东省为604.9万亩，河南省为701.2万亩，到1938年分别下降为45.7万亩，608.2万亩，287.8万亩，258.5万亩。

在掠夺农产品方面，“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政策。对粮食的购销、加工等均由伪“满洲粮农公司”进行。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对粮食需要量的增加，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将购销“统制”变力强制购销，即推行所谓“粮食出荷”政策，强迫农民将生产的粮食的绝大部分，按伪政府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交售。各县“出荷”的粮食，大多在总产量的40~50%以上。从1939年到1941年，仅“东安省”共“出荷”粮食即达33万吨。在关内，日军每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围攻和“扫荡”，都将抢粮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在每年麦收之际，各地日军都纷纷出动，进行抢粮作战。在日军占领区则实行变相抢掠的征发军粮，1943年对密云、通县等9个县的小麦征收，一次即征去了700余吨。此外，还以仅及市价一半左右的价格，对粮食强行征购。掠得的粮食除供日军消耗一部外，大部运走。如1939年，仅在华中就运出大米700万石，1940年则增到900万石以上。

在掠夺劳动力方面，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一整套兵役制和劳役制，对中国劳动力进行罕见的野蛮掠夺。据统计，至1944年在东北被征发的劳动力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虐待而死亡的占总数的20%。在华北，从1937年至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关的劳工就达529万人。还有4万余中国劳工被抓捕运往日本内地折磨，其中仅在秋田县花冈矿的986名劳工，即死亡418人。

（三）对金融和贸易的控制与垄断

日本在金融和贸易方面对中国的垄断和掠夺也令人发指。“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伪“满洲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伪“满元”，用以支持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78、684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42页。

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60页。

军费开支和维持军工生产。至 1941 年末，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满市达 131700 万元，比 1932 年增长 8 倍。在关内，1937 年 11 月，日本侵略者于张家口设立伪“蒙疆银行”，发行伪“蒙疆券”。1938 年 3 月，在北平设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

1939 年 5 月，在上海设立伪“华兴银行”，发行伪“华兴券”。

1941 年 1 月，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为“中储券”。还在华北设有：伪“察南实业银行”、伪“蒙古联盟实业银行”、伪“晋北实业银行”、伪“河北省农民银行”、伪“晋东银行”等。在华中设有：伪“江苏地方银行”、伪“河南实业银行”、伪“河南省农民银行”、伪“中江银行”等。在华南没有的“华南信托公司”等，总共在关内建立银行 20 余家。这些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伪钞，依靠日军的刺刀维持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如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1938 年发行 3500 万元，到 1945 年 8 月发行额增至 42 亿元，为初发行时的 100 多倍。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的“联银券”，1938 年底为 1.62 亿元，1941 年发行额增至 9.66 亿元。此外，日本侵略者于 1938 年 11 月颁布“华中、华南使用军用票之办法”，发行军用票。军用票根本不具备货币性质，全凭侵略者的暴力恐怖，使其流通于市场。从 1938 年至 1940 年底，军用票发行额为 5 亿日元，以此在沦陷区大肆掠夺物资。由于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以 1936 年批发物价指数为 100，至 1941 年，华北上漲到 450.2，上海上漲到 1099.3。到 1945 年，上海米价比 1941 年上漲 6300 倍。

日本侵略者还在封锁中国海陆交通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和垄断中国对外贸易。1938 年 5 月，日本迫使英国屈服，以日本正金银行正式接管了英国汇丰银行代管中国海关税收的权利。以后与英美达成协议，实行有利于日货输入的新税则，促成日货输入大量增加，使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上升并超过美国而跃居首位。此外，日本还通过大量的走私活动，把过剩的日本货偷运到中国内地，换取法币，用以套购中国的外汇基金，或套购日本缺乏的物资或商品。此项走私额，约占正式贸易的一半以上。

三、殖民文化与思想奴役

在思想文化领域，日本同样十分注意推行“以华制华”政策。1940 年 12 月 10 日，在侵华派遣军制定的“关于大持久战第一期现地政、战略指导”中，分别列有“政务指导”、“经济指导”、“思想指导”等各项，其中对思想指导的基本方针为：“解决这次事变之指导精神在于，以日满华之亲善合作为直接目标，以从道义上复兴东亚为终极目标。”要求务必实现“使现地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于东亚联盟思想，击破敌方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要求于策略上在中国内部制造分裂，发挥投降派傀儡政权的作用，“对敌方的抗战思想，使（汪）新政权以其自己的立场同他们在法则上产生对抗，以造成敌人失败的心理。”

1941 年 1 月 25 日，由军部制定的“对华长期战争施策要领”，其中，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 28，94 页。

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 年版，第 527 页。

“对华思想指导要纲”规定其方针为：“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对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方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可见在中国制造分裂，强制推行殖民思想文化，这是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重要内容。

日本的思想文化攻势，实际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打击抗战爱国势力。例如，日军侵占东北之后，曾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收缴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仅1932年3月7日至7月的5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万余册。

1932年东北有中、小学教师24000余人，到1933年减少为16000余人，其余9000余人受到迫害、逮捕、枪杀或被迫改行。“七·七”事变后，中国108所高等学校，被日军破坏的有91所，占全国高校总数85%。著名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所在地沙滩红楼长期为日军宪兵队霸占，成为迫害与屠杀的中心。南开大学、南开中学被日军飞机与火炮轰击，大部被夷为平地。日军还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师生进行野蛮残杀，如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关押、折磨致死。其余普通师生被迫害、屠杀的，则不计其数。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奴化宣传。1940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国本奠定诏书》中宣布其教育方针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臣民，更炼成之。”以实现日伪历来所鼓吹的“威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关内地区，北平的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由汉奸汤尔和、王克敏等先后充任。南京伪临时政府及1940年3月成立的汪精卫“国民政府”中设立的教育部、厅、局、科等机构，实际上受日军特务部和“兴亚院”的指挥。各伪政权在日军指使下，重视在高等学校中培养汉奸和亲日派。对中小学教育，使其纳入汉奸教育体系。在教育内容上，依据奴化方针贯输反共、媚日、卖国教育，课本须由伪教育部审查，内容充斥“中日满亲善”等欺人之谈，极力排斥近现代社会科学。

在宣传和新闻传媒方面，日本同样重视加以控制。日本历来重视收买或胁迫报社负责人、记者为其侵略服务。“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北平办《新民报》、《武德报》、《北平晨报》等十余家汉奸报纸或亲日报纸，天津则有《救国日报》、《新天津报》、《天声日报》等。在上海有《新申报》、《新中国报》，1939年春，汪精卫主办《中华日报》，南京日伪报纸还有《新南京报》、《中报》等。广州有《迅报》、《民声报》、《中山日报》等，据统计，日伪在中国19省约有报纸139种，最多时达600~900种。为控制并推进侵略舆论和奴化宣传，各日军集团都成立有专门的报道宣传机构，或自己的机关报，如广州沦陷后，华南日军司令部有报道部并办《迅报》，华北方面军也有报道部，伪满政权设有“弘报处”，等等。除报纸外，还开办广播电台，如伪满洲国成立有“新京放送局”，北平伪临时政府有“中央广播电台”，1940年又建立“华北广播协会”及“蒙疆广播协会”，上海有“大上海广播电台”，南京有“南京广播电台”。1941年2月由汪伪政权将其改称为“中央广播电台”。据统计，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境内先后建立有广播电

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2页。

《伪满奴化教育》，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编，1951年版，第23页。

台约 50~60 座。

日本侵略者还十分重视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如“东亚联盟”、“皇协会”，等等，数目繁多，以华北的“新民会”为例，“新民会”成立的宗旨，即在于实行“新民主主义”，按日伪解释，“新民主主义”即“王道”思想，“王道”思想的典范则是日本的皇道政治。华北日军特务部长喜多曾对此解释说：“王道”一词听起来太古老了，为便于向公众宣传，应该把它改称为“新民主主义”，因为新民一词听起来比较现代化，对青年人具有吸引力。”新民会建立后，除分担电话、广播、书刊等文化宣传作用之外，逐渐又担任了组织合作社、兼办医疗等活动，完全是日军得力的谋略工具。曾目睹“新民会”丑行的英国教授班威廉写道：“新民会在日本顾问指导下，负责精神上奴化中国人的任务。所用方法的卑劣几乎令人不能置信，造谣和欺骗，敲诈和勒索，腐败和争夺，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种种最下流的行为都在这种机构里培养出来，专为破坏人民道德，动摇大众的信念。”日本侵略军出于对儒家文化的利用，还计划在孔子的故乡设立一所教授儒学的大学，以实现土肥原所鼓吹的“东方文化的复兴”。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汪精卫等大小汉奸集团都利用儒学为其降日罪行辩解。1940 年汪精卫政权“还都”南京后，汪在其庆祝大典上即大谈儒家的“罪己内省”之功，要求中国民众以“严于罪己的精神”来解释日军的侵略战争。总之，利用中国的文化传统以统治中国人，这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重要手段之一。

日本在占领区实行种种殖民统治政策，虽给中国抗战造成相当的困难，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企图终究不能得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挺进敌后发动和组织人民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收复大片敌占领土，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敌展开持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使日本推行的“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侵略政策，受到致命的打击。

在沦陷区的人民，不堪忍受日伪的政治统治、军事镇压和经济的压榨，自发的以各种形式与日伪展开不间断的斗争。为领导沦陷区人民的反日斗争，中共中央规定沦陷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沦陷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领导人民群众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除在抗战初期动员了大批党员、“民先”队员，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外，还以隐蔽的形式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多次组织募捐活动，将募集的毛巾、手套、袜子、铅笔、纸张、药品等送往抗日根据地，以募捐的资金力抗日根据地购置电讯器材和油印机等。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和有利条件，建立秘密交通网，并设法打入敌伪机关和要害部门，积极搜集敌人的情报，以配合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共天津地下组织，领导工人以各种合法的形式同敌人作斗争，如请假、怠工、破坏设备和产品。1936 年日本在天津老闸口开办的天津昌和厂，后来改力生产军火。工人们以“磨洋工”、少做活、多出废品、以坏充好、虚报数字等办法破坏生产。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以遣散难民的名义，动员了大批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各种技术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工作，为新四军筹集和购置药品及急需物资，并秘密送到抗日根据地。在日本统治较严密的

〔英〕班威廉等：《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8 年版，第 7~8 页。

土肥原贤二：《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1938 年 11 月第 614 期《中央公论》第 116 页。

东北沦陷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各族人民，进行着艰苦不懈的抗日斗争，使日伪的损失和消耗不断增加。

1938年4月10日，大连甘井子石油工厂被爱国者“放火团”烧毁，日本损失石油6万余桶及其它物资。类似的大火，在大连屡屡发生，据大连敌《日日新闻》报统计，约有50余次，损失日币2000余万元。至于敌占城市的工人罢工，也是不断发生。1937年9月，黑龙江省孙吴县平顶树机场中国劳工2000余人举行罢工，1938年6月4日，哈尔滨制棉工厂及义聚成等14家工厂的工人举行总罢工，1940年6月，北票矿冠山“协和寮”1000余名被抓青壮年举行罢工，都给日伪一定的打击。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中指出：目前敌人依靠大城市在军事上作为进攻的堡垒，在经济上作为以战养战的中心，在政治上作为以华制华的据点，在文化上作为奴化敌战区人民的大本营。如果在抗战开始时我们由大城市退到乡村，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就要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开展城市工作，要把这一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任务。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组织对沦陷区大城市工作都作出了新的部署，沦陷区人民反日伪的斗争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一节 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

一、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外政策的矛盾

1939 年春天，日本陆军部对世界形势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和设想：欧洲战争的爆发，很可能在 1941~1942 年之间，在此之前，日本可以得到大约 3 年多时间用以解决“中国事变”，灭亡中国；同时，作好参与世界战争的准备，准备同“想定敌国”苏联作战，也准备同英、美交战。陆军部的这个设想，实际上成了日本政府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早期方针。

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夏末秋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8 月 23 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朝野震动很大。8 月 30 日，日本平沼内阁在难以应付的世界形势下辞职，陆军上将阿部信行被抬出组阁。9 月 1 日，德国发动“闪电战”突然袭击波兰。3 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由此爆发。欧战的爆发，使日本统治集团受到强烈刺激，深感企图用 3 年时间灭亡中国和作好参与世界战争准备的方针，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于是积极寻求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方策。“北进”与“南进”之争又起。但是，困扰日本当局的焦点是处理中国问题，及早解决“中国事变”，才能放手“北进”或“南进”。日本统治集团虽在扶植汪精卫，但深感汪精卫集团缺乏武力和财力，难以解决“中国事变”；要想拔足泥潭，必须从瓦解蒋介石政权着手，对汪精卫的工作，就是对蒋介石的工作，把对汪工作作为对蒋工作的一个步骤。

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内问题也使日本统治集团焦虑不安。1939 年秋天起，日本国力穷困趋向表面化。首先是米荒，东京甚至不得不采取对居民每次限购 2 升以下的措施，人心极度不安。为此，日本政府决定拿出进口额的 10%，用 2 亿日元进口大米，这就打乱了整个的进口计划。其次是电力不足，煤炭短缺，生产计划只完成 80%。国家经济力，特别是从英美势力圈购入资源的力量开始失去伸缩力。为了摆脱经济压力，日本统治集团把指望转向南方资源地区，但为了不使日苏军备失衡，又必须坚持充实北方军备计划。这样，日本便必须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投下赌注，形成了日本国力难以承受的负荷。

日本统治集团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之后，终于由外相野村吉三郎、陆相畑俊六和海相吉田善吾于 1939 年 12 月 28 日联名签署《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确定，对欧洲战争采取“不介入的方针，最有效地运用帝国的中立立场，引导国际形势，以有利于促进处理中国事变，同时采取措施，造成对建设东亚新秩序（包括南方在内）的有利形势。”阿部内阁的这个方针纲要，基本意图在于：把“中国事变”放在世界战争的大背景中去解决；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不仅包括日本、中国，而且要涉足东南亚和太平洋；用建立汪政权去诱惑蒋政权，作为解决“中国事变”的策略。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 年再版本，《文书》第 421 页。

二、日本的政治诱降新攻势

1939年6月，日本政府在决定建立汪精卫伪“中央政府”的同时，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新攻势也在极秘密中准备。阿部内阁的方针是：一方面与汪精卫进行秘密谈判，准备建立“新中央政府”；另一方面设法与国民党接触，力争在“新中央政府”建立前或不得已建立后，促使国民党投降，并导致汪、蒋政权合流。

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加强对伪政权的控制，促进汪伪政权的建立和统一进行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日本于1939年9月12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

11月下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铃木卓尔以日本驻香港武官的名义向香港当局申报成立所谓“香港机关”，开始对国民党实施诱降工作。

铃木于12月27日与自称是宋子文胞弟的宋子良会面。此后，铃木与宋于1940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及14日在香港连续谈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派今井武夫参与2月14日的谈判。2月16日，今井从香港返回南京，向总司令官西尾作了详细汇报。19日，今井又到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畑俊六作了报告。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发出指示，决定把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命名为“桐工作”，要求“对重庆或者把它包括进来或者使之瓦解，照此方针进行工作。”并规定，援用1939年11月御前会议决定的所谓“调整日华新关系”重要条款，作为与重庆方面代表谈判的条件基准。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与重庆方面的第一次会谈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日方代表是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和参谋部第8科科长臼井茂树。重庆方面代表是宋子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和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会谈开始后，日本方面提出一份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必须原则上承认“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规定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允许日本驻兵；两国经济合作；保证日本人在中国的居住、营业的自由；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停战协定签订后重庆国民政府应与汪精卫协力合作；日本在得到上述保证后，尽快撤兵。

重庆方面表示，要求避开承认“满洲国”，暂持缄默态度；华北驻兵问题，可视中日两国在国防上有其需要时，日本可推迟一部分兵力的撤退；蒋汪合流问题，由于国内反汪气氛强烈，不能考虑，但将作为国内问题加以妥善处理。

会谈没有结果，以相互领受对方意见的形式暂时休会。

第二次会谈于6月4日至6日在澳门举行。双方代表与第一次相同。会谈期间双方在满洲问题和日本在中国驻兵问题方面仍有分歧意见，但表示希望沟通相互理解，缩小距离。会谈虽未获实质性进展，然而双方都不愿完全关闭谈判大门。双方商定下一步举行板垣征四郎与蒋介石的高级会谈。会后，由双方代表于7月23日共同签署了《备忘录》，约定于8月初旬在长沙举行板垣与蒋高级会谈。

为了实施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日本倾注了全力。内阁几乎每天均向天皇作报告，政府与大本营也反复研究对策。日本决心迫使国民党承认伪“满

洲国”；承认日本有权在内蒙和华北驻兵；承认日本有权利用华北及长江三角洲、海南岛的资源；承认日本有权在中国大陆可以自由居住、自由经商，无限地剥削中国人民；承认实行所谓“日中提携合作”，实际上由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统制一切，使蒋汪合流的伪政权成为事实上的傀儡政权。真正唯一合作的是日本与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共，由日本提供武器装备，供国民党进攻共产党。

三、日本的军事迫降行动

在政治诱降攻势的同时，日本还对国民党实行军事迫降行动。

首先是对枣宜地区实施进攻。

1940年5月1日，日军以约20万人的兵力，发动对枣宜地区的进攻，力图“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

其次，对重庆和四川其他大城市实施空袭。5月2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台票8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18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开始对重庆、成都的空袭。8月19日、20日，陆海军航空队合计出动271架次，对重庆空袭达到高峰。至9月4日，日军对重庆等地的轰炸暂告结束。据日本方面统计：空袭天数共71天（其中对重庆37天），共出动飞机4555架次（其中对重庆2023架次），共投炸弹7107枚（其中对重庆10021枚），共患难957吨（其中对重庆1405吨）。日本以这次持续近4个月的空袭，造成进攻重庆的气氛，向国民党施加军事压力。

1940年7月18日，日本还与英国签订《日英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规定自7月18日起，在3个月内禁水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经缅甸禁运之货物，香港亦予禁运。

7月20日，由日本提出，经法国同意，一个由陆、海军派出的31人日本常驻办事处在河内成立，随后，滇越铁路老街铁路桥上的铁轨被拆除，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宣布，停止运输援华一切物资。

日本上述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活动，从不同方面对国民党施加了压力，为大力推进“桐工作”提供了条件。

四、日本诱降政策的破产

1940年五六月，德国法西斯发动闪电战，迅速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进逼英国，这对在侵华战争中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整个日本再次掀起战争狂热。日本政坛一度消沉的日德意军事同盟论再次抬头，“南进”论观点又占上风；同时，所谓“新体制运动”也乘机兴起。“新体制运动”的头面人物近卫文麿，在陆军的支持下，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全力投入建立新党。近卫的行动促使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更加嚣张。不久，陆军通过陆相畑俊六辞职并拒绝推荐后继人的方式，迫使米内把政权交给近卫。7月22日，近卫文麿第二次登台组阁。新内阁紧锣密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91页。

鼓准备“南进”夺取东南亚地区。9月23日，日军强行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开始“南进”的尝试。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日本“南进”政策的出笼，导致日美关系发生变化。9月25日，美国宣布给中国追加经济贷款2500万美元，26日，又宣布禁止对日本输出废钢铁。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逐渐增强。

1940年夏秋，侵华日军在华北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把进攻的矛头全面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八路军，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其占领区。为粉碎日军对华北八路军的全面进攻，打击其“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抗战局面更有利的发展，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八路军总部于8月20日起，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沉重打击了入侵华北的日军，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拔除了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大量日军据点，钳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减轻了对正面战场的压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作为重要抗战力量的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

在上述国内外形势下，蒋日谈判进程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庆方面提出，要求日本现任内阁宣布取消第一次近卫内阁发表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于”的声明；要求即将举行的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会谈不能触及蒋汪合作问题；要求取消日汪签订的条约等。从而打乱了原定于8月上旬举行蒋与板垣会谈的计划。

8月22日，日本企图继续诱蒋投降，近卫文麿、板垣征四郎分别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表示希望高级会谈仍能举行。在蒋汪合流问题上表示可以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8月28日，铃木卓尔带着上述两件亲笔信到达香港，交给宋子良。9月5日，宋子良答复：因近卫信件没有直率地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长沙会谈持旁观态度，故中国对日本仍不能信任。当日，铃木向中国派遣军总部提出报告说：“美国远东政策的加强，英国大使重庆之行，以及苏联、中共情势趋于活跃等，致使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值此板垣、蒋会谈迫近之际，莫如主动暂停此项工作。”9月12日，今井武夫到香港考察后也报告说：板垣与蒋“会谈暂以静观为宜”。

9月19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暂时停止“桐工作”。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于10月8日以大陆指第758号指示：“原大陆指第676号所指示停战谈判应予停止。”至此，以“桐工作”命名的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终于破产。

日本的“桐工作”计划虽未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但上述事实表明，国民党营垒中有妥协投降倾向的集团，确曾在汪精卫投敌后，暗地里与日本情报机关勾勾搭搭，名曰“探查日本对结束战争的构想”，实际是准备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抗日，对日妥协。而中国共产党针对这种妥协投降和反共逆流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 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 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 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所进行的斗争，对于坚定国民党的抗战意志，团结国民党抗战到底，则起了无可置疑的重大作用。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开展反磨擦、反投降和反分裂的斗争

武汉、广州失守后，日本被迫停止对中国的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战场的态势，由于国民政府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其军事指挥机关和军队的作战指导原则又有误，虽然组织过多次会战，对入侵之敌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大片国土还是沦于敌手；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深入战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并在敌后建立起一大批抗日根据地，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敌后战场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发展的趋势，完全出于蒋介石集团之意料。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强化国民党，限制共产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动摇开始表面化。五中全会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从此，国民党就开始消抗日，积极反共，在对日本实行妥协政策的同时，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制造各种反共磨擦事件和反共惨案，企图借此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换取日本的让步，以巩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

针对蒋介石集团限共、反共的阴谋活动，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有步骤地开展反磨擦、反抗降和反分裂斗争，揭露蒋介石反共阴谋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顽扔的军事进行了自卫回击，从而，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河北、山东等地的反磨擦斗争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早在1938年复就已在冀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日民主政权，但国民党顽固派却抬出已不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的招牌，委派冀察战区总局令鹿钟麟兼任河北省主席，河北民团总指挥张荫梧担任省政府民政厅长。他们到任后，即向八路军冀中军区提出要委任各县县长和改变群众团体隶属关系等无理要求，并勾结易县、满城、徐水等地的土顽武装袭击八路军，暗杀八路军政工人员，包围抗日县政府，剥夺敌后抗日军民的民主权利。反共磨擦活动从此日益猖獗。1939年12月间，竟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企图抢占安国、博野、蠡县。冀中军区被迫进行自卫，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193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各地反共磨擦事件不断发生，“都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指示》要求各地对于磨擦事件决不能“逆来顺受”，否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并且指出，为了抗战，八路军部队应当发展，在国民政府不加饷的情况下，部队只能自行筹款筹粮；对于“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河北等地反磨擦斗争的指示，要求八路军各部队在反磨擦斗争中，坚持以下主张：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要求加强冀察鲁三省抗日力量；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现行抗日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应当加强，山东及华北其他地区的行政区划，应依照战略形势，重新进行划分；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决不应轻易更改；八路军部队对于非理进攻，将坚决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积极开展反磨擦的谈判斗争。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却愈演愈烈。1939年3月，张荫策动由杂色武装改编的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2支队柴恩波部在河北雄县发表反共宣言，接受鹿钟麟指挥，并杀害第2支队中的中共党员和政工人员。不久，柴恩波叛国投敌。与此同时，张荫还在河北各地捕杀八路军干部、战士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工作人员及家属。3个月内，此类暴行达15起之多。6月11日，当冀中八路军对日军正进行艰苦的反“扫荡”作战时，张荫却率河北民军3个旅突然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制造惨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名的“深县惨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八路军第120师和冀中军区予以反击，除张荫梧率几名亲信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

在山东，反共磨擦事件也不断发生。鲁苏战区游击副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于1939年2月5日，在沂水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决定“统一划分防线”，将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划在滕县、泗水、宁阳等日伪军密集的狭小地区，企图借敌伪力量消灭八路军；提出“枪不离人，人不离乡”，妄图取消中共建立的地方武装和限制八路军扩充部队；强调“统一行政，军不干涉”，借以阻止中共和八路军开展群众工作和支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规定“给养粮秣，统筹统支”，不准八路军筹集给养。会后，沈鸿烈不断在鲁东南各县、区制造反共磨擦事件。3月30日，国民党复兴社山东头目、别动队司令秦启荣，指使其第5纵队在博山东部的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护送的南下受训干部，造成干部、战士400余人惨遭杀害或被囚禁的“博山惨案”。4月上旬，中共中央就此事件专门发出指示，强调指出：对于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坚决反击。

1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通电全国，揭露秦启荣坚持反共、破坏抗战、制造惨案的罪行；同时，调动部队对秦部进行反击。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山东今后磨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磨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统一战线与磨擦中，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山东纵队是由本地群众抗日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抗战有功与群众有血肉不可分离之关系，决不能调走”。根据中共中央上述指示，八路军山东纵队坚持在山东地区抗战，并不断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打退了秦启荣等部的多次进攻，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大局。

二、全国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

1939年6月，蒋介石集团反共分裂活动日趋猖獗。6月初，蒋介石指示其党政军各机关，总结“剿共”经验，强调全国对国民党的一切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以限制中共的活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陈诚随即奉命秘密制订《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蓄意取缔八路军的名称，阴谋取消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取消“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各类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不准中国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禁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报社、书店和印

刷厂出版、发行各种书报、刊物。

6 月上、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先后约见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要求中共军队服从政府命令，解决各地纠纷。周恩来当即指出，并非八路军进攻，而是八路军被人所攻。6 月上旬，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但整个形势基本上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上还是要团结的。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和行动在发展，这是逆流，是日本、汪精卫之流可利用的基础，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

此后，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扩大各地的反共分裂活动：在陇东制造镇原、宁县反共磨擦事件；在山东定陶袭击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在陕西制造残杀八路军残废院干部，事后又打死打伤八路军谈判代表的枸邑事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重修封锁线，增派部队；在湖南制造修杀、活埋新四军干部和工作人员，抢劫财物、枪支的“平江惨案”；在湖北攻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 5 大队后方机关，惨杀中共党员 500 余人；在河南制造修杀新四军留守处伤病残人员、家属及当地民众 200 余人的“确山惨案”。半年多时间，磨擦事件累累，反共惨案不断。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动摇、妥协，存在投降危险的严重局势，中共中央在 6 月初发出《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 月中旬又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形势的特点，全面估计了抗战的前途，提出“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根据中共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的精神，6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地开展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

根据上述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救亡团体、报社、书店，以及各进步报刊杂志，纷纷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谈话或评论，广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热情颂扬国共合作抗日的事迹、意义，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抵御日本侵略、建设繁荣富强中国的重大意义，揭露投降派、反共分子的阴谋实质，动员各阶层人民、抗战将士和爱国侨胞，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斗争。

7 月 2 日，周恩来致电陈诚，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电文指出：“北事未平南变又起，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中电文要求查明真相，抚恤死难者，惩治肇事者，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2 日和 28 日，周恩来又先后致电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徐永昌、国民政府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442 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09 页。

^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443 页

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揭露“平江惨案”真相，要求严惩肇事者。8月1日，延安各界如开万人大会追悼“平江惨案”的遇害烈士，毛泽东大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平江惨案是“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全国抗日，全国人民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团结。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毛泽东在演说中还特别就国民党顽固派滥用“统一”的名义以打击中共，诬称中共标新立异，妨碍统一，不利抗日的问题，作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否则，中国就会灭亡。近来，中国内部的汉奸，“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国民党中央制订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国共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党派是友党，不是“异党”。“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现在“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①

9月16日，毛泽东又发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重申国共合作抗日的根本政治原则，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两党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绝不能做“亲痛仇快”之事。对于反共磨擦事件，毛泽东直率的告诉记者说：“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心犯人。”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深入地发展。1940年初，香港《大公报》披露日本与汪精卫签订的所谓《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密约内容，全国各地又掀起以讨伐汪精卫卖国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反投降运动，各地、各界纷纷举行讨汪运动周，召开群众性讨汪锄奸大会，发表通电、宣言，既讨伐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又揭露、批判抗战营垒中暗藏的类似汪精卫之流的投降派。2月1日，延安各界召开群众性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声讨汪精卫的卖国投降罪行，拥护抗战到底。毛泽东、林伯渠出席并作了演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说中，强调要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一方面，要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于抗日的人，另一方面，要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目的就是为了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会后，通电全国，向国民党提出10项要求：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军民和各抗日党派开展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75—57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90页。

政治上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国民党中的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对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裂国共合作、诱逼国民党投降的阴谋，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和《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动用国民党的中央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在政治上发动进攻，提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叫嚷要取消共产党。

中央中央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出现动摇妥协与分裂倒退的严重危险，早在1939年7月起，就先后多次向党内发出指示，分析形势的特点，提出应该掌握的政策和策略，要求全党，提高警觉，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12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指示，强调指出：“敌人的军事扫荡及政治阴谋定会加紧”，“友方的磨擦定会加多”。“根据这种形势我们的总方针应当是：坚持对日寇的游击战争，坚持自己已得阵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争取政权，深入群众工作，与顽固分子坚决斗争”。

中共各地方组织和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大力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密切注视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的政治、军事动向，为应付突然事变，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2月，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军事磨擦，发展成在几个地区同时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终于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大的军事进攻为主要标志，阎锡山当了急先锋。八路军被迫奋起反击，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

一、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

长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在抗战初期，迫于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战关系。但是后来，他企图对日实行妥协，把山西新军视为极大障碍。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命令山西旧军向山西新军发动全面攻。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十二月事变”。

为了对日实行妥协，早在1938年9月，阎锡山就制定了重整旧军，压制新军的计划。1939年3月下旬，他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决定改编山西新军，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的军权。秋林会议后，阎锡山把山西全省重新划为4个游击区，设立4个行署，指派他的亲信兼任行署主任，以控制新军的活动。蒋介石极力支持阎锡山排斥共产党、八路军，破坏山西各派力量之间的团结。于是，山西出现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

针对上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9年5月13日发出指示，明确指出，阎锡山转向反共，“山西新旧派斗争可能加剧，新政权与群众运动及我党我军可能受到部分打击与限制。因此，山西环境将比过去更复杂更困难，磨擦与斗争亦可能更多”。指示要求“在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的总口号下”，“巩固山西内部团结统一、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巩固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合作，巩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反

对破坏山西内部团结，反对离间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关系。” 9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强调对于阎锡山继续倒退，向进步势力的进攻，应给予有力的与必要的反击和抵抗。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山西进步力量的战斗力，才能团结一致反对山西逆流，才能转变时局和克服投降危险。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西新军和驻晋八路军部队及时进行了反妥协投降，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工作。

1939年11月，山西形势进一步恶化。29日，阎锡山密令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61、第19军等部准备分3路向晋西南新军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发动进攻。按照密谋，12月1日，阎锡山诡称要对日军发动“务季攻势”，命令决死第2纵队于12月5日向同蒲铁路霍县至灵石段进行破击，命令陈长捷所部为预备队紧靠决死第2纵队之后。12月3日，陈部突然以重兵围攻决死第2纵队、政卫第209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同时，摧毁晋西南各抗日县政府和抗日救亡团体，大肆屠杀县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遇害者达200多人。事发后，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薄一波立即致电阎锡山，要求他下令制止陈部的进攻。但阎锡山置之不理。

面对优势阎军的进攻，晋西南新军于12月6日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协同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苦战10天，击溃陈部2个旅，突破层层包围，于16日向北转移至孝义以西郭家掌、枯桑园一带。27日，越过离（石）军（渡）公路，抵达晋西北地区临县以南招贤镇地区。

阎锡山为了阻止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与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在晋西北会合，遂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指挥第33军6个团，拦阻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北上，并令骑兵第8军8个团与北上的第61、第19军相配合对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实行围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西北地区于12月31日成立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军总指挥部”，1940年1月2日，发起反击，将进攻的阎军驱逐到临县附近地区，并接应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至静乐县西南的米峪镇、天池店地区，尔后，又击溃阎军第33军和骑兵第1军各一部，迫使阎军于13日夜退向晋西南地区。

阎锡山在晋西南、晋西北挑起武装冲突的同时，还令其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率独立第8旅，于1939年12月8日至26日在晋东南地区进攻新军决死第1、第3纵队。在阎锡山策动下，决死第3纵队中的部分反动军官叛乱，强行带走3个团及直属队一部共4000余人，晋东南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陵川、壶关等7个县的抗日政权遭破坏，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500余人被杀害，1000余人被绑架。决死第1纵队，由于应变工作做得充分，阎军进攻未能得逞。

1940年1月中旬，阎锡山又令其第19军暂编第2旅、新编第2师袭扰晋中地区，进攻决死第1纵队。在八路军第386旅主力和总部特务团的支援下，决死第1纵队奋起反击，阎军暂2旅和新2师大部被歼。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企图压制新军、排挤八路军的目的未能达到。相反，其自身力量却被削弱，蒋介石的势力则乘隙而入。为了隐定山西局势，争取阎锡山继续合作抗日，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向阎锡山面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晓以大义，并提出解决新旧军冲突的具体建议：双方停止军事

行动和敌对宣传；新军仍属晋绥军序列，不接受蒋介石方面的改编；恢复电台联络和人员往来。这时，阎锡山在反共失败和蒋介石势力乘隙而入的情况下已别无他路，表示愿意接受中共主张。经过谈判，决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旧军的活动区域。

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后，国民政府先是承认陕甘宁边区，并经过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决议确认。但是，南京失守之后，国民政府出尔反尔，将这个决议弃而不顾，对陕甘宁边区采取下承认态度。

1938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宣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先后调集胡宗南等部及地方武装共30余万人，实施包围，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和军事挑衅事件，至1939年10月，共达150余起。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从抗日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并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力争减少和避免武装冲突，但收效甚微。

1939年12月初，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又调集第97师等部，会同甘肃省陇东地区各县保安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新的军事进攻。

12月10日深夜，第97师的一个团会同宁县保安队，突然袭击八路军驻宁县的第770团一个营。杀伤该营干部战士300余人，宁县全部被顽军占领。

14日，驻镇原的八路军第770团另一个营也遭猛袭，被迫退至城外，镇原也被顽军夺占。与此同时，庆阳、台水等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也乘机向八路军第385旅所部进行骚扰袭击，并断绝交通，到处搜捕中共地方工作人员。民族败类叶青、张慕陶、张国焘等由兰州秘密赶赴镇原县以东的西峰，大肆煽动内战，阴谋扩大事变。关中地区的国民党顽军和各县保安大队也蠢蠢欲动，企图袭击八路军。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军事进攻，严重地破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

12月22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进攻边区，共御敌寇，恢复团结。

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枪口对内，进攻陕甘宁边区，要求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党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向蒋介石、何应钦等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恢复陕甘宁边区8月以前的态势。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于1940年初，又集中第28师主力，预备第3师、第97师备一部及陕西保安第1、第2、第3旅等部共2万多人，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店头、马家堡、淳化、马栏等地发动进攻。与此同时，还令其驻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煽惑清涧、安定等地国民党何保安队哗变为匪，抢劫民财，袭击八路军河防部队第717团等部。八路军忍无可忍，遂进行反击，肃清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5县的反共顽固势力，巩固了该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

从1939年11月到1940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接边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共124起，其中64起是武装进攻，占据枸邑（今旬邑）、淳化、正宁、宁县、

镇原5座 县城。八路军为了维护团结抗战大局，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实行有限度的自卫反击，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

三、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晋冀鲁豫地区的进攻

晋冀鲁豫地区驻有国民党军16个军及游杂武装4万余人。国民党顽固派为隔断八路军西北、华北地区与新四军华中地区之间的联系，决心首先消灭或驱逐驻太行山南部及太岳地区的八路军，隔断太行抗日根据地与冀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然后进一步夺取太行，冀南两个抗日根据地。

1939年11月下旬，冀察战区第97军军长朱怀冰率部由陵川、辉县北进，于12月初进入冀西地区，抢占要点，包围、压迫晋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第129师青师纵队、冀西游击队等部，摧残冀西抗日政权。

为了争取冀察战区继续共同抗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亲赴冀西地区，向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及朱怀冰说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劝告其停止磨擦，一致对外。鹿钟麟持观望态度，朱怀冰则置若罔闻，并于12月下旬，指使其别动第4纵队侯如墉部和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进攻。八路军第385旅主力和冀西游击队、冀中警备旅等部被迫自卫，于1940年1月12日向侯、乔两部反击，歼其大部，迫使朱怀冰部于2月初向武安、涉县、磁县地区撤县。

国民党顽固派在向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发动进攻的同时。还令其第39集团军石友三部向冀南地区的八路军挑衅。1940年1月下旬，在冀南的南宫、威县、枣强、清河等地，先后将八路军东进纵队2个连和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接着，又围攻东进纵队第3团和清河、清河两县的县大队，企图夺占冀南抗日根据地。为了打退顽军的军事挑衅，八路军总部命令冀南、冀中、冀鲁豫等军区各以一部兵力，于2月9日发起反击。顽军石友三部遭重创后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退向清丰东南地区。

1940年2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又令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再次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同时令在黄河以南的第41、第71军迅即渡河北进，协同朱、石等部夺取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据地。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新的军事进攻，八路军第129师遵照总部的命令，决心在平汉铁路以东进行卫（河）东战役，消灭石友三部；同时，在平汉铁路以西进行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消灭朱怀冰部。

3月4日，八路军集中17个团，发起卫东战役，先后在观城、濮县和清丰县的卫城集等地展开击，歼灭顽军一部。6日，又在濮阳以东地区击溃顽军2个团。顽军受到严重伤亡后撤至民权以东陇海路两侧。4月5日，经过补充后石友三部重占东明城，向八路军反扑。8日，八路军奋起自卫反击，痛击石部，迫使其退向曹县、定陶地区。至此，八路军全部恢复了卫河以东地区，建立了濮阳、长垣和鲁西的范县、朝城等11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磁武涉林反顽战役于3月5日开始。八路军第129师首先反击进占庙庄、前后牧牛池、齐家岭等地的顽军。6日，击溃南北岔口、东西花园等地的顽军。7日至8日，又在芦家寨、姚村及南卷、北卷等地兜击顽军主力，歼其在部，朱怀冰率残部退入修武境内。八路军收复武（安）涉（县）公路以南、林县以北地区。随后，与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达成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是中国共产党在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程中，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策略的结果。这对于阻止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对日妥协投降，制止其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坚持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共御外敌，都具有重要意义。

1940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要达到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发展全国民众运动，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间派的态度是经常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应当针对他们的动摇态度，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中国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要尊重他们的利益；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或变为顽固派的同盟军。反对顽固势力，就是对留在抗日阵营中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的两面政策，对其主张团结抗日的一面采取合作态度，对其摧残进步势力的一面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还要坚持三条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后，应适可而止，实行休战。这是斗争的暂时性。这三条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第四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夏秋，国际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德军继攻占北欧的挪威和丹麦、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之后，对法国展开全面猛烈进攻。意大利也对英、法宣战。6月14日，巴黎陷落。不久，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英军被迫退出欧洲大陆。接着，德军占领英伦海峡诸岛，封锁英国全部海岸线，并对伦敦实行恐怖袭击。一时间，德、意法西斯势力几乎席卷大半个欧洲。德、意法西斯势力在欧洲的嚣张气焰，对于在侵华战争中已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7月27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正式通过陆军部提出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强调“对南方施策应利用形势演变，抓住良机努力推进”，目标是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陆军部随即开始研究南方作战计划，海军则进行对英、美的作战准备。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在柏林签约，结成军事同盟。与此同时，在德国帮助下，日本迫使法国政府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并取得使用海空军基地的权利，从而，完成了“南进”的一个重要布局。

日本法西斯为了放手南进，迫切谋求迅速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11月13日，日本帝国御前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除继续进行武力作战外，应采取断绝英美的援蒋行为及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力求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迫使其迅速屈服”，实现“汪蒋合作”。

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和日本实施南进政策，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10月8日，英国宣布重新开放滇缅公路，接着，英、美政府分别向中国政府提供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

德国和意大利则极力促使日本南进，同时积极劝说蒋介石对日本妥协媾和，加入德、意、日军事同盟。

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避免两面作战，继续采取积极支援中国抗战的政策。

国际风云的变幻，直接影响着蒋介石集团和内外政策。蒋介石“左右逢源”，“等价而沽”。他利用与日本谈判，压英、美、苏给予更多的军援和经援；利用英、美、苏支援中国抗战，向日本价还价。终于在1940年下半年，将反共重心华北转向华中，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一、蒋介石阴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0年7月1日至8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会后，蒋介石指派何应钦、白崇禧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地域问题，并于16日向中共方面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的书面文件，主要内容是：（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并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二）将冀察战区取消，其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并入第2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八路军及新四军于奉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58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13页。

八路军准编为3个军6个师，3个补充团，另再增2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2个师。此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缩，不准自由成立抗日部队。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也不得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在原敌后组织秘密的抗日民众武装。“中央提示案”还规定，八路军、新四军整编后的师是整理师编制，每一整理师为2旅4团建制。按照这一编制。当时50万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缩编成8个整理师，仅10万人。很明显，这个“中央提示案”的企图是阴谋紧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并全部赶到黄河以北贫瘠而狭窄的冀察地区，然后围而歼之。

7月2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系列会议，听取他的报告并进行讨论。8月25日，周恩来从延安经兰州回到重庆。28日起，先后与蒋介石、白崇禧和何应钦会谈。9月间，又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绥远一部；二、按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战。

鉴于国内政治形势正处在剧变的新夜，为使全党对于这种变化，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中共中央于9月10日向全党发出《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强调指出：对于顽固派在暗藏的投降派策动下的分裂投降的危险，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提高警觉，同时，也必须看到苏、美、英等国支持中国抗战，国内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包括国民党广大爱国人士和官兵在内，都反对投降、分裂，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持久抗战是完全可能的。对时局持悲观估计和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19日)电”，诬陷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活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

与此同时，蒋介石调整其军事部署，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骤增至40万之多；密令第3战区顾祝同部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第5战区第21集团军李品仙等部由豫西和鄂东东进，配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准备向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大举进攻。至此，全国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面对国内抗战局势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从顾全抗战大局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及时提出挽救危局的方针和对策。

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要稳健地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发动的反共高潮，军事上要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要强调团结抗日，并要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

11月2日至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先后分别或联名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叶挺、项英等，进一步分析形势，并指示新四军应加紧进行对付反共军事进攻的各项准备；皖南方面拟采取缓和态度，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

11月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

出：“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投降。”“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必须“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的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投降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抗日军瓦解，必使抗战统帅身败名裂，必使全国人民陷入牛马奴隶的境地”，“鹬蚌相争，只使渔人得利。枪口对内，只使亲痛仇快。”强调：“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强调日本的诱降阴谋，响亮地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提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要求“必须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的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

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发出“佳（9日）电”，答复何、白“皓电”。电文历陈八路军、新四军4年多来坚持团结抗战，抵抗强大日军，收复大片国土的事实，驳斥“皓电”中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婉言拒绝其强令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申明，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日。

为了使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事情真相，在重庆的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11月间，他和董必武、叶剑英多次同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张申府、梁漱溟、张君勱、左舜生等商谈时局，阐明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同时，还访问了国民党一些元老派人士，并同各国驻华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如斯特朗等进行广泛接触，详细介绍两年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真相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抗日的事迹。周恩来还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编印各种传单和小册子，在桂林、西安等地向社会各界广泛散发。

“佳电”的发表和周恩来等所做的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阴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维护团结抗日的严正立场，并且是有诚意的，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这对后来皖南事变爆发时社会舆论的向背有着重大的影响。

11月15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击退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措施》，明确指出：“根据中央11月7日对时局指示及朱彭叶项佳日联名复何白电所取政治立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中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自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的安危。“佳电”发出后，中共中央一方面边电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强调形势的严重性，明确指出国国民党顽固派决心要剿灭新四军，要求皖南部队务必于12月底以前全部北移，并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另一方面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问题，要求延缓开动时间，解决给养和弹药，保证途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3～556页。

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中安全；同时，还指示新四军驻苏南和江北的部队积极做好接应皖南部队的准备工作。

新四军皖南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佳电”发出的第二天，叶挺就前往上饶会见顾祝同，交涉北移路线、军需补给和保证北移安全问题；新四军军部又多次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分析国内形势，印发《进军敌后宣传鼓动大纲》，向干部、战士进行教育解释，统一思想认识；同时，还多次派小部队到长江铜陵至繁昌地段沿岩了解情况，筹集船只，为渡江北移作准备。在江北的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也派部队到无为一带沿江地区侦察，布置接应皖南部队北移的准备工作。

但是，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恳言相劝和新四军皖南部队准备北移的实际行动，反而认为“佳电”所取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态度为软弱可欺，竟步步进逼。12月8日，又以何、白名义发出“齐（8日）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悉数调赴河北。”

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新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至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皖中李品仙部于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企图堵击新四军皖南部队渡江北移。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准备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

蒋介石在对中国共产党施加重大军事压力的同时，又施展哄编的一着。12月25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这一天，是4年前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获释的日子。约见开始，蒋介石就对周恩来说：“连是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他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十六年，我们何尝不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他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右，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周恩来在第二天向中共中央报告时，对蒋介石谈话中的许多承诺，一针见血地指出是“靠不住”的因为“其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安徽宁国召开作战会议，确定进攻部署：以其第52、第108师为右翼军，展开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以其第40、第144师、新编第7师为左翼军，展开于茂林、包村、钱家桥之线，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压缩至长江边相机歼灭。同时，以第79师于太平、石埭之间，以第62师于榔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阻止皖南部队南进；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和第2游击区部队于

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122页。

苏皖边郎溪地区，阻止皖南部队东进。并限定以上各部必须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

至此，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反共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鉴于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华中的战略部署的指示》，强调指出：“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根据上述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立即在华中、山东各地及新四军各部队中进行坚决自卫的紧急动员和军事部署，同时，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苏南部队也积极准备接应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

二、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抗敌报》发表长篇社论《临别之言》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告皖南同胞书》。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编成3个纵队按照拟定的路线，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准备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长江，向江北转移。

由于连日大雨，皖南部队行动受阻，至5日15时才到达茂林地区。7日，在星潭附近即遭国民党顽军第40师拦击。8日，被迫改向西南廉岭、高岭方向行动，又遭顽军第79师阻击，不能前进。遂又改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围。此时，顽军新编第7师、第144师已占领云岭、茂林等地，第40师和第144师加紧从东、西两个方向对皖南部队发动进攻。叶挺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激战一日，终将顽军击退，皖南部队转移至茂林以东5公里处的石井坑，准备整顿队伍继续突围时，又遭顽军第40、第52、第108、第144师等部的围攻。皖南部队宁死不屈，浴血苦战。

12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新四军全军东进，行至太平、泾县间之茂林，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

周恩来立即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分别提出严重抗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要蒋立即下令国民党部队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蒋介石表面上虽答应下令查处，但背地里却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12日，国民党顽军5个师对被围的新四军皖南部队实施向心合击。叶挺指挥部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继续与顽军作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至14日，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叶挺在与顽方作最后谈判时被扣，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突围时牺牲。被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页。

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这就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竟于1月17日晚，令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电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悍然宣布新四军“抗命叛变”，着将该军番号撤销，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这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来得后，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义愤填膺地痛斥道：“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后，又乘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

由于国民常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终于出现了严重危机。

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

皖南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共中央决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言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和1月17日命令的反动实质，强调指出“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强烈要求：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家属；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

周恩来、廖承志等在重庆和香港等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17日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在次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轰动了整个山城和国民党统区。18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文章，经周因业审阅后，印成传单散发。同日，董必武还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交谈，介绍皖南事变真相，商讨对策。与此同时，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国际社会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

19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形式，揭露和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好反击顽固派的充分准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中

《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共组织，开展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

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运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坚持抗战。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言谈话，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外理好皖南事变，做到下列几件事（通称“善后办法12条”）：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25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江苏北部的盐城重新成立。尔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以苏中地区部队编为第1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以淮南地区部队编为第2师，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以盐阜、皖东北地区部队编为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淮北豫皖苏边区部队编为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鄂豫边区部队编为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苏南地区部队编为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皖中和原皖南地区部队编为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全军共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

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极力动员全国报纸、电台刊登和广播污蔑、中伤新四军的消息和社论、评论，一方面则广泛宣传皖南事变纯属军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演说中宣称：皖南事变“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企图用执行个别、局部的军纪问题来缩小事变的严重性，掩盖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责，欺骗中外舆论和人民群众。

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解决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严正立场和合理主张，则获得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热情支持。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及参政员张一麐和老国民党员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曾三次写信给蒋介石，极力反对“围剿”新四军，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张君勱等与周恩来叙谈，对国民党大夫所望，痛感必须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日，并准备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在军界，指挥着25万将士的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多次表示不愿内战，愿意推动时局好转。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回人民的反对。而各地方实力派，如山西的阎锡山，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逵，以及云南的龙云，广东的余汉谋等，在此次反共高潮中都站在中立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75页。

《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

地位。在文化界，数百名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海外侨胞联合会及著名人士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分别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倒行逆施，要求制止内战，反对枪口对内。在新闻界，许多进步的新闻记者纷纷发出电讯和评论，认为皖南事变直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深感事态之严重，要求英美等国对中国当局施加压力，勿使事态扩大。美国纽约《华侨日报》、苏联《真理报》、菲律宾马尼拉《建国报》、印尼《民报》和香港《南华日报》等先后发表评论、专论，强调：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中国内战会不会发生，已引起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国内外同胞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尤为惊心动魄，因为这不仅影响抗战能否继续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强烈呼吁蒋介石“以善其后”，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向外！”

苏联对皖南事变的制造者提出了抗议，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会见蒋介石时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英、美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认为，内战只会因强日军的攻击，劝蒋停止国内冲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于2月14日在重庆会见周恩来时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很难赞助。随后，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日本侵略者则于1月24日至2月12日，在华中乘虚而入，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溃败。至此，蒋介石发现自己政治上已陷入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

2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日期临近，蒋介石为了摆脱政治上孤立的困境，千方百计要求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会议。14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以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社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的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将中人中央军委发言人1月20日谈话中提出的“善后办法12条”正式送上，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阿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参政会。这是十分高明的一着。它不仅极大地扩大了“善后办法12条”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而且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对敌抗战的立场，从而博得了国内外更多人士的同情与支持。

18日，周恩来将7参政员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同时将公函副抄送各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议员20余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王世杰接到公函十分紧张，立即与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张冲接连数次找周恩来，要求将公函暂行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周见面谈话。张冲的建议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参政会预定3月1日开幕。国民党方面越来越焦急，希望中共能撤回公函。出席参政会。2月25日晨，张冲再次找到周恩来，提出种种方案，恳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周恩来斩钉截铁地驳回张冲要求，“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清晨，张冲又奉命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国民党顽固派进退失据，一筹莫展。

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并说：“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

《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

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页。

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董必武、邓颖超也在同日写信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表示12条如蒙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可报到出席。“临时解决办庆12条”内容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五、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七、于第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两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上述12条临时解决办法最后虽然仍未被接受，董必武、邓颖超也没有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但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坚定立场，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进步势力的同情与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又一次遭到严重打击。

3月8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接着，参政会又选举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委员。这实际上是蒋介石结束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退兵一招。

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宋美龄也在座。蒋介石这次谈话的目的意在缓和对立气氛。他不再有前一时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谈话一开始，他就向周恩来表示：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这是底下人做的，不明白他的怠旨，周恩来提到防地、扩军问题。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但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而是含糊其词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

在先后两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表现出中共中央领导人政治上的成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既进行坚走而灵活的斗争，又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赢得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向全党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切勿忘记中国的基本矛盾是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上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国共两党继续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就存在；在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的情况下，国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498页。

《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党顽固派的政策依然是两面性的，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它既抗日，但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它既反共，甚至反到发动皖南事变和发布 1 月 17 日命令那种程度，但又不愿意最后破裂。对此，中国共产党只能是针锋相对，实行“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即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加以区别，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与一般的、统制中央政权的和地方实力派加以区别，以利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要准备两种可能性，即从国共两党全面破裂作准备，努力争取继续共同抗日的前途。只有作好应付最困难、最黑暗局面的准备，才能争取好的前途。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

第二十五章 百团大战

第一节 战前国内外形势

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大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破袭正太路战役，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正太铁路，由河北石家庄到山西太原，横越太行山脉，全长200多公里，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

1939年冬以来，日军加紧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正太铁路是日军施行这一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日军在铁路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的兵力守备，并经常派装甲火车巡逻。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的要点，还筑有一线外围据点。日军妄称正太铁路沿线是“不可接近”的地区，用它隔绝八路军总部、第129师活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与晋察冀边区的联系，并以它为依托进攻抗日根据地，为害极大。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这一倒行逆施，削弱了抗日力量，使日军“囚笼政策”得以趁机推行，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严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春，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和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聂荣臻讨论确定破袭正太铁路。切断该路，可使日军在山西的一切运输补给失去保障；对八路军来说，有利于将太行、晋察冀边区这两大基本区连成一片。

正当八路军酝酿破袭正太铁路的时候，欧洲战局急转直下。1940年4月9日，德国出兵占领丹麦，突然袭击挪威，击退英法远征军后，于6月10日占领挪威全境。5月10日德军入侵西欧，5月15日、28日，6月22日，荷兰、比利时、法国先后投降。英军退出欧洲大陆，英国本土受到入侵的严重威胁。欧洲战局急剧变化，刺激了日本迅速压服中国以利下一步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欲望。5月10日，日本陆军省一听到德国入侵西欧的消息，立即聚会磋商对华战争的指导方针，制定了《以昭和15、16年为目标的处理中国问题策略》，并在5月18日召开的陆军省、部首脑会议上正式通过。其要点是，在1940年底以前，进一步统一与加强政略、战略和谋略，以全力迅速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屈服。根据这一《策略》，日军把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上，对当时正在香港与国民党秘密进行的“桐工作”寄予了极大期望，为配合“桐工作”，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

为切断中国西南方面的国际交通运输线，日本趁英、法在欧战中遭受严重失败，在亚洲势力减弱之机，进一步对英法施加压力，威胁它们封锁中缅、中越国际交通线。6月20日，法国同意全面封锁中越边境，准许日本军事人员越监视对华禁运情况。7月12日，英国通知日本同意关闭滇缅路，并于16日正式宣布：自7月18日起，3个月内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运送军械、弹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39页。

药、汽油、载重卡车及铁路材料，香港亦同时禁运。英法的绥靖政策，使侵略者又一次得势，却使处于抗战困难的中国武器进口减少约 51%。

1940 年 5 月 1 日，日军发动了武汉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枣宜作战，不久又在广东方面发动了良口作战，企图对中国政府加强军事压力。在枣宜作战中，日军本无意于长期占领宜昌，但受德军 6 月 14 日占领法国首都巴黎的鼓舞，改变初衷，决定占领宜昌，以便直接威胁重庆，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日军航空兵以宜昌为基地，使 5 月 18 日开始的日军航空兵对大后方的战略轰炸进一步升级。

日本全面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给抗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国民党内一些人更加动摇，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

为克服这一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在 1940 年 7 月 7 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指出：日本“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号召“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把酝酿成熟的破袭正太路设想付诸实施，猛烈出击敌后交通线，给敌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企图，以利全国局势好转。

第二节 战役部署和经过

一、战役部署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后指出：八路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日军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战绩，影响全国抗战局势，兴奋抗战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严重的政治任务。为打击“囚笼政策”，打破日军进犯西安的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日军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同时，对其他重要铁路，特别是平汉、同蒲铁路，应组织有计划的总破袭，以配合正太路破袭战的行动。规定直接参加正大线作战的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要求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第129师派出8个团，第120师派出4至6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也参战；在其他铁路配合作战的兵力，由各区自行安排。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行动命令》，确定了战役部署及作战地域：

晋察冀军区以主力10个团破坏正太铁路平定（不含）至石家庄段，重点破坏娘子关、平定段；对边区周围的北宁、津浦、德石、沧石、平汉等铁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袭之，阻击可能向正太铁路增援之敌。第129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重点破坏阳泉、张净段；对根据地周围的平汉、德石、同蒲、白晋铁路及邯大、临屯公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袭；对平辽公路应派有力部队积极活动。第120师应破袭平遥以北同蒲铁路及汾离公路；破袭同蒲铁路部署应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路增援，并力求以约两个团进至榆次南北地区，配合第129师作战；对晋西北腹地内各个敌据点与交通线，应分派部队积极破袭。总部特务团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待命。战役统一由八路军总部指挥，战役发起时间为8月20日。

上述三大集团根据总部命令，重点对正大路 and 同蒲路北段沿线的敌情、地形、工事和居民等情况进行了侦察和调查，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集团的作战部署，并秘密调集部队，组织参战部队进行短期的攻坚和破路训练，准备物资器材，进行战前动员。地方政府大力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准备各项支前工作。

晋察冀军区于7月27日发出作战命令，作出初步部署，并令军区副参谋长唐延杰率有关侦察人员前往正太路附近侦察。8月15日下午，军区在吊儿村召开主攻方面（正太路东段）作战会议，确定抽调8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又两个骑兵团、3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和5个游击支队，组成3支主力纵队（即右纵队、中央纵队、左纵队）、1支钳制部队和总预备队，担任正太铁路作战任务。同时，对平汉铁路高碑店至石家庄（不含）段、北宁铁路平津段、津浦铁路泊头镇至唐官屯段也作了破袭部署，要求必须切断上述日军交通线，保证主攻方面作战的顺利进行。此外，还部署第2、第5、第8军分区部队，分别在同蒲铁路北段、雁北地区及津浦铁路沿线进行钳制活动。

第129师于7月22日下达了准备进行正太战役的指示，指定8个团参战，

要求参战部队作好准备。8月18日，在和顺县石拐镇师前进指挥所召集作战会议，传达了本师《关于正大战役的作战命令》，其内容是：抽调10个团的兵力，区分为左翼、右翼破击队、平和支队、总预备队（即中央纵队），破袭正太铁路。此外，抽调部队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铁路沿线，广泛破路袭敌，策应正太战役。

第120师决定抽调20个团，重点破击太原以北同蒲铁路和忻静、汾离公路，配合正太线作战。具体部署是：第358旅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忻静公路，独立第2旅破击宁武至朔县间的同蒲铁路，新军暂1师破击神池至五寨间的公路，独立第1旅围困岚县、东村及离石以北之敌据点，决死第2、第4纵队和工卫旅及师特务团破击太汾和汾离公路。

上述部署表明，初期直接参加正太铁路破击作战总兵力约20个团，配合作战的兵力远远超出此数。正太铁路是华北日军的重要交通命脉。破袭正太铁路，日军心然由平汉、同蒲路东西两面反扑。为了阻敌增援，钳制华北日军兵力的机动，相机展开广泛的破袭，收复敌占据点，于是形成了八路军百余团参加正太战役或配合正太战役的局面。（见附图11）

1940年下半年，日军华北方面军约有27万人，华北伪军约14万人（含苏北）。驻正太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的有独立混成第4旅（驻娘子关及其以西，司令部驻阳泉）、第8旅（娘子关以东，司令部驻石家庄）、第9旅（太原附近地区）。百团大战之前，日本中国派遣军于7月20日从华北抽调了6个步兵营和1个山炮营到武汉，增强第11集团军对该地区的守备，其中有独立混成第4、第9旅的部队。加之独立混成第8旅主力在冀中“扫荡”，因此正太铁路沿线日军兵力相对减少。

二、战役经过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

第一阶段为时20天，中心任务是破坏日军交通，重点摧毁正太路。前10天，晋察冀军区、第129师主要是破击正太路；后10天，日军反扑，八路军撤出正太路，晋察冀军区转而出击正太路以北盂县地区，第129师打击前出“扫荡”的日军，第120师在晋西北配合作战。

8月20日，八路军冒雨通过山谷河流，避开日军外围据点，直接运动到正太路两侧，当晚向正太路全线突然发起攻击，奇袭成功。日军事前毫无所知，措手不及，一时全线被动。

晋察冀军区负责破袭正太路东段。此段有敌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和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守备严密。

晋察冀军区右纵队（辖第5、第19团）负责破击正太铁路娘子关至乱柳段。娘子关早在失陷前即构筑有国防工事，日军占领后又依据险峻的山崖加修4个大堡垒，使该关防御能力进一步增强，易守难攻。20日20时，晋察冀军区右纵队主攻部队第5团一部首先潜入娘子关村，歼灭村内伪军。然后依托村庄，仰攻日军堡垒，战士们攀登陡峭的山坡，迎着浓密的火网，勇猛向敌攻击，经3小时反复冲杀，攻克全部堡垒，将守敌大部歼灭，黎明时分，

胜利的旗帜终于插上了三年来日军践踏的娘子关！这是正太线最早攻克的重要战略要点。接着，主力部队掩护工兵，大量破坏敌工事，并将关东铁路桥炸毁，收集了缴获的物资，在日军增援到达之前，主动撤离娘子关。

第5团进行的另一个大的战斗是袭击磨河滩车站。

20日晚，第5团第1营第1连袭入磨河滩，但遭到日军反击，21日拂晓撤出车站。为完成破坏磨河滩车站的任务，当晚第1连又渡过棉河，攻入车站。敌仓惶退入营房抵抗。磨河滩日军有近1000人（其中800人是乘火车路过该站的退役军人），凭坚固守，难以解决战斗，又值天降大雨，棉河水涨，不能徒涉，第1连遂抢占车站西面村庄固守。22日下午，日军400多人开始反击，第5团主力在棉河北岸向敌实施火力袭击。第1连在歼敌50余人后，撤出战斗。

第19团曾攻入巨城和移穰车站。

右纵队有左右友邻部队的策应，受日军反击较晚，因此，破袭战绩较大。

23日，第5团再次攻占娘子关，并炸毁娘子关以东1里左右的石桥，辽破坏了程家陇底、磨河滩之间的铁路。当晚第19团也再次攻入移穰车站，炸毁水塔、铁路。

24至27日，右纵队还炸毁了岩会附近的9孔大石桥、移穰东面的8孔石桥和3孔石桥以及程家陇底、西武庄间的石桥，程家陇底以东木桥也被烧毁。在右纵队大力破袭下，从25日起，正太路娘子关至乱柳段日军交通完全断绝，日军各据点各自为战，陷入异常恐慌之中。

晋察冀军区中央纵队（辖第2、第3、第16团），负责破袭正太路娘子关至微水段和井陉煤矿。井陉煤矿是日军重点守备目标，在新旧两矿周围筑有近4米高的敷设电网的围墙，墙外又增设铁丝网与外壕。在围墙之内。老矿有15个堡垒，新矿有4个堡垒，并在矿北山上筑有3个碉堡，以瞰制全矿区。

20日夜，第3团对井陉煤矿的岗头老矿和东王舍新矿同时发起攻击。第1营在矿工帮助下首先切断电源，迅速攻入新矿，歼敌警备队一部，残敌躲入碉堡死守。第2天下午，全歼守敌，救出日本职员的小女孩2名。接着在工人帮助下，将14台机器，10个锅炉，3座风车，两个大水缸，两座烟筒，5座铁桥和绞车房、电机房、火车站以及矿区重要建筑全部炸毁，搬走了大部物资，使其半年以上不能恢复生产。第3团还夺取了贾庄、南正日军据点，破坏了南正至微水间铁路。第2团攻占乏驴岭铁桥东端堡垒，掩护工兵将铁桥炸毁一段，并一度占领蔡庄日军据点。第16团第2营于20日夜攻入北峪，将守敌大部歼灭，21日掩护工兵破坏北峪石桥；其他各部攻占地都，并将南峪守敌大部歼灭。24日，中央纵队侦知井陉县城已有日军1000余人，南峪、地都也有大批日军增援，日军有大举反扑的可能，乃决定以一部监视和袭扰铁路沿线之敌，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待机。

左纵队（辖冀中警备旅第2团、军区特务团、平井获支队）负责破袭微水至石家庄段。20日夜，平井获支队袭击岩峰，爆破铁路；特务团掩护群众破坏岩峰至威州电线、公路。22日夜，特务团又攻击上安车站。

23日夜，警备旅第2团攻入头泉车站，夺下堡垒两个。随后，左纵队撤出铁路沿线。25日至27日，连续出击，破击平山、获鹿、微水、岩峰间公路。

第129师负责破袭正太路西段。该段有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司令部驻地、

煤矿基地阳泉，并有榆次方面独立混成第9旅的策应。这里是敌我争夺更为激烈的地区。

第129师左翼破击队辖第386旅第16团、决死第1纵队第38、第25团等部，负责破袭正太路寿阳、榆次段。

20日20时总攻发起后，第16团5个连进攻芦家庄车站，连克碉堡4座，将守敌大部歼灭。第16团向榆次游击的两个连配合工兵炸毁了芦家庄至段廷之间的所有桥梁。第38团以突然袭击动作，攻占了上湖、和尚足两个车站。第25团攻克马首车站，日军仓惶逃向寿阳。

第129师右翼破击队由新编第10旅第28、第30团等部组成，任务是破击正太路阳泉至寿阳段。

20日晚总攻发起后，第28团兵分三路，攻击狼峪、张净、芹泉车站；第30团向桑掌、燕子沟进攻。当晚攻占桑掌，并将该处大桥彻底破坏。

21日占领燕子沟，当地两座铁桥也被炸毁。到23日，又攻克狼峪、芹泉等据点。在此期间，右翼队还攻克了坡头、辛庄、赛鱼、铁炉沟、小庄、张庄等车站和据点。

第129师总预备队第772团于8月22日、25日两次强袭平定西南冶西之敌，终于将敌大部歼灭，占领冶西。落摩寺日军被第769团围困10天，到8月31日全部就歼。

至此，正太铁路西段除寿阳等少数据点外，均为第129师所控制。由于部队攻击猛烈，正大路西段日军数日内联络中断，各据点日军在被攻击包围之中，孤军作战，迅速被歼。第129师提出“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破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让敌人用牛驴搬炮弹、飞机大炮”等口号，教育、鼓舞部队，并动员组织民众，争取铁路员工，采用搬拆、爆破、火烧、水淹等方法，大力破坏铁路、车站及其附属设施。

为掩护师的破袭作战，战役开始时，第129师即以总预备队的第14团占领狮脑山。狮脑山位于阳泉西南4公里处，占领该地可以控制阳泉以西十几公里的铁路线，并对阳泉构成严重威胁。敌独立混成第4旅力挽救其守备部队被各个歼灭的命运，扭转阳泉的被动态势，从8月21日上午起，集中阳泉日军，并武装日本侨民，连日出犯狮脑山。敌兵力由200余人增至600余人，在约20架次飞机轰炸扫射和施放毒剂的支援下，连续进行反扑。第129师总预备队顽强阻击，战至25日，先后打退敌多次进攻。

26日，日军进一步增兵，继续向狮脑山反扑。第14团在取得坚守6昼夜、歼敌400余人的重大胜利后，为避免不利情况下的决战，主动撤出狮脑山主峰，继续以小分队钳制敌人，主力转移执行新的破路任务。

在正太线破袭战取得重大胜利，第一步战役目标基本实现，该线日军增强力量，频繁向破袭部队反扑，山西南部日军第36、第37、第41师也准备北援正太路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于26日下达了第二步行动方案，指示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或彻底完成正太战役任务的情况下，行动方针是乘胜开展正太线两侧战斗，力求收复深入我各个根据地内的某些据点，继续坚持正太线的游击战；具体部署是晋察冀军区一部向盂县以北地区活动，第129师一部进击和辽公路，力求收复和、辽两县，第120师一部继续破袭同蒲铁路忻县、太原段，乘胜拔除根据地腹地之敌据点。指示各部可向指定区域预作准备，但不要放松现有任务的执行。

为给第二步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八路军总部于 27 日、29 日一再强调继续破路和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出犯或增援的 1 个营以下的日军部队。根据上述指示，晋察冀军区 27 日命令右纵队继续破路一两天。第 129 师除以部分兵力监视各据点日军外，主力每日轮班破路。在第 129 师连续破袭下，正太路西段除寿阳、阳泉等少数城镇外，基本被破坏，交通完全断绝。

9 月 2 日，八路军总部命令：从 3 日起结束正太战役；各集团按 8 月 26 日命令的第二步行动方针转移兵力，乘正太路遭破坏后，敌不能转移兵力的有利时机，完成第二步计划的任务。

晋察冀军区按照总部 26 日命令，组织进行孟北战役。第 129 师由于日军主力反击，转入打击出犯日军的作战，对进击和辽公路，收复和、辽两城的任务，留待下阶段完成。

9 月 2 日起，晋察冀军区部署新的战役行动，以第 2、第 5、第 16、第 19 团参加主要方向作战，立即向孟县和寿阳以北出动，收复该地区内的敌据点，并规定第 19 团歼灭上、下社敌人，第 5、第 16 团夺取孟县城，第 2 团向西烟、宗艾出击；以第 3 团、第 4 军分区特务营及平并获游击支队一部，继续钳制正太路东段之敌；以骑兵第 1 团主力、第 120 师骑兵营、行灵游击支队及军区教导团在平汉线方面执行钳制任务。

由于正太线的破袭战，使孟县以北敌人主力南调增援，守备兵力减弱，各据点已感到恐慌，晋察冀军区部队展开锐猛攻势后，不少据点守军开始动摇，9 月 5 日下午，下社日军在上社日军接应下，退到上社，在该地仍下敢停留，与上社日军一同连夜向孟县方向逃跑。9 月 5 日晚，第 19 团赶到上社附近后，即与第 2 军分区特务营向逃敌展开追击。此时，第 19 团进至神泉、普田地区的第 1 营截断了日军退向孟县的道路。6 日 9 时，将该敌包围于兴道村。经 5 小时激战，歼其大部，残敌 80 余东逃罗里掌山，复陷于第 19、第 5、第 16 团包围之中。9 日夜，日军大半被歼，只剩下 40 余人趁浓雾突围，逃进孟县城。

第 2 团第 3 营于 7 日占领西烟村，8 日夜冲入日军据守的土寨，日军大肆放毒，突击部队全部中毒后退出，双方各伤亡 20 余人。9 日、10 日继续围困。11 日，西烟日军在孟县日军 200 余人接应下，逃回孟县。

9 月 4 日，日军抽调 2000 余人增援孟县地区，开始反扑。9 月 10 日，晋察冀军区命令第 19、第 5 团留孟县以东以北地区待命，准备配合第 129、第 120 师行动；其余各团向根据地东部、东北部转移，准备执行新任务。

为了钳制正太线方面八路军的破袭作战，转变被动态势，日军纠集独立混成第 4 旅 4 个步兵营（配属第 36 师以 1 个步兵营为基干的支队）、独立混成第 9 旅 3 个步兵营（配属第 36、第 41 师均以 1 个步兵营为基干的支队各 1 个）等部，向第 129 师实施反击。8 月 30 日，独立混成第 9 旅自太谷、榆社之间地区，9 月 1 日，独立混成第 4 旅自平定、和顺、辽县，榆社一带相互策应推进，以松塔、安丰、马坊地区为中心合击第 129 师。

在日军主力转取反攻的形势下，第 129 师各路破击队即由破击作战转入打击出犯日军的作战。左翼队连日在高坪、道坪、红凹、中兰、卷峪沟地区予敌打击。特别是卷峪沟约 15 个小时的阻击战，毙伤敌 200 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合击安丰、马坊地区的企图，掩护了师指挥机关、后勤部门及右翼队的安全转移，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这次战斗后，左翼队亦安全转移到外线。6 日，左翼队、第 772 团将太谷出犯之日军 500 多人包围孟榆社西北的双峰

地区，激战一昼夜，歼敌 400 余，大挫其锐气。第 385 旅于 6 日于张建设伏，重创向辽县撤退的日军。右翼队于 9 月 3 日离开正太线向根据地转移，曾在平定以西打击阳泉出扰日军，消灭日军 100 余人。随后，部队即行分散，展开广泛游击战。至 9 月 15 日，第 129 师粉碎了日军万余兵力的连续反击。

第 120 师为配合正太路破袭战，从 8 月 20 日 20 时开始，对同蒲铁路和晋西北主要公路展开大规模的破击，攻取敌铁路公路线上的据点。

康家会是忻静公路上日军最大的据点，驻有日伪军 50 余人，其东北石神有敌 30 人，西南利润有敌 10 余人，静乐有敌 100 余人。第 358 旅决心以第 4 团 1 个营进攻康家会，两个营在康家会以东的炭窑沟、青龙庄间设伏准备歼灭石神增援之敌；以第 716 团在康家会以西的砚湾设伏，准备歼灭利润、静乐增援之敌。8 月 21 日零时 30 分，第 4 团第 2 营向康家会发起攻击，拂晓时将守敌全歼。由静乐乘 2 辆汽车增援的日军 40 人被第 716 团歼灭，由石神增援之敌也大部被歼。攻克康家会是一次部署周密的速决全歼战，缴获了大批战利品，它是第 120 师发起破袭战役不久即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为扩张战果，第 358 旅以第 4、第 716 团各一部强袭丰润，其余部队负责打援，8 月 25 日晨将丰润山上碉堡攻占。正组织火力准备攻击猗集山下大庙内的日军时，敌增援部队赶到，攻击部队遂撤出战斗。

第 120 师独 1 旅于 8 月 23 日开始行动，第 715 团曾先后两次袭击寨子村，同时袭击岚县。第 2 团在群众配合下，破坏峪口至圪洞公路数里，又在班家庄以西山地伏击日军，并连袭石门鄢、寺圪塔敌据点。8 月 31 日凌晨，独 2 旅第 714 团猛袭宁武、朔县间阳方口，烧毁了车站，破坏了附近铁路设备，切断了同蒲铁路。这次战斗，全歼守敌，毙伤敌 120 余人，俘日军 2 人、伪军 32 人。此外暂 1 师一度袭入五寨；决死第 2、第 4 纵队切断了汾离公路，并一度袭入汾阳以西的王家池；第 359 旅第 717 团多次击退柳林出扰之敌。

第 120 师在晋西北先后作战 180 多次，歼日伪军 800 余人，攻克康家会、阳方口、平社、龙泉等敌车站和据点，一度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以及忻静、太汾、汾离公路敌军交通线，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使其难以增援正太路，有力地支援了第 129 师、晋察冀军区方面的作战。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大体上在 9 月 10 日结束。在第一阶段中，由于部署周密，准备充分，部队行动迅速、秘密，充分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因此给了日军沉重打击。

（二）第二阶段（9 月 22 日至 10 月上旬）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从华北敌后到大后方的报刊大力传播胜利的消息，祝捷电文、信件从四面八方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总部，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士气。延安开了祝捷大会。人们期待着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9 月 10 日指示：“根据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七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打通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击敌和

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

9月16日，总部下达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指示第二阶段作战目的是扩大战果；作战基本方针是继续破坏敌人交通，摧毁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据点。作战部署是：第120师集结主力破击同蒲路宁武、轩岗段；晋察冀军区集结主力破袭涞灵公路，夺取涞、灵两城（主要是涞源），并以有力一部在同蒲路东侧配合第120师作战；第129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的，开展榆辽地区斗争，并以有力一部不断破击白晋铁路北段。此外，对破袭沧石、德石、邯济、平汉、平绥、北宁、津浦铁路，阻敌修复正太铁路，也作了部署。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击了同蒲路。

1、涞灵战役

日军驻蒙军占领的涞源、灵丘地区，深入晋察冀边区西北部。驻涞源、灵丘及其附近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司令部驻张家口）、第26师（司令部驻大同）各一部，共1500余人，另有伪军1000余人。日军受到第一阶段打击后，提高了警惕，各据点纷纷增加兵力（其中涞源城已增到500人左右），增修加固工事，储备粮弹，严加戒备。

晋察冀军区决定调集部队，组织涞灵战役。部署是，以第1、第2、第3、第20、第25等5个团及游击第1、第3支队，第1军分区特务营，军区骑兵第1团的1个营，共约1.5万人，组成右翼队，在战役初期夺取涞源及其附近据点，打敌增援，尔后视情况转移攻势于灵丘外围，协助左翼队相机夺取灵丘；以第6、第26团和察绥游击支队，共约5000人，组成左翼队，在战役初期阻敌增援，以有利于右翼队作战（其中第6团暂归右翼队指挥），尔后在右翼队协助下转移攻势，夺取灵丘及其附近据点。此外，以冀热察挺进军平西军分区第9团袭击桃花堡及其附近据点，随时准备打击向蔚县、涞源增援之敌；以第2军分区第4团活动于五台地区，钳制向灵丘增援之敌。同时，命令冀中军区除以主力一部配合冀南军区破击沧石、德石铁路，另以一部袭击北宁、津浦铁路外，组织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钳制驻冀中日军，使其不得西援。

9月22日22时，涞灵战役开始，右翼队向涞源县城及其周围据点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夜激战，夺占东、西、南关，日军退入城内固守。

23日，右翼队决定先集中力量拔除外围据点，再行攻城。当夜，第2团在第1团1个营及炮兵配合下，猛攻涞源城东10公里处涞（源）易（县）公路上的敌重要据点三甲村，歼敌大部，将其占领。同时，第3团向涞源城东北日军另一重要据点东团堡发起猛攻。该据点由日军第2混成旅的一个教导队共130余人驻守，成员全系各部队选来的士官，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并有坚固的环形防御工事为依托。攻击部队不顾敌人的猛烈火力和不断施放毒剂的威胁，连续勇猛进攻，至24日夜，攻克该村周围全部堡垒，挫了敌人的锐气，将残敌压迫于村中数间房屋死守。

25日，敌将据点库存武器、物资、粮食全部烧毁，准备突围。攻击部队再度向敌猛攻，残敌突围无望，投火自焚。东团堡歼灭战，显示了八路军的

英勇顽强，使日军震动很大。

到26日，右翼队其他部队和平西军分区第9团也连克桃花堡、白乐堡、吉家庄、辛庄、北口、下北头、白石口、中庄、王喜洞、刘家嘴、张家峪、北石佛、金家井等13个据点。

战役发起的第2天，日军开始由张家口等地南援，由于破路不彻底，日军推进迅速。

28日中午，日伪军3000余人搭乘汽车，在坦克20辆、飞机4架的掩护下，进抵涞源城。

在这种情况下，右翼队已难开展有利的攻势，晋察冀军区乃决心转移攻势于灵丘地区，第一步扫除灵丘、浑源间敌据点，第二步夺取大营东南至神堂堡一线及大营、沙河以北山地内敌据点。10月2日，晋察冀军区命令右翼队主力集结涞源以东及东南地区整理，一部监视钳制涞源之敌，另以第1、第2团归左翼队指挥，加入左翼队作战。

10月8日夜，第1团第1营乘南坡头日军一部出动袭击第2团之机，向南坡头发起进攻，一举袭入敌阵，歼敌大部，残敌逃窜。同时，第6团第1营攻克抢风岭，青磁窑日军望风而逃，9日夜，第6团第3营又攻击了金峰店。此外，向灵丘、广灵间出击的第26团8日夜曾一度攻入黄台寺。

10月9日，晋察冀军区发觉第1军分区《抗敌报》第35期9月22日社论无意中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企图泄露。这时，灵丘方面，浑源、广灵日军1300余人南援，开始反扑。涞源、易县、保定、望都、定县、完县、唐县、曲阳、五台等地，日军正集结兵力，准备粮弹。根据以上情况，军区判断日军可能趁军区主力远在灵丘、浑源、广灵地区作战，大举“扫荡”根据地，遂于10日命令左翼队放弃第二步计划，立即结束涞灵战役，第1、第2团归还第1、第3军分区原建制，第6、第26团主力集结适当地区休整，准备反“扫荡”作战。

涞灵战役持续18天，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俘日军49人、伪军237人，八路军伤亡1419人。

为策应涞灵战役，冀中军区在破袭沧石、德石、北宁、津浦铁路的同时，于10月1日至20日进行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百团大战发起后，冀中日军一部西援，大部被束缚在重要交通线上，冀中内地守备较弱。任何大肃地区，自1940年春日军大“扫荡”后，很多村庄建立了伪组织，日伪统治机构大体形成，日伪感到这一地区不足为虑，因而产生麻痹心理，警戒相对疏忽。

冀中军区决定以第18、第23、第30团等部计10个营，共8500余人，编为左翼队、中央队、右翼队进入这个地区作战。计划首先以两翼部队钳制敌人，吸引敌人于任河大肃中心区以外，尔后以中央队突入中心区，打开局面。

10月1日战役开始。左翼队（第18团）进入潞龙河以东，河间、任丘以西地区，2日至6日，连续攻克连家庄、东固贤、良村。在进攻部队的威慑下，7日夜，玉皇庙、丰乐堡、刘善寺各据点敌人，望风逃窜。右翼队（第30团）4个营进入大城以东、子牙河以东地区活动，至7日，连克李民居、邓庄子、石疙瘩、西刘庄、臧庄子、陈村等据点，并大举破路挖沟。中央队（第23团）2个营北渡滹沱河，10月1日，伏击由商家林出动抢粮的日军100余人，歼敌90余人，缴获全部武器。9日，在白马堂伏击由留各庄到里

坦之敌，全歼日伪 20 人。

10 月 15 至 20 日，进行以子牙河东西两岸为重点的第二期作战，在任河大肃中心区，只留小部队坚持。中央队 19 日夜攻克半截河据点，破坏其附近的古洋河上的桥梁。右翼队面临敌情严重，无力采取大的行动。左翼队 16 日夜克大曲堤、任丘石门桥，18 日又克王盘敌据点。

任何大肃战役，毙伤日军 805 人、伪军 322 人、俘日军 3 人、伪军 326 人，攻克据点 29 个，冀中军区部队伤亡 573 人。此役钳制了敌人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涞灵战役。

2、榆辽战役

由阳泉经平定、和顺、辽县到榆社的公路，是日军突入太行根据地最深的一条公路。日军企图将该路向西南延伸，经武乡与白晋铁路相连，以达到分割大行区，灵活调动正太、白晋两线兵力的目的。其中榆辽段长 45 公里，沿线有榆社、沿壁、王景、管头、铺上、小岭底、石匣、辽县等 8 个据点，由日军独立混成第 4 旅第 13 营守备。

9 月 22 日，八路军第 129 师下达榆辽战役基本命令，决定以突然袭击手段消灭榆社至小岭底之敌，收复据点摧毁公路，并乘势向辽县进展，相机收复辽县。作战部署是：以第 385 旅（附第 32 团）为右翼队，主力攻取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敌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之敌；以第 386 旅、决死第 1 纵队各 2 个团为左翼队，攻取榆社、沿壁、三景等据点；以新编第 10 旅为平辽支队，破击平辽公路和顺南北段，截击南援之敌；以太岳军区第 17、第 57 团组成沁北支队，破击白晋路沁县至分水岭段，钳制敌人由白晋铁路抽调兵力增援榆辽地区。

23 日夜，攻坚作战开始。24 日，左翼队攻克沿壁、王景，右翼队攻克铺上、小岭底。至 25 日，榆社县城也被攻克，小岭底至榆社一线只剩管头据点之敌仍在顽抗。同时，平辽支队积极活动，攻占辽县以北寒王镇；沁北支队积极破路，频繁出击，使武乡、白晋路日军受到钳制。

26 日，第 129 师令右翼队以一部继续围攻管头之敌，主力和左翼队东移，乘胜收复辽县并消灭可能援辽之敌。

27 日拂晓，右翼队进攻辽县以西石匣，当夜将其占领。左翼队 28 日进抵马厰附近，准备当晚进攻辽县。这时，和顺、武乡日军分别向辽县、管头增援。八路军总部命令停止进攻辽县，以一部钳制和顺南下之敌，主力转移至红崖头、关帝塄地区，准备歼灭武乡东援之敌。第 129 师遵令转移兵力，同时猛攻管头，在 29 日 24 时将其攻克。30 日 9 时左右，左翼队赶到红崖头以南山地，右翼队尚未到达预伏地区。此时，武乡日军 600 余人正越过预伏地区，其先头与右翼队遭遇。左翼队当机立断，迅速向日军的后尾、侧翼同时展开攻击，日军四面受围，在飞机 8 架掩护下，占领高地顽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天一夜，双方伤亡惨重。到 10 月 1 日黄昏，辽县西援日军 500 余人突破右翼队阻击，逼近左翼队指挥所附近，左翼队奉命撤出战斗。同日，八路军总部鉴于辽县、武乡日军会合，阳泉南援日军 1000 余人已抵辽县以北的寒王镇，第 129 师相当疲劳，伤亡较大，判断增援辽、榆地区的日军可能趁势“扫荡”太北地区，乃决定结束榆辽战役。

3、第 120 师破击同蒲铁路

9 月 12 日，第 120 师下达了同蒲铁路北段行动计划，决心从 9 月 20 日开始破击同蒲铁路宁武、忻县段（重点在宁武、大牛店之间），作战部署是：

第 358 旅破击原平、宁武段，并准备袭击轩岗、良庄、东寨等据点；独 1 旅破击忻县、原平段，并准备袭占忻口、楼板寨等据点；独 2 旅破击宁武、朔县段；特务团位于宁化堡附近，掩护后方联络线；暂 1 师阻击岢岚、五寨增援之敌。前线各部统由第 358 旅指挥。

为防止铁路线再度遭受破击，此时，日军已在同蒲铁路两侧重要据点集结兵力，加强对铁路线的保护。因此，破击同蒲铁路的部队在进入破路作战之前，必须先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敌据点障碍。

9 月 14 日，第 358 旅从根据地娄烦以西地区出发，北越静乐、岚县公路，16 日到达马家沟集结。马家沟与同蒲路宁武、轩岗段之间，隔有头马营、东寨、宁化堡、分水岭、羊圈岭等日军据点。该旅以第 3 支队（辖第 7、第 8 团、特务营）袭击头马营。9 月 18 日 24 时。

第 3 支队以特务营向头马营发起攻击，以第 7、第 8 团打援。战斗至翌日晨，宁化堡日军 40 余人增援头马营，行至山寨村被打援部队包围歼灭。20 日，羊圈岭日军约 200 余人前出至里鄯村企图反扑。该旅第 716 团于当日 14 时向里鄯村之敌发起攻击，次日拂晓，该敌惟恐被歼，逃回羊圈岭。

独 1 旅于 9 月 16 日夜东渡汾河。18 日得悉，羊圈岭日军 400 余人袭击雁北支队扑空后返回上庄，乃决心围歼该敌。遂于 18 日 13 时向该敌发起攻击，激战至 19 日凌晨，旅主力撤出战斗执行破击任务，残敌向羊圈岭退去。这次战斗，独 1 旅伤亡 105 人，毙伤日军约 200 人。

各部队击破阻扰之敌后，即投入对同蒲铁路的破击作战。

22 日晚，第 358 旅第 4 团（附师属工兵连）、师特务团前出到段家岭、轩岗间破坏同蒲铁路数段。与此同时，第 2 团袭击奇村，第 715 团袭击忻口、楼板寨。23 晚，第 2 团破坏忻口以南铁路，第 715 团破坏忻口以北铁路。25 日夜，第 715 团再次破坏了大牛店、轩岗段铁路。独 2 旅也于朔县、宁武间破坏铁路数段。第 120 师经过 6 天的破击作战，使同蒲铁路交通再次中断。

（三）第三阶段（10 月 6 日至翌年 1 月 24 日）

一个多月以来，日军在华北的广大地区连续遭到八路军两次大规模攻势的打击，损失惨重，受到震撼，深感八路军力量的可怕和对其威胁的严重。为防止局势继续恶化，尽快稳住占领区，遂调集重兵，从 10 月 6 日起，先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企图趁八路军连续作战来不及休整之机，打击八路军主力，毁灭抗日根据地。

早在榆辽战役结束的 10 月 1 日，八路军总部在给各大区的指示中，就指出增援辽、榆之敌可能顺势“扫荡”太北地区，各部应有相应的准备。

10 月 19 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反“扫荡”作战计划，要求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部队集结于适当位置，坚决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并注意各区的策应配合。据此各地区军民以连续作战的精神展开了反“扫荡”作战。

1、晋东南反“扫荡”

日军第 1 集团军为打击第 129 师主力，毁灭抗日根据地，从 10 月 6 日至 12 月 5 日，先后“扫荡”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区。第 129 师来不及休整补充，即投入艰苦的反“扫荡”作战。

太行地区

10 月 6 日，冀西武安敌 800 余人，开始“扫荡”阳邑一带。11 日，日军

独立混成第4旅一部从辽县、武乡出发，第36师一部从潞城、襄垣出发，共3000余人，南北策应，“扫荡”榆、辽、武之间的浊漳河两岸地区，合围“清剿”榆辽公路以南，武乡、蟠龙以北地区后，14日自洪水、蟠龙、西营一线东犯东田、左会地区。八路军第385、第386旅，决死第1纵队等部，在内线节节阻击进犯之敌，新10旅在外线积极作战。15日上午新10旅2个团在和辽公路弓家沟伏击敌汽车运输队，毁敌汽车40多辆，歼灭押车日军100余人。此后半个月，日军不敢在和辽公路上运输。17日，“扫荡”之敌分途退去。

10月20日，日军第36师及独立混成第4旅等部近万人，分由武安、辽县、武乡、潞城等地出发，“扫荡”清漳河东西地区，重点指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及第129师师直、晋冀豫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的麻田、左会间地区及涉县、偏城一带。由于此次“扫荡”距上次“扫荡”间隙甚短，规模较大，抗日根据地军民缺乏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主力部队未能转到外线，只在内线被动抗击，难以给敌有力打击，致使日军进入合击地区后，连续数日实行疯狂的“清剿”和烧杀。26日，日军开始回撤，回撤的路上实行分区“扫荡”。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和摧残。

为摆脱被动局面，总部要求第129师下决心寻机歼灭一路敌军，震慑敌胆，使其不敢再以营为单位独立行动，从而拉开“扫荡”间隔，便于根据地军民机动。

29日，“扫荡”黄烟洞之敌第36师一部500余人，辎重民夫400余人，经左会进到蟠龙以东的关家垴，准备返回武乡。当日13时，八路军总部令第129师集中主力歼灭该敌。当日夜，第129师以第385、第386旅主力，新10旅及决死第1纵队各一部，将该敌包围于关家垴，拟于次日4时发起总攻。被围之敌为改变不利态势固守待援，除紧急构筑工事外，趁夜暗袭占了关家垴西南的凤坑顶高地，以两处制高点，互为犄角，固守顽抗。第129师按原定计划向关家垴之敌发起进攻，并分兵一部夺取凤坑顶。被围之敌在飞机火力支援下拼命顽抗。第129师部队以高昂的士气，勇猛攻击，迅速突破敌防御，将其压缩于狭小地区，展开白刃搏斗，激战持续到31日拂晓，敌大部被歼，仅剩60多人死守阵地。下午，黄烟洞方面之敌1500余人，在飞机10余架支援下驰援。第129师鉴于关家垴被围之敌基本歼灭，来援之敌又过大，为保持主动，再寻有利战机歼敌，遂迅速撤出战斗。残敌在援敌接应下，遗尸280余具，向洪水逃去。至此，日军大部已由根据地中心区撤走。

11月初，太行南部黎城日军北犯南、北委泉，继向西井进犯，襄垣日军经西营向蟠龙进犯，企图台击东田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砖壁一带。第386旅奉命急赴蟠龙以东的大陌村南北一线阻击进犯之敌，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

11月3日9时，部队刚在大陌村一带部署就绪，即与来敌展开激战。优势敌人连续发动进攻，并夺占大陌村部分阵地。第386旅顽强扼守，一直坚持到4日凌晨4时，在八路军总部顺利转移后，才撤出战斗。日军合击企图未逞，于5日向白晋线退去。

太行区北部，和顺敌2500余人经寒王镇、长城镇于11月3日到榆社，加强了榆、辽、武地区日军力量。此后，对榆辽公路以南讲堂、岭上、宋家庄、郭郊、大有一带进行了反复“扫荡”。在根据地军民的袭扰打击下，至13日，日军先后退回据点。太行区历时40天的反“扫荡”结束。

太岳地区

从11月17日开始，日军以第37师一部从沁县、■亭镇、南关镇出发，以独立混成第16旅一部从平遥、介休、霍县出发，以第41师1个营从洪洞出发，共7000余人，分路合击沁源及其以北的郭道镇地区。这时，赴太行区的第386旅第16、第772团，决死第1纵队的第25、第38团未归，太岳区兵力薄弱。为避敌锋芒，太岳军区将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组成沁东、沁西2个支队，转移于日军合击圈外的沁河两岸地区，打击敌人分散活动的部队。日军在地方武装袭扰下，于23日进抵合击地区后，即实行分散“清剿”，大烧、大杀、大抢，企图消灭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毁灭根据地。沁源县受摧残最严重，被害群众达5000余人，占全县人口1/10，牲畜被杀近万头，被抢走7000余头，房屋被毁三四万间。

太岳军区部队抓住日军四出“清剿”，兵力分散的机会，积极打击敌人。23日，沁西支队第42团在官滩歼灭日军100余人。27日，第42、第59团各一部又在胡汉坪、马背一带毙伤日军160余人。沁东支队第17、第57团，先后在光凹、陈家沟、龙佛寺、吾元镇、南卫村、南里等处予敌严重打击，其中第17团龙佛寺战斗，即歼日军100余人。第212旅在交口地区也予敌以重创。日军台击企图落空，又遭到不断打击，在对根据地烧杀一阵后，被迫于12月5日分路撤出太岳区。

2、晋察冀边区反“扫荡”

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作战，从日军首先进攻的平西地区开始，逐次展开。

平西反“扫荡”

平西抗日根据地直接威胁着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和华北伪政权中心北平，以及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平汉、平绥线，是日军对晋察冀边首先“扫荡”的目标。

10月13日，日伪军1万余人分10路向平西根据地中心地区——三坡合击。日军吸取冒险轻进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依靠据点逐步推进的战术，每日前进5~10公里。

10月14日，晋察冀军区指示平西：“以内外夹攻密切协同配合作战之方针，击退进犯之敌，粉碎敌之进攻”，“主力已处在内线的保持集结于机动位置，至适当时机，选择敌之薄弱部分解决之，主力免于分散；另以得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游击队开展广泛积极的游击战，于必要时主力再分途绕迂敌侧后。”根据这一精神，平西军分区以主力的适时机动和广泛的游击战对付敌之“扫荡”。经过一周余的作战，不断给敌袭扰打击，使其相当疲劳。日军各路虽深入根据地，但并未摸清军分区主力部队的动向。至11月21日，在敌包围圈进一步缩小时，平西军分区主力由三坡地区跳出敌合围圈，向西南转移，在蓬头与敌进行遭遇战后，顺利转移到板城以东野孤、大台之线。

日军进到三坡地区后，大肆烧杀。由于战前坚壁清野工作不够，大量粮食被抢走。从23日起，日军开始分途撤退。到10月底，主力退出平西，但仍留2000人以上兵力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内修筑据点、公路，仅在昌平、宛平地区就增加据点14处，控制了东斋堂、杜家庄等许多村庄。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出现退缩、减小现象，斗争更加艰苦。

北岳区反“扫荡”

当日军正进攻平西，第一次“扫荡”大行区结束的时候，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指示：进攻平西、太行区之敌均可能转而进攻北岳区，晋察冀边

区应立即准备粉碎敌之“扫荡”的作战，党政军民应切实配合，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主力应集结适当位置，准备坚决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并指示第129、第120师积极配合作战。晋察冀军区争取了1个月宝贵的休整时间，对部队作了补充和调整，加强了战备和敌情侦察，地方工作也作了相应的部署。

11月9日，日军第110师等部及伪军共1.4万余人，首先重点“扫荡”第1军分区所属地区。易县、大龙华、王安镇、涞源、插箭岭之线日伪军由北向南，保定、满城日伪军由东向西，相互策应，企图压迫军分区部队于狭小地区，进行决战。

10日，晋察冀军区下达反“扫荡”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决定在敌人进攻的头一阶段，避免与敌决战，采取广泛积极的游击战，使日军在“扫荡”中住不得其所，行不得其时，食不得其饱，最大限度地疲乏与消耗敌人，主力兵团立即集结起来，置于机动位置，准备于适当时机打击敌人，歼灭敌之一路或两路，以转换战局，彻底粉碎敌之“扫荡”；一切后方机关，均须适当编组，独立自主地分散在适当地区内转旋隐蔽。

12日，针对日军大肆烧杀与破坏的行动，又指示：主力在不妨碍机动原则下仍可分散一部（不超过1/3的兵力）坚决打击敌之烧杀企图。

11月9日，由涞源、易县、保定出动之敌6000余人，连续合击管头、银坊、黄土岭和神北等地。12日，敌合击扑空，即在当地烧杀后分路撤退。此时第1军分区集结第1、第25团，乘机进行截击。敌一路800余人，14日由吴家庄向苑岗撤退中遭到截击，死伤一部，该敌在飞机掩护下突出重围，向管头退去，途中再遭第20团截击，伤亡甚大，逃回满城。

11月13日，完县、唐县、定县、正定、行唐日伪军出动2700余人，向第3军分区所属地区进犯。

14日，定襄、东冶、五台日伪军约2600人分两路向阜平及其西南地区迫进。日军东西两线策应，合击阜平以北的台峪。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及第3、第5军分区指挥机关和第2、第3、第6团等部队在敌合围圈即将形成之前，适时跳出，转移外线。16日，日军合击台峪、张家峪地区。未能转移出去的游击军艰苦奋斗，司令员王溥、政治部副主任郝玉明英勇牺牲，部队伤亡100余人。

11月18日，合击台峪之敌从王快进占阜平城。21日，由大营经神堂堡、吴王口之敌，和由五台经台怀、石咀、龙泉关、下关之敌，也会合于阜平城。日军占阜平后，由阜平中心区向外，由周围各据点向内，对第3军分区所属地区连续合击，反复“扫荡”，残酷烧杀破坏。

在此期间，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根据敌情变化，机动转移，使敌合击屡屡扑空，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只以一部分部队与敌人保持接触，了解敌人的动向，钳制敌人的行动。各分区部队仍不脱离根据地，积极与敌周旋，各游击部队不断袭击敌人，破坏交通，阻敌修路，扰敌后方。

11月21日夜，第2团选派30余人袭入党城，以手榴弹袭击日军宿舍，日军惊慌失措，枪炮射击彻夜未停。26日，第1军分区便衣4名潜入保定，以手榴弹袭击日军正在举行会议的剧场，引起日军后方的惊恐不定。侵入根据地之敌，半个月来不断遭到打击，饥疲交困，遂于25日分路撤退。

至12月3日，日军大部退出北岳区，但在阜平、王快、党城、曲阳之线，

留驻 1000 余人，继续建点修路，企图久踞。

为迫退深入阜平之敌，拔除敌占据点，彻底粉碎日伪“扫荡”，12月9日，晋察冀军区组织第2、第3、第4、第6团进行阜（平）王（快）战役，具体部署是：以第4、第6团先攻东庄，再攻阜平，第2、第3团位于王林口、王快、党城以北地区配合；攻阜平得手后，以第2、第3团向东扩大战果，攻取王快。

14日21时，第6团向东庄之敌发起猛攻，第1营一举攻克东庄北山堡垒3个，冲入村内，日军反扑夺回堡垒。第6团投入主力与反扑之敌肉搏数次，阵地堡垒几易其手，毙伤日军170余人。与此同时，第4团向阜平之敌展开攻击，第2团、游击军一度攻入党城和灵山。其他部队在阜平至曲阳沿线，进行袭扰、围困，破坏交通，消耗和疲惫敌人。21日王快之敌130余人押送100余驮子军需品，行至王林口被全歼。

26日，平汉路宣村地区伏击战，炸毁日军列车及所载汽车14辆，重炮3门。27日，由阜平东庄北犯之敌1200余人，在罗峪、土门遭袭击，死伤140余人。在晋察冀边区军民沉重打击下，留驻之日军被迫于1941年元旦起先后从阜平、东庄、王快撤退。到1月4日，持续55天的反“扫荡”基本结束，晋察冀军区共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自身伤亡1382人。

3、晋西北反“扫荡”

10月25日至11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等部约4000人，“扫荡”晋西北第8军分区和第3军分区米峪、娄烦一带，遭到当地军民打击。12月中旬，日军抽调驻晋南的第37师、驻晋东南的第41师各一部，配合驻晋西北的独立混成第3、第9、第16旅及第26师各一部共2万余人，准备全面“扫荡”晋西北。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后，第120师预料日军必来报复，积极准备反“扫荡”。

10月30日，该师奉命组建晋西北军区，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兴县李家湾举行了军区成立大会。晋西北军区辖直属军分区及第2、第3、第4、第8、雁北等6个军分区。军区在成立过程中，调整了一些部队的建制，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部队更加精干。12月14日，晋西北军区指示各军分区：反“扫荡”作战方针基本上是游击战，但需有相当主力集结，以便机动；各分区需有1个团以上的兵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游击；各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及地方武装，须围绕着进攻之敌，不断抗击，并派一部在敌后破坏交通；各分区须负责保护粮食，立即帮助、检查群众空舍清野工作。

12月14日起，日军各路相继开始对晋西北地区进行全面“扫荡”。敌5000余人从太汾、汾离公路据点出动，北犯第8军分区米峪镇地区；敌4000余人从离石、柳林出动，进犯临县地区；敌6000余人19日从岚县、奇岚等据点出动，进攻兴县和保德以南地区。

至12月23日，日军侵占了晋西北除保德、河曲两县以外的全部县城、大部集镇和黄河渡口，开始有计划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和汉奸伪装八路军，诱杀群众；派出基干支队分进合击，反复“扫荡”，寻歼党政军领导机关；重点破坏八路军后方机关和设施。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残暴、野蛮、毒辣至极。根据地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扫荡”中，群众被惨杀者达5000余人，仅兴县地

区被抢、被烧的粮食即达 15 万斤，仅第 4 军分区被抢、被杀牲畜即达 5000 余头，被烧毁的房屋、窑洞达 1.9 万多间。

晋西北军区部队在反“扫荡”初期，主要以部分兵力配合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袭扰、钳制进攻之敌，破袭敌之交通运输，掩护群众转移。主力部队避开敌之锋芒，转到外线，寻机袭击敌人。第 4 军分区部队先后袭击了方山、峪口、信义等据点，并多次袭击临县和安叶村。师属教导团等部曾袭入兴县东关，又在兴县以南伏击敌“清剿”部队。第 358 旅和工卫旅，分别对“扫荡”米峪镇之敌进行多次袭击和阻击。独 1 旅和决死第 4 纵队，在大武以北不断袭击敌据点，破坏公路，断敌交通。在晋西北军民的有力打击下，敌难以继续“清剿”，遂改为修筑公路，设立据点，企图长期驻守，以分割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为粉碎日军这一险恶的企图，12 月 27 日，晋西北军区指示各分区动员一切力量，打破日军修路筑点计划；命令第 358 旅负责打击岚县至大蛇头、普明至赤坚岭修路之敌，独 1 旅负责破击大武至临县公路，决死第 4 纵队破击大武至方山公路。据此，独 1 旅第 2 团组织群众 2000 余人两次破击大武、三交间公路，使临县之敌不得不绕道方山与离石联系；离石游击队带领群众两次破击离石、军渡间公路，毁公路 30 余里；第 2、第 35 团各一部，连续袭击汾阳至柳林公路线上的信义、上白霜、张家山等据点。在内线坚持的各团还抽调干部组成便衣工作团与地方工作团一起，在精干部队掩护下破坏敌新建据点周围的“维持会”。第 715 团一部与临县游击队一起袭入临县县城，捕捉了南关“维持会”代表。决死第 2 纵队第 4 团深入到晋中平川，在下曲镇诱伏文水之敌，歼日伪军 100 余人；工卫旅在太汾公路连续进行了破击战。独 2 旅第 714 团、暂 1 师第 36 团和雁北支队各一部，曾袭入神池、阳方口等据点，并 3 次袭入义井镇；第 714 团在朔县利民堡西南解家岭击溃了企图伏击该团的日伪军并歼其一部。第 358 旅第 716 团奉命由娄烦以西出发，三天赶到兴县界河口附近，与在该地区活动的第 7 团相配合，打击“扫荡”之敌与袭击驻止之敌，使敌下敢出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在根据地军民英勇战斗下，日军修路筑点计划遭到破产。从 1941 年 1 月 2 日起，日伪军开始分途撤退，到 1 月 24 日全部退回原据点。

晋西北军区冬季反“扫荡”，历时 40 天，歼敌 2500 余人，破坏公路 125 公里，桥梁 23 座，在战役中被敌侵占的所有城镇全部收复。

第三节 百团大战的影响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20日的破击战开始，至1941年1月24日反“扫荡”结束，历时5个多月。

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公布，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里，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内有营长以上军官18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以上共46380人）；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铁轨21.7万余根，枕木154.9万余根，电线杆10.9万余根，收电话线42.4万余公斤；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与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日伪军兵力损失，若加上晋察冀军区阜平战役毙伤的2000余人，晋西北反“扫荡”毙伤的2500余人，则达到50880余人。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敌华北方面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军震动极大。日军华北方面军在作战记录和向陆军省报告中写道：共军“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石太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对桥梁、轨道、通信网、火车站设施等重要技术性设备，予以彻底摧毁。在进行破坏时，隐蔽伪装得极为巧妙。”经过这一战役，日军内部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经验教训，对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进一步明确了在华北作战以中共军队为重点的指导思想。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把此役称为挖心战，以后每年8月20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百团大战对粉碎日本威压诱逼中国政府迅速屈服的狂妄企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夏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迫使中国妥协，运用了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一切手段，进占宜昌窥视陪都，持续地大规模地轰炸重庆，全力展开诱降的“桐工作”，封锁滇缅路，断绝国际交通等，一时间给中国抗战造成空前严重的危机，侵略者正踌躇满志地等待着“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的成功。然而百团大战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的黄粱美梦，近卫首相的“坚信板蒋（板垣、蒋介石）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变成了“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抱最大希望的桐工作，终于未获结果”。

百团大战，推迟了日本的南进步伐。1940年上半年，德国法西斯在北欧西欧的接连胜利，使日本侵略者大受鼓舞，刚上台的第二届近卫内阁，野心勃勃地提出“向以南方施策为重点的体制转变”，确定利用急转直下的世界形势，抓住难得的良机，促进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同时，解决南方问题。7月下旬，在《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中决定，为解决南方问题可行使武力，行使武力只限于以英国为战争对手，但对美开战将难避免，

《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5、296、309页。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51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574~575页。

故须做好充分准备。为此，要实行强力政治，广泛发动总动员，确立战时经济态势，积聚战争资材及扩充船只，扩大生产及调整与充实军备，统一国内舆论等，并强调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时间以8月末为目标。作为南进的第一步，日军第5师9月23日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强行登陆。但是，南进计划突然又被迫发生逆转。日本陆相东条和参谋总长杉山一致认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为此，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提出，不应变更倾注主力于中国的宗旨，反对从1941年起缩减在华兵力。于是日本只有暂时收回南方作战的矛头，乘机南进只好以“口号演习”宣告收场。在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中，百团大战不能不说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推迟日本的南进步伐，无疑给英美及东南亚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

百团大战，由于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超过了部队和根据地补给能力的限度，部队消耗过大，在日军报复“扫荡”时，已相当疲劳，因此对日军打击不力，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加重了以后的困难。在有些地区，如太岳、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出现缩小现象。

百团大战是在中国抗战处于困难、妥协投降空气甚浓的时候取得重大胜利的，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它钳制了大批在华日军，1941年初日军又将第17、第33师由华中调往华北，从而进一步减轻了华中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百团大战的捷报传开之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报社电台相继发表社论、社评，各地纷纷举行祝捷会、庆功会，群情振奋，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遏制了妥协投降的暗流，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揭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等谎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

在百团大战中，华北抗日军民取得了巨大胜利，积累了大规模作战的经验，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付出了重大牺牲和代价。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前3个半月作战中，伤亡1.7万人，中毒2万余人。

百团大战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苏联《红星报》予以赞扬，美国合众社等驻北平记者冲破日军新闻封锁，在百团大战期间连续报道了交战消息。当时在华北敌后的不少外国记者、学者，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对百团大战作了充分的肯定。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经过长时间的筹划，朱德和彭德怀在1940年8月初发布最后命令，对日军展开百团大战。……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五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敌人所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八路军在国际上的影响扩大，声誉大为提高。

第四编 小 结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为寻找解决“中国事变”的出路，并应付长期战争带来的困难，不得不改变侵华政策，将前一阶段以战略为主政略为辅的方针，改变为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方针，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和“以战养战”的政策，通过分裂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牢固控制已占地区，压迫和引诱国民党、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以实现灭亡中国的迷梦。中国面临打破敌政略分化和军事进攻，进一步转化敌我力量对比的新的战略任务。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同样对中国极其不利。在欧洲，德、意法西斯日益嚣张，英、法节节败退。在远东，英、法、美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矛盾，维护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一再纵容日本的侵略行动，迎合日本的要求，并积极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实现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给中国坚持抗战带来严重威胁。

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时期正是实现其尽快逼迫中国屈服，以便抽出身来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最好时机。日本以全力策动的诱降工作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日本期望一旦汪精卫公开树起“和平”旗号，中国的主要社会力量就会集合到他的周围，地方势力便会投汪倒蒋的情况并未出现。汪精卫逃出了重庆，可应者寥寥，结果不过是国民党内亲日派与英、美派的公开决裂，在全国上下讨汪反投降的怒潮中，在一定意义上反倒促使动摇抗战意志趋向坚定，给企图妥协者以精神威慑。汪伪中央政权只不过是一具政治僵尸。日本为寻求汪蒋合流而展开的“桐工作”，也以失败而告终。日本的政略进攻走进死胡同。

巩固占领区和确保占领区的“安定”，是日本在这一阶段军事战略的主要任务。日本侵略者认为，仅是由于他们忽视和认识不足，才使中共的势力壮大起来，因此，只要日军主力转移到占领区作战，自然会所向披靡。从1939年起，日军以在中国关内总兵力的大部及全部伪军，对占领区进行连续两年的“治安肃正”作战，企图将日军对“点”和“线”的占领，扩展为对“面”的占领。但是，华北日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1000以上至5万兵力的“扫荡”近百次，大部分“扫荡”均遭到惨重失败，恢复对“面”的占领的目的并未达到，占领区“治安”的情况反而进一步恶化。侵略者这时才认识到，在军事战略上犯了更大的错误。

在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调整了指挥系统，对部队进行了部分的补充和整训，使战斗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在抗击日军数次的有限进攻中，基本稳定了原有的战线，并在1939年冬季攻势中，对日军实施了广泛的袭击，给敌一定的打击和消耗，在战略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作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正面战场作战的范围、规模及频繁程度，都较战略防御阶段有明显的减弱，各战区部队未能充分积极作战，主动策应配合，以钳制更多日军。在日本诱降和国际绥靖主义者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反共分裂和妥协投降倾向显著增长。五届五中全会及其“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提出和实施，两次反共高潮的掀起，给坚持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加重了相持阶段的困难。由于反共分裂、妥协投降不得人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领导敌后抗战的军民，对顽固

派的反共磨擦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给以有力的打击，终于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抗战克服了新的危机。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面对敌重兵回师占领区的残酷进攻，以主力的坚决战斗，保卫了华北敌后的平原和山区抗日根据地，并乘敌无力兼顾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了华中和华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两年来万余次对日伪军的作战（其中包括以 100 余个团、数十万兵力的华北最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粉碎敌人大规模“扫荡”近百次，歼灭了大批日伪军，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除抗日联军仍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外，在关内形成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战略区，正规部队发展到 50 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 1 亿以上。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中国抗战相持阶段提出的总任务和战略策略，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针，使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妥协投降势力，渡过了分裂倒退和妥协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在两年的英勇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伪军频繁进攻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武装，成为对日伪军积极作战的主力军。（见附图 12）

在战略相持阶段前期，严重分裂、妥协危机的克服，正面战场战线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敌后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壮大，这些都为适应相持阶段后期更为艰苦的斗争形势，积蓄反攻力量，争取新的胜利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